《汉译大众精品文库》人物类

冬天里的尼克松

[美]莫尼卡·克罗利 著
杨仁敬 詹树魁 周南翼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汉译大众精品文库〕人物类

主编：吴 源
策划：佘江涛

精译

史诗般的故事

NIXON IN WINTER

冬天里的尼克松

冬天里的尼克松

〔美〕莫尼卡·克罗利 著
杨仁敬 詹树魁 周南翼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史诗般的结局

91825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冬天里的尼克松/(美)克罗利著;杨仁敬,詹树魁,周南翼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11
(汉译大众精品)
书名原文:Nixon in Winter
ISBN 7－214－02596－5

Ⅰ.冬… Ⅱ.①克...②杨...③詹...④周... Ⅲ.尼克松,世界局势 Ⅳ.K837.1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2955 号

书　　名	冬天里的尼克松
著　　者	[美]莫尼卡·克罗利
译　　者	杨仁敬　詹树魁　周南翼
责任编辑	余江涛　许尔兵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徐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8.5　插页 2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596—5/D·393
定　　价	24.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作者的话

“这是一本回忆录，一本回忆录专著。”理查德·尼克松在1978年出版的他的自传《尼克松回忆录》中，开头是这么写的。这本书也是一本回忆录，它既属于前总统尼克松，也属于我。它是一本描述尼克松总统退出政坛的最后岁月的回忆录，又是我跟他一起工作的不平凡的四年的记录。

本书的第一卷《记录外的尼克松》于1996年问世。它介绍了尼克松的领导观、他的思想以及从1990年至1994年他去世为止在美国政界的活动。

本书第二卷按年代顺序叙述了尼克松对外政策的思想转变，他对水门事件的最终看法和后来发生的丑闻以及他始终不懈地要求对他个人和政治方面重新进行评价。

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尼克松以不断改变自己的形象，成为一种更有效、更坚定的政治力量，成为一个“新尼克松”而闻名于世。他在跌了一大跤以后又以奋斗不息的雄心壮志爬上了更高的地位。本书描写的“最后的尼克松”，有点受到年龄和经历的驱使和磨练。它是一个史诗般的故事的史诗般的结局。我有幸见到了这个结局，如今在这两卷里加以复述。

F238/12

不过,如果他不许我了解最后的尼克松和真正的尼克松,那将是不可能的。我一定要经常感谢他,让我看到他在得势时和在困境中的真面目,分享他的智慧、遗憾、胜利、失误、慷慨、幽默和友谊。由于他的开放心态,我不仅成了他生活的观察者,而且变为他生活的参与者之一。

在完成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许多人的支持和鼓励。我谨向蓝登书屋贸易集团的主席哈罗尔德·伊万斯表示深深的谢意。他对本书的信心从未改变。我也感谢波布·鲁米斯。他的一流的编辑技巧使我的草稿变成书稿。能跟他们二位一道工作是我莫大的荣幸。

我还要感谢威廉·沙怀尔,在没多少人支持我时,他对我充满信心。还有弗兰克·加弗尼、罗杰·罗宾逊和莱尔达·布里斯,他们首先鼓励我搞这个项目。我的代理人卡尔·布兰特总是有问必答,兴致勃勃。我的朋友、网络联网咨询公司的保尔·帕南波提供了电脑服务,在我最需要听听原稿时给予了支持。

我特别感激我的一家人:我母亲特里西娅、我姐姐乔西琳、我祖父母斯坦利和弗洛伦斯·巴伦和我叔父、叔母唐纳德和兰茜·布朗茨特。他们给了我无限的爱和支持,没有要求什么回报。

最后,我感谢上帝给了我这么幸福的生活。

莫尼卡·克罗利
1997 年 11 月
于新泽西州华伦

前　　言

1989年8月底炎热而多雾的一天,我收到了用一只细长的信封装着的邀请信。信上的词句是用深蓝色的墨水手写的,向着信纸的右边倾斜,在右手角下边用庄重的花饰结束。写这封短信的人写道:他多么赞赏一个月以前我写给他的原信,并答应在双方都方便的时候会见我,共同讨论美国的外交政策。信上的签名是:"你真挚的理查德·尼克松。"

我将这封信放下,接着又读了一遍。信中的词句很简单,但涵义深刻:美国第37届总统想跟我讨论世界的状况;跟一个他从没见过面的人,在他当选总统那年出生的人讨论。她对他的第一次回忆是他在电视上的形象:他告诉美国人民他已决定辞去总统职

务。我5岁时,正当我注视着他那一刻,他说的话我不理解。这时,我手上拿着他写给我的一封信,无法预料它对于他的生活和我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在我收到他的信以前三个月,我准备在升入高年级前离开柯尔格特大学的校园去度暑假。在罗伯特·库夫曼教授的建议下,我读了尼克松的书《1999年:不战而胜》。它在许多重大的外交政策问题上,对我的思想有巨大的促进,所以我给尼克松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我同意他的许多看法,对其他见解则不敢苟同。我将信寄出去,但不敢奢望得到复信。几个星期以后,我走到自己的信箱,取回了这封不平凡的邀请信。

1989年10月2日,我们第一次见面了。我们坐在新泽西北部他的办公室里,四周是他走向权力高峰和穿过政治复苏的走廊时所收集的东西:一张曾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待过的陈旧而豪华的办公桌、一张艾森豪威尔画的农场的宁静的景色的油画、林肯和丘吉尔的半身雕像、许多装订成册的总统文件。我们讨论了两小时有关世界政治的问题。他说话有力、沉着、语调有节奏,仿佛经过多年劝说和影响显得更完美了。他很注意听,吸收别人说的意见,并跟他自己已形成的看法进行比较。第一次会面使我形成了一个永恒的角色,作为他的外交政策的助理。这一职业仿佛带我走遍全世界,跨越美国,进入我们当代一个最高领导人的心境。

从1990年7月至1994年4月他去世时为止,我有幸每天有数小时跟这位前总统进行交谈,同他一起完成他最后两部书——《只争朝夕》和《超越和平》——的写作,陪他到国内外旅行,准备研究资料,讨论他的思想观点、计划、希望和挫折等,有时干脆同情地倾听他的诉说。我成了他一个专职的知

己的女友、他圈子里的一员，成了他允许进入他自己营造的避风港的少数人之一。

本书第一卷《记录外的尼克松》于1996年夏末出版以后，常常有人问我：尼克松为什么这么信任我，特别是他所信任的人这么经常地背叛了他。我相信这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首先，我是个年轻的记者。我来找他，没有带着别有用心的动机或议事日程。尼克松对我说话时，从内容上看并不是答记者问，而是一种无拘无束的谈话，所以谈话过程中，他用不着使用外交辞令，也不必为自己辩护。他完全可以自由自在地谈话。

其次，我认为他信任我，因为他将我当成他自己和未来一代的联络员，一个他可以对她最后一次讲述他的故事的人、一个他可以依靠她将他的故事再告诉别人的人。它是一种最后宣泄的行为，既表达了他对那个故事的自信，又反映了他最后完全接受它那些史诗般的章节的满足。

在他最后的岁月里，我常常给他叫去，作为了解他的经历的学生、他的临终年代里的证人，尽量按照他的教导多记录一些东西。随着他的生命终点越来越临近，他感到迫切需要在新一代面前最后说几句，以恢复他原来的地位，让人家最后瞧一瞧他这么细心地深藏不露的他自己的一部分。

我被选择来最后瞧一瞧他，这实在太棒了。我对跟他一起工作的经历，从1990年开始保持天天记日记。我们交谈时，我记了笔记，然后两次加以誊写打印，一次是交谈后马上进行，另一次是后来搞的，以便保持他谈话的连贯性。尼克松个人的或职业上的秘密很自信地公开了，但它们最后要由我以精确的理解，详细地加以叙述。经过我们多次交谈，尼克松

肯定：他提供的信息、经历和想象在他从政界消失以后还会长久存在下去。本书尽量以他的活动和判断为叙述中心，以展现它们对尼克松在他生活的冬天里有多少作用。

我们的讨论有许多涉及对公众猜测的细心的评论，但大部分是私人谈话的非常自然而忠实的反映。这些评论和经历在这里完全按原先的谈话和所发生的实况写出来。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以尼克松富有活力的矛盾和他生动而复杂的一切，按照我所了解的尼克松，将他展示出来。

要了解理查德·尼克松，就是要了解我们政治文化的动态。政策和个性包含其中，进步与传统主义处于不断的紧张状态。1946年他以职业的责任感和既有巨大成就又有悲剧性错误的倾向跨上了权力的门槛。正是在理查德·尼克松身上，我们看到了自己：我们的伟大和低贱的潜力、罪恶和赎罪的潜力以及丑闻和光荣的潜力。1952年，他作为副总统的提名人在华盛顿举行了第一次重要的记者招待会时，被迫否认他有更大的野心，并拒绝考虑关于他在1956年的选举中可能落选的谣传。"除了尽力做好我的工作，"他说，"我绝没有更多的野心。"当然，野心总是有的，它逼使他达到更高的目标，即使当他处于政治上流放的最黑暗的牢笼里的时候。

正是这种突出的适应能力，使他在寻求和掌握权力时显得与众不同，在他失去了尊严后长期保持了他的活力。不管遭到了什么毁灭性的失败，尼克松仍是个充满希望的现实主义者。他相信，一旦将他的总统工作与那些在他前后担任总统的人相比，一旦将他的错误与他的成就联系起来看，他的总统任职与最后书写的历史之间过去了足够的时间，人们就会判定，如果他不是个伟大的总统，至少也是个好总统。我希望

这本书和先前出版的《记录外的尼克松》将把读者放在跟他一样的位置，像我一样，倾听他的意见，看看他的行动，观察他的老习惯，以此增进对他的历史的理解。

我认为，尼克松影响历史的最好方法是他为自己申辩。如果从1969年至1974年他在录音带上留下的谈话以及他的行动是判断他履行总统职责的标准，那么他御任总统后几年来的言论和行动就是评价他离任后各项活动的关键。如果历史是公正的话，那么对尼克松的评价必须以从他诞生到去世的全部生活经历为基础。

这是他给了我独特的机会撰写的一本回忆录。当时我年仅21岁，我跟他一道工作，观察他和了解他。但这也是他的最后的回忆录。这是他的故事。这是他的遗言。它是理查德·尼克松用自己的声音告诉我们：美国第37届总统实际上是怎么样的人？他为什么比20世纪任何其他人物更加持续不断地体现了美国的经验？

Copyright: 1998 BY CROWLEY & BARON, INC.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RANDT & BRANDT LITERARY AGENTS,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Literary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1999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合同登记
图字：10—1999—115 号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部分　1994 年 1 月 16 日 ……………………… (1)
第二部分　尼克松与世界……………………………… (13)
　第一章　冷战的结束………………………………… (15)
　第二章　尼克松在中国……………………………… (230)
　第三章　海湾战争…………………………………… (303)
　第四章　越南战争的遗产…………………………… (349)
第三部分　丑　闻…………………………………… (393)
　第一章　水门事件…………………………………… (395)
　第二章　肯尼迪、克林顿、托马斯与派克伍德
　……………………………………………………… (445)
第四部分　反　思…………………………………… (473)
　第一章　论哲学、宗教和人性 ……………………… (475)
　第二章　论家庭……………………………………… (506)
　第三章　论年龄、死亡和目标 ……………………… (525)
第五部分　最后的尼克松…………………………… (567)
译后记……………………………………………… (579)

第 一 部 分

1994 年 1 月 16 日

并不是尼克松的含混使他那么迷人，而是他的生活的史诗般的时刻改变了纯粹是普通常识、幽默、温柔和脆弱的方法。在他的政治天才的背后是消除敌意的普通东西，一种不属于公共形象的人性。在那些寂静的星期天下午，我看到了为数不多的其他人已经看到的东西：尼克松是真实的。

1994年1月16日。星期日。东北部。寒冷而晴朗的黎明。冬天里不下雪。它是难得见到的一天。阳光似乎特别灿烂。往常太阳总是躲在又低又厚的灰色的云层里,夹带着暴风雨。气温在零点冰冻以下,使大部分人不敢出门,避开酷寒和恰好留在门外的严冬那白茫茫的一片面纱。

美国第37届总统尼克松早晨5点30分工作,跨出门外,受到无情的严寒的袭击,马上回到屋里。他不愿意让这些寒冷的因素使他不能进行每天三英里的散步,他又冒险走出去,只是再一次转回来。他10点钟打电话给我,他似乎得了独居斗室的烦躁症,要我当天下午去,这样我们可以继续编辑他的最后一本书《超越和平》。

“莫尼卡，”他在电话里说，“我没法出去照常散步。我试走出去两回，但天实在太冷了。我连走到报栏都不行，因为前面人行道上给冰封着了。我害怕我会摔倒，跌断髋骨或什么地方，后来我想我实在不中用了。所以，我只好坐在这里，往窗外看看。这很像在家里给软禁了。”他停了一停。

“好吧！我肯定，我的政敌很爱听到这件事的！”他说着，笑了，“听着，请你4点钟左右过来，一起搞搞那本书的最后部分，好吗？”

“一定准时到。”我答道，“请在家里待着，等我将报纸带上去给你。”

“如果你走上人行道摔断了髋骨怎么办？噢，我的上帝！你可别跌断什么骨头。你还年轻。不过，你很快能治好。”他说，“不管怎么说，小心点！”

我按约定的时间到达他的住处。当我小心翼翼地走上那条人行道时，我听到尼克松在二楼敲敲窗子。我抬头看时，我看到他在向我招手，做手势示意我要抓住扶手。我照办了。他竖起大拇指，突然笑了一笑。

前门开了。屋里莫名地寂静。七个月前，尼克松太太去世后，这屋里变得更寂静了，仿佛由于失去了一位给它带来生机的住客而静下来了。由于前总统尼克松大部分时间待在他的书房里，其他房间好像离他越来越遥远了。他从其他房间走过时，常常驻足往里面窥视，仿佛他想看到其中有什么新东西，那会吸引他走进去或使他待下去。他什么也没发现，转身就走，按原路返回书房，那熟悉的房间好像只属于他。

“莫尼卡！”我爬上楼梯顶端到达三楼他的书房时，他喊道，“你按着扶手上来，我很高兴。否则你会滑倒摔断什么骨

头的。如果发生了那种情况，我的上帝！还有谁能编这本鬼书?"他说着，笑了，"在你平常坐的椅子上坐下吧！"

他拉直了领带："好啦，你能来，我很高兴。我知道这编辑的事很单调乏味，但我们不得不艰苦地搞完它，这可能是我最后的一本书……"

我提醒他：那方面内容从1962年他的第一本书《六次危机》出版以来已经反复使用过了，"你在这个问题上没什么可信的了。"

"我明白。"他说，"可这回我是动真格的。"

我们一起笑了。

"好啦，我就算你对。算了吧！不，我真想是这么回事。我拿不准，我心里还有别的想法。"他停了一停，"如果我活到100岁，也许我会那样。"

他从我们前面有垫的矮凳上拿起书稿的草稿本，并戴上眼镜。"我真讨厌这副眼镜，"他说，"我想，它使我看起来有100岁！"

他不等我回答就举起手说："我知道你会常常对我说些好话，说我不算老，我很赞赏，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他将一部分书稿交给我："要做这个，惟一的办法是一行一行来。我们应该比我们的批评家们先走一步。如果你发现哪怕是一点点小东西使你感到不舒服，我们就将它拿掉。这是件很艰巨很艰巨的工作。不过，如果我们写出了一些得体的东西，一些人们将注意的东西，一些会产生影响的东西，那是很值得的。"

花了近两个小时，我们读了《超越和平》中200页部分以"超越和平的美国"为题的内容。为了保持内容上的连贯性，

尼克松常常大声朗读句子,以决定它们是否表达了准确的意思和恰当的基调,然后无情地挥动他的钢笔,改掉不合适的短语或多余的段落。

编辑工作完成以后,尼克松将书稿扔到地板上,取下眼镜,将脚伸到有垫的矮凳上:"我会挨骂的。我们按录音时间的速度完成了!现在,在将稿子交给出版商以前,我们只要再做10次就行了。"

显然,他累了。

"很重要的是,交给出版商的书稿应该是第一流的,这样,他就不用花功夫加工了。他们会很赞赏的,坦率地说,我也很赞赏。我讨厌不得不再看看这些材料,这你明白。"他说,"我希望这本书写得不错,应该是这样,因为它实在太好了,可你决不知道人们在想些什么。每本书都是一种赌博。如果克林顿受欢迎的程度提高了,这本书也许不会很受欢迎。这本书出版时,如果个个都去祝贺他的巨大成功,那就会削弱本书的影响。那么,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拿出我们尽力而为的最好的书,希望人民能加以注意,也许连克林顿也会注意的。"

我告诉他,虽然克林顿不会同意他对国内政策的许多观点,也许他更能接受和倾听尼克松有关外交政策的建议,特别是由于他已经注意到他过去提出的一些建议。

"这是个好想法。"他说,"尽管他相信一些错误的东西,克林顿是个勤于学习的人。他不怕听从别人的意见。我惟一关心的是,如果他的威望维持不了很久,他会过于自信,不愿听取我的意见。"

他在椅子上动一动,将注意力转移到一个更紧迫的问题:他辞去总统职务至今迫在眉睫的20周年和它可能产生的新

闻媒体无情的评述。甚至经过20年的自我辩护和解释以后，每一次新的攻击都使他匆匆忙忙地避开新闻界。虽然他准备对付他们不可避免的再度追问，他仍然害怕有关水门事件的故事，因为他们帮助削弱了他离职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产生的影响。

“也许我们应该关心出书的时间。”他说，“也许我们应该关心在8月份水门事件时同时出书……”他还没说完这个词就打住了，“周年，”他久久地望着窗外，表情变得很严肃，“如果那些坏蛋不放过它，我就不进行任何答记者问。如果他们问，我一定说，水门事件过去了20年，足够了。的确是这样。这整个周年纪念的事全是一派胡言。谁还关心水门事件？它也许属于历史频道之一，但不在主要网络上。你知道，它纯粹是我们的敌人搞的。我才不以为人们对水门事件的陈词滥调有多大兴趣。”他停顿了一下，“哎呀……也许有吧！”

我鼓励他回避水门事件，集中精力谈他的新书。

“不，我明白。你说得对。”他回答，虚弱地微笑着，“这些人将不顾后果地紧追着我。每一回，我写了一篇新的文章，或出了一本新书或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们就搞出一些负面的东西来否定它。我想他们就爱沉湎于这种水门事件似的废话里，直到他们几乎完蛋了。所以，我反对那么做。”他说着，提高了嗓子并举起他的右拳，“他们不可能从我嘴里得到任何消息。我将出版《超越和平》，然后忘掉它。”他笑嘻嘻地拍拍我的脑袋，从他的椅子上站起来。

“好啦，我想该是停下来吃晚饭的时候了。”他说，“你吃什么？”

看完书的时候，尼克松几乎每个星期天晚上都请我跟他

共进晚餐。这个礼节有两个目的：它可以扩展每周的工作，又有人陪他一个下午，否则他只好孤独地度过周末。

尼克松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走到酒吧的地方。我知道你并不特别喜欢喝酒。"他对我喊道，"所以，我一定要给你做一杯不含酒的鸡尾酒。"我看到他从柜子里取了两只玻璃杯，将几个瓶子放在柜台上，"他们管这叫亚洲的马提尼酒。我首先在新加坡搞到一瓶，后来在巴基斯坦也搞到一瓶。它是一种很美妙的酒，令人精神焕发。到这里来，我告诉你怎么做。"

我走进书房外的小房间，发现他在拾起掉在地板上的冰块。

"我来替你干。"我提议。

"不用，不用！我已经全扫清了。"他说着，往后站起来，"好吧，如果你给自己做这个，一定要用罗丝牌的酸橙汁和打碎的冰块。我做过一次，也许在泰国。但他们不用罗丝牌的柠檬汁，所以我几乎要吐出来。不管怎样，你必须摇动它，然后……"他举起玻璃杯，"好啦，试一试吧！你知道，最好加点酒，可我一点也不能再喝了。你爱这么喝。哎，我们不是开玩笑，真的！"

"老实告诉我，"我说，"那些国宴是怎么回事？"

他畏缩了一下，在空中挥挥手，对这个问题不予考虑："我太太全包了，从菜单到一切事情。我从不了解究竟上了什么菜，确实不关心。"

"在那些正式场合，你怎么找机会进行个别交谈？"

"这太糟了。我是指糟得令人难以忍受。"他又畏缩了一下，"你得跟一对对夫妇坐在一起。你知道，男男女女对事物的兴趣很不同。那并不是说，我没有任何兴趣跟这些人谈话。

我有兴趣跟他们谈。但是,当时作为总统,你是一国之主,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考虑。你以为我真的注意勃列日涅夫太太说些什么?当然,我是在听着,但我不得不集中精力考虑她丈夫是否会同意限制核武器。她是个漂亮的女人,可你明白我的意思是……"

他吸了一口掺柠檬的奎宁水,然后看看手表:"快7点钟了。咱们走吧!你可以看看我做晚饭。"他说着,转身朝着门口,"你知道,如果你不来这里,我就独自做。"

"好吧!我来了。"我答道,朝着楼梯的方向轻轻地点头,我跟着他到一楼去。

他走近立体声音响,放上一张传统的圣诞歌曲的磁带,然后走进厨房。他往橱子里窥视,取出两罐辣椒,再用开罐头刀将它们打开。他将辣椒放在电炉上加温,轻轻地拌成色拉,并将它分盛在两只盘子上。

"我希望你不会介意辣椒吧?可这是我能做的惟一食品。噢,还有热狗。不过,我想你不会喜欢的。"他说着,瞟了一下辣椒罐子,"很幸运,海迪(管家列特)留给我们一些色拉,所以我们有这些色拉可用。"他说罢,从柜台上拿起一包未打开的芝麻棒形面包。我还没建议打开这只包,他就开始用力撕开玻璃纸包装,很明显,包装纸撕不开,他做个鬼脸,猛然一拉,终于把包装打开了,但芝麻子撒了满地板。

"好啦,我至少是打开了。"他说着,脸上尴尬地泛起了红晕,"也许我应该坚持烧菜。算了吧,我从不以为我会那么说的!"

我将芝麻子扫起来,然后走进餐厅,他已经在桌上摆好精美的瓷器餐具。

"这是好瓷具。"他说着,从厨房里拿着棒形面包和色拉走出来,"我想每个人应该经常用他们的好餐具。你将去做什么?使用时损坏就再也不用它?请吧!"他对盛着冰凉的葡萄柚汁的玻璃杯上点点头,"我希望你会喜欢葡萄柚。我发觉它会减少辣味。来一点吧!"他说罢,将盘子交给我,转身走进了厨房。我拿起照相机,跟着他进去。

"我对这个照个相,你不反对吧?"我问,"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你为我烧菜。"

他没有回答,往电炉上做个姿势微笑着,"将照相机给我!"他说着,给我照了一张照片,"为了子孙后代——噢,别忘了,像我们常说的,也为了历史性的目的。"他笑了,领着我回到餐厅。

交谈不多。用餐时,他对几位第一夫人作了一些离题的评论。("南西·里根很厉害,她几乎控制了一切。巴巴拉·布什也一样,是个强悍而精明的人,但不那么爱控制什么。"谈到控制,我伤心地提到希拉里·克林顿正在成为偶像。)前天纽约的巨人们遭到损失("今年没有橄榄球超级杯赛,如果他们举办了,我可能会去看比赛。"),但除了那件事,他说得不多。我们吃完甜点时,他从空荡荡的露天平台往外眺望,只见那光秃秃的树枝在院子里摇晃。

"莫尼卡,你可相信今天就是我当总统的就任典礼25周年?25年前……"

"这看起来好像是那么久啦?"我问。

他点点头:"有时候是这样。别的时候,它看起来仿佛是昨天的事。"

他清了清嗓子,猛然眨眨眼睛,直望着我:"别为那些碟子

烦神,我会处理的。"他站着,将我坐过的椅子拉出来给我,陪我一起走到前门。我转身向他致谢时,他抢先制止我。

"谢谢你星期天来同我一道工作。人们总以为名人无时无刻不被人们包围着。其实不然。荣誉、名声——不管你怎么称它,可以是个很孤独的东西。许多人知道你,但并不是许多人都了解你,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你越成为一个公众熟悉的名人,你的生活圈子就变得越小,因为你发觉你所信任的仅仅是很少的几个人。"

并不是尼克松的含混使他那么迷人,而是他的生活的史诗般的时刻改变了纯粹是普通常识、幽默、温柔和脆弱的方法。在他的政治天才的背后是消除敌意的普通东西,一种不属于公共形象的人性。在那些寂静的星期天下午,我看到了为数不多的其他人已经看到的东西:尼克松是真实的。

在那一天和像那一天的其他日子里,尼克松处于最坚强和最脆弱的状态。同时富有挑战性和不确定性,他的思想复杂,他的品位一般,既为数百万人所知道,又完全是孤芳自赏的。尼克松成了人民的一个领袖和他们中的一员,具有自己隐私的公共人物,大于生活的人物,但对于生活所带来的一切又是脆弱的。

在他自己对生活意义的不尽的探索中,在推动美国在全球的势力中,尼克松从一个普通人阶层上升到权力的最高层,又从至尊之位上掉下来,再通过他意志的全部力量找回他的道路。最后的尼克松并不是一位"新的"尼克松,不是第二个自力更生的政治宣言,而是真正的尼克松,一个充满成就和遗憾、幸福和悲哀的实实在在的幽默的人。最后,他不过是个他生活的冬天里的人,留下了不怕争论和悲剧的过去,它曾表达

了令人振奋的胜利和令人泄气的失败;而且它曾逼迫他在他的众多的优点与明显的不可避免的缺点之间走过他的道路。这是一个普通人所经历的完全的人类历程,他在南加州留下一片柑橘林,给20世纪的后半期刻下永远抹不掉的标志。

第二部分

尼克松与世界

他不喜欢战争，但他崇尚战争所带来的团结和勇敢等一些美德。但他也清楚，由于战争对人力和财力的消耗如此高，而和平的益处又如此巨大，本世纪的大部分美国领导人都寻求消除战争、确保和平的途径。然而，尼克松和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不同，他认为这些目标不可能完全达到，世界局势的改善并不意味着世界局势的完美。随着一种昔日强大无比的意识形态的瓦解，两极关系平衡和结盟体系被打碎，冷战的结束带来了可能导致朝反向发展的不确定性，尼克松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一直都在努力确保此事不会发生。

第一章　冷战的结束

理查德·尼克松担心美国可能会在这场冷战中输掉。

这个在1964年冷战开始时步入政坛、领导美国渡过了严峻时期而且亲眼目睹冷战结束的人，竟担心我们会在冷战中输掉。

他于1980年撰写《真正的战争》，在书中明确地指出："除非我们快速采取行动，否则80年代中期将是美国和西方最危险的时期之一。简而言之，苏联将跃为老大；美国将位居第二。"《真正的战争》写于美国可能丧失世界领导地位和民族意志的严重危险时期，它旨在振奋美国信念，在国内激发这种信念，在国外增强这种信念。这本书阐述了这场危机，它有助于美国恢复在世界角斗舞台发挥领导角色的

信心。

尼克松担心的是，假如美国不能遏制苏联在世界范围的冒险主义，加强我们自身的军事力量，以便拥有确实可靠的威慑力，我们不仅会在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大搏斗中失败，而且将使我们在今后几十年内受到苏联的控制和羞辱。然而直到80年代末，当美国可能赢得这场冷战的事实已经明白无误时，尼克松又产生了新的担心：这次胜利可能会白白错过。

为了成功地结束这场冷战，尼克松本人投入了精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进入了国会，帮助哈里·杜鲁门为我们克敌制胜的战略奠定了基础。他揭露阿尔杰·希斯是苏联间谍，这一轰动的事件提高了他在全国作为共产主义激进反对者的声望。1950年他在加利福尼亚竞选参议员，宣称他的对手海伦·加黑根·道格拉斯可能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他赢了。

作为副总统，他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进行了一场有关敌对制度优劣的厨房辩论。1960年，他成为约翰·肯尼迪班子的一员，竭力主张向苏联发起主动挑战。他在1968年当选总统时，从前一任总统那里接收过来的是厌战的选民和资源耗尽的经济，他即时提出了以合作取代对抗的遏制政策。在总统任职后期，他对输掉冷战的危险后果发出了警告。

与美国任何在世的政治家相比，他或许与冷战的联系更为紧密，他不允许别人在通往胜利的最后关头把胜利夺走。

尼克松对共产主义在东欧和它的领头国家苏联的瓦解惊叹不已。谁也没有预料到它的来临，谁也没想到它的结果会来得这样快，而且谁也没考虑到它出现得如此顺利。

尼克松无暇向自己或美国祝贺，相反，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以及盟国在短期和长期所面临的挑战上，并开始对政策

施加影响。从1990年起到1994年,尼克松写了两本关于对外政策的重要著作,以私人身份到世界各地作旅行调研,对政策制定者和提案人发表了无数次的讲话,并且在公开和私下场合游说历届美国总统。如果他最大的担心是美国将使冷战的胜利付诸东流,那么,他其次担心的就是掌权人听不进他的话。

他对对外政策的态度既现实又保守,这是一种基于尊重历史、尊重经验、尊重人类难以驾御和预料的多变性的思想体系。他把绝对尊重个人自由、对政府的善意怀疑以及公民的不可推卸的义务融于政策之中,他认为个性和集体性、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永恒的张力既产生冲突又推动进步。

因为他不希望人性发生变革,所以他也不希望未来和过去相比有太大的改变。他怀疑那些保证结束战争以及让全世界欣然接受民主的计划。他拒绝乌托邦思想,相信人有分辨善和恶、冷漠和同情、自私和大度的能力。他在尽量不排斥事物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的情况下对它们加以考虑,同时认识到掌握世界领导权是需要付出真正代价和义务的。

他不喜欢战争,但他崇尚战争所带来的团结和勇敢等一些美德。但他也清楚,由于战争对人力和财力的消耗如此高,而和平的益处又如此巨大,本世纪的大部分美国领导人都寻求消除战争、确保和平的途径。然而,尼克松和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不同,他认为这些目标不可能完全达到,世界局势的改善并不意味着世界局势的完美。

带着这种现实主义的思想,尼克松没有对冷战结束作表面陈述,而开始研究它更深层次的趋势和意义。他经常考虑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自1848年以来的告诫:“新的世界

需要一种新的政治学。"随着一种昔日强大无比的意识形态的瓦解，两极关系平衡和结盟体系被打碎，冷战的结束带来了可能导致朝反向发展的不确定性，尼克松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一直都在努力确保此事不会发生。

正当全世界为以共产主义瓦解为前提的"世界新秩序"而欣喜若狂时，尼克松知道，任何一种新秩序只有在美国的引导下才能出现，而且必须冷静地考虑到国家的自身利益才能持续下去。他认为沾沾自喜会断送民族意志。

尼克松的使命是确保他的继任领导人不屈从于那种在对外事务中所持的悠闲冷漠的态度，那将会使冷战的胜利夭折。他反对那些认为美国和苏联是同等日益衰败的超级大国以及美国蛮可以做许多大国之一的说法。

因此，尼克松开始担负起自己对美国的新的明确使命。1945 年以来，美国制定的目标是战胜共产主义。这一目标完成后，尼克松又致力于确保他所说的"自由的胜利"。这同样是一项艰巨而微妙的事业，很容易失败。但如果成功，将会实现所希望的真正的自由、真正的民主、真正的自由市场改革以及尽管不完美也是真正的和平。

1990 年 4 月 12 日，在我开始为尼克松工作两个半月之前，他向波士顿世界事务委员会发表了一次演说，阐述了他有关冷战结束的思想。他的观点直截了当：社论撰写人、专栏作家以及其他观察家们宣称，随着苏联的开放和改革的到来以及柏林墙的拆除，冷战结束了，西方胜利了，苏联不再对我们的利益造成重大的威胁，因此我们现在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使我们团结而不使我们分裂的问题上，比如说世界气

候变暖问题。

尼克松明确指出，所有这些臆断都是错误的。共产主义的失败并不意味着自由的胜利，苏联的输并不意味着美国的赢，苏联威胁的消退并不意味着来自其他国家威胁的根除，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以及东德抛弃共产党领导人并不意味着民主会成功。

尼克松认为，我们富于挑战性的任务是帮助那些已经从苏联建立的共产主义联盟中分离出来的国家。他说，我们不应该轻率地认为只要我们仅仅谈论一下"输出民主"，那些国家就会为他们对经济发展的极度需要找到答案。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来对付极其复杂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问题。在他去世之前，他的观点的出发点是：美国必须援助东欧以及苏联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市场改革力量，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其后果将会是我们不得不进行一场新的而且更危险的冷战。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被尼克松认为是"当代最杰出的政治家"，他因在苏联实行政治改革、给新闻媒体以更大的自由、没有动用红军维持他的东欧伙伴的政权以及从阿富汗撤军而受到尊重。但尼克松也明白，戈尔巴乔夫几乎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所有被苏联征服的第三世界国家每年在经济上使它耗费150亿美元，在它的东欧附庸国的表层深处，不满和公开反抗已达到沸腾的程度。最糟糕的是，苏联政权的低效和内部矛盾的表现——日用品短缺、犯罪和贪污——使它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戈尔巴乔夫发现他的主要强大对手美国已经从70年代的隐患和80年代的衰退中恢复过来，经济发展了，军事力量

强大,并且掌握战略防御主动权,他要花费几十亿美元才能赶得上。他别无他法,只能实行国内改革、国外紧缩的政策。

尼克松打碎了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的幻想,他想给美国是否应该援助苏联政府的争论注入一些现实主义的思想。尼克松认为,如果他的改革进行得不彻底,帮助戈尔巴乔夫对他和我们都没利;即使他们的改革进行得很彻底,结果我们面对一个经济强大、实行同样强硬对外政策的苏联,帮助戈尔巴乔夫对我们也是不利的。甚至在没有东欧、波罗的海各国以及它的第三世界前沿国的情况下,苏联也不是一只"国际猫"。尼克松提醒他的听众说,苏联仍然拥有3万枚核弹头、世界最大的常规军、现代化的海军和长时期实行扩张主义的历史。因此尼克松认为,只要戈尔巴乔夫和他领导的国家制度依然保持共产主义的性质,我们就不应该帮助他。

美国是惟一能够在冷战后领导世界的国家,他对听众说,美国不可能在有战争的世界里处于和平状态,也不可能在经济不景气的世界上繁荣发展。他力劝他的听众们要像他那一代人迎接冷战的挑战那样去迎接和平的挑战。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他们给后人留下的遗产将是使世界"对自由有安全感"。

"莫尼卡,我想让你读一读我这篇几个月前的演讲稿,然后向我谈谈你的想法。"尼克松在1990年7月11日对我说,"我知道你刚开始工作,不可能一夜间对世界的命运作出判断,但我想让你读一读。当然,你当时不在场,没有听到演讲,实际的演讲总会比演讲稿要好些,但你读了之后可以了解大概的意思。我们明天讨论一下,好吗?"

我刚为他工作了一星期,他雇我为他做研究工作,提供一

些意见和观点，以便完善他自己对一些问题的见解，甚至或许会激发新的想法。

那天晚上，我把一份演讲稿带回家，一边读一边做笔记。第二天早上，我走进他的办公室，作了充分准备和他讨论那篇演讲稿。但尼克松提出了一个问题。

“戈尔巴乔夫真正需要什么？”他问道。

我回答说，叶利钦退出共产党并开始和激进改革派往来之后，戈尔巴乔夫不得不首先把重点放在修补党内裂痕的工作上，以便为他的改革保持住一个舞台。但改革派只是想修补共产主义制度，而不想铲除它。尼克松表示同意。

“我知道，你经常说美国如何在国际上发挥作用比它内部体系更重要。”我继续说，“那么，你如何看待这个观点：一个国家除非首先不再使它的人民卷入战争，否则它不可能在世界上不发动战争？”

尼克松眯起了双眼：“我知道这个观点：民众更仁慈，他们不会发动战争，至少不会相互敌对。有些时候，选择两害中较小者并对他们施加影响是必要的。我过去一向在某种程度上是威尔逊的拥护者，但那种对世界的看法如今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奏效。”

他喝了一些奎宁水，朝我晃动着杯子说：“告诉我，莫尼卡，如果你是戈尔巴乔夫，你会做什么呢？”

“如果我是戈尔巴乔夫，”我回答说，“我会放下架子站到叶利钦一方，承认共产党没有前途，表明自己顺应历史的意愿，而不是逆历史而动。实际上，他必须作出决定。他不能骑墙于共产党人和改革派之间。”

“是的，他不能。”他说，“如果他继续这样做下去，他就会

有把两方都失去的危险。这种使用150亿美元的西方一揽子援助计划来解救苏联经济的想法简直是荒谬透顶,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确保戈尔巴乔夫政权继续存在是个愚蠢的想法。就共产主义的瓦解而言,这如同一列火车驶出了车站。"

"政府似乎认为保住戈尔巴乔夫的政权对我们有利,难道这不是说戈尔巴乔夫的继任者会更坏?如果他的下一任更好,情况会怎么样呢?"我问道。

"说得好。但布什对戈尔巴乔夫太宽厚了。他过分强调私人关系,认为既然个人之间交情很好,他们两国的制度就可以融洽相处了。错了!但是对布什谈话就像对牛弹琴。

"新闻媒体把布什称颂为一个新的强硬领导人,还说既然戈尔巴乔夫的苏联已不再形成威胁了,布什可以而且应该削减几十亿的防务预算,真令人作呕。这是错误的,大错而特错。

"这种看法正是目前正在美国、欧洲、特别是德国所形成的症状——对和平极度天真的热情,甚至强硬派领导人也几乎不可能对戈尔巴乔夫发生怀疑。这就等于我不能公开地表示怀疑——不过目前还没达到这种程度。我认为布什渴望出风头……而且我确实认为他需要被人喜欢,你看呢?"

他还没等我回答就接着说:"我认为他这种需要超过了他对戈尔巴乔夫的警惕和怀疑。不幸的是,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有一个重大的政治难题,原因是右派人士不会因为他们不得不支持里根而树起警示旗,而根据里根在任职最后几个月里的表现,他甚至会在同戈尔巴乔夫做交易方面比布什走得更远。当新闻媒体对戈尔巴乔夫狂热入迷时,我可以理解:他

们对那种魅力如此容易动情。但如果右派势力狂热起来——嗯，我们都知道问题可就严重了。

“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能发表强烈反对他的谈话了吧？我不想在花园招待会上当讨厌鬼。但时机成熟时——一些观察家恢复他们的理智时——我会表明我们不应该帮助戈尔巴乔夫、不应该削减防务预算的观点。”

“关于防务……”我说。

“我知道你是个防务迷。每个人都热衷于削减防务，因为他们相信已经没有威胁了。事实可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国家削减防务之后，发现自己力量减弱而且不得不面对一个更强大有力的对手时，它将自食严重的后果。”

我问他对手已不再构成直接威胁时我们如何保持现有的防务支出水平，他回答说：“这是个问题。但基本上是理想主义者的美国人民必须听听现实主义者的意见，我发觉如果你向他们讲清楚客观而又严酷的现实后，他们会支持你的。”

“对东欧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问道。

“当然和东欧打交道要比和苏联打交道容易多了。应该欢迎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回到欧洲共同体。”他一边挥动着手指一边谈出他的观点，“我们的目标必须是使那些市场经济型的国家亲西方远离苏联，因为我们不能使他们对我们怀有敌意，不然会扼杀刚刚形成的改革局面。”

他停了一会儿继续说：“搞经济不是我的特长，但有一点我确实清楚：我们需要的不是马歇尔计划，而是布什计划。根据这个计划，西欧各国和美国应制定出一个协调方案，其中包括信贷、免除债务、技术援助，甚至对他们在苏联控制时期的经济损失实行补偿援助。”

他笑着说："你是波兰人。波兰和匈牙利是首选对象，这些贫困的国家在本世纪经历了苦难。如果这种刺激方案实际可行而且范围可扩大的话，捷克斯洛伐克应紧排其后。当然，由于种种原因，罗马尼亚、东德以及保加利亚可能会按捺不住了。"

"苏联被明显地排除在外了。"我说。

"无论如何，在目前的情况下应该把苏联排除在外。我们可以在同等的条件下向他们提供这种援助，但苏联的外交和防务政策必须是真正的防御而不是进攻，这是衡量的标准。"

我鼓励他用这次讲话开始一次公开的竞选运动。

他看着我又笑了："你可能是对的。是戈尔巴乔夫对我们的倡议作出反应的时候了，而不是我们对他作出反应。他想同我们就战争武器问题进行谈判，我们应该坚持就战争的原因进行谈判。"他停了下来，然后接着说，"你认为这条路线如何？在把它写进演讲稿或文章之前，我借用你对它进行思考。我想它总结了戈尔巴乔夫和我们应该拥有的优先通行权的分歧之处。"

"我还想再问你一个问题。"我说。

"尽管问。"他答道。

"在除中国以外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都瓦解的情况下，共产主义在苏联还会生存下来吗？"

他停顿了一下说："不，它不可能生存下去，除非戈尔巴乔夫使用武力。即便他使用武力，共产主义也不会生存下来，因为令它多年来能继续生存的可能性已经消失了。这种可能性消失了，共产主义也就垮台了。"

那次初步的交谈包含了尼克松有关冷战后思想体系的许

多基本论点。他主张极少量地削减防御经费，敦促改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使其更适应新时期的需要，支持东欧新近获得自由的国家对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承担义务，欧洲共同体应该向他们开放经济和军事地段。总而言之，他发出警告，美国应作好准备，要么援助那些地区的民主势力，要么面对重新形成的对立。

尼克松在他去世之前一直在公开和私下场合以各种方式强调这些论点。他强烈地认为，冷战的胜利可能会由于错误的政策而丧失，因此作为那些抛弃共产主义欢迎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改革的人们的代言人，他在去世前的几年里一直主张美国应进行更积极主动的进攻。他关心许多问题，但最令他花费心血考虑的是美国应该有效地援助那些真正坚持长期改革的力量，特别是苏联内部的那种力量。

"如果苏联的民主试验失败，我们就会丧失和平的利益，和其他的国内问题吻别了。"他说。

1990年12月14日，尼克松给乔治·布什的国家安全顾问、以前尼克松白宫国家安全小组的资深成员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写了一封三页的信，信中主要谈到美国应和中国保持直接关系，但他同时还谈到了戈尔巴乔夫在亚洲所起的作用。他提醒说，尽管冷战已在欧洲结束，但戈尔巴乔夫仍然在亚洲推行"熟练外交"。尼克松错误地估计，为使两国关系更加靠近，戈尔巴乔夫会向日本归还北方领土，即在二战即将结束时被苏联占领的四个日本北方小岛。他还提醒斯考克罗夫特说，戈尔巴乔夫正向中国伸出"温情之手"。他还补充说，日本人已经同中国全面恢复了经济关系。

从长远的战略观点来看，美国的惟一选择就在于密切注

视苏联在亚洲的行动的同时，加强同中国的联系。尼克松试图提醒斯考克罗夫特，并通过他提醒布什：尽管戈尔巴乔夫采取了大胆的改革措施，但俄国历史上的扩张欲望依然存在。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是不是?"1990 年 9 月 23 日尼克松在电话中问我说。

"知道，先生，"我马上回答说，"今天是筹集资金事件申辩纪念日。"

"是的，38 年前的今天，我直接走到美国人民中间讲述了我的事实，我成功了，因为真理在我这一边。我在彼时彼地明白了你不能依赖新闻媒介来传播信息，你必须跳过他们，直接和人民接触。在这个所谓的新时期，这正是我们在谈论面临和苏联打交道的挑战时必须要做的事情。"

我问他如何试图把人民的注意力集中在外交政策上。

"你必须天天努力这样做，我一直在讲，杰出领导人的标志就是他能耐得住默默无闻，然后再变得大受欢迎，他要引导民意测验，而不是被民意测验牵着鼻子走。"

"布什精通此道吗?"

他停了下来，思考着这个问题，十分得体地回答说："他如果愿意还是能够做到的，问题是我不知道他是否愿意。他被戈尔巴乔夫所引诱，并且因和戈尔巴乔夫关系融洽而深受新闻媒体的欢迎，他甚至可能怕自己的声誉受损而不想谈及戈尔巴乔夫仍然是共产主义者、苏联仍然是个共产主义国家而且仍然拼命地在进行军事投入这一事实。"

"所以此事落在你的头上了?"

"嗯，我想是的，真没办法，我以前已经承担比这更艰苦的工作了。不管布什是否要谈论此事，你应该相信，我肯定要讲

的!"他清了清嗓子,然后继续说,"我希望你继续为我写出那些有强硬路线见解的文章,这些文章对我有启发,"他挖苦地说,"因为你对戈尔巴乔夫太心慈手软了。"

我在1989年7月19日给尼克松的第一封信中写道:

> 最令我头疼的担心就是美国领导人在欣然接受戈尔巴乔夫先生以及他的建议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轻率的信任感。我认为戈尔巴乔夫可能正在利用他新的坦率作战略拖延,从而使共产主义继续运转。为自身的安全考虑,美国必须针对戈尔巴乔夫的这种情况作出计划……美国必须继续实行强硬的防御措施以取得广泛的威慑力量,并以此作为会谈优势对苏联人施加压力。

这一强硬的建议符合尼克松自己的思想,在他的要求下,我几乎每天为他写一些有关苏联改革进展情况的文章。在其中一篇题为"美国无力拯救苏联"的文章中,我谈到一旦苏联共产主义内部矛盾像东欧国家那样使政权问题难以解决,美国将无力对决定政权的取代问题施加影响。援助一个濒临死亡的制度是一种无谓的浪费。对仍陷于垂死的体制中的民主力量的援助很可能被窃取或挥霍掉。我们必须让苏联的共产主义自然死亡,而不要自寻烦恼地搞什么不成熟的决定和财政援助。

对尼克松来说,这些论点可供他对自己的有关想法进行调整。他用我的文章强化他的信念:当他继续提出理由反对向即将垮台的制度浪费援助时,我们正在为一项伟大的事业效力,为"自由的胜利"效力。

美国是惟一具有公认的垄断力量的超级大国,它实行民

主政治、资本主义经济和自由贸易,它有能力在世界上领导意识形态的新潮流。对这个不久以前在极权主义中动摇徘徊并且将来很容易走向保护主义的冷战后的世界,尼克松认为这是最好的解释。

他在10月4日说:"你知道,我想在这本即将出版的书中使用你写的东西。"他指的是《只争朝夕》那篇文章,"你对苏联人的态度很强硬,我想让它成为胜利的现实。你要知道,如果我极度生气,我会把它刊登在专栏版,但现在把它放在书中就可以了,保存的时间会更长。而且,有布什和贝克在白宫掌权,我看不出美国的政策会多么正确。"

自从布什和国务卿詹姆斯·艾·贝克1989年执政以来,尼克松对他们没有什么好感。布什是个"好人,但在政治上不是个强硬派人物",尽管他在对外事务中有丰富的经历,但面对冷战的结束他不能作出有远见和创造性的反应。他的外交政策似乎只反映了在公众中流行的意见,而不是一个阐述明确的议程表。他只是对一些事件作出反应,而不是制定强有力的政策去影响这些事件。在尼克松看来,布什不是一个足智多谋的领导人。

尼克松说,贝克"根本不懂对外政策,而他真正懂得的东西是错误的"。尼克松怀疑这位上次大选的战略谋士之所以取得国务卿的位置只是因为他和布什的私交密切。他们两个人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也许会把握住国家的对外政策,但尼克松认为,在冷战后期他们对此极不称职。他们只顾及眼前的事件,非常容易被世界舆论所左右,以至于察觉不到他们自己正在为将来的安全政策制造危险。

"布什没有远见,当然贝克更是如此。"他在1990年11月

12 日说，"称贝克为战略谋上是过分夸奖了他，他完全缺乏制定外交政策的能力。同苏联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在一起时，他看上去像个外行，唯唯诺诺，好像没有脊梁骨。而布什比他也好不了多少，他们没有什么高深的见解，没有远见，他们称之为国务管理危机，我可以称之为缺乏领导能力。"

尼克松对布什领导能力软弱的失望源于他这样的一个想法：总统应该不仅领导这个国家，而且还要运用既能有效地应付当前局势、又能预见未来发展的强有力的外交政策来领导自由世界。尼克松承认布什在不稳定的新时期的政策制定方面遇到困难的挑战，他指责布什不能为欧洲的民主革命而冒风险。

"这个家伙不知如何是好。45 年来的整个国际体系已经瓦解，美国还要做些什么呢？这真是个棘手的问题。我并不是说问题很好解决，但现在的情况是布什根本掌握不住这种局势。而贝克——算了吧。妙就妙在基辛格使国务院不越轨，在他们之外形成威胁，可贝克就没有这种能力。但两人都对戈尔巴乔夫投入了过多的精力，以至于对他是个不会脱党的共产主义者这个事实视而不见。最让我不能相信的是，他们似乎千方百计地解救他，甚至以牺牲更好的民主解决方式为代价，我真不能理解。"

面对苏联内部一些加盟共和国的分裂主义运动，戈尔巴乔夫拼命地想保住他的最高统治地位。在允许更大程度的政治开放和一些市场经济改革后，他又松开了维系国家的纽带。俄罗斯和其他一些苏维埃共和国的人民再也不受极权制度的禁锢了，他们要求从中央控制中独立出来。

用法制、自由和保障的理念把复苏的民族主义争取过来

是美国政策的一个难题。布什政府对首次独立运动——立陶宛的独立运动——举棋不定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害怕在苏联最高统治层内引起一次暴力的、间歇性的、无法控制的分裂。

布什在这个问题上对戈尔巴乔夫的尊重还可能旨在保持一种积极的苏美关系，但布什决定对立陶宛从莫斯科独立出来的要求置之不理，不幸地为其他分裂运动和改革的前途制造了一个先例。布什未能找到一种原则的方式把苏联境内民族独立的要求和其他地区极不合法的要求区分开来。

正如在苏联展开的事件所揭示的，除非对那些寻求独立的共和国提供保护，否则新的组合是维持不下去的。美国应该支持反苏的民族主义，因为苏联的最高统治者无视人民选择自己的领导人、政体和国家的权利。尼克松认为，从长远利益来讲，统一的苏联比以后可能建立的联邦制、甚至分裂的苏联更强大、更危险。

布什的逻辑是，如果不承认立陶宛的独立，那里以及苏联其他地区就会有更加安定的局面，改革更会有成功的可能。但在尼克松看来，美国还是应该采取既不鼓励又不限制分裂的做法，让苏联继续演化。演化后的国家也许会更坏，或者会更好。如果美国坚持道义和民主的原则并承认立陶宛，加速苏联的瓦解，我们至少会站在正确的立场。

这位前总统被布什不承认立陶宛是一个从莫斯科独立出来的国家的做法惊呆了，他在 1990 年 11 月 6 日把我召进他的办公室。

“莫尼卡，布什是不是精神失常了?”当我走进办公室时他问我说。他把钢笔扔在办公桌上，走到角椅处，“整个冷战时

期他都在睡大觉吗？看看吧：他在立陶宛的问题上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只是让他的朋友戈尔巴乔夫在那个可怜的地方继续维持下去。45年来我们一直在谈论那些受奴役的国家，45年啦！我们一直在空谈，还有什么别的呢？受奴役的国家是说他们受苏联的奴役——违背他们的意愿。现在他们终于有了勇气和力量要摆脱开来，请问，难道我们不应该做一些事情来支持他们吗？"

他露出一种愤慨的表情："唉，我一生都在和苏联打这场该死的战争，如果布什在最后的阶段丢掉这场战争，我将——嗯，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将来不可能平静，不可能私下解决，肯定有影响，我敢保证。"

"你现在为什么不考虑发表一些谈话呢？"我问道。

"我知道。我实在不能去见布什，因为他会怨恨的——他和戈尔巴乔夫的关系太密切了，以致不能保持客观的态度。我不能而且也不愿意去见贝克。我们能做什么呢？我可以公开发表讲话，但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值得。你的意见呢？"

我力劝他把对布什对立陶宛的独立保持沉默的不满公布于众。对尼克松来说，赌注下得实在是太大了，冷战结束得太快了，而行为准则又实在是太重要了，他不能漠然同意美国政府的政策。如何摆正民族主义和"安定"的关系是尼克松所担心的问题，因为布什政府似乎想以解救戈尔巴乔夫的名义而放弃原则。

然而，尼克松清楚我们所能做到的是有局限性的。我们不能决定戈尔巴乔夫的命运，也不能把我们的制度强加在正努力获得独立的国家身上。为避免最坏的结果、鼓励最好的结果，美国应该支持独立运动，并且鼓励那些国家以合乎他们

国家特点的方式慢慢地引进民主制度。通过支持那些共和国正在兴起的制度，美国可以在有迫切要求的地区扶植真正的民主。

尼克松认为美国应该奉行符合长远利益的原则性政策，这就是说，欢迎正在努力摆脱莫斯科控制的共和国，缓慢推进共产主义的演变，同时履行道义、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义务，帮助民主改革的力量。

然而，苏联的民主是不会在一夜之间来临的。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惟一所尝到的民主的滋味是随之而来的混乱不堪、内部冲突和经济灾难。如果这种过渡异常困难，他们很容易放弃。要使民主试验获得成功，必须把法制和自由协调起来。

此时，尼克松已打定主意，对他来说施加影响的最好方法就是再写一本书。1990 年秋季，他要求我为这本叫作《只争朝夕》的书搜集背景资料。

11 月 12 日，我在我的办公桌上发现一个备忘录，指示我去查找一些具体数据，例如 1945 年以来世界性战争的次数、在战争中丧生的人数、第三世界国家中的人均收入，以及为论证他关于繁荣并不一定和民主同时到来论点的佐证资料。他从对苏联社会和经济衰败的思考中得出了结论。

他写道，一则流行于奥地利和匈牙利的笑话说，一个匈牙利人问另一个人是否可以想象出比匈牙利更糟糕的局势，那个人回答说："可以啊！看看苏联吧！"尼克松指出，驻扎在德国的俄国士兵不愿意回国，因为国内条件"糟透了"。

"我写这本书并不是为我自己，而是因为我们的国家有必要了解我的现实主义思想。"他在 11 月 17 日说，"他们从布什

那里是听不到这些的，只有从我这里才能听到，你同意吗?”

我表示同意后他又继续说:“我想把我的立场记录在案。不管怎样，如果苏联失败了，我们对那里的改革不作任何鼓励，共产党把那个地方搞得一团糟，和他们相比，我们的过失只不过如此。我只是不想和现领导层为伍，这本书的重要性就在于此。在冷战后期出这本书，它和1980年出版的《真正的战争》有同样大的作用。时代不同，问题不同，但向外传播信息的目的相同。”

他又把话题转到戈尔巴乔夫越来越极力采取措施保住总统位置和他的大家庭的问题上:“瞧他那副在克里姆林宫四处奔波的样子，极力把持住所有的权利——拿着卢布到处闲逛，撤换和自己意见不合的人，在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实行镇压。记住我的话：他肯定会使用武力来保住他的大家庭，然后紧接着就会加强中央统治地位，这肯定会失败的，因为当前整个运动都脱离了中央。领导人是可以改变历史的，但在通常的情况下他们必须按照历史发展的路线行事。逆历史而动的机会是极少的，但这正是戈尔巴乔夫所企图的。我不知道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但他注定要失败的。”

他停下来，朝窗外望着:“新闻界一些天真的朋友和那些所谓的专家们正在谈论在这种世界新秩序下——任他们把它叫作什么好了——我们可以削减军事力量，解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把我们的经济援助分散到上沃尔特之类的地区去，依靠经济竞争等等。”

他不屑一顾地挥了挥手:“这都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冷战仅仅使我们更容易对挑战作出解释，但现在仍然挺困难，因为我们恰恰不知道将来还会出现什么问题。”

当我说它可能是民主进步也可能是混乱和灾难时，他指着我说："绝大多数的人认识不到尽管戈尔巴乔夫在国内外做了一些进步的事情，但他正极力重建他的体制使其更加有效。这是行不通的，但他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为他是共产主义者。俄国历来是中央集权控制的国家，即便没有戈尔巴乔夫，将来那里的局势还是独裁，甚至民主改革也不是我们通常在西方所看到的那种样子。

"关于军事收缩，甚至在没有戈尔巴乔夫的情况下，那里依然有3万颗核弹头在对着我们。不论戈尔巴乔夫是否会生存下来，我们必须为将来的结果作好打算。"

他微微一笑："我已经这么大年纪了，见识了很多东西，看到独裁者们上台和下台，看到各种意识形态的形成和消失，但这次——"他停了一下，"这次的共产主义瓦解是我所看到的最令人兴奋的事情之一。看看我们自己吧，"他一边指着我和他自己一边说，"我们的年龄相差一代，我在冷战开始时步入政治生涯；而你在冷战结尾时才开始你的政治生涯。上帝啊！"他的目光注视着我，然后放低了声音，"在这个时代做个年轻人！真幸运！"

他那一代人必须面对冷战的挑战；而我们这一代人将不得不面对冷战后时代的挑战。由于我们所处的位置，我们仅对于本世纪的专制就了解了许多年了。现在我们能够制定、引导更大的政治和经济自由化的政策。他那一代人相信自己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进行了以军事竞赛和多米诺理论为特征的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之后，他们把保卫和平的责任移交给下一代。尼克松羡慕地说，新的挑战是建立在更有把握获得和平这个前提之上的。

11月11日，我走进他的办公室，发现他在那里走来走去，"莫尼卡，如果贝克再不停止向谢瓦尔德纳泽谄媚，我马上就要吐了。"

苏联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建议并支持戈尔巴乔夫在东欧不使用武力，贝克同他建立了密切而积极的联系。尼克松认为贝克正在犯危险的错误，他用同世界领导人的私交关系来代替上层外交不带有感情色彩的解决途径。尽管私人关系能够加强已经建立的积极关系，改善消极关系，但这不能代替出于各自利益而进行的真正的谈判。苏联人正在为他们国家的利益而行动，如果美国不采取同样的做法，它将使自己处于政治、经济和军事劣势。

"欣然赞赏他们的交往是无可非议的，"尼克松继续说，"但那些'哈，哈，哈，最近还好吧？'的废话真是太过分了。我从不闲扯，但我见过的最精明的领导人在特定的场合把它运用得非常精彩。如果你恰好要谈论与他们的友谊，这当然可以，但绝不能让它模糊了对自己国家和他们国家行为方式的判断。记不起来有多少次了，我听到一些善意的外交家在开始时谈论了与对手的友谊后才提出反对侵略行为的观点。"他得意地一笑，"'但他多么真诚，多么友好。'友好？我们在讲什么？布什说，'戈尔巴乔夫握手时很有力。'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我猜想因为他感到戈尔巴乔夫直视着他——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从不这样做——而且还同他用力握手，哎呀，天啊，他肯定是个好人，和我们站在一边。"他演戏似的挥着手，"错啦！高明的领导人都是按照自己国家的利益而行事的，让私人交情见鬼去吧。"

尼克松的观点得到了证明，12月20日，谢瓦尔德纳泽由

于戈尔巴乔夫获得特别权以及他执行改革政策踌躇不定而辞职了。政府日益瘫痪，潜在的流血混乱的威胁悄悄逼近，尽管戈尔巴乔夫极力挽救中央的权威，但它垮台是必定无疑的。谢瓦尔德纳泽看到的是步步逼近的独裁专制——戈尔巴乔夫以及和他联合起来的反动分子的武力统治。作为过渡时期的殉难者，他辞职了。

这次事件把贝克惊呆了，并向美国政府猛击了一掌，它向评论家们再次证明：对外政策并不是建立在个人关系上，而是建立在行动上的。

"这可能是个伪装，"尼克松指的是谢瓦尔德纳泽的辞职，"但我对它有怀疑。我确实认为他不同意戈尔巴乔夫在波罗的海各国使用武力和不实行改革的做法。"他摇晃着脑袋说，"啊，贝克失去了好友，他肯定气坏了。我听说谢瓦尔德纳泽事先并没有通知他，他是在每个人都知道了这件事之后才晓得的。哈，哈！他反过来却让友谊在屁股上踢了一脚！"

"我想，既然谢瓦尔德纳泽是惟一真正能让戈尔巴乔夫听得进去自己意见的重要人物，而且他也是个稳健派，戈尔巴乔夫可能会劝他留下来。"我说，"出于政治上的某些原因，他需要他。"

"是的，但我不能肯定。这将是令人关注的 24 或 48 小时。顺便问一下，"他把话题一转说，"我不相信布什说'我们要狠狠教训萨达姆·侯赛因一下，'你能想象出戈尔巴乔夫也在说'我们要教训一下这些共和国'吗？"

我们一块儿大笑起来，尽管他对布什政府在国家外交政策上的做法极度气愤，耗费了大量的精力。美国政府不但不支持独立运动，鼓励类似已脱离共产党的叶利钦的民主改革

派,却支持戈尔巴乔夫政权。尼克松,这个毫不掩饰自己观点的冷战勇士被惊呆了。

12月28日下雪的早晨,他在7点15分向我打来了电话说:"我们这里下雪了。"

我晃晃头使自己清醒过来:"希望你今天早晨不要去散步了。"

"啊。上帝,不去了。你知道,我不想滑倒。我把你吵醒了吧?"

我极力让他相信没有吵醒我。"当你到了我这个年纪时,"他说,"50年之后,你也会早晨5点钟起床的!时间剩下不多了,我必须充分利用每一分钟,不能把它浪费在睡觉上!"他笑了起来,"我们今天的对外政策议事日程有什么项目呢?嗯,我认为戈尔巴乔夫将在最大程度上实行铁腕统治,但是那些共和国将要孤立地渡过这个糟糕的时期。他们可能会和俄罗斯作出什么交易。你同意吗?"

"这是一种可能,"我回答说,"但我认为他们要求分离出来的愿望非常强烈,不论怎样,他们不会继续受莫斯科的束缚。共产主义也许已威风扫地,但至今还没有什么能代替它。这些人要干什么呢?"

尼克松停了一下说:"我不知道。"

对于发生在苏联的戏剧性事件的内幕,尼克松经常询问迪米特里·赛姆斯,他以前是卡内基世界和平捐助会的高级成员,后成为尼克松和平与自由中心主任。赛姆斯是俄国移民,在尼克松任总统期间来到美国。他在两国都结交了一些高层人物,并且就苏联情况和苏美关系问题撰写了一些内容翔实、说服力强的文章。尼克松委托他关注信任程度,对苏联的政

治情况提供真实、客观的评价，并且要他在90年代陪同自己到俄罗斯访问。

1991年1月7日，他通过电话和赛姆斯交谈，对他说他不相信苏联的镇压迫在眉睫。

谈话结束后尼克松对我说："我对他说我认为这些加盟共和国知道离开中央就不可能在经济上生存下去。当然，戈尔巴乔夫是个过渡性人物，但现在他正转向右派势力，几乎丝毫不考虑这会给他的改革带来什么影响。你看他是如何支持克格勃和军队威胁波罗的海各国的。这些日子以来，他看起来不像是一个改革家。

"但赛姆斯是对的，他说除了残酷的镇压没有什么办法能使国家免于分裂。我认为这些加盟共和国甚至在获得独立后也会和中央保持密切联系的，但这仅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把坦克开了进去。"

我向他提出一种看法："你有没有考虑到戈尔巴乔夫所做的是一种逆向缓和？"

他扬起了眉毛说："你指的是什么意思？"

我对他说他当总统时所建立的对苏缓和，是国内局势的直接结果，特别是因为他努力结束越南战争时所面临的压力的直接结果。我说："军备的增加和舆论是必要的，但美国政府在那时是不会赞成对苏联采取强硬措施的。"

"不会的。"他肯定地说。

"你需要提出一种在国内可得到政治上的认可、在国外又行之有效的战略。"我说。

"对。"他表示同意。

"想想你以前所做的和戈尔巴乔夫现在所做的。他极力

通过对外协调使自己能够控制国内局势或者取得国内的支持，以便采取一种更传统的方式向西方靠近，他这样做是为了他的利益。当然，他们整个的意识形态和体制正在瓦解，但出于对国内局势的考虑，你们两个都制定了对外政策，都在尽量拖延。”

他看着我笑了：“当然，我是个民主主义者，不是民主党党员。”他说，“而戈尔巴乔夫是共产党员。但对外政策几乎经常和国内的情况有联系。”他接着说，“而且有时候被用来作为转移矛盾的手段。”

正如他在试图寻求一种以国家利益的有限概念为基础的政策时所发现的，单凭强权政治不足以赢得为有效坚持对外政策所必需的国内支持。美国人也必须相信，他们的政策既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又是正确、合法的。但正如道义不能完全脱离对外政策一样，对外政策也不能脱离国内政策。

“你无需成为一名民主党人就可以看清这一点，”尼克松说，“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国家领导人利用对外政策为国内服务——有些时候是这样的。不是经常的，只是有些时候。”

我停了一会儿：“有人说你 1974 年访问埃及的目的是为了转移人们对国内发生的事件的关注。”

他眨了眨眼睛：“我知道他们讲的是什么。听我说，那次访问是按计划进行的。由于亨利和我的努力，我们在中东的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我们那次的访问很值得，对我们国内没有一点儿帮助，而且我也没有那样期望过，但我们在埃及受到的接待是空前的。它提高了我的声望，但没有提高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的声望，我没有那样期望过，这不是我那次访问的目的——根本不是。”

1月11日，尼克松的注意力转移到苏联政府在立陶宛发动的暴力镇压上。武装部队强行开进了首都，恐吓并打死了其中几个正从事独立运动的人。

尼克松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两眼直直地瞪着。“伪君子！”他说，“这些人让戈尔巴乔夫逃脱在立陶宛进行屠杀的罪名，完全是因为戈尔巴乔夫用迷人的修饰和‘新思想’把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中的缘故，真荒唐。戈尔巴乔夫利用对外政策转移人们对国内混乱局面的注意力，这是又一个例子。我们正忙于波斯湾事务，以致顾及不到戈尔巴乔夫现在所干的事情，他自己也清楚这一点。戈尔巴乔夫可能不会比他的前辈更残暴，但他还是残暴的。瞧瞧他的所作所为吧！我们没有为那些受控制的加盟共和国挺身而出。布什怎么了？”

尼克松认为布什在戈尔巴乔夫身上下的赌注导致了这位美国总统执行无原则的政策。布什不但抛弃了美国50年来对波罗的海各国要求独立的支持，而且还在扶植一个仍为他的意识形态和极权统制而苟延残喘的共产党。

总统在1月13日对戈尔巴乔夫的暴力行为发表了温和的谴责，这使尼克松推测布什和戈尔巴乔夫达成了一种谅解，即：不论戈尔巴乔夫为保持国家统一而采取什么必要的手段，美国将不表示反对。

“这是个大错误！”尼克松说，“它不仅错了，而且向全世界的独裁者们发出了一个坏的信号。在苏联这仅是暴力的开始，我想我们已经让他知道这样做不会有麻烦。”

尼克松发怒了：“你听到布什对镇压的评论了吗？这都是形式。他能不这样做吗？”

1月14日，《纽约时报》上刊登文章指出，镇压活动是由

那些不暴露姓名的苏联的“忠诚分子”发动的，并没有提到这必须得到戈尔巴乔夫的默认这一事实，尼克松看了以后心情更加不好。他在早晨7点半从家中给我打来电话，发泄他的愤怒。

“我刚把这篇文章写好，我不相信。”他说，“《纽约时报》拒绝承认戈尔巴乔夫躲在幕后一手操作。如果他没下过命令，肯定也默许过，他否认下过命令真是荒唐。我说肯定是他下的命令。还有什么好讲的？竞选班领导人约翰·苏努努说‘戈尔巴乔夫是我们最美好的希望’。很糟糕、令人气愤，我甚至不能相信。这些人本应该聪明一些，我想他们都丧失了理智。”

“一切都清楚了，”第二天他说，“因为美国政府对戈尔巴乔夫采取的是温和的政策，而民主党采取的却是强硬的政策。”尼克松注视着我，“你知道美国政府是错误的，就连特德·肯尼迪这样的人在这个问题上都比布什强硬。因为他能大声疾呼！下一步你是知道的，戈尔巴乔夫就要对其他的加盟共和国下手了。”

尼克松说得很对。1月20日，星期天，坦克车又开进了拉脱维亚并打死了四个人。

第二天清晨，我看到办公桌上有一份他写的三张纸的备忘录，很令人好奇。他在备忘录的一开始要求我为《只争朝夕》的初稿查找一些研究资料。他想论证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之来，我们一直热衷于谈论世界新秩序，到头来却使希望破灭了。在这本书中，他抱着对世界的现实主义态度列举了许多事实，他要用事实来论证他的观点。

他在备忘录中还写道他曾经看到前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在1945年讲的一段话，大概意思是随着战争的结束和联合国

的发展,没有必要再结盟和研制战争武器了。尼克松要找到这段确切的文字,并要求我查找富兰克林·罗斯福所讲的类似的话。他们对后半世纪的天真看法很奇特而又理想化,尼克松想用这些引语来强调他自己认为世界仍然存在危险和不可预测的观点。

他想抨击那些"大谈戈尔巴乔夫的记者们"。他在备忘录中不敢肯定地谈到一位专栏作家讲《华盛顿邮报》上一个叫作戴维·布罗德的人把戈尔巴乔夫比作圣雄甘地,还有一位美国有名的商人"把戈尔巴乔夫比作耶稣基督"!他吩咐我将这些最"令人气愤"的引语汇辑起来,特别是那些过分宣扬戈尔巴乔夫的成就的新闻媒体"专家"和"左翼政治家"们所说的话。

他在备忘录中还说,他意识到这些文章和他将要在书中讨论的问题相比似乎不怎么重要,甚至乏味,但他在写上一本书时发现,少数确切的数字会比一般陈述的效果还要好。

"莫尼卡,我想这些讨厌的任务对你来说可能很乏味吧?"他在早晨的一次谈话中对我说,"但这些都是绝对必要的,数字和引语很能说明问题,任何人都回避不了。"

"特别是当我们要说明戈尔巴乔夫确实是温和的保守派而不再是改革家时。"我说。

"嗯,是这样。人们不会再把他描绘成一个强硬路线的牺牲品了,因为他本身已成为一个强硬路线执行者。我听说布什仍然在考虑出席下月在莫斯科举行的首脑会议,如果他要去,他可让我搞不懂了。"

"甚至戈尔巴乔夫本人都作出结论说他搞的改革已经进行不下去了。"我说。

尼克松晃动着拳头说:"改革家放弃了改革,那么,你就知

道一切都完了。”

尼克松确信，被罗纳德·里根恰当地称为“祸害”的极权统治正在作垂死的挣扎。私有化是惟一能保证不成熟的民主改革不可逆转的途径。戈尔巴乔夫和他早期有变革倾向的同僚们现在成了被改革吓坏了的改革家，他们害怕丢掉权利，害怕资产落入私人手中。1991年初期，戈尔巴乔夫执政下的局面和没有任何经济责任的决策计划的弊病混在一起了，从而导致了经济上的混乱。

尼克松知道，如果要把改革继续下去并对改革寄予希望，就必须迅速果断地过渡到市场经济，包括私有财产、自由企业、货币兑换和自由价格制度。美国可以在帮助俄罗斯形成一种外贸和投资环境方面提供援助，而不是向垂死的中央政府发放贷款。尼克松主张这种援助要与严格的政治和经济前提联系起来，例如取消中央计划、保护私有制以及保证外国投资者介入苏联经济。除非苏联政府确实保证向真正的私有化和自由企业化迈进，否则不能向他们提供贷款和贸易最惠国待遇。如果戈尔巴乔夫继续安抚反对派并拖延改革，苏联将转化为专制和动乱的国家，改革就没什么可谈的了。

“我不知道戈尔巴乔夫是否能够用武力控制住变革的势头。”他在1月22日说。我们一直都在讨论写这本书的难度，随着苏联局势的不断变化，我们每天都要进行改写。担心不得不重写原稿，尼克松努力预测当前激变的结果。

“我想如果戈尔巴乔夫把所有以前支持过他的人都撤掉，改革的精神有可能被他压下去。但我不相信他有改革精神，甚至他在波罗的海地区实行镇压也是半心半意的。没有人再真正害怕他或这个制度。共产主义在苏联已经灭亡，这是毫

无疑问的。但问题是还没有什么力量能替代它。反对力量还没有组织起来,而且没有一个领头人。惟一的选择还是共产党,到头来还得由戈尔巴乔夫——或其他什么人——收拾这个残局。"

我提醒他波罗的海各国在行动上太操之过急了,因为他们在共产主义控制下的时间较短。他回答说:"是 1945 年还是 1917 年,这些可怜的人们,可怜的人们……"

"戈尔巴乔夫的考虑重点已经变了,"我说,"但我们的考虑重点还没有变。"

"说得对!"他一边漫不经心地抛着钢笔一边说,"我们现在远远落后于历史的潮流,这都是布什和贝克的过错,除了戈尔巴乔夫之外他们什么也看不见。但他们不听我的话,凭着80%的支持率趾高气扬,就是听不进去建议。"

他一边拣起落在地上的钢笔一边说:"正因为他们不想听我说话才更应该听听我的意见。"

两天以后,尼克松说他担心这本书稿可能在复印时会失去意义,还担心那些制定政策和提供意见的人没有兴趣听他的看法。

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发现他正坐在角椅上咬着眼镜边儿。冬天明亮的阳光倾泻在他的办公桌上,在曾经使他总统办公室的桌子卓然生辉的文具上跳动着。

他清了清嗓子,露出一丝微笑。"今天我想问你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他说,"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

我像通常那样向他保证说,美国和全世界的人们有必要听到他的见解,他们长期以来受到冷战已经结束以及西方已经获胜等论调的诱导,他们需要一剂现实主义的良方,需要了

解这个真实的世界是如何运转的。

他看着我又笑了："那么这就是理由了?"

"我认为是非常正当的理由。"

"但会有人听吗?"他朝我倾过身子说，"他们还会听我的意见吗?"

这是个诚实的问题。尼克松认为逐年来他的影响力下降，而且他会成为被忽视的历史人物的危险加大了。

我再次向他保证，他听着，没有对这个问题再说什么了，他显然认为有必要写这本书，但仍然对这本书的影响没有信心。

当时，苏联新的外交部长亚力山大·贝斯默尼克批评美国在波斯湾战争中的军事行动，使贝克感到震惊。

"这位新外长对我们在波斯湾战略的首次批评正是我所预料的。"他1月28日说，"但布什对此不予理睬，他说他本人保证戈尔巴乔夫会完全支持我们的军事行动。然而，动员起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在内的同盟是有好处的，它有助于我们在国会以及全国获得对军事行动的支持，但代价是我们的'同盟国'现在实际上可能对我们的战争行为正努力行使否决权，并且坚持在战争胜利后建立和平。苏联外长的声明仅仅是在危机四伏的局势中射出的第一支箭，这是我所预料的，在战争的尾声以及战争结束后我们对自己的观点进行辩论时，这种局势还会发展。"

那天晚上布什要发表国情咨文讲话，尼克松担心他会极力迁就戈尔巴乔夫而不理会他在波罗的海地区的策略。他声称自己不愿意观看那种"讨厌的东西"，但演讲结束后我给他打电话时发觉他显然已经看过了。

"总统先生？我想你已经——"我开始说。

"布什对苏联太手软了。"他厉声说。

"对于波罗的海地区所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现在不惩罚苏联，我们将来就做不到了。"我补充说。

"看在上帝的份上！布什把他们放在手心上打，他似乎很心疼！戈尔巴乔夫是否是保守派的牺牲品已不再是核心问题，现在的核心问题是他和他们关系融洽。布什在他的国情咨文中说东道西，对于一个总统来说，这是个内容松散的演讲，他讲什么不惜任何代价支持戈尔巴乔夫，真是太过分了。"

第二天，当尼克松听到贝克和贝斯默尼克通过协商发表了呼吁在伊拉克停火的美苏联合公报时，他又一次地感到震惊。

"我从一个秘密渠道听说布什非常生气，还听说有些人正谈论国务院很专横。想想看！贝克竟越过上司和苏联人谈判，把这令人气愤的讨厌事情留下了？你甚至能想象出亨利会做这样的事吗？上帝啊！贝克做事出格了，布什肯定气得团团转。"

他停了一会儿又继续说："他应该为这件事把贝克辞掉，但他不会的。"

"白宫急忙澄清有关贝克的说法，他们好像没准备好似的。"

"他们当然没准备好，"尼克松大声接着说，"贝克认为他应该做这件事，他真是渴望当总统。"

尼克松对贝克和他几乎毫无节制的权利欲的蔑视是很明显的。"贝克这件事是很坏很坏的新闻，他甚至没有意识到他在处理战争后期事务中所建立的美苏联合会彻底排斥以色

列。苏联人的话全是空洞的许诺,我们的话也有一点儿。"他面带非常气愤的神色看着我,"苏联人出于他们战后地位的考虑放出了和平计划,而我们呢,贝克到处都在讲平安无事。基辛格从来不会像他那样不负责任,从来不会。"

1月5日,尼克松还在为贝克在苏联问题上自作主张的行为生气,他对我说,贝克"失控"了,他和贝斯默尼克定的协议简直是"一团糟"。尽管在波斯湾战争期间,尼克松还是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苏联局势的发展和他认为非常软弱的美国政策上。

第二天我走进他办公室的门口时他伸出双手:"请坐,我已经山穷水尽了。"他叹了口气说,"如果他们现在不对戈尔巴乔夫采取强硬措施,我将不得不认真考虑我的选择。"

苏联总统下令在街道搞武装巡逻,不是为控制小型犯罪,而是制造一种威慑气氛,甚至可能要挑起混乱。

"我想你会同意,戈尔巴乔夫不是向右转的牺牲品而是领导人,即使他没有这种企图。"我说。

"事情已发生变化,"他回答说,"但没有发展到人们认为的那种程度。所有那些新闻媒体的小丑们——还有布什和贝克等人——轻描淡写地把戈尔巴乔夫的反动转向说成是暂时的,是为避免国家分裂所必需的。什么国家?这是一些违背自己意愿受人控制的乱七八糟的加盟共和国。你不会因为一个绑架者转为依靠他所绑架的人而去赞扬他的。"

"甚至苏联人都认为我们的判断有错误,"我接着又对他说,在最近一版的《60分钟》上有人引用几个苏联人的话,讲到苏联人并不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个英雄,但美国人却把他当成了英雄。

尼克松"啪"的一声合上双手:"啊哈！这不是很妙吗？事实就是如此。我们把他吹捧得太过分了,以至于几乎不可能放弃他。"

2月14日,尼克松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并让我坐下来。他站在那里,严肃地看着我说:"莫尼卡,"他拖长了语调,"戈尔巴乔夫提出所有这些战后和平计划,以调解英雄的身份出现之后,他会使更多的人神魂颠倒了。"接着,他坐了下来。

"苏联人正极力用他们抛出的和平方案来推迟区域性战争,极力表明他们仍然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主要角色。他们还努力保持同伊拉克的关系,并且和第三世界合作。我们应该重视的是他们和伊朗人的关系。尽管伊拉克是当前的热门话题,但伊朗人确实很危险。"

尼克松担心的是苏联人正在以海湾战争作为拖延之计,他认为苏联对美国、伊拉克以及含蓄地对伊朗作出主动姿态旨在建立一种信任储备。如果苏联能充分转移人们对国内危机的注意,他们就可以有能力恢复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控制力。正当西方国家把注意力集中在波斯湾时,苏联就可以在国内使用武力而不至于成为西方国家的众矢之的。

"我想,布什看不到的是戈尔巴乔夫正在为自己牟利,而且他也有权这样做。"尼克松2月18日说。我们当时坐在他的办公室里,讨论着苏联最近对中东的和平方案。"问题是我们认为他也考虑到我们的利益。布什必须在拯救戈尔巴乔夫和打败萨达姆·侯赛因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目前他处境艰难,因为他想两者兼得。他做不到的,但我想他更倾向于打败侯赛因,因为他为此已调配了巨大的资源。戈尔巴乔夫也只有等待了。"

我对他说我觉得布什似乎对苏联的和平计划感到愤恨，因为莫斯科竭力篡夺美国所扮演的领导角色，并且为纠正苏联的国内问题赢得时间。

"我知道，"他说，"这很英明，也是最基本的。每个领导人在某个特定时候确实是这样做的。国内情况不妙啦？那么好吧，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引起轰动，讽刺吗？有可能。错了吗？这要看具体情况。在某个地方挑起战争或调动军队冒风险是不好的，但可以引起小小的外交轰动。戈尔巴乔夫在这个问题上是有过失的，里根也是如此。多数领导人在有些时候都是这样做的。"

"这样做会受到指责的。"我说。

"哦，作为游戏就少不了这部分，"他说，"但我想如果他要这样做，他事先已经估计出利大于弊。"

尼克松注意到戈尔巴乔夫用已经抛弃他的改革派与政府内的强硬派抗衡，使自己的处境危如累卵。他对改革派维持口头上的承诺，但自己却站在反对派一边。他保证支持美国在波斯湾的军事行动，但却努力保持同萨达姆·侯赛因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尼克松赞赏他竭尽全力坚持到底的能力，但也清楚戈尔巴乔夫是不能在这场席卷整个苏联的骚乱中生存下去的。布什的艰巨任务是用最平稳有利的方式利用这次变革，但尼克松怀疑他是否能够做到。

2 月 19 日，总统决定不接受苏联最近才提出的和平建议。布什甚至敢于冒疏远戈尔巴乔夫并分裂反对伊拉克联盟的危险同苏联对抗，尼克松放心了。对布什来说，挫败萨达姆·侯赛因比安抚戈尔巴乔夫更迫切。然而尼克松也担心，一旦战争胜利结束，布什会再次全力挽救戈尔巴乔夫的命运。

到了2月底，强硬派和改革派都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尼克松本人也是这样被人要求辞职的。他全面考虑了苏联当时的形势，全国政治、经济混乱，周边地区又冲突不断，总统无力控制国家，由他组织起来的力量逐渐开始排斥他。他在社会进程中同这些社会力量对抗，开始变得人微言轻，因此他的辞职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布什如果继续拖延戈尔巴乔夫的下台，他自己也会被抛弃的。

2月21日晚上10点钟，尼克松在我的留言电话上留下一则口信："让你做个噩梦吧，我认为布什会支持苏联的和平计划。"

我给他回了电话，问他为什么认为布什会改变主意。

"我不相信他会同戈尔巴乔夫对抗。他在拒绝这个建议时表现出他的勇气，但现在我想他正在为此而感到懊悔。"

我不同意他的看法，认为那些不接受和平计划的同盟国——例如以色列人——会刹车不干的。

"但我担心的是，这种变化过程已经开始了，你知道我的意思。"他说。

被尼克松称为戈尔巴乔夫的"辩护士"们表现得肆无忌惮，他们在国内外继续赞赏苏联总统的功绩，但他们的过失是实实在在的，因此他们的这种赞赏"令人作呕"。人们竟会支持一个过去代表失败并瓦解的制度而现在又阻碍更进步的民主和自由市场改革的过时的人，尼克松对如何看待当前这一事实感到困惑，他想通过这本书表达他的愤怒，并把他的观点作为历史记录。

2月27日早晨11点，我到尼克松的住处同他见面。一走进他的房子就发现这位前总统站在门厅前等我了。他家的

狗——布朗尼——跳跃着向我跑过来。这只短毛杂交狗在尼克松的住处流浪时被尼克松收养了，尼克松对这只粗野的狗的喜爱令他身边的人感到不解，其中也包括尼克松夫人，她抱怨这只狗把家里搞得一团糟。

我们在他的办公室坐了下来，壁炉里冒着明亮的火苗，布朗尼就蜷缩在他的腿边。"我写这本书是出于这种考虑的：我要痛斥长期以来所有支持戈尔巴乔夫的人，我要把戈尔巴乔夫描述成一个悲剧人物。"

我表示同意，并提醒他不要从同情的角度描述戈尔巴乔夫的悲剧，应该把他看成是他那种改革的失败者。突然，那只狗朝我跳了过来。

"我不想在这一点上引起误解。"他说，"但我要指出戈尔巴乔夫的悲剧在于他是苏联特定时代的特定领导人，事态的发展使他陷入困境。他不但没有找到出路，而且还固守到底。苏联的改革……没有人认为有可能搞改革，可戈尔巴乔夫搞了，正因为如此，他将永载历史史册。但当改革使得他丧失了权利时，悲剧就出现了。他用来挽救他的制度的改革到头来却把这个制度摧毁了。"

我险些没记录下来这些要点，因为那只狗正在我面前直起身子，低声叫了起来。我想用钢笔把它引开，但它摆出一副大无畏的样子，又朝我靠近一步，咬住了钢笔，把塑料笔帽叼了下来。我害怕为伤害前总统的狗而承担责任，极力哄它把笔帽还给我，可它却嘲弄般地傲视着我，一下子把笔帽吞下去了。尼克松对刚才发生的一幕毫不在意，继续叙述他的观点，我急忙又抓起另一只笔匆匆地作着记录，这时，尼克松又把它叫回到身边。

"从让人们理解当前苏联的现实的意义上看,"尼克松说,"这本书将是非常重要的。戈尔巴乔夫把他的国家毁掉了,这对我们来说是好消息,可对他来说是坏消息。革命党人中很少会产生出真正有能力的领导人,你从历史上就可以看到这一点。戈尔巴乔夫领导了一场平静而迅速、全面的革命,现在已经被革命抛弃了。"

他压低了说话的声音,把手放在狗的脑袋上:"当我 1986 年去苏联时,苏联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多布里尼送给我一些伏特加,我当然没喝酒。那次访问中,我和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一小时四十五分钟。他是个有坚强个性的人;坦率地说,他把布什、英国首相约翰·梅杰、贝克甚至里根横扫在地。我记得我们主要讨论了军备控制问题,根本没有谈论到——我说的是根本没有谈论到——政治和经济改革问题,他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谈论这样的问题,而会谈成果却超出了他所希望和想得到的东西。"

他又压低了声音:"我和迪米特里交谈过,他告诉我说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进行了一次绝妙的较量——谢瓦尔德纳泽在东欧改革最终效应的问题上误导了戈尔巴乔夫,而戈尔巴乔夫自然没有看到它的到来。此时他还不晓得他究竟是干什么的,尽管他确实仍然相信能挽救共产主义。从那一点来说,他看不到局势就像离开车站的火车一样已无法挽回。"

他脸上现出喜悦的神态:"我有个想法,但我要仔细考虑之后再告诉你。"他说。

几天之后,尼克松告诉我他要在 3 月底之前到苏联去。他认为只有"到那个讨厌的地方去"才能全面地了解那里的局

势。他要会见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谢瓦尔德纳泽、贝斯默尼克以及政府内外的其他领导人。"在国外通常必须要会见反对派，"他说，"特别是在苏联，因为今天的反对派可能会成为明天的领导人。"他认为苏联的局势已经恶化到他应该亲自对它进行观察并把观察结果向总统和美国人民报告的地步了。

他惟一担心的是，定于3月16日离开莫斯科的贝克会利用布什进行干预并阻止尼克松的访问。贝克想用最好的言辞来描绘美苏关系，而尼克松无疑要对美国当前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政策的危险性提出更加现实的观点。为防止尼克松反对他们，布什和贝克可能会要求尼克松推迟访问，或者更恶劣的是，请求苏联领导人不会见他。

显然，尼克松对这种可能性感到很生气。"如果是那样的话，"他说，"我要对布什说我将不得不向新闻媒体讲明我不能去苏联的原因。这样的话，他们将处于困难境地，而且不得不作出解释。"这是幕后政治的一种明确无误的经验：如果布什和贝克取消尼克松以私人身份到国外访问的权利，那么尼克松将取消他们向新闻媒体撒谎的权利。

1991年3月中旬，苏联正处于灾难性矛盾对立状态。戈尔巴乔夫想把苏联元气已尽的经济变成混合型经济，并维持这个联盟的统一，他的这两个目的都没有达到。不打破这个极权统治，改革就无法继续进行，因此戈尔巴乔夫选择了放弃改革这条路。法律与法制以及战争与和平都不能奏效，不论在混乱的气氛之中还是在强硬路线的法制管理之下，改革都是行不通的。戈尔巴乔夫想领导所有的人，但现在却领导不了任何人。右派势力掌了权，左派势力失去了权利。尼克松想知道戈尔巴乔夫是否还有可能继续改革下去？

谢瓦尔德纳泽在3月初说戈尔巴乔夫仍然值得帮助，因为在国家一旦重新获得安定的情况下，他还会有能力恢复改革。这就假定说，戈尔巴乔夫暂时受控于强硬派，他有能力摆脱他们的影响。他现在把注意力集中在克格勃、军队和共产党等方面，它们都代表中央政府，而戈尔巴乔夫最有权利保护它们的利益。

由于戈尔巴乔夫无意解散共产党，他开始了一次富于幻想的冒险，进行一场与其相适应的民主改革。再者，许多真正的改革家都不相信他，和他脱离了关系，开始制定自己确实有效的民主改革的纲领。这种运动已经在叶利钦的领导下开始了。

然而，改革派既不能带来真正的变革，也不能接替戈尔巴乔夫。他们得到普遍的支持，但缺乏组织机构。他们在戈尔巴乔夫向右转之后便失去了在政府中的位置，而且不能发表他们关于民主和自由市场的宏伟许诺。共产党人有权没有理，而改革派有理没有权。

与此同时，强硬派认为严格的极权制在混乱的时代会带来安全感和亲切感，他们声称人民需要它。他们认为在要面包不要民主和不要面包要民主这两种选择之间，人民会一致选择要面包不要自由。强硬派指着通货膨胀达200%、失业率达35%的东欧国家说，他们要把苏联人民从同样的命运中解救出来。

由于这种论调玩弄公众对变革的惧怕感，所以尼克松认为西方必须努力使他们打消这种惧怕感。当强硬派问人民"要面包还是要自由"时，西方早就应该告诉人民："如果你们努力改革，我们会协助提供面包。"尼克松认为这样他们两者

都有了

尼克松经常把苏联的形势和法国大革命相比。激进派想消灭全部的制度、习俗以及旧政权的传统，这种企图导致了在新的自由的幌子下的毫无约束的暴政：群氓统治、恐怖王朝以及独裁征服。如果法国大革命有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激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动荡常常会相应地导致独裁。真正的民主改革要想在苏联获得成功，就必须在不引起巨大动乱的情况下把共产党统治 70 年来所建立的所有的制度和习俗铲除。

尼克松怀疑这是否能行得通。此时，91%的立陶宛人、78%的拉脱维亚人和 77%的爱沙尼亚人想从莫斯科独立出来，并且已经为此而献出了生命和财产。他们要求自治，而从克里姆林宫里传出话来说，自治要由共产党来定。冲突加剧了。

波罗的海国家是苏联链绳上的薄弱环节，原打算对他们实行镇压就可以阻止独立运动、重新制造恐怖并且威胁其他的共和国，然而正相反，他们使成千上万的人民走上街头，举行集会支持独立并反抗克里姆林宫。曾经使东欧国家的共产主义解体的民族自觉和自治的主张在苏联是不允许实行的，因此戈尔巴乔夫极力采取各种方式来保存所剩下的极权统治，一旦最薄弱的环节从链绳上脱落，甚至使用武力也不能再把它结上。

这就是尼克松在 1991 年 3 月准备访问时的苏联局势。美国人需要了解的是戈尔巴乔夫控制力薄弱和失去控制力的迹象、改革派的失望和动向、强硬派的普遍影响以及各个加盟共和国对更大自治权的要求，最重要的是苏联人民对更大程度自由的要求。尼克松准备搜集他所需要的情况，以证明自

己观点的正确性。

他要我搜集戈尔巴乔夫的"最突出的相互矛盾的论点"，例如一党制和由多党组成的政府以及国家所有制和私有制等。他需要得到戈尔巴乔夫的意识形态上的精神分裂症以及他对政治中心的模糊理解的实际例子。戈尔巴乔夫对不同的听众说不同的话，他延长了它的政治存活期，但每次相互矛盾的讲话都引起了灾难。

在我发现的他许多次的讲话中，以下概括了戈尔巴乔夫的摇摆性："我认为我是民主主义者"(1990 年 12 月 25 日)以及"我是共产主义者，坚定的共产主义者"(1990 年 6 月 8 日)。

3 月 16 日，星期天的早晨，在尼克松启程之前，我驱车前往他的住处，将我搜集的材料交给他。11 点钟我到了地方，按了门铃，没人应答。我便来到通往厨房的那个门。听到里面有声音，我敲了门。门开了，尼克松、考克斯和尼克松夫人站在厨房里笑着，箱子摆在外面的门厅里。布朗尼逃过了吃进钢笔帽的灾难，在附近跑来跑去。当我关门时，前总统转过身来。

"莫尼卡，亲爱的，请进。"尼克松夫人说道，"我们肯定没有听到铃声。狄克呢？噢，你在这啊。"

尼克松握着我的手，看着大家说："哈，我们都到齐了。"

尼克松夫人慢慢地走到餐桌前，拿起一张很大的生日贺卡，卡片是由布什政府的成员设计并签了名的。

"他们说真心祝我生日愉快。"她笑着说，"你瞧这贺卡有多大！他们在上面写了些非常好听的话。噢，莫尼卡，为什么不拿一束花回去呢？我们这里花太多了，我想让你拿回家一

些。"她拿起一束非常漂亮的兰花插花给了我。

我谢了她并说:"我希望总统回来后为你准备一个庆祝会!"

夫人笑了,前总统冲我们三个眨了眨眼:"她的礼物是我要离开几个星期!"

尼克松叫我去书房以便让我把材料给他。他戴上眼睛,坐了下来,将双腿搁在垫凳上,迅速浏览着材料。

突然,他取下眼镜,用眼镜指着我说:"你知道什么令我发怒吗?那就是贝克现在在那儿。当然他会会见叶利钦,但是他见那些人只是因为他知道我会去见他们。"

我坐下来说:"我想你不必太关注贝克之行。他的访问意在支持戈尔巴乔夫,但是苏联人民对戈尔巴乔夫的环球旅行式的外交并不满意,所以这对贝克不会有什么帮助。"

"行,"他回答说,"但贝克本来去那儿只是会见戈尔巴乔夫,而现在他在会见立陶宛人和叶利钦,天知道他还要见什么人。这就是他的恶意。"

他又把眼镜戴上。"这材料看上去不错。迪米特里当然会站在我这边,他想让我在莫斯科发表演说。我在考虑这事。如果我要发表演说,我肯定会利用这些资料。好像没人意识到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上一直摇摆不定的程度,提醒苏联人会达到提醒美国人的效果。"

他笑着说:"我要去罪恶帝国了。"

"我想美国新闻媒体会全面报导这次旅行的,也许比你预料的更广泛。"我说。

"不,"他说,"他们不喜欢报导我,但我不能肯定这次旅行中会不会有足够的争议而引起关注。我必须亲自解放立陶宛

才能吸引新闻媒体的关注。"他笑了起来,"我们等着瞧吧,苏联媒体当然也不会报导。他们比美国媒体更不负责。好家伙!怎么会是这样的一群人!"

他起身送我到厨房,我在那儿同他、尼克松夫人和考克斯夫人告别。在我向车走过去时,前总统站在门口挥着手。这以后的两星期我再没有见到他。

即便是根据他自己的标准,他的苏联之行也是成功的。这是他自1959年同赫鲁晓夫的厨房辩论以来第七次访苏,他分别同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贝斯默尼克、谢瓦尔德纳泽、杜布利尼以及许多政府内外的官员会面,整个日程令他感到疲倦。他去了立陶宛和乌克兰,以便对他们独立的动机及领导人的相对力量作出评价。他在莫斯科街上散步,同普通苏联百姓交谈,了解他们的痛苦、恐惧和期望,引起了新闻媒介的关注。3月22日,他在莫斯科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说。他提醒苏联听众说,如果他们在接受了相对自由选举、东欧的解放、德国的统一、部分言论自由并且开始脱离第三世界国家之后,又返回到极端保守主义的黑暗日子里,他们会发现自己是历史的"旁观者"。他又说,在一个国家的生命历史中,像这样的时刻"在十代人里才有一次"。他们的真理的时代已经到来,给这片曾只是以暴政和压迫闻名的土地带来的是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

演说很成功,达到了尼克松此行的部分目的:向苏联人表达了他的观点。等他于4月4号返回美国后,再将他的观点传达给他的美国同胞。

早晨10点,在他下了飞机返回家中不久,我的电话响了。

"莫尼卡!"他大声叫道。

"总统先生!"我说,"欢迎回家。"我并没料到他回来后这么快就打来电话。

"是啊,我很高兴回来了。现在那里糟透了,他们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对了,你知道吗? 我在同一天会见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还没哪个主要领导人做到这一点呢。我当时想你会发现那是很有趣的

"尽管有新闻检查,苏联新闻媒介还是对这次访问作了全面报导,比美国媒介报导的多得多。谈到新闻媒介,我想针对这些报导搞一次报告会,所以我需要你提供有关海湾战争的最新消息以及他们可能会提到的任何问题。我知道我能依靠你准备这些简报材料。"他停了一下,"你的精神怎么样? 仍然时刻准备战斗?"

"始终如此。"我说。

"好吧,"他答到,"明天见,我会向你详细说明此次旅行。你要作好长时间会谈的准备。你认为能坚持那么久吗?"

第二天早晨当我到那儿准备同他交谈时,他手里拿着话筒正在口述他的见解,见面被推迟到后半下午。我3点钟到那儿后,发现前门开着。穿过门后看到尼克松背对着我站在门厅,他正在看一封信。

"先生?"我叫了一声。

他转过身来,看到我很吃惊:"噢,你好,"他说,"我刚才为你开了门,但我也想呼吸一些新鲜空气,这里太闷了。"

他接过我的大衣,我们走进书房。

"我要给你在一流外交和地理政治方面上一课。这是我的苏联之行中最有趣、也最沮丧的一次。首先,那是个糟糕的地方,无论在哪里你都可以看到人们在排队,队伍排得长长

的，等着买各种短缺商品。实在是悲哀……"

他在椅子上坐直了说："戈尔巴乔夫的自我控制力很强；他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但他确实处于困境之中。我知道有些人几年来一直对'是新尼克松还是老尼克松'的问题乐此不疲。现在他们也在问，是老戈尔巴乔夫还是新戈尔巴乔夫？当然戈尔巴乔夫声称他还是同一个人。

"目前戈尔巴乔夫没有选择，没有人和他结盟，目前没有。他不会离开舞台，至少不会很快离开。他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一个竞争者。他喜欢权利，大部分领导人都喜欢权利，他力图保持权利。"尼克松把他同自己作了一个比较，"他是一个斗士。"

尼克松在空中握紧拳头说："他这次的自信不如我在1986年和1988年见到他时那么明显。他很敏锐，但在政治上已经筋疲力尽。我想正是这种筋疲力尽才使他自己屈服于右翼的压力。但他这个人无法预测，这家伙会随政治环境的改变而立即改变。他可能有能力突然从反对党控制中摆脱出来，但我对此表示怀疑，他身上的压力太大了。他现在是同反对党人站在一边。"

"他是在领导他们，还是在被领导？"我问道。

"两者都有。"

我问他戈尔巴乔夫是否可能将改革进行下去？他摇了摇头："也许吧，但我怀疑这一点。由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怎么可信呢？它不可信。我们不能忘记他到底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杰出的俄国民族主义者。他不会容许国家解散或者私有制的，不会的。在我离开前你给我整理的材料就表明了

那一点,在我们的会见中他又几乎告诉了我这一点。这家伙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种民主人士。”

他露出喜悦之色:“你知道吗,这次旅行有一个惊喜。”

“是什么?”我问道。

他挥动着手指说:“简单地说,叶利钦。”

他停了好一会儿才继续说:“该死的新闻界!如果相信了他们,你会认为叶利钦是个无能、不忠的笨蛋。新闻界之所以对他抱有恶意的惟一原因就是因为他有棱角。他没有戈尔巴乔夫那样的风度和象牙塔般的优雅。”尼克松有意识地抖动了一下身子,“无论西方舆论界怎么说他,他都在感动和激励着人民。”

叶利钦的勇敢也感染了他:“这家伙很有政治感染力。他把人民——他的‘沉默的大多数’——鼓动了起来,他有潜力成为一个杰出的革命领袖。”他把叶利钦同自己的比较说得更明确了,“他非常坦率,目光直视着你。他的核心信念已不再是共产主义。对美国来说,他绝对要比戈尔巴乔夫好得多。但我认为他不想接替戈尔巴乔夫的工作。”

“你是说他不想领导苏联,但他想领导一个独立的俄罗斯?”我问。

“是这样,因为他知道苏联没有未来,没有。甚至于戈尔巴乔夫的镇压也是没有意义的。我看不出这个国家怎么可能再合在一起,尽管戈尔巴乔夫不会让它分崩离析,他无法不在历史纪录上留下污点。另外,至于波罗的海问题,我告诉强硬派们在边界上没有威胁的邻居要比在国内一个愤怒而仇恨的民族要好得多。”

他微笑着说:“但是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区别在于叶利

钦代表着民主原则，而且他没有实行独裁的物质财力。如果苏联还有未来的话，那就是叶利钦。"

他的眼睛向下看着："你知道，有趣的是我这次去了我1959年去过的同一个市场。那时人们当然很穷，但充满了自信和热情，可现在那种精神状态已经荡然无存。现在的人民在物质上更富有了，但他们在精神上却更加贫乏。我今后要利用这种情况的资料，因为它正好概括了他们现在的状况。

"他们过去相信他们的制度会超过我们的制度，现在他们知道这种制度已到了它的末日。人民处在绝望之中，有一种很深的忧患。人民之中也有分歧，那里没有恐惧也没有希望。"

我告诉他我已收集了一些关于他旅行的剪报，他笑着说："很好，我已两星期没看报了，你看，还不是太糟。但我不想看那些文章，告诉我他们都写了什么。"

我告诉他大部分主要报纸都刊登了他同戈尔巴乔夫的照片，但没有他同叶利钦的照片。

"无赖！"尼克松喊到，又一次挥动了拳头，"尽管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还指望有什么不同。

"对了，"他又放低声音说，"贝克企图破坏我同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会见。他不想听事实。他讨厌我去那儿讲真话这一事实。"

当然，尼克松看了有关他此次旅行的剪报。他对《纽约时报》的报导感到欣慰，而《华盛顿邮报》的报导令他难过，尽管他并不感到吃惊。

"尼克松夫人看《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时，我碰巧看了些文章。"他说，用他惯用的伎俩，责怪前第一夫人引起了他

的好奇心，"《纽约时报》很了不起。他们的报导又公正又好。我会毫不犹豫地给瑟奇·施梅曼一个采访机会的。《华盛顿邮报》总是非要制造一些麻烦不可，他们说我把莫斯科的孩子们给吓跑了。当然他们的确被吓跑了！克格勃就直接跟随在我身后！他们只是不愿承认我仍然存在，并且有影响力。"

尼克松为《时代周刊》杂志起草了一篇文章来继续扩大他的影响力。他给赛姆斯写了一份备忘录，将一些随意的想法写了进去，正是这些想法最终引起了一些争论。

他在给赛姆斯的备忘录中写到，生活在苏联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是不自然的。国家、个人、市场和思想要自由是正常的。他指出，戈尔巴乔夫因为两件事而遭到国际社会的批评，一是1989年苏联红军在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屠杀和伤害几百名无辜示威者的暴行，二是1991年1月臭名昭著的内务部黑贝雷帽特种部队在立陶宛和拉脱维亚杀死20名和平示威者。尼克松写道，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被指控要为那些血腥事件负责的人现在遭到的批评是，他在保卫他的祖国上还不够残忍。

尼克松着重谈到，前几次去苏联时，他所见的只是"上层人士"。这次旅行很突出的一点是他不仅同戈尔巴乔夫见面，还同反对派领袖见了面。那里已经有了一些言论自由和自由选举，不再有恐惧感。但是，尼克松又提醒道，戈尔巴乔夫现在完全站在反革命势力一边，人民在受着"巨大忧患"的折磨，他们对自己、政府以及过去曾激励他们的意识形态完全丧失了信心。

若改革不进行下去，苏联会逐步变成一个"无意义的帝国"，一个有着第三世界经济的核武器超级大国。美国应该采

取措施从而确保改革派的合法性，并给予他们相应的支持。戈尔巴乔夫不是我们寄予经济改革和温和外交政策的最美好的希望。他不会像叶利钦那样同共产主义制度分道扬镳。他保持着他的民族主义者的身份，不同意波罗的海国家的独立，对像古巴、阿富汗和安哥拉那样的国家并不轻易放手。如果我们不加强改革派的力量，戈尔巴乔夫会继续同反动势力站在一边。他最后向赛姆斯写道，我们要向新闻界和外交机构中仍然支持戈尔巴乔夫的"知识精英们猛击一掌"。

尼克松写给赛姆斯的备忘录的大部分内容最终发表在4月14日那个星期的《时代周刊》杂志上。尼克松反对将戈尔巴乔夫看作是改革的最美好的希望，宣称叶利钦是最符合苏联和我们的利益的真正改革家。他确实向美国新闻界猛击了一掌，他说他们"本末倒置"，牺牲进步的民主改革，导致了停滞和毁灭性的局面。他还写道，我们必须在不干涉苏联内政的情况下加强同改革派的联系。

他在结束语中说："支持改革从道义上说是对的。"

威廉·萨菲尔就尼克松的苏联之行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专栏文章，他强调了尼克松的观点，认为我们应该支持叶利钦，因为"经济现实使叶利钦的声望提高"，而戈尔巴乔夫已没有意义了。

带着这些观点，尼克松开始接受了一系列的访谈，讨论他在苏联的见闻。4月14日，星期天的晚上，他出现在《60分钟》电视新闻节目中，强调美国将重心从戈尔巴乔夫转向叶利钦的必要性。

节目播发之后，我给他打电话。他急切地说："你觉得节目怎么样？我当然没有看，尼克松夫人和朱莉都说非常好。"

我表示赞同，说我注意到他对叶利钦的强调是访谈的关键。

"很好!"他回答说，"那正是我想说的。要唤醒那里的人民。看来这么做值得吧?"

我表示确信无疑。尼克松又说:"好了。昨晚我写了大半夜的笔记，是有关在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我明天下午给你看。你会看到我是怎么做的，我知道你会欣赏它们的历史价值。"

第二天，4 月 15 日的早晨，我刚刚坐在桌子前，尼克松用内部对讲机叫我。他准备去纽约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接受伯纳德·肖的现场采访，但在离开前他想给我一份他的手写笔记。

尼克松用铅笔指着笔记说:"这一份给你保留。你会注意到上面写的时间。"

他在上面写着"星期六，1991 年 4 月 13 日"和"早晨 1 点 50 分"。紧接下面写着"美国使命"，并在下面划了一条线。下面是一篇很长的专题论文，它论述了在外交政策中注入理想主义的必要性和为达到这一目标所需的现实手段之间的微妙平衡关系。

他写道:"我的结论是理想主义……必须成为政策的一部分。理想主义不可避免地同我们的利益相联系。美国只关心一个国家在它的边境之外做些什么已经不够了;我们还要看他们在国内做些什么，对他们自己的人民做些什么，因为在家内的谋杀同在家外的谋杀一样是犯罪。"这明显指的是戈尔巴乔夫在波罗的海各国的行为。

他承认这种推理令我们感到模糊，但是从道德的角度来

看，那种认为"因为越南同苏联的关系密切，因此它入侵柬埔寨是正当的干涉；以及波尔布特屠杀200万人和我们没有关系只是因为它没有发生在我们国家"的说法是虚伪的。

他论述说，边界内的侵略同边界外的一样极具破坏性，我们必须首先采取行动来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然后，他以令人吃惊地断然拒绝现实主义的语气说，甚至在不涉及到我们狭隘意义上的利益时，我们也应该扩大我们的利益范围，包括制止"违反人性的犯罪"。

最后，他在作为结尾的一段个人评论中写道，他在格鲁吉亚、立陶宛和乌克兰等地受到人民的欢迎，很令他感动。这完全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代表美国，美国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圣诞老人"，给他们带来物质的需要，而且还是一种思想的象征。他说，那里还有一幅比"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比萨屋和摇滚明星"的广告还要巨大的美国图片。我们的政治体制尽管不完美，但它却能激励人民不但过着物质丰富的生活，而且过着一种"体面的、人道主义的和有道德的生活"。

他最后的看法很深刻：他们欢迎他并不是因为他为他们做了什么或可能为他们做什么，而是因为他们知道，作为一个美国人，他希望他们在保持他们自己丰富的历史文化的同时，过上更好、更自由的生活。

他写于深夜的这些笔记试图将苏联当前的事件同更广泛的哲学联系起来，为美国的新政策服务。尼克松相信现实主义需要彻底自省。各种利害关系仍然是第一位的，但现在也必须要同不太现实的问题一起考虑，诸如基本人权问题。如果美国要保持作为一种值得效仿的典范，美国对外政策中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传统平衡必须重新调整，就要稍微向更

伟大的理想主义倾斜。这些笔记是尼克松为奠定美国对外政策的新的哲学基础所作的最初努力,它又一次证明了美国应在国际上发挥监督作用

尼克松开始将这些零散的意见整理成具体的建议,准备提供给布什。他开始时写的是"总统亲启"的备忘录,其中评估了苏联的形势并提了一些政策性建议。尽管尼克松回来后布什和斯考克罗夫特都没有给他打过电话,这令他很恼火,但他确信没将这种失望情绪流露在备忘录中。

"根据我回来后他们不理我这一做法,我确实不想再等两个星期送这该死的东西。"他在4月16日说,指着他的草稿,"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听说布什可能要同戈尔巴乔夫进行最高级会谈,甚至没有军备协议。"他指的是在考虑中的"削减战略性武器协议之二"。

尼克松感到震惊。那不仅是美国向戈尔巴乔夫及他的强硬派同伴表示支持他们的信号,而且明显地表示拒不接受叶利钦和他所代表的进步的民主改革。遍及国际上的那些反叛者会受到鼓舞。

"布什到底在想些什么?他一转眼就忘记了可怜的波罗的海各国。如果他现在到那儿去同戈尔巴乔夫握手,叶利钦掌权后不会忘记这事的,他掌权是不可避免的。"

尼克松气愤了。4月18日萨菲尔在专栏文章中谴责了举行高级会谈的观点,他认为除非苏联停止遏制欧盟的常规部队,这令尼克松感到些许欣慰。尼克松表示赞同,但怀疑政府在寻求援救戈尔巴乔夫时是否会考虑这样重要的安全问题。

"萨菲尔是对的。"他一边把报纸扔到垃圾桶中一边对我

说，"但对布什他们不会起作用。这份备忘录写好之后，我明天把它送给布什。但他没打电话给我，我实在不想为他做任何事。"

幸运的是布什打来了电话。那天早晨晚些时候，我同尼克松坐在他的办公室时，电话铃响了。我过去接电话，白宫的接线员说："美国总统要和尼克松总统通话。"我为她接通了尼克松的电话，他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他们谈了15分钟。之后，我们开始谈。"啊，莫尼卡，你会感到高兴的，因为我同布什的交谈很有趣。我没想到他会打电话。也许是斯考克罗夫特让他打的，不管怎样，他邀请我星期一去白宫吃午饭。我告诉他你明天会带着备忘录去白宫，尽管他说他明天在戴维营，但你可以把它交给斯考克罗夫特。至少在我去那儿之前他会先看过这东西了。"

他笑了，对来自白宫的最新姿态表示满意："我现在要完成它的编辑整理，明天早晨清醒时再最后看一遍。"

4月19日的整个早晨，他都花在整理备忘录上，直到他对文体和内容都满意为止。他当着我的面签了名并写上日期，然后装入信封封好："我星期一同布什见面后会给你一份的。"他一边说一边把它递给我。

"你知道，"他说，强调戈尔巴乔夫最近的日本之行，"那是个失败。两年前他在国内可能还有将北方领土中的两个归还给日本的影响力。现在他成了强硬派的俘虏。他不可能向日本人归还一块石头，更不用说岛屿了。"

我同意他的意见，他又说："雷莎·戈尔巴乔夫从市场买回了一条章鱼成了重要的消息，这可是桩大买卖。42年来尼克松夫人一直都是这样做的！但是最高会谈不会以这件事为主

题的!"

我对他说,他能向布什陈述的最有力的一点是苏联只有在压力之下才能进行改革。

他笑了:"我在备忘录中充分强调了这一点,你等着看吧。"

我飞往华盛顿,将备忘录放在白宫。4月22日,星期一,尼克松同布什在中午时见面。当天晚上的新闻报导指出政府将向共和派寻求更紧密的联系,对戈尔巴乔夫的依赖少些了。

第二天返回来后,前总统的情绪很低落,原因不清楚。他回答问题时态度生硬,吩咐别人做事时声音很大,并且用力摔门。他在11点时怒气冲冲地离开办公室,3点钟返回时,仍然在生气。

他同前国务卿亚力山大·黑格和赛姆斯通话后,叫我进去。我打开他办公室的门,然后轻轻地关上了。在他办公桌的对面,尼克松戴着眼镜正盯着一张报纸。我坐了下来,他看着我。

"我肯定你知道麦戈文的事情,"他说,"那简直是疯了。起飞回来之前,我在机舱里看书,听到有人对杰利·罗莎莉娅说:'我认识那家伙!'原来是乔治·麦戈文。起飞后,我让杰利看看他旁边是否有空座。我们的交谈很愉快。他打算参加1992年的竞选,蠢家伙!但他一直是个不错的家伙。至少他有勇气为他的信仰挺身而出,不像现在这些小丑们。"

他站起来,又面对着我坐下,把腿搁在垫凳上。他重述了在白宫的一些讨论,然后皱着眉说:"他们对苏政策的整个看法是错的,他们不理解改革者的潜力或能力。我试图暗示最高会谈对戈尔巴乔夫不会有帮助。苏联人民为买面包不得不

排两小时的队,他们不会关心戈尔巴乔夫是否在同布什喝伏特加!"

听到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的9个已经同戈尔巴乔夫签署协议,他感到沮丧。他们将苏联变成一个由主权共和国组成的自愿联邦,拥有一个合法选举的政府及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尼克松认为这是一个赢得时间的计谋,使戈尔巴乔夫看上去更倾向于改革。尼克松相信美国政府会天真地以此为根据来制定政策。

他又流露出厌恶的表情:"我的感觉是即使不签署常规协议和美苏削减战略性武器协议,布什也想举行最高会谈。这确实是件令人感到悲哀的事。"

"你不会想听到这件事,"我说,"贝克宣布他明天去莫斯科,是从中东回来的顺访。"

"什么?"他大喊了一声,"啊,那正好表明他是怎样的一个机会主义者!他只是无法忍受我去了那儿并且给布什带回了那样的信息。你知道他要去从中挤出一个最高会谈来!"

为使自己从烦恼中摆脱出来,尼克松决定休一个短假。他于4月25日前往巴哈马,但却从劳德代尔堡机场的候机室给我打来电话,担心最近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的"共同管辖"会排斥叶利钦。

"你怎么看他们之间的这个协议?我希望上帝让叶利钦明白戈尔巴乔夫是在力图收买他。"他说。

我说叶利钦也许会用协议拖延时间,直到他能巩固自己的支持力量。

"你注意到戈尔巴乔夫提出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了吗?我认为双方都在试图重新站住脚,你这么看吗?我的意思是,他

们都同意他们必须停止混乱的局面,但他们的一致意见也就是到此为止。戈尔巴乔夫是否辞去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并不重要,因为共产主义只有8%的赞同率。"

"而且它们无论怎样都不可信了。"我说。

"好了,我该登机了。但我在考虑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出这本《只争朝夕》,因为这个政府心血来潮地制定外交政策。布什亲自涉及其中,而且更愿意妥协,而贝克处理所有的事情都以其自身利益和自以为是为原则。"他停了一下,"我回来后,我们将讨论这本书。我们几天后见。"

尼克松的假期从来都不会持续太长。他对他的继任者们感到恼火,常常远在计划的时间之前就回来工作。在原计划为一周的旅行的第四天,尼克松就回来了。

"到4月底了,"当我把一些以为他会错过的报纸给他时,他说道,"很高兴最后这几天是在外面过的。我的确需要休息一下。现在我们全力以赴写这本书,好吗?"

第二天早晨,我们在他的住处会面。他提出一个熟悉的问题,但并没有等我的回答:"我们这本书的任务是什么?对了,我们在哪儿讨论防御问题?我认为我们该把它放在苏联那一章。应该把它们放在那儿。你知道吗?"他说,"如果我们削减整个军备开支的5%,我们能养活半个世界。"

他停住了:"对于SDI战略防御计划,我们必须有一个可行性计划。一个完全的防护伞是很可笑的,部分打击军事力量的防御还是有可能的,这不全是为了防止苏联的导弹攻击,而是防御地区威胁。"

尼克松起身,走到吧台那儿,倒了两杯矿泉水。他在水里加入两片橙子,然后拿着杯子返回我们的座位。

"为这本书干杯!"他举起杯子说,"今天是 1991 年 4 月 30 号,让我们看看,"他说,盯着天花板,"在 1973 年的今天,我不得不让竞选班子的领导人霍尔德曼和约翰·埃尔利希曼离开。"

他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转换了话题:"好了,莫尼卡,我想让你在太平洋那一章发表一些你自己的看法。苏联的背景部分都是你写的,"他说,"苏联有 11 个时区,你能写好那一部分,我想你就能应付亚洲的问题,它才有 5 个时区。"

他微笑着说:"等我们涉及到日本时,我想加进一段有关他们的妇女如何是重要的资源以及他们应该摆脱沙文主义等。我们能找到一种外交辞令来表述的。"他皱着眉说,"尽管我认为妇女的位置是在家里,不要有任何成就之类的。你对此怎么看?"

"你知道我是怎么看的。"

尼克松大笑,然后又变得严肃起来:"如果我们转向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美国的领导作用是必不可缺的。那就是说,我们必须有效、积极、有创建地利用那种作用。我们在中东的第一次考验是一团糟,因为无论有没有新情况我们都没能有计划地加入进去。

"但我们确实必须注意苏联。那里真正的改革派是令人钦佩的,他们有热情、有智慧。我们的国会和政府中没人能同这些人媲美。他们中的一人对我说,'我一直在读《联邦主义文集》,我们不想要杰斐逊模式;我们要汉密尔顿模式。'见鬼,大部分美国人都不知道他们的区别!他们所知道的只是汉密尔顿在决斗中被杀了!"

两天后,他将注意力转向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戈尔巴

乔夫和叶利钦已达成协议,要共同把改革进行下去。“我希望叶利钦在试图稳定局势时不会做对自己有害的事。他不该试图缓解已带着他们走出了这么远的危机。苏联的共产主义者纯粹是在撒谎。

“但是我们的政府必须意识到苏联改革的惟一出路就是要解散苏联。布什和贝克个人陷得太深了。他们不想承认他们支持戈尔巴乔夫是错误的。唉,有时一个总统不得不被迫承认错误。我就这么做过。

“美国早在 1990 年 9 月份就该支持那些加盟共和国,那时戈尔巴乔夫拒绝了‘五百天计划’(一个加快经济改革包括私有化的计划),当然 1 月 13 日立陶宛事件后更该这样。他们现在出于必需,一定会这样做的。

“但看看谢瓦尔德纳泽。在他自己的共和国格鲁吉亚独立的问题上,你认为他站在什么立场上?”

“分裂。”我说。

“他在竭尽全力这么做。”他补充说,“但他是外交整体的一部分,布什和贝克更倾向于听他关于帮助戈尔巴乔夫的观点,而不愿听那些波罗的海地区的领导者们所说的‘别帮戈尔巴乔夫’。我听说杰克·马特洛克(美国驻苏大使)要退休了。我希望取代他的人不是一个外交傻瓜。我们不需要一个仆从在那儿。”

最终罗伯特·斯特劳斯取代了马特洛克,他是个民主党人,还是个有实力的谈判家。尼克松喜欢他,认为从政治上来说选择他是明智的。“这样做为布什赢得了在他右翼的民主党。”选择斯特劳斯是一个信号,它表明布什在对苏政策上并不受党派的影响,尼克松认为这个策略还不错,尽管不是特别

有效。

与此同时，布什并没有采纳尼克松将叶利钦作为改革的最佳希望的建议。总统在5月8日发表声明坚决支持戈尔巴乔夫，指出美国会继续为他的历史功绩而奖励他。尼克松对此很气愤。

“他一句也不听我的。”他恼怒地说，“听着。我知道他们不愿意表现出听我的指示的样子，但现在我要同他们一刀两断。

“波罗的海地区的领导人看上去有点可怜。我憎恨自己同一个不为他们做任何事情——不做任何事情——的政府连在一起。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我已为这些人做得太多了，但我不会因为布什抛弃他们而置他们于不顾的。

“我知道布什那么称赞戈尔巴乔夫的原因。他想将注意力从中东的恶化局势中重新转到苏联问题上来。政治会抬起它那丑陋的头来。我要同基辛格交谈并通过他传递我的看法。”他的脸沉了下来，以一种失望的语气说，“我想布什甚至根本没有看我的备忘录。在这点上他不听我的。

“我们已经看过了，但是布什——算了，谁知道呢。我知道那不是他所愿意听的，但，得了吧。”

尼克松的气愤最终被更客观的分析取代了。5月13日，他从《华尔街月刊》撕下乔治·梅洛恩的文章留在我的桌上，他在下面重重地划了横线。文章的标题是：“戈尔巴乔夫出兵，我们休息。”文中指出苏联依然是一个军事国家，用武力镇压和恫吓国内的反共产主义组织。西方国家若忽视这一点，就是与它的不道德为伍。尼克松在文章的顶部写了我的名字，还写着：“完全正确！”

"很少有人在这点上看得清楚,"当我把文章拿到他的办公室时他说,"他看得很清楚。但好像没有人听。强硬派不会只交出权利,但过渡没有和平的保障。我们会遇到一种局面,那就是共和派让改革派处理国内政策,让中央来处理对外政策。"

"但是双方无法像那样生存。"我说。

"中央也无法支撑。"他回答道。

尼克松一直准备揭露美国海外行动的政治动机,他觉得布什应该在国际事务中表现得更强硬些,因为国内经济相对的薄弱使他容易遭到来自民主党候选人比尔·克林顿的攻击。

"他已经让苏努努飞机事件发生了。"他指的是竞选班子领导人在政府飞机上过度热情的事情,"当然一直以来有关于副总统丹·奎尔的人选是否恰当的问题,以及尽管在战争时期但萨达姆·侯赛因仍然大权在握的事实,这些都引起了人们对政府的消极态度。我们知道戈尔巴乔夫有他的问题。他们两个都想要一种受到新闻界肯定的局势,那就是,"他一边挥动着手一边说,"一次最高级会谈。"

"现在布什已经放弃了军备控制作为最高会谈的前提条件。"我说,"他们可能为举行最高会谈而举行最高会谈。"

尼克松指着我说:"你明白了? 看,只有当你能得到回报时才能付出。另外,"他又附带着说,"我原以为你喜欢看到这一切呢。"

他递给我《新闻副刊》上的一则故事,其中摘录了戈尔巴乔夫指责尼克松和基辛格破坏美苏关系的话。我抬头看他,他笑了:"哈,我们在起作用!"他说,面朝我身体前倾着,"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吗? 我想是讨论另一本书的时候了。"

5月16日尼克松飞往华盛顿去见赛姆斯。我几小时后也去了首都,同前总统单独见面。他立即开始谈书的中心内容,以及如何论述国内政策,使其达到能影响我们向世界各国提供例证的程度。

"我认为要传达我们的观点需要大量的理想主义。还记得我最后一次见毛泽东时他说的话吗?他说:'和平是你的惟一目标吗?'我回答说:'带正义的和平。'——而现在,当然还有自由。物质主义是一个好目标,但是它不应该是惟一的目标。"

我说他应该采用现实主义目标,把它放在理想主义中。他回答道:"除非人们相信,否则你不可能让他们做任何事情。那是领导权的一个根本核心。"他停了一下,"我确实在军备控制上压了赌注。我知道我们过去是军备控制者,但看上去这么没有用。我不能肯定我们甚至会不会以一种严肃的态度来讨论它。"他又纠正自己道,"我想我们必须做。"

在飞回新泽西的途中,尼克松坐在窗前,罗莎莉娅坐在走廊里,我坐在他们的中间。尼克松打开公文箱把一些报纸胡乱地放进去。"议员约翰·西摩来套间时,你见到他了吗?要知道,他是个很好的人,但是他没有……"他把公文箱"砰"的一声关上了,握紧拳头说,"你明白我的意思。"

"也许是因为他还没有面对全国性的选举。"我说。

"也许是,"尼克松回答说,"但我不能肯定他在电视上给人们的印象怎样。在加利福尼亚,这是惟一能取胜的办法。民主党会提名戴安娜·范斯坦,她在电视上的表现很出色。我担心这对西摩可不太好。太糟了,因为他相信右派观点。看看布鲁斯·赫欣索恩,在电视上很迷人,但他的观点有点太极

端了。他想让联合国离开美国。他是对的,但那是60年代的一个话题。国会议员威廉·丹内迈耶也是一样。他的大论题是爱滋病——对爱滋病病人隔离检查。我的上帝!"他叫道,眼睛骨碌碌地转,"观点极端!不实际,不道德!"

没有冷战好发动,共和党开始为极端化和有分歧的问题而不惜牺牲稳定。外面没有敌人,共和党就在内部找一个。但是,他们一心扑在内部斗争中,所以他们失去了尼克松所说的"更大的局面"——苏联的进展。

"像西摩那样的人没法理解在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所发生的一切的重要性。议员菲尔·格拉姆倒是理解,但他没有谈到这一点。他太关心竞选总统了。"

他转向窗户时,我问他是否喜欢坐飞机。

他转向我做了个鬼脸:"我已经坐得太多了,不是这儿就是那儿。现在飞机就是大公共汽车。坐火车很舒服。现在人们留恋旅行之美——总是匆匆忙忙地在赶路。"他说,在他的座位上做出晃动的样子。

我提醒他,他过去习惯于在火车上进行竞选活动。他的脸上掠过一丝微笑:"鸣笛停站,一天12次。那时候和现在不同,非常不同。"在这之后,我们都没有再说话。

在纽瓦克着陆后,我们乘上了等在停机坪的大型豪华轿车。在去办公室的路上,尼克松再次打开了公文箱,递给我一些来自外交关系顾问委员会的文章。

"他们发表了一些好东西,但你知道他们怎么接电话的吗?他们说:'顾问委员会,什么顾问委员会?下次你打电话时告诉他们你不认为你是在给律师打电话!'"他大笑了起来,"知道吗,我最近读了一篇美国前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

特里克的文章,她提出一种新孤立主义。"他握紧拳头,"她究竟是怎么了?她说除了军事威胁外,我们对苏联没兴趣。这是一个巨大的不定因素!3万枚核武器是个不小的不定因素。那么,民主改革派呢?他们是我们的利益所在,或者他们的成功是我们的利益所在。所以正如你所看到的,写这本书,我们要打一场困难战。"

当然,尼克松喜欢挑战。他的满足一部分在于他知道他是对的,另一部分在于他知道他的不同意见会引起关注。他渴望有否定传统的机会并在此过程中进行他自己的事业。

5月底,苏联前外长谢瓦尔德纳泽要求在纽约同尼克松会面。会面安排在5月24日,尼克松邀请我参加。我到达谢瓦尔德纳泽下榻的宾馆时,他们已经开始交谈。我站在套房门口等着被通报。这时尼克松看见了我,他招手让我进去。他们两个都站了起来,让我坐在翻译旁边。紧接着,一些事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首先,尼克松用简单句说话、不时地停下来以便于翻译。在指称谢瓦尔德纳泽时他几乎都是用第三人称:"我想就改革说一些,外长也许不喜欢听,但这些是外长有必要听的一些事情。"

其次,尼克松用了大量的恭维的辞令。他说:"外长的卓越领导才能将东欧引向了和平。"谢瓦尔德纳泽对此答道:"我始终认为你是最杰出的政治家。"

另外,尼克松直接对谢瓦尔德纳泽说话,而译员作翻译时他又看着译员。尼克松用俄语说话时,我研究着谢瓦尔德纳泽的表情。他的表情发人深省。例如,当尼克松建议戈尔巴乔夫应该重新把谢瓦尔德纳泽招回到外交部,以此证明他在

继续进行改革时，谢瓦尔德纳泽盯着地板，没有表明有这种可能性。

尼克松随即向谢瓦尔德纳泽询问戈尔巴乔夫向西方呼吁100亿美元援助的事情。他摇了摇头回答说他不知道戈尔巴乔夫从哪儿得到的那个数字，他已经问过戈尔巴乔夫西方国家到哪儿去给他弄那么一大笔钱。他说戈尔巴乔夫没有回答。尼克松猜测出这个请求事实上削弱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者的身份，因为很明显他没有思考过整个改革进程。

关于古巴，尼克松说："古巴对大部分美国人来说是个敏感的问题。你们如果削减对古巴的财政援助，就可以从我们这儿得到更多的帮助。"

谢瓦尔德纳泽回答道："我们同古巴有协议，也有义务，我们不能在一夜之间就中止掉。"正是这种标准的外交辞令结束了这一谈话主题。

关于军备控制，谢瓦尔德纳泽指出，苏联人民意识到他们的国家不能作为一个军事化国家生存下去。他承认美国在80年代的军备的增强使他们被迫参与竞争，从而导致经济衰竭。"但是美国，"他说，"这儿，你们的经济也因为防御而衰竭。我知道你们的赤字很大。"

对这个外交转向，尼克松笑了，没继续说什么。

关于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运动，尼克松首先指出波罗的海人民的呼声，谢瓦尔德纳泽又补充了他的家乡格鲁吉亚的情况。这位苏联前外长说戈尔巴乔夫命令让坦克去镇压反叛的共和国，这不仅仅"不人道"，而且"在政治上是不现实的"。坦克开进立陶宛激起了其他的共和国为他们的事业而战斗的决心。

会谈又迅速转向民主改革的可能性。谢瓦尔德纳泽指出苏联的民主人士并不像反动势力那样统一和一致。如果要取得成功，他们需要做大量的组织工作。尼克松点头表示赞同。

“我们必须使苏联能吸引西方的投资，”苏联前外长说，“在我来这儿期间，已经遇到了许多对投资感兴趣的商人。”

鉴于苏联经济的恶劣状况，尼克松意识到这是在夸张，但他还是把话题继续下去。他说：“如果苏联全面实行市场经济，美国投资商们将会看到一个巨大的未被开发的市场，并且会前来投资的。”

谢瓦尔德纳泽点点头，之后又批评起戈尔巴乔夫攻击尼克松和基辛格：“戈尔巴乔夫企图找替罪羊是不对的。”他说，尤其是像尼克松和基辛格那样长期以来一直对美苏关系有积极帮助的人。

会谈结束后我准备叫出租车，尼克松说：“我想让你搭乘我的车，因为我想知道你的直接印象。”

在回新泽西的路上，他说：“你觉得怎么样？你是第一次同一个忠于上帝的共产主义者见面吧！共产主义者一般来说都是冷冰冰的，像戈尔巴乔夫那样。但是谢瓦尔德纳泽是格鲁吉亚人，跟斯大林一样，更加情绪化。他说话时你能看到这一点。”

我告诉尼克松他最有力的观点是在会谈结束时说的，当时他说谢瓦尔德纳泽将成为苏联新选举出的政府中的一个杰出的领导人。尼克松说他“有勇气、智慧过人，意志坚强，在电视上极具感染力。我不是煽动外长的虚荣心，”他对谢瓦尔德纳泽说，“我认为你将成为一个出色的领导人。”

我还告诉尼克松他强调苏联吸引西方投资是一个关键

点，谢瓦尔德纳泽明白，徘徊不前的部分市场经济改革是不够的。

“你看，”尼克松说，“谢瓦尔德纳泽在每个问题上都有分歧，尤其是格鲁吉亚的独立问题。他是一个改革者，但也是共产主义者。保持这两种身份反而更难。”

莫斯科的中央政府和大部分加盟共和国的官员同意各共和国间经济权力的划分和政治权力的转移。这是一个喜人的迹象，它表明新的合作开始了，但来自强硬派的压力仍然存在，强硬派曾使戈尔巴乔夫在早期放弃了解散中央集权的企图。在国内冲突的威胁下，重建高度复杂的集权结构会更困难。但是各方都意识到，冲突所带来的只有骚乱和流血，使莫斯科和各个共和国都陷入的僵局会加快灾难性的经济崩溃，这一切促使了他们表面上的妥协。

尼克松看到的妥协的举动有可能使苏联变成一个更民主的国家，但是现在需要选举和一个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计划。为了防止完全崩溃，相互竞争的政治派别别无选择只能合作。

尼克松同谢瓦尔德纳泽见面后给了我一份备忘录。其中，他描述了这种情况，并补充道，戈尔巴乔夫在表面上重新返回改革同他几个月以前倒向反动势力是同样高明的。不管怎样，这个结果会对欧洲共同体产生重要影响。

他最后说，戈尔巴乔夫和改革派最近的协议也许能减缓形势的急剧恶化，但是却不能阻止它。尽管人们嘲笑改革派在治理国家上力量太薄弱，尼克松知道他们会很快控制局面的。他们已开始从衰弱、无组织和压抑中恢复过来，开始重新争取合法的权利。这是一场处境不利的战斗，它赢得了尼克松的尊重和支持，也促使了他同政府公开决裂。

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他决定为《华盛顿邮报》的“观点”版块写一篇文章。他为此花了两天时间，让我同《华盛顿邮报》“观点”的副主编杰夫力·福兰克一起整理这篇文章。尼克松选择放在《华盛顿邮报》的专栏版，因为他知道这样能吸引注意力。而正是他现在为之写文章的这家报纸曾不知疲倦地追究“水门丑闻”。

文章于6月2日(星期天)登了出来。标题是：“戈尔巴乔夫的危机——美国的机遇”。文中提出苏联必须对是否朝着民主的和自由市场的体制转向作出抉择。美国不应该还只一心关注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和反动之间的摇摆，必须将其战略兴趣放在解散共产主义苏联的体制上。他写道，美国的政策应该集中在为苏联的15个共和国的民主政府、自由市场经济和独立自主创造一个最佳机会。

他粉碎了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暗中的民主人士的神话，指出美国在考虑对苏联援助时应考虑三个前提条件：地理政治调和，中止对古巴的援助，实行不可逆转的市场和民主改革；而不是幼稚地帮助共产主义者，那会拖延改革的进程。

尼克松对所谓高级会谈“纯粹是在政治上支持(戈尔巴乔夫)”的观点表示怀疑，他指出戈尔巴乔夫的惟一长期希望是把苏联历史的“意识形态包袱置于一边”并“领导这一新的革命”。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自由选举。如果他不这么做，他就会被他希望解散的势力所代替。

第二天，斯考克罗夫特向他打来电话赞扬这篇文章，这使尼克松怀疑“布什也读了这篇文章”。不管怎样，它所产生的影响还有待发现。

“政府中像斯考克罗夫特那样有责任感的顾问与贝克之

间的分歧是很深的，贝克根本什么都不懂。大家都害怕同布什较量。我是惟一这么做的人。甚至传统的保守派也被卷入到哈佛的影响和所谓的'宏伟的交易'之中。"他指的是由格雷厄姆·阿利森和杰弗里·萨克斯等教授设计的援助计划。

"我们称它为'宏伟的骗局工作'，因为事实如此。"他接着说，"它只能支持中央。如果是对苏联的真正民主派的援助——啊，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除非援助明确是给这些力量而且只给这些力量，否则就不能把援助交给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同党。"

当我提到布什是同情戈尔巴乔夫时，尼克松露出不愉之色："一个人不能凭感情来处理外交政策。现在我对他们已没有什么信心了。看看，除了斯考克罗夫特之外他们都对戈尔巴乔夫很和蔼。一个鹰派分子？这可不好。

"我希望斯考克罗夫特能继续保持强硬。我知道布什想让这成为他自己的政策而不是尼克松总统的。可以理解。但是，莫尼卡，他们错了，以至于变得危险了。"

与此同时，苏联人于6月12日进行了普选，选举叶利钦为他们的总统，这是苏联历史上的第一次自由选举。尼克松第二天看到全部结果后打电话让我去他的办公室讨论这事。很明显他非常激动。

"叶利钦以60%的多数赢了！"他一边拍着手一边说，"但你注意到新闻界是怎样降低他的选票及阻止他参加决胜选举的吗？你看，这使我想起尼加拉瓜的奥尔特加和钱莫罗竞选。"他指的是1990年在共产主义者丹尼尔·奥尔特加·萨威德拉和民主分子瓦奥莱塔·巴里奥斯·德·钱莫罗之间的竞选。"每个人都等着奥尔特加赢。吉米·卡特已准备要拥抱那个恶

棍了。但钱莫罗赢了,所有的人都感到惊讶。

“你知道,这个选举以及投票将列宁格勒的名字改回圣彼得堡是对共产主义的否定。

“有时,你只能承认你的赌注下错了。我想在我同布什会面时,我推崇叶利钦是个冒险家,但事实证明我是对的。如果叶利钦来纽约,我要拜访他。给。”说着,他递给我一份通过西南联合电讯公司发给叶利钦的电报草稿,这是一份简短的祝贺,“如果他知道这儿有人支持他,我想他会很高兴的。

“我担心戈尔巴乔夫会拉拢叶利钦并对他说应该号召帮助中央政府。他们一直在说钱将来自于国际社会。胡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分之一的基金是由美国提供的。”

我告诉他苏奴奴称赞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的协议,称它是“一加一等于三”。尼克松怀疑地说:“苏奴奴?天哪!他究竟是谁?他能干,但一个竞选班子的领导人不应该空谈外交政策。那里惟一负责任的是斯考克罗夫特,而他不喜欢叶利钦,因为他上次来这儿时出尽了洋相。”他指的是叶里钦1990年访问华盛顿时由于酒精的作用而举止粗鲁,“但我们必须理解他是我们对苏联改革所能寄予的最好希望。”

与此同时,尼克松继续进行著书工作,主要强调苏联的进展情况。他密切注视叶利钦于6月20日来华盛顿的访问,注意到布什接见叶利钦的“痛苦表情”,即使是当叶利钦支持美国冷战长期以来的一些政策和观点,诸如共产主义的终结、民主和自由市场的改革、波罗的海国家的独立,以及苏联对阿富汗和古巴援助的终止等。对于布什对叶利钦的反应,尼克松尽管并不感到奇怪,但感到很失望。他对俄罗斯总统的行为

和议事日程印象颇深。

6月21日我们在他的办公室时，他说："我要将叶利钦作为一个主要部分写进书中，因为我们政府对待他以及他所代表的力量的方式是可耻的。"

"叶利钦精力充沛，充满活力，没有政治上的闲聊，与人民建立了真正的联系。我认为他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印象。我不能理解布什。"他带着一种失望的神情说，"但他们谈论独立运动时，布什说那是中央政府的决定。他本应该这样说，'好吧，我们现在接受你的看法，但我们希望中央政府会给予关注并取得进展。'

"同外交政策比，他们在国内的所作所为是第二位的，但确实很重要。叶利钦认为他们必须照料他们的内部事务；戈尔巴乔夫仍然相信他们是一个国际大国。他们的确是，但只是在拥有核武器方面。我要把这些都写进那一章里。它会令许多人皱眉头，但这有什么关系：这是正确的！"

6月26日，尼克松碰巧看到一篇十页的文章和布什在《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中的访谈录，其中布什再次肯定了他对戈尔巴乔夫的信任。尼克松不知所措地走进我的办公室，把杂志摔在我的桌上。

"你读读这个。你不会相信你的眼睛。我知道我们过去一向认为那都是贝克的影响，但现在我知道是布什的影响。我太失望了。他要证明在帮助戈尔巴乔夫上他是对的，即使是所有的迹象都正好相反。"

我问他是否考虑给布什写封信，私下表达他对政策的不满，他皱了皱眉："不，我不想直接跑过去告诉他他错了。他知道我的观点。"尼克松决定无论他有多少政治资本，他都要在

合适的时候用来反击布什。

与此同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南斯拉夫的失败引起了国家的分裂，而它自1945年以来一直据统治地位。随着统一的意识形态的瓦解，南斯拉夫成员共和国脱离了中央控制，彼此之间开始面临着历史、宗教和种族的有敌意的冲突。这场危机不是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之间的内战；这是一场曾被共产主义者人为地以武力强迫连在一起的两个民族之间的国际性战争。尼克松害怕南斯拉夫的解体会为苏联开一个危险的先例。与南斯拉夫不一样，苏联是个核武器大国。

政府对共产主义的垮台所采取的"不惜任何代价保持稳定"的办法是在试图阻止同民主和自由市场改革的需求相关联的混乱，从而维持旧秩序的稳定。这是一个孤注一掷的完全行不通的平衡交易。稳定是一个令人羡慕的目标，但当另一个选择能产生一个更民主的秩序时，它就不令人羡慕了。然而南斯拉夫的混乱代表着最糟的一面：动荡不安和不民主的反应。如果苏联再发生类似的情况，世界就承受不起了。

美国设计的"盛大的交易"对西方保持共产主义在苏联的稳定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根据尼克松的观点，西方全力以赴予以援助比预期的晚了三年。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似乎充满了希望，他那时是民主改革的最好希望，在那时援助他应该是合理的。但一旦戈尔巴乔夫被更民主的力量所取代，我们再去援助中央政府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7月11日，尼克松同"盛大交易"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哈佛大学的教授格拉姆·阿利森见了面。会见后，尼克松邀请我去见阿利森。阿利森为他的建议辩护，但认为只要中央政府不代表改革的最好选择，就不能给予援助。

阿利森离开后，尼克松点头示意让我去他的办公室："我认为他是想在推行那个计划时采访到所有的大人物才来这儿的。那个计划的问题是，军事工业综合体是苏联惟一在起作用的部分，它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进行经济改革？非军事化不可能不引起重大的麻烦。我们的钱将会流入污水沟中。

"听了我的意见后，他说他不是在为不惜任何代价保持稳定辩护。我想你会觉得有趣，他确实说我们登在《华盛顿邮报》的那篇文章对他们最终的这个计划有很大的影响。但问题在于这是一个错误时间内制定的错误计划。"

也许阿利森只是想采访所有的大人物，但尼克松仍然对他的来访感到高兴。这个"盛大交易"作为重要新闻见报，引起了就如何保持和加速改革的成果的争论。尽管尼克松不同意计划的前提，但他确信他同阿利森的见面会对学术界如何看待苏联的转向问题产生影响。

赛姆斯在7月14号打来了电话，告诉他一些小道消息。他告诉尼克松贝克在苏联时曾试图阻止尼克松同戈尔巴乔夫的会面，他还下指示给大使馆不要派人护送尼克松去机场。尼克松称这种行为是"该遭受指责的"、"心胸狭窄的"。但弄明白贝克将他看作是他在处理国家外交政策方面的一个威胁，这一点倒也令他感到满足。

与此同时，"七个工业国家集团"的年会即将在伦敦召开。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加拿大和意大利的国家首脑参加了会议，这是个典型的提供照相机会的会议，而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但这一年的会议却邀请了戈尔巴乔夫代表苏联作为一个观察员。这使他有机会说服其他到会者帮助他挽救他那垂死的国家体制。

他的努力白做了,其他国家没有宣布为苏联提供援助的一揽子计划。尽管和美国在美苏削减战略武器会谈上达成过协议,7月14日这个星期结束时,苏联的收获和会议开始时一模一样:没能在国际上得到任何经济援助。

戈尔巴乔夫两手空空地回去后,又开始了一系列孤注一掷的措施,向西方国家证明他仍在继续改革。7月末,他建议将作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基础的列宁主义从苏联共产党纲领中取消。他发明了一个新的"独联体计划",意在以表面的独立自主和改革为基础,在中央和共和国之间创立一种自愿的联系。这又是戈尔巴乔夫所提出的一长串反常建议中的一个。

1986年,他提出一个总的改革计划,开始提高经济效率并进一步强调经济中的社会优先权。当时的口号是"加快步伐"。

1987年他提出一个更广泛的计划,鼓励竞争和独创精神,他说:"只有当一个人有主人翁感时,他才会把房子整理得井井有条。"并开始介绍了"民主化"。

1989年10月,他提出恢复经济金融稳固计划,建立消费市场,调节人民对货币的需求,并强调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1989年11月,他提出国有财产私有化的计划,创立股票交易市场,为比例失调提供社会保险,建立不信任法案和竞争工资。

1989年12月,他又提出继续实行多种经济成份的中央计划经济,减少预算赤字,放开一些价格。

1990年9月,戈尔巴乔夫认可了"五百天计划",容许共

和国迈出私有化的步伐,银行权利下放,保护资产权利和金融市场,并提供社会安全网等。他在那个月很快又否决了这个计划。

1990年10月,他提出逐渐出售国有财产,中央仍然保持对货币政策、防御、能源和国家资源的控制。

1991年4月,他提出"反危机"计划,实行部分企业私有化、食品分配的紧急措施,以及向没有对中央尽责的共和国实行经济制裁。

1991年7月,在"七个工业国家集团"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提出卢布兑换计划,通过西方国家大量援助的承诺,使"几乎80%的零售市场、公共企业和服务性企业,以及其他部门的大量企业"私有化。在一年之内,为改变农业生产方式的"土地改革"和军工转民都开始进行。

由这些相互矛盾的建议引起的困惑导致了混乱和不满的不断加深。戈尔巴乔夫没有意识到的是,苏联所发生的事情远远胜过他的建议。联盟已经瓦解。为了跟上他所不能控制的局势,戈尔巴乔夫在言辞上夸张,并试图像他几年前那样看上去有独创性和开拓性。

与此同时,布什在8月初去了苏联,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会面后飞往乌克兰的基辅。在那儿他提醒乌克兰人防止"自杀的民主主义"及从苏联脱离。他暗指如果他们从苏联脱离出去,他们将不会从美国那儿得到政治上、经济上和道义上的支持。

他在基辅的讲话表明美国政府在对苏联的发展进程上的政策是多么荒谬。使共和国从中央脱离的这一离心力量之源是令人恐怖的意识形态的瓦解,而它过去却把他们联系在一

起。改革进程是不可逆转的，而政府却坚持那些支撑苏联的过时的观点。布什无视大多数乌克兰人独立的愿望而继续维持现状的决定竟然不顾一直以来渗透在美国政策之中的原则。

政府认为如果戈尔巴乔夫下台，混乱会持续下去，这种看法站不住脚。当面临不断增加的困难时，苏联人民没有歇斯底里地、粗暴地冲上街头。相反，他们平静地进行示威游行，要求改革，然后选举出答应带领他们有条不紊地进行改革的领导人。事实上，到8月中旬之前，苏联的转变比东欧任何国家的革命都更有条理，尽管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有摇摆。

突然间，那种局势变了。8月19日凌晨，克格勃的强硬派小分队、军队和内务部人员推翻了戈尔巴乔夫，将他软禁，夺取了政权，并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尼克松7点时给我打电话，担心他书中关于苏联的很大一部分会用不上了。

那天早晨我到办公室时，他已把注意力转到莫斯科的最新政治形势上来。他同基辛格、黑格、赛姆斯和罗伯特·艾尔斯华兹大使进行了交谈，听取他们的分析，提出他自己的看法。会谈后他挥手示意让我进去。

"哈，亨利承认他过去是对的！"他大笑道，"但你知道，他是对的，坦白地说我也是对的。戈尔巴乔夫被软禁在他的别墅，但是不会有大的游行示威表示支持他，因为他太不受欢迎了。"

"这也许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没有逮捕叶利钦。"我说。

"我知道。戈尔巴乔夫能再回来吗？不大可能。"尼克松继续道，"如果再来一次反革命运动，他们也不会再要戈尔巴乔夫，而是需要进一步改革的人。"尼克松在他的手指间转着

铅笔,"你注意到布什看上去是多么愚蠢吗——他一直是错误的。"

政变开始了。强硬派推翻了他们软弱而且已经没有实际意义的总统,企图恢复某种意义的独裁统治。士兵们冲进了莫斯科的街道,坦克包围了重要的政府大楼,共产主义者承诺要返回暴虐统治的黑暗中。在这种新的局势中,旧策略是毫无意义的。

第二天,尼克松对我抱怨说,布什太愿意和新闻界接触了。"有时候,最有力的武器就是保持沉默,要等到一定的时候再走出沉默,拿出自己的见解。"他说。听到布什要派罗伯特·斯特劳斯到莫斯科去完成"调研使命"时,尼克松叫了起来:"那到底是怎么了?我们现在还需要知道什么?我告诉你另一件事:我听说布什讲'我已经再三讲过,美国是支持叶利钦的。'他说过一遍吗!"

他摇摇头:"我看不出戈尔巴乔夫会回来,我也看不出有什么大规模的暴力。如果强硬派能坚持两个月——我觉得这不可能——可能会有暴力事件发生的。"

第二天,8月21日,出乎尼克松的意料政变流产了。"我没有想到它会这么快就结束了,但它表明中央政府已经支撑不住了。他们已经丧失了权利——再也不会有什么恐惧了。戈尔巴乔夫现在只能同意进行选举了,而他不可能赢。他完了。"

政变使戈尔巴乔夫垮台了,却使叶利钦站了出来。在政变的高潮期,结果还不明了的时候,叶利钦爬上包围俄国议会所在地的一个坦克顶部,极具挑战性地申明强硬派将失败,而民主派将取得成功。他在面对反革命时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在

政治上帮助了他：政变后他成了一个受人尊敬和欢迎的领导人，一个新俄罗斯积极变革的象征。

尼克松很感动："叶利钦是那个糟糕的地方的最大希望，现在没人能否认这一点。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无论他们有怎样的形式以及以怎样的形式结束——在经受考验。如果这些都行不通，将会引起极度的失望和反革命事件。没有哪个行不通的革命会坚持长久的。但是胜利之后的治理工作是艰难的：那是对叶利钦的挑战。那家伙有勇气，但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政变之后的四天，戈尔巴乔夫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但浪费掉了一次重新使他恢复声望的机会。他不但不欢迎这场不可逆转的变革，反而引用列宁的话反复重申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很明显，戈尔巴乔夫现在是一个最后的共产主义者，而不是第一个民主主义者。

但他的确决定同叶利钦建立一个联合政府，政变开始五天后，他辞去了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

人们涌向大街，砸毁了列宁和马克思的塑像，将共产主义的祷文"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改成了"全世界无产者，原谅我"。有七个加盟共和国立即宣布从莫斯科独立出来，其他共和国也很快宣布独立，被剥夺了权利的戈尔巴乔夫成了一个傀儡。除了美国之外的许多西方国家都承认了波罗的海国家的独立。最引人注目的是，共产党在俄罗斯被宣布为非法。

那个星期的骚乱事件促使尼克松连忙重写书中苏联的那一章。那一章的整个前提为当共产主义者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时，美国应该支持逐渐转向民主和自由市场的改革。令历史有幸但令尼克松的书不幸的是，苏联人民出乎预料地以更快、

更和平、更有效的方式自行解决了他们的问题。尼克松不得不改写他的观点，把美国应怎样对付苏联改写成怎样对付正在消失的中央政府的15个新共和国。

戈尔巴乔夫在过去声称西方国家应该支持他，因为他是改革和稳定的惟一保证人，也是防止强硬派重新掌权的惟一保护人。事实证明他所说的并不对。推翻了戈尔巴乔夫并篡权的强硬派只保持了60个小时的权利。在老的反革命势力和年轻的民主力量之间的战斗中，坦克与信念相斗，坦克从来没有获胜的机会。

戈尔巴乔夫的软禁被解除了，他还坚信：共产党——也就是他从中招募的一个由反革命背叛者组成的顾问团——仍然会成为改革的工具。"我会为了党的复兴战斗到底！"戈尔巴乔夫在政变后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

支撑着一个迅速衰败的中央政府的戈尔巴乔夫缺乏选民的支持，共产党曾是戈尔巴乔夫惟一的选民，而现在这个党也背叛了他。现在这个党正在消失——由激进的改革者挡住了它的去路——戈尔巴乔夫剩下了一个选民：他自己。

他是一个典型的过渡性人物，他同过去的暴政和现在的动乱联系得太紧了，因此缺乏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改革者的可信度。他走了关键的第一步，但剩下的路必须由其他人来完成。

过去西方国家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必不可少的人物，这也就是说他的替代者会更糟。而事实上，他的替代者比他更好：叶利钦在政变中站到了坦克上，他挫败了独裁。

弗兰茨·卡夫卡曾发现："每一个革命的消失都会留下官僚主义的污垢。"真正的改革意味着旧制度的解体以及这种体

系的连根铲除。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相对应,俄罗斯的革命者试图将革命进行到他们公开宣称的结局——自由,而且阻止动乱局势的进一步恶化,或者他们会创立一种真空,由那些要求共产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变体的人来填补。

"《纽约时报》连续八天用八版头条刊登有关这场政变的消息。"尼克松在8月27日说,"自'水门事件'以来这还是第一次。"

他坐在寓所书房的桌子上,盯着一堆用来重写那一章的材料:"看看所有这些,"他拍着材料的顶部说,"我拿到了这些剪报、杂志和书——你随便把它们叫做什么都可以。但我想现在重写总比书就要出版时重写要强!"

他站起来离开桌子,在他最喜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请坐。噢,你看上去像是听到什么坏消息了。什么坏消息?"

我解释说我为布什继续帮助戈尔巴乔夫及美国没有在外交上认可波罗的海国家的独立而气愤。

尼克松笑了:"我明白。甚至芬兰在这方面都比我们先行动了。"

我直视着他问道:"你过去想到过能看到冷战的结束吗?"

他看着我,过了很久才说:"没有,从来没有。当赫鲁晓夫说'你们的后代将生活在共产主义之下'时,我说'你们的后代将生活在自由之中'。我那时就知道他错了,但我不能肯定我是对的。现在事实证明我是对的。"

那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在他执政和在野期间,尼克松目睹了冷战的开始,领导美国经历了冷战,现在又活着看到了它的结束。这对他来说是个很了不起的经历。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以坚定不移地阻止和最终打败苏联共产主义为基础,

事实证明是对的。目睹冷战的成功结束给他带来了纯粹的满足。

与此同时，支持苏联总统的势力强迫戈尔巴乔夫在8月底提交威胁性辞呈，但是因为国家本身正在瓦解，所以这个威胁没有什么作用。尼克松在8月29日作出反应，话中带有尖刻的讽刺，"威胁要辞职，啊?"他询问戈尔巴乔夫公开宣称的意图，"哼！基辛格曾威胁了四五次。霍尔德曼几乎每天如此，直到我告诉他要小心，因为我可能会说'行。'"

"只有处于优势的时候，威胁还有点用。"我说，"戈尔巴乔夫没有任何优势，此外他的国家也会阻止他。"

尼克松勉强地笑了，也许是联想到他自己的处境："我知道。另外，我不能相信《纽约时报》竟会怀疑叶利钦的民主理想。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民主也许不同于我们所说的民主，但在改革方面他比戈尔巴乔夫要好得多！"

他在椅子里挪动了一下身子，然后转换了话题："人们攻击国际关系的缓和，尽管它有缺点，但它——像我们对中国所采取的主动做法——却为苏联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并且可能会加快改革的进程。

"另外，"他继续道："我希望布什不要像那样讨论严肃的问题。他们在他从高尔夫球场出来时拦住他，没系领带，戴着棒球帽。我的上帝！他应系上领带！当讨论这样的重要问题时，他应该穿得正规些。我总是穿西装，也许穿得太多了。我知道那一点，但穿着西装令我感到舒服，并且也很得体。"

他又再次转变了话题，他驳斥了现在是帮助苏联的有利时机的观点："绝对不是。我不会给他们任何东西。我明白人

道主义援助,美国人太大方了。你注意到是谁一直在呼吁这件事,是莱斯·阿斯平和理查德·格普哈特!"

"就是农场地区的人。"我说。

"是的!"他叫道:"那就是政治。我看到基辛格在《新闻周刊》上写了一篇令人失望的文章。他赞同现在提供援助。但现在援助就好比几年前给戈尔巴乔夫一样,纯粹是浪费。"

在这种过渡时期,提供的援助会白白浪费在官僚腐败的混乱之中。在社会基层机构中,权利在被肆意滥用。地方共产党仍然控制着生产工具,并且禁止土地出售。有潜力的企业家们知道他们的财产可能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一种理由被没收。通货膨胀已高达250%。生产率在1991年下降了十个百分点,主要是因为工人对物价上涨感到灰心丧气。罢工的威胁迫在眉睫。食品和燃料短缺变得越发严重。住房短缺。由于分配中的障碍而使商品短缺更加加剧。由来已久的种族冲突迅速蔓延。

在西方国家承诺给苏联任何物质援助前,苏联人应该证明他们在自助。他们需要采取民主和自由市场的原则以及坚持这些原则的体制。

尼克松提醒说,我们不应该期望这些体制马上就能产生。事实上,叶利钦在短期内所面对的最大的威胁不是坦克,而是对更好的生活已经等得不耐烦的苏联人民会失去信心。

因此,初期的援助应该是人道主义和技术方面的,而且应该直接援助那些实行改革的共和国。它的先决条件包括:确实证明共和国同中央政府之间的政体和经济关系,这样西方国家就能决定援助谁;经济稳定方案;实行银行和税体制;保护私有财产和合同法案;以及独立的司法制度。更进一步说,

苏联需要大量缩减防御和安全支出，加速从东欧撤军，并终止对古巴这样的被保护国的所有援助。

随着联盟的瓦解，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各种团体——一些是独立的，一些是联邦的。这给那些西方国家带来不便，因为他们已习惯于听苏联用同一种声音说话。对许多西方观察家来说，尤其是布什和贝克，多种声音是刺耳的喧闹。判断我们的外交政策不是件容易事，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民主团结是力量。

"你知道，"尼克松说，话中带着一丝怨恨，"布什身在其中，但他根本什么也没有做。"

甚至当形势已明朗化，叶利钦已作为俄罗斯的合法的新领导出现时，美国总统也没有投他所需要的信任票。布什拖延对他的帮助，举棋不定地同他打交道。尼克松怀疑他在指望俄罗斯的垮台。这不仅是糟糕的政策，而且是在危险地浪费时间：美国应该在那里的局势仍然在不断波动的情况下充分利用它在苏联的影响。

"我不想因'临时政府会运转吗'的问题而停滞不前。"9月9日，他在我们编辑他苏联那一章的最后一稿时说，"正如你能看到的，我强调了肉和土豆的问题：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改革，它对他们的外交政策意味着什么？它对美国意味着什么？"

就尼克松花了上一个周末的时间重写了整个这一章来说，它确实很好。

他提到苏联处在解除中央集权的不可逆转的道路上。仍然想保持控制结构的中央政府和建立以民主与经济的自立为基础的共和国之间的分歧是很大的。随着权利的转移和利益

的转变，美国必须调整它同中央政府及共和国之间的关系。苏联的后继各国在真正的、长期的民主变革中能成为积极的合作者。

第二天，10月10日，尼克松想庆祝《只争朝夕》的完成。我后半下午去了他的寓所，见他拿了两杯白葡萄汁。

他笑了："来解放一下，没有酒精的，你知道，这是医生的命令。贝贝·雷博佐总是告诉我要听取另一种意见。"他举杯为这本书的完成祝贺。

"我们几乎不想再写这本书了，"他说，"谁会想到我们竟会在几天之内完成了重写的工作？现在我们只好希望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还活着！而那是我们所不能决定的！但至少我们完工了，现在，"他一边拿起一份最后的定稿一边说，"现在要看出版商的了。"

但两天后，他给我写了一份备忘录，担心最近的局势发展会影响他的书稿。他害怕政府会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担一揽子援助计划，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反过来会在政府对政府的基础上管理这笔款项，"贝克会说，'除了我还会是谁呢？'用以掩盖美国提供大约20%的国际货币基金的事实。"尼克松担心政府的行动会取代他的观点，即援助只应该在改革走上正轨时才能提供。

他不打算修改手稿，因为他相信在政府采取任何行动前，书就该到书店里了。但他的确认为布什会搞"一个骗人的把戏"，和其他的工业国联手帮助苏联。

大部分援助计划的问题是他们没有认识到苏联的政治和经济控制是分不开的。"盛大交易"使经济从政治中分离出来，就好像经济改革能在一个远离政治和社会混乱的真空中

进行似的。但经济改革只有当政治形势相对稳定时才能进行，只有当政治体制的存在能维持它时，它才能成功。

布什于9月23日在联合国发表谈话，尼克松紧张地看着演播。令尼克松感到欣慰的是，总统没有宣布援助苏联的重大计划，而是强调政治上安全的大局面。

“我认为演说对观众来说是可以的，”尼克松后来告诉我，“我在联合国也作过几次演说。没有用处，但是新闻界就是喜欢这些毫无意义的玩意儿。我听说仍然有一些人推选戈尔巴乔夫做联合国秘书长。”

“联合国由一个共产主义者当领导人？”我怀疑地问。

“我们已走得很远了，但还不至于远到那种程度。”他回答。

“我真奇怪他们为什么没有建议卡斯特罗！”我说。

“他们会的！”他大笑着，接着又换了一个话题，“你看，南斯拉夫现在正在发生的一切是一场灾难。那里的中央政府比苏联的中央政府要强大得多，他们试图通过轰炸他们的敌人来维持国家的完整。我们政府应该表明立场。他们击败了民族主义，但他们实际上是以民主为代价支持塞尔维亚、中央政府和共产主义者。国务院所说的话？没有意义。当贝克指责双方时……”

“他等于是道德犯罪。”我说，说出了他要表达的意思。

“就南斯拉夫问题，我要向斯考克罗夫特写张条子，将它作为记录。我不想让历史学家认为我也是随大流。”

美国持续的中立态度发出了几个危险的信号。首先，它向苏联发出了信号，如果中央政府重新获得最高统治的控制权，美国会重新考虑的。其次，它向东欧、苏联的潜在的政客

和当权者发出信号，如果他们获得权力并用专制的方法来“稳定”他们的局势，美国也会重新考虑的。美国的中立政策抚慰了侵略者，而使世界民主人士被弄得随波逐流了。南斯拉夫是对我们对这些民主人士的承诺的一个重要考验，而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考验不合格。

在给斯考克罗夫特的信中，尼克松敦促美国政府在还能控制局势和波及周边国家之前强烈谴责塞尔维亚的行为。这是一场由强硬派、共产主义的塞尔维亚政府及联邦军队发动的反对民主的和具有独立意识的克罗地亚的侵略战争。如果强硬派成功地用肮脏的手段肢解或摧毁克罗地亚的民主政府，那将是一个“极为危险的先例”，尤其是对那些苏联和东欧的民主人士想要争取更多民主的人士来说更是如此。他认为西方的反应“滑稽地缺乏热情”，他还督促总统用“最强硬的措辞”谴责由塞尔维亚的共产主义者发动的“野蛮侵略”，并对支持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民主力量作出反应。就像在苏联一样，我们必须在冷战后的欧洲尽一切可能阻止和平民主变革的倒退。

尼克松认为，我们不一定要派兵，但是要通过外交途径来阻止这场冲突，包括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民选领导以及在实际情况下寻求力量的平衡。除非用强迫手段，否则塞尔维亚的共产主义者是不会妥协的。

在欧洲的中心发生战争是世界所不能承受的。斯考克罗夫特会把尼克松的意见传给布什，没有保证有任何行动，但至少前总统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尼克松从9月30日那一期的《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上撕下理查德·珀尔的文章“苏联军队害怕什么”放在我的桌子

上。珀尔提到曾经一度强大的苏联军事—工业联合体害怕叶利钦和新民主人士，因此他们将大幅度削减军事开支。在文章的最上面，尼克松写道，那些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人应该读一下这篇文章。

与此同时，在美国和苏联的讨论中军备控制的问题占据了主要地位。双方都建议要大幅度削减，尼克松认为布什的削减是"草率行事"、"令人苦恼"。他们寻求销毁所有类别的武器——置于陆地和海洋的战术或短程核武器——并取消某些远程导弹。尼克松对此作出谨慎的反应。他说苏联不会愿意放弃他们惟一能保持超级地位的权利。

"在移动式导弹上的僵局很可笑。"他在10月6日说，"这并没有关系，因为苏联有300多而我们一个也没有。我担心布什这么做是为了支持戈尔巴乔夫。"

我指出国务院称将同意禁止进行核武器试验。尼克松突然说道："什么？太棒了！我还没有听说这事呢。我的确希望贝克困在中东局势当中，这样他就不会插手苏联的事情。他和布什不明白的是苏联的革命还没有结束。"

10月17日，在一个为克里斯廷·托德·惠特曼举行的募捐会上，尼克松作主要发言。惠特曼在新泽西州同现在的比尔·布拉德利竞选美国参议员。选票表明她远落在布拉德利之后，但惠特曼的策略是获得承认和经验以便在1993年竞选州长时处于一个更优越的地位。尼克松喜欢惠特曼，认为她在共和党中有一个生机勃勃的未来，并且乐于借此机会帮助她。

"我希望观众从中得到些启示。"事后的那天晚上他对我说，"发表那样一个演说，我通常要打五至八遍底稿，反复看很

多遍，直到我能凭记忆把它说出来。但我从不逐字背诵，因为那样听上去显得很虚假。而我这样做有更大的灵活性、自发性和即兴的幽默感。"他突然变得沮丧起来，"但是我从来都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人真正提到我发表演说时不用笔记却能得到长时间的热烈欢迎。这是信号还是先兆？"然后他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我想都是。"他对我建议说，"在你将来的政治生涯中，你要注意别让新闻界忽略你。

"演说是交谈——记住这一点。同他们的交流也是很重要的，即使听众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同那些对苏联改革比你知道得少的人谈论苏联改革是很困难的。你很难使你的观点达到他们所能理解的程度。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而是因为他们不擅长外交政策。而当你自己擅长时又很难使它简单化。但你必须那么去做，否则你就会失去这些听众。"

在惠特曼募捐会上，尼克松将革命和改革进程用每个人都能听得懂的话表述出来。他的使命是让美国人民相信支持改革的力量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如果他们失败了，我们就会被迫发动一场新的冷战。这是一个他一直到死都不断重复的观点。

10月30日，我桌子上放了一篇查尔斯·克劳赛默10月14日登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题为"喜欢独裁者的人"。文章严厉批评了布什政府偏爱独裁者和稳定并把它们置于民主和独立之上的倾向是"缺乏远见"和不负责任的。

"我想你还没有看这篇文章，"我把文章带进去进行我们通常的早晨讨论时，他说，"这篇文章太好了。你知道他是对的。在戈尔巴乔夫的问题上，布什仍然在谈论稳定，这真令人恶心。苏联完了。"

尼克松期望他的书不仅仅在政治界还会在政府内引起辩论。他拥护叶利钦和排斥戈尔巴乔夫的做法同政府长期以来的观点相反，无论是布什还是贝克都不愿意听取尼克松的意见，因此他们都坚持已过时了的帮助戈尔巴乔夫的观点。甚至到了1991年11月，国务院的意见还是苏联应该在政治上重建，这不仅仅是对局势的重大误解，而且是完全置苏联人民的愿望于不顾。尼克松惊呆了，但他知道《只争朝夕》会引起公众对政府既陈旧又失败的政策的注意，进而施加压力来改变它。

这时候，叶利钦集聚了更大的权力。他要求并得到了推行他激进的经济改革计划的新权力，那实际上等于结束旧苏联的中央政府。但由于采取控制手段，叶利钦被指控为实行专制主义，甚至那些承认要将国家从完全的经济崩溃中拯救出来专制主义是必要的人也指控他。由于不能对付瓦解的经济、逐渐增加的物品短缺和日渐提高的对公共秩序的威胁，改革的领导者更倾向于加强集权，以便能更快地对经济问题作出决定。

这并不令尼克松担心。叶利钦比戈尔巴乔夫或任何其他的政治对手都更有决心将俄罗斯推向一个民主和市场的轨道。专制主义在俄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将贯穿在改变体制的所有努力之中。

尼克松在10月4日对我说："戈尔巴乔夫的声望在很快衰退。正如我4月份对布什说的那样，他已经精疲力竭了。他要求建立联合体的呼吁很可怜。人们情愿谴责叶利钦实行专制主义，而赞扬戈尔巴乔夫，因为他是共产主义者并想把一个曾靠武力维持在一起的国家重新联合起来。那简直不可

信。但是看看，为了防止那个糟糕的地方分裂，叶利钦必须做他不得不做的事情。”

尼克松希望叶利钦成功，但尼克松计算着《只争朝夕》的出版日期，他越来越担心戈尔巴乔夫会在这本书出版之前辞职。11月14日他说：“从感情上讲，他会辞职的。他怎么可能仍然是一个实际上已不复存在的国家的总统？但是他好像喜欢他已经失去了这一切，他谈论联盟时就好像它依然存在一样，并且毫无理智地攻击布什背叛了他！”他在办公室里坐在我的对面，眼睛朝下看着，“我知道当你处于像这样的事之中时，很容易同现实失去联系。但是他比保护自己有一种更大的责任。辞职对他来说是一件正确的事，尽管对我们的书来说不是件好事。”

在苏联变幻莫测的局势下，书中的材料会幸存下来，但尼克松知道戈尔巴乔夫是不会幸存的。12月18日俄罗斯宣布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俄罗斯的三色旗将取代在克里姆林宫飘扬了70年的苏联红旗。

那天早晨很早，尼克松打电话叫我去他的办公室，他的声音充满了激情和满足：“象征主义太重要了，”他说，“我在去那儿的七次中，七次看到了那该死的红旗——锤子和镰刀的红旗。看到它降下该会是多好。”

他清了清嗓子：“哦，这是件令人激动的事情。”

尼克松很少表露感情，但是当他一生都在致力要打败的国家最终被击败时，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感觉占据了他。当戈尔巴乔夫辞职，苏联红旗在圣诞节那天从克里姆林宫上的旗杆上降下时，这一切证明了尼克松成功地建立自己政治生涯的反共产主义的路线是正确的。

尼克松活着看到了这一天。他和其他人——比如里根——因把苏联叫做罪恶帝国而被嘲笑的人现在可以感到欣慰了。

在11月的最后一周,成百本的《只争朝夕》被送到了办公室。尼克松给那些接受致谢本的人亲自写了私人信件。政策制定者、建议提供者、各州的州长们以及他的朋友们很快拿到了书。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戈尔巴乔夫刚刚辞职,新独立的共和国正引起西方的关注并将得到援助。尼克松想让他的书尽快到送到那些决定的人和能影响决定的人的手中。

几乎在每一个有关发表此书的访谈中,尼克松都强调美国考虑对苏联的民主势力尤其是俄罗斯的经济援助的必要性。在冷战期间,美国及其同盟国花了数兆亿美元来遏制苏联的扩张主义和影响。现在西方国家只要拿出那笔数目的一小部分就能阻止俄罗斯再实行镇压政策。

他强调俄罗斯局势的紧迫性:维持社会团结,清除旧思想和旧机构,控制加剧的民主主义情绪,实行长期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同世界的其他国家建立新的关系。他提出应重新认真评估我们自己同俄罗斯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关系。他强调同那些由人民选举出来的当权者合作的必要性。

尽管尼克松因对该书受到肯定而感到欢欣鼓舞,但是他没有立刻从布什或斯考克罗夫特那儿得到任何直接的反应,这也令他失望。

"听到国会已邀请戈尔巴乔夫讲话使我感到震惊。"1992年1月16日尼克松在电话中对我说,"难道这些小丑中没人在注意吗?布什和贝克这么做我还能理解,但是国会是怎么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说这个邀请可能是用来抵消叶利钦访问联合国及同布什的高级会谈，尼克松表示赞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从布什、斯考克罗夫特和其他人那儿得到任何反应的原因。"他说，"我们的观点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观点。这同他们到目前所做的一切都不同。正如这本书所说的，我们必须要只争朝夕，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在那边他们有大量的问题。叶利钦不该为我们半心半意的支持而操心。"

尼克松把自己当作为俄罗斯寻求援助的西方首要的发言人和倡导者。就像美国曾帮助我们二战中的敌人进行恢复一样，我们应该帮助俄罗斯从冷战中恢复过来。作为一种对和平和一个新的民主合作伙伴的投资，我们的援助能保证俄罗斯民主和自由市场改革进程的生存和成功。美国应该有目的地给予一定的帮助，使俄罗斯人民能自助，而不是进行一种全球援救努力。尼克松提到这是20世纪末美国对外政策所面临的惟一最大的挑战。

尼克松表述这个观点所采取的一个重要策略是3月份在华盛顿举行了一个由"尼克松图书馆和故乡"赞助的政策研讨会，在会上他自己是主要的发言人。尼克松的讲话是会议的一个主要内容，他原本也就打算要充分利用这个会议。尼克松知道他会在讲话中称赞叶利钦，因此打消了邀请戈尔巴乔夫讲话的念头。再说，他明白要说服布什改变美国政策，他必须要做得富有戏剧性和轰动性。

布什总统自己于1月22日在华盛顿召开了一次援助俄罗斯会议，47个国家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很快变成了一个没有结果的给大家提供拍照机会的会议。尼克松被激怒了。

"首先，"他喊道，"布什和贝克在关于美国领导权的问题

上的观点是让全世界聚集在一起，然后让他们都说话。他们的脑子中装的都是集体行动的大话。其次，我认为他们在竭力表明他们所领导的——诸如援助之类的事情——是他们一直想要的。他们没有这么做过。那 47 个国家呢？他们都想分一块蛋糕，真是开玩笑。”

我提到如果只有四五个强国参加会议可能会更有效一些。尼克松停了一会儿，咬着他的下嘴唇：“我们要领头。我不是指美国。我的意思是，”他指着自己说，“我们要领头。”

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讲话。很明显尼克松已开始考虑他何时、以何种方式谈对俄罗斯援助的问题。如果布什在会议上不采取行动，尼克松将迫使他采取行动。

1 月底，叶利钦对美国进行了自他当选为俄罗斯共和国总统以来的第一次访问。他受到了热情认真的接待，这使尼克松认为叶利钦已经达到了他所需要的为他的改革寻求美国援助的理解程度。

“他不能失败。”尼克松在 2 月 2 日说，“我们不能让他失败。如果他失败了，我们将会看到整个东欧、俄罗斯的倒退。看看正在南斯拉夫发生的一切。他们正试图将身份降低到最低的没有个性的程度。但是你不能强迫它。”他说，一边握紧了拳头，“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否则我们将会有更大的麻烦。”

当我问他打算怎样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到对外政策上来时，他回答说：“他们不在乎对外政策。但是他们应该在乎，原因是，如果俄罗斯垮了，那么大家所鼓吹的民主的大话就一文不值了。而我们将用所有的资源参加一场新的竞争。”他停了一下，“瞧，我知道对外政策不流行，但是总统必须要谈论它，他应该领导它。”

冷战的结束提醒人们这个世界并不完美。当克里姆林宫上的锤子镰刀红旗落下来时，人类对更自由、更丰富的将来的希望就变得更乐观了。

这并不是说世界处于和平之中。相反，它意味着一个不稳定时期的到来，因为那些曾在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的保护翅膀下的国家彼此之间开始发生战争。没有哪个国家能靠自己建立一个和平的后共产主义世界。美国有着必要的军事力量，但是必要的钱却太少了。日本有钱却没有这种愿望。欧洲有一点钱，也有一些军事力量，但不团结。由美国领导的世界民主的联盟将来完成它。

华盛顿尤其应该记住苏联是一个有着骄傲和英雄的传统的国家，苏联的垮台是对它的民族自豪感的致命性打击。政府必须在言行上都明确地把俄罗斯当作在世界事务中合法安全利益上的一个合适的伙伴。这个有着核武器装备的俄罗斯不再需要长期以来被看做非常重要的领土缓冲带，这样过去被用作帝国扩张的资源现在能用来进行经济恢复。

同时，俄罗斯必须明白搞新扩张主义将会付出更沉重的代价。在一边是俄罗斯及其邻国，另一边是世界其他国家之间周而复始的对抗会阻碍任何的援助。但是俄罗斯如果尊重这种新局势并在国内保持这种局势，那么西方国家的一个重要援助计划会是符合逻辑的。

贝克在2月初从莫斯科返回时宣布美国可能给俄罗斯提供50亿美元的援助，他这么做很明显地犯了一个错误。这笔数目是明显的个人武断行为，并且不符合有条件的支付计划。尼克松认为贝克的这种行为是极不负责任的，这不仅使局势更加混乱，而且加深了人们认为政府对俄罗斯的政策是随波

逐流的看法。

“我认为这本书这么看好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布什不想让它把人们带到山顶，让他们看到世界的新前景。”尼克松在2月12日说。

这项工作落到了他的身上。尼克松认为布什希望叶利钦的改革努力失败，以此证明他在帮助戈尔巴乔夫上是对的。军事政变是有可能的，而叶利钦的替代人很明显地会更少地倾向于改革。美国不能再等待了，它得有所行动。2月21日，尼克松自己的计划开始实施了。

“如果俄罗斯的局势变得更危急，”他说，“强硬的做法就会回头，那时我们不能责怪任何人，只能怪我们自己。我一直在谈这个问题，但是政府中没有人在听。布什和贝克仍然抓住戈尔巴乔夫不放，即使贝克倾向于我所说的，他也不会那么去做的，因为这个观点是由我这儿来的。我们还能再做什么呢?”

我回答道：“先生，也许你应该考虑给那个人自己写一份政策备忘录。”我自认为这是合乎逻辑的解决办法。

尼克松看着我问道：“给叶利钦?”

“不，”我说，“给布什。”

尼克松考虑了这个提议。他不想在面对布什时感到尴尬，但他必须找到一个强迫布什为了俄罗斯的利益采取行动的办法，而看上去又不会使布什觉得是在强迫他。尼克松利用他令人钦佩的外交经验作出了一个决定，他不打算给布什起草备忘录，而是给那些布什不能忽视的人。

心中藏着这个想法的尼克松告诉我说：“我会考虑这个主意的。像这样的方法也许是值得的。”

"先生,如果你决定那么做的话,可以通过邮寄使更多的人看到。"我建议说,我并没有意识到他已有了与我相同的结论。

两天后,他在家里打电话说:"我已经决定不直接把备忘录给布什。莫尼卡,他知道要做什么,只是他不去做。我要写一份秘密备忘录,然后散发。"他又狡猾地补充道,"你该明白我的意思。"

后面几天里,在为出席主题为"美国在世界中的作用"的尼克松图书馆研讨会的准备过程中,尼克松写了一篇尖刻的文章,题为"西方国家怎样失去了冷战"。他让我在不同的场合朗读,并且让我对内容和形式提出意见。不管怎么说,第一稿是他写的。2月28日,尼克松最后一次读这篇文章。他打电话让我到他的办公室,并给了我一份。

他把文章递给我说:"瞧,那是你的那一份历史。读读看,告诉我你的看法。"

文章是对布什政策的有力谴责,尼克松认为布什政策在语气上优柔寡断,内容上没有价值,产生的后果不光彩。

他是这么开始的:

"当候选人在总统竞选活动中对20个重要的问题发表了看法时,却忽视了二战以来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命运。结果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在通往胜利的最后关头有让人把胜利夺走的危险。"

他接下去严肃地警告说:

"我们一直不断地听到冷战已经结束,西方在冷战中

胜利了。这只是部分事实。尽管共产主义者在冷战中输了，但是西方也没有赢……今天，自由的观点处于考验之中。如果它们不能给俄罗斯和前苏联的其他共和国提供一个更美好的生活，那么一种新的、也更危险的专制主义将会夺取政权，人们只能用自由换取安全，把他们的未来交到以新面孔出现的旧势力手中。"

这种危机感在整个备忘录中随处可见。他将苏联的民主革命的重要性同拿破仑1815年在滑铁卢的失败相比较，同1919年的凡尔赛和平大会以及1947年、1948年北约的发展过程和马歇尔计划相比较，还同近代史上的一些最重要的决定性的时刻相比较。

他写道：

"俄罗斯是成功的关键。冷战最终的成败就在于此。如果自由在俄罗斯取得成功——如果叶利钦的经济改革成功地创立一个成功的自由市场——我们将来才会有希望削减军备开支，在应付世界危机中进行合作，以及通过扩展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自由的成功将会在世界上共产主义最后的孤独主义的堡垒——北朝鲜、古巴和越南——引起反响。"

在明确指出俄罗斯民主成功的正面后果之后，他又勾画出失败的可怕后果。下面的三段都是以急切的"如果——那么"设想开始的。

"如果叶利钦失败，那么将来50年的前景将会变得严峻起来。"

俄罗斯极端的民族主义将会统治一切,带来新的压迫。

"如果一个新的专制主义盛行,那么在1991年的这场伟大的和平革命中所取得的一切都将失去。"

战争会笼罩着苏联,死灰复燃的新的暴政会对我们在世界范围内的利益造成威胁。

"如果自由、民主运动在俄罗斯失败,我们将看到已遍及世界的自由的浪潮开始消退,专制——而不是民主——将成为将来的浪潮。"

之后尼克松向西方提出强烈的请求:

"尽一切可能帮助叶利钦总统获得成功……基本点是叶利钦是俄国历史上最亲西方的领导人。再有,无论他有什么缺点,替代他的新专制主义只会是更糟。"

接着,尼克松回顾了到目前为止美国和西方所做得不太多的事情,包括提供农业信贷、人道主义援助及和平部队志愿者。他写道:"这实在是令人遗憾的远远不够的反应。"

他提出一个更好的计划,其中包括:继续人道主义援助;创建一个"自由企业团体",使成千上万的西方商人到俄罗斯帮助俄国人民为实行自由市场机制作准备;重新调整俄罗斯债务;为俄罗斯出口打开更大的西方通道;通过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贷款,以保证货币稳定;建立一个单独的由西方领导的组织,来评估俄罗斯人的需求并调节所有公共和私人的援助项目。

他写道,我们的同盟国应当承担部分负担,但是:

"在玩这个游戏时,我们必须要在桌子旁边有个位

置。要在桌子边有个位置，我们必须准备在锅里丢一些小食品进去。赌注很高，但我们要像玩一场赌注很小的游戏一样。”

这个赌博的比喻是有意图的：它再次强调，如果西方不采取行动来提高成功的可能性的话，就平和繁荣而言，它将失去一切。

尼克松在下文中用了大量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

“民意测验表明对外政策只在选民认为是重要的问题中占几个百分点……但是一个伟大的政治领导人的标志不是简单地支持普遍流行的观点，而是要使不受欢迎变为受欢迎，如果它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他又更进一步写道：

“对俄罗斯和前苏联的其他共和国的援助不是施舍。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在国外帮助别人的同时也能在国内帮助我们自己。如果叶利钦被一个新的有侵略性的民族主义者所取代，那我们就只能同我们的和平股份说再见了……如果俄罗斯新的专制主义迫使西方再次武装起来，徒劳无益地空忙于税收法规或实行什么民主倡议将不会有什么经济影响。相反，如果叶利钦成功，一个自由市场的俄罗斯将会提供数亿美元贸易的机会，这将给美国创造数千万的就业机会。最重要的是，一个民主的俄罗斯会是一个非扩张的国家，因为民主不会发动战争，这就使我们的子孙后代在下个世纪中不再有军备冲突的恐惧。”

他在结尾中满足了一下布什的虚荣心：

> "布什总统是面对这一挑战的惟一合格的人选。他在海湾战争中使国外同盟和国内美国人民同心协力，因而赢得了这场战争，这显示出他杰出的领导才能。他杰出的领导才能够保证冷战将不仅以专制主义的失败而结束，而且将以自由的胜利而结束。"

备忘录具有挑战的使命。它表明尼克松拒绝隐退，拒绝人们对他的建议的忽视，拒绝接受失败。他有让人民在有关民族利益的问题上听取并遵从他的意见的决心，他的这种决心激发出了有时带有操纵性、但从来都很明智的策略。

尼克松把包括现实主义、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这一独特的合成体融进了处理俄罗斯问题的中心思想，但他的观点并不是他自己首先提出的。正是尼克松发表了这一中心主题，才改变了争论的方向。

他的目的是要帮助布什，而不是羞辱他。由于民主党派的竞选领先者比尔·克林顿在强调经济状况和其他国内事务，布什被迫对克林顿的指责作出回答，这等于是在克林顿的场地里做游戏。尼克松试图给布什一件政治的外衣，以便在俄罗斯问题上有主动权，避免一种软弱无力的沉默。通过备忘录，他力图给布什的竞选班子指出方向、前景、目的和中心主题，围绕着这一主题，布什的竞选班子能把自己调动起来，而克林顿却不能恰当地处理。

备忘录的攻击是总统政治的岌岌可危的游戏的一部分。尼克松在冒险，因为他随时有可能招致负责国家对外政策的政府成员的嫉妒和愤慨。但是尼克松已经给了他们一个行动

的机会,他多次警告他是不会保持沉默的。当还没有行动的迹象时,他求助于自己的那张王牌:因为他是尼克松,他能使这个问题成为一个最优先考虑的问题。

备忘录的新闻价值是很明显的,尼克松让工作人员立刻将它寄给几十个有声望的人。那些距总统最近的人首先收到;政策制定者、新闻记者、评论家和其他一些人其次收到。最为明显的是他没有将备忘录寄给总统本人。尼克松的策略既简单又狡猾:用尼克松的批评和建议包围布什,从而迫使他在不用同尼克松直接面对的情况下作出反应。尼克松知道他的做法会严重伤害他同总统的关系,但是在他看来俄罗斯的危急局势值得他为此冒险。

"布什现在不能再不理睬我们了。"他那天早晨说,"不会了,这肯定会起作用的。"

但这个策略只有当布什就他的批评发表讲话并采取改正政策的行动时才会起作用。尼克松的幕后密谋令人满意地实施了。他对新闻界的独家新闻报导的重视和就在他们的门口发布的积极行为都表现出他在标题新闻和消息来源的关系上的老练。尼克松的一生都是在政治领域中度过,他知道同新闻界打交道的危险,但是他也知道其中的机会。他通过使备忘录供不应求的方法而使它变得重要起来。

备忘录的影响没有很快就被感觉到。那些先收到备忘录的人按尼克松在上面所标记的那样,保守着秘密,没有声张。但是尼克松可没打算要保密。3 月 3 日他接到政治顾问罗杰·斯通的电话,问他愿不愿意泄露一份备忘录。尼克松说可以,但斯通没有说明他要怎样泄露,泄露给谁。

基辛格第二天打电话来赞扬了备忘录,紧接着斯考克罗

夫特于3月5日打来电话，对尼克松的精彩评论表示感谢。然后是《华尔街杂志》，他们想发表它。斯特劳斯大使的评价非常高。打算把它拿给叶利钦以引起他的注意。国内公用无线电台的丹尼尔·肖尔3月9日给我打电话，请求容许引用备忘录的摘录。尼克松很高兴。通过很小的发行量，他已得到了他预期的效果。布什和贝克会看到斯考克罗夫特的那一份，新闻界也不会忽视它的。

与此同时，尼克松为下星期的会议写了发言的草稿。他为会议的新闻价值担心，尽管布什已同意出席，并作一个通过电视转播的主要讲话。

"总的来说，研讨会是 ·文不值。"尼克松在三月初时说，"就像一次不会引起任何争论的失败的演出。没有人对 -堆说话的人感兴趣。行动！那才是人们所关注的。"

这个行动正是尼克松所做的。他写了一个"秘密"备忘录，严厉批评了正处于艰难的竞选连任之中的现任共和党总统。它会成为新闻，会成为会议的关注中心。它还会加强尼克松作为国家杰出的老政治家的作用。它还有可能改变在我们时代中最重要的对外政策问题上的美国政策。

3月10日，在会议开幕的前一天，《纽约时报》登的 -篇头版文章彻底改变了美国对俄罗斯的政策及尼克松同政府的关系。在那篇由托马斯·弗莱德曼写的文章中，尼克松的备忘录的主要部分被重印了，并加上了肯定的评论。

突然间，关于是否应该以及如何援助俄罗斯的争论完全改变了性质。总统已不可能再忽视这种局面。布什被迫在尼克松的会议上对尼克松作出回应。尽管尼克松已经预料到对他的攻击的肯定反应，但是《纽约时报》的头版文章及它所引

起的涟漪却是他远远没有想到的。

3月10日，在尼克松到达他的旅馆几小时后，我也到了。他几乎立刻就把我叫了进去，指着咖啡桌上弗莱德曼的那篇文章，咧嘴笑着。

“你是怎么想的?”他问。

“我认为你在你的手掌之间发动了一场政变。”我回答说。

“哈，如果我们能组织莫斯科不要再发生政变，它才是一场政变。”他俏皮地说，“这引起了一场轰动。尽管白宫没有问题。竞选班子领导人斯金纳打来了电话，确信我不是在同他们分道扬镳。斯考克罗夫特看到了文章，同意文中的观点；布什也一样。他的那些职员都不是专家，都是胆小鬼。贝克从欧洲给国务院和白宫打了电话。他肯定很激动!”他轻蔑地说，“他是担心他在备忘录中被攻击。同往常一样，他只是为他自己考虑。

“最好不要强迫我举行记者招待会。我不会举行的。就让这件事顺其自然吧。”

到目前为止，赌博已经起作用了。

“当你做这样的事情时，”他说，“你依赖于这么多的人和这么多的可变因素，你永远不知道它是否会起作用。你写了那该死的东西，然后你把它弄出去了。现在就取决于那些收到它的人来做些什么。你向外泄露，但泄露很快就会停止。弗莱德曼完全不必写这篇文章，编辑也不必把它放在头版。这完全就是一场赌博。你只能期望最好的结果。在这件事中，赌博生效了，但是真正的考验是明天晚上，因为布什要在这儿发表讲话——他们可能正在起草另一份讲话——要面对这些听众，这些认为我正确的听众。”

在四季宾馆举行的这个会议吸引了大量杰出的政策制定者、记者和学院派人士。安排讲话的有：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前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前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特·盖茨、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和瓦伦·拉德曼、国会议员李·汉密尔顿和斯蒂芬·索拉茨、美国贸易代表卡拉·希尔斯、大使弗农·沃尔特斯以及威廉·奥多姆将军等。听众也都是同样显赫的人物。

3 月 13 日中午，尼克松发表谈话，谈话的大部分内容来自于备忘录，但省去了其中尖刻的谴责。谈话的标题为"和平的承诺"。在谈话中，尼克松把对俄罗斯问题的政策前景同美国对外政策的更广泛的问题相联系。在结尾中，他谈到哈里·杜鲁门总统在冷战初期经受挑战的情景，为阻止共产主义在希腊和土耳其的颠覆活动，杜鲁门总统向国会寻求——并得到了——援助。面对冷战结束的挑战也需要同样的支持。

"我们那时对战争的威胁作出了强有力的反应。难道我们现在不能对和平的承诺作出反应吗?"他继续说，在冷战期间我们曾团结一致，阻止了邪恶势力的扩张。今天，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推动美好的事物向前发展。没有其他国家能带头保证俄罗斯和前苏联其他共和国永久保持他们的民主成果。在结尾处，尼克松以华丽的词语说："这是我们伟大的时刻，真理在握的时刻。我们必须抓住这次良机，因为未来就在我们的手中。"

听众起立为他的讲话鼓掌。他向听众很快地挥了挥手，离开了舞厅，等待美国同新欧洲关系的专门小组讨论会的召开。专门小组讨论会由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主持，其中包括沃伦·拉德曼、约瑟夫·约菲以及艾伦·汤纳森。在每次专门小

组讨论期间，尼克松在他的桌子边主持另一个七八个人的小组。在布热津斯基主持的讨论会上，我被邀请参加，就坐在尼克松右手边带有标签的位子。施莱辛格坐在我的右边，一架C-SPAN牌照相机架在我们的头顶上方，对着正在作开场白的布热津斯基。

对于自己所作的很受欢迎的重要讲演，尼克松十分得意。他已做了他该做的事，现在轮到布什来回答他的挑战了。

在布热津斯基的讲话进行大约五分钟时，我看见尼克松倾过身体，从桌子中间拿了一张由酒店提供的便笺。我用余光看见他拿起便笺并潦草地在便笺上写了一些东西，顺势递给了我。

担心对着我们的照相机会摄下尼克松的行动，在看便笺之前，我先将它翻过去。

尼克松用胳膊肘推推我小声说："看一看。"

我翻过便笺，见上面写着一句简单的问话："你感觉好吗？"

我点头示意的确感觉不错，尼克松笑了。可能和其他任何事情相比，他这种举动更能代表我所认识的尼克松。他是20世纪末对外政策大辩论的焦点人物，当美国总统和世界各国领导人要对他提出的挑战作出反应时，他还关心我的感受。在这场争执中，这真是一次热烈的私下交流。

尼克松将他的好心情带进晚上为布什举办的黑领结招待晚宴上。在他被带去会见总统之前，尼克松招呼我到他的套房中，我进去时，他正在结着蝴蝶形领结，当他听到关门声时，突然朝我转过身来。

"这领结打得正吗？"他问。

"很正。"

"那好。你知道,他们说每个男人穿上无尾晚礼服都很帅。我不太清楚,可我看到一些丑小鸭穿上这种晚礼服时没有一点儿起色。"他笑了起来,"好吧,咱们走吧。布什要么接受我的建议,要么不会。"

尼克松期望着最好的一面,但也预计到不好的一面。在此之前,布什已召开了一个简短的新闻发布会来控制损失,否认弗莱德曼在文章中所作的推测——布什和尼克松在俄罗斯问题的做法上有严重分歧。布什重点讲了同尼克松的"一致看法",并强调说美国已经为俄罗斯做了许多事情。

尼克松知道布什是个不喜欢正面冲突的谨慎的实用主义者,备忘录是尼克松所能发起的最不直接的正面攻击,但总统没有对尼克松的进攻给予回击并修改他的政策,反而选择了迂回的做法。

尼克松向与会者介绍了总统,当他看见布什失去了历史性外交突破的机遇时,他屏住了呼吸。布什承认了尼克松外交政策的胜利,但也许并未意识到和他自己的记录比较,并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好处。

布什一边回避尼克松在援助俄罗斯问题上的观点,一边极力对尼克松的观点表示赞同。他像通常那样谈到"孤立主义"和"保护贸易主义"的危险,这正是他的挑战者帕特里克·布坎南最初用来反对他的论点。布什说,美国的领导作用是必要的,因为"让我们在这个世界走回头路"是不可取的。我看到尼克松在离我几个桌子远的地方点头表示同意。

他继续用尼克松的观点说:"为赢得冷战我们已投入了许多。我们能不为我们所需要赢得的和平而投入吗?假如我们

失败了，假如我们重复魏玛共和国的经历，那么，我们的安全以及欧洲和亚洲的安全就会出现新的问题。我们必须支持改革，不仅仅是俄罗斯的改革，而且包括前苏联其他共和国和东欧其他国家的改革。"

尼克松似乎被这一刹那的希望给惊呆了。布什满可以讲摈弃政治策略，勇敢地把话题引向俄罗斯问题，满可以听从尼克松的意见，满可以帮助俄罗斯获得自由从而确立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

相反，他退却了。他直接拣起会议的议题，含含糊糊地谈论什么"美国在新的世界中的作用"以及"一个警觉和强大的美国"的必要性。

然后，他绕过了尼克松为他创造的开端："在决定新的世界的进程中，发挥领导作用是要投入财力的。"他极力缓和这种过激的观点：但正如保险条款一样，同生活在一个充满战争和敌视的世界上可能的开销相比，保险费还是很少的。接下来，他不去论述未来计划的费用和收益，却重温对外政策的历史教训："如何在国外生活同如何在国内生活没有什么区别，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的确，如果我们在国内不团结、不强大，我们就不能在国际上起领导作用，但是，在以军事和经济大战为准则的世界中，要在我们国家建立起我们所追求的社会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事实。"

他的论述词藻华丽，只是在兜圈子，没有实质性对外政策的见解，还是老一套的马歇尔计划，没有战略预见，没抓住历史时机。

尼克松很失望，但并不感到惊讶。他站在那儿，和听众一块儿鼓掌。我可以察觉到他脸上僵硬的微笑；布什完全使他

失望了。有好几次,尼克松因自己失去了权力而感到极度沮丧,甚至当他提出政策、观点时,他的继任者们有时不作任何反应。尼克松感到非常苦恼。

人群从舞厅涌了出来,尼克松和布什等人告别之后,打来了电话要我去见他。

"进来,"他一边为我开门一边对我说,"我刚到这儿,需要出出闷气。你能相信吗?我是说,你相信那种表演吗?"

他踱来踱去,喃喃自语:"我这辈子从来还没有见过,一个总统刚要接受我的建议,眼看要成功了,可偏偏却彻底推翻了。我向他提供了他所需要的一切,还附带包括布坎南和克林顿的政治保证,但他就是不接受我的建议。"

他把拳头放在胸口说:"这家伙没有勇气,确实没有勇气。你能想象得到珍珠港事件之后罗斯福也会这样推翻别人的建议吗?不可能的。当然,那时是面对直接的军事打击,所以很容易作出决定,但我们现在没有战争,我们还有机会建立和平,这是积极的事情,真要命,这不是坏事情啊。"

他看着我说:"你当时是怎么想的?你参与了这个备忘录的写作,你感到失望吗?"

我确实很失望。为了这个备忘录和它的中心观点,尼克松花费了几个星期的心血。那天晚上,当他准备听布什演讲时,他怀着同那几个大选之夜同样的不安心情:结果不可预测,成功的希望依然存在。失败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失意和烦恼。

"你今晚睡觉时要记住,"他说,"总统有权利;而前总统没有权!"和布什演讲后他脸上僵硬的微笑不同,他这次的微笑是真的。

第二天早晨，会议继续讨论国家安全优势，贸易和美国在亚洲的作用。但所关心的仍然集中在尼克松的挑战和布什没有应战上。议员萨姆·纳恩和斯特劳斯大使都在早间电视新闻节目上露面，强调援助俄罗斯的必要性，以免为时太晚。各大报纸都讨论了这些讲话，大多数都赞扬尼克松所做的工作。"他是正确的。"他长时期的劲敌《华盛顿邮报》发表社论说。《纽约时报》甚至连续刊登尼克松的谈话纪要和有关研讨会的详细报导。

尼克松要求我把有关谈话纪要、他的讲话、布什的讲话、公众的反响以及读后的喜悦心情的文章都保存起来。他的影响力比他想象的要大：他不仅在政治现实中使一系列事件发生变化，而且一下子就向总统提供了一个他本人未能使用的极其有效的战役决策。

更重要的是，大量的报导使知情人士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争论。就讨论和专栏文章所造成的最终会导致军事行动的政治压力这一问题，尼克松对赞同和不赞同的意见一律表示欢迎。

3 月 16 日，正当辩论继续激烈地进行时，有个人送给尼克松一幅政治漫画，上面画着他肩扛一个大地球仪，标题是"尼克松回来了"。

"你认为这是善意的吗？"他微笑着问我。

最近几天来高层人物的政治活动被一幅漫画简明地概括起来。尼克松不仅回来了，肩扛着世界，他还做到了现任总统做不到的事情。

尼克松决定把他的讲话写成文字，把它寄到那些还没有收到谈话纪要的人的手中。他在修改最后一稿时说："依我看

写成文字比讲话效果更好，但讲话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它把论点讲清了。”发表讲话后，尼克松希望他的讲话能进一步向政府施加压力。

他在 3 月 20 日说：“我现在主要担心的是强硬派不想帮助叶利钦，因为他们希望俄罗斯全部瓦解。”

他眨了眨眼说：“我想你会感兴趣的，我听说《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标题是政府正着手实施援助俄罗斯计划。”他很明显地感到高兴，“没有人能对这件事设置障碍，看起来我们还是有影响的，但这要取决于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我不能相信《华盛顿邮报》竟把对我的赞赏登载头版，这不是挺幸运的吗？”

我提醒他说贝克现在已经加入到援助俄罗斯的行列。

尼克松轻蔑地说：“是啊，贝克就要宣称这个主意是他出的！虽然我看不到我们的信息是如何向各处传播的。”

尼克松很快成为所有对俄罗斯演变的担心和希望的避雷针。《华盛顿邮报》的标题登出四天之后，他接到国会图书馆馆长、俄国史专家詹姆斯·比林顿打来的电话，他焦急地表示担心一场新的政变正迫在眉睫，还说美国需要坚决地支持叶利钦。比林顿的担心也成了尼克松的担心。

“我应该把这个意见传达给政府里的哪个人呢？”他问道，“比林顿不是杞人忧天的人，所以我倾向于相信他的话。情况紧迫，我想告诉斯考克罗夫特，但不知是否合适。”

“国防部长理查德·切尼怎么样？”我建议说。

“也许吧，但似乎盖茨可以对付这样的事情。”他给中央情报局局长打了电话，第二天接到了回电。

“我敢肯定这对你来说已经不是新闻了。”尼克松说，“但

我认为它至关重要，所以我强烈声明支持叶利钦。”

放下电话后，他对我说：“盖茨是那里的得力人物之一，但我仍然认为没有什么作用。如果他们不听，而叶利钦又失败，他的拥护者就倒霉了。”

3月28日，当尼克松了解到布什把援助俄罗斯的职责交给国务院时，他的噩梦变成了事实。他在家里给我打来电话，极度气愤。

“莫尼卡——贝克怎么啦？”他问道，“贝克怎么啦？噢，天啊，这件事真要完蛋了！他从一开始就对这件事不满。我曾经读到有人报导说国务院一些下级官员同意我的观点，下级官员？肯定不是贝克！当然，如果不支持我们，他们甚至现在也不会这样做的，是不是？”

他压低了声音，闲谈起了内幕情况：“我听说布什在星期二发表对外政策演说的惟一原因是因为克林顿要在星期三发表演说。”

“现在每个人都极力发表关于俄罗斯问题的主张。”我说，“克林顿努力在这个问题上对布什的权利施加影响是对的。”

“我知道。”尼克松回答说，“从政治上讲，这是很聪明的。但我很失望，布什没有把这件事计在自己的账上。对于这个问题，布什使自己完全暴露在公众面前。你知道，布什不应该到处作这样的演讲。克林顿不得不这样做：他是挑战者。但由总统办公室发表这类演说更适合。他是总统，他没必要对扶轮国际分社发表谈话！”

此时基辛格继续让尼克松大伤脑筋。在会谈中，基辛格强烈地告诫提防基于支持一个俄罗斯领导人而忽视帝俄历史的美国政策，他极力强调东欧的悲剧性历史，主张加强同乌克

兰以及其他加盟共和国的联系以便同俄罗斯抗衡。尼克松在会谈中发言公开反对基辛格的主张，引起了一次小小的轰动。然而3月份基辛格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继续坚持他的主张，对尼克松"俄罗斯优先"的主张表示异议。

3月31日我们会面进行午后讨论时，尼克松非常愤怒："他竖起了一些稻草人儿，以便把他们打倒。我认为他很容易妒嫉，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我让他黯然失色。他只想标新立异，以便引起人们的注意。"他朝着我挥动着那篇文章说，"他应该对我们更好一些，我的意思是说他一向对我们很好，他一向很好，但这次却太过分了。"

尼克松的失意在很小的程度上是因为基辛格的异议，在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布什丝毫不采取行动。世界由于俄国从沙俄帝国败退下来而收益很大，但对尼克松来说，俄罗斯的虚弱是对安定的威胁，而不是什么好事。

当时，总统决定在他主要民主党对手要发表演说的同一天发表对外政策的演说。克林顿在1992年大选初期谈论外交事务问题是很聪明的。布什被布坎南的关于孤立主义的攻击和对他强调对外事务而不顾国内事务的批评激怒了，他在尼克松对他施加压力之前一直不重视俄罗斯问题。他拒绝听从尼克松关于骚乱和专制的告诫，宣称美国没有支持这种援助计划所需要的款项。总统对自己的机会关闭了窗户，却为克林顿的机会打开了窗户。

4月1日，在总统和他的挑战者发表演说的几个小时之前，尼克松巧妙地分别应付了斯考克罗夫特和竞选班子的领导人斯金纳打来的电话，两人都对这位前总统对现任总统的"政治阻拦"表示"衷心的感谢"，意在阻止尼克松对布什的进

一步批评。

尼克松感到满意，但对即将听到的连续两次演说感到担心："如果他们其中一人讲到和平队的话，那就是把我忘记了。"

11点多钟，布什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讲话，他说"俄罗斯和其他地方民主的胜利对我们有重大的利害关系"，并建议制定一个240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计划，分配在四个地区。工业大国出资110亿，形式为双边援助，包括商品信贷和人道主义援助，其中美国出资26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出资45亿，其中美国出资9亿；重新安排外债支付计划，美国不参与此项计划；建立60亿的稳定卢布基金，其中美国出资15亿。美国总共出资50亿。

布什又一次拣起尼克松说过的话，认为如果俄罗斯的民主改革失败了，"我们将在某些方面陷入一种比黑暗的冷战年代更危险的局面"。他还说，"无所事事的代价是高昂的，这些加盟共和国的变革标志着历史的特别时期，我们当前的对外资助额比本世纪任何时期都要高。"

他又有所防备地说："这不是新鲜事儿，也不是出于大选年的政治目的。"但这却来自前任总统的压力。

20分钟后，克林顿在纽约外交政策协会发表演说。克林顿知道他自己在讨论对外事务中处于不利地位，但他决定铤而走险。他发表了积极进攻的讲话，严厉地批评了布什对国际关系的处理方式。由于布什"未能带来冷战后美国参与国际事务令人信服的前景"，克林顿指出了一个基于民主和人权的对外政策的前景。

然而，在援助俄罗斯的问题上，克林顿的建议同总统的建

议非常相似。他支持西方援助计划方案，但却用令布什尴尬的外交备忘录获得了政治分："总统在议会中民主党的敦促下，在理查德·尼克松的指责下，了解到我在大选中提出了这个问题，终于……提出了一个计划。"

克林顿指责了布什，一下子就在对外事务政策方面获得了他所缺乏的信任度。布什需要拿出一个既达到尼克松希望的程度又不致激怒他的批评者的方案，从他相互矛盾的讲话中就可以听出他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例如，"资金的数额并不是非常大"，"我们承担的义务是非常非常可观的"。

尽管尼克松讲他不想观看电视演说，但他对我的谈话清楚地表明他已经看过了。

"竟没有提到一个管理这个一揽子计划的协调机构，"他说，"也没有提到免除债务或私人机构的倡议，这将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结果。我不能相信布什竟把这项工作交给国务院，不应该由政府去做。"他点动着手指说，"不应该由政府去做，贝克会把它毁了的。"

他停顿了一会儿说："他没有提到和平队，是不是？"

"我不愿意告诉你。"我回答说，"但他提到了。"

他蜷缩了一下身子说："啊，天哪！又是贝克。我们有了一次重大的历史性机会，而他们却在和平队的问题上把它给毁了，看在上帝的份上。克林顿是怎么做的？"

我告诉他克林顿作了一场攻击猛烈的演说，其目的在于证明自己有能力当统帅。在援助俄罗斯的问题上比布什更坚定有力，尽管他强调集体安全。

"这个家伙干得不错，只是胡扯了多变政策。"尼克松说，"我看不出他能主持对外政策，但你知道什么呢？布什和贝克

以外，任何人都会做得更好些。克林顿没有经验，而且会无所顾忌；但布什有经验，可他照样无所顾忌。"

各大报纸都载有两个决斗式的演说的标题。《纽约时报》上，威廉·萨菲尔在专栏文章中将他们两人作了比较，认为"克林顿略高一筹"。

尼克松同意这一观点。那天早晨，他用胳膊夹着报纸走进了办公室，从会客厅就向我打招呼，把报纸掉在了地上。"进来，"他一边跪下身子拣报纸一边对我说，"援助的事情已上电视节目了。"

我跟他进了办公室，看着他整理我椅子上的报纸，把它翻到萨菲尔专栏，用手指着它："你看到这篇文章了吗?"他问道，"他是对的。克林顿的口才确实好多了。布什可能在俄罗斯有较强的支持力量，但他并不热心。名人的事情就是这样。而且我注意到媒体取消了所有对叶利钦的报导，又转回去支持戈尔巴乔夫。狡猾的家伙们。"

同时，当局声称即使尼克松没有首先发表这种想法，当局也会提出一个一揽子援助计划。尽管宣布得迟了一些，当局解释说计划已经考虑了几个月了。斯考克罗夫特只是嫉妒地承认尼克松能提出这件事并把提供援助的想法传给大众，是应该得到赞誉的。除此以外，当局把这主意称作是自己的。

尼克松于是决定，如果报社问他对该计划有什么看法，他将赞同它的最初方案，但指出这是不够的。他认为这是给当局施加压力、推进计划的惟一方法。

尼克松的许多批评人士争辩说前总统执行备忘录和会议时心里只有一个目的：为个人恢复名誉。许多人认为，自从1974年离开总统席位之后，尼克松的主要动机不是对国家无

私的奉献，而是要求重新取得在政治和历史上的显赫地位。这尽管不是完全错误的，却是不公平的说法。

尼克松把他政治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用来赢得冷战。在重要时刻来临时，西方要保住胜利，不会再有什么行动时，尼克松开始过问了。他被一种要继续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作用的力量驱使着，同时，也期待着看到人们对他一生的不同评价有个较好的结论。

他喜欢引用温斯顿·丘吉尔曾对他说过的一段评论："我知道是什么东西让一个人保持青春，是权力。"尼克松在下台时期对权力和影响力的追求并不在于权力和影响力本身，而在于他要用权力和影响力来做什么。他自己恢复声誉是第二位的，但不是不重要的，因为尼克松的所作所为是代表着国家，因为他是根据自己认定是正确的事情才做，而取得的成果不可避免地会抬高他的声誉。指导美国政策本身已失去其意义；他在过程中所追求的是提高他的历史地位。

4月6日，尼克松到华盛顿去，向27个国会议员简单介绍了俄罗斯的局势。我们两天后谈到那次会见。

"我猛烈地抨击了解除债务之事。我知道我们一直都在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那里提供的大部分贷款将会被西方银行用来偿还对苏联的滞呆贷款，据我们所知，这已经根本不存在了。纳税人实际上停止偿还苏联债务。我们也集中在我们确实做得不错的一些领域，如交通及地下能源开发，这样他们可以得到一些真正的钱。我们也将在管理技能方面提供一些培训服务，他们对商业一无所知。

"我也谈到他们应该让这该死的事情脱离国务院的管辖，

他们将不再干下去了，我发现尽管贝克不愿意承担此事，但甚至现在还一直在为自己邀功。我准备继续谈这件事，因为这是正确的，而且因为这会逼得贝克发疯的！”

他笑着继续说：“我听说布什正考虑在戈尔巴乔夫下周来访时为他举行一次国宴。这是我所听到的最令人气愤的一件事！以前的非国家领导人受此殊荣的是而且也应该是温斯顿·丘吉尔一人。如果他们对戈尔巴乔夫那样做，他们就叫我搞不懂了。”

“他们不是已经叫你搞不懂了吗？”我说。

他眨了眨眼睛：“是的，他们已经这样做了。但我的意思是，他们将真正叫我搞不懂了！”

接着，尼克松讲述了一条有趣的、发人深省的历史上类似的事件：“你还记得赫伯特·胡佛吗？他在战后援助俄国和欧洲中做了一件多么伟大的工作啊！他不幸地在经济萧条时期担任总统，但看看他卸任后在国际上做了多么伟大的事。当然，他为政府工作；而我是和政府对着干。”

尼克松把自己和胡佛相比具有启示性。两人都在丑闻的阴影下离开总统席位，而且两人都在离位后保持多年不抛头露面，又都继而为以前的对手做建设性的工作。对尼克松来说，更有希望的是胡佛总统后期的活动使人们对他的历史评价更高了。

5月初，尼克松称之为“过时的伟人”的戈尔巴乔夫开始在美国为期两周的旅行，为他的新事业筹集资金，确切地叫做戈尔巴乔夫基金。尼克松很讨厌看到下台的苏联总统被里根等人友好地拥抱，并且所到之处受到热情欢迎。

“他们从未对可怜的叶利钦这样做过。”他5月6日对我

说,"从来没有。可是一谈到戈尔巴乔夫,里根就很容易被欺骗了。此外,里根之流争辩说是由于军备增长才促使共产主义的垮台。这是部分事实,但真正的原因在于共产主义的致命的弱点。里根和布什占尽天时地利。

"里根说'我信任他戈尔巴乔夫: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能够结束冷战的原因。'这种说法真是可笑的。外交事务和信任无关,而是与利益和实力相关。"他说道。

对于戈尔巴乔夫问题,尼克松是占尽天时地利的。5月13日,这位苏联领导人在纽约拜会了尼克松。看到里根等人对戈尔巴乔夫的欢迎后,尼克松对这次会见很担心。

"他太习惯于滔滔不绝地发表言论了。"尼克松在前一天向我谈论戈尔巴乔夫说,"我想他不会喜欢我要说的话。但另一方面呢,他是个认真的人,所以他可能会听。当然,他没有任何权力,也不会对任何事情有任何影响,所以我希望这不过是一次礼节性的拜访。再一方面呢,仍然有人要来见我,事情就是这样!"

会见那天早晨,尼克松准备前往纽约时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那我要去见你的朋友了!我发展了对俄罗斯进行援助这个思路,我认为是个很好的思路,我想通过你把它宣扬出去。"

他清了清喉咙:"西方国家政府受预算限制。西方的商人受机会限制。你怎么想的?我不知道。这种思想需要一些修正,但你已做了。"

几小时后他回来了,尼克松在办公室同我坐下,谈到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两人同是被免职的领导人,尼克松的影响力更大些。

"我很高兴见到他。"他开始说道,"他说的第一件事是'我读到了你在会谈中的演讲,我们有些不同意见,但在主要问题上我们是一致的。如果没有见到你,我会认为我的旅行是不圆满的。'"尼克松微笑着,"我告诉他,他不仅在俄罗斯历史上而且在自由史上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他对此表示赞赏,并坚定地说,他并不打算倒退。因此我告诉他,'如果你这么做,别告诉任何人!'他大笑:我想他认识到这是某种专家的忠告!"尼克松俏皮地说。

"我告诉他历史的馈赠是看叶利钦的改革是否能成功。戈尔巴乔夫明白这点:他说他希望叶利钦能成功,但将在适当的时候批评他,即在可能的情况下批评他。

"戈尔巴乔夫暗示,根据共产党的研究资料显示,有可能会发生另一场政变。我不同意,但只是倾听他所讲的话。你不能事事都猜测吧。

"他态度安然。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是重量级人物。今天没有一个美国政治家能比得上他们。你准备拿克林顿来同戈尔巴乔夫抗衡吗?拜托了。"他低声说道。

"戈尔巴乔夫看上去好多了,很放松,重新注入了活力。我发觉雷莎看上去也很不错。她还记得我1986年的访问。不管怎样,我挺高兴见到他,如果能表明'叶利钦——今天及明天的伟人——必定会成功'的观点就好了。戈尔巴乔夫从内心希望这个家伙会失败,但如果叶利钦下台,戈尔巴乔夫也会下台——我指的是历史性的。他是把所有这一切都发动起来的人,他要么收获胜利的果实,要么得承担后果。"

尼克松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与其说跟政策有关,不如说跟人格有关。他们两人都不掌权了,但又都渴望引起他们继

位者的注意。尽管尼克松的行动超出了冷战的意识形态，而戈尔巴乔夫还是停留在他自己的意识形态。甚至他的思想已经无可救药地毁灭了，他仍是一个无悔的共产主义者。尼克松最大的希望的是戈尔巴乔夫在会见后能更加懂得，美国领导人为什么愿意帮助叶利钦的政府而不愿扶持戈尔巴乔夫的政府。

尼克松的备忘录引发了关于对俄援助的辩论，两个月后，他再次到莫斯科去见叶利钦，了解改革的进展情况。5月29日，即他离开的前一天，我给他写了个便函，上面写着："'采集新闻不如制造新闻；当评论家不如当演员，'——温斯顿·丘吉尔。你再次把历史掌握在你的手中。"尼克松随身带上了这个便条。

直到6月5日他从巴黎打电话我才听到他的消息。他非常高兴说："莫尼卡！嗨！我们在巴黎，太漂亮了。我们的行程太疲劳了，我明天早晨9点要去见密特朗，我今天早晨上了'今天'电视节目，你看到了吗？"

我告诉他我看了。

"你喜欢吗？"他追问道。

我说我对他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印象很深。

"噢，是关于我在历史上的地位？是的，我总是喜欢这样的问题，因为我说'历史会厚待我，但历史学家可能不会，因为他们大都是左派！'我现在仍然坚持对他们这样说！"他大笑，告诉我两天后就会见到我了。

20分钟后，我的电话又响了："莫尼卡，好，我失眠，倒时差，所以想要多告诉你一些事。贝克企图破坏每件事。你不会相信的。我不能把这些都告诉你，但下个星期我会让你知

道"

尽管贝克耍阴谋，尼克松认为他的旅行很成功。他在俄罗斯总统访问美国前两个星期见到了他。他全面地看到了改革的整个进程及阻力。他挫败了贝克。

"他不让斯特劳斯去机场接送我，并且不让他为我举办宴会。"尼克松6月8日对我说。我坐在他的办公室听他发泄对国务卿的不满，"当然，不管怎样，他还是这样做了，使贝克气得发狂！那餐饭吃得太糟糕了，要让人们讲话就像要拔他们的牙似的，我不得不讲一些有关美国政治背景的东西来活跃一下气氛。斯特劳斯对我们很好，他支持我们的援助观点，但我不知道他会在这儿呆多久。如果他离开了，他们会找一个年轻商人类型的。"

他把注意力转向叶利钦："他轻视戈尔巴乔夫。把他豪华轿车的特权取消了；那是对名人的一次巨大的讽刺。"尼克松发出顽皮的笑声，"他能控制屋子里所有人的情绪，他真是个精力充沛、感情丰富的人。他能在BC时——即'政变之前'——把人看清楚。他是个杰出的政治家，能奖励那些支持他的人。他说我是俄罗斯最好的朋友。我告诉他万一俄罗斯发生紧急情况——比如，一旦发生暴乱——我会尽力让白宫给予支援，但只限于经济和人权方面，而不是军事上的支援。

"他把贝克看透了，但我想他跟布什关系不错。我告诉他如果他想参加下一次竞选，就不要告诉任何人，他笑了，他很有勇气。"

他在椅子上抬了抬身："莫斯科完全不景气，那里一片灰色。计划很糟，我很累，但我们得全力以赴。我很吃惊我们做的都给报导了；贝克对新闻界封锁，因为他是个撒谎者，而他

们却听他的。

"不管怎么说，上次和戈尔巴乔夫以及这次和叶利钦会见后，我被说服了，俄罗斯人现在的政府比戈尔巴乔夫的政府要好得多。叶利钦可能不是完美的，但他相信正义的事。我准备对他下星期访问华盛顿一事起草一些建议，我希望迪米特里转交给他，我会拿给你看的。"

尼克松的出访完成了一项重要的任务：他帮助叶利钦为那个月末的国事访问创造了条件。在他因这次出访而接受采访的所有讲话中，尼克松明确地表示，叶利钦不单单是又一个向美国讨钱的二等穷国的受困领导人，他是以民主俄罗斯的希望以及和平与繁荣的伙伴的形象前来美国的。尼克松强调，启动长期拖延的一揽子援助计划不是出自于利他主义，而是出自于实际的需要。

在送给迪米特里·赛姆斯的备忘录中，尼克松建议叶利钦要利用对美国国事访问的机会，表现出自己坚定而且又极有性格魅力的政治家的形象。出于为叶利钦考虑，他准备了一些演讲纲要，强调了俄罗斯第一个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总统对美国国会讲话的意义。尼克松还建议说，叶利钦应该强调与美国的伙伴关系以及如果改革在俄罗斯取得成功将出现和平和繁荣的巨大可能性。

叶利钦是否会采用这些建议是另一回事；尼克松只是想对这位俄罗斯总统发出信号，即他所努力给予的支持超过了总统和国会。

6月14日，布什给尼克松打来电话。尽管布什最关心的是来自罗斯·佩罗特的竞选威胁，尼克松在三天之前和他见过面，尼克松还是利用这个机会安排他和叶利钦的会见。备忘

录还继续有效：现在尼克松对总统直接发布指示。

“啊，这就是我对布什所说的话。”他在打完电话后对我说，“我来告诉你详情吧。我在通话中口述了备忘录——整个儿的备忘录——明天我会让你看。他10点30分打来的电话，我们交谈了25分钟，在他的要求下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这是海湾战争以来最实质性的谈话。”尼克松显然很高兴，“我们谈了有关叶利钦的情况，我严厉地批评了贝克的事情。我对他说叶利钦喜欢他，而且会在他这个星期到来时给他一些惊喜，但他不喜欢贝克，而且不愿意通过他来工作。布什没有说话，但他有必要听下去。贝克是他的盲点。”

6月16日，美国和俄罗斯的总统一同出现在白宫，一同站在玫瑰园里。布什宣布说他们已经达成协议，把战略武器削减到第一轮美苏削减战略武器会谈的规定水平之下，成立一个“高级工作小组”，探讨如何共同制定一个防止弹道导弹攻击的全球防御系统计划。

叶利钦强调了这次协议的意义，并且宣布说：“我们将不相互交战。”

尼克松对这一宣告的结果感到高兴：“这很好。我想如果他能充分利用这个协议，就能从中得到很大的方便。但我要说叶利钦看上去很有活力，比布什健康得多。”

第二天早晨，布什和叶利钦这两位总统对美苏最高贸易会谈发表讲话，布什利用这一机会表示赞同俄罗斯、新兴欧洲民主和公开市场的自由支持案，即自由支持案。

“我将利用我能做到的任何方式敦促美国国会支持自由支持案。”布什说，“让我对美国人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并不是因为它对俄罗斯有利才支持自由支持案的。我的观点是自由

支持案将有利于美利坚合众国,有利于世界和平,有利于民主和自由。"

尼克松继续对此表示满意:"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他从白宫拿到一份总统言论副本之后,这么对我说,"首脑会晤进展很好。我想,这在短期内对布什会有帮助的。叶利钦透露俄罗斯掌握了一些有关越南战俘命运的信息,这也对布什有利。对他来说,这是最新消息。"

"这也证明,冷战的战争不像苏联人宣称的那样只是国家解放的战争,"我说,"而是由苏联发起的共产主义侵略战争。"

"完全正确!"他说,击了一拳,"哦! 这不是挺有道理的吗? 我们说的一切都是对的,从阿尔杰·希斯一直下来! 现在看看,叶利钦打算在议会上讲话了——这是自由选举出来的总统第一次这么做。我要你过来,和尼克松夫人跟我一起看一看。这是非常重要的时刻;我不想让你错过。"

我跟着他的轿车来到他的府邸,从前门跟他一起走进去。尼克松夫人出现在门廊里,我们三人乘电梯来到三楼他的书房。尼克松夫人叫前总统帮她把直靠背椅子拉过来,好让她坐得舒服些。

接着,她从沙发上拿起一个枕头,向我走来:"莫尼卡,坐起来一下。迪克每晚都这样帮我把枕头垫直。"她一边说一边在我背后重新放好枕头,"好了,这样不是更舒服一些吗?"尼克松站起来,在她椅子后背前面也放了一个枕头,然后到酒吧去,拿了一杯日常喝的可乐过来。

"有没有人要可乐的? 帕特?"

我们谢绝了,尼克松于是坐到长沙发上,在遥控器上面摸索着,好像不知道哪个频道在播新闻电视节目似的。他找到

后，马上打开，看看电视是不是在现场直播。可是却没有。

"去他妈的狗娘养的！"他说。

尼克松夫人插话赞成："太无耻了！"

叶利钦开始讲话，尼克松入了迷。俄罗斯总统谈到美国和俄罗斯的新的合作关系、新的裁减武器的协定，以及对真正的民主和在那些只知道镇压的地方实行市场改革的承诺。

"他是个有魄力的家伙。"叶利钦在继续讲话时，他说，"他的讲话很有效，他还是个很不错的演员。"当叶利钦说的话在尼克松看来不会得到适当的热情反应时，他对着电视向国会议员大声叫喊着："欢呼，你们这些笨蛋！"叶利钦讲话结束时，议员们站了起来，他也站了起来。

"看在上帝份上，他们应该站起来给他热烈鼓掌。"他说着，在家里鼓起掌来，"这讲话真是伟大的胜利。"

"我同意。"尼克松夫人说，"迪克，我从来没想到我们能够见到这一天，能看到一个自由选举出来的俄罗斯总统站在我们的国会议员面前。"

"我知道。"他回答说，"莫尼卡还年轻，可我们已经一把年纪了。我也没想到我们能看到这一天的，帕特。"前总统送前第一夫人到电梯边，然后转过身对着我。

"国会最好通过这个支持自由案。"他说，走回到房间里，"叶利钦一路到这来，在核武器问题上作了让步，他最好为此能得到些什么。"

那天下午迟些时候，布什和叶利钦在东厅举行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布什不冷不热地在自由支持案上签字，还禁不住抗辩着："我们已经准备好把这一计划尽快往前推进。……我们正把这事当成重点。我们也有很多国内问题，我们要把

它们一直往前推进，如经济增长，对城市的援助等。所有的事我们都能做到，包括通过这项自由支持案。”

布什又一次在回避。国内问题控制着总统竞选活动，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援助计划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尼克松知道，为了从国会得到必要的支持，那建议必须自立才行。布什由于害怕使自己看上去过分注重外交政策，便把对俄罗斯的政策和他国内的倡议联系在一起，由此降低了其重要性。

加拿大首相布赖恩·马尔罗尼 6 月 24 日打电话给尼克松，再次向他保证，加拿大将对俄罗斯的改革计划捐助 2 亿美元。尼克松很珍视他和马尔罗尼的友谊，他经常跟他谈外交方面的事宜。当马尔罗尼听说尼克松关于援助俄罗斯的备忘录后，他热诚地支持尼克松的主张，最终成了叶利钦最重要的拥护者。

“马尔罗尼的捐助非常大胆。加拿大并没有太多钱可供挥霍的，但是，至少他看见了要做点事情的重要性。”尼克松说。

布什在援助俄罗斯方面不积极，尼克松为此感到很沮丧，而这种心情最近更是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总统在首脑会议上没有听从他的建议，在这问题上没有起到真正的领导作用。7 月初的七个工业国集团的年会同样为布什提供了一个类似的机会，让他说明美国和新成立的俄罗斯的关系，可布什再次错过了。

这种失望的心情促使尼克松开始考虑他的第十本书——也是最后的一本书。总统竞选陷入了重要但却目光褊狭的问题讨论中去。现任总统和他主要的民主党竞争对手虽是处理危机的能手，但却没有眼力。在竞选活动中，美国外交政策成

了一个孤儿，对俄罗斯也没什么可说的内容了。选民们似乎也很生气，很失望，但不敢确定这应该怪谁。尼克松感觉到有一种思想混乱及缺乏一致的精神。尼克松正在寻求其意义，而且，他想把它说出来。

在最初期，他把《超越和平》构思成他最富哲理性的作品。他打算谈谈具体的外交及国内政策问题，可他想就20世纪后期作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再通过这深层的讨论把它们表达出来。他认为，美国精神带来的悲观、痛苦和冷淡的情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这种精神存在一种越来越尖锐的危机。美国社会已经发展成绵软、没有反应、沾沾自喜、秩序混乱、不顾一切地追求物质享受的社会。

由金钱利益控制的松散的政治体系，投票人数少以及自愿放弃责任，并把它让给更高的权力机构——不管是联邦政府还是联合国。这些就是政治、社会形势严峻的症状。

尼克松看到，精神上需要可以信仰的东西，这种贪婪的精神饥渴正席卷全国。这种饥渴的证明随处可见：海湾战争——短期、简单、危险最小——瞬息间便把整个国家凝聚到一起了；佩罗特的600万志愿者和无数其他的支持者证明，美国人天生就是缺乏感情的。一旦有个有望获得成功且有吸引力的选择，人们就会去参加。

美国人需要指导，尼克松想，但却是一种可以为他们提供人身自由的指导。他认为，他可以把需要力量、活力、国家团结及个人责任感的信息传递给国家里其他的人。他相信，精神真空就存在于这么一种普遍的态度中，那就是，作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我们有权利过物质财富毫无限制、自由度不受约束的生活。可是，尼克松指出，政治自由并不意味着没有

责任。

自由对人们的要求更多，而不是更少。它要求我们判定我们的行为、监督我们的制度、犯我们自己的错误并且改正它们。民主政体会强迫它的成员自己作出决定，然后容忍所产生的后果。自由要求个人和集体的纪律、无情的自省以及一个基于好意和道德基础上的更高层的使命。由于人类是很容易犯错误的，所以，放弃自由比得到自由更容易。

他想说的问题很简单，但可能无法回答：除了战争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东西能够把整个国家的人凝聚在一起呢？他曾经说过："战争带来了人类最好的和最坏的东西。真正的和平却只会带来最好的东西。"和平时期——一个不是标志着压倒一切的军事或思想冲突的时代——应该是个国人非常团结的时期。

然而，我们没有走到一起来，而是分开了。如果美国在冷战末期是在忍受着一种使命危机，那我们的新使命是什么呢？

尼克松相信，传统上，美国发动战争和促进和平都是为大多数人提供可能的最好的生活。如果民主确实是在发展进程当中，那么，那个任务是不是也在结束过程当中呢？正如尼克松所问的："我们那时对战争的威胁反应很热烈。我们现在对和平承诺的反应能不能也像过去那么热烈呢？"

和平承诺意味着更好的物质生活——更好更多的工作、更好的教育、更少的犯罪和毒品、更干净的环境、有效地响应人民的政府和更繁荣的社会。但是更重要的是，和平的承诺意味着更好的精神生活，而在这种生活中，信念指导着国人的生活。

在冷战末期，我们知道我们是个强大的国家，可我们是个

好国家吗？尼克松认为，政府应该促进而不是迎合最低的普通标准。在美国精神能够恢复以前，美国人民需要重新获得对他们的体制的信念。尼克松知道，要说明这一点，对他来说会很困难，因为许多人把水门事件当成了动摇那个信念的危机，但他不会从这一挑战中退却。

我们的自我专注已经在发出强有力的警告信号：贸易和政府赤字、不断上升的犯罪率、崩溃的基础结构和教育系统、恶化的环境以及行将消失的民族精神。繁荣滋生了满足感，使意志衰退。尼克松认为，美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然而，它要想一直保持其非同寻常的地位，我们现在就还需要某些东西。

布什政府没有能够面对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大的外交政策的挑战，这使尼克松坚信，他的观点是对的。美国人像他们的领导人一样飘忽不定。由于没有了稳定性，政治生活和民族生活需要意义，这就显得越发地紧迫。尼克松开始考虑一个计划，既要谈民族团结的衰退，又不会引发对自己的过分批评，因为他也曾经在这衰退过程中起了一定的作用。《超越和平》一书框架形成时正是 1992 年夏天，在援助俄罗斯备忘录已经开始进行及《只争朝夕》获得成功之后。

7 月 27 日，他叫我查找一份 1971 年他在堪萨斯城的讲话稿。他在讲稿中大略谈到了一个正在出现的以西欧、日本、中国、苏联和美国的力量为基础的多元世界。这份讲稿很有意义，因为总统指出了五个力量中心，而不是通常说的两个；他已经把日本、中国和西欧从只是超级大国配角的地位提高到凭其本身的实力成为强国的地位。那时很少人谈到这种区分的重要性。“连基辛格都没有看到这点，或者说不想去看到

这 -点。"尼克松说。世界继续维持着在军事上两国对立的局面,可是,根据1971年尼克松的看法,将来在经济上将会多元化。结果将会需要更加复杂、更加微妙的外交政策,这种政策应该超越两国形成的世界平衡。

我找到了讲稿,他从我手里接过去,在空中挥了一下:"你看到这个了吗?"他问,"这份讲稿好极了。你要远见吗?这就是了。而新闻媒介没有人欣赏这个。我知道他们不愿给我什么,可是,我还是不明白他们怎么能够忽视这个。然而,关键在于,你见过什么像远见之类的东西从白宫传出来过吗?"他回答了他自己的问题,"没有。而原因就在于他们没看见这个。他们看问题不会看到比自己的鼻子更远的东西。他们对世界的运作或者更大的趋向没有一点概念。如果俄罗斯成功了,这对中国人和越南人是个怎样的信号呀!可是,没有,他们没有看到。同时,世界却在他们周围瓦解了。"

7月最后一天,斯特劳斯打电话给尼克松,叫他用自己非凡的影响说服白宫的共和党人投票援助俄罗斯。尼克松振作起来了:"这家伙在努力,他找到我头上来了。好吧,我看看我能做些什么。"

他本来已经计划好那个星期要到华盛顿去的,接着便决定不去了:"记者们会问有关布什和竞选的事,我现在不想发表任何政治言论。"他在8月3日对我说,"他们对我说的关于援助俄罗斯的事不会提一个字的。政客们会把它们压下来。"

同时,贝克却在采取措施来预先制止尼克松的任何行动。他为8月5号的《纽约时报》写了份特约稿件,为支持援助俄罗斯的计划辩护。尼克松感到很苦恼,既赞许贝克写了这稿件,同时也知道他这么做是为了削弱尼克松在这问题上的

影响。

“你相信贝克的文章吗?”那天早晨很早的时候,他这么问我,“这太夸张了; -点热情也没有;没劲。”

“可是他至少写了,”我说,“而且,他至少提到了你。”

尼克松眉毛耸了起来:“是的。我根本无法相信。”

几小时后,斯考克罗夫特打电话来,叫尼克松签署 -封几位前总统给国会发言人托马斯·福利的信,旨在投票以前就援助俄罗斯的计划表示支持,投票计划在第二天举行。尼克松很苦恼。离任后这几年,他工作很努力,就是为了超过他的继任者,他不愿与他们为伍。然而,这问题很关键,他心软了,在联名信上签了字。

“这是很紧迫的工作。”他说,浏览着信的内容,“可他们至少在信里用了我的一些话。但是,真的,居然等到这问题的最后一刻? 多职业化的一群人哪!”他把信递给我,我把信传真给杰拉尔德·福特的办公室,让他签名。尼克松叹了口气,“如果援助俄罗斯的法案明天没有通过——这四个总统的联名信也帮不了什么忙——这可能就足以推翻叶利钦政府了。”

援助法案在8月6号通过了,尼克松松了口气,马上对此进行了分析:“这以多数票通过了,这该死的问题并没有引起什么争论。可是贝克知道这会通过的,这就是他写特约稿的原因。你该不会认为,他明明知道这通不过,还在那支持它吧,你说呢? 请注意,他坚决要挫败我们,好使我们得不到任何赞誉。那封四个总统的联名信是个骗局。”

7月23日在和前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的会谈中,尼克松得到了一些消息:贝克将离开国务院,以竞选班子领导人的非官方身份去开展布什已经延迟的再次竞选总统的活动。

贝克的新角色意味着尼克松和布什的接触会更少，可是，正如他跟黑格所说的："让贝克去组织竞选活动的最好的理由，就是因为这能使他远离外交政策！"

由于布什再次当选的可能性很小，尼克松知道，贝克永远也不会再担任国家外交政策方面的头了。劳伦斯·伊格尔伯格，一个尼克松—基辛格外交小组的老成员，代替了他，虽然伊格尔伯格得向贝克汇报进展情况。然而，知道由一个现实主义者在掌管此事，尼克松觉得舒服了一些。

"我得考虑一下该如何最有效地使用我还剩下的时间。"8月31日，他说，"这可能意味着再到俄罗斯去一趟。我知道，我说过我很可能回不来了。可我要对那里的形势一清二楚，就得呆在那。叶利钦能维持下去，但会很艰难。援助法案通过了很好，可他们现在在做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做。"

他叹了口气："美国曾经是个伟大的探险家，可现在再也不是了。大问题似乎不再显得重要了。可这就是我们实施这新的计划想要得到的，对不对？我希望我们能够充分做到这一点。我不想做没有意义的事情。我没有跟任何别的人说过，因为我自己还不确定我们能不能解决。可是人民需要推动。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

1992年10月的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会上，他们没有谈到外交政策，这也增加了尼克松的烦恼。尼克松认为，这个疏忽对克林顿很有好处，因为他没有被迫去讨论他不熟悉的问题，但对布什却很不利，因为他公认的长处是在国际事务上，而且这也严重损害了美国人民的利益，因为他们需要知道，未来的首领是不是负责任的人。可以预料，尼克松因他们对外交政策，特别是对俄罗斯没有予以关注感到很愤慨。

"候选人没有谈必须谈的事情。"他在10月2日这么说道，"而像克林顿这样的人，真的谈到俄罗斯的时候，他便用60年代的那个观点一句话带过这个问题，那就是'如果我们大家都互相了解了，那世界也就和平了'。前苏联不需要民主队伍——所有这些小政治科学家在那跑来跑去的，教他们怎么投票！不。民主是自然而然的，它自然会产生的。自由市场不是天然的。它们需要自由市场队伍。

"他们应该任命某个人，像马歇尔计划的保尔·霍夫曼，某个年轻而有活力的人来协调援助计划，使它成为优先要考虑的事。不是对外服务的那种！他们是很好的政治官员，但却是很糟的经济官员。"他顿了顿，放低了声音，"哦，如果你打算做什么有争议的事，那就一直做到底，不要半途而废，因为不管怎么样，你都是要为此承受压力的。就像在柬埔寨一样，不管怎么样他们都会怪我们的，所以，我命令他们把六个共产党的庇护所全取消了，而不是只取消两个。而那一年倒没有受到攻击。

"还有一件事，"他继续说道，"那些疯狂地要出口民主的人是不负责任的。在那点上，我从来都没有过雄心。我们因为跟专制政府打交道而受到批评，但我们是对的。有时候，你就得跟两种罪恶中较次要的一种打交道。"

10月9日，我们在讨论如果尼克松也是候选人的话，他的做法有什么不同时，他继续坚持这一观点："我会坚决支持援助俄罗斯计划，说'我知道这不受欢迎，但还是必须这么做。'看到《纽约时报》就使我恶心翻胃——《纽约时报》，看在上帝份上——它正为波斯尼亚招募军队。布什允许太多右翼力量了。他们在谈第二任期间要改变队伍，但他们首先得获

得胜利才行！”

尼克松认为，布什没有抓住俄罗斯这个问题，失去了一个攻击克林顿的主要机会。如果布什占据了领导地位，他就会得到很有意义的政治收益。可是，他在克林顿的势力范围——国内政策上玩手腕，欺骗了自己，也欺骗了国家。

正如布什在外交政策上的失败使他失望一样，克林顿的经验不足也使他感到很害怕。在“真正的世界是怎么运作”的这个问题上，他没有受过一点培训，对学识表现出来的兴趣也不怎么足，还让自己被一群同样被国内问题预先占据头脑的顾问们包围住了。在克林顿的政府里，外交政策很可能会被危险地任之漂流，虽然是因为疏忽，而不是处理不当。但是，既然布什拒绝接受尼克松的建议，也许克林顿还能被调教一下，并且确确实实受到影响。

1992年克林顿当选的那一天，尼克松对当选总统提出了第一个提议。他放弃了倾向布什的行为，知道自己如果要和克林顿取得更大的成功，就应该早点为合作开个先例。他亲手写了张便笺给克林顿，寻求交流的直接渠道，对他出色的竞选表示祝贺，并在竞选中克服了逆境。

通过在选举后马上接近克林顿，尼克松希望能和他建立积极的工作关系。他知道，在大多数国内问题上，由于他们在政治上站在对立的两面，所以，他的影响也会很小。然而，在外交政策上，他动摇克林顿的力量可能会很大。

克林顿是否会在自己的政府里选择负责任、有经验的现实主义者来担任外交政策上的重要职务，他对此并不抱太大的希望。11月6日，他说：“在外交政策上，这家伙太没有经验了。叶利钦打电话向他表示祝贺时，他已经从其头顶往下

观察了。这就是为什么他要任命像参议员萨姆·纳恩或者参议员戴维·博伦这样的人到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去任职的缘故——也就是人品好、负责任的人。还有，"他说，手倾斜着，"一些我能影响的人。沃伦·克里斯托弗太弱了。如果他能当国务卿，那就是上帝在帮助我们了。这是前国务卿赛勒斯·万斯那一帮的——不负责任的人。克林顿很可能会倾心于我，可是我明白，他把卡特当成非正式的顾问，一直在拜访他。他想证实卡特的外交政策，使自己的新民主方式能够脱颖而出。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来拜访我。胜利后的共和党人一般都比民主党人更宽宏大量。他们在玩强硬的手段。肯尼迪和约翰逊从来没邀请过尼克松夫人和我到白宫去过。从来没有。我一点也不指望克林顿会那么做。如果他做了，我会很吃惊的。"

第二天，尼克松为克林顿找到了一个机会："俄罗斯人需要马上解除债务负担。财政部长尼古拉斯·布雷迪忙于保护他那些该死的银行家朋友，俄罗斯需要一笔桥梁贷款。如果俄罗斯垮了，损失是算在布什账上的。克林顿可以怪罪他。坦率地说，他们应该得到贷款。"

他咬着牙："而卡特要去俄罗斯！对俄罗斯，他什么也不懂，叶利钦也知道这一点，可是他也得见他，因为他要和克林顿合作。我要建议叶利钦见见他。可是，使我烦恼的是，他们把这次访问上升为国事访问了——因为卡特呆在国务院。想想我自己吧，在这件事上，我不能让别人认为我在插手克林顿政府的政策事宜。该死的新闻界会说：'尼克松在强行挤进去。'"而这正是尼克松打算要做的。他不想让事情看上去好像是前总统们都在一窝蜂地拥向莫斯科，可是，形势紧急，得说服他把自己的顾虑放置一边，再次行动，把自己放在新任总

统的外交政策导师的位置上。

11 月 19 日，他给《纽约时报》写了另外一篇特约稿——“节省和平效益”。这篇文章又是一次对当选总统和他的外交政策队伍的警告。文章开头就奉承克林顿，高度评价了他积极地讲述了转折时期的许多重要问题。但是，他用俄罗斯援助备忘录里的口气继续说道：“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重要的问题却只得到最少的重视。”

他敦促要马上采取行动，重新安排债务的支付计划、实施桥梁贷款和私人投资。“这里面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尼克松问道，“如果叶利钦没有垮台，自由和民主在俄罗斯取得成功的话，我们就会生活在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里。我们也会生活在一个更加富裕的世界里。……我们会生活在一个更加自由的世界里，因为，民主和自由市场在俄罗斯的成功，就为中国等国家树立了一个榜样，可以去效仿。”

他争论说，尽管克林顿政府会依赖和平效益来支持其国内计划，但如果俄罗斯的民主实验失败的话，钱就拿不到了，我们又会被迫发起一场新的冷战。这个论点是很熟悉的，尼克松重复了无数遍，可是他现在有了个新的听众——比尔·克林顿。

尼克松还决定第二年 2 月再次出访莫斯科。如果前总统在莫斯科和俄罗斯总统会面的话，克林顿就会发现，要忽视尼克松几乎是不可能的。“你会很高兴知道，假设叶利钦没有垮台的话，我已经决定明年初带你到俄罗斯去。我想，他也不会垮台的。巴黎、莫斯科、基辅——你每天都得记日记。可这是件苦差事；你的工作将会很辛苦。你得感谢朱莉。她使我确信了今年是妇女的年份！”

他笑了："你这么年轻，有这么多东西要看。二战中我周游了世界，还看到新苏格兰！可是，45 年前，我和赫脱委员会一起去的才是真正的出国。那时，当然是以副总统的身份去的。可你要记住，大多数去旅行的人都认为，这将会像是郊游一样。而我可不会。准备工作吧。"

11 月 27 日，感恩节第二天，我给在家里的尼克松打电话。

"莫尼卡？请等一下。"我听到他走到立体声音响前，把音量关小了一点，"对不起。我在听一些圣诞音乐的磁带。好了，先说说你的感恩节过得怎么样？你知道，我喜欢传统的食品，特别是填料食品和新鲜的越橘。我们和孩子们一块儿到无线电城去了，他们开了场舞会，我们在特丽西亚家吃的午饭。戴维·艾森豪威尔（他的女婿）是个电影迷，他有'内圈'的带子。"

"关于斯大林的？"我问。

"是的。拍得不错。朱莉说，'莫尼卡去俄罗斯以前必须先看看这个。'里面有爱情故事，但还是挺好的。"

"你知道，我下星期要到伦敦去作一次演讲。朱莉会跟我一起去，那一定会很好的。这演讲不供发表的，这意味着我在上面花太多工夫了。可我确实计划要好好谈谈援助俄罗斯的问题；如果美国人对这不予以关注，也许英国人会的。"

12 月初，尼克松把这个信息带到了大西洋彼岸，回来时感到很满意，英国支持为俄罗斯民主进程作出努力。12 月 8 日，他给我打电话。

"演讲太困难、太困难了，特别是我们这些人中没有讲稿就演讲的。在学校的时候，我演过一些戏剧——我演过的最

重要的角色,就是在约翰·德林克沃特的《手里的小鸟》一剧中的旅店老板这个角色——我得把那些台词背下来。对我的演讲,我也能背下来,可听起来却不像是已经背下来的样子。我认为,你越是像谈话一样,效果就越好。英国国会议员乔纳森·艾特肯说,我在给伦敦的高层团体演讲时,效果特别地好。我没看讲稿,把重点放在俄罗斯问题上。那是很关键的。"

"我就C-SPAN问题和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见了面,他对南斯拉夫很好,真见鬼。他说,我们应该轰击塞族,因为他们是侵略者,我对他的看法再同意不过了。他们可能会把我叫做疯狂的轰炸者,可我认为,你跟独裁者打交道的时候,他们理解的惟一的事便是武力。我本来是可以轰击塞族的。头脑里我对此毫无疑问。那里的政府机构看上去并不强大。他们跟南斯拉夫不和是因为伊格尔伯格和斯考克罗夫特的关系。可这真令人震惊:40万人就要死了。如果将死的是犹太人,而不是穆斯林,那会怎么样呢?这真他妈的是双重的标准,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有两种选择。其一,我们就说我们是中立的,可是实行禁运的话,我们其实是站在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的那一边,也就是塞尔维亚那一边了。我们应该解除该死的禁运。其二,我们必须把还活着的人从塞尔维亚人那里轰炸出去。"

在俄罗斯及前南斯拉夫的战争问题上,政策方面没什么动静,这继续折磨着尼克松。波罗的海周围的国家脱离前苏联时,布什拒绝承认它们,还允许共产党当政的塞尔维亚人去蹂躏他们的邻居,对俄罗斯的民主转化过程又不支持。这些情况已经表明,他缺乏强有力的、有原则的领导才能。严重忽略了大大小小的问题使布什招致了历史性的灾难,也马上给

新总统带来了挑战。

如果克林顿还明智的话，尼克松想，他就会尽快采取行动，挽回因布什的失败引起的损失。在前南斯拉夫撤消武器禁运，可以使地面武力趋于平衡，美国在援助改革这方面可以在国际上居领导地位。这是克林顿在国际上树立形象的机会，尼克松于是便采取行动，要帮他好好利用这个机会。

12月22日早晨，前总统和我会面。他显然很沮丧，因为克林顿既没有就支持叶利钦一事发表讲话，也没有指出俄罗斯援助计划是个重要问题。

"我得到俄罗斯去。俄罗斯人应该意识到，跟我谈话对他们是有利的，特别是在西方都没有别的人跟他们谈话的时候。

"当然，你可以跟叶利钦会面，大约15分钟，去感觉一下他的吸引力。那时我就应该单独跟他呆上好一会。我要你在重要会谈中详详细细地作记录。我们要见每个人。"

到1993年1月初，叶利钦和尼克松在莫斯科见面已经定了下来。尼克松受到了鼓舞，但很谨慎："国会抱怨叶利钦在亲近西方上做得太过火了，而且放弃了美苏削减战略武器会谈的库存储备。"他在1月2日那天说，"他也许不想见我们，尽管我认为他应该见我们，因为我是他在西方的惟一的真正的朋友。"

我们计划出发前三天，尼克松和我到华盛顿去见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弗拉基米尔·卢金。他简单地向我们介绍了一下改革的进展和国内政治形势。我们还跟克林顿派出的特使斯特罗布·塔布博特见了面，他简单给我们讲了一下政府的立场。塔尔博特离开房间后，尼克松告诉我："我很失望，他对美国—俄罗斯关系的细节这么关注，就像防止核武器扩散一样，

倒把更广阔的局面给漏掉了。如果民主和自由市场在俄罗斯失败了,你就可以把核扩散问题忘了。要紧的事情先做。我们在担心那种事以前,还是先帮忙把民主稳定下来,把经济从厕所里救出来吧。"

他摇了摇头:"我一直在努力,让他去看山顶上的事,可他却一直要往下滑回细节上去。克林顿所有的人都是注重细节的。哦,至少他们不会给我们的旅行带来问题。"

"先生,"我说,"跟塔尔博特谈话时,你说你在这次旅行中不会批评克林顿,这其中还暗含了这个意思,那就是,如果克林顿到时没有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你也还会追随他。"

尼克松握紧了拳头,一拳砸在扶手上:"和一个民主党总统,我更有自由这么做,我会的。"

尼克松认为,听取"政府路线",向那些政府机构的人保证,在他和俄罗斯人会面时,不会与"政府路线"相抵触,这是很关键的。和塔尔博特的会谈是个礼节性策略,为的是给克林顿时间,让他考虑考虑,尼克松回来的时候,他该怎么跟尼克松接近,而且,根据尼克松的发现,他该进一步采取什么措施。

尼克松知道,俄罗斯人民垮不了的,但他对他们那尚属摇篮中的民主把握不大。要不俄罗斯成为民主国家,用贸易把它和前帝国的大多数国家联系在一起;要不,它就会成为专制主义国家,和那些地区一样,被捆绑在国内矛盾当中。如果后一种形势发展下去,那接下来的好几十年,对西方民主国家来说,都是很丢脸的事。

这样,尼克松又一次去了俄罗斯,这次,我跟他一块去了。

快到莫斯科机场的时候，小飞机猛然下落，接着就突然快速地降低高度。我看了尼克松一眼，他特别不喜欢坐飞机。他的两只手都靠在扶手上，指关节很苍白；他两眼盯着底下寒冷的地面。飞机窗外，暴风雪狂啸着。我们又开始另一阶段的下落时，我看到他的下巴绷得紧紧的，脸都变苍白了。我们私人飞机的着落装置最终触到结了一层冰的跑道，这时，尼克松欣慰地闭上眼睛，把手从扶手上放了下来。

“他们有没有戴帽子？”他问，打破了飞机上的沉默。这个问题涉及外交礼节。

“先生？”我问道。

“帽子，”他重复道，“他们有没有戴？”

我朝窗外看去，飞机越来越慢，最后停了下来。正是2月9日下午早些时候，雪在不紧不慢地下着，气温降到了零下。在柏油跑道上，围站着几个俄罗斯官员，包括外交部长安德雷·科兹雷夫，俄罗斯新闻界的成员和迪米特里·赛姆斯。他们都戴着帽子。

尼克松很快把自己的浅顶软呢男帽戴在头上，拉平了大衣，清了清喉咙，然后步下舷梯，跟接他的主人们打招呼。凯西·奥康纳，他的行政助理约瑟夫·克劳利，他的私人保镖，还有我，跟在他身后，我们大家都是第一次跨上俄罗斯的土地。寒冷的天气迫使我们只是用俄语和英语简短地打了招呼，然后便一个接一个钻进订好的政府轿车里，尼克松的ZIL豪华高级小轿车在我们前面，我们便开始朝莫斯科进发。

我们经过了俄罗斯的白宫，接着是国会的立法大楼、克格勃总部、宏伟的布尔什剧院。2月份正是俄罗斯的深冬季节，除了红场照明用的红星星，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种单一的色

调里。

俄罗斯政府邀请我们在列宁山上的主要宾馆下榻，这里可以俯瞰整个莫斯科。40年代末期，为了外交和社交的缘故，斯大林兴建了这个宾馆。宾馆的总体结构重新装修过，但还保留着原先的韵味：高高的天花板、游乐室、宽大的楼梯，还有私人会客室。我们走进住的地方时，尼克松说着俏皮话："这真是地狱。可我认为斯大林从来也没想到要让一个冷战的老斗士在这里下榻。"

我们四个人住在宾馆的二楼。尼克松在大楼中间住了一套宽大的套房，其余的工作人员住在离大厅远些的那一头，自始至终都在三个受过克格勃训练的俄罗斯政府官员的视线范围之内，他们给我们提供额外的保护。

虽然尼克松表示反对，但是，我们到达的当天下午，他们就安排了一个俄罗斯官员跟他会面。他又累又憔悴，不想见任何俄罗斯人，想等到恢复过来，并且有时间再看一看他的简略记事本后再说。尼克松已经80岁了，尽管他很健康，很强壮，也很有活力，但他需要相当多的休息。他告诉我："我一直都觉得国际旅途非常辛苦，我上了年纪，就更受不了了。所以，我只有在我认为重要的时候才出国。只要我还能做，我就会去做。"可是这经常都是以非常危险的劳累作代价的。

然而，我们还是去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大楼会见了弗拉基米尔·洛博夫——叶利钦政府的工业部长。我们步出小车时，尼克松把我叫到他身边，对着大楼点了点头："看看这地方，你知道，我1959年是在这里会见赫鲁晓夫的。那时情况跟现在很不一样，但是这大楼没变。我看还在下雪。"

尼克松、赛姆斯和我到了三楼，洛博夫在那等我们。三个

秘书坐在桌子边，上面放着几部电话，只能打进，不能打出。这是苏联共产主义的奇怪的残迹，上层领导打电话发布命令的时候，不允许下面的人回打电话问问题。

尼克松和洛博夫进行了一次很有活力的谈话，主要是有关工业部门试探性地支持总统叶利钦的事。他们的工业效益越来越低，越来越没有竞争能力，已经被自由市场改革削弱了。洛博夫暗示，他们可能试图用工业领导人的联盟来代替叶利钦。尼克松鼓励他们，政府和特殊利益集团之间应该合作，对改革要有耐心，一旦成功的话，对他们大家都有好处的。

坐车回宾馆的路上，他对我说："真不知道该对这些人说些什么。他们的境遇很糟糕。我只希望他们能闯过去。问题是，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能维持到改革固定下来，像中国已经做到的那样。你看，"他说着，指着窗外一晃而过的建筑物，"这就是共产主义者所做的事。一切都灰蒙蒙的，千篇一律，一切都令人沮丧。"

1993 年 2 月，俄罗斯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改革开始出现一些问题，也带来了一些机会。叶利钦的政权很稳固，尽管他和前苏联时代的国会和他自己的副总统之间老要吵架。改革的艰难——包括飞快的通货膨胀、双倍的失业率、食品匮乏及日渐上升的犯罪率——使叶利钦成了批评的靶子，可他还是适度地受到欢迎，部分是因为没有出现另外一个可能成功的人。

在莫斯科的第一天晚上，尼克松邀请克劳利和我陪他到宾馆周围散一会步。他每天都有例行的事，一定要做的，所以，出国了他也要坚持进行散步这一养生法。这样，迎着寒冷的空气，我们三个人开始了深冬时候子夜时分的散步。

"莫尼卡，在俄罗斯，如果你要谈话，你就总是必须在室外进行，你知道我的意思吧？"他说，眼珠转了转。

"连新建立民主政体的俄罗斯也是这样吗？"我带点讥讽地问道。

"噢，我的上帝！我知道装窃听器的行为。民主党人是最糟的了！"他大笑起来。

由于他要考虑第二天见叶利钦的事，余下的路我们都在默默地走着。克劳利和我互相扔了几个雪球，差点就扔到了前总统的身上，他也弯下腰，自己做了个雪球，向我们扔过来。

"玩够了，"他说，"莫尼卡，过来一下。明天我们就要见叶利钦了，这是我们到这来的首要原因。我要你把你听到、看到、感觉到的所有事情都记录下来。在发生过程中把它们全都写下来非常重要，因为，一等的话，你就会忘记的。你的印象对你来说非常重要，而我回美国向克林顿汇报的时候，对我也非常重要。"他向我倾过身子，"记住，你到某个地方的第一次总是最有趣的。把它们全都记下来，别漏掉任何事。还要记住，就像你在观察他们一样，他们也在观察着你。"然后，他转身朝着宾馆慢慢地走回去。

我们的车队转了最后一个弯，拐上了克里姆林宫的地界时，车轮底下的雪嘎吱作响。与之相连的街道都被封锁了，好让我们畅通无阻直抵克里姆林宫。我们的汽车缓慢地、默默地在迷宫似的小道上拐来拐去，最后停在一个小小的入口处前面。尼克松的车就在我的车前面，这时，有两个人走到他的车前，护送他到门厅去。我们一群人跟在尼克松后面，进了一个小小的等待室，这也是叶利钦总统套房的一个部分，俯瞰着红场。

“不准拍照!”负责俄罗斯外交礼仪的人警告道,眼睛看着我们偷偷带进来的小照相机。尼克松在我们周围徘徊着,心里在温习着他打算向叶利钦提出的要点。他为这次讨论准备了两个月,这将是他在克林顿当政的时候对俄美关系作出的最有意义的贡献。叶利钦同样也明白尼克松的支持的重要性,所以,他私人跟他通信,每年都邀请尼克松到莫斯科来,用这些方式来发展这种关系。尽管尼克松从来不让个人关系破坏外交行为,但他喜欢并尊重叶利钦。正如他所说的:“任何在克里姆林宫达到权利顶峰的人,内心都是钢铸的。”

尼克松在叶利钦身上看到了很多自己的影子,而这又使他们的关系加深了一大步。像尼克松一样,叶利钦出身贫寒,但内心却有一股不屈不挠的动力,驱使他到达政治地位的最顶峰。像尼克松一样,叶利钦有一种狡猾的复原力,使他成了持久的人物。像尼克松一样,叶利钦是个能力极强的人,一个聪明、骄傲、坚强、精明的政治家,对生存特别偏爱。

这是他们第二次会面,尽管尼克松很有经验,但还是很担心。他双手反剪在身后,走到窗户前,偶尔还停下来看看屋外。等了五分钟之后,我们被叫进去,沿着一条铺着红色地毯的长长的通道走到叶利钦的办公室,那里已经集中了一群各国记者。总统和前总统向对方迈步走去,伸出手,脸上露出粲然的微笑时,闪光灯照亮了房间。尼克松转过身,把我介绍给叶利钦,他双手握住我的手,说欢迎你到俄罗斯来。他很有活力、气度非凡,一派领袖风范。尼克松把这叫做“动物魅力”:个人方式、活力、信心和一种充满激情的天赋。叶利钦让人们聚拢些,让他们听着,集中了力量,就算他缺乏这种力量,他也要尽力表现出来的。

私下会谈一个小时后，受到激励、生气勃勃的尼克松把自己关在宾馆套房里，把谈话内容和他当场观察到的东西以及他早些时候与外交部长科兹雷夫的会谈都记录下来。

"请进来吧。"几个小时后，我见到他时，他说。他指了指天花板，警告我们有可能会被偷听，叫我坐到他对面去。"会谈顺利极了。叶利钦还在掌权，比我见过的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他这么说的话，那不管是谁在听他说，都是对他们有好处的。"我想让你今天下午陪我去见谢尔盖·史坦科维奇。你知道，他过去也是内阁成员，他真的是个值得尊敬的知识分子。我想，你会发现这很有趣的。"

"今天早晨这么重要，很可能把你累坏了。"我说，注意到他看上去好像很累，"也许我们要考虑一下重新安排时间。"

"不用，"他平淡地说，"我要利用我们在这的不长的时间见尽可能多的俄罗斯人。要不然的话，就没必要来这里了。最重要的会谈已经谈完了，现在我可以见见叶利钦的支持者和诋毁者。"他指着我，"这就是你怎样真正了解这个人的方法。"

史坦科维奇支持叶利钦，但却是有条件的。他还警告说，俄罗斯的"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不会以美国、欧洲或是亚洲的模式为基础，而是从这三者中派生出来的"第四种方式"。我在会谈当中作了笔记，为尼克松整理了出来，除了帮他准备更多背景资料外，所有的会谈中我都要做笔记并加以整理。这些备忘录充当了尼克松观点的"记忆银行"，后来用到了写书、公开讲话及私人谈话中去。

一个小时后，尼克松小睡一会醒来了，他把我叫过去。他的套房里很暗，只有角落里桌上的一盏暗淡的灯亮着，他正站

在窗户边，他那著名的身影被月光映照出来。我叫的时候，他转过身来。

“噢，嗨，”他说，忍住没有打哈欠，“我睡了好一会：一定是时差的缘故。你瞧，我们这次旅行还计划了多余的一天，我想知道你是愿意去布拉格还是布达佩斯。我也会问问其他人是怎么想的，可我想先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有些要为布达佩斯说的话——匈牙利是最早解体的，但是布拉格是很令人兴奋的。要到哪儿去？”

我建议到布拉格去，他点头表示同意：“好的，很好。好了，你得出去看看红场，我是说晚上。叫这几个克格勃中的一个带你到那去。晚上每个角落的红星都会亮，你必须出去看看。当然，还有圣巴西勒大教堂、桉树百货公司和列宁陵墓。那些地方你得白天去看，但你至少要晚上去看红场一次。”

我采纳了尼克松的建议，冒着严寒到红场去看看。我回到宾馆时，在俄罗斯电视上看到了他和叶利钦会面的报导。我为第二天的事准备了大概的方案，两点钟从他的门下边塞了进去，然后我便去睡了。6点钟他便把我叫了过去。他很烦躁，穿着袜子和皱巴巴的便装在套房里走来走去的。他生气地抱怨说，他缺少余下的旅途需要的资料，哀叹说这次旅行本身并没有受到适当的新闻报导。我解释说，与俄罗斯人会谈那天我们因忙着安排会面的事，造成了及时搜集资料的困难。他还是很气。

“我知道莫斯科很乱，见鬼，我从来没感觉到过这么毫无准备的！我们得坚决要求要我们所需要的资料。”他怒气冲冲地说，“我真受不了要依靠他们来拿到这些东西，我对授权讨厌到极点，可我又非得这么做。”

我解释说，俄罗斯人不给我们提供补充资料。他的表情温和了一些。“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你已经作出了最大的努力。可是莫斯科陷入完全的混乱当中，我他妈的也陷入困境了。哦，好吧，我们也没什么办法了，再辛苦干下去吧。”他停了一会，接着又说，“我们下午要见鲁茨科依，而要见他，我真的需要准备。我有些基本的资料，我也知道我到底要说些什么，可你应该知道我的意思的。”

那天下午4点钟，我们沿着熟悉的路径到克里姆林宫去见叶利钦易怒的副总统鲁茨科依。尼克松知道，这个阿富汗战争中的英雄比叶利钦更保守、立场更强硬，也更不愿妥协，自己还有野心要当总统。鲁茨科依毫不让步地致力于发展一批支持他的人，要利用他们来努力争取最高层的职位。他有他自己的议事日程，根本也不去掩饰这些日程，而且不受控制，迫使叶利钦或者和自己的副总统一致，或者与他脱离关系。

鲁茨科依紧紧地拥抱了尼克松，马上就点燃了万宝路香烟。我坐在尼克松旁边，在鲁茨科依对面，他经常戏剧性地从桌子上方倾过身子，强调他的观点。谈话中，鲁茨科依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整个房间充满了他关于在俄罗斯需要更多政府支持的“原则”和“合格的领导”的论调。

“他们都很害怕我掌权。为什么呢？因为我会把事情做好——采用正确的方法。”他大声叫道，手在桌子上拍了一下。

尼克松鼓励总统和副总统之间要合作，但是意识到这建议不会得到注意。鲁茨科依对俄罗斯单一的观点——政治集权和经济控制——跟叶利钦政府的改革努力是无法调和的。叶利钦选择鲁茨科依当自己的竞选伙伴，现在却发现自己跟

他有分歧了;这是个政治问题,很容易就会上升为国际问题的。

"哦!鲁茨科依真是个人物,对不对?"会谈后他对我说,又指了指他宾馆套房的天花板。

"他很有魄力。"我回答说。

尼克松眨了眨眼:"他在放烟火,好在叶利钦势力减弱的时候夺权。那就是我们的支持为什么这么重要的原因,也是我得回国见克林顿的重要性,因为我敢肯定,不是只有鲁茨科依在那谋划呢。他只是比大多数人更明显而已。"他走到办公桌前,拿出一本黄色的法律记事簿。

"现在我要就这次谈话写点东西,"他说,"可我以后要看看你对鲁茨科依的看法。"他转身面对着我,"我知道这很辛苦,我不是故意一大早把你叫起来的。我只是不习惯没有计划做事情。好了,去吧,试试再去睡一会。"他在我身后关上门,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把那天的会谈备忘录弄完。

2月12日,在莫斯科的第四天,日子似乎全混在一块了。我们一大早就参加了和莫斯科市长阿纳托利·波波夫的会晤,中午在科学院跟人见面。尼克松显然很累了,把科学院讲话的大部分转给赛姆斯去讲。他下午单独呆在套房里,为下一个约会记笔记、作准备,我则冲到阿尔巴特大街去,也就是莫斯科迅速发展起来的自由市场的中心。

俄罗斯私人企业的活力和紧迫性是不可否认的。从每个方向都传来美国摇滚乐刺耳的声音。货摊排在街道两边,出售俄罗斯生产的鞋子和玩具、衣服及苏联时期的纪念品。俄罗斯新兴的企业家愿意忍受零下的温度,在推销他们的商品,用美元和客人讨价还价。早期供需方面的问题带来了混乱,

但是在那寒冷的下午,在那灰黑的街上,俄罗斯资本主义已经生了根。虽然原始且难以控制,但这是经济改革的开始。

我回到宾馆时,尼克松已经睡了。我为他把那天的活动简要写了下来,而当他从他的套房里出来,沿着大厅走到工作人员的房间时,我已经开始为第二天的活动写简要概况了。他睡眼惺忪地、茫然地看着我们,走到左边,在一把椅子上坐稳,好让自己不倒下去。

"哦,我太累了,有点头晕。"他说着,看了一眼房间,"我们在这里的运作基础似乎还不错。至少那基础对我们起了作用。哦,我们明天还有一整天的事呢,所以,我想我还是回去睡的好。记住今天是林肯的生日,所以别工作太辛苦了。"他笑了,后跟多加了一层的鞋子掉转头,离开了我们。

第二天一大早,尼克松把我拉到他身边,说:"莫尼卡,我们今天要做的事跟见叶利钦一样重要。"他指的是计划中的去看莫斯科中央市场,"出去见见人民,跟他们谈话,听他们说话,这是很关键的。领导人谈改革;老百姓却在实践。他们总是怎么样就怎么说的。"

中央市场是个无计划扩展开去的忙乱的商业中心。人们推推搡搡地挤过去,有钱的人在买东西,其他人只是看看而已。新鲜面包、肉、水果、蔬菜和花卉在每个角落都有,为市场争了光。买卖在进行当中,空气中回荡着大嗓门、小嗓音,还有给退款、讨价还价的声音。尼克松一走进去就被认出来了,《今日新闻》的记者来到现场时,市场陷入极端混乱的状态。

整个过程中,尼克松主要和普通的俄罗斯市民谈话。他对每个人都问了同样的问题:政治、经济改革后生活是不是更好了?大多数人都回答说,他们自己的生活还是和过去一

样，不受政府的阴谋策划影响；其他人坚定地说，他们的生活变得更糟了；一个屠夫竭力对尼克松请求道："先生，若你们不帮我们，那我们就又要回到共产主义去，那我们是受不了的。"

许多尊敬他的人都靠近他，表示良好的祝愿，尼克松接受了他们对他的领导工作的赞扬及从他们的货亭里拿来送给他的礼物。受到这些鼓舞之后，他建议我们去看看阿尔巴特大街，这样，他就可以亲眼看看我曾经热心地向他描述过的有活力的自由企业了。

很不幸，那场面却不像我曾经经历过的那样。一个小时前，警察刚刚搜查过非法经营的小贩，整条街道都被洗掠一空，现在已经没人了。这里没有积极的感情流露，没有过分的赞扬，也没有有价值的交流。尼克松既烦躁又失望，生气地走向他的小车。

回到宾馆后，我参加了他和议会议员瓦勒里·康斯坦丁诺夫的会谈。康斯坦丁诺夫是个狂热的斯大林分子，他督促尼克松不要支持叶利钦："那是帮助俄罗斯最好的方式。"尼克松表示不同意，提出了他对俄罗斯事件的看法，但他知道他劝说的力量在康斯坦丁诺夫这一方毫无用处。70 年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不可能很容易就被取代的，特别是在那些有兴趣坚持这一思想意识的人还有权利地位的时候。

接着他接受了俄罗斯电视台很长时间的采访，然后和国会议员瓦勒里·阿巴佐莫夫、俄罗斯的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进行了会谈。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特别是和前苏联的其他共和国——"最近的外国"的外交政策及中美关系的讨论，似乎使尼克松受到了鼓舞。阿巴佐莫夫是个中间派，他不同意当时由外交部长科兹雷夫实行的完全亲西方的外交政策。尼克松

表示同意："俄罗斯有自己的利益，连民主伙伴都会有不同意见的。"

我们离开会谈地点后，尼克松对我说："他是对的，你知道。叶利钦不应该完全亲西方，要不他会被康斯坦丁诺夫这样的极端主义分子，甚至会被支持他的温和派削弱力量的。政治上，他应该以'俄罗斯为先'。美国有些人不明白这一点，但他们会明白的。为了生存，他必须把俄罗斯的利益放在首要地位，要不然的话，那些时刻准备着的人就会杀了他。"他看了看我，"而那可能是字面上的杀，也可能是引申义的杀。"

第二天一早，我们登上了到圣彼得堡的飞机，从莫斯科到那的短途飞行中，尼克松私下简要对我说了和叶利钦会谈的经过。

"叶利钦还跟过去一样很有活力。他在危机时期表现最好，而上帝知道他面临的危机够多的了！他还在宣扬民主，尽管政治压力已经减慢了民主进程。我告诉他说，美俄关系取决于俄罗斯对外政策上如何表现。他向我保证，他还是主张非进攻性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和紧邻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

"他很强硬、有决心，而且有时候还很残忍；他要想不垮台，非得这样不可。从情感上来说，他似乎很稳定，他告诉我，尽管他和鲁茨科依及国会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但他能得到足够的支持以使改革平稳地继续下去。关键的问题是，他遇到了最危急的考验。

"他最后告诉我，他很感激我对他的一贯支持，说我是他在西方最好的朋友。"尼克松接着便把那本黄色的法律记事簿递给我，他已经在上面潦草地写了他和叶利钦会面的最初印象。我在看时，他说："我已经做了些笔记，自从我过上为公众

服务的生活以来，每次重大的会面我都是这么做的。这对历史目的来说很重要。"

幸运的是，在圣彼得堡机场的降落比在莫斯科的平稳多了。一小队俄罗斯代表在等着我们下飞机，跟我们一道驱车进城去。城里的大型建筑都漆成了鲜艳的蓝色、黄色和绿色。彼得一世和列宁的纪念碑就在城市入口处，庄严的爱尔米塔什博物馆、教皇的冬宫全都耸立在我们面前。尼克松的车就在我的车前面，他转过身，胡乱指着爱尔米塔什博物馆，好让我不会错过没看到。这个城市建筑典雅、色彩明快，跟冬天给它宣判的阴郁的裁决展开了公开的挑战。

尼克松的首次会谈，是跟圣彼得堡的最上层的商人进行非正式会晤，由市长阿纳托利·索伯柴克任主席。尼克松更喜欢单独跟个人会谈，他要求赛姆斯改变安排，但没有成功。他被告知，索伯柴克为支配着圣彼得堡的企业精神深感骄傲，他想炫耀一下企业精英。尼克松很不情愿地让步了。

索伯柴克市长是个精力充沛、很有活力的人，他欢快地步下他的寓所被冰覆盖的台阶，向尼克松和我们这一小群工作人员表示欢迎。我们站在下午稍迟些的暗淡的天色中，尼克松介绍了我。索伯柴克发现我脖子上没有围围巾，便问道："你为什么不围围巾好抵御这寒气呢？"

尼克松转向我，回答说："她是那种不可摧毁的人之一。"

"像你一样，总统先生，对不对？"索伯柴克问道，尼克松笑了，我们便拾级而上。

使特别疲劳的前总统感到幸运的是，大多数讨论都是由圣彼得堡的企业家展开的。他们告诉了他很多这个还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国家里成功的私人企业的故事，使他乐不可

支。他们告诉他，尽管有那些官僚的繁文缛节、有组织的犯罪行为以及有限的国际上的支持，私人企业还是在发展当中，还要求美国对之扩大贸易，加大投资。

第二天早晨，我到了马里英斯基宫，尼克松的第二轮会谈，即跟索伯柴克的私人会面开始了。这次讨论重点放在支配这个城市的行业上，从防止犯罪到鼓励已从莫斯科的控制中挣脱出来，闯出了一条新路的自由市场贸易。这次谈话对尼克松和索伯柴克来说都更富有成效，因为他现在已经休息好，更适应白天的严寒了；而索伯柴克则利用这次机会征求前总统的意见，还对尼克松支持俄罗斯的努力表示赞赏。

"只有你才真正理解的，总统先生，"索伯柴克叹了口气，"西方的其他人只是空谈帮助俄罗斯，而你却是自愿这么做。"

在赛姆斯的提议下，我们在计划中增加了里加和拉脱维亚。苏联解体的时候，其他 14 个新独立的国家政府声称：住在那些国家的非基督徒俄罗斯人受到虐待，特别是波罗的海地区的俄罗斯人。赛姆斯认为，尼克松应该给波罗的海地区的国家之一，特别是拉脱维亚带去自由主义的信息，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拉脱维亚，据说俄罗斯人连最基本的人权都被剥夺了。尼克松同意了，我们又被送到俯瞰着波罗的海的政府宾馆住宿。

在里加，第一次官方的安排是阿纳托利斯·格巴诺夫总统设宴招待美国前总统，这是次小型的、半正式的国宴。格巴诺夫怀疑尼克松来访的真正原因，对话气氛非常紧张。尼克松大体上讲了讲拉脱维亚的独立、政治和经济改革，以及现在对俄罗斯的看法，可是社交气氛妨碍了严肃的讨论。由于没有谈得很多，他感到很失望，所以，晚饭后，他和赛姆斯在沙滩上

散步散了很久，好挽回损失，回来后他跟我说话。

“不管你在哪里，国宴都是很累人的。你得说话，还要让谈话轻松愉快。那从来就不是我喜欢做的事，它会使我精力大损。”他疲倦地说。

第二天早晨，我们来到拉脱维亚的国会大厦，却发现总理正在解散政府，并且不参加原先计划好的跟尼克松的会面，尼克松不禁大发雷霆。

“见鬼！我一路到这里来并不是要来被人拒绝或是来见二等人的。”他怒气冲冲地对赛姆斯说，“我一分钟也不想再呆了。我们走，现在！”

赛姆斯想让他平静下来，可是尼克松什么解释都不接受，向门口冲去。我跟在他后面，看见他再次爆发了，因为赛姆斯通知他，拉脱维亚人现在坚持要开个记者招待会。

“什么？”他不相信地叫了起来，“不，我不开记者招待会。看在上帝份上，我没见到总理，所以，我到底能说些什么呢？”

最后他还是被赛姆斯说服，同意跟记者们谈谈，但他给他们的见面时间很短，然后我们就登上飞机回莫斯科了。尼克松在旅途中一言不发，现在，与其说是愤怒，还不如说是反感。

在跑道上，我们政府轿车的发动机在空转着，准备把我们马上送去见苏联时代的国会——人民代表大会的发言人鲁斯兰·卡斯勃拉托夫。这是匆匆忙忙安排的会面。卡斯勃拉托夫是叶利钦的政治复仇女神，像鲁茨科依一样，是个决心要密谋取代叶利钦的反对派。通过会见卡斯勃拉托夫，尼克松将给他提供一个合法的手段，但他相信在他们还处于反对派的时候跟他们谈话是有用的。

那天早晨的那一幕还在暗地里折磨着他，尼克松邀请我

陪他去见卡斯勃拉托夫。在俄罗斯白宫的外交厅金厅里，尼克松正在把我介绍给几个俄罗斯官员，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一个声音宣布“说话的人”到了。卡斯勃拉托夫走进大厅，向尼克松走去。我出其不意地被人一推，一个身材魁梧的克格勃军官从后面一把抓住我，把我从地上举了起来，使我离开了尼克松好几英尺，好让他和卡斯勃拉托夫能比较适宜地互相介绍。几分钟以后，我才被允许去见过卡斯勃拉托夫，坐在代表美国的那一边，坐在尼克松身边。

卡斯勃拉托夫热情、严厉、强硬而且口才很好。此时此刻，我想起了我在记录中的话：“他用了妥协的言辞，但我感觉到他是不肯让步的。”卡斯勃拉托夫固执地声称，他想和叶利钦合作，但俄罗斯总统正在加快改革的步伐，而其实应该减慢才是，好让它能够被“负责任地”进行。虽然他争论说要采用更加温和的方法，但卡斯勃拉托夫想让改革进程倒退回去。

“你知道制衡制度，”他用一种聪明的拐弯抹角的语气告诉尼克松，“在我们认为总统的政策走极端的时候，我们国会就会对他进行制约。”

尼克松坚决地告诉卡斯勃拉托夫，俄罗斯的改革没必要像波兰那样用“令人震惊的疗法”，而是一种适宜的一步步加大政治参与、减弱中央集权经济的进程。卡斯勃拉托夫像鲁茨科依一样，想恢复中央集权和苏联时代那样由莫斯科独裁统治的规章制度。他们的外交行话外面披着一件宽松的外衣，内心却有统治俄罗斯的个人野心，形成了尼克松认为的篡位运动。

会面一结束，我们到了一家新的俯瞰克里姆林宫的旅馆。在他的套房里花了一个小时写东西后，尼克松邀请我去欣赏

从他那可以观赏到的克里姆林宫全景,还吃了旅馆的人留给他的鱼子酱。他正在酝酿一篇讲话稿,是第二天晚上要对一大群显赫的俄罗斯官员讲的,包括前总理亚格尔·盖达。

“我告诉他们了,这次讲话我只想要个站着讲的麦克风。”他说,“我不用看记录就讲,不要讲台。很可能这次这样该死的讲话会花我太多的时间,还要翻译,时间很可能也会太长,但是管他的。我还是做好为好。”他走到桌子边,把鱼子酱递给我,“带去路上吃。”

在美国国内,尼克松在发表讲话之前,从来不参加宴会或是社交活动。为了让要讲的资料在他头脑里能记得清楚、印象更深,他总是在定好讲话的时间准时到达,把闲聊的时间控制在最低限度。然而,在国外,他不是总能控制局势的,而在离开俄罗斯前的最后一个晚上,在发表讲话前,他不得不要忍受一次冗长的招待会和宴会。他的俄罗斯主人们在最后一刻搬进来的讲台使他很慌乱。

尽管他很生气,但 30 分钟的演讲还是讲得很好,受到大家的欢迎。他对新的美俄合作和需要开展成功的俄罗斯改革进程的讨论使得大家全体起立,热烈鼓掌,可是回到旅馆后,他却对自己的表现批评了一番。当我给他肯定的评价时,他只是耸耸肩,回答说:“哦,你知道,你辛辛苦苦地干,就希望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翻译不是最好的,可我认为还过得去。我应该说,当我看到那个该死的讲台被搬进来时,我还以为把我讲话的内容给忘了呢。”他走到窗户边,看着克里姆林宫的景色,盯着那些高耸在夜空中的城堡的围墙。

“我不会再来了。”他迷茫地说,“可你会的。你来的时候,记住要看看这景色。”说完,他跟我道了晚安。

我们离开俄罗斯的时候和我们来时一样：暴风雪正狂啸着。飞机上了天时，雪似乎把下面的景色全给盖住了。

我们在基辅和乌克兰都降落下来作外交性的短暂停留。俄乌关系越来越紧张，是因为克里米亚的边境状况和俄罗斯石油供应减少的冲突引起的。乌克兰的处境岌岌可危。它既要提防俄罗斯的扩张主义，又要依赖莫斯科的原料资源，所以既害怕又有依赖感，这些因素使它在安全方面陷入了棘手的进退两难境地。而依靠乌克兰农产品的俄罗斯现在却付不起乌克兰的市场要价。"如果我们失去了乌克兰，"列宁有一次在说到苏联时说，"我们就会掉脑袋。"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依赖，虽然不像乌克兰对俄罗斯的依赖那么强，但也产生了冲突，并且有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乌克兰忍受不了俄罗斯，但基辅没有它却活不下去。

尼克松想向莫斯科发个信号，让它知道基辅在地理位置上对美国很重要，西方正在密切注视着他们的关系。他叫我和赛姆斯去参加他和总统利奥尼德·克拉夫丘克和总理利奥尼德·库奇马的会谈。到了克拉夫丘克的总统套房，我们这一队人马马上就被分开，带到不同的房间。我在那等着，直到赛姆斯找到我，我们在尼克松跟克拉夫丘克会谈的前15分钟和他在一起。这个精明、严肃的乌克兰总统告诉尼克松有关俄乌关系不稳定的状况，指出他们互相依赖的紧张关系正在逐步上升为军队的紧张关系。

库奇马的话反映了对俄罗斯的忧虑，他主要谈步伐不稳的政治、经济改革的进程。"我们要等到自己能够依靠自己的时候才能加快改革步伐，而这要等到我们和俄罗斯的关系正

常之后才做得到。"他说。乌克兰连俄罗斯所进行的改革的最低阶段都没有达到。尼克松离开这个国家时,对那里改革的缓慢步伐感到很失望,但对它地理政治方面的危境却出其不意地颇为欣赏。

对照一下波兰,快速的改革非常成功,跟俄罗斯没有很重要的边境线,所以表现出独立的真正色彩。

在冷战中,尼克松曾把东欧国家称为"囚徒国家",给这一受害的地区描绘了一幅强有力的图画。苏联长达45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统治已经消除了民族特性,代之以暴政和压迫。尽管受武力管制,东欧人却不愿沉默。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春荒期间以及在1980年波兰的格但斯克造船厂,他们英勇地斗争着,要求恢复他们的国家主权。

我们在华沙军事机场的灰蒙蒙的雪泥上走下飞机时,夜幕已经降临了。想到我有波兰血统,尼克松坚持要我和他一起驱车穿过这个首都的街道到旅馆去。

"你知道的,在冷战中,我曾在波兰呆过,华沙过去看上去就像莫斯科一样,"他说,"灰蒙蒙的、毫无生气、令人沮丧。现在,你看看这活力和精力！现在我们看到的景象就像是我们真的在西方一样。我的上帝！华沙成了个不一样的世界了;她活过来了！"

他的惊奇感还延续到那天晚上由波兰外交部长为他举行的正式晚宴的讲话中去了。在一次动感情的祝酒中,他回忆了1959年到华沙访问的情况,那时,几千波兰人不顾政府的警告,在街道两边列队欢迎他。

"即使是那时候,"他说,"我就已经知道波兰要发生一些奇迹了。"

在我们那天访问的三个国家——俄罗斯、乌克兰和波兰中，每个国家都在体验着自己的奇迹。俄罗斯和乌克兰还在使自己脱离共产主义，而波兰已经在改革进程中既有了收效，又有了问题。这对比是很强烈的：每个国家代表着同样的势不可挡的进程的不同阶段。

第二天早晨，我们到总统府邸去和列奇·瓦文萨见面。1980年在格但斯克，在他的领导下进行了团结一致的反抗运动，瓦文萨成了东欧反抗苏联建立的共产主义的标志，因为他的成功，他还成了个带有神秘感的英雄。他无人可比的受欢迎程度使他登上了总统的宝座，当了总统后，他却经常因为领导改革而感到很厌烦，而且支持率越来越低，这也使他很失意。

礼宾官宣布瓦文萨进来的时候，我迅速从尼克松身边走开，看着粗壮、有吸引力的波兰总统向他表示欢迎。瓦文萨马上点燃了一支香烟，一个人自顾自讲起了俄罗斯潜在的扩张主义。尼克松试图让他放心，并把谈话引到波兰的改革状况上来，可是瓦文萨还是把话题集中在俄罗斯及需要西方更大的援助上面。

"波兰给了西方一件大礼物——冷战中政治和军事的胜利。"他动情地说，"西方却不接受这个礼物，你也不能强迫一个人接受他不想要的礼物。"东方不再受到俄罗斯的支持，西方又还没有接受它们，东欧这些国家成了孤儿了。瓦文萨表达了大多数被东方集团抛弃的感觉，恳求美国提供更大的资金援助，不然就要面对严重的后果。

"瓦文萨是个伟大的革命家。"尼克松后来对我说，"可是我们要看看他是不是会管理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革命家

很少能成为好的领导的。这就像打仗和管理，两种不同的东西需要不同的才能。”对总理汉纳·萨乔卡他就没有这种疑虑，他回顾了波兰经济转化的错综复杂的情况，而且愿意——如他自己所说——“勇敢地行动”。

跟波兰的新闻界开了个简短但很有活力的记者招待会后，尼克松邀请他的工作人员跟他一起下午到华沙的旧城区走走，被纳粹占领时，这里被毁了，是后来重建的。可是，当他看到外面很少他能够互相影响的人时，他失望地回到了小车上。

子夜时分，尼克松醒过来，把我叫过去。他的房间暗暗的，只有门厅里一盏台灯发出一点点亮光。

“总统先生，什么事？”我问道，走进套房时手里抓着我的记录。可是没有回答。

我听到角落里一个办公室里传来纸张翻动的声音，便在黑暗中朝那方向走去。他穿着睡衣，紧紧裹着一件浴衣，穿着拖鞋，眼镜架在鼻梁上，坐在办公桌边，在快速地写着什么。他抬起头，看到我吃了一惊。

“噢，嗨，我睡不着。你看，明天我们要到捷克共和国去，早晨我就需要你这些额外的资料。”他说，递给我一张写着他的记录的纸张，“这次旅行至今为止都挺好的，我现在也不想把它弄得一团糟。”

我转过身要离开，尼克松站了起来，语气缓和了一些：“我只想在布拉格时顺顺利利。你知道，我们真的不能出什么问题。”

“我知道，”我说，“没问题的。”

“好像是这样，我想我得把这些东西处理掉。”他说，“哦，

你知道你可以明天做这些工作。你没必要今晚就弄。好了，我给你开些灯，好让你出去时不会搭上自己的性命。”他送我到门边，在我身后轻轻地关上门。

我们到布拉格时是早晨，刚下过一场雪。飞机停稳时，尼克松宣布：“布拉格会让你们激动得透不过气来的。”

原来的铁幕现在成了捷克的巴罗克风格庄园、中世纪的村落和碧绿的河谷。街上有小小的乐队给行人演奏，显得很有生气，一群群小贩和设计木偶的人不畏寒冬的天气和刚找到的自由的立场。这是个星期六，布拉格的生活有种放松的节日气氛。

赛姆斯和我陪尼克松去见瓦克拉夫·哈弗尔总统最亲近的经济顾问瓦克拉夫·克劳斯，他主要是讲自由市场改革的步伐和范围。像波兰一样，捷克共和国也同样体验了成功的改革进程带来的利益和错综复杂的情况。赛姆斯和我对克劳斯提了好几个问题，为的是给尼克松减轻一些外交礼节上的负担。我们惊奇地知道，捷克人和波兰人一样更害怕德国的扩张主义，倒是不怕俄罗斯的帝国主义。我们驱车去跟捷克总统进行下一次会谈时，我想跟尼克松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但我看到他的眼睛闭着，不知是在思考问题，还是在睡觉。

哈弗尔在冷战中是个很受欢迎的持不同政见的剧作家，他的作品因激发了 80 年代后期的反抗运动而名声大噪。由于他是在捷克斯洛伐克推翻了共产主义的和平丝绒革命中的无人可比的领导人，在一片公众感激的浪潮中，他被推上了新总统的位置，主持了与斯洛伐克的温和的分裂工作。像波兰总统列奇·瓦文萨一样，哈弗尔是个负责管理国家的革命家，可是他在成为政治家以前曾是个艺术家。

我们过了伏尔塔瓦河时，就可以看见我们的目的地布拉格宫耸立在我们头顶。我们沿着小山往上走，经过了散落在一片片森林里的孤立的小屋子，直到总统府邸的入口处。外事活动等待的地方很宁静、安详、朴素，使我们对在哈弗尔的办公室会碰到什么事一点准备也没有。

我们进去的时候，捷克总统从椅子上站起来，嘴里叼着一根香烟。哈弗尔穿着随意的运动衣，头发凌乱，他把香烟碾灭在一个水晶杯里，绕过黑色的极为简单的抽象派家具和一个巨大的红色水管雕塑，过来欢迎尼克松，尼克松似乎被这先锋派的装饰弄得有点惊慌失措。

哈弗尔马上又点燃了一根香烟，坐在一张天鹅绒沙发上；尼克松坐在他对面的一张巴罗克风格的天鹅绒椅子上，赛姆斯和我坐在他旁边。他们谈话开始时，我注意到一幅很大的印象派的画，两个裸体的女人就悬挂在哈弗尔上方。我瞟了尼克松一眼，他也注意到那幅画了。他话说了一半突然停了一会，眉毛都耸了起来。

哈弗尔显然注意到这幅艺术品给美国客人造成的影响，泰然自若地谈着苏联强加给他们的共产主义的存留影响，说："戈尔巴乔夫还是社会主义的俘虏；叶利钦解放了自己。"尼克松想起了哈弗尔过去曾是个持不同政见的剧作家，说："从艺术来说，20世纪对俄罗斯来说是个迷失的世纪。70年的共产主义已经扑灭了伟大的俄罗斯的艺术之火。捷克斯洛伐克只经历了45年的共产主义，由于有了像你这样的勇敢、有才能、有原则的人，艺术之火永远不会灭掉。"哈弗尔赞赏地摇着他的香烟，对这赞扬加以回报，高度赞扬尼克松在冷战时期的领导。哈弗尔被一团烟雾笼罩着，他接着送我们到那安静的等

待室，在那里，他那富有独创性的气质似乎就显得很不适宜了。

“莫尼卡！那幅画是不是还意味着别的什么？”我们回到旅馆时，尼克松格格直笑，“让我下地狱去！想象一下！一个总统在办公室里挂那种画！我一定是不同年代的人，因为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他又笑着跺了跺脚，自从我们来到国外以来，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的放松。

“哦！我就好像睡了13个小时似的，”第二天早晨，他11点才醒过来，便这么说道，“我真需要睡眠，可我希望我没有减少你在布拉格的时间。”他说，“我跟你说吧。为了弥补我一整个早晨都让你呆在这的损失，我要带你出去游览一下布拉格。怎么样？”

在捷克几名安全局官员的陪同下，我们开始了长达两个小时的游览城市的步行。尼克松得到了彻底的休息，而且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的，好抵御寒冷的天气，他坚持要先到著名的文西斯劳斯钟去。

“我对它大为赞扬一番后，我希望你会喜欢它。”我们站着等钟里手刻的人表演时，他这么说道，“整个城市就像这钟一样，神秘，满是令人惊奇之事。这地方的精神非常出色。当然，在我前几次访问时，你看见的这周围的商店都没有，因为那个布拉格的春天，捷克共产党在东欧解体中是最凶猛的。可是这地方还是很漂亮。”

然后，尼克松去了一个教堂，待到爬上台阶，却发现主要的门都锁了。他找到一个开着的边门，领我们进了一个空荡荡的私人祈祷室，接着便离开我们，走到圣坛前，双手合十祈祷开了。突然，他转过身，走到一条长椅前，跪下磕头，这种精

神上的表现非常没有特色。几分钟后，他站起来，默默地领着我们出去。

消息传出去了，说尼克松在游览布拉格，他被摄影爱好者和表示良好祝愿的人围住了。他在国外都能得到绝对的尊重和爱慕，但在美国却经常得不到，他对此非常喜爱。他站好姿势让人拍照，说着笑话，泰然自若地、好意地回答着问题。

我们的下一个景点是老犹太纪念堂，它是几十年来成千上万的犹太人牺牲的见证。这里美得令人难以忘怀。我们沿着台阶蜿蜒而上时，尼克松伤心地摇了摇头。

“共产党把这全都关了。”他说，“否认历史——这就是他们如何成功的主张。他们原来认为，只要他们封锁历史，他们就可以从零开始。我们知道，那样是不行的。当然，布拉格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之一，德国人来的时候，因为捷克斯洛伐克失败了，所以才保留了下来。可怜的华沙就被摧毁了，因为波兰人反抗而被烧为平地。可是现在，变化这么大。这些国家的生气又回来了。他们真的是从冷战的深沟里爬了出来。”

2 月 21 日，我们飞往巴黎，这是我们旅途的第 15 天，也是最后一天。尼克松得了感冒，越来越重，但他坚持约会法国总统弗朗西斯·密特朗，还请我们在凡尔赛吃了最后的晚宴。

那天晚上睡觉前，他走进我们的临时办公室，穿着海军蓝睡衣，披着浴衣，穿着拖鞋。

“我正想去睡，却想起我还想为你们在这次旅行中所做的一切谢谢你们。你们看，”他说，递给我们一瓶香槟酒，“旅馆留给我的，可我不能喝。”他转过身，走进他黑漆漆的卧室，顺手带上门。

第二天一大早，尼克松跟我见面，确证他下午的约会，重

新过一遍他谈话的要点。当他看到我在盯着他的衣服看时，他站起来，把羊毛开衫拉平。

"你昨晚看见我穿睡衣的时候，你很可能认为已经看到一切了。并非如此！这是我看上去像吉米·卡特的时候。"他嗓子发哑地说，"你觉得怎么样？"

"哦，只要你觉得舒服就行了。"我说。

"哦，那就是该死的政治反应！我的上帝，你也在学习呢！"他大笑起来，点点头让我走了。

两个小时后，他穿着西服出现了，已经准备好见密特朗。每次到俄罗斯，他都可以在至少一个西欧国家的首都稍作停留，了解一下欧洲的状况及对它们强有力的东边邻居的看法。尼克松和密特朗私下见面后，我们便到了机场。感冒开始要使他受不了了，但一坐上飞机，他还是大略看了看手提箱里的东西，写了些有关会谈的记录，然后闭上了眼睛。大约一小时后，他把我叫到他的座位边，重温了一下他和法国总统的会谈。

"密特朗似乎支持叶利钦，可他完全支持戈尔巴乔夫，那影响了他对叶利钦的看法。"他说，"那些在美国声称叶利钦完了的观点的人是不负责任的；他们只是想证明他们对戈尔巴乔夫的支持是对的。密特朗没走那么远，他想要叶利钦成功；当然，如果叶利钦失败了，欧洲人会站到前线去的。

"我告诉他说，美国一些观察家认为东欧应该是个缓冲区时，他根本不相信。'这种奇怪的论调是哪来的？'他说。'东欧从来都是欧洲的一部分，只有冷战把东欧分开的时候除外。'当然，他在夸耀欧洲的整体性，而且想看到在合适的时候把东欧包括进去。"

他把记录放下，取下眼镜，在手里转着表示强调："这次旅行非常成功。我们在俄罗斯碰上一点组织安排上的问题，可是下个月在亚洲我们就不会有这问题了。我们回到新泽西后，我要你列个重要人物的名单——参议员、国会议员、记者、学者——只要你认为我们回去后要见的人都列上。旅行了这么一次之后，把你的所见让重要的人共享，并且希望会有人听，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飞越大西洋时，已经是晚上，小小的座舱越来越暗，尼克松拉了一块毯子盖在身上便睡着了。我也睡了一段时间，后来有人拍着我的肩膀把我叫醒了。

"莫尼卡？"尼克松低声叫道。

"在这，先生！"我也低声说着，坐直了身子，"有什么事吗？"

"噢，没什么。你在睡吗？"他问道，"哦，你是在睡。对不起，再睡吧。我只是想，我们得谈谈中国之行，但我们可以以后再谈。"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把头顶上的灯开亮，看我借给他的卡尔的《"二十年"危机》。

我环视了一下座舱。其他人都在睡觉，由于我现在已经完全清醒了，我悄悄溜到这个失眠的人身边。"我们现在可以讨论亚洲之行了。"我告诉他。

他从眼镜上方看着我，笑了。"我不是有意吵醒你的，可我想确定你已经开始收集我需要的背景资料，为朝鲜、日本和中国之行作准备。只剩五个星期就要去了。"他说，"这将会是我到亚洲的最后一次旅行，我想让它顺顺利利的。"他朝窗外看去，看着黑夜，"谁知道我什么时候从欧洲回来呢。"

"人家知道的会快得多。"我说。

他合上放在大腿上的书。"每个人都筋疲力尽了。"他低声说道，看着暗淡的座舱，他关掉头顶的灯，又轻轻地说，"是的，这旅行挺累人的。"

飞机在新泽西的泰特伯洛机场降落，把我们全都吵醒了。尼克松坐直身子，在手提箱里摸索着把记录本、书和眼镜放好。我们其余的人收拾好自己的行李，开始了艰难的下机过程。已是子夜时分，跑道上的雪和冰使我们很难分清是在我们的泰特伯洛降落还是在莫斯科降落。

尼克松一个人站在飞机舷梯底下，等着他的工作人员下来，好谢谢我们每一个人。我建议他不要站在寒风中，坐到马达已经开动的小轿车里。我们一起往前走时，我们又回顾了一下这次旅行中我们知道的重要的事，以及他将如何把这些传递给本国其他的人。

给他打开车门时，我谢谢他邀请我陪他去旅行。黑暗中，我可以看见他把手提箱放到车上，身子坐了一半进去时，又转过头看着我。他慢慢地把手举到额头边，稍稍致意接受了我的谢意。轿车载着他走了，我一个人站在跑道上，默默地也向他致意。

2 月 22 日，我们一回来便知道克林顿已经安排好要会见叶利钦，尼克松很吃惊。"选举刚过，这么快他就会见别的国家的领导人，我想他是疯了，因为他被选上是要处理国内问题的。"2 月 25 日他在电话上说，"可是这却很精明。显示他在当总统。至少他在考虑这该死的问题了。

"我知道克林顿和叶利钦已经宣称 4 月 4 日要进行首脑会晤。他要在那以前跟我谈谈倒是很明智的……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拜访我。他应该的，但是记者们在缠着他，所以他可能

想通过跟我会谈来摆脱他们。我们等着瞧好了。"

三天后，尼克松觉得克林顿受到了他去俄罗斯的影响。据报导，总统已经提议原定给俄罗斯的援助总额上再增加300万美元，这使尼克松回答说："那只是小钱。"

"他这么做很可能是要预先制止你在这个问题上批评他。"我说。

"确实，但也还是表面文章。他需要做得更多，如果他不干的话，我就会跟在他后面行动了。他费了很多精力的其他讨厌的事——军队的同性恋、健康改革——和要重新发动一场冷战相比，一点都不重要。"

3月2日下午迟些时候，他正在给《纽约时报》再写一篇有关俄罗斯形势的特约稿，他接到了他的好朋友——参议员鲍勃·多尔的电话。

"多尔告诉了我一些很有趣的事，"通过话后，他对我说，"他说克林顿可能会去参加参议员斯特罗姆·瑟蒙德下星期四的晚会，多尔告诉他，我也会去，在那以前，我们得先见见面。而克林顿——我不知道他当真到什么程度——他说：'哦，我想为了有关俄罗斯的事或是别的什么事我会打电话给他。'我们看看吧。这个人做什么事都会作出过分的承诺。我很怀疑他会不会打电话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多尔，这个在1996年向克林顿挑战的人，促成了尼克松和总统紧密合作的关系。正如尼克松想让多尔出任下一任总统一样，为了保证美国对俄罗斯有效的外交政策，他也需要和现任总统合作。如果克林顿根据尼克松的建议行事，他不但会增进美国外交方面的利益，而且在政治上对他帮助也很大。

多尔打过电话后四个小时，克林顿也打电话给尼克松。那次首次谈话开始了他们之间令人吃惊的富有建设性的合作关系——最吃惊的还是尼克松。他认为他们分属不同的政治派别，又属于两代人，克林顿不会打电话给他的。即使他会打，尼克松也认为，由于克林顿夫人曾为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工作，她也会阻止总统跟他联系的。尼克松错了。

那天晚上更迟的时候，他在我的回话系统上留了个简短的留言："我刚刚和你住在白宫的朋友通了40分钟的话。"

第二天早晨，尼克松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急于把他们讨论的事告诉我。我发现他坐在角落里的椅子上，转动着他的眼镜，笑了。"请坐，"他对我说，"哦，这真令人吃惊，但你的预言是对的。他真的打电话来了。我抓着电话等了五分钟，然后又等了八分钟，他们找不到他。白宫的接线员问是不是可以让他回电话。大约9点50分左右，他打过来了。坦率地说，听上去他好像很累，而且——最令人奇怪的是——他对我吐露秘密；他说的事情是他根本不想让外界知道的。我真不知道他的搭线窃听装置有没有在运作！

"他很尊敬我，没有说令人讨厌的大话。还是快点给你个概述吧，他只花了三分之一的时间谈外交政策，大多在谈俄罗斯，但他也问了中国的事。他说他担心他的防御裁减是不是太大了；当然，他那么说也许是因为我会反对裁减太多。但他喜欢说，而且对援助俄罗斯的问题很坦率。我把我们的主要发现跟他说了。他问我叶利钦怎么样。他说，他还是个候选人的时候，叶利钦就有勇气去见他了，他对此表示欣赏。毕竟布什是总统，他欣赏叶利钦这么直截了当。我告诉他，在叶利钦的问题上，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他说，他已经和叶利钦谈

过两次，他听上去很担心。克林顿建议，他们在4月4日以前见一次面，但叶利钦想等到他跟国会的斗争解决后再见面。他说叶利钦叫他来见我。"

尼克松眉毛耸了起来："那才是重要的事！可克林顿还问我，'他会保住总统职位吗？'我告诉他，这将会是很艰难的事。除非他有美国的支持，要不就会垮台。他是俄罗斯最好的政治家，最受欢迎的——而且是选举产生的。我们不能在美国和他之间留下太大的距离。他还问了有关派技术援助及诸如此类的事。但令人觉得有趣的是，三分之二的谈话都是有关国内政策的。"

他咬着眼镜的一头："他说这次访问真难，不知要做什么。我告诉他，我几乎全集中在外交政策上，因为我不想让他觉得他得听我说那方面的事；我们毕竟在大多数国内问题上都站在不同的立场。所以，我向他保证，我不再介入党派政治，我批评的本意都是建设性的。他对此很欣赏。"

尼克松继续说："不管怎样，这是我当总统以来和另一位总统谈过的最好的一次谈话。比跟布什的都好，因为贝克老是呆在周围，而且我和里根也从来没有这么谈过。克林顿想让自己放心。我和其他人不会有这种对话。我和里根和布什谈话的时候，常常要没话找话说。这不一样的。……这个人很有头脑。"

和尼克松谈话，克林顿是冒着自己党派指责的危险的，而且他真受到指责了。前总统很感动。"我想他的电话是很有意义的。"他不说了，把眼镜放在茶几上，手交叉在一起，"他要求我到白宫去。

"12年了，里根或是布什都没有把我放进白宫计划里去，

或是发表一张照片。我们偶尔才能知道一些事,可是你知道……"

就像尼克松被认为是惟一一位和中国开展外交关系的总统一样,克林顿是惟一一位能给尼克松那种他想要的公众信任的总统。一个在外交事务上没有经验、刚出茅庐的民主党总统,从尼克松这里寻求建议,失去的不会有什么,但却能得到很多。自从水门事件过早结束了尼克松的总统生涯,已经过了足够长的时间了,而因为尼克松在国际舞台上还是个主要的竞争对手,克林顿看到,跟他商量没什么政治依赖性。克林顿没有共和党总统在和被流言毁掉的前总统打交道时的政治包袱,他愿意把尼克松当作一个传声筒,又向他征求建议。

第二天,我走进尼克松的办公室时,他正在口述他对他们谈话的想法,他招了招手,示意我进去。

"我想让他知道,他应该多花些时间在外交政策上,因为——哦,你看,因为这个,他已经开始受到新闻界的攻击了,他必须倾向于这样,因为危机强迫他必须这样。再说,外交政策有趣多了。只要他跟我谈话,他就会顺顺利利。如果他依靠他那些卡特型的顾问,他就会陷入麻烦的。"

那天晚上,他和前大使罗伯特·斯特劳斯一起吃饭,吃完饭,他把他们的谈话说给我听:"鲍勃告诉我,他刚刚跟克林顿谈过话,克林顿告诉他,他和我的谈话是'他当总统以来最好的谈话',他从我谈话中知道的东西比他从他所有的顾问那得到的还要多。克林顿想知道,他也这么跟鲍勃说了,在俄罗斯问题上,他需要我的建议。他告诉他,他在选举完后收到的我寄给他的信是他收到的信中最感人的。好了,这个人也可能在说大话,但至少他知道怎么样使用外交辞令!不管怎样,克

林顿是个听众,我的感觉是他非常害怕失败。他给我打电话需要勇气,但是,也许这些勇气是因为害怕才有的。"

尼克松在3月5日的《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下一篇特约稿,继续向克林顿献殷勤。原来的题目"克林顿总统的历史性机遇"被改成了更有力的"克林顿最大的挑战"。尼克松一开头就把这挑战向新总统言明:"如果克林顿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外交问题发表讲话时展示同样的领导素质,那就保证了他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总统的地位。这个问题就是俄罗斯政治和经济自由的生存和成功。"

尼克松继续把那个进程的障碍说出来,包括物价飞涨,犯罪率、生活水平下降和激烈的种族冲突。然而,还是有代表改革前景的正面标志:不断增加的私有化和私有工业的发展、新闻自由、不足的东西更少了,还有对经济刺激越来越敏感的劳动大军。他督促西方要马上增加对俄罗斯的经济援助,调整其债务,还要有一个负责组织给那个国家的货币、商品和服务的协调人。尼克松写道:"如果在这关键时刻,美国没有提供其可以提供的领导作用,那会是很可悲的。"

像1992年援助俄罗斯的备忘录一样,这篇文章又发表了一个熟悉的论点,而且使用阿谀奉承的方法来劝说总统。不同在于,新总统可能比前面任何一个总统对这些建议都更开明。克林顿在外交事务上有不安全感,在国外和在国内一样需要受到尊重,尼克松可以在这些问题上做文章。最重要的是,尼克松迎合克林顿的虚荣心,暗示说只要他听他的,他就可以跻身于伟大总统的行列。这策略起作用了,至少一开始是这样。

在他去白宫前几天,尼克松对我说:"如果你能想到什么

我必须告诉他的——尽管大多数都已经写在《纽约时报》上了——那就告诉我。"

我建议他告诉克林顿，他见过面的东欧国家的领导人害怕美国从欧洲撤退以及德国的复苏，这比他们害怕俄罗斯独裁政府代替脆弱的民主政府的程度还更厉害。尼克松同意，应该告诉克林顿这一点，尽管他接着说："当然德国不是什么威胁，但他要认真考虑东欧人的事。"

尼克松3月8日在白宫跟克林顿会面，在首都多呆了两天，在白宫作了一次期望很高的演讲。事情被讲得很全面、很实在，3月11日，尼克松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新泽西。

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正坐在办公桌后面微笑着。我坐在通常坐的椅子上，他走到角落去，坐在我对面。"这次旅行，"他说，笑了，"很可能是自从我不当总统后到华盛顿最好的一次。白宫的演讲真的很好。我成功了，因为我想跟他们谈话，而不是对他们讲话。我告诉他们，上次我在那讲话是在43年前，在我就阿尔杰·希斯案件和高级官员简单讲话的时候。谁会想到1993年我还会回来，在这里谈民主俄罗斯的问题？他们喜欢这次讲话。我说我听到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他被杜鲁门从朝鲜召回来后的讲话。他说：'老战士决不会死；他们只是消失而已。'我说：'老政治家有时会死，但他们决不会消失。'大家都在欢呼！噢，真的！真的很好。"

他在软垫凳上重新把脚交叉着搁好，继续说道："在白宫的会面是我当总统以来最好的了。"尼克松谈了他和总统及第一夫人的最初接触，然后告诉我他告诉克林顿的"头号问题"：俄罗斯。

"我告诉他，在俄罗斯，行动的冒险性很大，但不行动的冒

险性更大。他接受了。他对中国也很感兴趣。他要我告诉中国人,他是个好人,因为他对他们对他怎么看感到很不安。我告诉他要在援助俄罗斯这个问题上对日本施加压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问题上打击他们。我告诉他有关粮食交换买卖的时候,他坐直了身子。当我说俄罗斯应该发展一个企业家阶层,而且要在群众阶层中发展时,他还做了笔记——那就是和平军队的精神,这就是他为什么要记的缘故。他还同意,这比他提出来的会花更多的钱。"

尼克松继续说道:"他也说国内问题很难办。"他放低了声音,"莫尼卡,历史不会因为他做的任何国内事务记住他。经济会复苏的:这只是短期的,让我们面对它好了,这很无聊。"

我问他是不是感觉到克林顿因为国内政治受挫而苦恼时,他回答说:"是的!他越来越对外交政策感兴趣,因为他意识到,要处理好国内问题是很难的,而且没人感谢你。布什政府的最后六个月,外交政策是个孤儿。克林顿得抓住这一点。"

克林顿这么公开见他,是要冒政治危险的。尼克松显然对此很欣赏。"我想,克林顿请我到那去表现了非凡的勇气。我认为,我们可以在俄罗斯问题上及他需要的任何问题上合作。在所有这些事情上,我的感觉都很好。"

尼克松和现任总统之间为富有成效的、真诚的合作关系建立了一个舞台,他认为现任总统能听取他的建议是很聪明、很经得起考验的。克林顿不但急于向尼克松学习,而且,在国家的对外政策上,他似乎比里根或布什更愿意让尼克松有更大的影响。

尼克松正在考虑下一步行动时,不代表全体选民的、反对

改革的俄罗斯国会投票剥夺了叶利钦一些权利,给自己赋予了更多的权利,使西方一些人猜测,俄罗斯总统对一个占支配地位的、非选举产生的国会失去了控制。"这些新闻界人反应过火了。"尼克松在3月12日说,"俄罗斯人争权夺利。我知道一些白痴在说克林顿不该犯布什犯的错误,对叶利钦投资过多,就像布什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投资过多一样!那纯粹是胡说。那是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共产党和民主之间的选择。我们在谈什么呢?"

他停了停,又说:"今天早晨国会摊牌后,我很关心叶利钦的前途。这些新闻界的混蛋想让他失败,好证明他们是对的。叶利钦需要一个经济领导人和政治顾问,我真该到那去告诉他怎样对付这个该死的非法的国会。"

我问他叶利钦是不是该考虑解散国会,"为了挽救民主只好先搅乱民主了。"

"我再同意不过了。紧急管制——用法令来管制——很可能对使改革进行下去是很有必要的。"他的愤怒又爆发了,"国务院那些该死的笨蛋们都是怎么啦?他们难道不明白这个?他们为什么不支持叶利钦?我要给赛姆斯打电话,告诉他给叶利钦传个话,取消4月的公民复决投票。在他的支持人数减少、经济处于低谷的时候,不应该进行选举。他会输的,如果他这么做,他就得辞职。这赌注太大了。"

那天晚上晚间新闻过后,他打电话给我,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叶利钦前途"不乐观"的报导发愁。他问:"你认为他们这么做是不是要使我难堪?"

我告诉他,俄罗斯的形势已经很严峻,足以证明关于叶利钦政府有潜在的垮台危险的新闻报导是对的。

"我知道。只是我——哦,我并不后悔为叶利钦公开发表不同意见。如果新闻界要说'我告诉过你的',那就让他们说好了。"

几天后,他听说政府已经在考虑派部队去莫斯科支持叶利钦政府,他为此感到很吃惊。"你不能派美国部队到俄罗斯去,看在上帝份上。他们的军事力量已经够强的了,都有他们自己的日程。如果我们反对了布尔什维克,那就灾难临头了。再说,我们不能去干涉他们的内政。"他尖叫着,"噢,我的上帝!"

美国必须广泛了解俄罗斯的发展情况,又不卷入俄罗斯的政治斗争中去。除了非常明显的民族主义极端分子,美国可以容忍各种势力集团对经济和政治改革提出不同的建议。要坚持要俄罗斯根据美国政府的惯例在国内国外都采取一致行动,这是不稳定的,也是错误的。要求政策完全得到执行的代价太高了,对俄罗斯人、美国人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都是这样。

潜在的现实是,要等到苏联时代的体制和未经选举的从旧有程序中沿袭下来的国会议员被换掉以后,俄罗斯的第二次革命才会完成。新的选举应该保证所有的派别都处于民主的同等起点上,而通过支持改革进程,美国可以增加改革者的选举机会。

3月18日,尼克松走出了非同寻常的一步,就如何处理和国会的冲突问题给叶利钦提建议。他给俄罗斯总统简单地写了个备忘录,告诉他他已经和克林顿、他的政府官员及国会领导人就帮助俄罗斯一事广泛地商谈过。他指出,他发现在国会里提倡大力援助俄罗斯得到了两党的大力支持,无疑,克

林顿要制定出全面的援助计划。

然而，有关俄罗斯政治局势越来越不稳定的报导会使这一点产生危险。他督促叶利钦避免和俄罗斯国会正面冲突，至少等到4月4日和克林顿在温哥华会晤完再说。他告诉叶利钦，等到7月份，他和克林顿的首脑会晤获得成功并且获得七个工业国集团可能增加的援助之后，从政治上来说，他对付俄罗斯国会的力量就更强大了。

他叫我把他给叶利钦的建议传真给华盛顿的大使卢金，再由他转给叶利钦。这是个非同寻常的政治策略。由于干预另外一个国家的内政不但是不合适的，而且会产生相反的结果，所以，给一个外国领导人提的建议应该提得很小心。然而，俄罗斯的总统和国会之间的形势如此紧张，尼克松被迫要介入了。

快到3月底的时候，尼克松对美国总统在援助俄罗斯问题上采取更有力的行动越来越悲观了。尽管尼克松一再重复劝告，克林顿只是有限度地采取行动。加拿大首相布赖恩·马尔罗尼3月19日打电话给尼克松，告诉他，他刚刚跟克林顿谈过，督促他就俄罗斯局势召开七个工业国集团紧急会议。问题是，即使克林顿想实行更积极的计划，但是，政府以外也没有一个有能力有水平的人充当协调人。

“我觉得，克林顿有义务为俄罗斯多做些事，但我希望他不要只是告诉我想听的东西。布什和贝克在外交政策上缺乏独创性，大受其苦，他们在冷战后期当政真是一种耻辱。可是现在克林顿有个历史性的机会，可以去做些事，我觉得不是偶然出现的。我正在就俄罗斯一事给多尔口授一份备忘录。也许他能做些什么。”他说着从手提箱里拿出手提式录音机，“某

些人最好要听些东西。”

第二天，尼克松听说叶利钦已经颁布“特别管制令”，等到即将到来的4月25日对他任总统的公民复决投票结束以后才取消，为此尼克松感到很生气。“他对我的建议一个字也不采纳。”他说，一拳砸在桌子上，“也许他没收到我的备忘录。我不知道。我告诉他要避免和国会正面冲突，可他却偏偏这么做了。可是问题是，他越来越孤立了，他得到了不好的政治建议。他太卤莽，太感情用事了；他是凭心情而不是凭头脑行事的。而现在，包围着他的顾问都是跟他一样卤莽的。在这问题上，每个人都应该保持镇静。

“白宫和克林顿处理这个问题（与国会冲突）的方式给我印象很深。他们很冷静地支持叶利钦，连通信系统的主任乔治·斯蒂芬诺波罗斯也处理得非常好。他比布什的新闻秘书马林·菲茨沃特好多了。他的回答简洁而切中要害。不要说太多，这是很重要的。

“我希望，对给叶利钦的这个备忘录，我没有得到坏消息。可我希望我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是他收到了，但不予理睬；还是他根本没收到。”

布什、克林顿、多尔和叶利钦全都是尼克松在俄罗斯问题上提建议的直接对象。没有一个人根据他的建议采取了有意义的行动。他的建议没有引起注意，这使他很气愤、很失望、很沮丧，但这并没有阻止他继续提建议。

克林顿在3月23日举行了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尼克松对他的表现“印象很深”。他处理得非常好，不但是在俄罗斯问题上，而且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是这样。在俄罗斯问题上，他要进一步支持俄罗斯的声明很强烈、很正确。见完记者后的那

-天，克林顿打电话给前总统。下午迟些时候在他的住处跟我会面时，他把他对谈话的看法告诉了我。

“大约 2 点 30 分，我接到克林顿的电话，我们谈了大约 20 分钟。他是要我给他提坦率的建议——不是吹牛皮。我感觉到，在俄罗斯问题上，他是真的不知所措了。我告诉他，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他在俄罗斯问题上所做的事都非常突出，他应该带着一个有意义的援助计划去见叶利钦。我反复重申，支持叶利钦是冒险，但如果他没有美国的支持垮台了，那还会更糟。他应该单独跟叶利钦见面——不能有秘书或是其他笨蛋。过去，如果我等着官僚机构的话，我们也就决不会有跟中国的第一次接触了。

“他告诉我他对俄罗斯政策的四种选择，其中两个非常荒唐可笑。在部长这一级，你什么事也做不成。我为此给他发了一份传真，我认为这传真非常好。我告诉他，他应该发表一个真正的计划，清楚明白地支持叶利钦。他应该利用七个工业国集团的首脑，使这计划足够大。他应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叶利钦见面，然后到东京去向日本人提出紧急要求。他们应该为俄罗斯做更多的事。”

他停了停，又说：“他问我，我是不是认为他应该和基辛格谈谈。我不能告诉他不要去，尽管亨利很出色，那也正是他想要的。所以我告诉他先去跟斯考克罗夫特谈谈。不管怎么样，他很可能在搜集别人的建议，所以我也就给了他一些额外的建议。我告诉他，他跟其他人谈话的时候，他应该告诉他们他打算做的事，然后再问他们的建议，因为如果你先问，然后又做了别的，他们就会不高兴。克林顿喜欢跟每个人谈话，可是你跟他谈时，你的思想就会慢慢趋于缓和。可你怎么会喜

欢这样呢?"

尼克松是个现实主义者,也知道克林顿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在搜寻建议,而不是为了尼克松的利益在这么做。可是,尼克松知道,他亲近克林顿的地位能保证他接近他,而且使他有影响,所以,也像克林顿奉承他那样去奉承克林顿。这是一种互利关系:克林顿从国内老政治家那里得到了非常需要的外交政策,而尼克松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公众信任和接近总统的机会。每次克林顿把他的建议掺入有关俄罗斯的讲话和言论中去的时候,尼克松就越发地对自己影响新总统有信心。

听到叶利钦成功地渡过了一次国会对他的指责性投票难关,使成千上万的人上街表示支持他,尼克松为此感到很欣慰。"即使国会投票反对他,他也应该对此忽略不管。"尼克松在3月28日这么说,"我们不应该派外国顾问过去。他和不妥协者之间日子很不好过。如果他们认为他向西方屈服,那他们会把他杀掉的。顺便说一下,我听说克林顿在考虑用前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为大使到莫斯科去。那会是个很大的错误。他对经济方面的事一窍不通。

"我担心政府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钱上面,而是在人上面,像和平部队一样,那是一文不值的。日本人不反对援助俄罗斯了,但我们也得跟在他们后面。叶利钦跟国会摊牌是个优势,至少他没有跨掉。那个宪法是个令人讨厌的玩笑;在冷战中我们还笑话它。可是总的说来,政府在这些问题上都挺好,特别是我们考虑到克林顿被选上时对外交政策一无所知,他知道的有关俄罗斯的惟一的事,就是他作为克格勃的客人到那里去时所知道的事!"

尽管克林顿公开许诺要援助俄罗斯,他还是被美国经济

和其他国内事务弄得束手无策。所以,尼克松觉得有必要再到远东去一次,以把国家的注意力重新集中到外交政策上来。和中国、日本、朝鲜的关系都受到了不太严重的忽略,尼克松试图去关心那些关键的关系,并且站在俄罗斯一边为其争辩。他决定从太平洋沿岸地区来采取这一平衡行动,希望政府会重新调整它的重点。

4月3日,我们飞往东京的途中经过安克雷奇,尼克松告诉我,他接到安东尼·莱克的电话,他现在是克林顿的国家安全顾问,原来他是尼克松—基辛格全国安全队伍的老兵。尼克松戴上眼镜,从手提箱里拿出一本黄色的法律记事簿,他把谈话内容记在上面了。"我告诉他,我欣赏他们对俄罗斯的有勇气的访问。他说,如果我没有领头,就根本没有这次访问了。他提出了一些他想让我跟中国人讨论的问题——重要是人权方面的问题——这样他们就可以追逐那些反对最惠国待遇的人。还有俄罗斯方面的事,他说七国首脑会议还是个最新的主意。"他把记事簿放回手提箱里,取下眼镜,"我不喜欢他对越南或者对基辛格所做的事——或者说给我留下的印象不深。"他说,指的是莱克拒绝接受尼克松的越南政策的事,"可我得跟这些人相处好,他对我很有帮助。"

我们在阿拉斯加的时候,叶利钦和克林顿的首脑会晤如期进行了,尼克松对会谈的基调以及克林顿如何有效地控制叶利钦很感兴趣。我让他放心,克林顿似乎给俄罗斯总统投了他非常需要的信任票。

"如果克林顿继续走这一步,而且坚持完成的话,叶利钦就可能坚持下去。"他说,"而克林顿就将取得历史性的胜利。"

亚洲之行暂时转移了尼克松对俄罗斯的注意力,但是,4

月25日，他回来三天后，莫斯科的进展又一次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公民复决投票中，叶利钦得到了70%的赞成票，尼克松欣喜若狂了。"作为一个政界人物，我原来认为他不会赢得这么大的胜利！而他是在改革继续进行当中胜利的。经历了70年共产主义后，看到他们投票，而且投得对，这真令人激动　听听我们该死的新闻媒介说的，你会以为他输了。他们谁都不想让他成功。他们播新闻的时候太悲观了。我想起了1956年，在他们说阿德莱·史蒂文森要胜利的时候。史蒂文森！"

"1960年——"我开口说道。

"是的，在他们说肯尼迪会以压倒多数的选票胜利的时候。"

"还有麦戈文。"我又说道。

"80%的新闻媒体给麦戈文投票。"他说。

"给叶利钦投票的70%的俄罗斯人大多数都是他沉默的选民。"我说。

"太对了。向新闻媒体挑战。"他说。

第二天，他又接到克林顿的电话，把谈话内容对我说了。"知道我今天又接到克林顿的电话，你一定会很高兴的。"他说道，"他为我带头援助俄罗斯又一次谢了我，他对俄罗斯的选举结果也很高兴，尽管他同意我的观点，认为新闻媒体轻描淡写地报导叶利钦的胜利，真是令人讨厌。自然，我并不支持克林顿，但是，新闻媒体追着他跑的时候，我会站在他那一边。不管怎样，我告诉他——再次——这次打的是有关援助问题的有勇气的电话，但却是正确的，他说他刚刚跟叶利钦谈过；克林顿说叶利钦对援助计划感到很高兴，可是要使那该死的

官僚机构去实施计划,他还是有困难的。这些是他自己的人民!可他们有社会主义思想、行动像蜗牛一样缓慢。我告诉他,我完全理解。你看,如果我们依赖官僚机构,我们在中国、俄罗斯、欧洲和中东问题上取得的成就就连90%都决不可能有的。

"哦——他打电话的主要原因是要问我对波斯尼亚局势怎么看。很明显,他正倾向于取消禁运,用有限度的空袭对付塞尔维亚人。我告诉他,我同意,但是,不管他决定什么,我都会同意的。和平协议甚至还只是一种选择以前,我们在那块土地上必须平衡武力,自那开始,他走的都是对的路,可我不想推波助澜,以免他做出些别的事来。为了再次强调这一点,我对他说,你在战场上能够赢得的,你在谈判桌上却只能谈判。我说,如果塞尔维亚人不停止,他们可能会进军南斯拉夫的其他地方。他被切中了要害,说:'是的,或者世界其他地方。'他倾向于采取行动,认为英国和法国也会一起行动。我还告诉他,他不可能在那里打赢战争,但他可以在那里提供一种力量对比,这可能使他们的头脑清醒些。

"他听了,"他继续说道,"可是谁知道我们明天又会听到什么事呢?他很容易受新闻界压力的影响。看到《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尼·刘易斯支持我们干涉波斯尼亚的事,而他在我们轰炸越南的时候是经历过那生活变化的,这真令我生气。有民主党人当总统,我想,军事干预可行。"他咧嘴笑了。

"噢,我还告诉克林顿,叶利钦应该像中国那样吸引私人投资,他说,他想以后再跟我谈中国的问题,不然就混在一起了。"

"克林顿很聪明。"我说。

"他确实聪明。"尼克松说,"可你确切地是指什么呢?"

"哦,在谈话最后提到中国,他让你心痒痒的,等着下一次电话——而且作好准备,等着它来。"

"当然,"尼克松说,点了点头,"这家伙知道怎么玩游戏。"

前总统也知道游戏是怎么玩的,而且他玩得很好。由于尼克松使自己成了必不可少的人物,克林顿就依赖他。5月1日,尼克松说,会给克林顿带来有利影响的一件事便是"他在俄罗斯问题上采取了勇敢的行动"。

"假设,"我说,"他进一步采取行动,让国会通过计划。"

"确实,"尼克松说,"但是,即使如此,至少他也已经做了。"他停了停,会意地说,"我希望他对总统应该并需要大量勇气才能作出的决定有个更好的理解。我怀疑他对波斯尼亚会不会做什么事。他的党派中的解放运动组织要求他要做出些什么,可我认为他不会。

"你知道,几天后,也就是5月8日,我们将要庆祝我过去必须下的第二个最难下的决定的纪念日,第一个,当然,是辞职。这个却是1972年的轰炸海防市。我们担心苏联人。这是特别困难的决定。没有一个人——只有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除外——支持我。埃利奥特·理查森已经准备辞职,基辛格在躲闪、推委。我认为克林顿打这艰难的电话时心里没有想这些。

"中央情报局的局长艾伦·杜勒斯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来见我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把所有这些都写进了《六个危机》中。他对我说,他告诉肯尼迪'不要让它失败'。我的上帝,你得一直走下去,或者什么也不做。在波斯尼亚的问题上,克林顿不该半途而废。所有这些哈姆雷特式的深思熟虑

使他看上去很弱。我们得让我们的同盟者、国会和人民一起行动。他没有告诉他们我们将要怎么做，却要他们同意！这不是领导！他不怕任何人，克里斯托弗也不怕。希拉里引起了恐惧。你得把恐惧放在这些人身上，或者用沉默吓唬他们——什么也别说，任其处于不确定当中。可我发现，他在这上面的优柔寡断显然令人非常震惊。"

尼克松开始担心，克林顿对他说要支持俄罗斯的援助计划及在前南斯拉夫采取更大行动的话都是空头支票，是为了安抚他并预先制止别人指责他才说的。尼克松担心，他只是在告诉他他想要听的。尼克松知道，克林顿在政治上采用权宜之计方面是个大师，可他不打算被利用。如果克林顿只是把潜在的不同意消灭在萌芽状态的话，那尼克松的反应会是：不但要严厉谴责克林顿的政策，而且要严厉谴责他的方法。

"我不知道冷战后美国要做什么。"5月17日，他说，我们一直在讨论尼克松决定叫作《超越和平》的新书，因为和平作为终结已经不再能激发政策。"我们的目的是用例子来说明问题——不是波斯尼亚的例子。这太会引起争论了，我不知道他们到底要做什么。也许你可以看看那次堪萨斯城的演讲。不，"他突然说，"我不想去看那个。新闻界那些傻瓜没有一个人对那次演讲加以注意的——只有毛泽东注意到了。其他的谁也没有。

"这本书当然要讲俄罗斯，这还是首要问题，不管政府做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我们需要有更深刻的原因说明为什么这书很重要，它对美国和全世界意味着什么。这是传教性的东西，好了吗？我们可以做吗？"

“哦，如果你不能做的话。”我说。

“那是逃避，”他回答说，“考虑考虑，我们能不能——我意思是说还有我们将要进行的那些攻击——我们能做吗?”

尼克松担心，克林顿领导上的优柔寡断和失败会使美国失去它曾经赖以成功的非凡的权力、优势和可信度。新书试图恢复一些已经失去的指导原则。到6、7月份的时候，尼克松开始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这本书上。6月1日，他告诉我说，他想把这本书写成他写过的书中最有“个人”性质的书，“当然，跟《尼克松回忆录》和《在政治舞台上》是不一样的。我想让这本书全部是我自己的事，不只是政策处方，这会削弱它的力量。我们要把这本书写成富挑战性、有促进精神、提出问题的书。还应该写到这一实际问题，即没有战争的现在，对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除了仅仅维护和平以外，我们还要面对什么挑战?除了战争，有没有什么东西能把整个国家的人团结在一起的?它道德上同等的东西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能作出回答；我不知道它们到底能不能被回答出来。可我们要试试。

“我想让它有三条主线：第一，战后我们从这里要走到哪儿去?第二，我们有种精神危机，或者不管你怎么称呼都行。第三，美国作为榜样应该有些什么东西?——不去谈细节问题，虽然我真的想大力抨击多边政策，因为联合国一钱不值，而克林顿的人似乎都被它钩住了。

“我要你到这来，因为对这个计划，我要征询你的意见。你知道，《六个危机》是我自己弄的。读起来就像是我。它比较粗糙。《尼克松回忆录》我得到了弗兰克·甘农和黛安娜·索里的帮忙，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在《真正的战争》中，我们有

雷·普赖斯(尼克松在白宫时的演讲稿撰写组的负责人)和其他人帮忙。《在政治舞台上》全是我写的,你知道《只争朝夕》的安排,因为你也起了作用。对于美国,我相信什么东西,在这本书里应该是最有我个人见解的,因为这很可能是我最后一本书。我心里可能已经有一本,我认为就是这本了。"

六天后,我们在他的寓所再次见面,讨论新书的观点问题。尼克松很放松,急于准备列个提纲。根据他的要求,我买了一本阿伦·布卢姆的《走向封闭的美国心灵》,带着它去见他。我到的时候,尼克松坐在三楼他的书房里,在专心阅读他的一些笔记。

"请进、请进,"我走到楼梯顶部时,他说道,"你准备好和我漫谈了吗?在准备一本书时,我发现,我们把观点提出来讨论的时候,这些漫谈非常有帮助。这真的会开动脑筋。"

尼克松开始了意识流式的背诵,涉及很多主题,有一些成了书的一部分,有些只是当时在他头脑里出现的东西。

"我不赞成这种出口民主的大话。"他说。"民主不属于任何地方。不是所有的社会和文化都应该有的。这是不可取的。

"看看俄罗斯人。他们决不能承受我们这种民主,也承受不了亚洲型的民主。他们也不该这么做。他们必须找出自己的路,一条对他们来说有效的路。

"重要的是,美国必须起领导作用。对那些说我们不配领导的人,我说:'那是胡说八道!'其他还有谁能领导呢?没有。你知道我的意思的。

"我们必须避免这些有关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松散的谈论。尽管我喜欢'民主资本主义'这个词组,但我们的一些朋友一

听提到这就会发疯。"

他拿起布卢姆的书。"你看过了吗?"他说,用书指了指我,"头两三章是很大的成功。接着就谈起了哲学性很强的东西,于是变平淡了。我要避免这一点。"他把书放下。

"看看最后一次选举发生的事——庇隆主义不是在真空里发生的。看到宗教权利赢得这么多动力,我感到很不安。他们对党派的作用可能非常积极,我很高兴他们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可是他们的一些立场,像流产是不合法的,对美国人来说太极端了。不应该允许他们接管党派或是国家。他们受到了个人愚蠢行为的阻碍。我赞赏他们的原则,但认为它们不应该变成政策。这就是我在我自己和我的老朋友帕特里克·布坎南之间应该有距离的地方。

"这个国家还有很伟大的事情要去做。冷淡的物质主义是不够的。没有了美国,世界会是什么样的呢?那会是个恐怖的世界。伍德罗·威尔逊[①]这个人,我有很多原因仰慕他,他认为领导只能通过道德力量来实现。那正是亨利·卡伯特·洛奇[②]异议的所在。当然,这种异议导致了隔离主义,在30年代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引起了大规模的战争。

"说到战争,你知道,得用理想的词汇把它描述出来,要不人们无论如何是不会支持战争的。在朝鲜,我们和共产党打。在越南,要把这信息说清楚就更难。在海湾战争中,我得给侵

① 伍德罗·威尔逊(1856—1924),美国第28届总统(1913—1921),领导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倡议建立国际联盟,获1919年诺贝尔和平奖。

② 亨利·卡伯特·洛奇(1850—1924),美国参议员,制定反托拉斯法案,支持美国参加一战。1919年任外交委员会主席,反对国际联盟和凡尔赛条约,成为美国孤立主义的代表人物。

略者发信号。战争是件大事，只是因为它在一项普通的任务中把人民联结在一起了。我们应该找到它的代替者。我们在这是为了另一个目的，更有意义的东西。和平只能是个基础。我们真正在寻找的东西是题目暗示的东西：和平后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尼克松的思考既具体又有哲理。他在寻找世界上没有具体的冲突后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角色的意义。战争期间，和平本身就是目的。现在再也不是这么回事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总是会有的，但尼克松想保证，美国除了用只是维持和平这一点来支撑自己的存在以外，还应该有些别的东西。即使他不能提出解决办法，至少他可以提出这个问题。

他下一个思想和想法来临的时候是在6月23日。

“我口述了一份有关E·H·卡尔的备忘录，和今天的问题有关。”他说，看上去筋疲力尽、很累的样子，“我要强调的一点是，人民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而且他们也应该这样，就像政府一样。我要打倒这种胡说八道，那就是，惟一重要的角色在于政府控制的企业。这不是真的。工厂里的人和在该死的环境保护局里的官僚机构里的人是一样重要的。政府是种好行业，但不是更高级的行业。希拉里在空谈有关迈克尔·勒纳的大话——政治意义或是管它是别的什么——我们必须避免埃莉·克利夫特批评希拉里的那些令人厌烦的、多愁善感的胡说八道。

“我们要解决深层的问题，不要那些没什么意义的伤感多情的东西。但这本书应该是辩论性的，不是纯粹对观众甩手腕的东西。”

几个星期后，在7月7日早晨，在他的府邸进行的有关书

的一次会面中,他继续说了这个主题:"哦,在书的开头,我要用有力、生动、别具一格的散文抓住读者的心。看看七国首脑会议。如果比尔·克林顿是那里最受欢迎的领导的话,世界就好极了。

"我要抨击联合国,可你会说它挺好的,虽然它一点意义也没有。我们不要谈美国第一这种大话。可是,如果我们不谈政策的具体细节,那就可能会松松散散的,可我们怎样才能避免希拉里那微妙的伤感主义呢?我们会被批评成'牛排在哪里?'这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一件事。这书必须全面,有哲理性。我们怎样激发我们的价值?通过家庭、教堂,还是——上帝保佑我们——学校?希拉里和勒纳在那飘游着,但她在忙着某些事。这里有个精神真空,我要谈论它,又不要陷入不安的境况中,可那还不是所有的一切。冷战结束了,却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任务来代替它。

"对那些无效的政策,我要彻底地讨论:里根的、布什的,还有我自己的。从个人角度,我对它们感情很深,但我不再准备支持它们曾经支持的东西。

"就像宗教权利。他们提出来的问题,像流产问题,像巴拿马运河问题一样煽动了选民——记得那件事吗?这是件好事,但不是要为之争取胜利的事。流产问题,我当总统的时候就该处理的,我还说过政府不会提供资金鼓励这件事,可是妇女应该有自己的选择——哦,我没说'选择',虽然也就是这么回事。那时论点还没有形成。

"我也赞成控制武器,因为,我还在海军的时候,惟一打过的一枪却没有打中任何东西!可是真的,需要控制武器。

"民权也是个关键的问题。我比肯尼迪在民权问题上更

能胜任;他并不是真的在乎。我当副总统的时候,为民权投票展开争论的时候,我是孤立的。在这个问题上,艾森豪威尔很保守。可我说,世界上 80%的人都不是白人,我们应该考虑到我们在这做的事在国外有什么影响。这国家还是有很多种族主义。

"我也要抨击罗斯·佩罗特。他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不对的,还有多数主义——他是不是要在电视上为了更多的野生动物,像火鸡或别的该死的东西,举行民意测验呢?不,这个国家不是这么回事。"

他很有预见,预料到一些政治结果:"1994 年,我们要得到五到六个参议员席位,这将会是个有相当多共和党席位的年份。看,1946 年,第 80 届国会,我们在众议院和参议院都赢得了胜利。1948 年,由于杜鲁门的被击败,我们在两院中都输了。1950 年,我胜利了,塔夫脱在俄亥俄州也获胜了,我们在众议院中赢得多数票。1952 年,由于艾森豪威尔,我们在两院中都胜利了。今天,我们要在两院中都取得胜利,还有可能在 1996 年破记录呢。这意味着冷战结束最终要由共和党来操纵。至今为止,两个党派都非常紧张,但是,在这本书中,我要把我的信息传给这个党派和国家的未来的领导人。冷战结束是件很严肃的事。"

他交叉着两手放在腿上:"我记得去国会山宣传外交援助计划的事,我做得不赖,但是只是在我把它和苏联的威胁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做得不赖。有些人声称,冷战绝对没有必要进行,因为共产主义总是会垮台的。我们应该抨击这些人。邪恶的观点不可避免地是会失败的,但在它们失败以前,会造成很大的危害。它们还得扩展以谋求生存。那就是为什么遏

止政策是对的原因；我们阻止了西欧的屈服，并且阻止它们继续扩大到第三世界。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只能够安抚那些孬种；让我们面对它吧。共产主义只有保持其纯洁性才能生存下去。它妥协的那一刻，也就是它灭亡的那一刻。

"60年代初，赫鲁晓夫说'我们会超过你们。'接着这个国家对人造地球卫星都疯狂了，这就有了肯尼迪有关导弹差距的一派胡言。那时有经济竞争，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那时有多弱；有军事竞争，可是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估量的。现在，我们却没有了。什么也不清楚，那就是为什么有更大的挑战的原因。那就是椰子的果肉部分。

"参议员亨利·司库普·杰克逊——我的朋友——像他的名字'Scoop'一样抢先行动、比其他人略胜一筹。可是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无心进行冷战。我记得肯尼迪和我在国会投票赞成希腊—土耳其援助时候的事，我们收到了几百张明信片，上面写着'送食品去，不要送武器去。'

"想想恩格斯说的'有必要改变这个世界。'改变有时是很好的，有时又是不好的，可我们绝对不能为了改变而改变。我们现在面临的和平的挑战比我们在1945年面对的还要大。那个挑战只要有更强的经济、军事力量就可以与之抗衡。可今天我们要面对的是这些软绵绵的价值概念。领导层使我们失望了。美国的头脑不清醒，但心脏还是好的。"

尼克松开始把这些主题写进《超越和平》的初稿里去。他有关援助俄罗斯的具体建议受到两个总统的忽视，这使他感到很失望。他决定，他应该把他的精力用在面对这个国家的更有哲理性的问题上去。如果尼克松在冷战后期不能影响政策，他至少可以影响将会形成的新时代的思想。

9月4日,尼克松开始编辑《超越和平》的全稿。他对其内容感到很满意,虽然也担心它会招致批评,而对这些批评,他是完全没有准备好作出答复的。

"写这类的东西就像生孩子一样,尽管我从来也没生过孩子!我作完'沉默的大多数人'那次演讲后,我也是这么说的。我说:'孩子生出来了。'不管怎样,我担心我们的批评家们会辩护说:'这个在越南问题上促成了精神危机的人现在也在这里谈精神危机,这家伙是谁呢?'——这是他们老是攻击我们的东西,尽管他们不应该;'还有水门?'——那是越南的孩子。"

我安慰他,说危机在越南战争、水门事件和冷战结束以前就已经开始了,而且必须要由某个对其起过作用的人来讨论。

尼克松点点头:"也许你是对的。也许这确实需要某个跟这有关系的人可信地把它写出来。我不知道。坦率地说,我并不真的很在乎批评;这只会使人们对书更感兴趣。而我必须这么做,我真的必须这么做。"

"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国家?"我问。

"都是。"他回答说。

9月中旬,他暂时又把注意力放回到俄罗斯的形势上。他原来担心叶利钦在政治舞台上会活不下去,现在却担心他在身体上会支撑不住。

"我很担心叶利钦的健康。"9月18日,他说,"迪米特里说他酗酒已经很厉害了。他说斯特罗布·塔尔伯特试图把卢金从华盛顿召回去。他很强,但显然不够亲美。塔尔伯特应该留下来,不能插手那种事。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手下发生的腐败是在特权和工资方面的,现在他们什么也没有。

一切都是供出售的，所以他们就偷。这真是乱七八糟。叶利钦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真是奇迹，这并不归功于我们。可是如果他身体出了问题，我们就真的糟了。”

两天后，叶利钦解散了难以控制的、不代表全体选民的、反对改革的国会，国会宣称此举违反宪法，要弹劾他。在主席鲁斯兰·卡斯脱拉托夫和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依的领导下，国会控制了大多数席位和俄罗斯白宫，公开宣称反对政府。

尼克松同意叶利钦的行动。由于国会是改革的敌人，叶利钦只能再一次取消民主，为的是挽救民主。

然而，一个星期后，叶利钦开始往俄罗斯白宫抽调部队。卡斯脱拉托夫和鲁茨科依还留在大楼里，命令忠于他们的部队占领他们能占领的所有地方，包括控制莫斯科电视台。随着局势进一步恶化，尼克松又一次站在俄罗斯总统这一边。

“这些西方的评论员说，解散国会是违反宪法的行为，他们真是疯了。这有什么！那是共产主义时代的骗局！他们好像认为它是合法的一样，其实根本不合法。克里斯托弗在谈人权，真是在浪费时间，但克林顿一开始就出来坚决支持叶利钦，倒是得到了很高的赞誉。我应该说，我在这件事上也得到了一些声望，因为我们在白宫见面的时候，我们谈的就是这个。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斯蒂芬·科恩斯——攻击叶利钦严重违反宪法的人——漏掉的是叶利钦在他的外交政策上是最亲美的。其他人都是反美的，所以我们要谈什么呢？这些是相信希斯的同一类人！那真令我生气。

“还有，噢，他是总统，传媒却称他叶利钦先生。哦，我知道这是件小事，但很重要。但是，至少克林顿支持这家伙。我

对他这点表示欣赏。”

10月4日，叶利钦命令坦克炮轰被包围的国会大楼时，其实也是对支持他的人的考验。卡斯脱拉托夫、鲁茨科依和其他叶利钦的诋毁者都被抓起来投入监狱。147个俄罗斯人被杀，几百人受伤。和平革命不再和平。然而，尼克松还是支持叶利钦。

“我认为叶利钦并没有做得很过分。”他说，“他们先采用暴力的。他们是保守的共产主义者。不打，他们是决不会放弃的。叶利钦必须采取果敢的行动，他这么做了。我听说72%的莫斯科人支持叶利钦，只有9%的人支持国会。怎么会那样呢？我们的新闻界真该见鬼去！他们什么事都跟在人家后面，从封锁新闻到向对手开火。那有什么错？我喜欢这样。”他把手在空中一挥，笑了，“向杂种们开火！向他们所有的人开火！”

克林顿一定感觉到了尼克松同情他的立场，因为他在10月8日又给前总统打了个电话。虽然大多数谈话都是有关美国在索马里的军事参与的，但是尼克松告诉我：“他说他一直在为俄罗斯和日本的事工作。……我就叶利钦的事对他表示祝贺，他说有些人觉得他不该走得这么远，去支持他。至少他在那问题上是支持他的。这是次不错的谈话，可他听起来像是很烦恼、很激动。”

俄罗斯危机，加上波斯尼亚棘手的局势、在海地帮助那里恢复民主的行动以及在索马里遗留下来的参与行动，迫使“国内政策”总统把注意力集中在国际问题上，尼克松觉得“这个人对此没有推动力”。克林顿曾经希望在他的总统任期内，世界会原封不动，战争根本不是问题。他错了，10月19日他再

次打电话给尼克松。

"这次电话的内容，我想，是海地。"通过话后，尼克松对我说，"显然，他被外交政策的事弄得手足无措了。今天，他听上去很烦躁，但他跟我说话时倒挺好，甚至还说能就这些事情跟我谈话真是太好了。这家伙懂行。他学得很快。只要他能学会——"他停下不说了，"哦，我想总统要学外交政策有点太迟了。他不懂外交政策，但他很精明，知道向别人寻求帮助。"

尼克松通知克林顿，他正考虑再到俄罗斯走一趟。"我告诉他我计划到俄罗斯去时，他没有什么反应。"他对我说，"他可能在计划首脑会晤或是什么的，好像不想告诉我。我不知道。他打电话给我，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听我的。我希望我已经讲清楚，海地和索马里是次要问题，跟俄罗斯相比，那是一点也没有价值的；俄罗斯才是个大问题。"

他讥讽地继续说道："莫尼卡，我们下一次寻找事实根据的旅行是不是到海地去？"他大笑起来，"哦，那里比俄罗斯更暖和！"

克林顿真的是计划到俄罗斯去，在他跟尼克松通话后几天，白宫宣布了这个消息。克林顿的支持率大跌，民意测验表明，公众已经对他处理经济和国际事务的能力失去信心。这使尼克松猜测，俄罗斯之行纯粹是政治性的。他需要胜利，但即使这点也可能使他输掉。在冷战中，总统们总是可以依赖和苏联最高领导人的会晤来促进他和美国人民站在一起；然而，现在，人民转向国内，更关心经济而不是国际安全问题，总统也就不能保证能通过吹嘘外国领导人来在国内受益了。

然而，克林顿还是确信，1994 年 1 月和叶利钦的首脑会晤会让他在世界舞台招摇而过，从事一些高级外交活动，表现

出总统的样子，也许能够增进对他工作的赞成率。他需要在国外赢得一些成就，特别是在他10月中旬公开承认了这一点之后，那就是一谈到外交政策，他就经常纳闷："先对付谁？"

尼克松大笑道："我的上帝！我真不敢相信。你从来没承认过，即使在你什么也不知道的时候。我想，他指责英国和法国外交政策很弱的时候，他是在骄傲自大。《经济学家》要求要支全新的队伍。他们是对的，你知道。克里斯托弗必须走。布什在从俄罗斯到索马里的所有事情上都在为自己辩护，当然贝克也是。天哪！因为外交政策，克林顿必须把医疗保健和其余的东西放在次要地位，他一定要疯了！"

把国内连续不断的问题放在一边，去关注国际舞台上公众关注的中心问题，克林顿确实看到了一些好处。他不但可以把选民的注意力从他越来越不受欢迎这事上分散开去，而且，实际上，他还能改善美俄关系。

由于俄罗斯人没法保证尼克松和叶利钦会面，所以，尼克松自己的莫斯科之行便推迟了。尼克松不愿意为了一次可能不会进行的会面周游世界，他在10月底把打点好的行囊重新打开，说，在"富有成效"的时候去见叶利钦更好。"最贴切的字眼是，他也有最高潮和最低潮的时候，像大多数领导人一样。他只是把国会议员击倒，和克林顿进行首脑会晤，对日本进行了成功的访问。他的高潮期已过，现在已经产生了低潮。他在走下坡路。"

他摇摇头："我怎么活下去呢？不走下坡路是需要钢铁意志的。在我有绝大部分影响的时候，我宁愿去。副总统阿尔·戈尔几个星期后要去，离克林顿1月份要去的时间这么近，这是个大错误。12月俄罗斯还有选举。不，这次太集中了，太

多事了。我们还是等吧。"

同时,他对新书的信心也发生了危机。他认为我们讨论过的深刻的主题没有阐述充分,也许也无法阐述充分。11月5日,他建议我"清除这个计划"。我不相信。他在这书的进展上花了那么多精力,不去完成它太可悲了。尼克松却还是不松口。

"我正在考虑。我对生命和死亡是很现实的。我不想把我剩下的四五年时间都在这本该死的书上面磨掉。我不能写出一本劣质的作品。书评家——他们不管怎样都决不会喜欢我说的东西的——他们会说:'尼克松这本书失败了。'不,我不会那么做。我应该写些能使我满意而且我认为很好,可以写出来的东西。我应该做些对我有好处的事情,不是有趣的,而是我乐在其中的。我还是对这计划很感兴趣——时机到了,也有必要。但我不敢肯定我做得对不对。我不是有意打击你,但我想让你考虑考虑。"

我建议尼克松继续写下去,编下去,再润饰一下。他真的这么做了,一部分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论点也只是半信半疑,另一部分则是因为他不是个正如他所说的"轻易放弃的人"。他已经定下了一项任务要完成,哪怕在完成的过程中发牢骚也要做的。

12月3日,正当他重新把注意力放在书上时,他从赛姆斯那里听说政府计划在1月份克林顿和叶利钦的首脑会晤期间宣布一个新的俄美共同统治计划。尼克松惊呆了:"迪米特里告诉我,塔尔博特热中于要把叶利钦—克林顿的会晤变成异乎寻常的事,把它叫做'为了和平的合作'。这太傻了,会毁了北约。他们想让这成为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主要成就,好

像他们是用自己的小手做出来的。这全是公共关系。我记得俄罗斯人——哦,勃列日涅夫,我们在黑海第二次会晤的时候——说,美国和苏联应该进行共同统治,当然,中国要除外。他说其他国家并不重要。现在俄罗斯很弱,他们要把欧洲和中国排除在外。业余选手!糟糕的、糟糕的政策。"他说,就好像在批评政策本身不好似的。

基辛格12月7日来电话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亨利说斯特罗布·塔尔博特正在构思的美俄合作太可笑了——顺便说一下,记者们不应该订立外交政策。这政策和中国人、日本人有关——而欧洲人当然非常震惊。"政府想在合作这一不明朗的宣言下以及不给予俄罗斯真正需要的帮助这一基础上为一种新的关系奠定基础。这是代替真正援助的外交方式。

西方没有给俄罗斯的民主力量提供长期的大量的援助,这导致了像日里诺夫斯基那样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冒了出来,12月12日被选入国会。日里诺夫斯基——一个以反对犹太族和憎恶外国人的言论而闻名的变化无常的人——为所有的事情辩护,从恢复大俄帝国——包括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的一个部分——的军事力量,到和美国的核战争。

日里诺夫斯基入选后三天,尼克松绝望了:"我希望这对西方来说是件令人震惊的事。可是真见鬼!我们保证过的援助一个也没有到位。这真可悲。而现在已经在那里的戈尔又做了些确实愚蠢的事。他谴责了日里诺夫斯基。现在这家伙很坏,但你别说出来!不管他有多讨厌、多可恶,你可能都要跟他合作。不管怎么样,至少这次事态发展结束了'合作关系'。"

日里诺夫斯基被选这一明显的倒退是个生动的例子,说

明苏联共产主义的结束并没有保证他们正朝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这一洪流前进。俄罗斯政府和相当一部分俄罗斯人民有个不切实际的期望,希望外交政策中新的、非侵略性的行为以及信奉国际金融机构的建议能够带来几亿西方的援助。这些希望破灭后,这种反冲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莫斯科,人们的感觉是,政府愿意帮助俄罗斯只是压制它的一种策略。这一不公平但却是真实的看法对俄罗斯的每个人都造成了不利,包括相信和美国进行战略合作的叶利钦。如果这种观点持续下去,就会继续产生像日里诺夫斯基这样的候选人,把合作关系变成对抗关系。

1994 年是尼克松的最后一年。年初,克林顿从莫斯科回来了。"首先,他到那去是为了促进这'和平合作关系',不管人们认为那是什么。这么混沌的头脑!我真为那些可怜的东欧领导人感到遗憾。除了接受这次合作关系外,他们还能做什么呢?其实他们真正需要而且配得到的是成为北约的成员国。

"第二,克林顿把这次旅行当成一件好的乐器在把玩。他去了市场;当然,是很贵的那个,不是我去的那种普通俄罗斯人去的。但那也行,那正是他想做的。可他得想想形象,想想他在那怎么应付一般的俄罗斯人,在这又怎么应付普通的美国人。"

克林顿和叶利钦的首脑会晤收效不大,只是进一步强调,只要在一定的经济款项范围内,美国将支持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尽管克林顿向尼克松保证,他会提供援助,但他又一次违背了他的诺言。在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势力上升阶

段,形象一点意义也没有。

2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尼克松和我最后编辑了《超越和平》,冷战结束把两个主要的主题提到了显著地位:必须支持俄罗斯和必须给美国定一个新的任务。2月9日,他从头至尾阅读了全部手稿,对我说:"我很高兴。这确实是本好书。它没有回避重击。我真不相信,在几乎把它从窗户扔出去之后,我还会这么说,可我认为这书很好。我真的这么认为。可我不会再读了。交稿之后我是从来不再去读的。你想:'为什么这次我不有所不同呢?'我不去作事后评论。"

书完成后,尼克松准备最后一次俄罗斯之行。2月24日,他对我说,他要"在一个有趣的时机去。我要见日里诺夫斯基和其他人。当然,政府是喜欢这样的,因为他们不能单独见他,所以他们想让我去见他!临行之前,克林顿可能会打电话来,但这真的没有关系。他们支持这次旅行,他们怎么能不支持呢?看在上帝份上,我们利用了这件事!"

他伸出两个指头:"有两帮人马在叫嚣着要终止援助俄罗斯:一帮是解放运动组织和新闻媒体,他们希望叶利钦失败,社会主义就会重新回头;还有极右分子,他们说俄罗斯永远变不了,想让敌人再回来。如果事情很糟,像日里诺夫斯基这样的人就会掌权,虽然这'射程'挺远。"

3月3日,总统打电话给尼克松,尼克松也就有了警告克林顿俄罗斯即将发生灾难的机会。过去和克林顿通话时,尼克松都表现出了很满意的感觉,这次尼克松却很沮丧。"我今天早晨接到克林顿的电话,正如我预料的,"我们坐在他的办公室时,他对我说,脸上挂着一丝淡淡的微笑,"我们谈了大约15分钟。……他想知道我在俄罗斯的预定行程。我告诉他,

我要去见对立派——鲁茨科依和日里诺夫斯基。他认为那很好,因为他的人员都见不到他们。他在担心乌克兰,他也应该担心的。他说他很高兴我会去见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他说科尔是美国最好的朋友之一。"

尼克松继续说道:"可是你知道,至少我们的旅行得到了政府的支持。记得舒尔茨吗?他什么也没给我们。而贝克指示大使馆把我当成 -个商人进行侮辱。至少这届政府对我还好。"

3月4日,尼克松出发到俄罗斯去,两天后从莫斯科给我打过两次电话。"我知道你有多喜欢这个城市。我真希望你没有在学校。"他说,指的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做毕业论文的事,"在伦敦中转真值得。伦敦很美。他们这比我们那更早进入春天。番红花和连翘都出来了,花开得很艳。我们和乔纳森·艾特肯一块到凯勒塞尔这个伦敦旧剧重演中心去了,我第一次看到25年前的事。

"我们在莫斯科受到记者们的欢迎,我对他们说了我35年来是如何第一次要去见自由选举出来的国会议员和反对派的人物的。"

我对他说,那天早晨戈尔在见记者 -事上给了尼克松之行大力支持。"很好!"他回答说,"他们跟我们在 -起。明天我要见鲁茨科依,因为叶利钦不在这城市;我们可以到黑海去见他。"

见鲁茨科依的决定首先证明是灾难性的。鲁茨科依是叶利钦长期以来的复仇之神,是最近武装反抗政府的领导人。对叶利钦来说,尼克松在见他以前选择跟鲁茨科依会面是令人震惊的公开侮辱。尼克松不但损坏了叶利钦对他的私人信

任，而且他还给了鲁茨科依某种程度上的合法性。俄罗斯新闻机构刊登了尼克松和鲁茨科依显然是热情、有活力的谈话的照片，尽管叶利钦和他的改革队伍成员——那些尼克松显然去那帮助他们的人——认为鲁茨科依是人民的敌人。

另一个举动又在伤害上面增加了侮辱，尼克松在第二天会见了俄罗斯共产党的领导人盖纳蒂·久加诺夫。他代表的是全党，共产党刚刚才因为对人民犯下了罪行被放逐后归来，然而尼克松却在见叶利钦之前先见了他。赛姆斯跟尼克松一块去的，他起先也没有阻止尼克松见这些人，两人都为此付出了代价。

3月9日，星期三，叶利钦对尼克松发难了。“美国前总统和鲁茨科依、久加诺夫都见过面！”他生气地说，“而他却是到这来见我的。一个人来到一个国家，怎么能来寻找黑点呢？让他知道俄罗斯是个伟大的国家，而他却如此玩弄它。我今天要这个，明天要那个，这种方法现在行不通了。不行，这事发生以后，我不会再见他了。政府官员也不会再见他了。”然后，叶利钦就取消了尼克松的一切交通工具和安全保护特权，取消了他和政府官员的所有约会。俄罗斯总统被背叛了，而自己对被轻视也很敏感的尼克松应该预料到这种后果的。他反而感到震惊了，试图重新聚集力量。他没有让自己被叶利钦的愤怒吓倒，而是决定留在莫斯科，把剩下的行程完成，还发表了一个声明，说明他继续支持俄罗斯总统。

同时，克林顿马上就站出来为尼克松辩护。他声称，这不是“世界末日”，还说他对“他见了一些反对总统的人这一事实”不会“反应过火”。确实，这次动身之前，尼克松曾经向我指出，他要去见反对派，政府还为此感到很欣慰。

3月9日晚上9点,我的电话铃响了:"莫尼卡?我真不相信能接通你的电话。我按了你的电话号码,希望能有最好的结果!哦,现在这里是早晨5点钟,但我失眠了,所以我觉得我该打个电话,向你提供最新消息。当然,叶利钦对我发火时,他也失眠了一会。那是众所周知的。但一些挺好的新闻报导报导了我们,我们正努力和白宫通话。克林顿的声明很好;当然,他也必须这么做。我知道,他和多尔都给叶利钦递交了照会,督促他见我。他们两人都很好。见反对派的人是我的一贯做法。这些人将要竞选总统的。叶利钦不见我也没关系。我们不会取消这次出行。我们要见我们来见的其他的所有的人。"尼克松处于守势,听上去很放松,但有一点疲劳感。他周游了世界是为了和俄罗斯总统见面的,现在犯了个可怕的错误,先去见了总统的敌人。这一损失得到鉴定后,却决定呆在莫斯科,以证明他的使命,也许还有他自己的行动是对的。

"我胃痛得很厉害,24小时都在痛。45年中,我以前只得过一次,是在香港得的。那时我病得很重,状态很不好,但现在还行。

"我尽量徒步走过红场,想起了35年前和赫鲁晓夫一起走过时的情景。我们是去桉树百货公司买顶帽子。

"不管怎样,我可以看见叶利钦是从哪儿来的,但我不想让这事烦扰我。"然而,这事显然是在烦扰他。

第二天,他又从莫斯科给我打电话。"莫斯科电话!"他对着话筒大声叫道,"我真的认为事情不像听上去那么糟。叶利钦有戏剧性的天才,这你是知道的。可我确实应该负些责任。不该是这个样子的。我想给特丽西亚打电话,因为她被新闻

报导弄得很沮丧。

"迪米特里正在订立一个全新的计划,我应该说,我们是凭经验在腾飞呢。明天我要见妇女党派的领导人！我知道你很高兴听到这消息！

"大使馆提供车子给我们,至于白宫,我想他们那些人不错,因为他们支持这件事。"

尼克松决定堂而皇之地走高速公路,收敛住任何沮丧、失望和愤怒的表情。相反,尼克松还在一次新任大使托马斯·皮克林主持的招待会上发表讲话,把克林顿和叶利钦都大加赞扬一番,说他们是"世界上推行自由的伙伴……民主俄罗斯在鲍利斯·叶利钦的果敢领导下,击溃了苏维埃共产主义。我作为他的朋友来到此地,并一直是他的朋友。祝愿他如意。"

这种措辞有几个目的。首先,是对叶利钦及其改革派人士表示道歉的外交辞令。其次,是向克林顿发出信号,感谢他的支持。第三,转移别人的视线,掩盖自己的失误。至于第四,这种措辞表明,一件似乎是不起眼的小事件引起了某些争议,而他有能力超脱这些争议。然而,尼克松心里明白这个事件不仅不是微不足道,而且令人难以忘怀,所以他采取措施制止事态恶化。

3月13日他出了点事,他从莫斯科打电话给我。他的声音稳中带虚:"我啊,在红场摔了一跤,膝盖擦破了,肋骨碰伤了。呼吸时会痛。我不知当时怎么的,只觉站不稳,脚底一滑。一开始得了流感,然后出了叶利钦那件事,现在又这样。可能是命该如此!"他又信心十足地对我说,"不过,现在没事了。"

叶利钦听了尼克松措辞谨慎的致歉后,态度转软。他容

许政府成员去见他，并派一位代表直接向他表白，这事了结了。然而，这位俄罗斯总统却没有要求与尼克松见面，而是返回黑海，因为叶利钦说他岳母辞世后需要他回去。叶利钦默默地接受了尼克松的道歉，挂起了免战牌，保住了他的面子。

"你知道，"尼克松从莫斯科接着对我说，"整个事情搞糟了。但我得这么说，我要你记住：关键在于争论。我们需要争论——虽然我们在这过程之中不喜欢争论——但还是需要争论来促动利益。对吧？这是必不可少的。"他毫不罢休地补充道，"大多数事情如果你不加以重视，是不值得去做的。当然，不远万里地跨国旅行是要去见叶利钦。但如果这件事整个都没发生的话，如果按照日程安排去见了他，并进展顺利，世界上也就压根没人知道我来这儿。也许媒体会报导一些关于我们的消息，但你明白我的意思。现在人人都知道我在此，克林顿和多尔支持我。争论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才知道那些可怜的王八蛋需要帮助。而且争论可能带来结果。"

尼克松最后一次从莫斯科打电话给我是在 3 月 15 日。他告诉我他在俄罗斯下议院——杜马开会的前一天发表讲话，"回国后我会给你这篇讲话。顺便告诉你，这次旅行还没结束。"

尼克松按计划安排见了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日里诺夫斯基，这是件密闻。第二天他从伦敦打电话给我："上次给你打电话到现在已经 24 小时了，有件事你很难相信！"他笑着说，"但告诉你，我和日里诺夫斯基的谈话最有意思。我获得别人没有的信息，因为我巧妙地盘问了他。确实有意思。我们设计让这次会面不被拍照，因为你知道它会对世界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他这个家伙不得了。"

尼克松于3月20日星期天回国。他在早上11点钟给我打电话，请我到他的住处，以便给我"此行的总结"。第二天一早我到他的住处，看见尼克松若有所思地伫立着，满脸疲惫，并有着回家后表现出来的放松劲。他倒了两杯白葡萄汁，把笔记本放在椅子旁。他把杯子递给我，我们为他的归来碰了杯，他还说："也为这次充满丑闻之行干杯！"

我们坐了下来，尼克松翻开笔记本："这次旅行非常好。高潮在于那篇对杜马的讲话。我告诉他们要继续沿改革的路子走下去，不要反复。我告诉他们没有回头草可吃，因为在俄罗斯，共产主义已不复存在，而上帝还活着。这句话使他们感到吃惊，但却爱听。

"叶利钦从体质上、政治上看形象都不好。他就是没办法控制。乌克兰总统利奥尼德·克拉夫丘克总是支持叶利钦，但他说叶利钦长不了。我问他，'怎么啦？是会有政变，还是竞选失败？'他说，'都不是。他们会围攻他，使他成为有名无实的光杆司令。'这种苗头已经出现。克拉夫丘克还很精明。他说日里诺夫斯基不能赢得全国选举，但是日里诺夫斯基现象会由某个较不那么希奇古怪的、坦率的、疯狂的人一脉相承。他很外露，但却很老练。我想他不会去干吗，当然不会去竞选总统，但他所代表的是强烈的倾向，你知道，是那种对俄罗斯失去大国地位并需要恢复昔日荣耀所流露的情感。这种情况表达了很多人想恢复业已崩溃的地位的希望。看看一战后的德国吧。不行，我们应当对他倍加小心，对那边的一丘之貉倍加小心。

"改革派人士要统治俄罗斯还太嫩，但他们有长进。我还没有背叛他们。我在欧洲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科尔给人留

下深刻的印象。他完全支持叶利钦。英国人可不这样，他们知道怎么回事。

“我知道在整个与叶利钦有关的事情发生时，克林顿还很顺，但我并不想见他或是塔尔博特。现在整个总统班子都陷入白水事件的窘境，我得和那儿保持点距离，这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已经有人问我 -些问题，比如白水事件和水门事件的相似程度如何。我现在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你同意吗？”

我同意他的观点，但建议他写份备忘录给克林顿，让当局方面先作出安排见面姿态。3 月 21 日早晨 4 点钟尼克松起床，口授了一份很长的备忘录给总统。“无论如何我得向那人汇报。”他那天晚些时候对我说，“我在备忘录中措辞直率。我告诉他要向基辅派一位新大使，因为那里的局势捉摸不定。我不想告诉国务院那些白痴，因为他们干不了什么屁事。或许他从我这儿听了此事，会变机灵些。自从白水事件充斥媒体以来，他需要从外交政策上得 -张胜券。”

尼克松也为《纽约时报》起草了最后一篇个人专稿，标题是“'94 年 3 月的莫斯科：动乱与希望”。此文一反他以往文章中所持的乐天派观点，即民主和自由市场改革已在俄罗斯扎根。这次他不说恭维话，而且为俄罗斯的动乱与衰弱描绘出一幅戏剧性的图画：

> “此行我所见到的俄罗斯与仅仅一年前我所见到的那个俄罗斯非常不同。对未来的乐观情绪已被悲观情绪所替代。一种强烈的亲美观念已在很多场合里变成令人不安的反美观念。叶利钦虽然仍是重量级政治人物，但已不再是超人了。

他修改了以往对俄罗斯总统毫不犹豫的支持,写道:

> 叶利钦已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他在摧毁苏维埃共产主义时所扮演的历史角色的神秘性。他也许正发现历史对他不利。几个世纪以来,好的革命领袖不见得在建设国家方面能行。但仅仅由于叶利钦常常离开莫斯科和他反复无常的行为,而把叶利钦先生撇开来写历史也是不成熟的。美国应尊重他并与他紧密合作。

他对主要反对派领导人进行评价,包括他称之为"神圣的傻瓜"的日里诺夫斯基、鲁茨科依和久加诺夫。他说,他所发现的"最令人不安的进展"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变化。外交部长科济列夫改变了初衷,"把对于人类普遍的价值观和对于与美国发展共同利益的重视转移到恢复俄罗斯超级大国地位和必须为莫斯科勾勒出自己的道路上来。"

他警告说,北约的未来并不能"因俄罗斯的敏感性而作出牺牲"。和平的伙伴关系必须包括北约将逐渐东扩,同时不对俄罗斯的利益构成危胁。"俄罗斯没有权利否决北约扩展的决定"。

他在这篇文稿结尾又认真地兜出了他的论点:

> 应该有人好好地建议克林顿在国会逼迫他做之前,下令立即对援助俄罗斯及前苏联共和国一事重新认真加以考虑。政治与经济改革的存亡兴衰并不只是俄罗斯人民的利益问题,而是和平事业的利益之所在。俄罗斯新革命仍显希望确属奇迹。改革派人士即使有我们帮助也可能会失败的,但如果没有这种帮助那就注定要失败。克林顿先生在向俄罗斯自由力量提供适当援助方面得到

了国会两党的支持。但是，

他用缓和的语气写道：

这种支持必须精明而实际，不对俄罗斯的行动心存幻想，也不对美国利益有所损害。

3月25日报纸刊登此文后，尼克松手拿报纸向我挥舞："你瞧了吗？我狂叫了两三个倒霉年头。有人注意到了吗？援助一点都没有出手，对俄国人的支持没给。我猜我的问题答案在此。"他摇着头说，"我这么做是因为不做不行。但我想不值得。旅行、个人专稿等等，这些事劳而无益。"

然而，当局的确对援助计划进行修改，也许是因为尼克松的建议而重新进行审视。如今俄罗斯将得到原定许诺援助的35%，而不是65%，其余部分将提供给前苏联其他共和国。而且也许是因为尼克松关于乌克兰局势的提醒，当局将得到7000万美元。

"这些都毫无意义，"尼克松重复道，"如果没人去落实的话。"

叶利钦此时此刻表示要见尼克松，尼克松4月7日打电话给了我。"赛姆斯说叶利钦想来与我改善关系，我不知能否去见他。如果他以书面形式让我知道，我就去，但我并不想冒险让类似的事情再发生。你意下如何？"

尼克松对事情的这种变化感到高兴。不仅叶利钦对以前的事表示后悔，而且还积极地有求于他。俄罗斯总统向他在西方仅剩不多的几个朋友之一伸出了手，而这个人此前还毫不犹豫地、不厌其烦地再三向他伸手。尼克松会重新答应帮助叶利钦，但只有在支持得到回报的前提下才会答应。

这是俄罗斯总统和尼克松之间在尼克松4月22日辞世之前的最后交流。这支射给这位美国前总统最后的善意的"离弦之箭"出现于《超越和平》一书，此书在他过世后那星期出版。

几个月前在撰写草稿时，他就决定虽然他强烈反对克林顿的许多国内政策，但对其外交政策的批评则会斟酌而行，不偏不倚。他认为克林顿所提议的全国保健计划纯属花哨的把戏，但对于俄罗斯的政策则是采纳尼克松的建议而制定的，这可是另一码事。不出所料，他指责多极化和依赖联合国是"幼稚的"，抨击输出民主的概念是有危险的和误导人的，批评前南地区的暴行是"外交政策的不幸和不必要的失败"。

然而，在谈到俄罗斯时，尼克松并没有直接批评克林顿，但与他以往文章的观点一样，强调了形势的紧迫性。他的著名论点出场了。他写道："再也没有其他因素比政治和经济自由化在俄罗斯和其他共产党国家扎根、发展更能对世界政治造成冲击。"他再次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挑战，"当今一代的美国领导人让人评判的主要标准是他们能否尽力取得这个成果。如果他们失败了，他们的继承者将付出难以想象的高昂代价。"

虽然他呼吁对叶利钦继续给予坚决支持，因为他仍认为叶利钦是改革最大的希望，但他反对将外交政策局限在某个个人身上。这点与他以往的观点大相径庭，他曾呼吁对叶利钦提供不分青红皂白的支持。他强调对俄罗斯年轻的改革派人士伸出支持之手，因为改革进程的成败最终将落在这些人身上。

《超越和平》是尼克松的辞世之作。无论对克林顿和美国政策制定者来说，对叶利钦及其改革派人士来说，对他的反对派来说，还是对身后评价他的历史学家来说，都是如此。他的先见卓识使他成为说话有分量的人，他的经验对像克林顿之类的人物，是不可或缺的指导思想之源泉。

尼克松的荣耀之所在，是他看清了交融的时势，抓住了以下机遇：在苏联解体及由此而引发的混乱局面中，人们对"世界新秩序"的寻求；在一位没有外交经验的新总统宣誓就职时，出现了他为此事求助于对立党派的情况。尼克松把自己修饰成一位总统的外交政策的良师益友。如果克林顿更积极地采纳尼克松的建议，那就更理想了。但至少克林顿听了他的话，并顺从地作出反应，而这一点布什没能做到。从这点来看，尼克松胜了：在位的总统是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一代，他向老总统讨教，而这位前总统却是在野的共和党人；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在位的总统采纳了老总统的建议。

冷战的结束给尼克松这么丰富的、意外的机会。由于他并未预言、预期到这种变化和和平的结局，他甚至尚未对此所带来的一切作好充分准备。这个机会能证明并确认他是一位老牌国务活动家，在国际舞台上东山再起的杰出人物，能让他有机会为世界各国制定政策出谋划策。

尼克松是在冷战开始时步入其政治生涯的，他是一名反共分子，冷战造就了他保守派的名望。他通过制定有创意的缓和政策带领这个国家走过冷战的千钧一发的时期，然后活着看到冷战的结束，真是不可思议。他现在深知，他在历史上是站在正确的一边。跟其他几位在意识形态斗争年代的总统一样，他为正确的原则而斗争。

然而,1991 年当锤子和镰刀红旗在克里姆林宫旗杆上降下时,尼克松职责尚未完成。他并没有宣布个人取得了胜利,沉湎于退休生活,而是接受了令人厌烦的使命,为新纪元和可能引导未来的方针政策勾画蓝图。他奉劝人们要有协助精神,有耐心,有灵活性,要有眼光。但是教当代领导人有眼光是行不通的。不过尼克松能通过某种方式鼓励他们维护胜利成果,这样他就尽职了。

当布什对他的建议不屑一顾,或是克林顿言听计从而后又没抓落实时,他觉得他的后继者本应按他的初衷行事,所以他觉得很沮丧。他决意不能让他的后继者空为这个胜利而庆幸,或是失去这个胜利。所以他相信,我们所见到的不是历史的结束,而是一个捉摸难定的新纪元的开始,而这个新纪元同样像以前的纪元一样,同样需要他的领导。他的著作、讲话、专栏文章以及公开和私人备忘录等都是他努力重新获得对各种事件进程的影响力的一部分。

一次使命完成了,另一次使命又开始了。冷战的结束证明尼克松主张的任何事情都是正确的,同时给他提供了重整旗鼓的机会。尼克松决心不仅保持明确目标并使之有进展,而且决心使自己成为世界各国领导人规划新的行动步骤时必不可少的人。

尼克松一生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虚弱的孤立主义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以几次热战为标志的冷战时期。他知道,新的和平将不同于美国在本世纪所了解的任何事情,它并不是来自热战的结束,而是来自于敌人的内部瓦解。正是这种局势的独特性使尼克松有了继续在 21 世纪留下深远影响的机会。他所做的是支配世界各国。这是明确的使命,是他职业和

毕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的结束使他又一次地从冷战斗士转变成帮助俄罗斯的最先倡导者。就他毕生坚守如一的自由将战胜独裁的信仰来看,他的这种转变是不足为怪的。

第二章　尼克松在中国

"有两件事将使我载入史册，"1993年4月11日理查德·尼克松说，"水门事件和对中国开放。一件坏事，一件好事。这并不公平，因为我们为许多别的事作出了这么多努力，如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与癌症作斗争，成立美国环境保护署……但那两件事将会很突出，事情就是这样的。"

这番评论是我们站在中国杭州西湖一艘专门为他和周恩来建造的小船的甲板上时他说的。尼克松最后一次访华是我陪同他去的，在风景区小镇上，主人坚持我们午后乘船游览。那小船在缓缓驶离码头时径直倾向一边。前总统向岸边欢呼的中国人群挥手致意，他抓住船上的栏杆，东倒西歪地往前走。船身渐渐平稳并缓慢地向

远处河岸驶去，他重新获得平衡，朝我的方向焦虑地看了一眼，把一只手叠放在另一只手上握着栏杆，他小心地跟我走到船头，在那里他可以清楚地看看中国乡村。

"我并不是悲观，但水门事件，那愚蠢得不能再愚蠢的事件，历史上将把它与我在这里所做的事情相提并论。"他继续向点缀在群山景色中高楼的方向大幅度地挥动着一只手。"你看，"他对我说，"1972 年我这样乘船环游时这里什么也没有。甚至 1989 年我到这里时大部分建筑物都还不存在。这个地方的发展真令人难以置信，而且你也知道，"他平静地说，"我喜欢觉得自己也为此做了些事。"

尼克松最自豪的成就是他 1972 年打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门。用外交手段，尼克松解开了中美关系的死结，使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世界决不会再维持老样子了。

1967 年，他当选总统前一年，他在《外交关系》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暗示了他对中国的想法。他写道："从长远的眼光来看，我们不能永远把中国排除在世界各国大家庭之外，那样会助长它的幻想，抱着它的仇恨并威胁它的邻国。在这颗小小的行星上，不能让最具有潜在能力的 10 亿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之中。"但他也主张在短期内"制定一种有严格限制的、不附带任何利益条件的、反压力的创造性的政策，促使北京认识到只有接受国际文明的基本准则才能维护它的利益。"这样，中国就会逐渐被欢迎"回到世界大家庭中来——但它应是一个伟大的发展中国家，而不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这既是一个合格的要求又是一个行为的标准：如果中国人决定"将精力用于内部而不是外部"，他们可望与美国建立一种建设性的伙伴关系。

当他写那篇文章时，中国还是一个封闭性的大国。1969年尼克松执政之后不久，他指示要探讨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的可能性。它从一系列的私人的外事交流开始，让两国有机会互通有无而不冒险去互相侮辱或对抗。到了1972年尼克松第一次历史性地访问北京时，中国国内仍很压抑，但对其邻国没有直接的军事威胁。这一切使得尼克松接纳中国而改变了全球政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尼克松把自己的政治生涯建立在政治上受益的坚实的反共基础上以后，他作为总统竟会开始缓和同苏联的关系，并重建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尼克松是个讲究实惠的现实主义者，他认识到，越南战争使我们的资源和行动能力受到了限制，这就要求以一种较少进攻性的方式来对付苏联；形势要求一种有创造性的遏制政策，既不需要好战的花言巧语，也不需要大量的金钱。越战期间和紧接着越战之后，美国实在无法承受更多的对抗。

尼克松认识到国内条件的限制，设计了美国对付共产主义大国的政策，即鼓励合作、强调共同的利益和目标。这是一个令人瞩目的保持平衡的行动，许多人认为只有抱着反共信心的尼克松才能成功地这么做。

缓和是一项施加压力和进行鼓励的复杂的协调工作，直到美国从越战中完全恢复过来并采取比较富有侵略性的政策，而重建友好关系是指同中国人建立长期的工作关系。

尼克松1972年去中国时，人们对他为什么改变了原先拒不承认中国的强硬态度有许多猜测。有人认为他想利用中国作为对抗苏联的筹码以赢得苏联对结束越战的支持。另一些人猜测他最后确认中国的共产主义并不像他以前想象的那么

可恶。尼克松经常说，以上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

"我并不是因为最终有所省悟或抱着其他不切实际的想法才去中国的。"1991 年 9 月 18 日尼克松在他住处的一次午后见面时说，"我去中国是因为我看到我们双方的利益有了变化。尽管他们是共产主义者，而我们是民主主义者，共同的利益把我们更紧密地连在一起了。我们双方都很担心侵略成性的苏联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威胁。

"当时，中国向四处观望，发现自己也被潜在的敌人所包围。"他挥动着一只手指说，"北面是苏联，陈兵于边境。南面的印度是俄罗斯朋友，有潜在的核能力。东北方是日本，一个经济强国，以前的敌人。跨过太平洋，中国人民看到了美国：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对手，但在反对苏联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而苏联是中国最严重和最直接的威胁。因此中国人看到了与我们共事的好处。他们只好在意识形态和生存方面作出选择，他们选择了生存。就那么简单。

"不管苏联的威胁是否存在，我们当然需要与中国建立一种良好的关系。即使没有任何来自苏联方面的威胁，我也会去中国。你知道，与中国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是很有必要的，当时，中国还很弱小，而且也希望建立这种关系。我们不应该坐等他们强大，他们强大以后就不再需要我们了。这就是我那么做的原因，这是件做得对的事。"

尼克松看到了中国的巨大潜力：一个勤劳智慧的民族，丰富的自然资源，拥有核力量的潜力和强权政治的历史。脱离苏联后，中国独立地站起来了，尽管别无选择。尼克松在 70 年代初同他们接触时，正是它与美国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适当的时机。

尼克松生命的晚期，出现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既然苏联侵略的威胁消失了，美国不再需要同中国建立密切的关系；另一种观点是，中国不再需要美国来保护他们对付苏联的侵略。尼克松说，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在这个没有固定的敌人的时代，中国和美国需要彼此合作的原因与苏联或俄罗斯没有任何关系。

上个世纪，弗里德里奇·恩格斯提出了共产主义的理论，他开始着手"改造世界"的工作。他指的是在共产主义国家推行社会平等及从出生到去世的安全保障和世界霸权的承诺。共产主义在理智上富于感染力，但它的平均主义使苏联误入歧途。

经过伟大而悲剧性的试验之后，共产主义在它的先驱国家——苏联崩溃了。

尽管中国缺乏苏联共产主义曾具备的军事实力和思想上的吸引力，但中国开始非常成功地追求某种更重要的东西：经济实力。

"1972年我去中国之前，"1991年10月1日尼克松说，"有人说毛泽东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将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打算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做些什么呢？'我这么说吧：在我与中国人会面的这五天，从来没有提到任何关于经济方面的问题，一次都没有。他们只关心战略大事和苏联的军事实力。20年后，我们所谈的几乎都是经济问题，并且是中国的特色。"

历史上，经济实力是军事实力和全球影响力的先决条件。在尼克松生命的最后10年，他看到中国后期每年经济增长10%以上，这要感谢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和向西方开放的政策。

中国拥有10亿多人口，正逐渐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就他们自己的市场而言，他们有全球性时代经济范围，并成为主要的出口国。尽管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占世界五分之一文明的中国从贫困中解脱出来，但这并不是因为有了共产主义制度。尽管赫鲁晓夫敲着鞋子扬言要“埋葬”我们，但苏联从来没有达到那种经济发展高度。

从1976年至1985年，尼克松曾四次访问中国。尼克松看着这个国家从世界教条主义的营垒中变成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早在戈尔巴乔夫把开放和改革带到苏联之前，邓小平通过开放市场经济的方式脱离了教条主义的累赘、摆脱了经济结构和价格的束缚，首先鼓励农民种田获利，接着吸引外资投入轻工业，从而又带动沿海地区快速发展，并迅速扩展到内陆地区。市场经济悄悄进来，频频获利，直到成为一股不可阻挡和不可逆转的力量。一旦如此，中国就抛弃了孤立主义的政策，很快变成一个和全球经济联系在一起的重要的政治经济力量中心。

尼克松确实“有一些事情要做”。对外交往必然带动经济和文化交往。信息和技术革命使10亿中国人看到了自由世界所拥有而他们所欠缺的生动的局面——政治选择权和经济繁荣。他们自己要求拥有这些东西也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1989年春，两个平行的事件——中苏高层会晤和天安门事件——对中国对外政策和国内改革的未来进程以及中美关系的未来提出了质疑。

苏联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并没有引起尼克松的警惕。恢复关系并不是因为共同的意识形态，而是因为拥有共同的边界、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和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尼克松相信，莫

斯科不可能为北京提供外国投资、先进的技术或可行的经济模式。中国人需要与之共事的是经济伙伴，而不是一个经济上完全瘫痪的空架子。如果美国继续友好地向中国人提供经济帮助，中国人将会继续与之建立积极的关系。

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一些人认为美国会终止与中国的所有关系，实施经济制裁，孤立中国直到它改变政策。然而，尼克松知道，终止中美关系而不去进行补救，将会给我们和他们的利益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美国起草了一个终止所有武器销售的决定，停止与中国的大多数高层讨论，为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延长签证。尼克松认为，作出这种反应是恰如其分的，因为包括全面的经济抵制在内的额外制裁将会产生副作用，使他们丧失坚持要求改革的决心。

1989年，我首次见到尼克松的三周后，他再次亲自关心中美关系问题。在他1972年以来最具有戏剧性的访华中，他继续肩负修复中美之间紧张关系的使命。1989年10月28日至11月2日，他在北京逗留的六天中，分别同邓小平、江泽民、李鹏、杨尚昆、钱其琛、李铁映、李瑞环及上海市长朱镕基进行了20个小时的谈话。

10月2日我们第一次交谈中，他没有透露将要作这次旅行。然而，他确实强调了耐心及正视现实的必要性。“你必须严肃地对中国人讲，让他们知道美国不会坐视不管。”他说，“但你必须私下做这件事。如果在幕后进行讨论的话，我们的分歧是可以沟通的；如果在公开的场合提出来，那只能使问题更糟。”

尼克松相信他是惟一能做这件事的人。布什政府既要对

天安门事件作出反应，又想稳定中美之间的关系，处境十分微妙。总统迫于国内政治压力要制裁中国，又因外交的压力要与他们共事。尼克松认为，凭着他的地位、经验和对中国人的尊重，他是惟一可以直言不讳地传送不愉快的信息和可以重新建交的谨慎而乐观的美国人。他像已往那样以私人身份旅行，不受政治干扰，无需摆出外交姿态。只有尼克松可以比得上中国领导人务实家的智慧，警告他们倒退的严重后果，而且也只有尼克松，可以在回国时向美国总统提交一份清醒、冷静又现实的报告。

对尼克松此行的新闻报导是大量而肯定的。《纽约时报》称赞他“很好地利用了他的声望”。《新闻周刊》报导“华盛顿和北京都把他视为中间协调人”。新闻报导说，在李鹏总理所主持的一次宴会上，尼克松说：“总理先生，你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我是信奉资本主义和民主的美国保守党人，我们之间在文化、政治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太大了，不允许我们对这一事件取得共识。”有一次，杨尚昆主席祝酒后，他在致答词中说：“中国的领导人现在似乎认为他们如何治理国家是内部事务，不要他人来指手画脚。但大多数美国人深信，有些国际准则可以指导全世界领导人的行为。”不过，他补充说，“另一场悲剧将是友好关系和已运行得很好的政策付诸东流了。”

一些尖锐的评论之后，尼克松比政府通过传统的外交途径进行交涉，更有效地直指问题关键。这是一次相当有分量的访问：尼克松表达了对天安门事件的态度，同时设法乐观地展望中美关系的未来。他以一个朋友的身份而来，不是作为一名怀有敌意的批评家的身份而来。他既提出了警告又作

出了承诺：如果中国修正一下自己的政策，将有望与美国之间建立一种富有成效的、战略上对双方都很有利的友好关系。

11月23日，我第一次见到尼克松的一个半月后，我到科尔盖特大学校园邮箱去取信时，发现了一封发自理查德·尼克松办公室的鼓鼓的信件，里面有一封前总统给我的信及他三周前访华之后所写的备忘录的副件，题目是"中美关系的危机"。这七页私人机密备忘录是他写给总统布什的一份18页报告的浓缩，包括他对中国领导人和他们的政策的评价、对改变天安门事件期间政策的展望、以及对改善中美关系的建议。

他写道，他与中国领导人的"高度坦诚"的谈话包含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局势、中美关系的危机和其他国际事务，例如中国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东欧的革命性发展以及柬埔寨和阿富汗等第三世界热点地区的形势问题。

"我七年前访华之前，中美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差的阶段。"他是这样开始叙述的。美国人和中国人用截然不同的观点来看待天安门事件。他说，那是"完全无法逾越的"鸿沟。

他论述说，如果我们允许那些分歧永久地损害对中美两国人民和亚洲地区"和平与进步事业"都有利的关系，我们将会使悲剧更加严重化。他说，1972年刚与中国建交时，我们的分歧极大：我们在越南、朝鲜、日本、台湾问题和意识形态上都有分歧。但我们都认识到，尽管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我们却有着共同的、压倒一切的利益：那就是提出一项政策以制止抱有侵略及扩张野心的苏联对我们双方的威胁。尼克松写道，今天，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和冷战可能结束，我们必须找到"能把我们连在一起的黏合剂"。

尼克松接着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恢复合作关系符合我

们的利益？首先，假定冷战即将结束，苏联对美国和中国形成不了什么威胁，与中国重新建立一种积极的关系仍然符合我们的战略利益。尼克松警告说，戈尔巴乔夫不是一位"空谈的民主主义者、慈善家或傻瓜"，他的目标是挽救共产主义，使它的体制更加精干而有效率。尽管莫斯科的威胁减弱，潜在的苏中关系可能被用来攻击我们。苏联人与中国人对话，我们却没有。既然终止高层接触已经达到了制裁中国的目的，那就应该重新开始高层对话了。

再有，中国是个核大国，我们需要为防止核扩散问题而共同努力，否则我们将无法阻止核技术销售到国际热点地区。

如果能在亚洲中国、日本和苏联之间维持权力的均衡，美国与强大而稳定的中国建立紧密的联系是很有必要的。除非美国与中国很负责任地参予，否则朝鲜地区的和平不可能维持，台湾问题无法和平解决，印度支那也无法得到安宁。

尼克松进一步论及随着中国不可思议地变成一个重要的经济强国，我们不应该"把自己从中国排挤出去"，而把有巨大潜力的市场让给日本人和欧洲人："17年前我们寄予如此厚望的大门应该关闭吗？"

尼克松接着转到中国与美国建交的利害关系。尽管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无经济改革的政治改革方式在新闻界独领风骚，但邓小平的经济改革爆发出极大的增长率。但是，他写道，除非同时实施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否则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它们都将失败。如果经济改革和向西方开放在邓小平去世后仍能继续进行，政治改革的压力将不可避免地加大。尼克松已见过的几个领导人都向他保证经济改革是不可逆转的，但他们知道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抉择。

在10月30日李鹏总理主持的一次宴会上，尼克松径直向主人指出：中国愿意失去它的伟大地位而"使自己陷入受压制、停滞不前的泥潭吗"？或者愿意继续为它的人民朝着进步、和平和正义而奋勇进取？

他写道，美国不可能也不应该干预只有中国自己才能作出的抉择。但如果美国继续孤立中国，将会长极左分子的威风而灭改革力量的志气。尼克松强调，如果那些支持邓小平改革的人占了上风，那么交往与合作是至关重要的。

尼克松指出双方应采取具体的步骤来弥合裂痕。他建议说，中国应废除戒严令，邀请学生、商界人士、科学家和旅行家参观中国正在兴起的私人企业并为之作出贡献。

美国方面应取消经济制裁，继续为那些想到中国投资的人提供政府帮助，并继续通过国际金融机构为中国重要的项目提供融资。

双方为恢复关系所采取步骤的时机和"舞台设计"是至关重要的，只能通过最高层之间的私人外交达成共识。他的一段话使人联想起他于1967年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孤立中国现任和将来的领导人，培育他们怨恨甚至痛恨美国的情绪"是极不明智的。他写道，中国的长城非常厚实。当你置身其中时，你的意见很难被听取；而"当你置身其外时，你的意见可能会被采纳的"。

尼克松强调了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中国领导人想与我们共同努力重新建立建设性关系的希望。通过进一步制裁来打击中国可能会令人高兴，但这种建立在感情主义基础上的政策是愚蠢的。反改革的人会认为既然他们几个世纪以来不与外界交往都能生存，他们还可以继续这么做下去。他们没

有认识到，美国那些主张孤立政策的人也没有认识到，鉴于技术革命，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以把自己排除在世界之外。在中国决定与其他人对话之前，美国应该与中国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尼克松最后说，尽管存在着分歧，但与 1972 年相比，他现在对中美关系更为乐观，因为在当时两国都对共同的敌人的对抗表示忧虑才走到一起来的，现在是经济进步与和平的希望把两国联系在一起的。

不像 1992 年著名的对俄援助备忘录那样，尼克松的这篇备忘录没有引起什么新闻轰动。它并没有在选举之年批评总统，没有痛斥美国的现行政策，也没有指出任何革命性的行动方向。相反，它提出了处理中国问题的一个明智的策略，既简单又困难：通过保持经济开放，坦诚探讨一些敏感问题，但要以私下解决争议的方式鼓励改革。这将会是一次微妙的均衡行动，但美国应该把中国当作一个平等的伙伴来共同工作，而不是把中国看成仇敌。

合作将在鼓动演变过程中慢慢地起作用，但孤立政策却是根本行不通的。耐心的策略是促进与中国既合作又竞争的长期关系的最好方式。尼克松警告说，北京致力于一件被苏联人忽视的事情，这最终是军事力量和全球优势的关键——经济实力。在中国还愿意与我们交往时，与中国保持一种建设性的关系是相当明智的。

"我们如果做了任何使中国私人经济削弱的事，那就错了。"他在 1991 年 1 月 23 日说，"开放型经济向政治改革施加了最大的压力，相信我，下一代人将是有中国特色的，而不是现在的共产主义特色的。"在我们之间第一次关于中国问题的

广泛的交谈中,尼克松主要谈到了他的1989年之行。

“我回想起那次旅行,就在天安门事件短短的几个月之后。那是一个什么年代啊!你知道,几乎每个人都警告我不要去做那件事。他们说,批评我的人将会找到一次对我大肆嘲笑的机会,说我到那里去是企图挽回中国的开放政策。我可不是那么看的,但许多人是那么对我说的,人们就是这么看的。我必须尽我所能地修复两国关系,因为这对两个国家都太重要了。

“没人知道布什派了一个秘密代表团去中国;我当时也不知道,而我明白为什么布什不让我知道的原因,这跟我们不能告诉任何人关于我们与中国的秘密协商是一个道理。你不希望把事情搞糟,这是对的。但没有关系,因为我可以做其他事。美国人民需要看到我去那里公开地做政府不能做的事情。”

当我问他把不愉快的消息带给中国人是否令他觉得难堪,他回答说:“不,并不。我知道要我来说那些事很难,但他们有必要听。我知道他们很难给我个关于无法忍受任何干涉他们内政的准绳,他们知道我会对那件事有什么感受。

“你知道,在越战中,我们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个示威者上街游行,使所有的城市都陷于瘫痪。在中国领导人希望恢复法治和秩序这一点上,我是赞同他们的做法的。”

我问尼克松是否认为中国人能理解他关于要容忍为政治改革而举行和平示威的观点,他回答说:“他们当然知道。中国人很聪明敏锐,他们很清楚地知道我在说些什么,但他们所不能理解的是,他们不应该声称只把他们的外交政策建立在战略利益的基础上,而把他们所有的内部事务建立在思想意

识形态上。如果你因冷酷的战略利益要与持相反意识形态的国家打交道，那么你必须意识到，当你要为使用武力来维持政权辩解时，你就会遭到那些国家的反对。”

“你怎么向中国人解释这个问题而又不造成任何伤害呢?”我问道。

“当我与中国人谈时，我并不担心惹恼他们。该说的还是得说，当然，你尽可能以外交方式去做，但是用不着担心得罪他们。

“我去中国时脑子里有三个目标，”他一边扳着手指一边继续说，“第一，向他们的领导人表明即使是中国最好的朋友也被他们的所作所为激怒了;第二，把他们的注意力重新集中到国际政治上来;第三，开始与他们探讨两国关系的前景。”

当我问他是否认为自己是惟一能完成所有这三个目标的人时，他回答:“嗯，我不能肯定，但可能是吧。那里没有其他人可以真正做到这一点——你知道我的意思，很显然布什做不到。基辛格是他们的朋友，他去中国也做了些好事，但他不是总统。这个时候我去最合适，去完成这该死的差事。

“你知道，我与邓小平的会谈可能是我与他的最后一次会谈。他太老了，比我还老。”他笑着说，“但我真的认为我不会再去中国了，那可能是我最后的一次访华。

“无论如何，那是一个很奇怪的场面。他很虚弱，身体状况很不好，但他的思想仍相当敏锐。我上次见到他之后，可能是四年前，他的身体就走下坡了。但他的听力好得惊人;他身边有两个翻译，一个作谈话记录，一个大声翻译给他听。谈话进行了三个小时才结束，我们谈了很多事情。

“我从我已经观察中美两国关系近20年的经历谈起。这

次两国关系中出现的危机是我们过去经历中最糟糕的。我对他说我们必须看到那些分歧。

"邓小平的回答比他那些把一切都归罪于美国的同事们要巧妙得多。不,邓小平说,为了把最近发生的事抛在身后,我们必须迈出第一步。他还说,中国弱小而美国强大。"尼克松微笑着说,"想想看！他说,如果他不维护中国的尊严,他就得下台。当然,他正扮演一个受害者的角色,但我努力使他明白他不能两头兼顾。中国不能只从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得到好处的同时,又不听取我们不得不谈到的人权和其他问题的意见。"

尼克松认为,美国应该像1972年那样耐心行事。中国是五大重要的地理政治强权中心之一,这一观点是他1971年在堪萨斯城提出的。中国是一个核大国,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阿富汗、柬埔寨、朝鲜和中东等地区冲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国与中国保持紧密的联系以促进如贸易和防止核扩散等双边合作问题,这对美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主要是由他们在国外的行动所决定的,而不是由国内的行动所决定的。尽管尼克松开始改变这个现实主义观点,强调对人权的普遍尊重,但他仍认为我们对别国的政策应主要以那些国家在国际上的表现为依据。要迫使封闭的社会进行改革,最好办法就是要同他们保持密切的接触。要么现在就和中国政府打交道,鼓励它长期进行改革;要么就孤立中国,使它的改革夭折,在这两种选择中,前者才是正确的。

"你知道,"尼克松接着说,"当我见到现任总书记、邓小平的当然接班人江泽民时,我向他列举了一个中国可以立即实

行的 16 项措施，用以表明中国有处理人权问题的愿望。他们采用了一些。

我提到了东欧的先例和苏联面临的崩溃，尼克松同意关于中国领导人被警告信号所包围的观点。“中国人很清楚他们四周的共产主义都在瓦解，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是一个伟大的设计家的原因。他好多年以前就预见到——我说的是好多年以前——教条主义在经济上是行不通的。除非你想搞一场革命，那就像在东欧领导人身上发生的一切，否则你必须进行改革。他也明白，如果人民吃饱了肚子，就不大可能再造反了。因此，他设计了一条让共产主义继续保持政治权力但在经济上放松的路线。人民开始有钱了——钱不多，但有一些钱。经济上开始发展了，人民要分享这块蛋糕，这是不可逆转的。”

中国领导人再也不可能轻易地将市场经济的利益与极权政治统治的利益均衡等同。为了避免像苏联那样解体，他们努力地维护政权。即使放弃了对经济的控制，他们仍鼓励国民抵抗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

“中国将在 20 年内走向民主。”尼克松在 1991 年 5 月 31 日说。我们一直在讨论《只争朝夕》中太平洋地区的这一章节，他指出，他想用这本书来强调美国在对华政策上必须有耐心。“你不能逼他们。中国人是以几个世纪来看待历史和将来的，而不是像我们那样以几个时代来看待历史和将来，因为他们的文化比我们的文化要古老得多。我知道我们极想看到民主化立即走进中国，就像这样，”他啪的一声捻动手指说，“天安门事件之后马上走进中国，这是不可能的。东欧确实是这种情况，但只是因为共产主义在那里由苏联控制。当苏联

不用武力维持时，它一下子就垮了。而中国人采取的是不同的办法。"

当我提到共产主义不能背离其基本经济原则而运行时，尼克松回答："苏联的共产主义已经根深蒂固，因此苏联不能实行中国式的混合型经济，但中国人知道苏联人所不明白的东西：那就是必须先进行经济改革。当然戈尔巴乔夫从没想要失去他的最高统治地位，但问题是他不可能使共产主义在经济方面运行得更有效率，这是行不通的。"

我说，既然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发生许多种族冲突，改革的压力也就不会像席卷苏联那样在中国迅速形成。

尼克松考虑到了这个问题："这是有些道理的。你知道，戈尔巴乔夫几乎把苏联拖垮了之后，中国人觉得他们笑在最后。尽管现在他们致力于经济建设，但我们却不能把他们称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吧？"

6月21日，尼克松有机会向中国代表团提出了这个问题。代表团包括中国前驻美大使韩叙、北京大学校长以及身着毛式制服和便鞋的中国驻苏联大使等在内的14名成员，他们来到尼克松新泽西州的办公室探讨中美关系的前景。尼克松早在20年前就开始了中美关系的研究。我当时也参加了会谈。

尼克松从强调持续建交的重要性开始谈起："中国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向前发展，但你们必须认识到经济改革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治改革。你们必须为进一步的开放进行一场新的革命，否则就要落后。"

他转向北京大学校长说："我知道你在学生示威方面遇到些问题。我能同情你！但你必须对他们有耐心。他们的机会

更多了，他们在政治上也要求有更多的机会。”

中方回答说，想取得任何进步，他们都需要有稳定的局面和良好的秩序。对此，尼克松回答说：“法律规范下的秩序和武力维持下的秩序是不同的。如果你希望从中美关系中获利，那么你也必须听听我们是怎么看待你们如何对待自己的人民的。

“美国人非常关心人权问题。我们对中国政府把敏感的武器和技术卖给像伊朗那样的国家也很关注。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不负责任的，破坏了这一地区微妙的力量均衡。

“现在，我不属于那些认为美国应该对中国实行极度制裁和孤立的人之列。我相信继续保持密切而有建设性的关系对我们双方都是有利的，双方可以轻松地探讨存在的分歧，寻求共同之处。这种关系太重要了，是不可忽视的。”

他向他们谈了一些历史问题：“1972 年之前的 25 年间，我们同中国政府没有任何的接触——没有贸易，没有外交关系，没有留学生和旅游方面的交流，什么都没有。当时中国仍然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社会。自从我们之间的大门敞开之后，中国实行了自由经济，对自由世界实行了社会开放，这使全世界都受到了震撼。”

他结束谈话时表达了乐观的态度：“冷战期间，美国和中国由于惧怕，惧怕侵略性的苏联而走到了一起，今天我们需要新的经济刺激点，共同的希望——对进一步繁荣与和平的希望——把我们联系在一起。”

中方很专心地听尼克松讲话，尽管他有时会说些不愉快的事情。

1991 年夏季，尼克松完成了《只争朝夕》的大部分。尽管

他关注在苏联发生的事情，但他仍然强调，必须使亚洲“太平洋三角地区”这一章节具有相关性、争议性和重要性。

“进来，进来，”当我走进他的住所为这本书的写作和他见面时，尼克松站在门口等着我，手里拿着一瓶中国茅台酒。“看到这个了吗？”他说，在我身后关上了门，“我刚在楼上找到的，这是茅台，会要你的命的。酒劲很烈，会把你的食道烧伤的。我记得在1972年那些宴会上，中国人喝这东西就像喝白开水一样。我只能啜一小口，这东西很烈。当然，我现在什么也不能喝，所以准备把它送给你。”

“你要把要我命的东西送给我吗？”我笑着说。

“你年轻，你可以喝！”他把瓶子放在门厅的桌子上，“你回去时可以把它带走。”

我们来到楼上尼克松的书房，这是他为写那一章而收集背景材料的地方。他走到椅子处坐了下来，拿起眼镜指着我说：“要想使这本书有分量，必须把它写得有争议性。像日本和中国这样的问题很难写，每个人都一次次地写这个题目，而且都没有写好。但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式，”他咬紧牙关说，“我可以毫无困难地写中国问题，当然，中国不像苏联，那里没有惊天动地的戏剧性事件发生，那里的改革太慢、太按部就班了——中国特色，你知道的。所以我准备谈我以前经常谈到的问题：双方都需要耐心和冷静的头脑。”

他再次把眼镜指着我说：“我记得很清楚，1972年我们离开时留下了一套卫星电视装置。那是我们在中国时美国新闻媒体使用的，但它后来变成了一匹特洛伊木马，因为它把西方的图像和新闻直接传到了中国。当时中国可能有几十万台电视机，现在已经有几百万台了。重要的一点是当中国人看到

其他国家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的时候——我们应当正视这个事实,他们看到了我们在物质财富方面所拥有的东西——他们想要得到它。邓小平预见到它的来临,很有战略眼光地开放了经济。如果他们继续这个进程,允许经济改革发展到要求政治改革,我们必须同他们保持交往,那是惟一的办法。这意味着不能中止高层接触,不能取消最惠国待遇。"

尼克松强烈地感到应该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贸易地位,尽管每年都要在国会里为这个问题激烈地争论不休。这种决定允许各国能正常地同美国进行贸易,只限制那些公开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如利比亚和伊朗。那些认为要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人主张,滥用人权的国家不应该在同美国贸易中受益。而像尼克松那样主张继续给中国最惠国待遇的人争辩说,促进中国人权改善的最佳方法就是通过贸易和其他交往来保持同中国的接触。

"我知道自由党人通过呼吁取消最惠国待遇而捞到不少政治资本。"他嘲笑地皱紧眉头说,"他们说,'那些可恶的中国人!我们知道该怎么整治他们——'他们的支持者们大声喝彩,一些选民也跟着这么做,但他们占不了多大的优势。所有这些在人权问题上哗众取宠的表演都是蹩脚的。是的,我们必须关注他们是如何对待自己的人民的,而且必须在不同意他们的做法时向他们表明我们的态度,但是削弱他们的经济利益不是我们应该做的。

"如果你取消了最惠国待遇,你会得到什么好处呢?"他问道,同时摊开了双手,"什么好处都没有。你可能会丧失对政治改革和人权的任何希望。经济自由会宣布极权统治的死亡,可能不会像我们希望的那么快,但它会发生的。因此当中

国领导人正热衷于让他们的国家富裕起来时，我们应该关心的是等待必然的结果。简而言之，事情就是如此。”

对于尼克松来说，中国的经济实力说明美国的人权报告并不明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不适当的。甚至那些最顽固的共产党员也别无选择，他们只能赞成实行已显示出惊人经济增长速度的自由市场经济。

在《只争朝夕》一书中，尼克松决定把中国置于他所谓的太平洋三角地区——中国、日本和前苏联之间极不稳定的权力均衡地区。美国同这一地区三个角落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当他们处于竞争状态时，使他们保持平衡和安定，并在他们之间维持一个和平区域。传统的野心、军事行动和利害冲突使太平洋地区成为一个潜在的危险区域。如果美国能同他们，特别是同中国保持接触，政治的和平变革将很快同地区的经济繁荣合为一体。

我问他是否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将在不进行政治改革的情况下幸存下来，尼克松耸了耸肩膀说："如果在选票与饭碗之间作选择时，人们每次都会选择饭碗，肯定是这样的。然而一旦他们的需要得到满足，他们就会站起来要求选票。我们倒愿意认为所有这些东欧革命和现在的苏联革命都是为了寻求自由，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的，但实际上是为了更高的生活标准，为了更多的财富——更多的钱，更多的物质。他们已经使人民有了电视机、电话等等，因此他们应该能够再坚持大约 20 年的时间。”

尼克松极力地维护他同中国人的特殊关系。当他注视着他的继任者和他们的代表访问北京时，他通常都是嘲笑这些访问是“失败的”，并嘲笑他们无法从中国那里取得让步。只

有他才能获得他们的重视和尊重，只有他才可以把两国拉到一起进行认真的讨论，只有他才可以听到并完全理解中国的路线，并且只有他才能说服他们坦率地听取美国的意见。在尼克松的心目中，只有他才能成功地同中国人打交道。他建立了那种地位，不但用它来发展中美关系，而且用它来建立自己的政治和历史地位。

《只争朝夕》一书于 1992 年 1 月初出版，尼克松花了大半个月接受采访以推销那本书。他知道问题会集中在苏联的解体和即将到来的白宫竞选，但是他希望至少把一些注意力引到亚洲和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重要问题上来。

与此同时，布什在那一年开始访问亚洲。尼克松认为布什可以有机会施展他的外交才华，并在民意测验不断下降的时候看上去更像个总统。但是正相反，总统却把美国的经济问题带到了国外。

尼克松感到很惊讶："我真不敢相信布什竟在日本抱怨我们的经济问题。在国外时，他不应该看起来像在竞选总统。"我们 1 月 6 日到达华盛顿推销那本书时，他说道。两天后，在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记者拉里·金的采访时，尼克松掩藏起了对布什此行的失望态度。

"我了解到有些人在攻击这次访问，因为他们觉得这次访问的商业味太浓了……我们来理解一件事。有个非常不幸的说法——总统并没讲出来，但他的内阁成员中有人讲了——大意是说经济衰退可能在某些程度上是由日本引起的。那是无稽之谈……我们必须审视自己，然后再去审视别人。"他说着，小心地不去批评布什与汽车行业经理们的旅行，也不去批评他指出与日本二分之一的贸易逆差在于汽车与汽车零部

件。"有一种说法是要日本人作出某种决定,这样我们就可以向他们出售更多的产品,或者可能削减他们卖给我们的产品,我不喜欢这个主意,我是个自由贸易者……"

像有些人想通过取消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而捞取政治资本一样,另有些人则通过批评日本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而捞政治资本。正如尼克松倡导对中国人进行耐心的接触一样,他同日本人也进行商议。这两种关系对美国和对这一地区的稳定都太重要了,以致不能在傲慢的自以为是或不耐心的过激行为的祭坛上把它们牺牲掉。

"美国和日本像骗子一样互相兜圈子是不明智的。"尼克松在 1991 年 8 月 16 日讨论《只争朝夕》中有关日本章节时说,"我们是同盟国,我们要面对这个事实,日本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看看他们在二次大战后已完成的业绩:他们从废墟上建立了强大的经济体系。95%的日本人是高中毕业生,而美国人只有 75%。我们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维护和平和努力扩大政治自由方面都需要对方。

"我们同日本的关系是安全问题。他们需要我们的军事保护作为抵挡中国、俄罗斯和朝鲜的后盾。当然,中国需要我们来保证日本不再恢复侵略性的外交政策。每个亚洲国家都因二次大战中发生的事而对日本怕得要死,即使他们现在不会构成任何威胁了。如果日本确实造成一种威胁,他们在大约两分钟内会受到核武器的攻击。那就是所有的国家都需要我们的原因——我指的是亚洲,特别是日本。这可以削减军事上的开支。如果我们离开,你想象会发生什么军事冲突吗?我的上帝!局面将会失控,可能会引发战争。"

他在椅子里挪动了一下身体继续说:"经济方面,当然也

是至关重要的。他们若不进入我们的市场就不可能生存，绝对不可能的。不管所谓的专家们说些什么，我们对日本的出口将会增加，我们会更依赖他们的市场。

"但看看日本的四周吧：他们被潜在的威胁包围着。苏联解体了，中国拥有核武器，正在成为军事和经济巨人，北朝鲜拼命地想得到核武器。除非受到威胁，日本不会走核武器道路。即使是那样，他们也会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先找我们商谈。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离开，整个地区——不仅仅是日本而且是整个亚洲——将会解体的原因。战争、军备竞争、贸易大战——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的。"

第二天早晨，我在我的办公桌上发现尼克松亲手写的一张便条，对美国将国民生产总值的6%用于国防支出而日本仅用1%的情况进行了对比。他写道，日本应"大力增加它的外交援助"预算，增加5%才能和美国的支出相一致。尼克松认为，由于日本要增加国防预算在政治上不可行也不可能，因此日本应该增加外援预算支出，以便消除日本的经援项目只用来帮助日本人的普遍印象。

"他们应该为各国多做些事。"他在1991年9月25日说，当时我们正坐在他的办公室里谈论日本对海湾战争提供经济援助的问题，"他们这么富有，要在其他国家身上花点钱时，又这么自私。而我们呢，我们几乎用尽了储备，可这是另一码事了。他们应该用外援做一些我们所做的事情，在他们感兴趣的地方，譬如中东地区，改善和平、经济进步和政治稳定的条件。看在上帝的份上，他们完全依赖中东的石油，却几乎很少为战争作出什么贡献。他们应该为阿一以和平进程提供经济援助。他们现在介入这些事情的时机简直是太好了！一旦俄

罗斯的事摆平了,那些想要民主的人将会得到他们的所有的帮助。"

他身子向前倾了倾说:"听着,如果日本想要世界认真对待它,它要舍得花钱。和平不是廉价的,良好而稳固的同盟也不是廉价的。"

11月10日,他继续谈这个论点:"当经济不景气时,指责是很普遍的,这就是政治。让我们来看看局势吧,我们与日本有巨大的贸易逆差,这个差距每年都在加大,他们拒绝进口我们的一些产品。我们有巨大的预算赤字。他们的经济慢下来了。他们储蓄,而我们开销。我们双方都有很大的问题,关键是互相攻击绝对没有任何好处,你可以从我们对待中国的方式中看出这点。你得与他们共事,而不是与他们对抗。记住,他们是我们的朋友。如果我们不断地敲他们的脑袋,那么要求他们降低贸易关税、承担更多的责任是不可能的。不能这样做,正如杜鲁门过去常说的,'手里握着一根大棒',不到绝对必要时就不要去用它。但我认为绝对没有必要这样做,除非他们侵犯什么国家或干了什么坏事情。

"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如果日本每天在国会中攻击我们,你真的认为我们国会中的好好先生们会对日本更友好吗?当然不会的。那么,"他合上双手说,"就没有什么计划贸易,也不可能通过补贴美国工业或禁止日本产品的方式来拉平差距。解决的方法不是更多地用政府的规定,而是更少。"他挥动着手指说,"解决的方法是,我们双方都应该认识到我们是不可小看的竞争对手,而不是仇敌。"

尼克松主要关心的是日本会继续盲目地拥有实力。太长一段时期,它享有经济巨人的地位,但不承担什么附带的责

任。日本必须在国际上发挥与它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作用，必须在国际金融体系特别是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必须极大地增加它对具有战略重要性国家的“目标一致的”援助。

尼克松认为日本巨大的国民生产总值可以支撑它外援预算的剧烈增长，问题是日本是否愿意使用其财政实力来稳定全球的金融市场并拓展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体系，即使它意味着它的商业利益作出短期的牺牲。日本显然想要树立一个更高大的国际形象，但在它想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一个席位之前，它必须表现像安理会其他民主国家一样，这就是说，它必须开放更多的市场、金融体系和来往债务。

尼克松意识到，日本在国际上的频繁活动将会引起国内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当美国拒绝采取必要的措施复苏本国经济，并在决定双边结盟的广阔的战略目标的同时承认更多的“权力分享”时，日本人很可能会埋怨美国“分担责任”的压力。尽管美国不能劝说日本要慷慨大方，但它能尽量说服日本人如果他们想从国外得到更多东西，他们必须付出更多的东西。

布什在 1992 年 1 月初访日时没能把这信息转达到日本，这是保守派和自由派人士都批评这次访问的主要原因。自由派说，布什在贸易问题上不够强硬，他应对日本下最后通牒，如果他们没有给予相应的答复，他应给予报复。自由派进一步批评说，布什的“贸易出使”是为了竞选活动，结果却适得其反。面对着被他的民主党反对派大肆利用的国内经济衰退，布什到亚洲去访问，大谈“工作、工作、工作”。回国时他并没有获得什么让步。他们说布什在对外政策方面再没什么优势

了,保守派们说布什迎合日本人是他优柔寡断的另一个例子。由于他没能得到更大的让步,保守的民主党人现在可以宣称布什未能成功地与日本人玩恃强凌弱的游戏。结果,总统付出了相当沉重的政治代价。他的自由贸易信条由于他关于"计划贸易"的言论而显得黯然失色,他的声誉因与汽车行业经理们一块儿旅行而削弱了,布什回国时显得惊慌失措而处于守势。

"布什应该在这次出访中'走捷径'。"尼克松1月7日在总统继续对日本访问时说,当时我们在他住的华盛顿酒店套房里见面,准备去ABC广播电台为"晚间新闻"节目录音,"我不是要诋毁那个人,但他在那里所说的都是不值一提的废话,比如工作与汽车部件问题——上帝啊!他竟和克莱斯勒公司的董事长李·艾科卡到那里去,他是个信口开河的大炮——唉,真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他摇了摇头又说,"作为总统,他应该把一些细节的讨论留给他的下级去做,这就是为什么要有一个内阁、秘书处和下一级秘书以及整个的办事机构。但布什亲自去那里说了这么些废话——嗬,好家伙!差劲,太差劲了。我可以谈细节问题,但布什应该紧紧地把握住重大的事情;谈论贸易问题,但要讲究策略;谈论区域性力量均衡;或谈论我们为不受苏联威胁而保持的友好关系的重要性。如果他竭力想再次当选而从日本那里拉选票的话,那么11月份将是糟糕的日子。"

他打开他的手提箱,戴上了眼镜说:"我重新翻了一些旧文件,偶然发现了这两篇文章。"他一边说一边把它们递给我。两篇都出自《经济学家》杂志。第一篇集中讲述了日本有意为要回称为北部国土的日本北部四个小岛举行谈判。尼克松在

下面写道，有远见的日本人在向叶利钦“求爱”，而布什却称他为“蠢货”！

另一篇文章论及西海岸各州正通过与亚洲的大量贸易而进入繁荣时期。尼克松用笔把第一段圈了起来，其中有铁路大企业家亨利·汉丁顿在1912年说的一段话：“洛杉矶注定要成为即使不是世界也是国家最重要的城市。它的前门向着太平洋——未来的海洋。大西洋是过去的海洋。”

尼克松指着我手上这篇文章说：“这些文章非常正确。第一篇是关于岛屿的，切中要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应该对日本那么迟钝；那些岛屿毕竟被苏联占领了。就另一篇文章所说的，从现在起，绝大多数思想、资金、客户、工人和合作伙伴都来自太平洋地区，这是不可避免的。”

2月初，尼克松收到了日本政府希望他访问东京的邀请。他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直到日本方面表示他们将支付有关这次旅行的一切费用，尼克松很快就拒绝了，“我不能让日本人为我付钱。”他在2月11日说，“这是个很慷慨的表示，但我不会为钱而出卖我的职责，从来不会，将来也不会。而且，现在我去亚洲不合时宜。可能明年去吧，但不是现在。”他停顿了一刻又接着说，“可能明年也会去中国，我会带上你的。你必须看看这些地方才能理解他们。你得见见中国共产党——强硬得很，比俄罗斯人更有思想。但可能明年中国人该听听我的意见，计划经济给每个人一份平等的贫穷，而自由市场给每个人一个平等的机会去改善他们的生活。他一边用拳头敲着椅子扶手一边大声说，“他们快明白这一点了。几个月后我可能有再次短期访问中国的机会。”

尽管尼克松在1992年关注苏联的崩溃和那里民主力量

的斗争，他还是决定于1993年初再次访问俄罗斯后到亚洲访问。比尔·克林顿当选了总统，任命了一个尼克松认为很“脆弱”的外交政策小组，这使尼克松相信克林顿需要他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帮助。尼克松决定关心一下同亚洲各国的重要关系，向新任总统提交他的看法，把自己看成是克林顿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的指导者。

“你知道，克林顿在对外政策上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因为他什么都不懂，说实话，他满不在乎，我担心他会把我们的对华政策搞得一团糟。”尼克松在11月8日克林顿当选之后说，“我是说，他真的会把对华政策难以置信地搞乱套。他周围所有的自由派会逼着他取消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这足以让布什很难坚持下去，而布什还是个亲华派呢！克林顿很容易在他不太懂的问题上受到压力的牵制，这些都是对外政策的重要方面，我真为中国担心。克林顿周围有一帮什么都不懂的家伙，伺机以人权问题惩戒中国。我现在还发现另有些相信和平和联合国的人，他们准备到处去呼吁‘人权，人权’，把我们同中国的关系拉回到1972年以前的时代。我必须做一些事情，因为我不能静静地坐视克林顿把它搞糟。”

尼克松害怕克林顿大胆的自由主义活动家的名声会影响他处理对华关系。为了安抚党内那些大声疾呼要求对中国采取更加积极进攻和敌对政策的人，克林顿可能会把贸易问题同人权问题联系在一起，从而同中国形成对立的局面，终止建设性的高层对话，延缓双边经济的发展。这位前总统担心，如果克林顿要寻找一种尼克松所说的“表现自我”的对外政策问题，他会选择中国的。

“他身边没有任何人告诉他不要走那条路线。”尼克松12

月 20 日继续说道，"克里斯托弗——别提他了。莱克？嗯，他知道可能无法在这点上顶住总统。塔尔博特为俄罗斯担心，有他自己的麻烦，这毕竟是首要问题。如果要犯错误，中国问题可能会成为首要问题。"

尼克松作了一个可行性的决定。他拟于 1993 年早春时访华，以引起总统对这个问题及这一地区的关注，并在 6 月份对于是否给予最惠国待遇投票之前给他一份回复报告。出访时间的制定很重要。尼克松拟通过不仅就经济改革现状，而且就继续与中国建立一种开放的建设性的关系的需求方面，给他带回一个诚实的评价，从而减轻克林顿身上来自他的政党内部，要求他就人权问题惩罚北京的压力。克林顿需要一剂现实主义的良药在黑人与白人之中找到一点灰色，他希望他身边的理想主义者给他一些外交政策上的忠告。

1993 年 1 月 2 日星期六，我去尼克松的住所接他，带他到办公室进行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当我的车转进人他的私家车道时，差点把他撞倒，因为他正向汽车道走来。很显然，尼克松刚好躲过去，爬上乘车座位。

"嗨！"他说，"新年愉快！很抱歉让你这样来接我，但满屋子的小孩子们，一点也不安静，不允许你思考。轿车在城里，我想是去接特丽西亚去了。不管怎么说，谢谢你来接我。"

在驶向办公室的这五分钟，尼克松告诉我他想去加勒比海过一个短暂的假期，但很难找到一个旅伴。"和朱莉和特丽西亚一起去总是很快乐的事，但你知道，她们都有自己的家。贝贝·雷博佐和鲍勃·阿普拉纳尔普也非常好，但他们不能总跟我去。而我自己又不能一个人去……"

我大笑："真让人啼笑皆非，因为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都

想要跟你一块去度假呢!"

尼克松微笑着说:"我知道。问题就在这里!"

我们坐在他的办公室里,考虑着他那年计划中要进行的第一次旅行。如果2月份去俄罗斯能成行,那就太好了。你得去看看这个地方。要是得不到叶利钦肯定的承诺,我就不去了。但如果那次旅行落空,我的另一个计划是和你、鲍勃、贝贝和雷·普赖斯一块儿去中国、朝鲜、日本,可能还有台湾。中国人不会喜欢,但他们也知道我是支持给予最惠国待遇的惟一有分量的朋友。不管怎样,我们将呆在夏威夷。我想要你看看,我知道鲍勃、贝贝和雷太想去那里了。几年前我们就计划要去了,但我生病了,没有去成,他们极为失望。这将是一次私人旅行,但我必须让克林顿清醒地考虑中国问题。

"你必须看看人民大会堂和长城,当然中国是地球上最壮观的国家之一。它的历史那么悠久,有众多的民族和丰富的文化遗产,你会兴奋不已的。当然,还有共产党。"他两条腿交叉着,继续说道,"他们谈论着一条美好的共产主义路线,但他们知道经济改革已完全超越了他们以前惯用的经济体制。但你得见见真正的共产党;你对他们的研究已经很多了!"

我们2月7日前往俄罗斯,从新泽西州飞往巴黎作为此行的第一阶段,尼克松把我叫到他的座位旁。他把鞋子已经脱了,一个黄色的标准记事簿放在他的膝上。

"请坐,"他拍拍他旁边的空椅子说,"我知道我们脑子里想的是俄罗斯,但忍不住要为中国担心。克林顿在中国问题上是个保护主义者,这就是说他要为支持那里所谓的中等阶级和自由主义者而付出代价。他会听南希·佩洛西的,她是个蠢家伙。"他指的是以中国的人权记录为由强烈反对延长对中

国的最惠国待遇的加利福尼亚女议员南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在克林顿对最惠国待遇问题作出决定之前到中国去的原因。如果他受到来自左翼要求取消最惠国待遇的压力，好吧，我们将从右翼对他施加要求保留最惠国待遇的压力。"

我们刚从俄罗斯回来，克林顿第一次给尼克松打来了电话，进行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并邀请他到白宫去。3月5日，正当前总统为会见作准备时，他对我谈到了他同克林顿的谈话、即将到来的会见以及中国问题。

"克林顿问我为什么中国会有10%的经济增长速度。我说有三个原因，"他数着手指头说，"第一，邓小平从农业开始，这是戈尔巴乔夫没有做而俄罗斯至今还没有做的；第二，他们的政治稳定；第三，因为他们是中国人。克林顿明白了。"

在苏联解体时，中国却繁荣发展。第二天，尼克松详尽阐述了其中的一个原因："中国人一直都是商人。当我对克林顿说他们之所以发展了经济是因为他们是中国人时，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一贯都是那么勤劳，当邓小平打开市场的大闸门时，中国人迅速作出反应。农民们想要赚钱。其他人抢着抓住机会通过经营私人生意、与西方公司合资办企业或到大街上推销商品等来赚钱。俄罗斯人还没真正重视市场：他们由于有一种对不平等的根深蒂固的怀疑而厌恶市场。中国人从没遇到这样的难题。

"关键是中国人抓住了赚钱的机会，他们并不害怕艰苦的工作。当邓小平开放经济时，他真正地开放了，没有像日本人那样再施加任何限制。他们就是让它疯狂发展。"他向四周挥舞着手说。

"当然，随着经济的狂热增长经常伴随着腐败问题。他们

得努力处理这个问题，否则他们将会造成极大的混乱。

“但是，中国大陆外有那么多华侨回国进行投资。这是很强大的力量。中国人能取得所有这些进展就是因为他们是中国人，事情就是这样。”

当俄罗斯在混乱的民主主义的困惑中挣扎时，中国却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指导中国人民为在下个世纪成为经济和军事大国而奋斗。俄罗斯人曾在共产主义死亡之后试图下最后通令促进经济繁荣，但中国人却逐渐地调整经济增长率，他们得到了回报。尼克松很清楚他们的野心：他们想要取代苏联，成为美国的主要挑战者。如果我们要迎接这个挑战，就必须要同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

尼克松几乎全身心地关注俄罗斯在由共产主义转向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期间的困难，然而他知道，如果外交政策在布什当政时是个孤儿，它会完全被克林顿所忽视的。他的一连串的有关俄罗斯局势的专栏文章引起了对这个问题的一些关注，但他不想以此作为亚洲问题的代价。尼克松的使命是要关心美国同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双边关系，以期政府当局能制定稳固的政策来发展同他们的关系。

3月13日清早7点钟，尼克松从家里打来电话说，“莫尼卡！这场该死的暴风雪下得真大！”雪下了一英尺厚，前总统不能在清早散步了，被关在书房里，“我和尼克松夫人都准备好蜡烛和手电筒了。上帝，好大的暴风雪！

“喂，我已经打点好我们到亚洲去的行装。你知道只剩下三个星期吗？时间过得真快啊。

“我对贝贝和鲍勃说了，他们都很兴奋。你会喜欢和他们一起旅行的。他们很会开玩笑。你还从没见过他们，是吧？

哎，你肯定会大吃一惊的！”

贝贝·雷博佐和罗伯特·阿普拉纳尔普是尼克松最老和最亲密的朋友。他们忠实、谦逊、有自制力、大方并且很风趣，雷博佐和阿普拉纳尔普是尼克松忠实的朋友。他们都是很棒的律师。几十年来，不论是在急风暴雨或风平浪静时期，他们都支持尼克松，经历了成功与挫折，创造并改写了历史。他们随时都在帮助和支持他，经常和他开玩笑、讲故事或同情地倾听他的诉说。作为尼克松政治生涯中严峻的竞技场中的同志，雷博佐和阿普拉纳尔普从未索取过任何东西；他们不需要特权或恩惠以及政界名流的光环或影响力，他们只想得到尼克松的友谊，而且无条件地得到了。

人们经常说，尼克松喜欢同他们为伴，并不是因为他们对他进行智力上的挑战，而是因为他们向他提供毫无保留的支持。这忽视了他们之间关系的关键：他们为的是友谊，而不是政治，为的是与除家人以外的人相处，尼克松对他们绝对信任，他们也在尼克松朴实安静的住所为他提供一片安全的天空。雷博佐和阿普拉纳尔普是尼克松难得的知己、合作者和忠诚的朋友，他们总能使尼克松开怀大笑，当他最需要的时候做他高雅的同伴。

“我知道你们都对这次旅行寄予很大的希望。对你来说特别有意义，因为你对这地区很有兴趣。你只有看过中国才算是看过整个世界。”

“除非爆发战争，我们会去朝鲜半岛这个极度紧张局势的中心。”我说

“战争！这是去那里的最好时机！”他答道。

在尼克松的要求下，我收集了国会对中国、日本和朝鲜地

区的概括性评论、剪报和其他背景资料,他从中作了大量的要点记录。他研究了经济增长率、贸易数字、当时的政治气候、正式与非正式的关于该地区领导人的资料、美国同那些国家之间以及他们之间的双边关系的现状、地区军事开支、增殖和人权等问题。

3月31日,我们出发的前三天,尼克松在下午把我叫到他的住所见面。我见他两脚抬起斜靠在椅子上,一只手上有几张纸,另一只手上拿着钢笔。"你知道有什么事真的让人惊讶吗?"他问道,"自从邓小平1978年执政以来,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三番,三番啊!他们的人口那么多,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他们正在成为经济大国,而且会很迅速!难怪日本人很担心。"他轻拍着一页纸说,"1992年,中国吸引了100亿美元的外资,这个数字与美国吸引的外资相同,这对于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来说是很不错的!

"与此同时,日本经济发生重大滑坡,当然那些只是市场规律:上升、下降,再上升。衰退,繁荣,就是这样进行的。日本还没有出现过令人瞩目的事情——你知道我的意思。但他们的储备仍比我们多得多,并且投资也多。我们的社会竟会这么可以自由处置。"他扬起眉毛说,"不喜欢它吗?厌倦啦?嗨,把它扔掉!现在就花钱吧!不要存钱了!你可能明天就会死掉!这是我们现在的思维方式,我们真不知道日本人为什么有那么强大的经济实力。"

当我向他问及亚洲区域安全联盟的前景时,他停顿一下才回答:"我知道是什么情况。由于冷战结束了,那里对美国的需要减少了。但我们得明白,对冷战结束过早的疑虑仍然存在。你看,日本和朝鲜彼此不能互相忍让,日本和中国也是

这样。我们同中国有人权争端，同日本有贸易争端，朝鲜现在仍然分成两半，所以亚洲的局势非常复杂，有潜在的危险。四个国家和区域都在追求金钱和影响力，可能很有必要找到一种新的安全协定，以便把中国顺利地拉进来——也包括俄罗斯，顺便说一下。”

“可以做到吗？”我问道。

“嗯，我不敢肯定，可能吧。谈到贸易问题时，我们能够合作，所以谈到安全问题时，我们也许能够做到。但正如我说过的，我们是该地区惟一没有发动侵略战争的一员，这些亚洲国家之间谁都不信任谁。他们可能不信任我们，但至少他们知道我们不会派坦克到那里去碾死他们。

“如果真的通过一项安全协定，美日关系肯定是个维系点，别无选择。”

有了共享的经济发展准则、不断增长的地缘经济、日益加强的对战争及其代价的悲观主义情绪以及不断扩大的贸易，主张新的区域安全同盟的人说现在是可能的。尼克松认识到美国的存在和安全保证使整个地区得以稳定，他惟恐失去对多边组织的任何控制：“如果我在这方面碰到任何问题，我会回避。”

4 月 3 日，星期六早晨，我驱车到新泽西的泰特伯洛机场登上我们的飞机。我问候了雷·普赖斯、贝贝·雷博佐和鲍勃·阿普拉纳尔普，他们很快使前总统大笑起来。尽管尼克松这次的使命缺乏他俄罗斯之行的急迫的戏剧性效果，但对他在历史上和政治上都是相当重要的。由他极为尊重和欣赏的两个亲密的朋友和普赖斯陪同，这更有好处。

我们在安克雷奇市着陆，当晚与沃尔特·希克尔州长及其

家人共进晚餐。尽管尼克松很疲劳，但他还是对俄罗斯的转变进行了深刻的权威性分析：“叶利钦会成功的，但这将是一场非常紧张的赛跑。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帮助他。媒体对叶利钦这么势利，他们从不说他的好话。那是因为他们支持戈尔巴乔夫以及共产党会得救的观点，因此他们瞧不起平民主义者叶利钦。当他们没办法时才采访他，并希望他失败。这真是令人恶心的。莫尼卡，”他转向我说，“你认为叶利钦能幸存下来，是吗？”

我回答说我认为他能幸存下来，因为他不仅代表正确的事业，而且有坚强的政治性格。

“说得对。”尼克松说，“他是个斗士。斗士总是站在最高处，即使看起来有些不像。”

跟州长道过晚安之后，尼克松想去散步。很晚了，他也很累，但他坚持要我同他以及他的安全护卫约瑟夫·克劳利暂短地散步一下，这似乎能给他注入活力。

“看看它们是如何闪光的，”他指着远处的灯光说，“这些颜色——嗯，你今天看过了——真是太美啦。这里每样东西不是白的就是绿的或蓝的。我知道人们喜欢纽约，但看了这个之后，我们真怀疑我们为什么要回到那该死的地方。有时这里甚至比我们那里更温暖。”

他把大衣最上面的那颗扣子系上，拉紧衣领。“你觉得希克尔怎么样？他是个极好的人。他跟我们在一起，你知道，非常支持我们。他是个环境专家，当阿拉斯加州的州长不容易，但不当也不容易。看看所有这些美景！但他懂得对外政策；他只是对国内方面更有兴趣，这很好。他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好州长。

"但我对叶利钦的评语是真实的，媒体只有在他们认为完全有必要时才去报导他，比如他在不信任投票中获胜等事情，否则，他们只把他挂在外面晒干。唉，"他叹息道，"我想我们不能对他们怀有太大的希望。我只希望克林顿明天会支持叶利钦，强有力地为这家伙说几句话。他应该这样做。"

第二天一大早，尼克松要我总结一下星期天早晨访谈节目。我告诉他塔尔伯特已对克林顿－叶利钦的最高会晤发表了正面的评论，参议员劳埃德·本特森和斯特劳斯大使对俄罗斯总统极力支持。尼克松拍起手来："好，早就该这么做，太好了！我想要你给他们写个便函，告诉他们你对他们支持叶利钦很感动。如果是你写的，他们会知道这是我的意思。他们爱听好话，因为他们通常听到的只是对他们的谴责。"

那天晚些时候，我们离开阿拉斯加前往东京。当我们接近国际日期变更线时，雷博佐和阿普拉纳尔普把我们召在一起"庆贺一番"，包括开些玩笑并举杯为此行祝福。为在亚洲着陆之前给我们创造一份节日的心情，阿普拉纳尔普打开了手提箱，向每个成员分发了幸运饼。尼克松打开他的那一份，微笑着说："莫尼卡，"他把他的幸运饼纸条递给说，"读读我的——大声点。"

我自己先读了一遍，然后明白他为什么要我大声读了，"你头脑敏锐、分析透彻，"上面写道。"你看，"尼克松说，"很明显，这不是我的敌人写的！"

我们在东京着陆后，尼克松在晚上休息之前把我叫进他的套房。"给你，"他把一些审阅过的资料递给我说，"把它们保存好，别丢了。我太累了，所以我想睡了。但如果你不太累的话，你真应该出去看看这个城市，这可真是个大都市。当然

你在一天内不可能看所有的东西,但如果可能的话,你应去看看皇宫。"

他打了个哈欠说:"我还得对你说,我很高兴我们没有被大使馆缠住。人们很奇怪为什么我出国不要大使馆或国务院来管我,那是因为我能做我想做的事情。我知道我对大使馆或外事服务人员很不好,他们不喜欢我们,因为我们不用他们。但是,"他说,"他们约束我的工作作风。"

由衷地大笑之后,他继续说道:"我同迈克尔·阿马科斯特大使谈得很愉快。他很精明,有点傲慢,但这没关系。他了解日本人,是个很好的外交官。当然在日本不会出现太多的象其他国家那样的政治问题,但他抓住了所有的经济事务,他能处理得很好。我很高兴见到了他。"

尼克松第二天早晨再次叫我时,看上去似乎休息得不错。"我想要你同我一起去和宫泽喜一首相会见,你必须看看最高层的外交;那是惟一的学习方法。宫泽喜一是个给人印象颇深的人。当然他是前首相吉田茂的支持者,他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日本。他以前在财政部呆过,所以他是金融专家,但他也懂得世界政治。你见见他是很有趣的。我也会带雷参加这些会谈,因为他对外交及整个区域非常感兴趣。他们(日本人)只给我半个小时的会见时间,也就是说除去翻译只有15分钟的谈话,但这很好了。我会集中谈大事的。"

尼克松接着离开了,前往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的办公室与中曾根进行私人会晤。当他回到酒店时,他带上普赖斯和我去与宫泽会谈。我们被护卫着进入首相的宫邸,国际新闻媒界已在那里恭候了。两个首脑开场白之后,新闻界退出了房间,尼克松与宫泽就日美关系的未来进行了一次兴致勃

勃的讨论。

尼克松说,尽管美国与日本"在经济方面"即贸易逆差问题存在着分歧,但我们共同的利益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不能让这些分歧模糊了我们共同的利益,"他说,"我们都是民主国家,我们是世界上两个最强大、最富裕的自由市场经济国家。自从归还冲绳岛之后,我们没有留下二次大战给我们带来的任何领土争端。我们都是贸易国,在促进自由贸易、抑制保护主义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那就是为什么计划贸易只是暂时的、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不符合美国或日本的长远利益。"

宫泽目视前方,回答说,日本的经济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开放,在不损害日本经济利益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实行自由贸易。尼克松感到他在贸易问题上的说服力有限,就转换话题,提出了直接的建议。

"日本在外交援助方面是个非常慷慨的捐助者,仍可以考虑增加捐助,特别是涉及俄罗斯问题时。非侵略性的俄罗斯民主政府对每一个自由国家都有相当大的利害关系。现在日本不情愿多付出,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和俄罗斯不肯归还四个岛屿有关,他们应归还,就像我们归还冲绳岛的做法一样。另一方面,对叶利钦政府持那种态度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如果他作出其他的选择可能情况会更糟糕,日本是不可能从任何伺机等候的民族主义者那里要回那些岛屿的。"

"我知道,"宫泽说,"我读了《克林顿的最大挑战》。"他指的是尼克松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需要帮助俄罗斯民主力量的专栏文章。

"如果日本清醒地考虑增加对俄罗斯的援助,"尼克松回答说,"这不仅对世界其他国家表明日本准备在国际上扮演一

个重要的角色，而且也向日本提供了扮演这个角色的权力和义务。”

宫泽听着，但没有直接答复尼克松。相反，他转移到关于外交更保险的话题上，重申日本应该与美国建立一个强大的双边关系，以及需要寻找尼克松所说的共同基础。

我们回到酒店时，尼克松约见我：“嗯，你看到了吧，”我走进他的套房时他说道，“日本人从不会改变，非常强硬，而且彬彬有礼。他一点儿都不让步。好家伙，他是个又强硬又有个性吸引力的人——非常能干。但我认为我已经把我的想法说得很清楚了，你怎么想的呢?”

我对他说，宫泽已经很明显地听进去了，但不知道他能在多大的程度上按尼克松所说的话去做。

“我知道，”尼克松回答说，“日本人就像咧嘴而笑的柴郡猫。他们从不表露出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不像俄罗斯人，俄罗斯人很情绪化，如果他们对你说的话不高兴，马上就会让你知道。日本人从不表明他们的真实目的，这是第一流的外交，你也可从中国人那里看到这点。很自制，多听而少说话。但那没关系，因为这给了你一次把你要说的话讲出来的机会。

“但问题是日本不可避免地要承担一个更重要的世界角色。我希望我已经表达了只有通过共同努力才能促进太平洋地区的和平、繁荣与稳定的观点。日本人已明白这一点，但有我这样的人时不时地重提一下仍是不错的。”

尼克松微笑着：“我们现在来看看。你已见过叶利钦和所有东欧的领导人了，也见过日本首相了，一两天后你会见到韩国总统，接着你会见到中国共产党人。他们真的很强硬。”他微笑着，在我离开后关上了门。

第二天，4 月 7 日早晨 9 点钟，我到尼克松的套房去见他。他很不安又很激动："我昨晚没怎么睡，我应该要睡的。我已经和麻生女士共进早茶了，你知道，她是吉田的女儿。我们要前往韩国了，我只是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呆的时间够不够长。日本这么重要，但我还要见谁呢？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宫泽很难以捉摸、强硬而精明，他是国际贸易和产业部的部长；他们真他妈的强硬。劳埃德·本特森可以对付他们，但其他没人可对付他们。我们的总经理们冷酷无情，但我们政府里很少有人会这样。但是很明显，他被我关于俄罗斯问题的专栏文章所震动了。他们知道他们该做的事，只是不想去做而已。"

那天晚些时候，在飞往汉城的途中，尼克松问我对日本一行的看法。我告诉他，除了与首相会谈的时间太短之外，他提出了一些非常有效的观点。

尼克松回答说："我想是有效的，老实讲，他需要听听这些话，特别是俄罗斯问题，你同意吗？"

我表示同意。尼克松透过飞机的窗口往外看："这些地方真是百看不厌，即使你 1000 次地来到这个地方，你是第一次到这里来，所以它是全新的、令人兴奋。但当你回来时，你必须像第一次那样看这些地方。"

他清了清喉咙说："你会永远记住这次旅行的，因为你见到了掌握权力的人。但更重要的是见到了大街上的老百姓，就像我们在俄罗斯见到的一样。我们在中国会有时间这么做的。那是最重要的事。此外，领导人不能创造国家和文化；是人民创造的。

"我们着陆时，我准备看一下我关于韩国的笔记，然后再

去睡觉，所以我可能在明天我们与金泳三总统见面之前不会见到你。你跟鲍勃与贝贝相处得怎么样？与他们旅行是不是很有趣？他们可以使你放松外交活动中的紧张情绪。我还没有太多的时间和他们在一起，但在中国那些大型会谈之后就可以了。"

次日早晨，尼克松同前总统卢泰愚用过私人早餐后，我见到了他。"他给人的印象很深，"尼克松谈到他，"他有远见。韩国人一贯出优秀的政治家。你今天上午也会从金泳三那里看到这点。因为半岛分裂，边界军事化，所以南部的领导人不得不好好干。这点像以色列，四面临敌，所以他们产生强硬而优秀的领导人。朝鲜是美国在和平和稳定问题上有重要利益的地方之一。现在苏联解体了，北朝鲜很孤立；他们胆大妄为，说实话，发疯了。"

同金泳三会谈比同宫泽会谈的时间更长，而且涉及的范围更广。在总统官邸蓝宫里，尼克松首先与他单独会见，而普赖斯和我在国宴大厅等候。半个小时后，他们走了出来，与我们一起共进午餐。在座的还有外交部长韩素福、总统国际事务和国防事务秘书洪钟清以及公共事业秘书金加利。

尼克松把总统引到普赖斯和我面前。"总统先生，"他说，"坐在我桌旁的是三代人的代表。我自己，"他指着自己的胸口说，"普赖斯先生，二战中参加海军，克罗利小姐，我当选总统那年出生的。"韩国人大笑。"但在把韩国看成一个经济奇迹和美国最好的联盟之一这点上，我们是一致的。"

金泳三开始时高度评价了叶利钦，并对一篇关于一些共和党人不同意克林顿对俄罗斯的一揽子援助计划的报导表示怀疑。

尼克松回答："在提交议会之前，每件事情都会有反对意见，但我相信会获得两党强大的支持。我几个星期前从俄罗斯回来时，见到了许多议员，我有信心他们会支持这个计划的。外援从来都是不多的，但如果知道这是投资在和平与繁荣上，会得到支持的。"

金泳三说克林顿对俄罗斯援助的决定"非常大胆"，并补充说，"我认为尽管存在着千岛群岛北方领土问题，日本决定给予一些援助也是大胆的。"

尼克松说这对日本很难，因为俄罗斯不情愿归还那些岛屿，但是，"如果日本能像韩国一样捐助那么多，那会是一项重要的投资。

"俄罗斯的转变是一场赌博，因为它是史无前例的。叶利钦政府仍然站得住脚，这真是个奇迹。但共产主义在苏联失败惨重，不会再卷土重来，特别是现在30%的劳动力私有化。我们的支持是正确的，而且是必要的；我们希望对我们很适用的思想也能在俄罗斯获胜。"

"世界上两个最不稳定的地方是俄罗斯和北朝鲜。"金泳三说。

"我同意。"尼克松回答，"北朝鲜的政治领导人这么不可预见。很多人认为苏联人是罪恶的，但没有人认为他们是疯狂的。我们不能这么说北朝鲜，这是世界上最封闭、最讳莫如深的社会。短期内，我们关心北朝鲜是否会同意接受核检查；从长远考虑，我们必须让他们开放，因为这会缩短极权主义的生命周期。"

"我同意。"金泳三说，"韩国最重要的外交政策问题就是让北朝鲜同意接受检查，加入防止核扩散条约。我也很关心

北朝鲜主席金日成把多少权力传给了他的儿子。”

尼克松指出，核问题是美国和世界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如果北朝鲜发展它的核计划，它将会危及韩国和日本，促使他们增强自己的武装力量来对抗。

“北朝鲜是一个被国际社会放逐的国家，”尼克松说，“它拥有核武器是不可接受的。这对美国来说是极端重要的，对于中国应该也是如此，因为中国也是一个核能大国，它将不会欢迎区域内任何一个国家也拥有这种武器。作为经济上的强硬对手，我们都有许多分歧。但是每个国家都应注意核扩散问题，特别是北朝鲜。现在，总统先生，”他握住手说，“需要我对中国人说些什么吗，因为我不代表政府，因此我可以不负责任。”

金泳三笑了。尼克松接着说：“在对华政策上，经济问题决不能与其他问题相联系。中国人对北朝鲜比较友好，但他们对发展经济更有兴趣。如果美国政府取消最惠国待遇，对他们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克林顿说过他将重新审查对华政策，但如果在核武器问题上中国不与国际社会共同反对北朝鲜，那么中国可以忘掉国会讨论最惠国待遇的这回事了。”

金泳三同意尼克松的观点。但是较之中国经济的爆炸性增长，他更关心北朝鲜不断坚持美国从韩国撤军这件事。

“美国不会考虑从韩国撤军。”尼克松说，“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减缓南北朝鲜之间的紧张局势。在北朝鲜有一股实用主义的势力，而通讯革命和思想的传播将会危及这种统治。看看阿尔巴尼亚，一个完全封闭的社会，但也无法抵抗思想的潮流，最后还是开放了；一旦北朝鲜的人民接触到他们国界以外的生活，他们的领导集团将无法抵御那种压力。正常

化是这一过程所不可缺少的。"

尼克松回忆了1953年他对韩国的首次友好访问，以此结束这次谈话。当时是寒冷的11月，无数学龄儿童挥舞着美国国旗欢迎尼克松。"我知道韩国会胜利的。"尼克松说，"你们将为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和未来的世界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这次会面刚刚结束，尼克松决定访问汉城百货商店，去看看运行中的自由市场。当我们在商店里的时候，尼克松对我说："看看这些商品！这说明市场能给人们带来什么，即使价格对于普通人来说仍然有点高。但是你瞧，在莫斯科，你无法见到这样的商品。只要他们顺着这条路走，就能达到。"他停了一下，"看看周围，这座城市有一股强大的活力。他们真的创造了经济奇迹。我再告诉你一些其他的：他们在对俄罗斯的援助上显示了真正的勇气。他们的经济实力已经相当于日本的一部分了，而且他们付出了相当大的比例。如果日本有韩国人的那种勇气，俄罗斯现在将会好得多了。"

我们在宾馆周围的花园里作了另一次简短的步行。之后，我们离开汉城来到了北京。当我们驱车穿过中国首都的街道时，我们看到了成千上万的人们在城市里活动，他们或者骑着自行车，或者开着小汽车，或者步行。大幅标语支持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小汽车的收音机里放着美国流行音乐。虽然在晚上，人们看上去都行色匆匆。这是一种有控制的、活跃的喧闹。

我们被护送到一个政府宾馆大院，宾馆门口有持枪卫兵警卫，周围环绕着池塘和花园。尼克松走过大厅，进入他的套间。我听到他叫道："莫尼卡。"

我走过铺着红地毯的走廊，来到他的门前。门是开着的，

我看到他透过窗子看着下面的院子。"你叫我吗?"我问。

他转过身来。"是的,是的。"他说,"进来看看。看看这一切。这是我1972年时住的房间。你能相信吗?它跟当时一样的辉煌。"他慢慢地走向桌子,后面有灯光射过来。他摸了摸桌面,然后他走向椅子坐了下来,抬起头看着我,"我就是在这儿写下《上海公报》。我就是在这儿完成这一切的。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现在情况已经改变了许多,但是这一突破也许是我的总统任期内最重要的成就了。"他停顿一下说,"我只是想,也许你想看看发生这一切的地方。"

他站起身来送我到门口,问:"你的住处怎么样?记住今晚你是在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国家入睡的。"

第二天,4月9日,尼克松让我们这些随行人员去参观故宫。当时一场大风暴袭击了北京,灰尘与风沙劈头盖脸的,看不见美丽的景色。我们回到宾馆后,尼克松见到我们被风吹得乱糟糟的样子,吃了一惊,要求我们在去与外交部长钱其琛共进午餐前先清洗一下。

午餐与其说是实质性的会面,不如说是一种礼节上的表示。虽然尼克松提到例如中美、中日关系这样的话题,大部分的话题还是留到下午与李鹏总理会谈的时候讨论。

5点钟时,普莱斯与我陪同尼克松前往中南海总理办公室与李鹏会面。尼克松在媒体面前向他致意并介绍了普莱斯和我,他补充说:"一个星期前她刚随我去过俄罗斯。"李鹏看着我说:"你会讲俄语吗?"我告诉他说我不会,他说他曾在莫斯科学习过,然后他挥手让摄影记者退出了房间,请我们坐下。

会面的开头,他表示很高兴再次见到尼克松,"中国人民

的老朋友”。他向尼克松询问他对俄罗斯局势的看法，因为他说他不相信俄罗斯政府可以在物质上供应人民。

“几周前，我在莫斯科的时候，我看到人们在政府大楼面前进进出出。”尼克松说，“而且我见到商店里有充足的商品，虽然商品的价格比较高。俄罗斯正在取得进步，虽然速度比不上中国。经济改革正在取得进展，这是以某些政治上的不稳定为代价的，但这是不可逆转的。决不会再回到共产主义了。克林顿总统以在七大工业国的援助中起领导作用为己任。叶利钦政府生存下去是很重要的，因为它采取了温和的外交政策。任何一个叶利钦的替换者都会采取侵略性的外交政策。”

他以中国的直接利益为基础继续阐述了叶利钦存在的必要性：“周恩来对于冒险性的苏联外交政策很关注。而叶利钦的民主政府不是一个威胁，这个政府的存在是合乎中国和美国的利益的。撇开政治和经济形态，叶利钦的继任人将寻求一个更强大的俄罗斯。”

李鹏回答说俄罗斯正处于“混乱”之中，并明确表示中国将不干涉其国内危机。无论谁在莫斯科掌权，中国都想与俄罗斯保持“友好睦邻关系”。

“只要叶利钦掌权，中国将是安全的。”尼克松继续说道，“我认为他有 50% 存活的可能性。虽然经济上存在着问题，叶利钦在俄罗斯依然是个受欢迎的人物；叶利钦与俄罗斯人民之间有一种特殊的亲密的联系，而戈尔巴乔夫却没有。他们两人都出身农民，戈尔巴乔夫成了一个世界性的人物，而叶利钦则保持为人民的一员。中国应与北方邻国保持一种友好关系，我们不指望中国会支持那个民主政府，但中国应表示

欢迎。”

李鹏回答说，叶利钦在去年12月对中国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访问，访问期间他们谈到了增进贸易关系。李鹏很清楚尼克松是叶利钦在西方最重要的支持者，因此他告诫说：“美国不应将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因为叶利钦在公众中的受欢迎程度已有所下降。”

“我们并不是对一个人制定政策，”尼克松说，“而是根据他所代表的，我们想要的，以及中国想要的而定的：一种不具侵略性的俄罗斯外交政策。”

“即使西方给叶利钦政府更多的援助，”李鹏回答，“那也只能是象征性的，因为他必须采取一些实际措施来发展经济。”他暗示道，这些措施与中国所采取的并无不同。

尼克松接着谈到了中美关系：“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局面与1972年时不一样。当时美中之间建立一种特别关系极其重要，因为越南与苏联对我们有威胁。我当时到中国完全没有想到中国会援助越南，但美国人民因为苏联的威胁，支持与中国的关系。现在我们处于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必须为继续我们之间的关系找寻理由。

“中国在地区范围内和全球范围内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并且快要成为经济上的超级大国。你知道，6月3日国会将就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进行投票。克林顿总统面对着给最惠国待遇时要附加条件的压力，因为他在竞选时承诺在中国问题上更加强硬，也因为国会中有许多反华分子。但我相信克林顿想要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不过我想中国在人权问题和北朝鲜核扩散问题上应该自愿做出一些令人消除疑虑的行动，以避免授人以柄，给那些反华分子找到撤消最惠国待遇

的借口。"

尼克松继续说道："我并不想要干涉中国的内政，但是，作为20年前打开与中国关系大门的人，我觉得如果两国关系在这些问题上被困扰，对两国都是不利的。"

李鹏清了清喉咙："俄罗斯可能依然是一种威胁，因为它仍旧拥有巨大的核军火库。"他说，"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征服过它，包括拿破仑和希特勒。世界应该警惕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倾向。俗话说高枕无忧，但西方是不会安眠的。克林顿将重心放在国内经济上，中国也是如此。它们是互补的。"

"在美国，大部分的领导人并不作长远考虑。"尼克松说。

"美国需要更多像尼克松总统这样的领导人。"李鹏回答道。

尼克松点点头，开始另一个话题："克林顿总统正在裁减国防预算，因为不再有苏联的威胁，但是我个人反对美国从亚洲撤军。如果日本失去美国的支持和保护，它将不得不走向核能化。这样的话，中国将面临一种很艰难的局势。"

他改变了一下方式，说："另外还有一件事我想与总理先生交换一下意见。美国对华贸易有180亿美元的逆差——"

李鹏打断他说："这是一个荒谬的数字。"

"总理先生相信我们的中央情报局吗?"尼克松问道。

李鹏微笑地说："商业秘书的功课没有完成，因为贸易收支是平衡的。"

尼克松扬起一边眉毛。"嗯，"他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至少人们有一种感觉，认为对日本和中国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

"如果撤消了最惠国待遇，"李鹏显然已有计划，回答说，

"香港将受到影响。美国不应因撤消最惠国待遇而放弃它在这个市场中的份额。"

"我同意。"尼克松说。

"美国与日本是对手，"李鹏说，"但是美国与中国是经济伙伴。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产品低价而优质，如果美国不从中国进口这些产品，将向其他国家进口，做工也许就不会有这么好了。请转告克林顿总统，无论他在竞选中说什么都没关系；我们关注的是现在他在干什么和说什么。我们愿意合作。"

接着，尼克松把话题转回北朝鲜。他直截了当地问李鹏说："对待北朝鲜核武器的发展，中国持什么政策呢？你们能对他们施加影响让他们遵守核不扩散条约吗？"

李鹏在座位上动了动身子说："北朝鲜与中国有良好的关系，但是中国不会去干涉他们的内政。"

当尼克松再追问他北朝鲜武器问题时，李鹏回答说美国先得拿出有关这种发展的证据，然后他才能要求他们停止。

尼克松结束这个谈话时说，他将强烈反对美国国内任何对最惠国待遇附加条件的要求，或其他"破坏关系"的做法。

比起 1989 年与李鹏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会面，尼克松与李鹏的这次会面比较没有争议性。天安门事件已经过了足够长的时间，尼克松有更大的自由来谈论两国关系中的积极因素以及他对核扩散和人权问题的关心。尼克松说，他自从 1989 年访问中国之后，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越来越有信心"。这次，他在与李鹏的会面中越谈越有信心，会面结束时他很受鼓舞，他认为这位总理不但听了他的观点，而且也许也理解了。

那天晚上，回到宾馆后，他叫我过去。他的套间是关着

的,我敲了敲门。没有回答,我扭了一下门把,打开门,"总统先生?"我对着黑暗说。远远房间角落里一束柔和的灯光转强。尼克松坐在办公区的角落,支着腿,把手放在膝上。"先生,"我问,"都好吧?"

他挥手让我进去。"是的,我只想闭上眼睛,这样我才可以考虑一下今天的谈话。过来,坐在这儿,"他说,他把腿从矮凳上放下来,把它推过来,"好,你见到了一个真正的战斗中的共产主义信徒。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你见到他是怎样证明论点的。当然,我也可以用我的方式证明我的论点。但是这个人像钉子一样硬。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者。你可以在他身上看到钢一样硬的东西。"

第二天,4 月 10 日,尼克松让他的随行人员去参观长城。他站在宾馆入口处,看着我们钻进汽车,挥着手送别车队 我在车里转过身,看到他叉着手臂,目送我们离开。"我已经去过长城了。"他说过,"每个人至少要去一次长城。但我不能来去都在小汽车里花上两个小时。特别是下午我与江泽民主席有一次会谈。但你们要去,你们会觉得惊奇的。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奇观,当然,它和金字塔。"

我们从长城一回来,就陪同尼克松参观了北京茶馆。他一下汽车就被几百个中国人围了起来,大家拼命地鼓掌和挥手。他穿过敬慕的人群走进茶馆,在那里,我们欣赏了中国传统军队艺术、舞蹈和歌曲。尼克松随着音乐摇晃,为艺术家们喝彩,明显地为受到崇拜和尊敬而高兴。在欢乐中,他抓起一个把狭长形鼓,随着音乐的节奏敲击,接着他起身走到台上,摆出姿势给人拍照并在照片上签名。

离开茶馆后,我们前往人民大会堂,尼克松带着我们走上

庄严的台阶,穿过1972年周恩来与他庆祝那个历史性成就的宴会厅。尼克松离开我们慢慢走上台。他走上台阶,默默地站在舞台中间,看着空空的厅堂。几分钟后他说:

"这就是当时我们所待的地方,"他柔声说,"这就是我们举杯庆祝两国互相开放、建立关系的地方。现在它是空的,但在1972年,那时这里是多么拥挤热闹啊!这个房间挤满了人群,大家都在庆祝与我们之间的那个突破,"他顿了顿,"多么令人激动的时刻啊。"

下午我陪同尼克松与江泽民主席进行会晤。前总统知道江泽民被认为是邓小平的指定接班人,因此他决定提出一些与李鹏讨论过的话题,用一样比例的威胁与鼓励,再与江泽民谈一谈。

会谈一开始,江泽民首先对尼克松表示了热烈欢迎,还回忆了他1972年的来访。尼克松则祝贺江泽民成为主席,并说自从1989年他上次访问中国后,美中关系取得了进展。

"我希望,"尼克松继续说道,"主席能在合作基础上与美国新总统建立新的关系。对于1972年我访华的原因,许多人进行了推测:是要结束越南战争,还是要平衡抵消苏联的威胁,或是其他什么原因。不过现在,冷战结束了,我们需要为中美关系找到一个新的基础。许多人没有意识到,即使没有越南或苏联的威胁,我当时一样会访华的。我访华是因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在现在和未来都将扮演重要角色,起决定性作用。要使下世纪成为一个和平的世纪,我们两国间的合作是不可或缺的。

"你知道,国会每年对于是否延长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的投票,支持与反对票都是很接近的。7月3日,我们还要

投一次票，克林顿总统将承受要求对最惠国待遇附加条件的压力，因为美国有许多人因为中国人权问题而反对给中国最惠国待遇。不过，我相信克林顿总统将与主席发展友好关系，因为你们两人都与人民有良好关系。我希望这种新的关系不要因最惠国待遇问题而受到什么损害。我因而极力主张主席考虑在人权领域采取某些行动，以减轻克林顿总统面临的对最惠国待遇附加条件的压力。”

江泽民直视前方：“我十分欣赏你的直率。历史已经显示了你总是具有长远的目光，这是令人欣赏的。

“当我就任中国国家主席时，克林顿总统给我发来贺电，并表示了他对积极的双边关系的需要和理解。

“我认为中美之间在地缘政治学的利益上并没有基本冲突，但是我们双方之间缺乏理解，导致了许多重大问题存在分歧。我们应寻求两国间更多的接触和交流。”

尼克松回答说：“天安门事件导致了我们高级官员级和议会级人员间接触的终止。这应该得到恢复。”

江泽民点点头表示同意：“我与你一样，来自人民，我由学徒做起，后来当上一家工厂的厂长，然后进入政府部门。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他说，轻描淡写地忽略了尼克松是美国保守人士，而他是中国共产党员这回事，“保持最惠国待遇对两国来说都是有益的，中国为此作出了许多积极的努力。中国将继续开放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尼克松接着说：“我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提起人权问题的，而且当国会提起最惠国待遇问题时，我总是投赞成票。如果最惠国待遇被否定的话，对于两国的经济都会是不利的，但克林顿总统面临的压力也是很实在的。如果中国给他鼓励，

他会改变看法的。克林顿总统现在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是很重要的。你们双方共有一个建立新的战略和经济关系的历史性机遇。"

江泽民表示他希望建立这种新关系，并补充表示对叶利钦的相对友好的评价。

尼克松继续道："对太平洋的未来起决定作用的有四个国家——中国、俄罗斯、日本和美国。它们之间的关系越密切，越好。美国不应从这一地区撤军，或者冒险让它陷入更大的不稳定中。这就是为什么美中友好关系是不可缺少的原因。"

江泽民站起来为尼克松鼓掌并送我们前往参加为尼克松举行的宴会。宴会中，江泽民多次在祝酒词中称赞尼克松，并强调他在中美关系中作为一名诚实的中间人的独特地位。

回到宾馆后，尼克松与我在他的套间坐下，说："嗯！你今天累得够呛了！又是长城，又是人民大会堂，又是天安门广场，又是与主席共进晚餐。我简直觉得回到了1972年！"

与中国领导人的成功会晤带来的兴奋似乎激动着他。第二天，当我们登上租来的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前往杭州时，他很放松地与机组人员开玩笑。起飞后，尼克松离开他的座位，走到后面坐在我身边，说："中国人与俄罗斯人很不一样。俄罗斯人酗酒，抽烟，大声说笑；而中国人从来不会这样，尤其在外交会谈中。但他们对他们的经济发展非常自豪，他们确该如此，他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因为他们紧紧抓住了经济改革。"

他靠得更近了些："你听他们在贬低叶利钦。他们害怕他会成功，因为那将敲响他们的丧钟。改革的种子将以你从未见过的速度撒播。所以我从他们的利益出发阐述我的观点。

为什么他们应该希望叶利钦继续存在，那是因为他的和平的外交政策，这是叶利钦所赞同而他的替代者们不会赞同的。他听到江泽民说他们希望与俄罗斯保持友好关系，因为他们之间的边境线那么的长。是的，如果叶利钦下台，他的继任将向边境派出更多的部队，比你想象的快多了。"

他改变话题，说道："你相信西方媒体对我们几乎一点也不关注吗？现在，说说你对中国媒体的想法，至少它们给了我们一点活动范围。为什么呢？难道它——这次行程——是无关紧要的吗？不，也许是中国人将它们摒弃在外。"

美国媒体没有对尼克松这次旅行给予应有的重视，对此尼克松颇觉沮丧。他到俄罗斯的旅行一直吸引着媒体的注意，而他到中国的这次任务相比之下大大不同了，没有得到主要美国报纸的足够重视。尼克松明显觉得失望："他们应该注意到的，可他们没有。"

在杭州，我们登上1972年特意为周恩来和尼克松造的小船，在湖上享受了一次愉快的游览。当尼克松离开他的中国主人们，到甲板上与我说话时，他说："你觉得怎么样？难道这不是令人惊异的吗？所有这些高楼在1972年时都还不存在。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令人难以置信。"他越过碧波盯着远方的风景说，"这是中国的旅游区，当然，北京除外。人们从四面八方千里迢迢地赶来欣赏：这些船只，樱花和喧闹的活力。你可以看到有些私人商店。这些活动结束之后，我要去见见当地群众。中国人热心又友好。"

前总统在杭州市区走进人群。人们对他有一种毫无保留的感情，群众拥上来簇拥着他，鼓着掌，与他握手，伸出手来碰他。尼克松几乎要被人群淹没了。

"被人这样对待是令人兴奋的，"与群众见面之后，尼克松这样说，"这么多人认得我，他们似乎很欣赏我所做过的事。"这是一种物质上的认识，也是一种历史上的认可。人们对他的欣赏和尊敬，在国内已渐渐变弱，而中国人对他显示出来了。意识到在世界上某个地方受到尊敬对他来说，显然是一种欣喜和对自我的证明。在中国那个温暖的一天，他以前的总统活动显示出了新的意义。他是中国人的英雄，一个受尊敬的、受聆听的、被需要的人。他寻求尊敬，在中国他找到了。

接着，我们前往杭州植物园，参观尼克松在1972年亲手种下的红杉边，在他们商量《上海公报》时住的宾馆边，照相留念。回到饭店后，他要与我谈话。他看上去很放松和满足。

"你喜欢公共澡堂吗？"他轻轻地笑道，"出去见到真正的人民总是好的，但是在中国你总是被围着，因为你是个美国人。"

"或者因为你是尼克松总统。"我说。

"也有这个原因，"他微笑着说，"但是他们那么感激我对他们国家开放所作出的贡献。而我则为他们的欣赏而感激他们。我知道这对于我来说是在回忆往事，我希望它不会使你厌烦。你现在已经学到了许多东西，当你要对外交事务提出意见或者自己卷入这种事件时，你就可以进行应用。中国人民是友好的。他们的自由市场相当原始，凡事总有个开始，如果有人可以做这件事，那一定是中国人。"

当我问他是不是认为中国下一步需要的是可以引导经济发展的政治改革，他回答说："当然，但不会发生。不会很快发生。20年，也许是30年后，我们才会看到这种进步。我不认为会更快。虽然在邓小平死后，你无法预测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认为要一代人之后中国才能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靠近民主。但是要记得，中国人考虑问题是以世纪为单位的；对他们来说，30 年不过是打个嗝儿。"

尼克松说着，对中国真正的民主化进程作了预估。自由市场使不止十亿的人迅速脱离了贫穷，达到世界中等水平。中国人在热火朝天的经济改革中热情澎湃地寻求繁荣发展。尼克松知道改革是无法阻止的。当北京的政治领袖们谈着意识形态的时候，其他的中国人谈的是商业。

尼克松相信，新兴的中产阶级将要求更多的自由和繁荣。领导层将被迫适应他们，因为，如同台湾和韩国所显示的，经济上的成功往往使社会更容忍多元化，减少暴力倾向，趋向于妥协。

人们整天叫喊要跟上市场形势，而市场则老是走在前面，脱离他们的控制。同时，随着那些在经济机遇中得益的人们开始要求获得政治机遇，政治上的控制将渐渐减弱。尼克松关于中国真正的民主将在 20 年后到来的预言，基础在于，他认为人们对政治的自由要求需要经过那么长的时间，才能适应经济上的发展势头。

4 月 12 日，我们到达上海，一个散漫、忙乱的自由市场的大都市。我们随着中国主人穿过城市时，尼克松几次遇到敬慕的人群的围观。主人们把我们带到南浦大桥，参观了那里的港口经济建设；然后是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观看股市开市；之后到锦江大饭店，《上海公报》当年签订的地方，以及美国领事馆，在那里，尼克松对这令人应接不暇的经济发展发表了简短评价。

在回宾馆的路上，尼克松突然在一条拥挤的街道上停下

汽车。我们坐在他后面的车上，看到他打开车门，走出来，站在车地板上，抓着车顶支撑住身体，向对着他热烈欢呼的成千的中国人挥手致意。他试图下车，但人群挤了过来，考虑到自己的安全，他只好钻回汽车里。

"那么，难道这不说明什么吗?"回到宾馆后，尼克松问我，"中国人知道我们在1972年时做的事情的重要性，因为他们现在每天都生活在其结果之中。

"美国领事馆里的人们看上去似乎很好。他们似乎懂得中国的情况。我对他们印象很深。但你知道，我常在想，如果俄罗斯也做到了中国人所做的这些……"他停了一下，说，"那将会是另一种局面了。"

第二天我们到了广州。尼克松参观了一个户外市场，在那儿，他"走入群众，真正地看到了、听到了、嗅到了中国"。还参观了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你见到这里发生了什么吗？你看到的这个国际港口城市很快就与香港一样繁荣富裕。"在我们去赴广州市市长的宴会前，尼克松这样说道，"香港就在隔壁，如果广州处理得当的话，它将成为第二个香港。你瞧广州的这些官员，他们更像是美国的政治家。他们往往忽略掉北京方面所不得不说的那些东西。无论如何，他们这儿有的而中国其他地区欠缺的，就是私有的外来的投资，这些投资大部分来自台湾和香港。他们这些成功的自由贸易区，其实是在为资本主义向国内其他地区渗透、扩散铺路搭桥　到处都可以看到霓虹灯、商店、汽车……各种奇怪的东西，我今天甚至还看到有人在用无线手机打电话……"

"今天在街上还有人向我兜售呢。"我说

"你看到啦？到处都有资本主义，但是也到处都有腐败。他们的腐败问题相当严重，但是如果要发展自由贸易，就得容忍这种肮脏的东西。他们得找个办法对付它，但这也可能会摧毁他们已取得的成果。"

他敲了敲我的鼻子，说："要小心那些向你兜售东西的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好的。"

4月14日，我们离开广州，乘5号列车前往深圳，列车里有专为我们一行保留的车厢。旅程中尼克松在我身边坐了一段，以便给我指点窗外经过的"真正中国"。"看，"他说，"人们在打太极拳。我也打过一次；你可以想象我把它打成什么样子！"当我们在列车上看到稻田上的牛车时，尼克松说："你能相信这和你刚才看到的广州是在同一个国家吗？中国有这么多的东西：小汽车和牛，财富和贫穷，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旧事物与新事物。我想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拥有这么多的对立面。"

他停了一下，看着窗外："我们在对待中国时带了太大的优越感，这令我很担心。给他们送教授来？拜托！而且我们的大部分教授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笑道："他们怎么教授他们本来不大懂的或已经在抵制的东西呢？我们可以向他们学的东西太多了。我们并不是一个模范社会！"

"有人希望美国建立一种全球文化。"我说。

他转过头，惊恐地说："你说美国化所有的东西？噢！天啊！那不是犯错误，那简直是犯罪。"

"在广州时我听说，当时中国人决定盖我们住的那座饭店时，他们请了一个美国经理，他给每个中国员工取了一个美国名字，以方便他叫他们。"我说。

尼克松吃惊地张大嘴巴："不！这真是该死的侮辱！我不能相信。他以为他是什么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最古老、最骄傲的文化国度冒充英雄，并剥夺了他们的名称？噢，我的天，太糟糕了！"他摇着头说，"谁都不该允许这种事发生：我们不该，中国人也不该

"你知道，所有这些发展看上去似乎都是天衣无缝的，但很快其中现代的部分就会像潮汐一样淹没其他的东西。"

"金钱的浪潮。"我补充道。

"对。"他说。

在深圳短暂停留后，我们穿过边境进入香港。在海关处我们等了一个多小时让海关人员检查护照。尼克松跳出汽车走到前面问："怎么这么久？我们的所有证件都是合法的。见鬼！"他生气地挥着手，然后转过来向我的汽车耸了耸肩，走回自己的汽车。

我们最终到达了香港，尼克松在走向饭店的时候被媒体紧紧围住，记者们拥挤着试图靠近他问个问题或拍张照片，尼克松几乎被挤倒。

"我的天！我怎么活着走出这个拥挤的包围圈？"当我终于在一个小时后与他见面时他这样说。他站在镜子前，理直领带，说："他们差点杀了我！这个地方的新闻界很有攻击性。但是，只有在有话要说时才去使用新闻界。我并不怎么理他们：他们有工作要做，可我也有我的工作。

"不管怎样，你将见识香港是个多么丰富多彩的地方。看看这儿，"他与我走到窗前，看着喧闹的港口，"这儿有一种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精力。真的。现在已经是深夜了，而港口还有上百艘船在开来开去。街道依然拥挤。"

他转过来问:"你累了吗?"我是累了。"我也累了,过去几天很辛苦。接着到了这儿,我又被媒体搞得很累。不过,有人需要总比没有好。因此虽然我不接受访问,我还是挺高兴他们追着我的。"

第二天,尼克松为他在回程中将在洛杉矶尼克松图书馆发表的谈话作了最后润色。早晨我们又谈了一次话。

"我知道G 7将为俄罗斯带来新的财富。其中一半是为了债务重组,它应该是一种赠送,"他说,"总是要给他们的。"

"我听说本特森很鼓励日本人多做这种事。"我说。

"很好!我这么说没问题,但其他人也会这样说。他们应该多做些事。

"有句话,我知道我以前已经说过,但我还要再说一次:我们的外事人员是些差劲的家伙。当然也有例外,但大部分来自于贵族学校和上流社会,他们一点都不懂对外政策。他们全是些自由党、民主党。一般来说,这些人并不造成什么破坏。但如果他们任职于处在重大转变时期的国家,像中国或者俄罗斯时,他们就成了真正的大问题。

"可怜的俄罗斯人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了70多年。他们没有建立民主社会的传统。他们没有。当然,中国也没有,但是他们有经济基础,这是最重要的。"

他直视着我说:"告诉我,你要出去看看香港,是吗?我要在屋里呆一整天,准备我的这篇讲稿。贝贝告诉我说你要乘船到九龙购物。好好玩吧,不过要小心。"

直到晚上我们坐飞机飞越太平洋时,我才再见到尼克松。我们4月16日到达夏威夷,停留了两天

“我对这次图书馆会议有意见。”4月18日上午我们碰头讨论他的讲演时他说：“它简直不值一提。新闻总是由东岸传到西岸，从来不会从西岸传到东岸。因此在加州举行会议是一个错误。它将不会影响到东岸的任何媒体。这对参加学术性会议的人来说是基本的，因为他们大多是骄傲自大的。这种会议的听众很少，见鬼。我希望我不用去讲演，可我得去。”

我向他保证他的讲演会是很有效果的，特别是有那么多有影响力的听众。

“其他的前总统们总试图产生一定影响，可他们没办法；你知道我的意思。”他回答说，“里根试过；福特没有真的试过；卡特大张旗鼓地带着一群人试图停止战争。全无任何影响力。

“这个会议——嗯，我知道它想干点儿事，但我认为它并不会有多大影响力。现在我就告诉你我对这个讲演太用心了。我打了九次草稿，对于一件别人不会注意的东西，这样用心是太多余了。还有另一件事：会议只把重点放在日本是错误的。重点应该是冷战后的亚洲。整个中心不对。日本人固然是重要的，但还是让我们讨论整个地区吧。我的讲演反正会把重点放在整个亚洲，有什么关系呢。”

4月18日，尼克松离开夏威夷飞往加州，而我飞回纽约继续研究生的功课。4月20日，我在洛杉矶给他打电话，前一天他在图书馆发表了演说。“莫尼卡，你是醒着的吗？”他问道。

“是的，”我说，“但是我睡了整整16个小时了。”

“很好！我在比你大一点的时候常这么做。我在竞赛期间常两三个晚上不睡觉。不过你从夏威夷回来，连续飞了两

个晚上。难怪你这么疲乏。

"听着,明天我有一场演讲。我已经准备得筋疲力尽了。我决定不再为它花一秒钟的时间。回来的时候我会把手稿带给你的。加州州长皮特·威尔生在介绍我,这很好,然后我演讲这篇该死的东西,完成任务。"

尼克松4月22日回到新泽西,第二天,我在办公室见到他。他站在窗边,手背在身后。我走进他办公室时一定是吓了他一跳,因为他转过来时有点吃惊。

"好的!我们去过那么远的地方,现在我几乎想不起这儿是什么样了,"我们坐下时他说,"你觉得这次旅行怎么样?"

"我觉得相当成功。"我回答道,"你向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阐述了你的观点,他们听了。你回亚洲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当你认为下世纪是太平洋的世纪的时候。"

"我知道,可新闻界对此表示的冷淡令我很失望。媒体那么病态。在我看来,要争取版面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堵住了我们的路。除非我说一些有争议的话,不然他们是不会报导我的。"

"但这次旅行是值得的,因为那些领导人很高兴能直截了当地与你会谈。"我说。

"他们不必认真地理会这些外交垃圾。"他说。

我告诉他,因为他是不论形势好坏,任何时候都可以与中国人来往的少数美国人中的一个,他需要经常回到这个地方以保持美中之间的关系。

"也许,"他回答说,"但是如果你得不到媒体的注意,你就不能让消息传出来。我对这次旅行有些失望。它就像个闷弹,如果你明白我说的意思。我所发表的演讲是很精彩的,可

没有人注意 他们这些混蛋是工作起来毫无目标。不过你说得对，在中国时，我在个人交流方面做得不错。但作为一个公共人物，我希望在离开中国时上头条，可是没有。必须认识到，当事情没有做到时，不要再去重复它。我不想表现得小家子气，或者令你不快，但你知道我的意思。我是自己最好的批评家。

"从现在开始，在电视上，我只想创造控制良好的场面。因为当我们在亚洲时，他们没有注意到我们，去他们的。"

尼克松有些生气，因为新闻界不但对他在国外时没有恰当地进行报导，而且在他回来的时候也没有进行跟踪。1972年尼克松访华是历史性的头版头条；1989年尼克松到中国也是戏剧性的头条，1993年访华则如果有的话，也只是少数的几个头条。

他把它视为个人的失败，并怀疑他的中国之旅是否恰当，他本人是否已成为一个历史的神话，成为已不再有用而坚持环游世界的人。尼克松不惜任何代价想要回避这种感觉，坚信自己的旅行是严肃的实质性的 当他鼓励他的随行人员去参观旅游点时，他自己则呆在屋子里，读书，学习，写作。那些辛苦的努力却不够活跃不够有争议性，不够吸引媒体的注意。尼克松只得自己制造自己的新闻 "几年前我就已放弃了新闻界。"他这么说，可他并不是这个意思。

亚洲之旅是成功的，因为尼克松说达到了他的所有目的。他对日本人说，美国依然关注不公平贸易，但希望继续保持积极的安全和经济关系 他对韩国人说，美国将尽其所能维护朝鲜半岛的稳定。对中国人，他说，美国极其关注他们的人权问题，以及他们向危险国家出售核武器的问题 他保持了他

与中国人的特殊关系。他为克林顿政府处理敏感的经济和人权问题提供了政治掩护。虽然他没有得到新闻界的关注，他还是为亚洲的新领袖们提供了建议。

当然，尼克松决无隐退之意。除了政治舞台外，他对其他的生活领域毫无所知。他只知道周游世界来影响美国政策。除了当政治家之外，他不知其他角色如何扮演，即使政治家已成为一个安静的没有闪光灯引导的角色，他依然如故。

尼克松在 4 月 21 日图书馆会议的演讲中，再次提到了俄罗斯民主变革的失败可能带来的后果，然后他将注意力转向他在亚洲所看到的一切。他说，虽然中国进行了实质性的经济改革，但政治上几乎没有任何改革。为了鼓励其政治改革，美国应继续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正如布什过去曾正确地否决了撤消它的企图一样，“我希望 6 月 3 日之后，如果这一问题摆到克林顿总统的面前要求他作出决定时，他也会这样做。”尼克松显然已经开始公开催促克林顿保持中国的无条件最惠国待遇。他甚至给了克林顿武器去反对他本党内撤消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要求。“在我们与中国的交易中，我们应该把外交的重点放在人权问题上，但我们不应走得太远，去削弱民间的来往，因为中国经济自由的发展正是通往政治自由的道路。”

他鼓动他的听众和日本保持积极关系：“不要让我们之间的差异影响共同的利益。”他提醒说，美国的日本批评家们有养成保守傲慢和彻底憎恨观念的危险。他说这会导致贸易战或安全形势的崩溃。在与日本的会谈中，他暗示说我们的目标并不是削弱日本的经济实力而是增加我们自己的经济实力。

他充满热情地论证了我们占据领导地位的价值性。然后他以"美国今天的使命是什么?"来结束他的演讲。他引用了威廉·皮特[①]在特拉法尔加角纳尔逊[②]取得胜利之后的酒宴上被称为欧洲救星时的回答:"我为你们给予我的荣誉而感谢你们。但是欧洲并不是某个人所拯救的。英国是被它自己的努力和意志拯救的。我相信,欧洲被它的模范所救。"尼克松接着说:"今天的世界不能被一个国家所拯救。但是美国可以凭她自己的努力和意志自救。"

最后,尼克松对这次旅行感到满意,因为显然它给他的继任者留下印象,知道要向这一地区实施实际的、负责任的政策。但随着6月3日关于是否延长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的投票日的到来,尼克松开始担心克林顿在因中国人权问题而要求惩罚中国的压力下,会撤消其最惠国待遇。虽然前总统愿意为克林顿进行斡旋,但总统并不采纳他的建议。

"这是因为他十分清楚我的立场,"尼克松在5月12日这么说道,"如果他还没有作出决定,或者即使他已经作出了决定,总之他不会来找我听取其他意见。这令我担忧。如果他决定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他应该给我打个电话,但他没有。他也没有打电话给我,要我帮他整理一下投票。这说明他要么另有想法,要么还没作出决定。

"中国人认为他们获得最惠国待遇是理所当然的。我希望他们在这一点上听我的。这个家伙(克林顿)在进行的是不

① 威廉·皮特(1759—1806),英国首相(1783—1801),老威廉·皮特次子,组织反法联盟抗击拿破仑。

② 纳尔逊(1758—1805),英国海军元帅,1805年在特拉法尔加角击溃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

同的游戏。他面临许多压力要求撤消它。而他面对参议员乔治·麦克尔时并不坚强。"他愁眉苦脸地说,"坦白地说,这话我只对你说,我几乎希望他把事情搞糟了。那时,那些投他票的商业领袖们就知道他们选他是个怎样的错误。但是不,我其实并不真的希望事情变成这样。我们和中国的关系太重要了。"

八天后,他继续发愁说:"如果他让派罗西管外交政策,他将做得一团糟。如果政府倾向于给最惠国待遇任意附加条件,那么他们是在玩火。中国人会说:'见你的鬼去吧。'他们会这么做的。"

他继续说道:"我记得当年我竞选国会议员时,我从一个老议员那里得到了极好的建议,他告诉我,除非你想采纳,否则千万别向老政治家询问他的看法。这就是为什么他不来找我的原因。附加条件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如果他这么做了,我会告诉他我是怎么想的。中国是个巨人,美国不能强迫它。销售核武器是个严重的问题,但是贸易不应该被混到一起,这是个政治问题。如果他没有认识到这点,我发誓我会公开反对他的。"

不过,克林顿很幸运,尼克松不必"公开"反对他。总统最终意识到自由贸易以及它给美国经济,给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给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力量所带来的利益,太重要了,不能因党派政治而受到牺牲。尼克松的论点似乎是只要与美国之间贸易的大门是开放的,那么经济上的选择最终会导致政治上的选择。

克林顿拒绝为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附加条件,宣布他将使贸易问题与它的人权问题"脱钩"。正如尼克松向我建议的,

克林顿把人权问题当作是政治问题,把它与贸易和使用权双方可以广泛接触的问题区分开来。

尼克松认为这是令人兴奋并且鼓舞人心的决定。以前企图否决最惠国待遇已经使中国很气愤,警告会伤害美中两国500亿美元的贸易额。通过贸易往来,克林顿论述道,美国可以在人权方面更好地影响中国。克林顿已肯定尼克松是正确的。

7月初,第一家庭旅行到东京参加每年的七国集团首脑会晤。尼克松斥之为"一无是处",并嘲笑最终产生的协议中允诺的更大的经济合作是"废话"。

我7月9日早晨去住所见他,他在我坐下时用钢笔拍着他在《纽约时报》的文章的复印件。

"我看另一场七国首脑会晤已以绝对的优势取胜了,"他说,"他们什么都不会,却很会把所有的领导人召集在一起勾画一幅美丽的图画。你知道,看着那些集团周旋时我想到了两件事。一是如果没有科尔(可能),叶利钦是惟一一个高踞世界舞台的人。"

"尽管这样,事实上他统领的国家一团糟。"我说。

"是的,"他回答,"第二,七国集团很富有但很萧条。这些国家中没有哪一个真正兴旺的,没有哪国跟得上中国及亚洲四小龙,如新加坡以及泰国的发展速度。经济上发展最迅速的国家是中国,而中国是个连高峰会议上都没个席位的国家。"

"所以俄罗斯和中国——两个发展中国家——是应该关注的。"我说。

"如果他们出对牌,"他说,"未来是他们的。"

“你认为他们两国之间会结成联盟吗？”我问道。

“有可能。他们，甚至还包括日本在内。”他说。

我提到所有那三国——俄罗斯、中国和日本——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他回答道：“我们确实该关注一些事情，否则我们某天将面临非常严重的局面。”

那天晚上晚些时候看完晚间新闻后，他打电话给我冲着克林顿在高峰会议上的表现发火：“难怪再没人去看该死的网络新闻，上帝，消息太差了。尽是些娱乐节目，根本不是新闻。他们给的新闻那么偏左，这完全就是偏见。不管怎样，(NBC的汤姆)布罗考确实对在东京的克林顿和希拉里吹捧一番，说希拉里是年轻的女中豪杰。实在很糟糕吧。我们1953年在那里时，妇女还什么都不是，尼克松夫人与他们出访，与他们交谈，而该死的媒介没有给她任何体面赞誉。为什么？”

“你当时跟错党派了。”我说。

“对。”他回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怎么说不得的呢？”

“他们称克林顿的访问是成功的。”我说，“可能因为他谈论国内政策而不是外交政策。”

“总统在国外时，你想要他表现得好，他就会有些飘飘然。但这不会太久。高峰会议算什么东西。克林顿惟一做对的事是特别关注叶利钦。那太好了。但只是看不出在亚洲举办经济高峰会议为何中国没有参加。正如与日本的有管制的贸易是个大灾难，因为他们会害死我们。

“看，印度人和中国人因冷战结束而开始互相接受对方。苏联传统上支持印度，而我们与中国一起支持巴基斯坦。现在都变了。成了一个混合的大袋子！”

我问他是否认为中国领导层害怕中国人会从印度的民主

方式中受到启发,他耸耸肩说:“我不知道,他们可能有这样的担心。”

“中国人怎样得到10张选票的?”我问道。

“这是个大难题。”他回答说,“必须是一人一票。中国是个主权国家。印度从来都不是个主权国家——英国人插手进来。他们很难处理所有那些选票。人口那么多,是很难很难的。”

9月末,另一个发展引起了尼克松的注意。国际奥委会决定把2000年奥运会的举办权给予澳大利亚,而无视中国花大力气争取北京的举办权。这消息令尼克松沮丧。

“这会给中国带来负面影响,”他9月23日说,“他们不可思议地把它提到政治的高度,但每当他们这么做时总是错的。中国人太骄傲了。在中国,你看到了到处是争办奥运会的标志。他们不该使用政治手段。对他们来说,有可怕的双重标准,这是个耻辱。”

尼克松摇摇头:“一个有10亿人口的国家,有辉煌的文化,而我们却在谴责他们。噢,孩子,我吃尽苦头了。我们太愚蠢了。没有多少人可以处理好与中国的外交的。我行,基辛格行,但其他人呢?这是不容易。你了解中国人,可同时你也不了解他们。但我们观察他们经济增长而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人民的力量。真正起作用的,是人民。”

繁荣不可能如上述从命令中取得。必须通过冒险行动,人们作出牺牲、损失而收获了利益。中国人建立了自由市场经济,进而将建成一个巨大的由中产阶级企业家组成的伟大主权国家。

“真的不再有第三世界了,”尼克松1994年1月15日说,

"想一想：只有两个。财富把欧洲分成东部与西部，把世界分为北部和南部国家，当然还有中国。如果中国经济发展扩展到内陆，影响到中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中国将会更加繁荣。"

尼克松在杭州游西湖和站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时，他认识到自己确实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发展"有些关系"。1972年他踏进一个封闭的社会，离开时中国便逐渐走向开放；1989年他回来弥合中美关系的裂痕，离开时成了中国一个更好的朋友；1993年他最后一次旅行，为了评价经济改革的现状，离开时为中国的进步而大为惊叹。

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对他的后继者们，对中国人民，对尼克松自己都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美国总统们把尼克松作为一个可以信赖的富有经验的密使，并受益于他的意见和忠告；中国人把他当一位老朋友看待，他们能与之交流能被理解；尼克松有机会保护和发展他自己的历史成就。开放与中国的交往，如他所承认的，将会是他最闻名的两件事之一。他无法控制人们会怎样看待水门事件，但是他可以控制在中国方面他会给人留下什么印象。

他经常说如果没有美国，太平洋三角洲——中国、日本和俄罗斯——就会像三脚凳，不稳定而且有潜在的危险。美国是起到稳定作用的第四条腿——一个地区的平衡力量、诚实的掮客及安全捍卫者。尼克松把自己看作是美国与太平洋强权关系的维护者，因为他们需要被关注及只有他才能给予的培育。当尼克松说美国需要在亚洲地区起领导作用，并且美国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更能胜任时，他也说他需要起领导作用，他是最有资格这么做的人。

尼克松把他无可比拟的与亚洲的经历带到20世纪90年

代,继续与中国人保持富有成效的关系,理顺与日本和韩国的关系。尼克松在最后一次访问亚洲时看到,人民一致希望能获得发达世界承诺的更好的生活。战争与征服不再引导经济繁荣,只会引向贫穷和困苦。即使中国共产党人也认识到尽管有缺点,但自由市场仍是发展和摆脱政治压力的机器。他们看到成功的经济是人民的愿望、精神、智慧和国家富强的表示,而不是大规模集体主义的结果。

尼克松,年老而冷静的战士和不屈不挠的保守的自由市场主张者,看到了亚洲转变的大部分过程。他活着看到中国的开放政策产生了强大的动力,令他十分满意;他对中美关系的处理给两国,实际上也给他自己带来了很好的回报。

新的革命是关于财富而不是平均主义公平的承诺。1972年尼克松使中国开放门户,带进了自由和民主的思想。尼克松以自己的方式"做了些事",改变了世界。

第三章　海湾战争

1990年8月2日早上，前总统走进我的办公室，来到我的办公桌前宣布："看来我们又要面临一场战争了。"

几个小时以前，伊拉克向科威特边界派遣坦克部队，占领了该国的石油区，迫使科威特领导人流亡他乡，最终完全控制了这个弱小的邻国。外交官们争先恐后地谴责伊拉克，石油市场立即出现波动，时事评论员迅速发表评论，提出建议。这场老式的侵略出乎人们的意料，尼克松从中看出了来自政治、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挑战。

这场战争再次证明，中东地区随时牵系着我们的注意力，并需要我们随机应变。中东地区看来似乎遥远，谈到它时，往往与宗教、石油或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但关于它的报导源源

不断，都在关注着正在进行中的"和平进程"。近50年来，中东地区危机频起，其中多数都需要美国迅速作出决断和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巴勒斯坦分治。此后，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爆发了五次全面战争，时间分别为1948年、1956年、1967年、1973年和1982年，差不多每10年一次，此外，还发生了无数次小规模战争和轻度军事冲突。冷战虽然没有阻止这个矛盾，却遏制了当地的其他威胁因素。因为这里潜伏着许多挑衅分子，如果没有超级大国的管制，他们会更容易付诸行动。正如尼克松在8月2日早上所说的："我早该预料到了。"

他相信，中东有丰富的文化蕴藏，是文明的摇篮，但它又酝酿着古老的宗教仇恨和政治仇恨；这里埋藏着石油，局势很不稳定，而我们和以色列又有许多联系，因此这个地区对于美国来说非常重要。他在伊拉克入侵的这天说道："2000年来，冲突侵蚀着整个中东地区。我们只能在边上做一些工作，但不管我们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种状况。这需要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而不是单靠我们。"然而，由于这个地区是显赫的战略要地，美国永远有义务促进该地区的稳定，以保护美国的自身利益。

冷战期间，美苏在中东排兵布阵，互相竞赛，形成了这里的主要特点。尼克松相信苏联会不顾一切在海湾占据实质性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几乎尚未结束，斯大林就对这个地区进行突然袭击。在战争时期，苏联占领了北部伊朗，促使这里最终建立了莫斯科控制下的库尔德人的共和国——阿塞拜疆苏维埃共和国。接着苏联向希腊和土耳其推进，企图进一步靠近波斯湾。当时，尼克松还是国会议员，他投票赞成援助计

划,正是因为这项援助计划,杜鲁门总统得以排除苏联的威胁。战后的几年是决定性的几年,西欧脆弱不堪,元气大伤,急需稳定以求生存;而苏联的总体战略是要动摇这个地区的局势,在该地区获得更广泛的影响。这一切都离不开石油。

然而,另一种挑战来自以色列。尼克松相信以色列的生存与安定对于美国来说至关重要。虽然美国和以色列没有签定安全协议,不是正式的同盟国,但有一种更深沉的东西把两国紧紧连在一起,这就是道德上的义务。1990 年,尼克松对我说:"以色列永远不会为美国所背弃,它也不应该为美国所背弃。"希特勒进行的大屠杀中出现了种种难以言喻的恐怖事件,因此,美国和所有其他寻求正义的国家有义务从道德上和行动上支持以色列。以色列缺乏任何自然资源,但它建立起了工业经济,在全球市场上展开了竞争并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军事方面也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强国。此外,40 多年来,以色列尽管一直是邻国企图毁灭的目标,却是中东地区惟一实行民主的国家。正是因为我们坚持不懈地支持以色列,它的民主体系才得以生存下来,许多阿拉伯国家承认了它,而且尽管和平进程不断地遭受挫折,却仍在继续着。

然而,尼克松提出,我们的对外援助预算不成比例,对以色列的援助达到所有援助预算的四分之一,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以色列和埃及是接受美国援助最多的两个国家,总数一直占去我们整个援助预算的一半以上。尼克松认为应该大幅度削减这个数目,用以帮助对于我们来说有战略利益的其他国家,尤其是俄罗斯。我们为中东地区的军事化进程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结果备受束缚,无力帮助俄罗斯或亚洲进行民主斗争,导致我们在这些地区的利益不堪一击。

为了调整对外援助的不平衡，美国需要推进和平进程，这样才能维持以色列的安定局面，同时又不必支出太高的费用。

尼克松相信应该占据有利地位进行谈判；美国可以敦促以色列推进和平进程，以色列则可以乘自己比邻国强大的时候达成协议。以色列四面受敌，这些敌人一心要消灭以色列，因此，以色列即使拥有我们的友谊，也不可能永远安然无恙。在以色列濒临危机之前，美国保护以色列的惟一办法，就是引导他们致力于和平，即使我们的影响如尼克松所说，是微不足道的。

尼克松认为，我们在这个地区的重要利益以及这里的和平受到了威胁，威胁主要来自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等激进的政权，来自他们资助建立起来的恐怖分子组织，这些组织分布在这个地区及其周围。

萨达姆·侯赛因长期统治伊拉克，建立了残忍的、不折不扣的流氓军事集团，并通过恐怖和威吓手段，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整个中东地区。虽然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两伊战争削弱了伊拉克的力量，联合国也不断努力遏制它的核武器计划，但伊拉克占有世界已知石油储藏的 11%，具有深厚的军事潜力。

伊拉克对伊朗的八年战争，埋下了它侵略科威特的种子。1988 年战争结束时，伊拉克已经欠其他阿拉伯国家和西岸地区 500 多亿美元。科威特向萨达姆提供的贷款高达 150 亿美元，其中大部分被用来装备伊拉克的军事机器。萨达姆要求科威特将巨额战争借款一笔勾销，并让科威特控制石油出口量，使之不超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 OPEC）所规定的份额，这样就有助于提高世界石油价格。萨达姆声称，科威特超出了份额，加上世界石油市场已经基本饱和，因此世界油价下

跌，造成伊拉克在石油收入上的损失高达140亿美元。他又到科威特境内搜寻石油，声称这些石油蕴藏属于伊拉克所有。

1990年7月26日，欧佩克的官员在日内瓦开会，同意降低石油产量，以提高价格。五天以后，伊拉克和科威特代表在沙特阿拉伯的吉达进行会谈，谋求解决边界争端问题。然而，与此同时，伊拉克在科威特边界集结了10万兵力。军事威吓之后，萨达姆向埃及总统霍斯尼·穆巴拉克保证，不会重现10年前与伊朗之间发生的一幕，绝对不会向科威特动用武力。然而，8月1日，伊拉克代表却在吉达中途退出谈判。此时，伊拉克的宿敌伊朗在与伊拉克接壤的地带密切地注视着这一切。

这次侵略证明，美国与这里的土耳其等稳定势力建立了建设性的关系，但它不能取代驻守该地区的有效军事威慑力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取代美国，这是尼克松从战争越南化政策的失败和1975年西贡被攻破这两个事件中得出的教训。要以武力阻止激进政权的推进，美国是惟一具有这种军事能力的西方国家。1980年，尼克松在他的著作《真正的战争》中写道："一旦沙特阿拉伯、阿曼、科威特和其他重要国家受到来自国内外的反动势力的威胁，美国将坚定地站在他们一边，对此，各国的领导人要坚信不疑，他们绝不会遭受类似伊朗国王的命运。"

尼克松坚定地倡议，应当增强海运和空运的快速部署能力，将来就能够迅速把美国部队调遣到海湾地区，同时，应当在沙特阿拉伯形成局部防御打击力量，以抑制任何潜在的威胁。如果大幅度削减防御预算，只会严重破坏我们的能力，无法保护我们在波斯湾和其他地区的利益。如果军事力量徒有

虚名,就不能保证源源不断的石油供应。如果美国软弱无力,就无法促进中东地区的进一步稳定。

尼克松毫不动摇地提出,要时刻作好准备,也要摆出作好准备的姿态。必要时,我们必须有决心使用武力,并随时准备展示我们的决心;要想保护我们在波斯湾的利益,我们将会冒很大的风险;但如果不这样做,只会招致更大的风险。我们必须有财力,也有决心使用我们的财力,同时,必须能够迅速作出反应,使用武力、外交手段和大胆的战略方案。在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这就是尼克松提出的关于美国力量的哲学精髓。

备受战争蹂躏的中东地区,出现过无数次危机,尼克松作为一个应付过无数次危机的领导人,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早上,镇定自若,表现出一种温和的嘲讽态度。1990年8月8日,他这样说道:"永远别告诉敌人你会做什么,也别告诉他你不会做什么。"这天早上,我走进办公室,发现他正背着手,踱来踱去。"这种事情我见得多了。关键是布什在公众面前不能摇摆不定,不管发表什么声明,都要像钉子一样强硬。"他指着我说,"当危机来临时,一个英明的领导人应该总是说:'无可奉告。我们还没有排除任何一种可能性。'让他们猜去吧,这是惟一的办法。不确定——这才是取得优势的关键,特别是在危机的初期阶段。"

尼克松相信悖理中含有合理的因素:一个领导人举止高深莫测,将会促使潜在的敌人相信,谁惹恼了他,谁就要付出难以估算的代价。乖张无常的政治家风范如同一个信号,警告未来的挑衅者,一旦招来了这种不确定的反应,就意味着自寻死路。尼克松知道,无论在谈判时,还是在危机中,这都是

宝贵的策略。然而,他怀疑布什总统是否愿意或者是否善于运用这一策略,尤其在处理中东问题的时候。

在伊拉克刚刚入侵科威特的几个星期里,尼克松经常问我一个看来并不复杂的问题:"战争还是和平?"我的回答总像是照搬书本,毫无创见。我说,冷战结束了,新的时代开始了,人们越来越觉得战争不道德,没有理由,代价太大,应该禁止;战争会避免的,外交策略会占上风的。尼克松听了我的回答,总是扬着眉毛,面带微笑。他知道,战争有可能爆发,事实上是极有可能爆发的。

如果萨达姆在入侵科威特之后,扩大军事优势,立即入侵沙特阿拉伯,这个地区就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他了。美国的军事反应也是很有限的,能够执行空中打击和导弹打击的,只有驻守在波斯湾的"自由"号航空母舰的特遣部队,以及驻扎在印度洋迪亚哥加西亚岛上的B-52轰炸机,但这个岛屿几乎是在3000英里以外的地方。

然而,萨达姆并没有向沙特阿拉伯推进,这是美国的大幸。入侵之后,紧接着是平静,布什因此得以启动"沙漠盾牌"行动,保护沙特阿拉伯及其产油邻国。布什和国防部部长理查德·切尼、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将军一起,将5万陆、海、空部队调遣到在沙特阿拉伯的基地,又将三个航空母舰大队派到这个地区。他们带着"四大简单原则":迫使"所有伊拉克部队彻底撤离科威特";恢复"科威特合法政府";维护"海湾稳定";"保护国外美国公民的生命"。由于美国在海湾的威慑力已经失效,布什把这支军事力量调到该地区,作为眼下的威慑力量,阻止伊拉克进一步扩大侵略。

批评家几乎立即对这一部署表示反对。孤立主义者和其

他一些反对使用武力的人提出，西欧和日本现在是我们的经济竞争对手，不是地缘政治同盟国，那么美国应该避免有所动作，像其他国家一样依靠联合国来实行制裁。他们的观点是，美国比西欧和日本更能承受欧佩克的过高油价，美国没有必要干涉，我们应该让他们去处理危机。

然而，尼克松认为，孤立主义者没有看到，联合国的行动都是象征性的而不是实质性的。要把萨达姆赶回去，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使用由美国领导的军事力量。欧佩克抬高油价，我们因此遭受的损失可能比同盟国少，但它对所有国家造成了恶劣影响，威胁到世界的安定秩序。尼克松提出，我们的同盟国应该为保护共同利益作出重大贡献，但这并不意味着削弱美国的义务。

12月5日，布什就刚刚出现的紧张局势打电话给尼克松，尼克松答应提供一份书面的建议备忘录。尼克松通宵达旦，打了三份草稿。第二天早上，他把最后拟定的稿子拿给我看。这份稿子指点布什在使用武力时要毫不犹豫，在使用外交途径时要细致入微，对联合国则应当不抱任何幻想。

这是一份彻底的现实主义文件。他首先告诉布什，重要的是要认清各个主要角色的动机。有些人反对武力解决冲突，颂扬联合国"最高理想"的胜利。如果我们接受这些人的看法，自然有助于"公关目的"，但布什必须认识到，那些有关的领导人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他们受着理想的驱使，而是受到物质利益和本国利益的驱使。

他一个一个地指出那些角色及其动机。他写到："戈尔巴乔夫在感情上支持伊拉克，在理智上却支持我们。"苏联的经济一塌糊涂，如果把他原来的同盟国伊拉克和西方世界放在

面前让他选择，他会选择西方的。

阿拉伯的动机就更清楚了。他接着写道："'阿拉伯世界'是个不恰当的提法，多数阿拉伯人互相痛恨，甚至超过对以色列人的仇恨。"叙利亚人憎恨伊拉克人，沙特人则害怕他们。埃及人觉得，他们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受到了萨达姆·侯赛因的威胁。在所有的石油生产国中，没有哪一个国家愿意让他在欧佩克政策上指手画脚。

尼克松接着用完全现实的言辞阐述了我们的利益。他警告说，我们为什么派兵到这个地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要太"伪善"了。为了"公关目的"，我们应该再次强调我们的观点，即反对使用武力改变边界，但是，他接着写道，假设是印度或中国企图"吞并"尼泊尔，那么就不会有人真正建议我们调动兵力，去遏制侵略者的行动了。

在危机的早期，尼克松便提出"(把萨达姆)赶下台，或至少削弱他发动战争的能力"，他警告说，不要"好高骛远，空谈什么给科威特带来'民主'"。他劝告布什不要鼓励我们的阿拉伯伙伴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民众，进行什么民主选举，因为从政治上来看，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此外，尼克松强烈反对布什把苏联拉进来做外交调停人。40 年来，美国执行的政策是不让苏联插手中东事务，现在，尽管戈尔巴乔夫鼓吹"新思维"，尼克松相信美国不应该因此改变这长久以来的政策。没有苏联人的干涉，布什就可以集中精力，设法保证同盟国继续支持我们。当然，要达到这个目标，也要讲求实效，不能瞻前顾后。如果布什决定动用武力，就不要考虑我们的"同盟国"是否支持他的决定。一旦他决定了，剩下的事就是看它是否行之有效。有效了，同盟国就一定

支持;"没有效果的话,即使最好的朋友也会抛弃我们"。尼克松提出,最重要的是,美国必须时刻带头保护在海湾地区的石油利益,打退伊拉克的侵略,以免其他潜在的侵略者纷纷效仿。

在备忘录的最后,尼克松提出一条涉及党派的尖锐的忠告。他告诉布什,听说有人建议布什在10月份采取军事打击,这样可以保证共和党在非大选年的选举上获得胜利。"这个建议再愚蠢不过了。"他写道。布什的威望非常之高,一直到11月份这段时间里,不管他采取什么行动对选票的影响都不大。共和党竞选人只要是称职的,就能当选;只要是不合格的,就会落选。他总结道:"军事行动的影响微乎其微。"

9月6日,我飞往华盛顿,要亲手把尼克松这些讲求实效的鹰派建议,送到白宫交给布什。不巧布什外出,我把备忘录交给他的私人助手。她引着我穿过白宫的门厅走廊,走过之处一片幽暗,空无一人,悄然无声。我们走进椭圆形办公室,她请我稍等片刻,然后去打电话。我独自站在总统的书桌前。这里一片寂静,只有一个落地式大摆钟发出夸张的摆动声,打破了沉静。他的助手走进来,又引着我来到布什的私人书房。书房里,摆着大量布什所搜集的乡村音乐磁带,丘吉尔演说录音带,小狗米利的狗床,上面满是脱落的狗毛,还有一个空空的收文篮。外面是严峻的国际危机,白宫里却静谧安详,恍若隔世。尼克松担心布什不愿意以足够的力量面对挑战,于是极力敦促总统行动起来。

尼克松总因为自己不在其职,爱莫能助,深感绝望,尤其在危机严重的时候,更是如此。海湾危机大大缓解了他的绝望之情。10月13日,他跟我说:"有时我看他们搞得一团糟,

可我却无能为力。我在那里的时候，可以竭尽全力，现在只能提提建议而已。他们听了，当然好；他们不听，我有什么办法？"一般来说，未经询问，尼克松是不会提出这种忠告的。然而伊拉克入侵，事态严重，他原来就打算，如果布什不先来咨询，他就要主动提出建议。

总统不愿意引起正面冲突，喜欢妥协；不愿意动用武力进行威胁，喜欢外交威胁。尼克松却提倡以强硬的方式对待伊拉克人，希望推动正在观望的布什采取正确的政策。尼克松相信，8月3日，在科罗拉多的阿斯本，布什之所以如此强烈地谴责伊拉克的入侵，是因为当时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也在场，"给了他主心骨"。布什需要有人刺激他，才会行动起来。尼克松在提出忠告时，加了些调料品，赞扬了布什的领导才能，使他的忠告更加可口。但不管怎样，他的提议再清楚不过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然而尼克松在幕后总能影响到那些在其位的人。

9月7日，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打电话向尼克松致谢，说他向布什提交的备忘录"非常透彻、很有洞察力"，他通知尼克松，布什在下个星期初将就危机局势向美国人民发表讲话。布什决定向海湾地区调遣大批军事物资和人员，因此需要向公众直接解释。9月11日，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讲话。第二天，尼克松寄给他三个字的短信："很中肯。"

他把我叫进办公室，让我看完信后，装进信封里说："这封信很短，但很甜美。备忘录是用来提建议的，这封信却另有目的：给那家伙鼓鼓气。他需要鼓励，可他身边那么多人，那么多评论家，谁也不愿贸然行事。他需要有人给他定心丸，说他做得对。"

尼克松自己也需要定心丸。接到斯考克罗夫特的电话之后，我见他把给布什的备忘录重读了几遍，检查里面是否含有任何可能引起误会的信息。他完全放心了，于是定期跟斯考克罗夫特联系，因为将军是通往布什的可靠渠道。

尼克松赞扬布什和詹姆斯·贝克，说他们使用了明智的外交渠道，召集了威猛的军事力量，争取到世界各国广泛地支持对伊拉克的贸易禁令和军事行动。英国、法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叙利亚等十几个国家同意给予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布什认为外交上和军事上的联盟是世界新秩序的产物，尼克松却认为它是美国采取行动后的必然结果。这次联盟是个令人瞩目的外交成就，但也只能起到辅助作用，主要的行动仍应该由美国来领导。

尽管布什继续在这个地区进行大量军事部署，尼克松感到布什对苏联的反应太敏感，过分依赖外交力量，很容易让伊拉克人认为美国缺乏决心，他们就会因此得寸进尺。尼克松担心，布什会显得过分急于接受能够迅速解决问题的外交策略，透出"优柔寡断的领导作风"，不仅会危害到美国的军事威胁力量，而且会央及总统自身的政治地位。关键是要有洞察力，要让敌人相信，如果伊拉克不终止侵略行径，美国会毫不犹豫地动用武力。

9月4日，尼克松给斯考克罗夫特发了一份急件，强调了这一点。他写道，他越来越怀疑是否能够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一旦军事力量部署完毕，布什的惟一选择就是向萨达姆发出最后通牒，然后诉诸军事行动。尼克松认为，更重要的是，这一行动是对潜在的侵略者的警告：在目前这种危机时刻动用武力，说明在类似的危机下，我们动用武力的警告是认真

的，潜在的侵略者若想实现目标，将会更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而不是军事途径。

1990年9月6日是竞选的日子，尼克松十分不满布什的犹豫不决。我问他是不是觉得布什仍然不能下决心动用部署在那里的军事力量，他笑着说："嗨，他又没有咨询我。"布什在前一个周末确实打电话给他了，但没有结果。事态在发展，可是尼克松却无法进行指导，他焦急万分。在一阵绝望中，他一拳砸在自己的书桌上，说道："要让人觉得你的军事行动可信，我们得炸他妈的个底朝天，不能老想着什么伤亡人员、什么人质。我告诉你：在这件事上，哪怕布什稍稍迟疑，萨达姆就会得寸进尺。世界上有哪个该死的独裁者不是逮着机会就上？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管他妈的批评干什么？我们不干谁干？天天在说我们是世界第一，又不动用这个力量，有什么用？这么个道理，一清二楚，黑白分明，我真不敢相信怎么每个人只会放臭屁。不然想怎么样？跟萨达姆辩论，说服他撤出科威特？"

与此同时，联合国决定采取行动。9月29日，它通过了第678号决议，批准成员国采用"一切必要方式"，支持和贯彻安理会早期的决议，即第660号和第661号决议，前者在伊拉克入侵的当天发布，谴责伊拉克的行径；后者则对伊拉克实施贸易禁令和经济制裁，并承诺"恢复该地区的国际和平和安定"，除非伊拉克在1991年1月15日之前彻底执行所有决议。

尼克松对联合国的这一行动不屑一顾。他摆了摆手："联合国的表决有所帮助，但毫无必要。我一直相信，美国在必要时应该利用联合国，而不是被它利用。决议给我们的行动提

供了合法依据,可就算没有,我们也会不顾一切地行动。至少,我希望我们会不顾一切地去行动。可是对于布什,你就没把握了。"

尼克松觉得集体安全是个可悲的理想化的想法,软弱无力,毫无指望,这在历史上是有悲惨记录的。不管是联合国,还是其前身国际联盟,都没能阻止大规模的毁灭性战争,也没能制止悲惨的流血事件和财富损失。尼克松是个现实主义者,相信冲突是国际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有人希望通过集体努力,永远遏制侵略,惩罚违背法规的人,这注定会失败。

"所有这些集体安全的无稽之谈都是废话。"他在11月30日说道,"谁要是相信联合国这样的团体会在什么事情上有决定性的行动,那他就是被误导了,说明这45年来,他根本没有关注国际形势。有的人在那里大喊什么'让联合国来处理',他们对这个世界根本不了解。他们以为只要我们相互了解,就没有战争了。他们说:'让我们互相理解吧。'我的天!你怎么能这么天真!之所以出现冲突、不是因为那些对头们不了解对方,而是他们太了解对方了。"

他摇摇头又说:"联合国只有一个好处:那是个聊天的好地方,什么事情火烧眉毛了,就到那里去吹吹牛。可让它代替美国的领导地位,代表真正的权力,没门!丘吉尔说过,没有哪个国家愿意把自己的权力交给联合国或任何其他集体组织,他是对的。就是这么回事。所以我们得靠自己了。"

对于尼克松来说,只有美国才有政治、经济及军事等综合能力,只有美国才能带头保卫自由、发展自由、遏制侵略、打退侵略。德国和日本拥有可怕的经济实力,却缺乏军事力量。俄罗斯和中国具有军事潜能,却缺乏稳固的经济实力。只有

美国才具有全面的储备力量，值得信赖，可以在国际上担当诚实的中间人的角色。尼克松提醒布什注意这一点，他不断强调，外界不断施加压力，迫使总统接受以联合国为基础的新的"自信的多元化"，这时，采取强硬的单方面行动十分必要。

有人提出，安理会投票表决，同意对伊拉克动用武力，只有中国弃权，这似乎表明，在布什所说的世界新秩序中，集体行动确实是可能的：在共同的使命下，诸国结盟，把利益各异、意见有分歧的对头都团结起来，一直到成功地完成国际行动。

"一派胡言！"1990 年 1 月 1 日，尼克松批评了这一观点。"国家利益永远也不可能从属于集体利益——现在不可能，将来也不可能。"在他的办公室里，他就坐在我面前，吸着保健可乐，"我们认为，这个事件发生在冷战的最后阶段，十分特殊。你知道有什么重要性吗？这只是个时机的掌握问题，这只不过是在某个时间，相似的利益碰在一起了，于是有了反对伊拉克的同盟。就是这样！美国、英国、法国、德国都要保护自己的石油利益，都想打退侵略者；苏联愿意和西方统一行动，只不过是想获得经济资助，好生存下去；以色列当然是需要美国提供安全保证；叙利亚觉得和美国联盟，机会难得。因此，只有个体利益，没有集体利益。"

对这次侵略袖手旁观，只会给相关的国家带来灾难。中国在安理会表决中弃权，是为了保护自己在伊拉克的武器市场；约旦宣布中立，实际上却偏向伊拉克。只有他们两国抵制反侵略的浪潮。然而，所有国家都在注视着美国，看它是不是会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等美国确实要行动了，盟国就聚到了一起，各个成员国紧跟着领袖。前总统的使命就是保证现

任总统维持这一领袖地位。

尼克松一直相信，要想让军事使命获得成功，政府就必须向公众详详细细地反复解释，以取得他们的广泛支持。尼克松的经验来自美国与越南的纠葛，得之不易。美国凡是决定军事干预，都需要争取国内最大范围的支持和最低限度的争议。国内纷争不断，国外的使命必然受挫。冲突固然能够激发公众支持自己的领导人，但前提必须是投入绝对优势的兵力，历时不长，并能大获全胜。

1990 年 9 月 13 日，尼克松对我说："入侵格林纳达，轰炸利比亚，它们跟越战这类真正的战争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可它们却帮了里根的大忙，鼓舞了全国的士气。如果你径直去砸死那些杂种，自己又不会丢掉一兵一卒，你在政治上就吃得开。问题是一碰到军事行动，你就没有把握它会怎么发展。可是，一旦承诺动武，就得径直冲过去，把什么都投进去，炸他妈的个底朝天。哼哼哈哈，迟疑推委，或者绞扭双手，摇摆不定，都行不通。"他绞扭双手，模仿出犹豫不决的样子，"作出该死的决定，行动起来。我们现在谈的不是越南问题，也不是格林纳达问题。这一回的时间会更长。可是天啊，我们不是有科技吗！我们在高科技武器上花了那么多钱，结果该用时却不用，有个屁用？战争搞短一点；行动得越快，效果越好。里根时代就是这样的。"像海湾行动这一类的使命，范围更广，间隔时间更长，需要对军事行动作出充分的解释。尽管布什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了讲话，再加上贝克夸张的外交策略，尼克松觉得还是远远不够。

10 月 28 日，我们见面时，他说："你和我一样清楚，你得用上理想化的辞令，美国人民才会支持你。你不能直通通地

走出去，说：'嘿，我们要开战了。'你得跟他们一遍遍地说明是怎么回事。不一定非得让他们接受，但一定要让他们理解。布什屁事不做，只好由我来向人民解释。外面还是有人会听我说话的。"他开始考虑，如何帮助布什说服大家，是动用武力的时候了。

尼克松知道，只要用积极的和高尚的语言来描述调兵海外的行动，美国人就会支持的。如果没有理想主义的理由，它就会招来批评、诋毁，会被理解成马基雅维利式的不择手段的现实政治、偏激而又不道德的政治活动。美国人民不能容忍这种道德败坏的行为。善与恶，是与非，必须明明白白，公众才能支持武力干涉。

布什可能也有同感，所以在11月初宣称，萨达姆·侯赛因可以和希特勒相提并论。尼克松听后，十分失望。11月12日，我一踏进他的办公室，他就问我："你听到那个和希特勒的类比了吗？这就错了。我知道他想干什么，可是妈呀，让他搞得一团糟。好吧，算是创造了个形象，可也太他妈的夸张了吧。萨达姆和希特勒？说到哪儿去了？当然了，希特勒在阿拉伯世界算得上个英雄，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的敌人。可怎么能把他们两个人相提并论？希特勒引起了世界大战；可萨达姆仗着那一堆武器，不过是街头上的小恶棍。"他摇着头说道，"布什太过分了，我是说走极端了。"布什为了让人不断支持他集结兵力，竭力勾画萨达姆万恶不赦的形象，结果这个极端的比喻显得更滑稽，没有号召力。

军事部署在继续，而布什和贝克忙乱不停地进行外交活动。苏联正处于动荡的最后一年，总统和国务卿竭力保护他们在苏联总统米哈依·戈尔巴乔夫身上的投资。在海湾地区，

只要是苏联资助的行动，他们都欢迎。戈尔巴乔夫觉得需要靠布什才能够生存下去，同样，布什也觉得需要戈尔巴乔夫继续执政，才能证明他长期以来对苏联总统的支持是正确的。

尼克松知道苏联人在海湾地区耍两面派的手段。他们一边为美国和反伊同盟提供外交上的支持，一边却拒绝召回他们在巴格达的军事顾问，并继续偷偷向伊拉克军队输送军事物资。伊拉克军队是联系苏联和伊拉克的纽带，是维持它国内安定局面的保证，因此戈尔巴乔夫不会冒险抛弃它。尼克松也怀疑，苏联人在前一年增加了对伊拉克的武器运送，暗中鼓励了伊拉克侵略科威特，这样，苏联人可以转移人们对他们自身内部危机的注意力，同时又能够有机会与美国结盟，最终获得他们急需的经济回报。他们希望在中东危机中能够通过耍两面派的手段，解决国内面临的危机。

此时，令尼克松越来越焦急不安的是，目前演奏着军事部署的曲调，跳的却是外交策略的舞蹈。他担心只要苏联有新的外交动向，布什和贝克就会紧抓不放，既可以避免战争及其带来的损失，又可以拯救奄奄一息的戈尔巴乔夫。对于尼克松来说，政治家最致命的一个错误，就是在国际政治中掺杂私人感情。国际关系是施展权力的王国，不是表现个性的地方。领袖可以互相喜欢，但是让私人情绪掩盖国家利益和谋划运筹，既危险又天真。政治家总在变换，利益却始终不变。尼克松知道布什确实很喜欢戈尔巴乔夫，他担心总统会让友好关系取代美国独立自主的行动。每当苏联作出和平努力，尼克松立刻警告斯考克罗夫特，不要让布什被私人外交迷惑。

“布什必须摆脱私人因素，尤其是跟戈尔巴乔夫。”9月14日我们在他的办公室见面时，他这样说道，“他中毒太深了，真

是再错误不过了。不光是布什，贝克和那帮子人都有这个毛病。眼下是该死的危机，布什和贝克却对戈尔巴乔夫激情满怀，真让我恶心。这又证明了他们在什么事情上都感情用事。拍拍肩膀，说说笑话，他们以为外交政策就是这样的。错了！"他尖锐地说道，"它是由利益构成的，只有利益而已。"

到了11月，美国兵力已经增加到20万以上。11月8日，布什突然又将兵力增加了两倍，这一行动让他的对手大吃一惊。联合国限定伊拉克自动撤离科威特的期限——也就是1月15日——越来越近了，布什的行动使美国部队届时将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尼克松不时地和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和亚历山大·黑格商谈，他相信根本不该宣布什么期限，这太装腔作势了，只会让伊拉克乘机耍耍外交花招，其他人也会利用这段时间调整自己的议事日程。在联合国同意授权时，他只是说了句："让敌人知道你什么时候动手，大错特错了。"

11月30日，布什主动向萨达姆表示希望进行外交谈判，并准备派贝克到巴格达。尼克松勃然大怒，他站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冲着我大喊："太蠢了！别向敌人献媚。外交策略确实有用，可现在不是使用它的时候。我的天啊！他们到底在那里搞什么鬼？他们不知道这会适得其反吗？"

我提出说，政府采取这样的行动并不是因为它希望这会成功，而是因为它需要向美国人民表示，动武以前已经试过各种外交途径了。尼克松反驳道："不！他们就是这样打算的。他们不想动用武力。我自己在必要时就动过武力，里根也不怕动武。可布什是另一种货色。冲突可不是他的长项，他宁愿派贝克去巴格达，搞个轻松的解决办法回来。"

到了这种危急时刻，尼克松知道，美国如果希望自己遏制

侵略的承诺能够令人信服,就必须动用武力;外交途径既危险,又没有成效。外交策略的好处在于可以通过它向国内的选民表示,政府备战的时候仍然在寻求着和平,但是,在必要时毫不犹豫地动用武力的决心不能丢弃。派贝克去巴格达,只会给萨达姆提供合法的外交退路。如果他接受了,那么就既不能解决眼前的危机,又无法遏制其他的侵略者。12 月 3 日,尼克松又一次跟我说:"想让人相信你,你得炸他妈的个稀巴烂。"

尼克松还相信,军事行动宜早不宜迟。他说:"我来告诉你一点儿用兵的窍门:等得越久,麻烦越多。当然了,国内外的支持会渐渐减少,但领袖的责任就是把选票拉回来。"我告诉他几天前基辛格搞了个非常不错的电视访谈,尼克松举起了右手,然后拿起电话,要求接通基辛格。我正准备离开,就见尼克松挥手示意我回到座位上。

"亨利!"他大声喊道,"你觉得孤独吗?你是那里惟一的鹰派!我没看访谈,我的外交政策助手看了,她说你非常棒。顺便说一句,别再搞访谈了;该说的都说过了,他们爱听就听吧。"基辛格回了句什么,尼克松接着又说道:

"贝克去那里真是大错特错。伊拉克人又不是笨蛋,难道要我们带着联合国的决议去念给他们听吗?天啊!"基辛格又回答了些什么,尼克松飞快地看了我一眼,说:"嘿,亨利,我叫她自己告诉你她对访谈的看法。"他把电话塞到我手里。我跟基辛格说,看来只有他赞同动用武力,尼克松冲我拼命摆手,接着轻声地指导我该跟基辛格说些什么。简短的三方谈话结束后,尼克松又拿回电话,向基辛格道别。

"我很高兴你跟亨利说他干得好。"他说,"他应该听到这

话，因为这是实情，而且他也需要鼓励才能不断站出来，说些正确的话。想想看！那边只有他在干一些建设性的事情，其他人都是胆小鬼，"他摇摇头，"可怜的亨利，他在那边斗个半死，贝克却飞到伊拉克搞个一团糟。布什应该听基辛格的。中东的事情，他闭着眼睛都比那些人知道得多，那些人不过是天天围着布什转的小丑！"

尼克松和基辛格的交往由来已久，关系十分复杂。基辛格本质上是个学者，他在 1953 年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在博士论文中，他考察了 19 世纪古典欧洲的权力均衡状况。由于他深受有关冲突与合作的学术理论的熏陶，采用了现实主义作为世界观，在对付盟国和敌国的时候，冷静地采取讲求实际的方式。

相反，尼克松的硕士专业是法律，他对国际关系的了解，直接来自经验，而不是课堂。尼克松先是国会议员，接着当上了副总统。在此期间，他周游各国，了解现实世界。基辛格的外交教育是正规的学历教育；尼克松却是实地的经验教育。尼克松当选为总统后，马上选择这位哈佛的教授作为自己的国家安全顾问，于是政治家和学者在政策制定方面成为完美的组合。他们在智力上不相上下，彼此尊敬，思想和决策便源源不断地在两个人之间交流。尽管他们占据了世界上两个最有权力的职位，仍然互相竞争，因为这位学者也有政治家的气质，这位政治家也有学者的风范。

两个人在激烈的公开竞争中互相较劲，他们赫然耸立，举世瞩目。在与北部越南达成停火协议时，基辛格光荣地完成使命，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尼克松则两次当选为总统。基辛格提供有创意的思想；尼克松却有权埋葬这些思想。基辛格

能够向报界泄露致命的信息；尼克松却能够解雇他。基辛格曾经是国务卿；而尼克松曾经是总统。两个人都是既喜欢进行激烈的辩论，又喜欢冷静地使用政治手腕；既善于驾驭权力，又善于运用对方。

然而，尼克松到了晚年才明白，他不能与基辛格有隔阂，和他保持良好的关系才能够更有收获。尼克松一直十分欣赏基辛格在国际事务上的洞察力，他们大多数时候观点一致。尼克松不赞同政府制定的政策时，就会找基辛格咨询。他们已经不再执政，都觉得非常沮丧，但他们讲求策略地说几句话，看准时机写个专栏，总能够影响到政府的政策，因此两个人都乐此不疲。尼克松跟基辛格探讨各种想法，寻求共鸣；基辛格则请尼克松发挥自己的才智和修养，彼此获益匪浅。然而，更重要的是，前总统和前国务卿互相交流，就是为了听到自己的观点为对方所接受。

尼克松对布什的国务卿贝克却没有太高的评价。他觉得贝克聪明，但不过是个优秀的商人，根本不了解全球政治的运作。他们两个人之间互相怨恨：尼克松能够越过贝克，直接找布什，变成是由尼克松引导美国的外交政策，取代了贝克的权威地位，贝克对此十分恼火。尼克松相信贝克追求私利，总是在犯危险的错误；贝克则相信尼克松总是在越俎代庖。他们互相鄙视，很少来往，虽然没有公开相互攻击，私下里却互相批评。

1990 年 12 月 7 日是珍珠港事件 49 周年纪念。尼克松在纽约的广场宾馆发表演说，反响强烈。演说主要是关于苏联的解体和动态，但也提出应当尽快对伊拉克进行全面的武装打击。第二天早上，尼克松让人把演说词打好。他备有一

份名单，上面列着300名政策制定人和评论员，他给每个人都寄了一份，希望把他的信息传达给更多的人，同时也与基辛格作伴，在孤独的战场上为支持动用武力而共同奋争。他达到目的了：第二个星期，让·克尔派特丽克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专栏文章中引用了它。于是，尼克松相信，这篇演说确实是个理想的政治工具。

几天后，尼克松听说布什派遣国家安全顾问助理、未来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特·盖蒂斯在同一天向所有的前总统简要介绍海湾动态。尼克松没有得到总统的特殊对待，非常恼火，于是拒绝了盖蒂斯的来访。他觉得政府的那些官话，至少有一部分是他写的，他可不想再听一遍。

"布什派盖蒂斯来见我，他居然还让他在同一天也去跟福特、卡特和里根谈话。谁会相信啊？"他觉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天啊！我是说，公开私下，我给这个布什政府提过那么多建议，为他们找借口，让他们在中东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们每一次行动，我都支持他们。现在倒好，布什把我跟他们同等对待？没门！"他拍着椅子扶手说道，"我才不干呢。那些话我都一清二楚，还用得着他们来告诉我！真是奇耻大辱！其他人也许该听一听，我可没必要听。"

尼克松对布什的行为大失所望，现在又怀疑总统到底会不会采用武力解决危机。12月底，他看出布什和贝克与苏联人、伊拉克人、联合国装模作样地搞外交，不过是权宜之计。他相信布什政府为了获得眼前的蝇头小利，会牺牲长远利益。

"他不惜一切代价，就是要搞个协议。"12月18日，尼克松挥舞着两只手，这样说道，"我就是担心他们老给布什出馊主意。应该搞一些大规模的空中打击，毁了他们的后备运输

线、通讯设备和军工设施，你再看看萨达姆会不会来和谈，在这之前可不行。如果没有动武前就和他们做一笔交易，又让以色列人觉得不满意，他们就会自己去轰炸伊拉克。但消除威胁可不是以色列的责任，这是我们的责任。"

圣诞节的前五天，他的担忧消除了。斯考克罗夫特打电话说，总统已经决定要选择动武，除非伊拉克全面撤兵。所有的外交途径都已经试过，可伊拉克人还是顽固不化。布什满意了，可以无所顾忌地开战了。他终于作出决定，而尼克松早在伊拉克人侵后没几天就已经作出这一决定。

尼克松写了一篇题为《为什么》的文章，讨论美国在危机中的作用，文章将于 1991 年 1 月 6 日发表在《纽约周报》上。1 月 3 日，他一边检查稿子，一边说："政府不会喜欢这类东西的。"这篇杂文从理论上坚定地阐明我们在海湾地区应该占有一席之地，为将来可能动用武力打下政治基础。

专栏文章的开头，是一条他认为布什早该发表的声明："现在，应该坦率地谈一谈，为什么 40 万年轻的美国人在沙特阿拉伯的沙漠里度过了圣诞节，为什么两个星期以内，美国可能再次投入战争。"他提出，这场战争不为了在科威特建立民主政治，也不是为了惩罚萨达姆的残暴，而是为了两个大问题——一个是物质上的，一个是精神上的。

他直截了当地指出物质原因："如果没有我们的干涉，一个国际歹徒今天就控制了全世界 40% 的石油。我们不能允许萨达姆先生抓住我们的石油命脉，向我们和我们的盟国敲诈勒索，强迫我们接受他的野蛮要求。"

第二个原因更深邃："我们确信，如果萨达姆·侯赛因从他的野蛮侵略中获益，世界上其他潜在的侵略者就会随时向邻

国开战。"然而，如果美国成功地把萨达姆赶出科威特，"并削弱他将来挑起战争的能力"，我们就会树立威信，不需要派出一兵一卒就可以阻止其他地方出现野蛮行为。

有些人宣扬使用非军事手段解决争端，例如持续制裁和外交途径，这是错误的。原因很多。首先，"实施制裁，受苦的是伊拉克人民；萨达姆只需调动储备力量，伊拉克军队就不会受到影响。"其次，制裁会削弱伊拉克，但更会削弱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既要维持国外的同盟，又要保证国内对部队行动的支持，这在政治上是有难度的。第三，制裁可能有效，而"军事力量一定有效"。

他在文章结尾写道："勉勉强强的和平比战争更糟糕，因为它必将导致一场更大的战争。"带着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他提出，这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事业"，是"旨在和平的战争"。

文章发表的那天早上，他打电话问我："你看专栏了吗？我觉得观点阐述得很明白。在这件事情上教育人民，布什做得太不够了。你把人家的儿女送到沙漠里去，就得天天向他们解释原因。这篇文章有几段就说得特别好。布什可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可他让人没信心。"

我问他布什看了后会有什么反应，他回答说："不知道。我想他可能不会喜欢的，因为是我在说话。当然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知道贝克根本就不喜欢。不过我在文章里拔高了调子，布什可能会欣赏的，这正是他需要帮忙的地方。"

这篇文章是尼克松就危机问题发表的惟一正式的公开声明，目标直指布什、贝克、斯考克罗夫特、戈尔巴乔夫、萨达姆·侯赛因、国会以及美国人民——军事行动成功与否，就靠人民了。文章显然打动了读者。第二天，斯考克罗夫特打电话表

示赞同,并且赞扬和感谢尼克松,说他在参议院投票赞成动武之前,在政治上为布什排兵布阵。

文章发表的第二天,基辛格告诉尼克松说,在这场关于美国在海湾的作用的辩论中,文章作出了"重大贡献"。黑格向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作出评述,评述中重申了尼克松的论点。这篇专栏文章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在政策制定者和舆论制造者中得到了反响,引起了要求动用武力以达到目的的呼声。

1991 年 1 月 9 日是尼克松 78 岁的生日,但他这天却在担忧中度过。贝克到日内瓦和伊拉克外交部长塔利克·阿齐兹进行最后的外交会谈,尼克松担心会谈将取得一个软弱的解决方法。他相信,美国最好及时铲除伊拉克的威胁,否则它会发展到危险的地步;接受糟糕的协议,只不过是推迟武装冲突而已。到了下午,我告诉他贝克和阿齐兹的会谈宣告失败,他拍了拍手,如释重负地说道:

"妙!贝克想达成协议,可我知道白宫是不会愿意的。这怎么可能呢?他妈的,伊拉克人不是诚心谈判,为什么我们就得诚心谈判?"

1 月 15 日,联合国规定的期限近了,尼克松又有了新的担忧:美国和盟国这样犹豫再三,会不会给萨达姆以可乘之机?萨达姆有可能先发制人,命令部队打击美国在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的目标。对此,尼克松说:"他不会去惹以色列的,他还清醒着呢。以色列有核能力,会毫不犹豫地动用核武器,把他从地图上抹掉——丝毫都不会犹豫。"那么,萨达姆会不会在 1 月 16 日从科威特部分撤兵呢?从操作上来讲,这样做并没有向联合国的决议屈服,挽回了它的面子,但美国将很难

再发动进攻。对此，尼克松耸耸肩膀，回答道："有可能。"

1 月 10 日、11 日和 12 日三天，参议院仍在辩论是否批准在海湾地区用兵。尼克松愤怒至极。有些人表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选择武力解决问题，应该继续制裁。他们说，在这场危机中，美国没有任何理由派兵去送死，特别是为了石油的缘故。这种孤立主义的观点让政府里的一些人很不舒服，因为他们已经调兵遣将，并且对自己的可信度作出了保证。贝克在与阿齐兹的私人外交活动失败后，听着参议院反对政府动兵的争论，奇怪的是，这回他倒是很干脆地站在反对伊拉克的立场，竭力影响参议院。许多重要的新闻媒体大量报道一小撮反战主义者的抗议，也想借此影响参议院的表决。表决的前一天晚上，尼克松打电话给我，预测投票结果："我现在敢说是 52 对 47 票赞成动武，你记着我说的话吧。要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草案仅以一票之差通过。管它有多玄呢，只要那个该死的东西通过就好。"

第二天一早，参议院以微弱优势批准动用武力，与尼克松的推测一致。他马上打电话给我，兴奋地说道："嗨，我的预言完全正确！我知道那些有责任心的参议员会挺过来的。"他大声地说，"天啊！真他妈的累人。"他相信总统应该有权自由行动，无需经过国会的批准，就像美国无需联合国的支持就能够自由行事一样：国会和联合国的同意都很有用，可是都没必要。

他叫我找出 1973 年战争权限法案的全文。当时的提案受到他的否决，但仍然成为法律。法案规定，总统在动用武力干预武装冲突或潜在的武装冲突前，必须与国会磋商。如果国会不同意，法案允许他有 60 天的时间继续执行干预。如果

他亲笔证明，为了保证我们的武装人员的安全，需要继续执行干预，那么可以再延期30天。此时，如果国会仍然不批准他的行动，不肯宣战或通过其他法令，法案要求他必须撤兵。

我把一份法案递给他，他一把抢过去，在空中挥了挥："这个法规糟糕透了，在危急时刻只会绑住总统的手脚，却让敌人占便宜。万幸的是，从来都没有启用过它。国际上出现紧急情况时，总统还得听从国会那些心血来潮的东西，这才该死呢。戴高乐是怎么评价议会的？他们不会倡导政策，只会让政策疲软。他妈的！他们倒是会争个面红耳赤，可争论和行动是两码事。导弹和坦克都冲着我们来了，国会还会有力量倡导政策吗？见鬼去吧！"

就在参议院辩论是否动武时，苏联知道，由于海湾危机严峻，联合国的期限日渐逼近，美国被搅得鸡犬不宁。他们乘机严厉镇压立陶宛的独立运动。布什和贝克关注着海湾局势的同时，仍然一心想要保护戈尔巴乔夫，不肯有所行动，尼克松不由得勃然大怒。

1月16日晚上6点20分，他接到斯考克罗夫特的电话，通知他布什刚刚发布命令，对伊拉克进行空中攻势。20分钟后，对巴格达及其他伊拉克目标的轰炸开始了，目标精确的导弹和光电导航的炸弹照亮了夜空。当晚，布什就"沙漠风暴"行动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尼克松认为他在讲话中，过分强调联合国的重要性。但人民必须听到总统的讲话。这个讲话简单地宣布对伊拉克的进攻已经开始，号召人民支持这次行动，并向支持美国行动的国际盟友致敬。

1月17日开始了全面战争。傍晚，尼克松把我叫到办公室里，他大骂联合国和所谓的世界新秩序。他捶着桌子，以示

强调:"我要在这本书里(《只争朝夕》)狠狠地抨击联合国。让大家不要以为在这场战争结束后,联合国会突然变成一个伟大的组织、变成个世界领袖。每一个议会都臭不可闻,联合国是最难搞定、最不公正的议会。

"还有,这个所谓的'世界新秩序'一点都不中用。我就是这话。每到某个时代的末尾,就说是世界新秩序。狗屁!世事难料,到处都是危险,时时需要动用武力。轮到保护国家利益的时候,那些集体组织,联合国也好,其他什么鬼也好,全都不管用了,而且归根结底总是涉及到国家利益。惟一管用的集体组织是北约,这还因为它是军事联盟,而且由我们负责。"

晚上,我在收音机上听到新闻说,八枚伊拉克飞毛腿导弹打中了以色列。我向尼克松汇报了这一情况。尼克松见他早先的预测出现差错,十分震惊:"老实说,我没想到萨达姆会找上以色列,真是疯了。他可能想把以色列拖进来,可他得明白,这是危险的游戏。他可能觉得反正他没什么可损失的。"

虽然战争指向巴格达,其实是在惩罚伊拉克、保护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向以色列发动攻击,可以转移美国的注意力和军事力量,迫使美国放弃伊拉克境内的战事,转而应付以色列、科威特、沙特阿拉伯所面临的威胁。如果伊拉克能够凭着向以色列发射几枚技术粗糙的飞毛腿导弹达到这一目的,他就可以控制整个冲突。萨达姆大胆推测,只要他坚持得久一些,把以色列拖入战争,美国所得到的支持就会萎缩,国际同盟就会分裂。

以色列承受住这几枚漫无目的的飞毛腿的打击,等待美国作出军事响应。尼克松知道,让伊扎克·沙米尔总理对此无所举动,是相当困难的。他赞扬了他的克制态度:"他只能按

兵不动，他得过这道坎。如果以色列也卷进去了，我们的麻烦就大了。沙米尔愿意信任我们，很不简单，特别是他们议会里的强硬派一定让他很难过。但他愿意坚持下去，很有胆量。”如果以色列作出反应，就钻进了萨达姆的圈套，使盟军在该地区的战略部署复杂化；而以色列等待美国和我们的盟国作出反应，令萨达姆找不到第二个阵线。

对伊拉克的空袭开始后不久，布什的支持率开始上升。到了1月23日，他的支持率已经达到80%，而且继续上升。尼克松认为这个数字“迷惑人，显然掺有水分”。他看出这将造成所向无敌的错觉。他叹了口气说：“我了解布什，这个数字让他和那帮人春风得意，他们就听不进建议了。”尼克松就当前和战后的战略部署写了个备忘录，但他决定暂时不递交给总统，“等数字下降后再给他，那时他会谦虚一些。”五天后，他把备忘录递交布什。

在备忘录的开头，他首先赞扬了布什的领导才能，说这么高的支持率是他“当之无愧”的，说虽然当年肯尼迪在猪湾事件之后——那是外交政策的灾难——也达到过这种支持率，但那是在他取得重大外交政策的胜利之后。

尼克松说，接下来的就是“考验”，有些盟国会怂恿他命令中断军事打击，开始和谈，尼克松指点布什要立场坚定：“我很高兴您已经明确表示拒绝接受这类建议。”

接着，他为了说服布什坚持强硬的路线，拿以前的事实作类比：“昨晚我重读了1969年秋天写的一条日记。当时我和LBJ[①]共进早餐，他悔恨地说，他就是听从了别人的建议，命令

① 指林登·本兹·约翰逊，美国第36任总统。

停火；在选举前，也是听从了别人的建议，几乎败在汉弗莱[1]手下。"他从政治方面吓唬布什之后，提出教训："他跟我说，'阿弗列·哈里曼[2]大使跟我讲了十几次，说如果我命令停火，北越和越共就会停止炮击南越。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每次下令停止轰炸都是错误的。'"

尼克松接着比较了萨达姆的情况，鼓励布什坚定立场，实现承诺，继续战争，直到取得所有军事目标和政治目标。最后，尼克松再一次夸奖了布什的领导才能。他希望备忘录能够帮助布什抵制压力，避免过早停火。

然而，贝克比布什更需要尼克松的教导。他为了狂热地捍卫美苏团结，于 1 月 29 日同苏联的新任外交部长亚历山大·贝斯默特尼克发表联合公报，号召大家接受他们的和平计划，停止在伊拉克的战火。尼克松愤怒至极："贝克在搞什么鬼？现在把苏联人拉进来，真是大错特错。他们武装了那些杂种（伊拉克），咱们都开战了，他们还把军事顾问留在那里。他们是想办法在萨达姆面前挽回脸面，然后挤进海湾地区。我们还上钩了。他们原来说什么总统权力至上，我看是国务院权力至上！"他摇摇头，总结道："贝克太过分了。"

白宫显然也有同感，于是发表一份说明，希望澄清贝克搅起的混水，重申承诺，把战争进行到底。尼克松听说布什对贝克很是恼火，因为贝克在苏联的支持下，公开提出和平建议，损害了他的威信。贝克无视既定政策，他严重的越级行为使

---

① 汉弗莱(1911—1978)，曾任美国副总统，参议院自由派领袖，提出"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及"民权法"，支持越南战争，在 1968 年总统竞选中败给尼克松。

② 哈里曼(1891—1986)，历任美国驻苏联大使、商务部长、助理国务卿等要职，曾参加在巴黎与越南的和谈。

总统被迫发表声明予以否认。尼克松自己有过类似的经验：下级任意行事，造成严重后果。他觉得应该牺牲贝克才会对布什有利。

“布什应该因此炒他鱿鱼。”第二天，尼克松愤怒地说道，“我是说现在，不是以后。把总统搞得这么狼狈，真让人很难接受。他就是巴望着当总统，瞧他做事的样子，好像这份工作已经他妈的到手了！选举？还用得着选举吗！”他双手一挥，这样讽刺道，“咳，想他妈的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样就能把占着那个位子的人推翻了！”

幸运的是，贝克和贝斯默特尼克的提议也好，此后来自莫斯科的无数个和平动议也好，都没有被采纳。戈尔巴乔夫对立陶宛进行血腥镇压后，为了挽救他的和平形象，向第三世界阿拉伯国家效忠，维持苏伊轴心国关系，指使他的外交部长和伊拉克人谈判，提出一连串的停火建议。但也许是听从了尼克松的忠告，布什拒绝了苏联的所有动议，重申承诺，表示要彻底地打胜这场战争。于是，尼克松如释重负。

2月15日，伊拉克人在苏联人的支持下，提出无数个从科威特撤军的先决条件。英国首相约翰·梅杰痛斥他们是厚颜无耻，“虚伪欺诈”，尼克松非常赞同，但他还是担心布什会退却。然而，新闻媒体报导了伊拉克的提议，表示已经和平在望了。

“新闻媒体这样报导，让人以为战争已经结束了！”尼克松十分恼怒，“他们想把和平协议说得像个会自然应验的预言一样。”

对于尼克松来说，苏联的主动姿态不过是些圆滑的外交手段，他们的把戏很容易让人识破：其目的就是拖延地面战

争，维持莫斯科和伊拉克的关系，继续与第三世界对话，让戈尔巴乔夫成为和平英雄。

"我希望布什现在能看清苏联人的这些动机。他得认清他们的本来面目，或至少斯考克罗夫特认得清，这就好办了。我就他妈的希望布什不要让步。"他说。

我回答说，我认为布什会把这个计划看作是政治策略，阻碍事态的发展，但不管哪个政府想按照这个计划行事，我们的盟国都会制止的。尼克松担心这项动议已经开始了和平的进程，但我提出，战争之势已经无可逆转。

"你比我乐观，"他回答道，"以前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不过1972年圣诞节的轰炸还是把苏联人带到谈判桌前。萨达姆倒在其次；我们得多盯着苏联人。"

他们继续推进和平计划。2月18日，布什终于不得不在挽救戈尔巴乔夫和击败伊拉克之间作出选择。

"我敢打赌，他们今晚在那边的会议肯定很热闹。"尼克松说，"你想不想变成飞蛾附在他们的墙上，看他们在那里扑腾？天啊！以前我们在那里的时候，讨论得多热烈！如果我在那里的话，我就会告诉布什，苏联人反正会偷偷地补偿萨达姆的损失；妈的，他们本来五分钟就可以搞定了。要一直逼紧他。我的天啊！"

然而布什已经作出决定，因此当晚并没有给他打电话。他拒绝了苏联人的计划，因为计划一旦执行，势必把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和以色列从占领领土撤军联系到一起。布什一般避免冒险，而这一回却孤注一掷，这样一来，有可能使美苏脆弱的联盟崩溃，孤立戈尔巴乔夫，在美国和苏联之间产生隔阂。尼克松推测，苏联的动议使事态更加复杂，影响了外交、

军事行动、联盟以及美苏伙伴关系，布什可能甚至因此暗暗地痛恨这次动议。但戈尔巴乔夫自然有权一心只为自己的利益打算，政府却没有看到这一点，错误地以为他也会照顾到我们的利益。

2 月 22 日，尼克松对我说："嘿，你对布什的猜测是对的。我以为他不会立场坚定。我刚刚和斯考克罗夫特谈过，真没想到。"2 月 23 日是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的第二个期限，现在只剩 18 小时了，地面部队正在准备行动。早些时候，尼克松一直在给斯考克罗夫特打电话，但将军和布什在一起，复查总统关于苏联和平计划的讲话。我在看了布什发表讲话后，向尼克松汇报说布什称苏联的动议"很有用"。

他觉得难以置信，说道："噢，天啊！那不是有用，是老谋深算，迷惑人心。不过我猜想布什总要说些好话，才不会完全冷落俄罗斯人。咳，至少他不会退出，这才是最重要的。我希望切尼也在那里，他是惟一的鹰派，他才不会只听贝克的呢。"

第二个期限到来了。这天早上，尼克松最大的担心成为现实：在戴维营[①]和布什呆在一起的是贝克，国防部长切尼却不在那里，斯考克罗夫特也留在了白宫。他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消息。"他妈的！贝克这下子可有机会向布什进言了，真要命。布什有那么多人，怎么偏偏要听贝克的？噢，天！贝克不惜一切代价地要和平，恐怕布什还会受到这种胡说八道的影响。"

两个小时后，他又打电话告诉我从斯考克罗夫特那里传来的话："你会开心的，今天开始地面进攻。斯考克罗夫特跟

① 美国总统的休养别墅，在马里兰州。

我说施瓦茨科普夫将军接到通知了。贝克可要气死了，最大的输家还是苏联人，这可是事与愿违。”他们的和平计划遭到了严厉拒绝，苏伊关系却未受影响。2月23日傍晚6点钟，布什打电话给尼克松，告知他，尽管遭到苏联的反对，但地面进攻“沙漠骑兵”计划预计在两个小时内开始。尼克松松了一口气，同时又稍感奇怪，虽然贝克在布什身边，布什仍然坚决动用武力。

基辛格也觉得吃惊。三天后，他打电话给尼克松，说前天晚上参加白宫晚宴时，见贝克一次次把布什叫走，催促他接受苏联人的计划。尼克松觉得这个行为实在“可耻”，他告诉基辛格：“要是我们，早就炒他妈的鱿鱼了。”也许他并没有意识到基辛格也有这个意思。

尼克松担心布什倾向于相信戈尔巴乔夫的动机是纯洁的。基辛格证实了这一点：“布什相信一半，贝克却全部相信。”我跟尼克松提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民意测验显示，80%接受民意测验的人认为，苏联人的计划是他们“又在耍老花招了”。“布什最好看看那个民意测验。”尼克松说，“实际上，也只有这个民意测验他应该看一看。”

2月26日，我早早地来到办公室，看见办公桌上放着一篇从《时代周刊》杂志上撕下来的杂文，是前总统吉米·卡特写的。尼克松在文章的上端写上我的名字，后面划了两个感叹号。文章的题目是《不要拒绝停火》，里面提出，坚决要求对方完全投降，如果不采用和谈，将会导致长久的毁灭性战争，破坏同盟，扰乱该地区的稳定。尼克松感到非常震惊。卡特不仅大错特错，而且在发动地面战争的时候发表这个建议，“非常不负责任”。

尼克松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看着我手上的文章，他发火道："你能相信吗？看看这些蠢话！请拿给我。"他把文章拿了过去，"我真不敢相信，我们快要解决伊拉克了，他居然送出这种混淆是非的信息，真要命。我们的部队在该死的沙漠里打得半死，他却在这里挖他们的墙角。卡特对战争有疑问，应该私下告诉布什，不该发表在《时代周刊》上嘛。"

一旦战争开始，我们的对手也好，部队也好，应该让他们看到的是国内齐心协力的支持，而不是来自前总统的异议。

地面打击只持续了100个小时，伊拉克人就被赶跑，科威特完全解放了，但到处都破败不堪，伊拉克人偷窃、抢劫、纵火，把许多贵重的物品运回伊拉克。2月27日，布什宣布伊拉克同意停火，战争结束了。

尼克松的心情很沉重。下午见面时，他说："现在停火了，一大堆问题又来了，都是战后经常碰到的问题。首先，萨达姆该何去何从？让他继续执政，简直大错特错。其次，他可没有亲口说停火，我们干嘛松劲？第三，苏联人在那边搅和什么？"

尼克松认为，伊拉克被赶出科威特，科威特政权恢复了，我们的军事目标和政治目标已经达到了，但美国应该继续对萨达姆施加压力，让他无法重新组建武装部队，无法继续独裁统治。战火刚停，他的担忧就得到证实。北部库尔德人和南部穆斯林什叶派掀起了独立主义反叛，萨达姆利用残存部队，对他们进行疯狂的镇压。

同时，战争正式结束后，布什和施瓦茨科普夫之间出现了小小的争端。施瓦茨科普夫和尼克松一样，提出如果继续地面攻势，进一步削弱效忠于侯赛因的伊拉克部队，他就无法镇压起义。施瓦茨科普夫说："坦率地讲，我本来就建议……继

续行进,本来可以……全歼敌人。"布什回答说,关于战争应该何时结束,他的军事顾问们的看法完全一致。然而,从这次意见的相左可以看出些政策性问题。

首先,大家纷纷争论,紧接着战争之后,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究竟应该起什么作用。布什政府提出,我们的作用仅限于决定联合国永久停火的条款,我们的任务是把伊拉克从科威特清除出去,不是消灭他们的内战。

然而,伊拉克的反叛势力宣称,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引发了战争,他们的内部革命是战争的延续,因此我们有责任支持他们的事业。布什确实亲自号召伊拉克人民起来推翻萨达姆。他们宣称,他们接受了这个忠告,因此希望美国援助他们。

政府反驳说,布什如此评论,目的不过是为了向伊拉克社会强调,只要萨达姆继续执政,美国就永远不会与伊拉克保持正常的关系。布什提议政变,不是革命,因此我们没有义务帮助叛军。

这场争论引起伊拉克的一片大乱,尼克松觉得,在伊拉克溃退时,我们就应该进军巴格达,废掉萨达姆,摧毁更多的军事硬件。

争论的第二点是,我们的政策是不是自相矛盾?我们号召推翻萨达姆,却反对伊拉克分裂;我们号召伊拉克人起来反对萨达姆,却不愿意帮助他们;我们不帮助叛军,萨达姆就会继续掌权,就不可能实现关系正常化,但帮助他们,就会卷入他们的内战。

尼克松提出,美国本该将这场骚乱斩草除根,不幸的是,国务卿过早倡导停火。尼克松说:"我敢打赌,都是贝克在施加压力,告诉布什说,如果不及时停火,苏联人就会中断联

盟。"据说贝克正打算立刻前往莫斯科，准备去赞扬苏联人，夸奖他们在停火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实际上，苏联人名不副实。尼克松感到十分震惊。

美国领导了战争，反对压迫伊拉克人民的萨达姆·侯赛因。伊拉克叛军的起义，从逻辑上讲确实是战争的延续，但美国并没有作好思想准备，应付战争引发的后果。库尔德人要求独立，建立自己的国家；什叶派要求保护他们自己的少数民族；伊拉克部队却重新装备，残酷镇压他们。这一回，伊拉克的暴行不是在境外，不是在科威特，而是在境内，这两群人没有美国的保护和支持，只能自己保卫自己。4月15日，尼克松与有线新闻电视网的伯纳德·肖进行了一次现场电视访谈，尼克松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我们应该让中央情报局把萨达姆搞掉。"

伊拉克的少数民族被残酷地剥夺了人权，如果我们废掉萨达姆，他们就不会是这种命运。但土耳其总统土格特·奥扎尔劝布什说，有萨达姆在，伊拉克至少能保持稳定；没有萨达姆，伊拉克将会天下大乱，于是政府采取了不插手的政策。然而，库尔德人备受摧残，他们的形象出现在美国千家万户的电视屏幕上。布什被迫在伊拉克建立"禁飞区"，为少数民族提供空中掩护。不久，伊拉克人违反了"禁飞"条例，美国立刻实行空中打击，以示惩罚。

在此期间，布什和斯考克罗夫特都没有跟尼克松联系。前总统不由得猜测到，伊拉克战争胜利后，公众的支持率极高，他们沾沾自喜，相信自己所向披靡。布什也许不会听从尼克松的劝告，但前总统还是准备了一份备忘录，希望矫正布什的道路，并向陶醉于胜利的白宫指出，胜利是必然的，但又是

短暂的，应该谦虚一点。

4月18日，尼克松坐在桌前，口授备忘录，这时，布什打电话邀请他到白宫参加午宴。尼克松告诉他，第二天将让我把这封信送到白宫。布什说，他下午去戴维营，不过我可以把信交给斯考克罗夫特。尼克松的态度马上转变。他觉得布什应该向他咨询，可他也明白布什并非一定要这样做，因此，每回布什征求他的意见时，他都特别高兴。

第二天早上，他写完备忘录，告诉我他要和布什交换意见，在此期间，我可以读一读这份备忘录。下午，我第二次前往椭圆形办公室，把尼克松的信放在位于西翼的斯考克罗夫特办公室。第二天，斯考克罗夫特打电话表示感谢，他提醒尼克松，布什在白宫为前总统举行午宴，出席的人有布什、斯考克罗夫特、切尼、盖茨等。尼克松对贝克和他的一伙人怀有戒心，他警告斯考克罗夫特："不能有国务院的人。"

4月22日，布什在白宫主持招待了尼克松。出席宴会的还有，副总统丹·奎尔、总统竞选班子的领导人约翰·苏努努、切尼、斯考克罗夫特、劳伦斯·伊格尔伯格、国务卿助理以及国务院里一个他信任的人。尼克松和他们谈了将近两个小时，主要讨论苏联的解体和动乱、海湾战争的后果以及萨达姆该何去何从。

第二天，他告诉我："大家都静静地听我说。"他虽然尊敬在座的每一个人，可觉得人太多，心里感到沮丧，"参加讨论的人越多，讨论就越不集中。最好是和他们单独谈。其实我应该先跟布什和斯考克罗夫特谈。算了，"他耸了耸肩膀，"那是他们的白宫。"

"会谈不错，可没太大成效。他们都聚精会神地听。我说

只要萨达姆在那里，就没有和平，他们都表示赞同；可你知道，布什坐在那儿，天知道他在想什么。里根很不错，他很会挑选优秀顾问。我看布什就不行。我是说，不管发生什么事，他们应该能够站起来为他说话。这些人都很精、可我觉得没有一个忠心耿耿，这可是一个总统最需要的。”

他停顿了一下，又说：“在思想上，也许斯考克罗夫特和切尼跟我最接近了。我希望他们会听进去的。我狠狠地揪住俄罗斯的那档子事。我告诉他们，除非苏联真正愿意搞民主改革，不然美国一分钱也不帮他。他们好像很欣赏这个观点。战争结束了，可苏联方面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永远也解决不完，这比萨达姆·侯赛因重要多了。我是想把他们带到山顶，让他们一览全景。不知道他们看到没有。

“我有一个感觉，布什倾向于同意我的看法，可只要贝克有不同的提议，他就会受到影响。奎尔在对外事务上的直觉不错，可他还处于学习阶段。切尼是坚决、负责任的鹰派，斯考克罗夫特和伊格尔伯格在那里呆很久了，应该能认清形势。他们精明、得体，可谁知道呢——他们就是没有眼界。当然了，最高层的那两个人——布什和贝克——都没有眼界，你怎么能期望其他人有呢？”

战争结束时，政府认定这是天赐良机，重新推进中东的和平进程。伊拉克战败后，承受着制裁的负担，科威特政权恢复了，以色列受到了保护，脆弱的国际同盟也完好无损。这里的动力结构有所改变，为和平提供了转机。伊拉克战败后，政府抓住胜利的势头，宣布召开和平会议，贝克热情洋溢地支持这次会议。尼克松对此却不抱希望，称之为“小儿科。只不过是在那里老调重弹而已，真正的谈判要在私下里进行”。在战争

中，为了对抗共同面临的威胁，以色列和邻国团结在一起，这也许改变了和平的前景，但他提醒大家，战争也许会加重原来的敌意。

冷战和海湾战争之后，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冲突仍在继续。尼克松相信，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袖雅西尔·阿拉法特在1993年9月13日历史性的握手，本可以推动和平的进程，开创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和平新时代。虽然以色列及其周边地区的暴力活动没有减少，但到了1994年7月25日，以色列和约旦签订和平协议，似乎也露出了和平的曙光。海湾战争至少暂时稳住了该地区的局面，使之不至于恶化。阿以双方正在进行的和平谈判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巴解组织和以色列之间的协议，以及以色列和约旦之间的协议，都是重大的突破，但是，在通往持久、公正的中东和平的漫漫长路上，这还只是第一步。

尼克松认为，美国在海湾战争中取得了胜利，苏联也不再支持以色列的阿拉伯敌人，而且自从1979年签订戴维营协议以来，埃及不再反对以色列，各方面因素都对以色列有利，这正是创造持久和平的大好时机。自以色列诞生以来，不曾出现过这样宽松的局面。如果不能抓住有利时机，和平将更加渺茫，以色列将来一定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尼克松赞扬了拉宾在政治上的勇气，因为他乘着以色列正当强盛的时候，努力谋求与阿拉法特的和平。

1992年8月9日正好是尼克松辞职18周年，我参加了尼克松与拉宾的私人会晤，为会晤作记录，并观察着他们。我来到广场宾馆，见到一群示威游行者聚在那里。原来，拉宾决定将以色列和伊拉克的接触合法化，他们在抗议拉宾的这一

决定。接着,尼克松也到了。我们穿过一群国际新闻记者,来到拉宾住的房间。总理个头不大,声音轻柔,听着令人安心,却看不出他有着辉煌的军事背景,也看不出他会因强硬而公正的政治领袖风范而享有盛名。他热情地打了招呼。接着,尼克松把我介绍给他。这位以色列总理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谨慎的怀疑。

"我们可以信任她吗?"他问尼克松。

等尼克松回答说可以后,他这才伸出手,优雅地表示欢迎。他的助手安排我们合影,他们把记者邀请进来。记者分两批,闹哄哄地挤来挤去,大声地向两位首脑提问,但两人并不回答。

等他们给引出去后,拉宾先说话了。他描述了这个地区的形势,对苏联的解体进行了评估。尼克松接着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提醒拉宾,当前的形势有利于和平,但是有利的时机很快会成为过眼烟云。他提出,如果在土地换和平的基础上寻求解决办法,无论对美国利益,还是对以色列利益,都有好处。

他告诉拉宾道:"如果以色列继续保持那些占有领土,就会败坏自己的道德。在以色列及其占有领土上,有400万以色列人以及100万从苏联迁来的犹太移民,而阿拉伯人只有200万。继续困住这些阿拉伯人将不利于稳定,非常危险。"美国出于道德目的,有义务帮助以色列生存下来,但如果以色列继续占有这些土地,就会沦为双民族的军事体制国家,败坏犹太民族的精神,损害美国的道德目标。

拉宾则介绍了一些关于和平进程的想法。尼克松充分理解拉宾政治上的困难处境,他向拉宾提议,可以跟议会里的强硬派谈判。两个人的关系显得非常融洽:总理一再表明,他

非常珍惜与尼克松的关系，称他是“以色列的一个最好的朋友”；尼克松则认为拉宾是个善良的人，是个杰出的军事领袖、真正的政治家，是个朋友，可以与之坦诚地讨论国际政治，而且他们对国际政治有着共同的见解。

几个星期后，也就是9月30日，我跟着他去见以色列外交部长西蒙·佩雷斯，地点还是在联合国的广场宾馆。佩雷斯随和、坦率、直爽。他们讨论了许多相似的问题，包括最初向巴解组织提出的建议。以色列国内选民对这场冲突极有兴趣，他们势力强大，因此拉宾和佩雷斯面临严峻的政治难题，这些难题既来自阿拉法特，也来自国内。尼克松跟他们两个人都说：“发动战争的人，应该是个强有力的领袖，但创造和平的人，则应该是更加强有力的人。”

与拉宾的会谈结束后，出门时，我问尼克松，在他和国家首脑谈话时，是不是都遵循某种标准模式，他回答说：“哪，你今天也看到了，就是这个样子的。主人开始谈话，客人顺着话题接下去。我认为我们应该讨论世界局势，双边谈判则留给低一层的人来进行。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代，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差距太大，两极状态十分稳定，所以我们当时的话题很多，中国啦，军备控制啦，但只是泛泛地谈，从来不谈细节问题，也不应该谈论那些细节。所以才要有内阁和助理秘书什么的。等该谈的都谈完了，勃列日涅夫一般想谈些安全的话题，比如运动。”

“什么？”我问道。

“我也知道，这简直是疯了。”他回答道，“可勃列日涅夫就是这样，他总想发现什么是美国的动力。这个国家总有些东西让他觉得抗拒不了。”他笑了，“再来谈谈战略问题——1953年，

我在几次出访后，了解了战略上弱小的国家的情况，比如以色列。小国家喜欢占有一席之地——所以在和北越的关系上，我们起用了罗马尼亚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他是个很不错的渠道。说到以色列嘛，他们现在有拉宾，很幸运。他强悍、沉默寡言，却是个猛将。以色列这么脆弱，必须产生一流的人才。我们这么强大，没有必要——也没有——经常产生最佳的人才。以色列人总是人才济济，他们就是他妈的聪明。"尼克松希望他和以色列人的私人外交往来能够推动他们向公正与和平迈进，因为他们应该得到和平，整个地区也急需和平。

这场战争实现了许多重要的目标。这里的势力不均衡，重心偏向伊拉克，但战争暂时调整了这个状况，在阿拉伯世界孤立了伊拉克，使它承受了债务和赔偿的沉重负担。战争再一次向以色列保证，美国将继续为以色列提供保护。它证实了美国在冷战后的军事实力，激发了具有惊人活力的国际联盟，坚决击退了侵略者。它让人们不再怀疑，我们愿意捍卫我们的利益，它也向潜在的侵略者发出遏制的信号。它把美国团结起来，恢复了冷战结束后失去的使命感。

然而，某些重要的目标却没有实现。战争并没有使联合国成为永久的、权威的和平论坛。它没有加强人们大力宣传的世界新秩序。它没有为该地区搭起全面稳定的框架。它没有建立起稳定的地区军备控制。它没有消除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潜在的威胁。它没有彻底清除伊拉克这个该地区最危险的力量。它没有在刚刚得到解放的科威特建立民主，没有重新分配中东的财富。尽管美国胜利了，尽管主导美国干预行动的新原则成功了，这次战争却无法和越战的遗产

相比拟。

海湾战争的规模很大，外交成绩显著，涉及到重要的利益，取得了重大的军事胜利，它本该最终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应该能够向世界表明，美国有意志、有能力、有义务接受侵略者的挑战，恢复世界对美国力量的信任。但早在2月25日，即停火的前两天，尼克松已经知道，海湾战争树立了战无不胜的新榜样，而这场战争却无法消除越战的影响。

"这场战争打得不错，但恐怕不会是什么分水岭。"尼克松眯缝着眼睛说，"时间太短了。虽说一个伤亡都嫌太多，可坦率地说，这场战争伤亡太少，没有分量。它只不过是把伊拉克从科威特赶走而已。不幸的是，越战的后遗症一时还消除不了。坦率地说，这恐怕得等到我们这几代人退出舞台，或者再来一次世界大战。"

"这个药方太凶猛了。"我说。

"越战本来就给我们留下了凶猛的局面。"他回答说。

战后复苏的爱国主义对国家起着积极的作用，但它不是表现在庆祝相对而言速战速决的海湾战争。越战结束时，没有人挥舞黄色缎带，也没有游行队伍欢迎士兵的归来；而这一次的爱国热情，更多的是代表了对越战的补偿。越战使这个国家严重地撕裂开来，海湾战争又把它过分地团结在一起。战争去得快，布什骇人的支持率消散得也快。对于尼克松来说，海湾战争虽然是一次不可避免的冲突，在政治上十分有利，但它仍不足以与越战相抗衡，无法抵消越战所留下来的痛苦的教训。

在这个地区，重重的威胁中透出一丝丝微弱的和平的希

望,因而美国必须领头。这是尼克松哲学的精髓。在海湾危机中,他很巧妙地把这一哲学不断地灌输给政府。他觉得,正是这一哲学指导了美国政策的全面胜利。美国应该尽力通过联合国起到领导作用,正如通过北约领导冷战一样。即使无法起到领导作用,也应当从单方面保护自己的利益。尼克松坚定地相信,美国在国际上的领导地位不仅有力地抵制了国内有害的愤世疾俗的倾向,而且极大地打击了某些地方猖獗的专制统治。

1992 年 3 月 16 日,他在《时代周刊》杂志上写道:"公众对威胁反应强烈,对机会却无动于衷。面对明确无误的威胁,很容易取得人民的支持,但很难争取他们去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如果我们的领袖把对外政策放在次要的地位,等待事态演变出新的威胁,到那时,我们的时机早已消失了。"

他催促布什行动起来,不要坐等事态逼迫你时才行动。在世界新秩序下,美国并非可以放松警惕,而应该更加警觉。在这个新时代,旧有的难题没有消失。海湾战争证明,永久的和平尚未取得,民主启蒙尚未点亮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美国的力量仍然无可取代。尼克松在危机中、在他不再担任总统的那些年头里,他的作用不仅仅是指导当前的领导人认清战争的机制,而是要影响整个美国政策。他要让他们看清"更广阔的全景",让他们在战争中也好,在和平时期也好,能够坚定地行动。然而,更重要的是,他要教会他们怎样合理地平衡各种力量和理想,让美国成为和平与稳定的催化剂,即使在中东的流沙中也不例外。

第四章　越南战争的遗产

1992 年的一个温暖的夏天，夕阳西沉。我和尼克松坐在他的府邸的书房里，讨论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角落里的电视正在播放晚间新闻，但那只是背景声音，我们并不看节目。突然，电视里传来一阵爆炸声，尼克松受到了干扰，觉得很恼火，于是拿起遥控器准备关电视。就在他把遥控器对准电视的时候，他呆住了：他意识到屏幕上惹人注意的暴力画面，居然是越南战争的场景。他慢慢地放下遥控器，看着战争的一幕幕场景在眼前展开。

他轻声地说道："在战争的最后几年，我是主持工作的总统，也是我这个总统最终结束了战争，这难道不是很有讽刺意义吗？"他悲伤地摇了摇头，

"这事真他妈的悲惨。想想看,就是我,必须面对那些反战争的嬉皮上流氓。我的天啊!我不仅比他们大一辈,而且我好像是从另一个星球来的。价值、思想,所有的一切,差距巨大啊。鸿沟太深了。我想我当时并不是很理解,可现在我看清了,太……具有讽刺意义了。"

没有什么事情像越战的遗产一样,一直噬咬着尼克松的良心。战争为他的总统任职定位,它确定了整整一代人的特点,确立了贯穿到本世纪末的战争与和平的途径。战争造成的分裂局面强烈地震撼了国家的基础,激起一小部分诋毁者大声地鼓噪抗议,而尼克松所拥有的沉默的大多数则通过选票说话。尼克松所代表的价值观突然显得过时而且无关紧要。他陷入一个越来越宽阔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的裂缝,既无法驾驭,又不能忽视。战争及其代价显得越来越野蛮、越来越不合适宜。反对越南行动的人吸引了新闻媒介的注意,形成越来越大的政治势头,占据了变幻不定的道德高地。对于他们来说,尼克松执行彻底的战争,如此愚昧,是善良与公正的敌人。很少人能够理解他为什么继续战争,更少人能够与作为总统的尼克松产生共鸣。

"我是个正方形。"1993 年 5 月 27 日这一天,他用两个手指在空中划了个正方形,"我的价值观很传统:上帝、国家、家庭。在越战时代,这些价值观遭到破坏,我完全反对。性爱自由、毒品、诋毁国家、否认上帝、自私自利、放任自流——我所鄙视的一切却在我担任总统期间生根发芽,可我却无能为力。真难相信我还会得到那么多人的支持。我代表了他们想推翻的一切,可我又当上了总统。"

越战的回忆萦绕着他。他相信,这场战争是阻止共产主

义滋生蔓延的光荣的努力，但是每当他回想起它，总是联想到它所引发的文化革命，这场革命侵蚀了美国生活中正义和体面等传统支柱。美国社会中许多激进因素成为主流，一度被禁止的行为观念从阴暗的角落里走出来，曾经是无耻的思想渗进了一个新的价值体系。尼克松正处在社会动荡之中，却不为激进主义所动；战争激发了这一切，而尼克松更加致力于合理地结束战争。

"这个总统，"他指着自己说，"不会被那些吵吵嚷嚷的反战分子吓倒。他们不同意战争，那好，他们有权发表意见。可我是人民选举出来的，我的责任就是把战争打下去，直到体面地结束它。考验领袖是否伟大，就是看他能不能引导公众的看法，不会被会众牵着鼻子走。就拿越战来说吧，那群反战分子大喊大叫，让人误以为是公众的意见。果真是公众意见的话，1972 年我就不会以绝对优势再次当选。

"但是，想一想当时的情形吧，那是对领导才能的考验：我制定的政策是为国家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了满足大喊大叫的少数人。你看，越战是两个阵线上的战争：一个是战场，一个是我们的价值观。战争本身很悲惨。"尼克松的悲剧在于，他既无法操纵战争的结果，又无力阻止传统的、也就是他自己的价值观念所遭受的冲击。

"那么，您是不是认为当时的动荡是不可避免的呢？"我问道。

"不可避免？"他重复道，"也许吧。毁灭性吗？绝对是。越战是个催化剂。"

尼克松经常说，在他担任总统的时候，每一天都在痛恨越战。他鄙视这场战争，它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人员伤亡、物资

浪费、道德沦丧。他鄙视他必须作出的决定：把将士派去冒险。他鄙视这场战争，因为许多将士或者死亡，或者被俘，许多家庭因此失去了他们的亲人，而他又必须面对这些勇敢的家庭，让他们相信，他之所以这样做，目的是要体面地结束这场战争。他鄙视这场战争，因为它不仅损害了他的总统形象，而且损害了美国人民对政府的信任。

美国在印度支那的目标，就是阻止河内共产党政权征服当地的自由国家，保护美国在那里的利益。尼克松相信这些目标是正义的。然而，和平方式没能实现这些目标。尼克松面临着严峻的抉择：或者通过武力继续打击共产党，或者抛弃那些受到威胁的国家。他相信他其实并没有选择。无论从道义上来讲，还是从战略上来讲，美国必须支持和平与自由的力量，抗击那些企图摧毁和平与自由的人。

1992年9月14日，他摇着头，大声喊道："他妈的！科伊尔怎么能这么不负责任，说什么连理查德·尼克松也承认越南战争是个错误。我真不敢相信。我的天啊！他是怎么想的？从历史上来讲，这种说法不准确。是我给战争收尾，可我从来没有反对过它。新闻界对他的说法表示质疑，他们不是要为我辩护，而是要搞他。你知道吗？我喜欢他，可他这回活该。我真不相信他会说出这种蠢话。可能是他身边一些反越战的家伙影响了他。谁知道呢？没错，我就是想打这场该死的战争。"

1969年11月3日，他发表了一次外交政策讲话，他认为这是他的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讲话。1969年1月他就任总统时，在越南的美国部队有55万人。早在竞选的时候，他发誓要在保证我们的利益、保护我们的名誉的基础上，结束

美国在越南的瓜葛。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开始撤军。尽管如此，全国到处掀起了反战运动，要求立即全面撤军。接受民意测验的美国人当中，大多数也支持这一运动。政府也好，国会里的共和党领导人也好，意见也有分歧。有的人甚至警告说，如果他继续打下去，这场战争就会演变为尼克松的战争，为人所不齿。

他很想采用最便当的政治路线：他可以指责民主党总统肯尼迪和约翰逊，说最初派兵的人是他们两个，然后他把部队全部撤回，把西贡拱手让给苏联支持下的北越。这项计划会让美国和越南都安静下来，然后政府再执行其他提案，他就更有机会将国家团结起来。然而这将纵容共产党对印度支那的控制，代价惨重，他不愿意。

他不能让局势沦为"尼克松的战争"，而是要让它成为"美国的战争"。美国在越南不断地作出牺牲，而被要求作出牺牲的是美国人民，因此他把这个问题直接拿给人民去解决。"所以，今天晚上，"他在电视上向全国人民说道，"伟大的同胞们！沉默的大多数！我请求你们的支持。让我们为和平而团结起来；让我们为避免失败团结起来。让我们明白一点：北越无法击败美国，无法侮辱美国。只有美国人自己才会击败自己，侮辱自己。"

演说获得极大的成功。他向沉默的大多数呼吁，他们作出了回应，支持他。他最终得以继续执行他的政策，并于1973年1月27日签订了巴黎协议。1992年9月9日，尼克松说："对沉默的大多数发表的演说，也许是我的演说史上最大的胜利，当然啦，基金演说除外，那次演说挽救了我的政治生命。发表演说的前一个月，成千上万的示威游行者游行到

华盛顿,在白宫和五角大楼周围抗议,有时非常凶猛。一些国会议员和参议员希望不惜一切代价谋求和平,更不用说还有许多人在越南问题上一向是鸽派。他们都要求我单方面撤军。我的一些朋友和支持者甚至火上浇油。副总统斯比罗·阿格纽和霍尔德曼也支持他们——亨利·基辛格也是如此——但他们都是被迫的。每个人都反对战争,包括布什,他对这场战争整体上抱着温和的态度。我听着大家的话,可我一直都很清楚自己该做什么。我根本没有预先通知就上电视,甚至没跟电视公司打招呼。我可不想走漏他妈的一点点风声。我知道,要想让演说有分量,大部分得我自己写,特别是结尾部分。最后一段是在发表演说的那天凌晨两点用手写出来的。这是决定性的成功。大家纷纷地表示支持,这样我就可以更容易体面地结束这场战争。"

尼克松相信,不管面临什么样的冲突,美国都必须作出现实的评估,看一看是什么重要的利益受到了威胁,威胁的本质是什么,以及如何最充分地坚持我们的立场。如果那些利益无关紧要,我们尽量不要直接动用武力。但如果是重要的利益受到威胁,我们应该准备采取直接的、强有力的方式保护这些利益。我们应当寻求取胜的方法,尽量避免动用武力,但必要时我们应该愿意动用武力,以保证这些方法能够成功。

尼克松坚持这一哲学,毫不动摇。我们在越南的纠葛就是对这一哲学的考验。美国的对越政策基于两个主要目标:第一,保护我们在南亚的重要利益。南亚地处连接波斯湾和印度洋与太平洋的重要海上通道,日本运输石油的船只几乎全部从这里通过。我们决不能让苏联在沿线落脚。第二,维护我们承担国际义务的威信。北越的扩张主义威胁到南越和

印度支那的其他地方，我们要努力阻止它的扩张。1975 年，河内占了上风，我们没能实现这两个目标：莫斯科在金兰湾和岘港建立了重要的海军基地，越南共产党很快占领了柬埔寨和老挝，公开威胁泰国。

1992 年 1 月 3 日，尼克松跟我说："西贡被攻占。在越南和其他地方，支持北越的人雀跃欢呼，但他们没能高兴多久。16 年来，教条主义的领导人没有给越南带来繁荣和自由，只给他们带来贫穷与绝望。他们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可他们做了些什么？他们只会盲目采取政策，目的是要一直掌握大权，所以越南到现在还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这一点我们一直都很明白。你没看到吗？一群又一群的越南人乘船逃离越南，就是想到其他地方寻找希望。应该听听这些人怎么说的：政府给他们带来了痛苦，他们就抛弃少得可怜的财产，冒着生命危险，他们都是为了逃离悲惨的生活。"

然而，尼克松相信，虽然我们失败了，还是实现了一部分目标。至少在十多年里，我们保护了在该地区的朋友与盟国的自由。更重要的是，我们遏制了北越的势力。一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我们为该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赢得了宝贵时间，他们得以巩固自己的政权，有些国家获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

回顾往事，尼克松清晰地看到，如果当时采用更谨慎、在军事上更可行的策略，现在的越南就会是另一个模样。在肯尼迪和约翰逊当政时，没有为部队确立一个明确的军事使命。他们把冲突看作是南越的内战，只要镇压南越共产党游击队，推进经济发展，就可以解决冲突。实际上，游击队只是北越征服西贡的策略。结果美国在南方部署兵力，制止暴乱，却听任

北部为敌人提供兵力和物资。这一政策让美国的军事力量永远疲于奔命:这样的冲突,北方可以永远搞下去,而美国人民绝对是很快就失去了耐心。

尼克松认为,方法之所以不正确,都是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过错。麦克纳马拉是肯尼迪和约翰逊的国防部长,是越战的总设计师。1992年11月14日,尼克松跟我说:"我对麦克纳马拉没什么好感。他鬼精,可是又傲慢,又自私,所以看不清形势。他是典型的上层知识分子,冷漠而卑鄙。"

"也是最优秀、最聪明的一个。"我说。

尼克松冷笑了一下:"最优秀、最聪明。那都是肯尼迪的屁话,拜托了吧。麦克纳马拉很精,可并不意味着他会打仗。他在越南搞了个什么渐进式战略,把战争耗得不成样子,最后让我来收拾这个烂摊子。可最让我心烦的是他不忠心。没有约翰逊他就什么都不是,可他居然跟约翰逊翻脸。我们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派他去世界银行,他在那里屁事没做。都是基辛格提议的,以为这样可以稍稍平息对我们的批评,真是错得不能再错了。"

尼克松就任总统后,他的政策旨在扭转麦克纳马拉的战略,集中力量,切断北方输送到南方的部队和装备,装备并训练西贡部队打地面战争。他认为,主要是因为肯尼迪的政策不对,没能从战争开始时就这样做。肯尼迪政府帮助南越策划了政变,推翻了政府,导致吴庭艳总统被杀,使南越的局势变得很不稳定,此后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和军事混乱。为了避免失败,约翰逊被迫大力干涉。

"约翰逊当然得增加我们的投入。那些批评我的人根本不懂得其中的道理。"1991年2月2日,尼克松说道,"我们并

没有使战争恶化;我们不过是通过逐步撤军,加上其他战略,慢慢地结束战争。说什么使战争恶化,那是没有的事。"

尼克松在1969年任职的时候,重新指导美国的策略,打击柬埔寨和老挝的共产党指挥基地和补给线,轰炸北越接收苏联物资的港口,轰炸北越通往中国的铁道,执行训练和装备南越军队的计划,使他们可以接替美国部队战斗。这些措施使他得以减少直至最终结束我们的战争投入。

1970年4月,尼克松决定攻打柬埔寨的避难所,因为正是从这些地方,北越对美国部队展开了游击战争。批评尼克松的人声称,他的决定扩大了战争。尼克松指出,这些人也是不懂得其中的道理。当时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建议铲除这些避难所,就是为了保护美国部队和南越盟军的将士。尼克松接受了建议。对两个最大的避难所的最初打击达到了预计的目标,可是却激起了公众的强烈抗议,但尼克松还是决定继续攻击剩下的避难所。他说,既然已经遭人指责了,再铲除六个地点,没有什么分别。行动十分成功,共产党放弃了计划,当年不再发动进攻。尼克松认为他并没有扩大战争,而是在战争的当前范围内采取了一个必要的步骤。

"说什么扩大战争,真伪善,我可真受不了他们。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我们在柬埔寨的做法完全正确。"1991年6月13日,尼克松这样说道,"敌人很聪明,他们把冲突转移到越南境外,我们必须追击他们,不然会损失更多人。说什么因为我们轰炸那些通往越南的补给线才出现红色高棉,这是越南问题中再荒唐不过的理论了。那群疯子在那边胡说八道,歪曲了事实。不!我们没有促成红色高棉的产生,我们没有扩大战争。是敌人把战争拉出境外,不是我们。说

我们是非正义的一边，这就歪曲了我们的行动，我们的做法是正确的。就是这么回事。”

尼克松认为，在有关战争与和平的重大问题中，道义占有特殊的地位。若想打好这场战争，他必须获得国人的支持；若想获得他所需要的支持，他必须让大家知道，这是为了正义的政治目的而战，采用的是正确的军事手段，只有这时他才可以把士兵派往战场。“必须是正义事业，”1991 年 9 月 9 日，尼克松这样说道，“采用的战略战术必须最大限度地减少公民的痛苦，而且必须有取胜的把握。不然哪个总统敢开战？”

我们介入越南事务是否符合道义，成了公众辩论的中心问题。反战积极分子争论说，我们的参与支撑了南越和柬埔寨高压统治的腐败政府，如果我们无条件撤离，这里的人民会生活得更好。有的人积极地支持共产党，大多数则认为我们的盟国不值得保卫。

尼克松否定了这些观点。他相信，虽然这些国家并不代表完美的民主和人权，但只要看一看我们走了以后那里发生的事情，就可以消除疑虑，可以让人认定，我们从事的是正义事业。在越南，北越军队杀了数万人，60 万南越人在逃走的时候死在了南海。我们打仗就是为了避免出现某些危机，可是我们失败后，这些危机偏偏就爆发了，例如柬埔寨的大屠杀，越南人乘船出逃事件和“劳教营”。“反共战争中死的人比共产党统治的和平时期死的人少得多。”他说。他在看到柬埔寨的大屠杀和越南人逃亡时的恐怖情景时，觉得可以对我们干预越南事务作出结论性的道德评判了：正如里根所说的，这是一个“光荣的事业”。

印度支那被攻克后，认为我们的事业不道德的人又提出，

这场战争根本打不赢。他们强调说，南越人不擅打仗，因此在1975年碰到纪律严明的北越侵略势力时，他们的国家难免崩溃。他们说，我们的政策是在拖延一场打不赢的战争，因此给人们带来了不必要的痛苦，让人怀疑我们的领导人物是马基雅弗维式的不择手段和不道德。

尼克松猛烈地抨击了这种论断。9月9日，我们在讨论即将出版的《只争朝夕》时，又谈起这个话题。他说："那场战争是可以打赢的。一个事件导致了某种结局，并不意味着本来就一定会出现那种结局。我们全部撤离后，经过我们的努力，我们的盟国已经可以独立生存，不需要美国的战斗部队留在那里了。我们实行战争越南化政策，就是要把南越变成具有战斗力的力量。我们当时认为，既然别无选择，只能撤军，那么可以用他们来代替我们。当然了，我们知道，他们纵然配有我们的装备，也无法像我们做得那么好。可是我们不得不走，只能如此了。另外，1972年他们的地面部队阻止了北越的一次大举进攻，证实了自己的实力，所以我们以为损失是可以避免的。"

"装备和训练南越，好像我们只有这样做，才能——"

"脱身。我知道。"他回答道，"可是回顾起来，我认为1973年签订的巴黎和平协议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北越在1972年的侵略中，占领了一些南越的土地。停火条款却允许他们继续呆在那里。不过，签了那个破协议之后，我们至少还辅以军事力量，稍稍弥补了缺陷。我们继续进行空中军事威慑，以防北越入侵，而且继续为南方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我们当时顶着各种压力。可是国会很愚蠢，目光短浅，后来居然中断了资金来源，让我们在这两方面都干不成。我知道他们

压力很大,可是,我的天啊!我们没办法起威慑作用,就全完了。我们在战争中胜利了,"他指着天说,"可是我们在和平中失败了。"

"到了1973年,我们达到了政治目标:南越的独立保住了。可是到了1975年,国会的行动让我们无力实施巴黎协议,我们的盟国只好受河内侵略势力的摆布。听起来我是在指责国会,我就是在指责他们。他们的选民嚷嚷着要甩掉他们,他们的处境尴尬死了。可他们有些人就是不明白,我们有责任体面地结束一切,即使我们必须做一些在政治上不受欢迎的事情。对越开战,压力太大,把约翰逊压垮了;想把我压垮,才怪呢。"

他把双手放在膝上,重申他的观点道:"约翰逊给压垮了。"他顿了一下,"不行。作为总统,我一直都明白,我们有责任坚持自己的领导,不能让一小撮抗议的人给打垮。他们毁了我们的价值观,毁了我们的文化,我没有办法;可是想跟我们说我们不配当领袖,我就有办法制止他们。"

然而,他也承认,反战的示威游行者帮了他的忙。他在号召沉默的大多数支持他的战争策略时,那些人的抗议成为他讲话的一个参照,他通过反驳他们,有力地倡导了自己的观点。关于战争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他采用了"我们对他们"的策略,使这个桀骜不驯的尼克松取得了政治制高点。

"电视公司自己决定要不要播放示威游行的录像,这主要取决于是不是对他们有用。"1992年12月13日,尼克松说道,"他们在1968年就播放了示威游行的录像,因为他们不想让我赢。1972年他们就没有播出,因为那帮不了他们的忙。我让那些示威游行为我所用,相当成功。这些示威游行使辩

论两极化，没有他们，我还得不到这么多人的支持呢。”

我问他，在向沉默的大多数讲话的时候，示威游行者是不是他所说的敌人之一。

“绝对是。”他说道，“应该让沉默的大多数知道，不仅仅是他们被示威游行者吓坏了，他们的总统也一样。我记得很清楚，1971 年的一天，反战示威游行者包围了白宫，约翰·康纳利来了。他讲话总是直奔主题。他说：‘总统先生，这些暴民吵吵嚷嚷，粗野不堪，被这些人骚扰，实在让人不愉快。可是在政治上，有几个敌人不是什么坏事，特别是敌人不过是令人恶心的极少数。’他完全正确，我就是这样告诉他的。接着，他回想起许多年前在白宫开的一次会议。会上，罗斯福送给一群年轻的民主党人一些政治忠告。他跟他们说，一个领袖如果没有敌人，他最好创造出一些敌人来。要鼓舞你的军队，最好的办法就是号召他们对付一个具体可见的对手，忠诚就会化成熊熊烈火。”他咬紧牙关，从牙缝里挤出这些话道，“他们那时候还不懂。反战示威游行者损害了他们自己的事业。他们的呼声很高，可他们不对。这就是沉默的大多数所看到的。”

他指着我说：“要知道，不要以为那些抗议的人是和平的。在越战问题中，这是最大的误解。他们非常粗暴。记得鲍比·肯尼迪说的话吗？他说，如果让他住在城内，他会鼓动一次反叛。在朝鲜，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在同共产党打仗。可是在越南，就很难让大家了解到这一点。同样是基本战争，可是时代不同了。”

尼克松强烈地感到，人们从来都没能了解到这一点。1985 年，他在第六本书中全面地披露了他所说的“越战之

谜”,周详地解释了我们是怎样和为什么介入越战、我们如何“在战争中胜利,却又在和平中失败”。在他的十本书中,只有《不要再有越战》让他觉得非写不可。西贡被攻克十年之后,他仍然需要表明,在历史上,我们站在正义的一边。1990年他为这本书又写了一个序。他写道,他把一条反战口号拉来作书名,自以为很聪明,其实犯了个大错:“‘不要越战’,意思可以是我们不再打仗了。其实它的意思更应该是‘我们不会再失败了。’”

我们一直认为自己卓越超群,这种精神为我们提供了道德基础,使我们成为强大的世界领袖。但侵蚀这一精神的主要是这场战争,尼克松对此感到十分不安。1993年6月16日,我们一起讨论他最后的一本书《超越和平》。他说:“越战之前,我们一直是世界领袖。关键是我们是否愿意继续当下去。当然了,到了战后,你想在国外做点什么,再也没有什么人支持你了。很多人说我们失去了道义上的理由,可我不同意。我们仍然有道义上的理由,只是要在国外做点什么,已经越来越让人无法接受。所以嘛,战争结束了,可我们面临着新的难题:没有了国际使命,我们怎么才能团结在一起。本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达到了这个目的。接着越战把什么都搞糟了。它强迫我们审视自己。要想办法把我们团结起来,让我们为一个共同的事业而奋斗,我们实在不能再到国外去寻找这样的目标了。”

这个主题就出现在《超越和平》一书里。尼克松准备书稿时,努力使事实与提供事实的人保持距离。1993年9月4日,我走进他的书房,见他从书桌后站起身来,轻轻地敲着一部分书稿说道:“我跟你说,我很担心。”他走到房子中间,“我

们的评论家会理直气壮地说：'这家伙是什么东西呀，居然敢在这里谈论精神危机。精神危机，还不是他的越战造成的？'他们一直在指责我们，可那个该死的东西是继承来的，他们不应该指责我们。还有水门事件，这当然也是越战的产物。现在我们知道了，早在冷战结束之前，在水门事件之前，在战争之前，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危机就已经埋下了种子。价值观的崩溃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当然了，越战和水门事件加剧了崩溃，这一点毫无疑问。"

我提出，如果他承担应负的责任，也许人们会公正地倾听他的申述。他笑了："公正？我想在我整个政治生涯中，根本没有见到过公正。不，我不求什么公正，我只是想讨论一下，整个价值观念这东西是怎么崩溃的。有人以为美国在60年代以后好多了，这简直是一派胡言。那次文化革命的破坏性极强。"战争和水门事件催发了的愤世疾俗的情绪和文化的覆没，而两个事件都与他联系在一起，他知道人们会指责他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尼克松本人是传统价值观念的体现，而他将永远和它们的沦丧联系在一起。

1992年，比尔·克林顿当选为总统。在尼克松看来，这标志着反对越战的人最终取得了胜利。克林顿在国内外反对越战，并且积极地采取措施逃避兵役。他在竞选时对此含糊其词，这使他在战争中的行为越发显得不光彩。尼克松认为，最高统帅应该具有军事经验，或者至少，他不应该谴责军事行动，不应该主动地回避服兵役的号召。他坚信，由于逃避兵役问题，候选人的资格变得不合法，这足以取消他的候选人资格。

"要面对现实。有机会的话，几乎每个人都会逃避兵役。

战争残忍,没有人愿意让人打死,每个人都会撒点谎。可克林顿太不老实了。越战时代的那一代人都是些惯坏的黄口小儿,可他对自己的出身问题一直都不老实,他会吃苦头的。”1992年9月9日,尼克松说,“他的很多顾问都是反越战派的杂种,跟他是一路货色。等着瞧吧:将来内阁全是一群不负责任的人,跟他一样。”

正如尼克松所见,比尔·克林顿年轻时跟总统的政策唱反调;现在比尔·克林顿担任总统,轮到别人跟他唱反调了,这时他就会深切地体会到,总统们总要作出一些痛苦的决定,紧接着,他将体会到,这些决定在是非道德方面模棱两可。1993年7月26日,克林顿对一个诘问他的人大发脾气,责骂他举止无礼,说这就是美国现在的毛病。尼克松看着这一切,感到有些好笑。

“有意思吧?”他问我,“想想看,当时他和那伙人一起抗议战争,非常无礼。现在他的反应倒很传统。”尼克松认为,克林顿之所以反对战争,倒不是从良心上反对它,主要是考虑到他自己将来的私利。现在他居然能够竞选总统,而且还能获胜。尼克松不由得认为,反正统文化的革命已经兜了个圈子回到了原地,它所造成的破坏比他所预料的更加严重。

1992年11月11日,我从他的办公室门前走过时,他把我叫住:“莫尼卡,进来一会儿好吗?”我走进去,关上门,坐在前总统的面前。他的手指转着钢笔:“我还是不能相信克林顿当选了。我的意思是,我能相信,可我不愿意相信。我在《时代周刊》或其他什么地方读到过,克林顿跟人家‘柔和地’说:‘如果我当选了,越战的问题就结案了。’你觉得怎样?那些可怜的家伙从贫民窟里出来,被打死在战场上,可克林顿却当选

总统了。我觉得太难接受了。人们老在谈公理。嗨，在现在的政治舞台上，哪里还有公理可言。"

我问他："克林顿在退伍军人节上发表的讲话，不知您听了吗？他主要在说要全面统计战俘以及在战斗中失踪的人员。"

他犀利地看了我一眼，露出了怀疑的神情："他是这么说的吗？"

"是的。"我答道。

尼克松发了脾气："新闻界太伪善了，老是护着他逃避兵役的事情！真丢脸啊！这家伙太肆无忌惮了。他竟选获胜了，这说明你尽可以反对他妈的战争，没关系。我们支持的一切，我们为之奋斗的一切，全都完蛋了。"

对于尼克松来说，越战不仅是毁灭性的军事和政治事件，而且是美国20世纪末关键的文化转折点。是与非，善与恶，自由与专制，道德与非道德，信仰与怀疑，传统与反传统，无不经受着考验。从各个方面来看，越战似乎奖励了社会上的非、恶、专制、非道德、怀疑和反传统。据尼克松看来，越战的一个弥天大罪就是，虚幻的希望、虚空的理想以及虚假的预言误导了整个国家，使它走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道路。如果说国家因为越战而失去了纯真，他相信，这份纯真将永远地失去。

如果说克林顿的当选关上了越战之门，参议院重新调查战俘和在战斗中失踪的人员却再一次打开了这扇门。这个问题是在1992年6月16日第一次受到人们注意的。当时，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华盛顿与布什总统进行首脑会谈，他提到说苏联仍然关押着一些越南战俘。听了这个消息，尼克松的心情很复杂。"叶利钦总的来说是个负责的家伙，可我不知道

他现在提这事干什么。这对布什有利，他可以乘机闹腾一下。叶利钦可真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后患无穷。现在参议院可能不会给他提供援助了。我知道他想落个清白，让他们在决定是否给俄罗斯提供援助时可以轻松投票，不过这也许会适得其反。我不敢保证每个参议院成员都能顾全大局。他们陷入芝麻大点儿的事情里，不懂得高瞻远瞩。如果俄罗斯在民主之战中失败，战俘的事也就没戏了。”

战俘和战斗中失踪的人员的问题让他恼怒。最初是一股强烈地反对美国卷入战争的势头，接着是水门事件，这两件事让他无法实施巴黎和平协议。1972年，反战协议几乎得到通过时，这股势头特别明显。到了1973年，也就是水门事件成为焦点的三个月之前，众议院和参议院民主党的核心小组投票，以绝大多数赞成的票数决定撤军以换取战俘。尼克松承认，这股势头这么强大，他完全是毫无准备的。美国在12年的奋斗中，牺牲了50多万人的生命，终于在越南赢得了公正与和平。对于那些士兵用生命换来的一切，美国现在居然会不以为然，这让尼克松觉得实在是不可思议。

他知道，即使在撤军之后，那些反对美国卷入战争的人仍然会反对他的政策。但他没有料到，想要从他的政治盟国那里获得支持也是难上加难。让他始料不及的是，鸽派强烈地反对他，鹰派无动于衷地保持沉默，两者加起来，于1973年促成国会通过了反战议案。美国再也无法反击北越，对北越的最后的威慑力消除了，尼克松再也没有机会和平地解决越南战争，也无法周密地统计战斗中失踪的人员和战俘的数字。

1992年夏天，参议院选定了调查战俘和在战斗中失踪人员事务委员会。在参议员约翰·凯利的带领下，委员会调查尼

克松政府是否为了取得和平协议,将战俘丢在越南不管、其程度如何。尼克松和基辛格愤怒至极。自从战争结束以来,他们一直在宣告,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们不曾故意把战俘扔在越南不管,只要是能够统计到的人,全部已经带回美国,没有牺牲任何一个兵将。凯利委员会正在挖掘证据,证明他们在说谎。

8月10日,前国务卿基辛格气急败坏地给他打来电话。“基辛格气疯了。”他谈完话后跟我说道,“他很担忧这个凯利委员会,认为我们应该站出来说话。我不知道值不值得这样做。调查研究、不择手段地搜罗证据,那不过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观念不同罢了。他们的目的是想证明克林顿在越战中的行为是对的,免得他难堪,这就是他们的真正目的。我可不想掺和进去。

“可他们找错了地方,什么都没有。我不知道亨利干嘛这么生气。我们在那件事情上做得光明磊落。他说他要上电视,跟大家说我们的政府之所以延长战争,并不是为了把战俘当筹码。你能想出这么愤怒的话吗?也难怪他这么生气,可他没有必要担忧他们会找出什么来,因为他们提的那些事,我们没干。谁知道亨利会说些什么,可至少他开始和他们较量了。”

在战后的和平谈判中,基辛格制定条款,争取战俘安全回国。他在越战中为美国立下了功劳,凯利委员会却对他横加指责,这不仅不公平,而且不负责任,因此他立刻作出反应。他进行多次访谈,谴责委员会的行动,发誓说委员会永远都找不出能够证明尼克松政府把美国人丢在南越不管的证据。他把访谈的记录材料发给在这个问题上有影响的每个人,包括

尼克松。基辛格在和他以前的上司谈话之后的第二天，出现在晚间热线节目上，为尼克松政府的越战失踪人员和战俘政策进行有力的辩护。

“我们所以进行谈判，”他这样开头道，“是因为我们不想把那些仰仗我们的承诺的越南人交到共产党手里。有人说我们故意把美国人交到共产党手里，简单太无耻了。这种说法损害了国家利益。哪一个美国官员会故意把美国人交到共产党手里？这对于他们的亲人来说太残酷了。我不接受……参议员凯利所暗示的一切。他本人当时曾参加过示威游行，反对战争。”

他继续说：“有记录表明，他们违反了协议，而我从3月份起就建议炮击北越。5月份，我们进行了又一轮谈判，就遣还战俘和统计战斗中的失踪人员问题增加了三个条款。我们本来可以利用那个协议，执行新增加的三个条款。可是两个星期后，国会禁止在印度支那及其附近地区进行任何军事行动。协议签订的两个月后，国会完全中断了经济资助。”

凯利同时出现在屏幕上。他责问道：“基辛格先生，您是否曾经来到国会跟他们说：‘我这里有一份名单，上面还有80个人，此外，我们相信还有其他没有统计在内的人员；在我们还没有彻底统计之前，你们不能通过这个决议。’”

基辛格回答得很有分寸：“1973年6月18日，我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新协议，同时指出，对于战斗中的失踪人员的数字统计，我们还很不满意，因此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进行新一轮的谈判。我相信，我在私下里也表示过，由于种种原因，我对这项决议的执行很不满意。我知道尼克松总统向国会递交了一份正式的信函……共产党是否关押着战俘，我

可不知道,不过很有可能。参议员凯利知道,他打电话给我时,我跟他说,如果他把这个事情放一放,那他就算是作出重大贡献了。越南人是否违反协议,是否没有人性地、恶毒地关押战俘,我想他该把这类问题放一放了。我真没想到,美国官员居然会成为这类调查的受害者。"

8月13日,尼克松冲我挥了挥基辛格在晚间热线的访谈材料。"嘿!基辛格可让他们好受了。我早知道他会的。"他笑着说道,"他完全正确。他们暗示我们把战俘当作谈判的筹码,简直无耻透了。我跟律师杰克·米勒谈论了传唤的事,他说他们可以传唤我。天啊!谁知道呢。他们真是无中生有,搞得一团糟。"尼克松第一次显出着急的样子,"这么简单的事情。他们只需要把手头那件蠢事放一放,好好想一想,就全都清楚了。我们打这个仗,不就是为了保护南越人,让他们不受共产主义恐怖的威胁吗?那么我们当然会进一步保护在那里的美国人。"

第二天我们在他的办公室见面。基辛格打来电话。他们的谈话很短。他放回电话,双手在空中一挥,说道:"亨利着急死了。什么鬼啊!如果要我提供证词,我会去的。我会把我所知道的统统告诉他们,可我没什么好说的。"

"他们期望你会滔滔不绝地说。"我说道。

"他妈的!我可没有他们想要的回答。亨利也没有。我们做过的,就是我们已经说过的。他们怎么能从石头里榨出血来呢?"如果在参议院的电视听证会上,他们逼迫他谈论这个一触即发的问题,他就要跟大家说明:战后的档案里什么都有,他们可以去查查看,除此之外,他没什么好补充的了。

9月19日,他对委员会的行动已经失去了耐心。这天早

上，我走进他的办公室，见他正面朝窗外站着。他听到了我的关门声后，转过身来，说道："我太生气了。这个他妈的战俘问题把人折腾死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谨慎态度已经消失，"克林顿和他那伙人在越战中无视对国家的责任。那些人老揪着这事不放，无非是要为克林顿他们辩护。可现在把我和基辛格牵扯进来，简直是不可饶恕。"

尼克松的怒气又转到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凯利的身上："瞧他们那个头目！凯利！我的天！就是这家伙，手里举着个牌子到白宫前面抗议，说那是他的权利！而我呢，一边卖力地要把这个仗打完，好让那些人不会白死，一边还要应付凯利、还有克林顿。

"所有这些人都反对战争，反对尼克松。现在他们一直嚷嚷说我们当时不够硬，没有把所有的战俘都弄回来。我们确实把他们都弄回来了；只不过是没有统计出所有战斗中的失踪人员而已。我在 1973 年 3 月 29 日的讲话里已经提到这一点了。难道他们想让我们当时再轰炸一次吗？12 月份的轰炸几乎都没办法进行，更不用说再一轮的轰炸了。就是这些人要求停止轰炸，他们死也不会同意再给予我们经济、政治和军事帮助。

"我跟你说，黑格和基辛格要去提供证词，我真松了一口气。他们会挫败委员会的；他们会整死他们。我跟亨利说，他的观点和我的观点必须保持一致，他向我保证他会的。不过，他可会保护自己了：他强烈地赞成 12 月份的轰炸计划，等我们被人批评的时候，他就撤退了。接着，等轰炸成功，他又支持它了。他声称他是在我发表讲话的前一天来白宫的；我查了一下日记，他是前两天来的，还叫斯考克罗夫特来跟我商

谈。那时,斯考克罗夫特连眨一下眼皮都要跟基辛格汇报。没关系,基辛格做事就是这样。不过,不像他自己所说的,基辛格确实知道讲话的内容。他也很清楚我决定一定要轰炸。”

两天后,委员会的听证开始了,前国防部长詹姆斯·斯莱辛格和梅尔文·拉尔德提出了证词。尼克松听了他们的证词后,大发脾气。他冲进自己的办公室,砰的一声把门关上,在屋里走了一圈,说道:“他们的证词说我们在战俘问题上可以做得更好,暗示我们其实知道得更多。我真不敢相信他们的证词那么苍白无力。他们一心要保护自己,可有啥好怕的?他们这样回答问题又有什么好处?妈的,只会让我的形象更糟。我们的人没有几个是他妈的好东西。他们不敢为我们说话。黑格跟他们说我在讲话里提到过战俘和失踪人员,可凯利说:‘不错,可是尼克松没有强调这一点。’强调?天啊,他们还想要我干什么?我把战争结束了,把能够带回来的人全都带回来了——也就是能够统计到的每一个人。我的上帝啊!你能相信吗?”他摇了摇头,“唉,至少黑格跟他们较量了,基辛格也气坏了。他明天会宰了他们,我知道我可以相信他。”

正如尼克松所料,1992 年 9 月 22 日,基辛格为参议院选定的调查战俘和失踪人员事务委员会提供的证词非常有力。委员会提出,尼克松政府不仅故意把美国士兵抛下不管,而且本可以对在越南关押战俘和失踪人员进行更充分的统计。基辛格的证词将这些论调统统击垮。

“委员会……理应向美国人民解释这个简单的真相。”他朗声说道,“某些战俘可能会——我重复一遍,是可能——因为敌方违反庄严的承诺而被他们滞留在那里。但美国官员不会故意或因疏忽而漏掉任何一个战俘。”基辛格一开始就清楚

明白地阐明这些事实，接着，他为政府的政策进行了动人的辩护。

“抗议者不断地折磨我们，新闻界抨击我们，无数个国会决议批评我们，都在耻笑我们的国家荣誉观念。原因只有一个：我们没有更无条件地撤军。

“今天的调查这样批评我们，可当时谁也没有提过这种话。我们当时经受的压力与今天的完全相反——指责我们作出的让步不够多，说我们应该单方面撤军，期望那些关押战俘的人会出于慈悲心肠释放他们。”

基辛格转而谈到委员会最关心的问题：“已知的最后一批战俘是在1973年3月28日被释放的。有些人透露说，尼克松及其顾问一方面宣布所有的战俘已经释放，另一方面却知道还有一部分战俘仍然滞留在越南。可是他们十分狡猾，故意不提尼克松总统的声明：‘尚有一些疑难问题。协议的条款要求全面统计在印度支那战斗中失踪的人员……这个条款尚未执行。……’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全部事实。没有发现也不可能再发现什么与此相反的东西。”

基辛格接下去的话既犀利，又很有说服力：“1973年，我们付出了艰苦的努力进行统计。20年后，有人指控说我们知道仍有一些战俘滞留在越南，而我们当时的努力竟然被歪曲为所谓的‘证据’，这实在是天大的讽刺。

“还有，有人说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多。当时，河内不断违反协议，我同意进行军事反击。总统认为，总的来说，最好再进行一轮谈判。当然了，在政治上，美国没有什么人支持采取更强硬的措施。”

最后，他进行辩护，提出了挑战：“巴黎协议规定的义务清

楚无误，具有约束力，要求统计整个印度支那的所有战俘并全部返还。如果越南人违反了这些条款，那不是因为这些有责任心的美国官员的遗漏，而是因为我们被夺去了武器，我们原本可以用这些武器实施我们的义务。

“我为我和我的同事在千辛万苦的情形下所做的一切感到骄傲。我想反问抨击协议的人，在类似的情形下，他们究竟要怎么做才能获得更好的结果。”

基辛格的证词十分有效，委员会不再过分追查这个事情。基辛格的反驳挫败了他们，而且他们没能证明他的声明是错误的，这使整个事件显得虎头蛇尾，令人扫兴。即使传唤尼克松，他的证词也会同基辛格的相似。委员会不敢无中生有地捏造丑闻，决定还是不传唤他，但表示希望听一听白宫的录音带精选。

一开始，凯利委员会想获得尼克松的录音带，希望从中找到证据，证明在更快地释放战俘和更全面地统计在越南被关押的战俘和失踪的人员方面，尼克松和基辛格或者他们中的某个人对美国公众有所隐瞒。委员会威胁要传用相关的录音带，但遭到了尼克松的抵制，因此不再逼迫。然而，人们总觉得新的录音带很有可能会公开，一时间，流言蜚语满天飞，说录音带里藏有可以指控他们的证据。

9月26日，尼克松没精打采地说道：“我到现在还在跟那个可笑的委员会斗，他们还在宣称我在录音带上说了些可怕的东西。尼克松太太觉得不可思议。他们说我在其中一个录音带上说：‘咱们把他们(战俘)先搁下，把越战结束了吧。’莫尼卡，我在那些录音带上说了很多话，可我永远也不会说这种话。那些录音带上没有这一类的评论，哪里都没有。原话其

实是，我们在考虑是发表一个关于越战的讲话，还是关于水门事件的讲话，我决定还是发表一个关于越战的讲话，然后就把这件事了结了。他们断章取义。你看，他们刻意歪曲我的录音，捏造事实。”

不像水门事件的录音带，这些录音带不是犯罪调查的一部分，不能传用。“传用这些录音带根本没有法律依据。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获胜，所以他们不敢再逼了。我是不想闹出法规方面的危机，”他顿了一下，“再一次。”

基辛格在委员会面前辩护的三天后，尼克松就那些录音带问题，给他的律师杰克·米勒和斯坦·莫尔顿森写了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很长，语调很坚定。他在听完听证会之后，作出了两个决定：第一，他不再为委员会提供任何录音带；第二，虽然前总统福特已经提出要和凯利以及少数委员会首席委员谈话，他决定不见他们。他认为，不管是跟他们谈话，还是把任何一个录音带交给他们都是严重的错误。他预计委员会不会满足于只拿一个录音带，而且这样做会为将来类似的行动开一个先例。

水门事件的阴影笼罩着他下面的话。他写道，他已经跟斯考克罗夫特谈过，“在录音带的问题上要坚持原则”。由于斯考克罗夫特也参与了这次谈话，他建议尼克松把这些录音带列为“行政磋商”，因为有些文件和材料涉及到作出决定的过程而不是决定本身，这个用语可以为这些文件和材料保密。他写道，那些录音带正合这个标准，斯考克罗夫特也表示他与尼克松的看法相同。不管国家安全局是否赞成这一观点，他决定在这个问题上毫不退让。“18 年前，我就是这样摔跤的。当时特别检查官列奥·雅沃斯基跟阿尔·黑格说，他需要这个

录音带，需要那个录音带。可我们现在知道，那样做根本行不通！"

他接着谈到在公开场合要控制住这件事情。他提出，如果委员会要求交出录音带，他会指出，行政磋商的常规不但有力地保护他的所有书面材料，而且更有力地保护那些录音带。至于委员会要求面谈，他将依据"杜鲁门先例"表示拒绝。他将提醒大家注意这个先例，包括福特和里根的律师，以及白宫或者司法部里适当的人；必要时，白宫和司法部里适当的人都要通知到。

他引用了几个令人安心的谈话，证明他的防御姿态是有道理的。他写道，他已经跟基辛格和汉克·布朗谈过。前者在委员会面前的表现非常出色，参议院里的其他成员对他作出了肯定的评价。后者却是委员会的一个成员，他告诉尼克松"我们赢了"。

此外，尼克松指出，布朗提到多尔曾在委员会前作证，说多尔在 1973 年 6 月提出修正案，以便全面统计战俘和失踪人员，但参议员们投票反对了这个修正案。多尔要求传唤他们来，说说当时为什么反对。他写道，多尔鼓励他坚定地反对委员会，而委员会的行为也越来越让他相信，他们处于弱势。他提醒律师说，多尔是个"讲原则的人。在选举年里，他不会愚蠢地支持他认为会失败的观点"。他打电话告诉尼克松，说他将不屈不挠地反对参议院的这个委员会，还说由于委员会成员让他出来作证，凯利跟他们"大吵大闹"。

在备忘录的结尾，尼克松来了个回马枪。他跟他的律师说，他考虑他要说的话只有几句，即当时负责战俘及失踪人员谈判的是基辛格，他在 3 月 29 日的声明完全正确，并且他也

没什么可说的了。

尼克松跟委员会所说的话将会是一模一样,这样一来,如果让他出来作证,他们不可能从中再挖出新闻。1973年的国会、反战运动以及他们在新闻界的支持者让尼克松和基辛格束手无策,没能实施巴黎协议,包括关于战俘和失踪人员的条款。因此,国会必须在两个方面负有一定责任:一是越南可能没有遣还的所有美国人,二是越南的统治者后来屠杀了200多万人。有人问,为什么20年后,美国仍然在等待越南政府统计美国士兵。对此,尼克松回答,国会在跟这个只尊重武力的政权打交道时,只相信外交策略,不肯用武力作为保障。

1992年的总统大选日子越来越近了,尼克松越来越担忧,不知克林顿的胜利对越战的遗产会产生什么影响。"从凯利小组那里还没有听到其他什么消息,"10月10日他说道,"但我很难想象我的事已经了结了。新闻界是红脸也唱,白脸也唱,可在这个问题上就行不通了。布什揪住克林顿的服兵役问题,或者说是没有服兵役的问题,于是他们就抨击他,宣称越战已经是昨天的事情了;但他们又想就这些听证会大造舆论,说越战是今天的事情。这可不行。如果布什输了,克林顿的胜利将抹去1972年的胜利,因为这就相当于公民们对越战进行复决投票。克林顿的胜利就像是在告诉大家,尽管反对战争好了,没有关系。这就颠倒黑白了。"他的眼神里流露出一阵厌恶,"我就是无法接受这种现实:我所为之奋斗的一切,我们在战争方面所取得的一切……"他停住了,两条胳膊在头上一挥,非常失落的样子,"一次选举后,就全部消失了。"

虽然凯利委员会缺乏可信的证据给尼克松定罪,但仍然

加紧调查。1992年末，凯利公开表示，他仍然有可能传唤尼克松作证。尼克松仍然不肯低头："他妈的。我真不相信，说了这么多，他们怎么还揪着不放。我会告诉他们，基辛格已经提供证词了，我没有什么好补充的。他们还想干什么？总不能逼我说些我不知道的东西吧？如果我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就会结束他们对我的盘问。整个委员会，除了几个人以外，全都是浑蛋。我知道我以前说过这话，可我现在还是要说，我们的人没几个好东西。参议员约翰·麦克凯恩和汉克·布朗还不错，他们精明强悍，可我想他们并不理解这对我和基辛格来说有什么历史意义。麦克凯恩在那场该死的战争中受过苦，他也许会明白，是福特搞成这个烂摊子。前总统们要组成一个统一战线——里根不会跟他们合作的，其他人也不会——可就福特答应了，所以我们现在都得过这个关。基辛格可不想交出任何一个录音带，这会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录音带上的其他事情就会公布于众了。我们都知道那会带来多少麻烦。"

凯利委员会没有传唤尼克松及其白宫录音带，但他们呈上一份长长的问卷调查，上面囊括了战俘问题的方方面面。尼克松翻了翻那几页问卷调查，把它扔到书桌上，他一想到要花时间回答这些问题就很不耐烦。过了一会儿，他又把它拿起来，这一回更仔细地查看着上面的问题。"嗨，我想，回答纸上的这些问题总比亲自去那边回答强吧。"他从书桌的上抽屉里取出一个小录音机，检查了一下里面的电池。

"检查检查，"他对着麦克风嘟囔着，倒回磁带，"好了，"他拿着那机器指着问卷说道，"我要口述这些问题的回答了。可我痛恨在这上面花时间。"整整一天，他一边考虑着这些问题，一边把回答录下来，做完之后，就交给他的律师评估。

"律师说我回答得太尖刻了,说应该缓和一些。"12 月 28 日他告诉我,"这些回答太蛮横。想想看吧!凯利小组不断地折磨失踪人员的亲人,还居然提出说,一个总统会故意守住消息不让人知道。我的上帝啊!我的回答是应该蛮横的。这些问题就像是'你准备什么时候才不打老婆?'一类的问题。那么,你看看吧。"

他把一份问卷和回答递给我,一边翻着一边指着页面说:"这些越战问题是最侮辱人的问题,真是闻所未闻。我就要跟他们较量,尤其是凯利——那个杂种当时把他的奖章从篱笆的那头扔向白宫。我在那里努力结束那场该死的战争,好让他服的兵役不会白搭,可他居然把奖章扔向我。所以我的回答才会强硬。那又怎么样?"他顿了一下,"唉,也许我会让一些人软下来,可没办法让那些重要的人物软下来。"

他看着我读那些回答,说:"至于我反对关系正常化的一些话,我想还是不要去掉的好。我强烈地感到,我们不能跟越南搞关系正常化,除非那个残忍的政权倒了。我打算保留这些评论。我知道那些自由派人士不爱听,可是太糟了。虽然忠言逆耳,他们还是需要听一听正确的话。我要叫人把报告亲手交给参议院所有正直的成员,不单单给委员会主席——他只会用作自私的目的。要和我们的人搞一点儿让他们始料不及的事,特别是跟多尔。这很重要。"

他从我手里拿过问卷调查,一页一页地查找某个回答。"这里。我原来写道:'国会与美国人民不愿意支持为释放战俘而加强轰炸。'但我把它改成仅仅是'国会'。美国人民本来是会支持的。"他放下问卷调查,"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一群杂种。他们搞了个标题:尼克松政府欺骗美国人民。一派胡

言,蛊惑人心。但焉知非福呢。至少我有机会说出真相,逮住所有反对战争的人。"他笑了,"这才是真正目的,对吧?"

新年的第二天,他决定透露他对委员会的回答,使之成为官方档案的一部分。这一天,基辛格又焦急地打来电话。

"显然,他以为自己击败了委员会,没错,可他们还不满意,又找上门来了。"他告诉我说,"在这个事情上,指甲大点儿的事他都担优。没有人会读整个报告的——总共有100多页呢——记者只会读一读提要。他担心他们会拿里面的芝麻事大做文章。我要让他高兴一些,就提醒他,这是他通知我巴黎和谈有所突破的20周年纪念,当时他跟我说那是我的生日礼物。这都写在《尼克松回忆录》里。但想想我们20年前所做的一切,他们现在却又提起什么'谁杀了约翰?'之类的问题。我倒想通过我们的回答先压住他们,我们不需要过分渲染这事。"他摇了摇头,"嗨,这可不错。"

尼克松的回答显然让委员会哑口无言。他从某个渠道得知,凯利透露说,他们最早的报告是收到尼克松的回答之前草拟的,报告上说尼克松隐瞒战俘和失踪人员的信息;但报告被尼克松尖锐的回答"驳回"了。尼克松不无满意地说:"游戏就是该这么玩。"

1993年1月,凯利调查委员会公布报告,但没有引起新闻界的注意。报告没有提供新的证据,没有明确的结论,也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这场调查主要是想找出些轰动的事,可根本不存在这类东西。尼克松和基辛格被证明是无辜的。尼克松并不感到奇怪,可也松了一口气。没有什么新闻媒体报导这件事,尼克松感到很满意。

"《华盛顿邮报》会说点什么的,可我根本不在乎。"他大声

地说道,"整个事情无中生有。我和基辛格尽可能地统计了在那里的每一个士兵,尽快把他们弄回来,这个混账委员会却暗示可能是另一个样子的,简直不可饶恕。你该看到,反战情绪有多么浓,多么普遍;这些人毫不让步,自己反而不明白国家怎么没能自动治愈创伤。"

尼克松回答了凯利委员会的问题后,感到有些苦涩,又非常失望。我们对越南的武装介入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活动造成了很大的裂缝,至今没有愈合,战俘事件就是一个症状。尼克松知道自己总是反战人士的攻击目标。对他的政策进行合法的辩论是合情合理的;没有根据地搞政治迫害却毫无道理。在尼克松看来,凯利委员会毫无理智。他们认定总统危害了关押在越南的美国人的生命,希望揭露其中的阴谋。他们鼓励人们大胆猜测:总统再一次严重地损害了国家。然而,他们找不出任何证据。

1992年年底,尼克松交给我一份最新的民意测验,上面60%的人说他们相信美国对越南的介入是错误的。尼克松扮了个怪相说:"都是该死的新闻界干的好事。他们死咬着越战不放,每年都有新花样,都是'越战错了'这个主题的变奏,真是冷酷无情。这样一来,你再看看这个民意测验,你还能指望它会符合事实?"

尼克松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反战情绪及其相应的文化变动是美国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全扭转这一局面只是一种不现实的期望。尼克松只能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战所引发的价值观和愤世嫉俗的情绪会有所淡薄。国外的战争已经结束了,但它在国内的社会残余和文化残余更持久,更广泛。尼克松说,军事战争在战场上展开,文化战争却是在美国

社会的最隐秘处进行。任何总统都改变不了它；再一次战争改变不了它；生活富足也改变不了它。只要越战所激发的价值观四处蔓延，越战的阴影就难以消散。对于尼克松来说，这是战争最大的悲剧。

一年一年过去了，某些围绕越战问题的风暴平息了，可又有一些风暴加剧了。1991年以前，美国在外交上与越南一直断绝往来。然而，有限的自由市场经济在越南的潜力越来越大，布什政府开始重新评估外交立场。1991年年底，他们通知尼克松，政府正在研究这个问题。

"现在还不是时候，"他说，"还没有什么原因能够迫使我们承认他们的合法地位，除非他们改变自己的体制。美国不去干预它，让共产主义在越南自动消亡吧。我们在那里有一个悲惨的战争史，几万名士兵在那里失去了生命。这个残暴的政权让我们丢掉这么多生命，还叫我们去承认它？这是在说什么啊？无论从道德上来说，还是从政治上来说，都不对。"

那些赞成承认越南政府的人强调，越南原来是个孤立的敌人，现在已经演变为经济上更开放、意识形态上更温和的国家，他们愿意避开过去。他们争辩说，激发美国对他们的敌意的原因已经消除：资本主义的东南亚在经济上十分强大、充满自信，而印度支那在经济上十分衰败、四分五裂；欧洲共产主义崩溃，苏联解体，美国因此在冷战中取得了胜利；1989年，越南从柬埔寨撤出几乎所有的占领军；另外，越南与中国已经达成协议，这使柬埔寨和平成为可能。

那些赞同承认越南政府的人也承认，虽然越南政府不时地进行不完整的经济改革，它仍然属于共产主义性质。几个世纪以来，越南对邻国充满敌意，让人很难忘记。不过，他们

争辩说，某些政权在意识形态上与越南政权相似，但美国并不阻止公民与他们做生意；某些政权更具有威胁，但美国仍然与他们保持外交关系。除了越南以外的东南亚国家享受着自由与富裕的生活，越南受到了吸引，特别愿意提供外交机会。美国与越南之间的关系大有希望，因为美国的援助、贸易、文化和科学技术，将大力支持越南自由派人士，使他们的国家脱离贫困，把他们从压迫中解放出来。有人争辩说，时机已成熟，美国应该宽宏大量，承认越南政府。

尼克松激烈地反对这种逻辑。大约20年来，美国对待原来的敌人的政策是有原则性的。与越南关系正常化与这一政策相悖。1992年年初，助理国务卿理查德·所罗门宣称，如果越南在战俘和在战斗中失踪的人员问题上采取合作态度的话，美国可能会同意在两年内与之恢复关系正常化。尼克松气坏了。如果美国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由稳定、开放、民主的国家组成的大社区，以促进一个更和平的世界，那么越南的情况正好表明，必须在亚洲采取传统的耐心态度，而不是急于搞关系正常化，这样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美国。

"叫我们现在承认越南政府，我想不出会有什么理由。"1992年10月24日，尼克松说道，"恐怕只有一个原因：越战中成长的一代人有偏执狂和悔恨之心，难道要将它永远奉为美国针对越南和战争的官方政策吗？"

他担心政府会推行上述计划，承认原来的敌人。1992年1月的开头几天，他为一家全国性的重要报纸的专栏版准备了一篇杂文，他在文章中表达了这一担忧。他决心一定要把文章发表出去："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该死的东西印出来。"然而，文章并没有发表。尼克松考虑到文章一旦发表，可能会产

生一些政治影响,因此将文章撕掉了。

"关于这个问题嘛,火车可能已经出站了。"1 月 11 日他说道,"我可不想拿这个问题去缠着布什,浪费我在他那里的政治资本。先放一放,看看事态如何发展。"

这篇文章写出时,尼克松对越南的观点差不多快要告一个段落了:他决定不发表它,这表明他的思想开始具有实用主义的倾向。他关于越南的新观点正在形成,因此这篇文章最后一次表达了他的旧观点。

"在这个国家,陈旧体制正奄奄一息,"他在《不要帮助河内》中写道,"西方却准备采取政策,使它在越南继续生存下去。这个发展趋势令人害怕。"

那些希望承认越南政府的人推出他们最有力的论断。他们说如果给予越南外交上的承认,将会促进越南的经济与政治改革;如果我们在建立新的关系上犹豫不决,美国就会失去贸易和投资机会,让日本和欧洲抢去。尼克松立刻谴责了这些论断,称他们在战略上站不住脚,在道德上有缺陷。

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有一个惯例:为了谴责侵略性的和高压统治的政权,在外交上不承认它们的合法地位,除非这一政策危害到西方的战略利益。他写道,河内的那些"国际歹徒"自 1975 年征服了南越以来,在那里实施残酷的恐怖统治,即使承认它的合法地位,也无法服务于美国和越南人民的利益。"

越南官员承认他们不打算使政治体制自由化,因此难民的往来仍然是"单向的。没有人愿意回去,另有几千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逃出来。"

接着,他转向美国热门的政治话题。他说,越战中失踪的

人员名单上有 2273 个美国人,但在解决这个问题时,“越南人蓄意阻挠,没有人性”。西方情报部门知道,河内很清楚有许多在战斗中失踪的人员已经死去,但他们不肯向美国官员透露。河内采用“令人毛骨悚然的残酷做法”,关于我们其他服役人员的消息,他们每隔几年透露一些。

河内是否有资格成为诸国大社区的一员呢？它不配。如果我们承认它,为河内的共产主义强硬分子提供经济援助,我们不仅“失信于”为反抗他们而战斗的南越人,而且“失信于”成千上万在越南尽忠的美国人。

目前流行的做法是把越南和中国进行类比,他摧毁了这一类比：有些人争辩说,在天安门事件之后,美国仍然与中国保持关系;在另一方面,却又孤立越南,这种做法自相矛盾。这些人错了。中国是个大国,其行动影响到美国在世界上的利益,越南却不是;中国是个核大国,越南却不是;中国共产党中有的人支持政治解放运动,越南却没有。不断往来,通过开放推进其改革进程,这只有在中国才是最佳的战略。

在文章的末了,他提出一个立足于国家利益的有力论点。我们和越南打交道的最大优势,就是通过关系正常化获得经济利益,因此应该清楚地阐明我们的条件。我们应该开门见山地让它做一些事,如在老挝实行自由选举、使越南经济非军事化、结束对原南越官员的迫害、在越南开始政治改革等等。不然的话,我们将来永远不可能对越南作出让步。如果越南拒绝妥协,它将仍然是苏联帝国之船失事后漂浮的一片残骸,我们没有必要把救生索扔给它。

尼克松希望采用一种耐心加开明的政策：不要给越南提供援助,不要去整修胡志明留下的摇摇欲坠的遗产;西方帮助

越南人民的最佳方式是等待;总有一天,它的陈旧体制会被自身的重量压垮。河内还没有进行基本改革,现在就决定关系正常化,时机尚未成熟,而且越南出现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的一天将会延期到来。现在就承认越南政府,并不像许多支持这一观点的人说的那样,会保护美国的对外政策利益。相反,这表明美国正式接受了自己在越南的失败,纵容了一小部分美国人的看法。反对越战的人和逃避服兵役的人宣称这场战争是个错误,劳而无功。我们这样做就等于间接认同了他们的各种行动。尼克松认为,应该等待非共产主义越南的出现,这才是最谨慎、最道德的战略。

尼克松热烈地捍卫对越政策的现状,但这篇文章从未见报。尼克松原来是发自肺腑地反对承认越南政府,现在则是适度地接受。如果说在承认越南政府方面,火车"已经出站",尼克松则打算呆在这列火车上。

几个星期后,帕克里特·布坎南宣布将参加竞选总统。尼克松考虑利用他作为这个问题的传声筒。2月22日,他指点我说:"布坎南凶猛顽强;他会咬着他们不放的。不过你传话给他的时候,想法让他去咬贝克而不是咬布什。让他把事情都翻出来。"然而,利用布坎南的计划并没有实施。尼克松意识到,他不能通过别人传播自己的信息,尤其是关于越南问题。如果想反对美国承认越南政府,应该自己出面。当然了,他并不准备这么做。

那一年的12月,布什打算自己承认越南,以免新总统揪出这个问题。尼克松和布什都确信,克林顿打算成为美越外交关系正常化之后第一个到河内的总统,结束越南问题,也结束他自己在战争中的行为。

"简直可耻!"12月16日,尼克松厉声说道,"我看见布什批准与越南进行商业往来,他不让克林顿来搞,我几乎吃不下早饭。他根本不明白我的意思。我知道他不想让克林顿捞到这个功劳。算了吧!克林顿是整个越南事件的耻辱。让他来打头阵,看他怎么向反对这事的越南老兵团体解释。他们镇压了一半的自己人——南越人——拿他们当二等公民看待,这又怎么说?唉,布什犯了个天大的错误。"

接着,克林顿也表示了相同的意图。这时,尼克松不是感到沮丧,而是觉得恶心透顶。2月1日,尼克松与多尔以及一小群任期未满一年的参议员共进午餐。回来后,他跟我说,他"强烈地反对与越南关系正常化;除非他们改革政府,不再滥用人权,否则,这种事情我们根本连考虑都不能考虑。克林顿居然会同意。这是因为他迫不及待地想去河内,在河内的大街上走动,接受成千上万越南人的热烈欢迎。"他扮了个怪相,"想想看!最大的越战兵役逃避者承认越南了。令人难以置信。"几个月后,他还在想着克林顿的意图。他大声地说道:"也许我们什么都不说也不对。也许我们应该公开说点儿什么,拒绝承认越南。不管那帮小丑怎么说,越南在战俘问题上没有说实话,怎么现在突然想说实话了?他们现在做的,早在20年前就该做了。我们也许会考虑在这个问题上做点儿什么,可从另一方面来说,还是让克林顿去干,然后再搞他。"

尼克松开始动摇了。对于是否承认越南的高压政权这一问题,尽管他长期采取抵制态度,但他渐渐地有些相信,越南是可以与中国进行类比的。几年以来,他提出,鼓励中国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最佳途径是两国人民和政府之间直接接触,但激发越南进行改革,最好的办法是不管它,让它的陈旧

体制自动消亡。尼克松的这种两极政策是注重实效的。尽管中国和美国的意识形态存在差异,但我们不能忽视这个国家;越南与美国的意识形态同样存在差异,但我们必须不去理睬它。然而,到了1993年年底,尼克松完全转变了自己的思路。

他的新书《超越和平》几乎完稿,他对书稿也相当满意。但他又觉得,这本书不像他以前写的那几本,没有那种有突破性的、出其不意的观点。他打算在书里至少加进一个这类观点。经过深思熟虑,他为他的《超越和平》选好了炸弹:支持与越南关系最终正常化。"说实在的,我这样做很不容易。"1994年1月15日,他一边修改草稿,一边说道,"可我还是得做。认识我的人肯定要大吃一惊,不过我阐述得很精彩。"

书中阐述了越南、古巴和北朝鲜的异同。尼克松用三个例子来论述关于越南的"惊人"理论:

> 在剩下的三个共产主义国家中(中国除外),北朝鲜经常严重威胁着韩国以及整个太平洋沿岸的和平与稳定……除非它不再构成威胁,除非它的领导人不再坚持把它变成一个低贱的国家,否则我们也只能继续把它当作一个低贱的国家对待。
>
> 越南和古巴跟北朝鲜很相似,这两个国家都是由高压政权统治着。两个国家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但都不会严重威胁国际和平。

关于越南和古巴的主要问题有:如何在最大程度上为国家利益服务,为这些国家的人民以及为世界大社区服务。所有这些问题集中为一个简单的决定:是孤立它们,还是邀请它们回到世界的大家庭中来。

尼克松以中国为例，提倡与这两个国家恢复友好关系。“在这两个国家中，”他写道：

> 越南是最轻松的选择。……加强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会带来更大的经济自由，而经济自由又会转换成巨大的压力，促进国内的政治自由。
>
> 首先要把我们与越南的政治关系同我们两国之间的经常关系分开，让我们之间的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以不同的步伐前进。即使越南政府已经尽其可能地统计了在越南战争中失踪的美国人，即使我们完全满意，但是，只要河内继续把我们的同盟——成千上万的南越人——当作二等公民对待，我们就应该继续冻结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

基于上述强硬立场，他提出下列建议：

> 我们应该遵从政府解除贸易禁令的决定，大力提倡在越南投资，把它进一步纳入全球经济。这不是鼓励越南现在的政权，而是为了加强促使它改变的力量。

取消贸易禁令，打开通往贸易和投资以及经济交往的途径，同时保证思想和信息像商品一样自由流入，这才是促进越南在政治上有所改变的最佳途径。对于古巴也是如此。尼克松提倡开放，但并不表示他的看法已经产生了永久性的转变，而是要为接下来的对越南决策定下一个基调。他仍然强烈地反对解除贸易禁令，但现在他愿意把战争丢在脑后。他这样做，不是为了替布什和其他反对越战的人辩护，而是为了提供一个思路，减轻这个必然发生的事件所带来的冲击。

尼克松担任总统时坚持打完战争的最后几年,不无讽刺意味。而现在,更具有讽刺意味的则是,尼克松作为前总统,很不情愿地支持与原来的敌人实现关系正常化。尼克松将其一生的事业致力于打倒共产主义敌人,但在争论美国的对越南政策应该如何演变时,在他自己对待共产主义的方式上,存在着原则与实效、意识形态与政策、理想主义与政治策略之间的纷争。到后来,布什政府与克林顿政府显然打算承认越南的合法地位,这时候他认定,虽然他们的这一做法让他很反感,但是,既然他无法说服他们,他就要加入他们。在越南问题上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这已经造成了重大破坏。

"在越战中成长的一代人有许多毛病,但可以用凯瑟琳·安娜·鲍尔事件来归纳。"1993 年 10 月 7 日,尼克松说道。这个女人是一个反战暴徒小团伙的成员。1970 年,她抢劫银行,开枪打死了一个警官——一个有九个孩子的父亲。她成了一个在逃犯。20 年来,她改名换姓,躲避审判。然而,在 1993 年年底,鲍尔出来投案自首。许多富有同情心的评论者大谈什么她原本是花季少年,受到了心理创伤,云云。尼克松大为反感。

"这简直是整个时代最恶心的事件了,"他说,"这个女人又不是什么误入歧途的小家伙,在某个下午和一群煽动闹事的歹徒四处乱逛,然后突然决定要抢劫银行。在她的公寓有一大堆该死的武器——步枪、手枪、短枪。"他的食指在空中指指戳戳,"她非常清楚自己在干什么。有人在暗示些别的什么,那都是一派胡言。她曾经用火焰炸弹炸毁一家国民警卫队操练厅,她有犯罪前科。如果是别人的话,早就定罪了。她蓄意闹事,而且使用暴力。她根本不在乎杀了什么人,或伤害

了什么人。她也不在乎自己所干的事会促使国家四分五裂。说什么'大家都这么干',这不是理由,特别是在越战年代。她整个就是自私自利的缩影。你看,"他充满激情地说道,"在战争时期,有个人要阻止她造成更大的破坏,她就开枪打死了他,还声称这是什么反对政府的最佳道德途径。20年来,她悠然自得,然后,她的良心突然就产生危机了?拜托吧。"

我提到说,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的主人公一样,她的良心变成了她的监狱。他苦涩地回答道:"那倒不错。我希望她痛恨自己。"

尼克松认为,在美国潜伏着60年代留下的可怕的影响,那就是不去指责罪犯,而是把一切归罪于社会。许多人通过新闻媒体表达了对鲍尔强烈的同情,甚至超过了对她的受害者的同情。因此,尼克松在《超越和平》中针对这一事件,愤怒地写道:"我们可以理解那些示威反对战争的人,但我们不能原谅他们诉诸暴力。这些人为了反对在国外的对敌战争,在国内发动了对无辜的人的战争。"能够为战争一代寻找的借口已经找遍了,尼克松要的是公正无私,即使经过了20年也不能例外。

他在越南问题上一直在寻求公正,这完全是出于一种需要,即遏制战争所带来的影响。战争结束了,但它的负面影响却十分猖獗。尼克松在他的著作、演说、访谈以及杂文中,抨击了越战时期不道德的行为与态度、自以为是与自私自利、贪婪与放纵。他提出应该全面恢复谦恭虚心、自力更生、宽宏大量,要遵纪守法、敬拜上帝。在他辞职之后,不管他的信誉怎样,他都将它用来实现上述目标;他的使命不仅是为当时关于外交政策的争论作出自己的贡献,而且是修补遭到破坏的美

国文化。

然而，尼克松最后希望，在东南亚实现自由市场哲学和政治自由的历史上，这场战争将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章节。人们举行抗议活动反对美国的这一军事行动，抨击传统价值观念，但如果世界上诞生了一个自由的越南，这将证明军事活动和坚持传统价值观念的人是正确的，而且将结束越战之后在美国出现的辩论。

尼克松只能努力恢复在越战中失去的某些文化准则。正如他说的那样，他这个总统既负责战争最后的几年，又在战后努力恢复被战争破坏的部分价值观念，这实在具有讽刺意味。尼克松，这个历史上惟一一个辞职的总统，称自己为正方形。他不断地与越战的文化、社会和政治影响抗争。这在支持他的人看来是高尚的；在诋毁他的人看来又是可笑的。而他却认为那是他的义务。越战和水门事件造成了道德的沦丧，他真诚而努力地阻止道德的沦丧，这就是他的使命。“我将永远跟越战和水门事件联系在一起。”1993 年 9 月 4 日，尼克松说道，“我无法抹去它们，但我努力逆转它们所带来的后果。”

在他辞职后的日子里，他全力以赴地修正那两个事件所带来的后果。在水门事件上，他只能保护自己。但在越战问题上，他积极地与战争所带来的价值观念进行激烈的斗争。如果反对那些价值观念的人保持沉默，将会促使它们滋生蔓延。美国不得不接受北越的胜利，但它没有必要接受国内反正统文化价值的胜利。对于尼克松来说，在逆转这场文化的革命中，不管取得多少成功，都将是越战留下来的正面遗产。

第三部分

丑　　闻

丑闻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牵涉到提出控告的对手的政治议事日程。水门事件牵涉到尼克松在希斯事件和越战上的看法；伊朗门事件牵涉到反对共产主义是否正确的问题；克莱伦斯·托马斯案件牵涉到妇女是否有权堕胎的问题；派克伍德的性骚扰事件牵涉到民主党希望在参议院获得一个席位的问题；白水事件则是一些虚伪的自由派民主党人谴责20世纪80年代的贪婪，自己却贪婪无度，并竭力掩饰自己。每个丑闻都有其特殊之处，但背后都有一股更深沉、更强大的政治力量驱使着它们。敌人必须除掉，借口当然也必须事先编好。

第一章 水门事件

1972年6月17日凌晨，在巴拿马群岛的一个小岛格兰德珊瑚岛上，理查德·尼克松睡得正香。珊瑚岛的主人是他的好朋友罗伯特·阿布拉纳尔帕。同时，在几千英里以外的华盛顿，五个人潜入水门大楼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盗窃，结果被抓住了。其中一个自称是詹姆斯·麦克科尔德，是尼克松总统争取连任的竞选委员会保安总长。

星期六早上，总统醒过来，对于在华盛顿发生的阴谋犯罪活动一无所知。他跟竞选班子领导人H·R·霍尔曼打了几分钟电话，讨论是否支持联邦政府援助教会学校，又问怎样可以跟出差的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取得联系，接着，他跟阿布拉纳尔帕和另一

个密友贝比·里波佐出去划船,如此度过了一天。

星期天早上,也就是6月18日,尼克松回到佛罗里达州比斯开恩珊瑚岛的家中。他从厨房的台子上随手拿起一份《迈阿密先驱报》。报上的大标题写的是越南撤军,在标题下面的页面中间,他看到一则小故事,讲的是关于在水门大楼的逮捕事件。他只浏览了一下开头几段,觉得这个越轨事件很"荒唐",于是把报纸扔到台子上,出去游泳。

当天晚上,他拿起丘吉尔二次世界大战系列的最后一册。尼克松当时并不知道,他手中这本书的书名道出了他政治生涯中酸甜交织的主题——《胜利与悲剧》。于是,6月17日以及此后两年里发生了许多事件,使一个典型的美国梦式的故事发生了灾难性的转折。说它是典型的美国梦式的故事,这是因为故事开始于加利福尼亚穷困潦倒的柑橘树林中,它似乎在1974年8月的一个夏天结束于白宫的南草坪。

尼克松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在他担任总统期间,他一直是个目光远大的现实主义者。正因为如此,他倡导了一系列对内政策和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他也发现,不幸的灾祸、始料未及的后果,无不为成功笼罩上一层阴影。伟人一旦出错,将会是另一种命运。成功是场喜剧,失败是场悲剧;昨日曾经伟大,今日却自寻毁灭;本来会流芳百世,结果却惨遭历史谴责。

但最让尼克松自豪的是,他是个斗士,他不折不扣地相信自己必将复活,重新获得政治生命。他懂得如何孤军奋战,重新获得人们的尊敬。水门事件刚刚公布于众的时候,克莱尔·布思交给尼克松一份圣巴顿的颂诗:"我受伤了,但我没被杀死!我躺下来舔舐伤口——接着我站起来,继续战斗。"这成

了他的祷文。但是,他必须掩盖这个全国最臭名昭著的"三级盗窃案",因此不得不辞去总统的职务。于是,他知道自己的政治生命已经被扼杀了,他在事业上的成就,不再是单纯的成就,而是成为一个身败名裂的总统的悲剧的一部分,胜利与失败再也不可分割了。尼克松曾经是一座高高耸立的丰碑,象征着自豪与政治才华,但他却因自己雄心勃勃而误入歧途,最终毁坏了自己的名声。

在他伸手获取伟大的桂冠时,他却像一个传奇的悲剧人物一样,狠狠地摔倒在地上。尽管他在辞去总统职务之后取得了显赫的成就,但只有水门事件才具有一种特殊的含义:他的支持者大失所望,他的对头却欢欣鼓舞,他自己则变成美国政坛上的一股非法力量。事实上,居然是尼克松自己为敌人提供毁灭自己的弹药,这才是整个事件中最让人无法忍受的部分——对于尼克松来说如此,对于整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此时的国家,在国外的军事活动虽胜尤败,在国内则被反正统文化势力搞得四分五裂,疲惫不堪。尼克松是一股靠自己的奋斗成功的力量,不幸却惨遭破坏,成为史诗般的悲剧。这固然是他自己造成的,但同时也是全国上下动荡不安的结果:这场风波如风卷残云,势不可挡。任何机构,任何个人,只要挡住它的去路,势必被它摧毁。

然而到了最后,尼克松虽然饱尝磨难,却没有被击垮。辞职以后,他隐居加利福尼亚,一边写回忆录,一边开始慢慢地养精蓄锐。1978 年,他在牛津大学俱乐部发表了重要讲话;1980 年,他写出了畅销书《真正的战争》。就是这样,他迈出了一步又一步,写出了一本又一本书,发表了一次又一次讲话。他开始东山再起。他终于胜利了,而且胜利得如此彻底,

影响如此之广，这是他始料不及的。他曾经跌得那么惨，现在的成功简直是个奇迹。别人对水门事件怎么说、怎么做，他控制不了；但他自己如何去处理这件事，他却可以作主。正如他所说的，他不是"深陷于水门事件里意志消沉"，而是把注意力转移到每天发生的事情上去；他不是沉湎于过去，而是放眼于未来。但他也知道，别人如何看待他的过去，这将取决于他怎样安排自己的将来。

尼克松一直努力把水门事件的影响抛在一边，但到了晚年，他意识到水门事件及其影响将永远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一部分。他不是把丑闻彻底地埋葬在记忆深处，而是与之搏斗，竭力去评价它，最终接受它对历史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冲击。水门事件像恶魔一样纠缠着他：他既要面对外界对他的评判，又要面对内心深处的折磨与焦虑、悔恨与傲气、胜利与悲剧的滋味。他的政治生涯交织着光彩与愚蠢，十分复杂；而他对水门事件最后的思考也并不单纯。有时候他能够很透彻地去理解这件事；有时候为了保护自己，他把它丢在一边。也许是因为人们对他的评判太残酷了，他需要保护自己，使自己不至于受到侵扰，又也许他只是想让自己相信，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我从 1990 年开始为尼克松工作，当时并没有想到会与他谈论水门事件。我受聘担任外交政策与研究助手，因此打算把我们的讨论局限在国内外政策方面。然而，我很快就发现，虽然他在谈论水门事件时感到并不轻松，但他渴望谈一谈，让人听一听他的说法。他的听众应该是下一代，对水门事件没有深刻记忆，同时，他也可以了解下一代人如何看待他和他的总统工作。对于他亲身经历过的或者观察到的丑闻，我们有

许多共同的看法。他对这些事情既不感到苦涩又不包庇纵容，实在令人吃惊。

我们在谈论其他话题时，总是在许多天里，兴致所至，随感而发；谈论水门事件的次数很少，但每一次都谈了很长时间。他不愿谈论这个话题，但他又渴望再一次审视它，似乎通过他的意愿就可以把它变成快乐的结局。他轻易不提水门事件，但只要谈起来，一定会严肃认真地对待。只要有合适的机会坦率地谈论水门事件，尼克松就毫不退缩。他很想知道下一代史学家是怎样评论此事的。这对于尼克松来说是一种很不寻常的处境：一般都是由他来评判别人的成败功过，但谈到水门事件时，由于他身在其中，偏见、悔恨以及过去的阴影难免限制了他。

1990 年 9 月 4 日，他跟我说："你已经看过《在政治舞台上》了，你觉得我是不是花太多时间谈论水门事件了？"由于这是他第一次提起丑闻，这个问题悬在半空中，显得十分沉重。他接着说道："我本来提都不想提它，可这是我的个人回忆录，我总得说点什么。可我一提到它，就一发不可收拾，该说什么就说什么。我刚才那样问你，是因为报界的注意力都放在那上面了。书里的其他内容，关于俄罗斯人啦，或者其他个人方面的东西啦，新闻报导甚至是书评都只字未提。水门事件——这才是大家想要听的。快 20 年了，也够了。我不该把它塞进书里，可我想我也没办法。"

水门事件给他设下了又一个陷阱：如果回忆录里没有充分地讨论它，有人就会批评他否认丑闻，逃避责任；如果直接面对那些问题，难免要作出解释，又会有人批评他为自己辩护。他既想说一说自己的故事，又想避免旧事重提，实在是进

退两难。最终，他还是用了很大的篇幅谈论这件事。他认定，与其让别人翻出此事，还不如自己谈一谈。这一次，他还是找出纪录，作为最有力的证据，为自己辩护。

一桩出名的丑闻的背后总该有一个优秀的肇事者。尼克松相信，如果他尽可能客观地谈论此事，水门事件的主犯将不再是一个被阴暗的狂怒占据的人，也将会削弱事件的某些历史意义。

"我在《在政治舞台上》里写到它，因为我觉得这会有好处。"1991 年 1 月 3 日，尼克松这样说道。当时我们正坐在他的办公室里，讨论海湾局势，他突然话锋一转，提起了水门事件。他把双脚架在搁脚凳上，继续说道："要知道，我当时觉得从我这方面来谈一谈会有好处。可现在让我写的话，我就不会把水门事件这个破事放进去。所有的书评都集中到那上面了，其他的内容全都忽视了。你同意我的看法吗？"

这一次，他让我回答。我答道："他们确实差不多都在谈论那件事，不过您应该明白这是为什么。"他耸了耸肩膀，表示同意。接着，他又问我是不是觉得这本书应该费这么大篇幅谈论丑闻。

我跟他说，他确实应该从他的角度谈一谈水门事件。他听后叹了一口气道："我也知道，所以才这么做了。可是，我再跟你说一件事，我讨厌老是谈论这个该死的事。我是犯错误了，我道歉了，我也承担责任了，而且我一直都在付出代价。当然啦，报界不喜欢人们——尤其是他们自己——忘记这件事，因为这是他们一手炮制出来的。"

他顿了顿，看着我："不，这样说也不对。一部分是他们创造出来的，但主要是我自己造成的。是我的错，我过了好长时

间才接受这个事实；我可以怪罪报界，也可以怪白宫的顾问约翰·迪恩和特别检察官阿浃鲍尔德·柯克斯和其他什么人，但主要还是该怪我自己。”他倒抽了一口气，“我知道自己是别人的目标。从阿尔加·希斯[①]事件开始，我就成了别人的目标。当时我证明报界错了，可把它们给大大地得罪了。他们为希斯说话，可他是个有权势的滑头，又是个共产党间谍。我证明他有罪，结果他就进监狱了。但他是他们一伙的，他们永远都饶不了我。

“所以你看，我知道他们埋伏在那里，随时准备扑过来。我错就错在给他们机会找我的麻烦。”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您本该小心的？”我问道。

“是的，”他回答道，“我本该更小心才是。”

“是小心不要被逮着，”我说，“还是小心不该犯错在先？”

他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说：“不，我的意思是，我本来应该小心不要做错事，或至少不要让人看出端倪。好像那里有两个标准：民主党可以安然无恙，共和党就必死无疑。我接受不了。肯尼迪和他们一样肮脏，我的天啊！他在那里做的事情可真是无耻之极！可他让人保护起来了。约翰逊是一路货色，虽然他不像肯尼迪那样恶劣。可能我搞错了，以为自己可以像他们那样干；或者甚至不是以为，而是在潜意识中这样觉得。”

我说他的这个想法是典型的“政治就是政治”。他回答道：“嗨，我以前那么想，可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儿。对民主党

---

① 希斯（1904— ），美国国务院官员，1948年曾被美国共和党指控为华盛顿特区共产党间谍网成员，曾向苏联提供过国务院秘密文件，后因伪证罪被判刑五年。

有一些标准，对共和党有一些标准，对我又有另外一些标准。我给归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类别。希斯事件之后，报界就不再信任我了，他们老在那里转悠，等着我出错。我早该知道，我是个人物，即使在白宫打个喷嚏，也会有人叫人来调查。就此而言，我真是太蠢了。"

我问他，他把谈话都录下来是不是做错了。他回答说："又是又不是。说不是吗，从罗斯福以来，几乎所有总统都或多或少地录一些，肯尼迪和约翰逊录的最多。说是吗，因为结果不像我所期望的那样。"

"您期望什么？"

"像其他人的录音带一样，记录我的总统任职。可并没有想到会闹出这种结果。"

我问他讲话时是不是会忘记录音带正在录音。他手指摆弄着钢笔，眼睛看着我说："嗨！要知道，我都是一走进去，就开始和霍尔德曼、艾尔利希曼、基辛格或不管什么人说话。我们说着话，想都没有想过录音带的事。约翰逊叫我把跟总统有关的所有纸片都留着。后来他让我看录音设备，当时我想也许将来搞历史会有用的。"他笑了笑，"我想也确实派上用场了。"

这个早期的谈话透露出几个要点。尼克松承认自己有罪，承认自己毁了自己的总统职位。他知道自己的情况特别，许多准则在前任那里适用，到他身上就截然相反了。报界对他持不信任的态度，他又树敌众多，他们都以另一种标准评判他。但他没有因此更严格地要求自己。他总以为，前任能够受到保护，他当然也会受到同样的保护。那些录音带录有他的谈话，最后没有成为他的回忆录，反而被用来指控他自己，

他所说的话也成了毁灭自己的罪证。这既是悲剧，也是悲哀的讽刺：被告人成了自己的刽子手。

在他的晚年，那些录音带一直纠缠着他。许多与水门事件相关的谈话已经披露，用以协助犯罪调查，但仍有几千个小时的录音没有公开。从辞职到生命结束的20年里，他不断努力阻止这些录音带的披露。尼克松相信，他像其他总统一样，有权要求对其他材料保密，他相信他会像前任一样受到保护，但他又错了。不管他怎样努力，国家档案馆不断披露这些录音带，引得报纸上时不时地出现关于水门事件的头版头条新闻。

"我估计明天又会出来一些水门事件的录音带，"1991年6月3日，他说道，"我想就是明天了。不知道人们对这事还有没有兴趣。公众可能会有兴趣的。不，是报界还有兴趣，所以他们强迫公众注意它。可你知道，也许我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可还有几百句正面的、积极的话谈到我们当时反对什么，正往什么方向努力。报界公布这些了吗？没有。就算我说了些有问题的话，他们对这些话的上下文作出说明了吗？没有。有些话我后来又改正了，他们注明了没有？没有。"他顿了顿，"看看他们都报导了些什么。"

四天后，他出行佛罗里达回来，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等我坐下后，他微笑着问道："你对披露那些录音带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我跟他说，他为《华盛顿邮报》写的关于俄罗斯的文章在同一个星期而不是后一个星期发表，先发制人，我感到松了一口气。

"他们想纠缠着水门事件，随他们去吧！我知道，我们没

什么办法。但不要灰心丧气，不要意志消沉。"他这样说，好像在为自己鼓劲，"每隔一段时间，他们都会披露一些录音带，然后又是大肆折腾。"

"虽然这事偶尔发生，但对于你来说不会轻松的。"我说，"对于我们这些在您身边的人来说，也不轻松。"

他噘了噘嘴："你真的感到不安吗？"

我提出要给各家报纸写信，为他辩护。他摇了摇头，似乎眨了眨眼以忍住眼泪。"我钦佩你的勇气和年轻人的热情。"他说，"不过能损害的已经损害了。那些谈话抹也抹不掉，就是这样。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为自己辩护，可你知道我的意思，有些话除非放在谈话的上下文中，否则根本没法辩护。

"我跟你说，有人批评我说话粗俗，这跟录音带上的其他东西相比可能无足轻重，可我很不安，尼克松夫人也觉得不安。你要是跟约翰逊或肯尼迪呆上五分钟，耳朵都会竖起来。所有的总统都说脏话，可看看大家那模样，好像我是绝无仅有似的。"

"那是因为我们可以听到您说话，可听不到别人说话。"我说。

"我知道，"他回答道，"可尼克松夫人很不安。我从来没跟她说过那种话。我在你面前也不……"他停了停，"嗯，可能有的时候。可问题是当时的压力太让人忍受不了了。我不知道尼克松夫人怎么受得了。全家人心情都很沉重。"

我问他是怎样熬过来的。他说："都是因为有他们，嗯——尼克松夫人，朱莉，特丽西亚，戴维·艾森豪威尔和艾德·科克斯。他们都很坚强。一切都崩溃了，影响了他们，给他们很大的打击，可他们依然站在我身边，从不抱怨。我从来

没有看到他们发抖过。他们知道如果我看到他们发抖，-定会崩溃的。他们太无私了。还不能反击！我知道他们想去为我辩护,反击那些胡言乱语,修正那些被歪曲的话。给那些杂种一些颜色看看。可当然了,他们不能这样做,只好忍着,一天天地忍着。不知道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可他们承受住了。”

他坐直了身子:“我可没有别人的优势,可我想谁也没法像我这样忍耐。整整两年时间,新闻、广播都是以水门事件开头,天天如此。我不读那些东西——我知道他们怎么折腾——我只看摘要。不简单吧?”

我跟他说,他离职后为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国内政策作出了巨大贡献,人们会超越水门事件的创伤,公正地评价他的一生。

他清了清喉咙:“希望你是对的。这种事既然发生了,不能躺在那里等死。别人可能很快就卷铺盖滚蛋了,可我不是轻易放弃的人,我早就发誓要抗争。我在辞职演说里提到,时间还没到就放弃,不仅违背我的信念,而且违背我的教养。我当时不得不放弃,但我决心让它到此为止。事情看上去很要命,可我会改变它。关于我,关于所发生的事情,别人怎么说,我控制不了。可我的余生怎么过,我可以作主。那些东西,像录音带什么的,只要一出来,反对尼克松的人还是反对尼克松,拥护尼克松的人仍然拥护尼克松。就是那些夹在中间的人,他们的思想很容易让人左右。

“在水门事件中跟我过不去的人已经盯着我很长时间了。希斯事件也好,越战也好,水门事件也好,他们无非要揪住我的把柄,我也就让他们抓住了。相信我,水门事件只是借口而已。”

"您是不是说，不是水门事件，就该是其他事件？"我问道。

他耸了耸肩膀："这不过是我的推测。"

他推测，有人反对他的反共政策，反对他揭露阿尔加·希斯，反对他在越战中"体面的和平"政策，反对他与苏联缓和关系，反对他与中国恢复友好关系，反对他登上权力的宝座，他腹背受敌，难免招致毁灭。有人认为他是美国政治中的毒素，气势汹汹地要清除他，正如他曾竭力清除希斯一样。水门事件暴露了希斯事件的隐患：既然他代表了不受左派流毒侵蚀的力量，就该把他拉下来。

7月1日，我们坐在他府邸的办公室里。我告诉他，我打算看一看调查员莱恩·科罗德尼和记者罗伯特·盖特林合写的新书《沉默的行动》。他们对水门事件有新的说法，非常轰动。他们提出，发生在水门大楼的盗窃案，其真正目标不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劳伦斯·奥布莱恩，而是要发现民主党为外地男客提供的高档卖淫服务。他们说，白宫顾问约翰·迪恩命人在夜间闯入水门大楼，不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是想找出证据，证明他的妻子毛琳与应召女郎集团有牵连。

两位作者都是有威信的人，他们的论断因而变得很有说服力。他们都是左派，两人的兴趣当然不在于为尼克松开脱罪责。他们宣称，他们不是要为尼克松辩白，而是要深入未曾查出、不为人知的真相，揭露盗窃案的来龙去脉，事后如何掩人耳目，以及他决定辞职的前因后果。他们全面彻底地探讨了整个事件，得出结论，说尼克松无意中卷入别人的阴谋，发展到最后，其主谋已经无法控制局面。他们声称，他的毁灭完全是意料之外的结果，是他自己愚蠢，沉不住气，而他过分急于控制局势，显得有些病态。科罗德尼和盖特林没有为水门

事件辩解,而是客观地审视它,表明这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力量之大,与此有关的要人都无能为力。

这个论调使尼克松坚信了他原来对水门事件的看法。当时,华盛顿骚动不安:街上是成千上万的反战游行者,到处充满了阴谋、激情和恐怖。尼克松在旧式的正规政治中游刃有余,但在这个时代,直接指向他的却是政治上的游击战。他显得那么落伍。人们长期有组织地、不屈不挠地反对战争。从林肯时代起,没有哪个总统碰到过这种局面。尼克松从前任那里接过越战的烂摊子,此时,退伍军人纷纷向白宫扔军功章,五角大楼不断有人泄露机密。全国动荡不安,尼克松没有其他的应付办法,只好采用窃听电话、对国内收入署查账的老法子。可是,30年来其他总统惯用的方法,现在突然引起了人们的反对。

国内的政治与社会出现一片歇斯底里,如脱缰的野马,越来越难以控制。万事俱备,只等着在国内进行清洗。在一阵集体的疯狂中,尼克松却借自己之手,让别人给推翻了。

"不管别人想什么,"他说,"我仍然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儿。过去也没明白。大家好像以为都是我一手策划的。我跟你说,我刚听说有人盗窃时,还在想:'我的天啊!谁会干出这种愚蠢、弱智的事情?'我根本没想到会影响到我,至少当时没往那方面想。我没有命令人干那件该死的事,也不认识任何一个和那件事有瓜葛的人,也不知道我的人会认识他们。大家跟我说的时候我还他妈的蒙在鼓里呢。

"出事时我消息闭塞,整个过程中也是消息闭塞,大家给我提供各种各样误导人的信息,我只能根据这些信息行动。一会儿迪恩来说点儿什么,一会儿霍尔德曼来说点儿什么,一

会儿艾尔利希曼来说点什么，一会儿黑格又来说点什么。他们都有自己的小九九，保住自己的小命要紧。想想看，我深陷其中，不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我倒是明白他们跟我说的话，从中推测些有价值的东西，可还是一团糟。"

他挥了挥手，接着说道："虽说他们在水门事件中像无头苍蝇似的到处乱撞，可还是挺不错的一群人。不管怎么样，多数人的意图是好的，我们的意图都是好的。出了些差错，发生些不愉快的事情，接着又努力平息它。"他停了停，"这本书没有采访罗斯(尼克松的长期秘书)，对吧？她从来就不喜欢黑格，也不太喜欢亨利。他们太关心自己的权力了，没功夫对别人好。我的人嘛，说归说——他们是犯了些错误——他们还是出类拔萃的。基辛格和黑格——是他们领域里的顶尖人物，霍尔德曼——我见过的最他妈优秀的竞选班子领导者。艾尔利希曼——跟钉子一样强硬。查理斯·科尔森——赤胆忠心。

"每个总统都需要身边的人能够说不、能够勇敢斗争，还能够跟总统说实话，不管这实话有多么残酷。这些家伙太忠心耿耿了，不肯把他们知道的都告诉我。我不知道。我作出过那么多决定，最让人为难的，除了辞职以外，就是开除霍尔德曼和艾尔利希曼。他们非常硬，非常忠心耿耿，干起来很卖命。他们受到攻击后，不断抗击。牺牲他们是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错误。"他摇了摇头，"那时候，报界血腥味十足——要知道，我也很脆弱——他们猛扑过来，就全都完了。回想起来，我别无选择。可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我是不会解雇他们的。我会抓住他们，让那些杂种什么都捞不到。"

"这是不是水门事件中最让您后悔的事？"我问。

他又摇了摇头："水门事件中让我后悔的事太多了。首先是我在一开始时处理这该死的事的方式。我跟它毫不相干，不该大动干戈。我应该直接面对美国人民，告诉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向他们保证所有有关人员都会付出代价。直接去找人民这个策略，不到发生非常重要的事情时，还是少用为妙。在这方面，我的记录还是不错的。"

我提到1952年的基金演说，他指着我说道："那时我掌握着真相。在水门事件上，我应该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使用相同的办法，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如果人民直接听到总统解释——嗯，他们一般愿意听，愿意去理解。我是该这么做，那么整个该死的事就是另一个模样了。"

我问他是不是觉得美国人民宽宏大量，他回答道："没错。可你一开始就得跟他们说实话。不跟他们坦白，隐瞒真相，设置障碍，那他们可他妈的饶不了你。绝对的。他们也不该饶了你，确实做错事了嘛。他们说水门事件就是这个样子的。嗨，别误会我的意思。我在政界混了这么久，政治都是肮脏的、没有心肠的，一直都是这个样子，永远都改变不了。总会有丑闻出现的。可对那桩丑闻不动声色，对这桩丑闻就大惊小怪，不正常。这就是双重标准。"

"还有什么？"我问。

他眨了眨眼："我跟你直说了吧，我对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太不公平了。我跟基辛格，我们俩有很多事情瞒着他，太不可饶恕了。我在应该用国务卿的时候却用了基辛格。虽说我这样做有我自己的道理，但还是不对。就拿中国来说吧，事情完了我才告诉罗杰斯。罗杰斯聪明、善良，我挺后悔的。"

他顿了顿："还有多尔。你知道，他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

任职，我却让布什取代了他。多尔很忠心，也很硬，老是在为我辩护，尽管多数时候这样做不得人心，尽管发生的事很难辩护。他受到太多攻击了，可我对他太不公平了，实在很糟糕。我感谢他为我所做的一切，可我只顾着自己的难题，从来没有好好地谢谢他。"

他耸了耸肩："用布什替换他？谁知道呢。水门事件让布什的日子很不好过。也是的，任何一个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头头都会给搞死的。他跟每个人都说他多么不愿意呆在那里，还来跟我说：'派我到中国去吧。'我把多尔换下来也许反而帮了他大忙呢。可我当时应该跟他多解释解释。还有可怜的福特。在政治上，宽恕是死亡之吻，可他还是那么做。在这方面，你得佩服他的勇气。"他低下头，又抬头看了看我，"水门事件毁了很多人。可我跟你说，除了我的家人，我最后悔自己那样对待他们，其他的人倒还在其次。"

他顿了顿："我以前说过，可我现在还是要说。我应该在白宫营造一种氛围，让大家想都不敢想这里会有遮人耳目的事情。"他说，"我没这样做，是我的错。"

由于这一错误，他身边的人跟着他倒下了。他不仅为自己和家人悲伤，也为他们这些人悲伤。他肩负双重包袱：他是第一个辞职的总统，某些人的命运不幸碰巧与他的命运联结在一起，他毁了他们。

尼克松一心要让历史对他作出更善意的评价，一心要补偿他给相关的人所带来的伤害。他不断地著书，就全球政治和国内政治发表讲话，修复他和多尔、科尔森等人的关系。他在私下里修复私人间的关系；重新树立公众形象则是在报纸上和摄像机前。

"我每回谈到新计划或新书之类的东西,"1992 年 1 月 7 日,尼克松对我说,"我都等着他们问一些与水门事件有关的问题。多数记者不会让我坐在那里说我想要说的话。谁都想从水门事件上弄点什么。好吧,我们就来谈谈吧。可今天美国广播公司的特德·科佩尔简直太恶劣了。"

在华盛顿,尼克松为了促销《只争朝夕》这本书,录了科佩尔的晚间热线节目,但马上认定这是个错误。科佩尔在访谈的一开始就提了些很不客气的问题,比如:如果一个人故意滥用了总统的职权,那么美国人为什么就得相信他说的话,等等。尼克松感到这些问题充满敌意,实在没有必要。我在主控室观看访谈录像,看见尼克松的表情有些呆滞,脸色苍白。尽管他料到会有这些问题,可还是感到有些吃惊。

我们回到宾馆时,尼克松对我说道:"你看到科佩尔提问题时的表情了吗?绝对反尼克松。你看出我们面临的问题了吗?我对新闻界绝望透了。他们没几个是好东西。他妈的,他们根本不想公平一些。这在水门事件的风头上还可以理解,可到了现在又有什么办法?那时发生的和我现在做的是两码事,他们根本就不懂得或不愿意分清楚。"

他停下来,握紧了拳头:"我讲述自己的生平事迹,是因为我觉得自己为国家、为世界做出了些重要的事情,我决不会让水门事件阻止我这样做。反正痛恨我的人总在那里,他们不会听我说的。可我还是要说出来。他们老是死缠着那件事不放。可重要的是:如果你是保守派,报界就是你的敌人。他们假装很公正,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报界就是想毁掉你,至少是诋毁你,抓着机会就上。我错就错在老给他们机会。"

尼克松确实给了他们机会。他坦白了一系列国家内部的

罪行;他给他们提供录音带,用自己的话证明他曾经努力遮掩这些犯罪活动;他给他们半真半假的东西;他妨碍他们的调查;他桀骜不驯。于是,他们逼得更紧了。他给他们一支剑,他们就拿着剑指向他。

1992年圣帕特里克节,我到尼克松的底邸。六天前,尼克松图书馆在华盛顿组织了一次会议。会上,尼克松发表了讲话,他谈到我们应该援助俄罗斯的民主力量。为了把这一想法传播开来,他决定修改讲稿,发给没有参加会议的人。我来到他家,发现他带着一条有三叶草图案的领带。

"你瞧这条领带,"他对我说道,"我一年才用一次。坐吧。"我们讨论着该给什么人寄发他的讲话。提到科尔森的时候,我说《沉默的行动》这本书我快看完了。尼克松关切地看着我说道:"是吗? 什么时候会看完?"

"大概再过几天吧。"我说。

"好,"他回答道,"我要你说说你的看法。我当然是没看过了,我也不会去看的,不过我倒希望你看看。"他顿了顿,"要知道,我听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月份要搞个水门盗窃案20周年特辑。我希望他们不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纠缠那件事情,可这办不到。所以吗,又来了。"

我不想丢开这个话题,于是冒失地问道:"回想起来,您除了后悔没有在发生盗窃案之后直接面对国人,还有什么?"

他咬着钢笔:"一切,差不多是一切。直接面对人民是最重要一件。我应该这样做。所有卷入盗窃案或与此有关的人,我都应该开除,不管他们是谁,也不管他们知道些什么。替我的同伙或朋友遮掩——他们是这么说的,是个错误。我甚至不该考虑让中央情报局插手阻止联邦调查局的调查。"

“这是犯罪的确凿证据。”我说。

“1972 年 6 月 23 日，”他说，“我当时确实在想，一些前中央情报局的人卷入盗窃案一事，中央情报局会愿意阻止的。这是最大的错误。谢天谢地，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汉姆斯和副局长维龙·沃特斯没有这样做。这不但不合法，而且很愚蠢。后来联邦调查局局长佩特·格雷打电话给我，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该怎么调查就怎么调查，让霍尔德曼和艾尔利希曼配合调查，直到完事。我并没有妨碍司法，因为没有人照我说的办，可我一开始错就错在有这种该死的想法，导致最后的辞职。”

我问他是不是应该归结于判断失误，他摇了摇头：“不光是这个。我跟你说说危机吧。如果你是总统，又身陷危机当中——如果是国内外的危机，你倒可以保持一定距离、理智地思考，可像水门事件这种个人危机会加剧政治危机——这时你会太紧张，觉得自己的判断力都从窗口溜掉了。”

他使劲眨了眨眼：“我根本不该考虑它，谈都不该谈。拿钱封住水门事件盗贼豪沃德·汉特的嘴这件事也是如此。我跟迪恩、霍尔德曼谈到过这件事，大家就抓住不放。他们根本不理会我在谈话的最后说这样做不对，不要这么做。根本没拿钱给他。实际上，这事跟水门事件的其他事情完全是两码事；谁也没有从这件该死的事情中获利，谁也没有捞到一分钱的好处。”

我提醒他，人们感兴趣的是滥用职权。他不耐烦地答道：“是的，是的，我知道。所以他们才大肆宣传我说过那些话，偏偏不理会我在后面说这样做不对。他们大肆宣传我叫国内收入署查劳伦斯·奥布莱恩的账。”他握紧双拳，“我决不会为此

道歉。这是合法的。肯尼迪和约翰逊总是叫人查我的账。不管怎样,国内收入署的人全是民主党;聪明的保守派,有谁愿意在那里工作? 他们经常查我的家人、朋友、政治上的支持者,有时还包括比利·格雷厄姆。"他双手一挥,"比利·格雷厄姆! 天啊! 当时那是政治常规,完全合法。就是现在我还会这样做的。"

我提到毁掉录音带的问题,他同样毫不悔恨。

"回想起来,我当时真的相信录音带上的东西会帮我澄清一切。我在录音带上是说了些愚蠢的话,可我后来都收回了。我想大家都该听到我所听到的东西:全是坦诚的谈话、没有不合法的内容。实际上我什么都没做,也没有命令别人做什么。可录音带成了绞索,最后我只好辞职。"

"当时如果知道这些,您会毁掉那些录音带吗?"

他垂下眼睛,点了点头。

尼克松显然过分自信。同样,他错误地相信他的谈话录音和政治策略会像其他总统的那样,受到保护,得到认可,他也认为录音带里的材料会为他辩护。水门事件期间,他没法阻止他们公布那些录音带,于是把它们交出去。那些有犯罪嫌疑的话说过之后,很快被他摈弃了,或者根本没有被采纳,他相信这些话会因此抵消。他没有意识到,他提的一些建议不合乎道德,或者不合法,所以没有被采纳,它们本身就有犯罪嫌疑。他和下级讨论要采用一些可疑的行动、谈论时局、一点一点地得到信息、作出愤怒的反应,等等,这都是他自己的声音在说话,是逃不掉的。录音带似乎让他自己也感到震惊,好像那上面是别人的声音。20年后,他想完全抹去那声音。

回顾当初,尼克松希望自己毁掉那些录音带,让调查水门

事件的人自己去找证据。没有了录音带，他们只能根据传闻提出间接证据；没有了录音带，他们只能暗示存在妨碍司法的行为，但可能无法证明；没有了录音带，尼克松在这个案子上可以有更多的主动权；没有了录音带，尼克松本人和其他人就再也不会听到上面的话。其实，毁掉录音带本身虽然构成了妨碍司法罪，但这对于尼克松来说无关紧要。调查人员已经指控他妨碍司法，如果他毁掉了录音带，至少算是为自己做了些实事，也不会枉担虚名。

3月20日，我和尼克松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提到说布什已经同意尼克松的提议，决定大力加强对俄罗斯民主力量的援助。他突然转向我，带着一种惊恐的表情对我说："尼克松图书馆打算在6月17日水门事件20周年纪念日举办公开小组讨论会，以G·戈尔登·利蒂和莱恩·科罗德尼为首。"

我告诉他我强烈地反对这样做，原因有两个：其一，其他总统图书馆不曾举办过类似的公开讨论会，讨论发生在他们总统身上的大灾难。其二，大家不会把它看作是对水门事件彻底公正的讨论。

他指着我说道："这会招来更多的头条新闻，它不会仅限于谈谈是谁命人盗窃的，因为也不是我们命人干的。不行，我要打消他们的这个想法。"他拿起电话。

"对了，我看完《沉默的行动》了。"我说。他马上放下电话。

"你觉得怎么样？"他问道。

我告诉他科罗德尼和盖特林全面地调查了所有的证据，包括从未公布的材料，并且他们有力地论证说，由于疏忽，某些本来与尼克松总统毫不相干的行动导致他退位。总统卷入

了一些连他自己都搞不明白的事情,又受到像迪恩那样一群人的误导,但他们启动了某些行动后,自己却控制不住局面。

"迪恩就是这样的,"他说道,"他是个叛徒,老是撒谎,从一开始就只顾自己。可我却根据他的话行事。能不能遮掩住真相危及到他的私利,我当时还不知道呢。"

"他们还说阿尔·黑格是个'低音嗓门'。[①]"我说道,这暗示了黑格是《华盛顿邮报》的调查记者鲍伯·伍德沃特和卡尔·伯恩斯坦获得消息的秘密渠道,"他们说他在白宫进进出出,经常神秘地失踪,经常作出些错综复杂的解释……"

尼克松闭上眼睛,摇了摇头:"不,他们错了,"他说道,"黑格不是那种人。他最他妈的忠心耿耿了。我想他不认识伍德沃特。我的意思是,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但他可不会在半夜跟伍德沃特在车库里乱转。不,不会是他。"

"那么会是谁呢?"我问道。

尼克松微笑了:"我也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不是黑格。我猜到是谁了。"

我追问他,他大笑道:"反正是内部的人。"

"至少能够接近内部的人。"我说。

"可能,可我不这样想。我想不会是先从别人那里得来消息,然后再传出去。是内部的人自己干的。黑格是内部的人,但我想他不会这样做的。还有其他的人选。你仔细想一想就明白了。"

我提出说"低音嗓门"可能是几个人,或者是捏造出来的。

"不,"他坚决地摇了摇头,"消息的渠道只有一个人,确有

① 指身居要职匿名揭发政府内部非法活动的人。报导水门事件的记者鲍伯·伍德沃特对内情提供人的隐匿称呼,借用当时一部盛演的影片名。

其人。这个人觉得他有利可图，所以跟那两个人和盘托出。我们就来考虑考虑他的动机。也许他想当总统，但这个说法行不通。水门事件后，从我的白宫出来的人不可能在竞选中获胜。那么他一定认为自己可以在新闻界捞到好处。这个人偷偷地跟《华盛顿邮报》通气，想证明自己是自由派。”他用手指在空中指点着说，“他想在报界或传播界谋个职位。也不是迪安娜·索亚。不管是谁，他想先保住自己的小命要紧，想从困境中摆脱出来。迪恩是个叛徒，可说到消息渠道——唉，他做得比这更过分。”他停下来，把话题转到《沉默的行动》上来，“你应该明白报界为什么要窒息这本书，他们根本没有提到它。关于水门事件，谁想提一些其他的说法都行不通。”

我写信给科罗德尼和盖特林，感谢他们公正地探索了水门事件的新说法。4月13日，科罗德尼打电话给我，说他和盖特林对我的信表示赞赏，说迪恩控告他们犯了诽谤罪，说民主党当时知道应招女郎的事，只不过他们自己也有一些事情需要掩饰，并说《华盛顿邮报》派了三个记者调查他们两人的论断，但找不出证据来证明他们两个人的提法不对。当天，我把他们打电话的事告诉尼克松，奇怪的是，他对此毫无兴趣，只是说：“不管谁发现了些什么，水门事件已经结束了。”

水门盗窃案的20周年纪念日越来越近了，尼克松越来越担忧，越来越气愤。他听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邀请朱莉和戴维·艾森豪威尔参加它的水门事件专题讨论，他勃然大怒：“从我辞职到现在，18年来残酷的抨击就没停止过！”说话的这天是5月8日。他在办公室慢慢地踱来踱去，偶尔停下来，用钢笔指着我说道：“人们只记着这个——一年半以来，水门事件天天是头条新闻。我们的朋友是好意，可他们太天真了。他

们参加这些节目，是想从我们的角度说话，可他们这样做，只会给这些节目添一些吹嘘自己公正的资本——前健康、教育、福利部长鲍伯·芬奇跑去跟他们抗争；科尔森和艾尔利希曼很聪明，可我不知道他们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还有可怜的通讯部长赫伯·克莱恩。前新闻部长罗纳德·齐格勒和新闻界的关系不错，可他只想跟他们搞好关系。他妈的！他们不该这么做。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居然敢请朱莉！我的上帝！打开中国大门或缓和美苏关系的周年纪念时，他们干什么去了？——应该重视这些开创未来的事件，不应该老是注意到这些过去的事件。"

我提到斯蒂芬·安布洛斯写的尼克松传记，我觉得他写得相当友善，虽然写得不大对头。

"我知道，"他说，"安布洛斯认为我在私下里是个自由主义者，他说如果我渡过了难关，里根就不会出现。他这么说也许没错，可轻描淡写的夸奖还不跟骂我似的？要么就是夸错地方了。汤姆·威克的书(《我们的人》)也是一路货色。"

"《沉默的行动》呢？"我问道。

他摇了摇头："没有得到充分的表现。那些家伙是民主党人，本来应该受到人们的更多关注，但实际上并没有。"他顿了顿，"我写得还不够多。看看丘吉尔，他写了一本又一本。也许我该多写几本书。"

尼克松相信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恢复名誉。安布洛斯、威克及其他人写了些正面的传记，为评价尼克松总统的功绩作出了不同的贡献，但恢复他的政治形象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只有他自己才能担当这个重任。每当与水门事件相关的周年纪念日来临——如水门盗窃案，他的辞职——尼克松

总要奋力搏斗一番,因此他越来越坚定地决心促进自己的新生。尼克松再次孤独地进行着最后的战斗。

无数次水门事件的周年纪念不断地侵扰着他,尼克松不由得思考这样的问题:在这些日子里,人们会怎样看待他的一举一动。他不想让报界有机可乘,对他评头论足。他尽量避免显得自己是在努力消除周年纪念所产生的负面影响。5月底,他取消了原定的俄罗斯之行,“等他们结束了对水门事件的大肆渲染再说。不然我会在6月9日或10日回来,那就正好撞在枪口上。你如果太抢眼,就让人觉得他们的胡说八道是可信的。”5月26日,他在办公室里对我说。

我问他俄罗斯之行会不会消除那些胡说八道的影响。

他耸了耸肩:“一点点吧。但他们借着这件事情又会有新的说法。如果我过一阵再去俄罗斯,主动权就掌握在我的手里。”他停了停,又考虑了一下,“不行,我想我不能取消行程。叶利钦还等着我呢,他可比那些新闻界的小杂种重要。不过我这个星期要避一避风头。如果我让报界逮住了,我就对他们说:‘想谈谈20周年纪念吗?那么美苏限制战略武器第一次和谈签署协议20周年纪念时你们干什么去了?还有缓和美苏关系、中国问题、反弹道导弹等等等等。’怎么样?不过我不想太冲。先放一放吧,不值得。”

尼克松双手放在膝上,眼睛注视着我,出乎意料地问了我一个尖锐的问题。他慢慢地说:“你觉得人们为什么这么痛恨我?”

我看着他,他只是微笑着,等着我回答。我跟他说,各种敌意都针对着他,比如追溯到希斯事件的政党纷争、源于反对共产主义的政策纷争,加上有的人觉得他在水门事件中有超

越宪法的行为，不可饶恕；他顽强地拒绝接受失败，令人失望；他作为保守党却一直占据头条新闻，令人愤慨。凡此种种，给这种敌意火上浇油。

尼克松咬了咬嘴唇，笑了："他们对我的期望太高了。布什的问题很多，但是却没有人恨他。领袖要想强有力的话，得有敌人才行，才会知道自己做得对。但这些敌人又会找机会抓住你，如果不当心让他们毁了你，他们可就赢了。"

1974 年，尼克松在白宫工作人员面前致告别辞，而今天的一席话就颇有当年告别辞的味道，只是到了晚年，这些观点已经成为尼克松哲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现在说起这些话时，少了当年的偏激紧迫，多了许多平静祥和。为了生存下来，他必须全心全意地相信这一哲学，让它成为激发自己反击的动力。击溃他的敌人不再是为了复仇，而是因为他不愿意接受他们强加在他身上的罪责。他不再归隐，不再把自己隔离起来。他与以前一样，频频露面，惹人争议。

水门事件 20 周年纪念日的前五天，尼克松把我叫到办公室里。他像往常一样坐在角落的椅子里，并叫我也坐下。

"准备好吧，水门事件纪念日快到了。"他说，"不会让我心烦的。你呢？"我还没有回答，他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看样子他确实让这件事情闹得很心烦，"《今日》要搞连续一周的节目。太过分了。一天我倒可以看看，可一个星期？拜托了。谁也不会为此改变想法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迈克·沃里斯又要恶毒诽谤了——我们还替他们做了那么多事情呢。他们就是死缠着不放。"

他停了停，挑了挑眉毛："这个星期可要难过了，不过还不像 1974 年 8 月 9 日前一年半的日子。天天如此。我那时不

理睬他们,不然还不把我整死? 我现在倒想看看他们还有什么花样,都20年了。”

星期一,也就是6月15日,尼克松打开《纽约时报》,发现有两页关于水门事件20周年纪念的内容。他马上把我叫进办公室,看见我走进去,指了指放在我的椅子上的报纸前页。

“我看见《纽约时报》写了两页,”他说,“拿去吧,很烦人。不过别让它搞得心情不好。我发现《时代周刊》什么都没提。我不相信他们这是有意的,但还是挺好的! 记得他们是怎么对付赫鲁晓夫的吗? 当作他不存在。我就要这样对付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也许以后也这样对付《纽约时报》,不理睬他们。他们对于我来说不存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原计划用两个小时,后来减成一个小时。我估计他们留不住观众。”他突然站起身来,用手指戳了戳我的胳膊,“我不想让你因此心情沉重。”他好像是要让自己相信似的说道,“这无关紧要。你明白吗?”

我明白这对于尼克松来说很重要,可他不愿承认。每个与水门事件相关的新闻标题都令他头晕,等于重新揭开他以为早已愈合的旧伤疤。他不愿意读新闻,也不想看电视节目,他知道他们咋咋呼呼,旧事重提,无非是想让他闭上嘴巴。有趣的是,6月17日,也就是水门事件的纪念日,尼克松没再提起水门事件,而是谈论另一桩丑闻:伊朗门事件。

前一天,前国防部长加斯帕·温伯格被指控在通过伊朗把武器转卖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交易中,偷偷挪用钱款。尼克松谴责此事纯粹是原告的政治把戏,十分可耻。

“布什说他对此事一无所知。”6月17日,尼克松在办公室对我说,“放屁! 天啊! 他那时可是副总统啊。里根全都告

诉他了。咱们来看看——当时里根实际上并没有操纵伊朗门这件事,是温伯格和中校奥利弗·诺斯及其他人干的。可他们到底干了什么?不告诉国会他们挪用钱款的事情?他妈的!多数总统都不告诉国会他们脑袋里在想什么——包括肯尼迪。他在这方面最差劲了。你觉得他的猪湾计划通过国会了吗?还有他想搞掉卡斯特罗的计划?在这方面是有金钱交易的,别让他们给蒙住了。可从来没有人叫他作出解释。

"所以,可怜的温伯格成了堕落的人,政府干的事情全算到他的账上了。他们无论如何都要搞掉温伯格的,谁叫他是个聪明的杂种呢?你越聪明,威胁就越大,他们找到点什么借口就来搞你。他们这么死缠着不放,不是因为这件事情违背宪法,而是因为这是件反共产主义的事情。"他用拳头砸着椅子扶手,"这就是实质。诺斯和温伯格正撞到枪口上,就像我对付希斯那回一样。他们反对共产党!不是什么把武器倒卖给伊朗的问题,而是他们援助反政府武装。反政府武装是反共产主义者,那帮自由主义者就是想让他们失败,所以见到温伯格和其他人努力帮助他们在尼加拉瓜建立民主政治体制,他们就受不了。

"我今天给他打了电话,就这件该死的事情安慰他。这跟水门事件很相似。我们这么多人,居然没有一个想跟那帮杂种对着干。他们到底怎么了?他们没有胆量。"

临别前,他警告我说:"今晚别看那个节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特别节目)。"

但我还是看了。第二天早上,我向尼克松汇报。说话的时候,他面对我站着。

"你看了?"他惊奇地问我,"你受得了?我当然没看——

嗯,还不算糟吧?"

我不得不告诉他节目相当有破坏性。他后退了一步,非常震惊:"噢?咳,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还能搞出什么好东西?还有丹·拉泽和瓦尔特·克朗凯特?"

我跟他说他们又放了一些以前没有披露过的录音带片段,他发火了:"他们从哪里搞到那些鬼东西?他妈的,我们应该料到他们什么时候会放录音带的。"他顿了顿,"我们的人没有上那个鬼节目吧?"

我跟他说没有。

"好,"他回答说,"我不想让我们的人再干这种事。他们以为自己在帮忙,可不是这么回事儿。如果是谈谈霍尔德曼和艾尔利希曼嘛,他们倒是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们就是太他妈的好心了,都是科班出身的——不像现在白宫里那些闹来闹去的小丑。"他又顿了顿,"迪恩没有上节目吧?"

我跟他说没有,不过他们提出说联邦调查局局长派特·格雷是"低音嗓门"。

尼克松看了我一眼:"我真难相信他们居然会说是格雷。不,不是他。他知道的不多。"

我问他怎么如此肯定,他的眼神有些黯淡:"嗯,我想我当然不敢肯定,可我相信不是他。他们提到黑格了吗?"

"提到了,不过他们认为消息的渠道似乎是格雷。"我回答道。

"不,我想两个都不是,但他们没办法制止流言蜚语,对吧?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没说是我命人遮掩——"他停住了,"我是说水门盗窃案的事情?"

"没有,他们没有那么过分,没有证据。"我说。

"永远也不会有证据的，"他回答道，"我根本没有命人这么做。"

"当然啦，他们不能这么不负责任，没有证据就乱说话。"我说道，"不过他们暗示您第二天开始遮掩此事。"

尼克松不屑地挥了挥手："他们可闹够了。你记一下，"他指着我的记事本说道，"我再也不给下面这些地方做事情：《华盛顿邮报》、《新闻周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科佩尔，还有布莱恩特·冈拜尔，我虽然喜欢他，可他用整整一周的时间搞那鬼东西，他是有权制止的。"

我问他是不是又多了一份敌人名单，他笑着回答道："我跟你说吧，所有政治家，如果是认真而且强有力的政治家，都会有某种敌人名单的。我掌权的政府就有人有这种名单，不过如果你是总统，就不能写下来，这太蠢了。其他人可能也不会写的，可还是有。肯尼迪和约翰逊都有这种名单，臭名昭著了，两人的名单上都有我。肯尼迪叫人查我的国内收入署报表，约翰逊叫人在我那里装窃听器！从政的都会因为某些事情树敌。"他探身压低声音说道，"你只能朝他们有礼貌地微笑，仅此而已，否则你就是傻瓜。"

尼克松觉得自己周围敌人众多，他们当中许多人嘲笑他多疑。但他的对头确实存在，并且一心想毁灭他，尼克松发誓坚决抵抗他们的攻击。他的敌人既有政治上的，也有意识形态上的；他们从来不会安静下来。许多人甚至很自豪自己成为他的对头。尼克松认识到，他们反对他，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的不同，而不是出于个人恩怨，但他们对他的痛恨之情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如此猛烈尖刻，最后演变成个人之间的敌视。尼克松认为，在水门事件前的政治生涯里，他在两个问题

上采取的立场引发了这种敌意：其一是起诉希斯，这涉及到共产党在政府中的影响问题，争议很大；其二是越南战争，战争使整个国家意见不一，争论是否有必要阻止共产主义在东南亚扩大影响。尽管尼克松在希斯问题上是正确的，尽管是他结束了战争，还是有人反对他的政策，他们对他的仇恨永远难以消退。他们想方设法要把他从政治舞台上除掉，而他同样极力扫除自己的政敌。他们互相折磨，意在毁灭对方。

1992年8月9日是他辞职的18周年的纪念日，他什么都没说，但四天后，他说了些话，证明他其实一直都在思考这件事情。我生病了几天，尼克松拿了些文件到我家中让我翻阅，我们谈到布什的竞选情况不容乐观。我提到说总统身边围着太多经验不足的助手，这时，尼克松坐直身子，换了个话题说："在其他国家，如英国，领导人或其他人辞职是因为时间到了——福克兰群岛[①]争端演变成一场灾难时，卡林顿勋爵辞职；还有玛格丽特·撒切尔。辞职是一种荣誉，是一件可敬的事情。在美国却正好相反，因此大家抓住职位不放。人们认为辞职等于承认自己有罪，是一种失败。"

我问他是否后悔辞职，他低下头："不，不，当时那样做是对的。要知道，我本来不打算那样做，我不想让那帮杂种赢。家里人当然也要我坚持斗争。可我最后决定国家应该有个专职总统。"

我提到他在1960年大选之后曾提出过这种观点，当时他反对重新计算选票，他说："我怀疑他们有欺骗行为，尽管我的怀疑是对的，但我不愿意让国家暂停运转。在1980年，我知

① 位于南大西洋，即马尔维纳斯群岛，原属阿根廷，1833年被英国占领，目前英、阿对其归属权尚有争议。

道自己还会杀回来，还有第二次机会。但在 1974 年，我却认为再也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再也没有第二次机会了，他的周围总有人不断地提到水门事件，毫不留情地侵扰着他，让他无法解脱。如果尼克松在 1974 年没有辞职而是继续战斗，国家会因为不断的弹劾行动而陷入瘫痪，而且国家总统不再是领袖而是被告。提前结束他的总统任职，这也许与他的信念不相符合，但不管在当时还是 20 年后，他都相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他认为许多事件给他惹来了最初的敌人，希斯事件就是其中一件。它像水门事件一样不断地缠绕着他。1992 年 10 月 29 日，希斯声称，俄罗斯军官德米特里·伏尔科戈诺夫将军的报告表明，苏联档案可以证明希斯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莫斯科的间谍，这就为希斯作出了最好的辩白。尼克松发火了：“在他之前有五个俄罗斯人称他是共产党员和间谍，证明维特克·钱伯斯和我是正确的。这五个人能够看到克格勃档案，那里有记录。研究什么党内档案！那些都是清洗过了的。间谍又不拿党员证；否则就不叫间谍了。得去看看克格勃的文件，不过当然也已经毁掉了。”他摇了摇头，“真没劲。新闻界今天打电话来，我跟他们说‘无可奉告’。希斯就是他妈的间谍，他们还是不愿意承认我是对的。就因为那个案件，我成了头号的反共产主义者，这倒没啥。可即使我支持民权或其他与反共产主义无关的事情时，还是给贴上这个标签。在希斯事件上，报界错了，现在他们一心要证明他们是对的，这样他们就可以说我一生的事业都建立在一场骗局之上。”

几个星期后，他仍然非常愤怒。那个俄罗斯将军撤回声明，说他并没有全面检查所有的情报人员档案，不能保证希斯

是无辜的。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有线新闻电视网、《华盛顿邮报》以及《今日美国》都没有报导伏尔科戈诺夫将军已经撤回声明一事，但他们都报导了前面那则消息。只有《纽约时报》报导了将军的声明。尼克松感到十分绝望，说："他们拿谎言当头版头条，却把事实埋在不起眼的广告里。"虽然他宣称自己早就对报界不屑一顾，可看到他们有选择地报导时，还是觉得很不公正，十分绝望。

然而，在法律上他偶尔还是能够享受到重要的胜利的。11 月 17 日，美国上诉法院裁定，由于他任总统时的文件被没收，他可以获得补偿金。法院审查了总统文件的使用、管理、处理情况，发现尼克松"完全有理由享受他的财产所有权"。它认为尼克松像其他前任总统一样，拥有总统文件的"可补偿的财产权益"。由于 1974 年总统录音带及文件保护条例限制了尼克松对文件的所有权，法院判定，"没收那份财产"需要"依据宪法规定给予补偿金作为公正的赔偿"。

尼克松非常兴奋："我的律师打电话一般都是告诉我坏消息——'嘿，我们又输了。'可今天他们打电话却带来这个好消息。莫尔顿逊写了个鬼辩护状，说从华盛顿总统以来的每个总统的文件都属于他们本人。那是个开明的法官，他们以为他会判决文件属于所有人民，可他偏偏没有这么做。他们赢了，我真高兴。从水门事件那几年以来，我每年付的法律费用至少有 12 万美元。我还得再花上几百万。我决不会从这个判决中拿一分钱，我可不愿意从中渔利；这笔钱要捐给图书馆。可这事儿不是很有意义吗？"

他最终打赢了水门事件战役。历来与本案相关的判决都对他不利，但经过几乎 20 年的法律较量，这一判决有所不同

了。20 年来,他为水门事件付出了应付的代价,总算有所收获。这个判决鼓舞了他,似乎等待了多年以后,这个有利的裁决使他艰辛而昂贵的奋斗没有白费。如果说他别无选择,只有辞职,那么他后来时时奋斗,处处反击,同样是因为他别无选择。他经常打败仗,一旦失败,就会深深地失望;偶尔打了胜仗,这就会成为有力的证明,不是证明他在水门事件中的行动是正确的,而是证明他完全有理由立下誓言,继续奋斗。

"我打了这些法律之战,一点都不后悔。"11 月 21 日,尼克松向我指出说,"因为我辞职是迫不得已的。水门事件最大的悲剧,除了个人悲剧以外,就是我没法把保守党组成新的多数党,而我当时却要从新闻记者着手。那些人让克林顿白白捞到了好处,他们不会毁掉他的理想,因为他的理想也就是他们的理想。而我当时得把保守党弄进去跟他们较量,所以他们 1972 年要把我搞掉。"

尼克松在提出他下台的理论中再一次把自己从方程式中去掉。他的对头可能是害怕他有能力组成"新的多数党",因此一心一意想摧毁他;他自己的责任倒在其次。这个理论或者是个盲点,或者是他的防卫方法。尽管它使他无法充分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却可以让他接受现实。他用来解释水门事件的诸多理论,尽管都相当正确,其实是为他创造了心理上的防护罩,而不是提出新的事实。

1992 年圣诞前夜,没能重新当选总统的乔治·布什下令赦免伊朗门事件的人物温伯格、罗伯特·"巴德"·麦克法兰及其他四个人。尼克松非常高兴,可布什的政治对头却勃然大怒。"我在读《时代周刊》社论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高兴。"圣诞节这天早上,尼克松在电话里跟我说,"他们看了赦令简

直气疯了！这不是太好了吗！我昨天给麦克法兰打了电话表示庆祝。我真高兴布什有勇气去做；他早该这么做了——本来会帮助他重新当选的——但至少他做了。麦克法兰说我总是站在自己人的一边，虽然这不是最好的做法。里根可从来没有这么做。巴德对里根那么尽职；他是个忠诚的人。唉，可怜的家伙，他说给他打电话的人只有我一个。我以前打电话从来没有这么好的感觉。

“当然啦，现在特别检察官劳伦斯·沃什要追查布什，说他没有披露某些记录。这样做一点儿意义都没有。布什的记录不会有什么的；他非常小心。我相信他什么都不会写下来。希望不会！想想看，伊朗门事件都六年了还这样闹个不停。可这怎么能够抵得上水门事件的将近 19 年啊。我在美国广播公司看到过去的总统颁发赦令的一组镜头，他们总是放我告别时挥手的镜头，可是他们放错了。记得吗？那回是用一只手，非常严肃。他们放的镜头总是竞选时的挥手，当时还作出胜利的手势，让我看上去桀骜不驯，踌躇满志。我后来确实这样挥手，可当时已经准备登上直升飞机了。这事儿很微妙，但很重要。”

他可能不会踌躇满志，但他仍然桀骜不驯。他那坚强的形象，正是渡过眼前的灾难、将来恢复元气所必不可少的。在他准备飞离喧嚣动荡的过去、进入未知的未来时，他做出了胜利的手势，向世人昭示：大家普遍认为他完蛋了，但他不愿意接受判决，他拒绝接受这一说法，他一定还会回来。他曾经从政治死亡中复活过一次，这一回却更难以控制自己的命运，需要更坚强的意志和更大的耐心。从白宫最后一次走出来，他在空中挥动着胜利的手势，并不是踌躇满志，自以为是，而是

要让自己相信他一定会东山再起。

他整整花了19年来打水门战争,终于在1993年8月9日,又打赢了另一场战争。

"莫尼卡!"那天,尼克松在电话上冲着我大喊,"嘿,好消息!法院在录音带问题上判我们胜了。他们判定:所有私人间的谈话必须还给我,在此之前,档案局不能再公开任何录音带。真是重大胜利啊!杰克·米勒和斯坦利·莫尔顿逊(律师)被报界围攻,不敢相信报界有那么大的偏见。只有布洛科在报纸上登了点儿东西,是我挥手再见的图片和新闻报导。今天可是辞职20周年纪念啊!其他那些杂种没有一个登点儿什么的。不过,相信我,如果是另一种判决,他们一定会登的!要知道,那些律师多么辛苦;简直就是战斗。他们先是赢了赔偿金那个案子,现在又赢了这个。非常重要。我跟你说我很激动。"

第二天他来到我家时仍然很兴奋。当时我正在校订《超越和平》。他砰的一声闯进门,径直走进厨房,"我能不能用一用电话?我要打电话给莫尔顿逊,向他祝贺。"

他拿起话筒,细心地拨了号码,然后转身面向我:"你呆在那儿,我要你听听。斯坦吗?嗨!啊,你昨天打了个大胜仗。很难打。我看见《时代周刊》登了报导,还引用公民自由组织里某个人的话,说这坚持不了多久。会坚持下去的,对吧?"他停下来,听了听,"啊,他妈的!好,再一次谢谢你们了,斯坦。你干得好!"他放下话筒,"他觉得会坚持下去的。你相不相信,19年了,我们还在跟他们打这该死的仗!"

我说,关于文件的争议,不再是要不要披露文件全部内容的问题,它已经成为政治斗争了。他摇了摇头说:"他们总想

找找看是不是有更多亵渎的言语、阴谋或其他鬼东西。这不过是暂时的禁制令;他们还在考虑是否进行即决审判,那就是终审了。可如果他们决定了,他们也会输的。全部跟战斗似的。"他握紧了拳头,"我赢了官司,报界恨死了。他们总盼着让我早日完蛋。所以我们这本书可能会遭到冷落。你会不会觉得他们已经对我不感兴趣了?"

我安慰他说,永远不会。

"不管怎样,我们知道那边记得或关心水门事件的人已经不多了。我们打了个大胜仗!"他停了停,"你这里有钢琴吧?"我点点头。"来,"我跟着他来到家庭娱乐室,看着他拖出钢琴凳,坐下来,按了一个琴键。他转向我说:"你会唱歌,是吧?"

"唱一点。"我说。

"好,你肯定会唱这首歌,"他说着话,就开始弹《重现美好时光》。我跟他合唱了一段,他又唱了一遍,接着独唱了第二段。唱完后,他转向我说:"啊!这就是庆祝了。水门事件的两场胜利,真没想到。"

此情此景,令人感伤。在原来那场战争过去 19 年之后,尼克松终于打赢了一场法律战争,他控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希望与人分享。水门事件之后,尼克松坚持认为剩下的谈话和文件属于他而不应该属于政府。他捍卫了自己的立场,他终于享受到前任和继任的待遇,而他在担任总统时,误以为自己可以得到同等的待遇,结果犯了致命的错误。

他慢慢地在政界重新获得尊敬。看着继任者们不断地卷入丑闻,他感到既愤怒又好笑。伊朗门事件玷污了里根的名声,他声称自己不记得发生了什么,因此受到人们的嘲笑;白水事件则几乎把克林顿吞掉。水门事件一词含义复杂,用来

指一系列犯罪、遮掩、或真或假的指控；同样，白水事件错综复杂地交织了各种行为，涉及到克林顿夫妇在阿肯色州房地产公司的不法行为，以及它与一家刚刚停业的信贷机构麦迪逊·瓜兰迪的往来。调查表明，克林顿夫妇与白水发展公司以及破产的麦迪逊·瓜兰迪的财务活动很有瓜葛，于是，各种疑问纷纷涌现，在政治上很有破坏性。例如，克林顿在1984年的州长竞选活动中，债台高筑，他有可能把麦迪逊的资金非法转入白水公司，以支付这笔债务；在白水公司倒闭时，克林顿夫妇很有可能得到不在他们名下的个人所得税补助金；白宫助理顾问文森特·福斯特自杀一事，情形可疑；联邦治安维持会会员可能向白宫职员非法透露正在进行的民事和犯罪调查信息。总统与克林顿夫人坚持否认他们有不道德的和违法的行为，辩解、耍弄手段、利益纠葛、错综复杂，公众对整个丑闻迷惑不解。

然而，尼克松对高层人物的政治丑闻和犯罪的嗅觉十分灵敏。他立刻对此事有了兴趣，感到它在政治上会有灾难性的后果。尼克松在1993年8月9日得知法庭在录音带问题上的判决对他有利，在此之前的两个星期，福斯特自杀。尼克松开始对白水事件进行一系列的推测，同时总是提到水门事件，并对两者进行比较。

"我想，这可是个严重的政治问题，"7月29日，在福斯特自杀几天后，尼克松对我说，"这次死亡事件一定会直接牵扯到其他事情，像房地产交易、他们的税收或其他什么的。他们神神秘秘的，也许甚至妨碍调查，一定有原因的。"

尼克松知道，妨碍调查不仅会使小事演变为重大丑闻，而且会导致总统下台。他经历过水门事件，明白克林顿可能会

感受到什么样的恐慌。他自己曾被击败了,他相信时机已经成熟,政治上的公正即将到来。他希望共和党毫不松懈地追究白水事件,就像当初民主党追究水门事件一样;他为自己的失误负责,克林顿也应当为自己的行为不检负责;所有的总统应该受制于同样严格的标准。尼克松相信其他的总统会和他一样承担责任,但他又错了。

12 月 15 日,尼克松看到共和党没有能力利用白水事件,大发雷霆:"一团糟!他们那边贪污腐败透顶了,尤其是希拉里,她掌管他们的财政。福斯特自杀背后罪恶昭彰,可他们也许不再调查了。他们把文件从福斯特的办公室拿走,显然是妨碍司法。看他们当初是怎么对付咱们的?我的律师——米勒和莫尔顿逊——跟水门事件那案子斗,已经快 20 年了。我已经花了 200 多万诉讼费。不值得啊!你认为 20 年后克林顿还会为白水事件抗争吗?"他用手指指着书桌,摇了摇头,"克林顿夫妇交上的东西都是彻底清洗过的。我们的人如果不站出来的话,那我——"他握紧了拳头,"出于某些明摆着的原因,我当然不好说什么,可他们最好揪住这件事儿不放。"

尼克松一向以现实的眼光看待问题,奇怪的是,这回他一改往日作风,希望共和党也能像政治对手民主党一样,渴望发掘丑闻。如果共和党不去追查,无疑保护了双重标准。这个双重标准一向损害共和党,保护民主党。白水事件问题严重,很有可能产生破坏性的政治后果。民主党长期以来一直是执行监督权的合法力量,如果共和党希望像民主党一样,就应该积极负责,将调查贯彻到底。对于尼克松来说,不这样做,就相当于政治投降。

随着公众对白水事件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他也越来越关

注此事。1994 年年初，他谈到这个案子的运作以及它与水门事件的相似之处："头号新闻就是对克林顿的信贷丑闻以及他与阿肯色州的商务往来进行的后续报导。《时代周刊》呼吁指定特别检察官——还有《今日美国》——你相不相信？如果连他们都呼吁指派特别检察官，一定是有问题了，当然不会真的有结果。司法部长简尼特·雷诺说不行；她在公众当中享有盛名，可她是个偏向一党的巫婆。她和波比·肯尼迪一样有政治倾向。可我必须说，到目前为止，新闻界相当公正。他们嗅出丑闻了，这比尽写些好东西强。可如果他是个共和党，那他们就会铺天盖地地报导了。想想看，希拉里步我的后尘！他们跟我们当初犯同样该死的错误。"

他压低声音，继续说道："不是说他们设置障碍——尽管他们可能会这样做的——而是他们表现得像是在设置障碍，或做错了什么事。我们就是这个错：给人留下做错事的印象。其实不过是他们两人之间的事。她跟他说不能叫特殊检察官，而他知道必须这么做。她不停地瞎搅和，他们俩全都罪大恶极。"

白宫给人留下设置障碍的印象：妨碍调查、默许指派特别检察官、不断地否认错误，诸如此类，尼克松实在太熟悉了，一切都很难逃过他锐利的目光。克林顿夫妇言词闪烁，拒绝立即为检查人员提供全面的合作，这显得他们缺乏判断力，表明他们有罪。尼克松对他们愚蠢的做法感到目瞪口呆，不禁认真地反问："难道没有人从水门事件中学到些什么吗？"

克林顿政府的人显然没有从尼克松的灾难中吸取经验教训，他感到费解和有趣。这是又一起由总统自己造成的灾难。尼克松无法理解，当初克林顿夫人之流迫切把他拉下马来，现

在他们自己的行为举止居然跟当年卷入水门事件的人没有两样。那些人曾理直气壮地谴责尼克松及其政府，现在居然犯同样的错误，同样笨手笨脚，出现同样的道德失误，他觉得实在是不可思议。如果共和党像民主党对待水门事件一样，也热切地抓住这个丑闻，大做文章，那么，对尼克松的裁判就会显得更公正。

他希望共和党人加紧调查，但还是不相信会出现类似水门事件的大溃败。1 月 21 日，他说："我看鲍伯·菲斯克要出任白水事件的特别检察官。我不太了解他，可如果他是贝克一类的人，我们就完了。我们这时不需要温和的、上层知识分子一类的人；我们需要强硬的杂种。我还是觉得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克林顿在报界的朋友会竭力地保护他。我们那时可没有这样的好条件。"

克林顿像他的前任尼克松一样，对丑闻不理不睬，希望由于它自身的错综复杂，自然会烟消云散。但与尼克松不同的是，他没有把自己的声音录下来，没有提供可以指控自己的证据，没有助对手一臂之力。不管他有没有报界朋友的保护，他不像尼克松那样身陷其中，而是与丑闻保持距离，不受侵扰，这对他十分有利。

2 月 10 日，尼克松与前总统布什在电话上交谈以后，变得十分沮丧：共和党与民主党对付丑闻的方式截然不同。"他没有提到白水事件，可你知道他会偷偷地欢喜雀跃。"他对我说，"当然啦，除非我们的人让这个机会白白溜掉。商业部长让·布朗和国会议员唐·罗森科夫斯基就是这个情形。这些家伙腐败透顶，罪孽深重，可他们还是逍遥法外。全是我们的人的错。他们就是办不了大事。批评我的人都说水门事件是

我们白送给他们的礼物;现在克林顿白送我们礼物了,可没有人去取来用。

"必须说明的是,水门事件不像这个情形,当时没有人从中渔利。现在却是滥用职权加上金钱收益。我记得他们为了1 000 美元就揪着商业部长毛利·斯坦斯不放;现在让·布朗拿了几百万,却没有人做点儿什么。

"你看希拉里,当时在弹劾委员会里大喊大叫了 18.5 分钟,现在她自己可受到小小震动了,快要给人撕碎了。"

最后几句话尖刻地抨击了某些人的虚伪。他们称水门事件是典型的滥用总统职权,他们自己却矢口否认,捏造借口,以消除自己犯下的错误。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总统都有不符合伦理道德的行为,但似乎只有共和党人尝到了苦果。同时,公众目睹了水门事件以及后来各种不体面的事情,大多对丑闻的影响习以为常。他们麻木不仁,并不像在尼克松时代那样要求总统下台。他们只是谴责一番,然后国家的一切事务照旧进行。如果美国人民对政府的腐败行为已经不以为然了,高层人物不符合道德规范甚至是非法的行为已经不再引起他们的关注了,那么有选择地对某些人而不是其他人提起公诉,并不能改善这种情况。尼克松相信,共和党人不能为这种玩世不恭的情绪火上浇油,应该对民主党采用同样的衡量标准,削弱双重标准的作用,以促使双方更加遵守道德规范。

令尼克松惊奇的是,报界仍然在报导此事。"双重标准还在起作用,不过他们至少在作后续报导。"4 月 4 日,他说,"他们不会喜欢这样做的,克林顿是他们的人。不过只要他们嗅到些异常的东西,他们就会不顾一切地把它弄到手。汤尼·刘易斯的专栏暴露了他们的偏见:他说新闻界夸大其词。你能

相信吗？他们说这一点儿都不像水门事件。我倒要说，这事儿更糟。在水门事件中，我们没有投机获利，我们也没有团伙。

“我记得在我辞职的前 -天晚上，艾迪·柯克斯说：‘这些人恨你。’他指的是希拉里和纳斯波姆（克林顿白宫顾问、水门事件律师伯纳德）那帮人。我们的人现在没有那于劲追着他或她。要知道，1973 年年初的几个月，水门事件并没有影响到投票结果，但等到欧文委员会启动，上了电视后，就了不得了。等听证会开始后，这件事情会受到更多注意的。至少让我们希望它会受到更多人的注意。

“我要打电话给多尔，让他找些机灵的人进委员会。咱们可不能让一群呆瓜去提问。”

尼克松这一回的做法比较特殊，他向多尔提议应该选什么人组成国会委员会，调查白水事件。他想让共和党的听证会最大限度地给公众留下印象。如果他们拿不出有破坏性的证据，没有惊人的证词，产生轰动的指望就会落空，公众将会同情克林顿。因此，听证会应该小心操作，所选的人不能只顾眼前的政治利益，应当有责任心，有志于揭露错误，最终让克林顿承担责任。尼克松认为，终于又有一位总统必须受到他所经受过的标准的审判，这就是公正。

“克林顿和希拉里妨碍司法，也许更严重。就是这么回事儿。”4 月 13 日，他看了晚间新闻后说道，“我们的人不要害怕抓住这件事情，把证据都抖出来。水门事件犯错误了；白水事件也犯错误了。我付出了代价；克林顿也应当付出代价。我们的人不能让这事儿沉寂下去，不能让它消散掉。”

这是对公正的迫切要求，它不仅体现在对有犯罪嫌疑的

总统提起公诉，而且体现在下列历史的分析中：如果尼克松应当而且必须接受最高道德标准的裁判，克林顿也应当接受同等标准的裁判；调查记者蛮横地搜寻尼克松总统不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他们应当同样对待其他总统。总统应当坦诚正直，不是因为法律的制裁威胁着他，而是因为职位的义务要求他这么做。

但这只是理想中的政治体制，不存在于现实中。尼克松相信，美国的政治进程充斥着双重标准、意识形态争斗、新闻界的影响。只要是人在掌权，只要是人在进行报导，它的政治进程将永远不会得到修正。但他仍有一线希望，希望后人在书写历史时，会与他的总统任职隔开一段时间和一定距离，把他与前后总统进行一番比较，把他的功与过摆在一起进行评断。

我们最后一次谈论水门事件是在 4 月 8 日，五天后，我们最后一次讨论白水事件，九天后，尼克松严重中风。这一天，他感到"不太舒服"，要求我到他家中见面。我走在他府邸前面的小道上，听见他在三楼敲敲窗户。我抬起头，见他从书房向我挥手。

"噢！嗨！"等我来到楼梯顶层，他对我说道，"进来，坐下。昨晚的新闻没什么东西。太没劲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要知道，我得了解究竟都发生了些什么，我必须看新闻。可其实我倒希望自己可以不用看新闻，像度假的时候啦，或者克里斯托弗来这里啦，他要看《洛克福特资料》，我就看不成新闻了。"

他正了正领带，从书桌里拿出一张纸，向我走来："这里，"他递给我说，"读读吧。不，不用读全部，就读我画线的部分。"

这是从《经济学家》1994 年 3 月 19 日那一期上撕下来的

一页，文章评论了詹姆斯·卡农写的杰拉德·福特传《时间与机遇》。尼克松圈出来的段落赞扬了卡农，说他详细地描述了尼克松“那个阴险的人物”所撒的“弥天大谎”。尼克松在段落的边上画了个惊恐的感叹号。

“嗯，你觉得怎么样？”他问道，“以前称我是邪恶，我想‘阴险’倒是个新词。这就是我要面对的。不管我做了多少好事，道歉过多少次，付出多少代价，都没个完。就是这么回事儿，”他指着文章说道，“一直都会这样了。”

我说，是他自己选择离职后仍然在公众面前出现，他答道：“如果我躲到洞里去，他们就赢了。他们恐吓威胁，逼我屈服，这就是他们的目的。我当然不干了。”他露出洞察一切的微笑，“他们害怕我会杀回来，我在这方面是有先例的。《尼克松回忆录》是第一步，让我开始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该怎样弥补。我抽身引退后，花了几年时间回想往事，终于明白了一些重要的事情。”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在空中敲着。

“首先，水门事件是个三级盗窃案，对国家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你看，不管通过了多少道德法规，不管多少政治家因为丑闻丢掉了事业，政治都是个肮脏的勾当。谁也不会从政治中得到点儿教训。不管是什么人，一旦自己掌权，都不会真正从别人的错误中得到教训。所以，尽管我成了各种阴谋诡计的受害者，但我能理解，这就是游戏规则。

“当然啦，我不是为水门事件找借口，我倒是觉得这事儿越发不可原谅。报界愿意为肯尼迪和约翰逊掩饰这类罪行，可只要我做点儿什么，他们就会铺天盖地地攻击我，我早该明白这一点。我没有为自己和职员制订更高的标准——嗨，从罗斯福开始定下了游戏规则，肯尼迪和约翰逊作了改进，我就

按规则来办，结果呢，我们都知道的，全错了。"

他使劲眨了眨眼："我一直都知道存在着双重标准；我只是没有想到，轮到我就变成三重标准了！我说水门事件属于政治上的长期纷争，我的意思是：不管我犯什么事儿，反正敌人一心要抓住我的把柄。我给了他们水门事件，他们就疯狂地捏造罪名，他们甚至用不着捏造，水门事件本身就够了，更不用说他们控制住对我们政党的政策的投票，要弄他们政党的力量。"

"水门事件最初是轻微的犯罪，等我卷进去后，就变成重大罪行，等报界和他们那伙人把它抓在手里，就变成国家的问题了。当然了，我可以这么说，应该把有关的人都开除，马上追查出真相，立即把它拿到美国人民面前去。可我又想，即使当时这么做，结果还是差不多。"

"您是不是觉得抨击您的人总能找出办法把您拉下台？"我问道。

他摇了摇头："我想水门事件很严重，他们做梦都没想到会有这种好事儿。"

我问他，是他自己给了他们摧毁他的弹药，他怎么面对这个现实。他回答说："嗨，要知道，你毁掉了自己用一生建立起来的事业，也伤害了身边的人，这很难让人接受。"他说，"非常难。但我还是接受现实。要想战胜灾难，对家人和国家作出补偿，我必须接受现实。在我一生的沉浮中，这是主要的失败。"

"也是个重要的失败。"我说道。

"是的，但要想完全恢复元气，就得这样。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总以为水门事件是最后一场政治斗争，可看了这个，"

他指着我手中那篇《经济学家》的文章说道，“我明白这才是最后一场政治斗争。”

每当尼克松回顾当时的情景，想到自己的失败和痛苦，都万分伤感。按照他的说法，为了生存，他不仅要当水门事件的主角，而且必须又是它的旁观者。他必须把他在丑闻中的活动与他对丑闻的分析区分开来。他保持一定距离进行观察，不仅能够了解水门事件的影响以及他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而且得以把当时的他与晚年的他区分开来。他努力把握自己的政治生活，竭力恢复自己的地位，接近权力中心。他仍然可以影响到人与事，只是作为东山再起的人，需要细致与耐心，不能像大权在握的人那样随心所欲。尼克松决心不让敌人称心如愿，他不断地考验自己的勇气，强迫自己面对他最恐惧的问题和经历。他常说，通过努力和全身心的奉献得来的胜利，那种“在山顶上的感受”是无可比拟的，但他不允许自己过分沉溺于兴奋之中。他在我的钢琴上弹奏《重现美好时光》，一时放纵自己的喜悦之情，但他只是在极个别的时候这样做，他经常严格地控制自己的情绪。

他对水门事件这一闹剧的思考，体现了他那传奇般的性格中的矛盾与冲突。他的解释有时安详，有时却充满激情，他激烈地抗争着，他为捍卫自己而辩解着，他的批评那么辛辣，他的歉意那么真挚，他又是那么坚定地无怨无悔。他在愤怒中反击，他在沉思中悔罪，他在悔恨与理解当中，走过了痛苦的旅程。

他独自经历着心理磨难，但他赢得政治尊严的漫漫旅程却是有目共睹的。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前总统，他化劣势为优势；他曾达到极顶，又坠落深渊。亲人过早的逝去会更增加我

们对亲人的怀念;同样的道理,水门事件为他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假使他顺利地完成了第二次任职,就不可能如此引人注目。他充分地理解到这一点,因此他努力保护自己独特的地位,凭着自己的才智,慢慢地走向复活。

尼克松担任总统时,认为自己不但拥有强有力的总统所应具备的眼界,而且能够处理好管理的细节活动。但一个不起眼的水门盗窃案引发了种种琐碎又充满危险的问题,令他深陷其中,阻碍了他的宏伟规划。多数政治家碰到他所经历的创伤,一定会一蹶不振,他却能够恢复生机,即使是最恶毒的敌手,也不免对他肃然起敬。尼克松是因为自己的意志毁掉了自己,但又是同样的意志使他重新站立起来。

然而,水门事件的错误不可避免地萦绕着他的一举一动。丑闻为美国政治笼罩上危险的阴影,加剧了政治上的不信任感。美国的政治丑闻并不是始于水门事件,但这一事件加速了政治的毁灭性倾向以及奥利弗·诺斯所说的"政见纷争的犯罪化"。尼克松意识到自己在这个毁灭性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他并不企图逆转这一进程,而是削减它的影响。他的下台对他打击极大,但他努力地作出积极的贡献。他不仅是在弥补错误,而且为有犯错倾向的人提供警示。尼克松作出过若干错误的决定,结果他杰出的事业暗淡了下来,但他用余生与不良的后果进行搏斗。

尼克松在构思最后一本书《超越和平》时,渴望讨论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堕落问题,因为这一威胁会损害美国长期以来树立的道德榜样。在美国,对政府的不信任感不断加剧,道德的沦丧越来越广泛,这种崩溃与尼克松的经历十分相似。他希望讨论这个问题,但他意识到自己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的位

置,只好放弃。

"我们的伦理道德观念在分崩离析,我真的觉得有必要谈一谈。"1993 年 12 月 16 日,尼克松说道,"在这本书里,该谈的都谈到了 我如果没有那个问题的话,会更深入地探讨它。应该由我来谈论伦理道德的衰落问题;可是因为有水门事件,我谈起这 类东西会让人觉得不可信。批评我们的人会说:'尼克松是什么东西,居然谈起这个了?还不是他 手造成的!他在水门事件里是主角,在越战中也是主角,他不光彩地辞职。'战争和丑闻。就是这样。我每天抨击他们,可每回这么做,都要付出代价。看看这些文章——'不光彩的前总统'、'邪恶'。你明白我的意思。已经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大家又那样看待我,想让人们接受我的观点,这不免会受到影响。所以嘛,虽说我担忧美国的堕落,关心某些人的政治性格——像克林顿——我是对的,可是我不能公开说出来,这样会给他们骂死。实在不值得,这真悲哀 "

这些话令他痛心,但他明白,水门事件让他永远不能公开谈论国家的伦理道德状况。在这个事情上,他不是可信的见证。他在面临挑战时总是迎上去,而这一次,他只是把它放置一旁。

如果坦诚正直的品格——而不是秘密勾当、妥协让步、互相给予好处的交易——能够取得良好的政治效果,政治家将会全部成为圣人,民主也就没有必要了。我们为了对抗政治现实,特别是在水门事件以后,通过了 系列旨在摧毁人性和政治本身的法律。但新的伦理道德法则不仅失败了,而且摧毁了许多政治家和其他没有出错或出错甚微的人。结果,人们不但永远鄙视政治,而且鄙视从政的人 在这种体制下,行

为稍有不检,公众就义愤填膺,但他们无视隐藏着的腐败,除非某个政治演员将它表演出来。

尼克松本人与现代美国丑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只有在同水门事件之后的各种丑闻进行对照的前提下,才可以恢复名誉。他承认自己加快了不信任感的蔓延,但他拒绝让这一角色成为自己的最终形象。在辞职后的日子里,他建立了出色的政治生涯。在那些年里,他探讨了令他关注的问题和事业。他将过去铭记在心,对未来充满希望。最后,胜利与悲剧携手而至,他悔悟谦卑,却又桀骜不驯;他吸取教训,终于获得了新生。

第二章　肯尼迪、克林顿、托马斯与派克伍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1992年2月7日，尼克松说道，“人性如此，我们总会屈从于某些东西：也许是权力，也许是金钱，也许是酗酒或者毒品，也许是四处行骗。克林顿和肯尼迪嘛——那些他们全有了。可不管怎样，这是事实。只要政府是由人来管理的，总会有丑闻出现的。”

政治丑闻蕴含着爆炸性能量，能够摧毁个人生活和事业；而政府工作人员的个人绯闻也会有同样的效果。水门事件由政治丑闻演变为个人危机；克林顿总统、最高法院法官克莱伦斯·托马斯、参议员罗伯特·派克伍德以及肯尼迪总统去世后，他们的个人绯闻则演变为政治危机。不管怎样，

他们的情形表明，两种丑闻通常混在一起，合二为一。

尽管政治性格通常是个人性格的延续，对于政府工作人员来说，把两者协调起来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往往造成某些破坏。他们愿意在白宫、参议院或椭圆形办公室为某些政治准则而战；一旦摄影镜头和记者不在眼前，这些准则可能就不会在他们的个人行为中得到体现。他们也许会发表言论，支持妇女问题，却对身边的女性进行性骚扰；他们可能会展示出婚姻美满的公众形象，却在私下里搞婚外活动；他们可能会大谈家庭观念，却不尊重自己的家人，使家庭蒙上耻辱。他们必须在表面形象和个人品性之间取得平衡，因此不断蒙骗别人，不断欺骗自己。这种双重人格的生活最终往往轰然崩溃，招来公众愤怒，导致个人悲剧。

政治丑闻可以通过独立的律师会和国会委员会进行调查，政府工作人员的个人绯闻却可以免于正式的谴责，除非它涉及到犯罪。但是，如果个人危机使政治家无法正常工作，或给他带来奇耻大辱，公众可以自行提出责难，要求他辞职或不再选他。

在过去，候选人和官员的私生活受到个人隐私权的保护。现在，不管公众是否重视，它已经理所当然地成为竞选活动中的重要问题。“性格问题”曾是公众决定某个候选人是否称职的重要参照。一个人在个人生活中自律、谨慎、稳重，意味着这些美德将很可能在他的公众生活中得到体现。

然而，这些道德规范变幻莫测，政府工作人员总是奋力地重新审视：什么事情可能毁掉他们，什么事情会得到谅解。1988年，总统竞选人盖利·哈特被指控有桃色事件，因此没有资格提名为民主党候选人。四年后，比尔·克林顿同样被指控

有不忠的行为，这却不妨碍他的候选人资格。国家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在改变，评定政治家的标准也随之改变。尼克松观察着各种丑闻，审视其破坏力量，却很难跟上变化中的行为规范。

"肯尼迪夫妇在这类事情上开了先例。"2月7日，我们在讨论对克林顿不忠行为的指控及其对他候选人资格的影响。尼克松接着说，"乔·肯尼迪经常鼓励那帮男孩出去胡闹。他给他们安排女人，让他们放纵，不管他们有没有家庭。也许正是因为他们有家庭才这样。对他们的妻子一点都不尊重。毫不尊重。"他的目光充满鄙夷，"你看，他们得这样证明他们是男人，得到他们的父亲的赞许，一点都不在乎那些可怜的妻子。那些女人——杰基、伊塞尔、乔娜——难过得要命，特别是可怜的乔娜。自己的丈夫（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在晚会上喝得酩酊大醉，跟个年轻姑娘上了一辆小汽车，从桥上开了下去，结果把她给弄死了。你能想象吗？"他摇了摇头，"我的上帝啊！难怪她要酗酒。整个破烂事当中，她还得跟他站在一起，包括帮他遮掩。"

他压低声音："要知道，警察只用了不到三天的时间调查帕奎迪克事件。还遮遮掩掩！每个人都在替他遮掩。可那家伙现在还在参议院里，还是妇女组织的英雄。她们爱他，因为他支持妇女解放运动；她们根本不在乎他毁掉的女性已经数不胜数了。"

尼克松认为，正是由于肯尼迪那帮人的行为有失检点，人们才渐渐地开始审查个人的行为是否腐败，以判断此人是否适合政治工作。曾经使美国政治充满活力的道德精神开始涣散了，但很明显地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只要官员能够负责

地执行公共义务，人们就会认为他的个人性格无关紧要；但人们仍然要求他的政治性格必须无可挑剔。这种安排最终站不住脚，受害者似乎很不固定：1988 年盖利·哈特因为生活不检点受到惩罚，而 1992 年克林顿却安然无恙；1974 年尼克松的水门事件掀起了轩然大波，1987 年里根的伊朗门事件却风平浪静；1991 年克莱伦斯·托马斯因性骚扰而被指控，1994 年克林顿却不受责难。尼克松审视了这些反常的现象，相信之所以只有一部分人受到指控，主要不是因为他们行为不检，而是因为他们的政治思想有差异。但是，最终因丑闻而受到伤害的是我们乐观的体制，它过分地相信人性在本质上是善良的。

1992 年 1 月，克林顿被指控为不忠实于家庭。尼克松对这位候选人以及国人的反应十分感兴趣。当时，阿肯色州的卡巴莱[①]歌手杰妮弗·弗劳尔斯声称她与担任州长的克林顿有 12 年之久的两性关系，她有两人的谈话录音为证。克林顿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不理睬她，或者直接面对这些指控。克林顿采取的措施近似于尼克松 1952 年的基金演说。他把这个案子直接拿到美国人民的面前。

1 月 26 日，这位民主党竞选人独占了《六十分钟》节目的电视访谈，身边就坐着他那位尽职的克林顿夫人。克林顿驳斥了对他的指控，只是承认过去曾有过婚姻问题。他的策略使选民们相信，既然所指控的事对于这对夫妇来说纯属子虚乌有，那么对于选民来说当然也是子虚乌有。更重要的是，克林顿既把它作为私人问题淡化，又把它作为政治问题淡化。

① 一种有歌舞或滑稽短剧等表演助兴的餐馆或夜总会。

"他明白指控是对的，否则他会轻轻松松地撒谎，不必上电视去费那么大的劲摆脱它。"1 月 28 日，尼克松说道，"现在，玩弄女性的指控交到选民的手里，由选民自己决定是否选他。要不要选一个通奸者呢？现在这得由他们选择。在肯尼迪那时候，大家什么都不知道。知道的人要么保持沉默，要么跟他串通一气。可现在，选民碰到难题了。他们是不是真的会选一个欺骗妻子的人？"他停了停，"要知道，也许这已经不重要了。看看吧——到处都是性、毒品、暴力。这些东西意味着一个超级大国的衰落。希腊曾有类似的经历。罗马也是如此。所有伟大文明的衰落，都是因为人民变成了自私自利、不道德的动物。

"记得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吗？那是在六七十年代。反正统文化——他们是这么称呼它的。反正统文化就反正统文化吧，可是非常非常糟糕。伦理道德都给从窗口扔出去了。谁都不关心别人，只关心自己。'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做——就是这个说法。他们也确实这么做了！结果会怎样？严重的毒品问题，不负责任的性解放，更多的暴力。全他妈的一团糟。"他向前探了探身，"我跟你说，克林顿是否犯有欺骗罪，人们可能觉得并不重要，原因是他们很多人自己就在搞欺骗。"

发展到现在，担任总统职位的人不再是能够为全国作出道德表率的人，而是像其他人一样，不能抵制并且愿意承认自己不能抵制人性的弱点。尽管尼克松承认自己毁坏了理想中的总统的政治形象，但是，理想中的总统的个人形象在衰退，尼克松对此深感不安。如果政府的目的，尤其是总统职位的目的在于激励人民、教育人民、启迪人民，理论上说，那些担任政府职务的人应该成为最佳的道德榜样。我们的缔造者在设

计总统职位的时候，希望担任这一职务的人不是像“我们当中的一个”那样的普通人，而是一个从根本上比我们强的人：是道德品质的体现，是我们所有人向往的榜样。这是个顶点，既然全国人民只选出这么一个人，总统有责任成为充分发挥个人潜能和国家潜能的象征。由于政治丑闻，尼克松令大家失望了；由于个人绯闻，那些在他之后的人把可接受的行为标准降得更低。

1992 年，克林顿的当选向尼克松证实了，全国人民对个人的伦理道德采取了更加宽容的态度。许多人对总统候选人的德行的要求大大地降低了。自己的总统曾经在战争时代逃避兵役，承认服用过毒品或者对婚姻生活造成过“痛苦”，例如克林顿，人们已经不再觉得这是个丑闻。某个人在私生活中背叛了家人，这不再意味着此人不具备担任政府职务的资格。个人性格不再被看作是政治性格的重要体现。一个人在私生活中缺乏判断力不再标志着他在政治生活中同样缺乏判断力。

“我说不出什么明显的理由，”1992 年 11 月 8 日，在竞选的五天后，尼克松说，“可我总觉得人民愿意选像克林顿这样的人，他在私生活方面如此恶劣，国家真是每况愈下了。我是个现实主义者，他们那里的事情我什么没有见过？罗斯福、肯尼迪、约翰逊，他们都有桃色事件，可当时没人知道，国家也就幸免于难。现在大家却听之任之 总统是个玩弄女性的人？那又怎样？”他双手在空中一挥，说，“60 年代的观点是：大家都这么干，所以我们现在也抱着这种态度。咳，事实并非如此啊。不是每个人都服用毒品的。我的女儿们就没有这么做。也不是每个人都是性解放或者瞎胡闹。我们对它习以为常

了,所以我们的文化就宽恕它,任其到处泛滥。我的上帝啊!晚间新闻后一般我都是要关电视的,节目太差劲了。前几天晚间新闻后我没有关电视,我真不敢相信,他们都放了些什么东西啊:几个演员服用毒品过量,一个影星的第二次婚姻,还有充满暴力的闹剧。你信吗?一切似乎再正常不过了,一开始连我也这么觉得。可我后来意识到,在那半个小时里,电视上给我看了些什么呀,于是我就不觉得正常了。”

他用钢笔指着我说:“所以你看,人们会选克林顿,那是因为他们四周都被道德败坏的东西包围了,他们已经到了无动于衷的地步了。所以他们坐在那里听他大谈什么保健啦,拯救鸟类啦,改变政府啦等等,可一说到他的个人品格,大家就不会明辨是非了。

“报界也搞这种垃圾,给我们灌输什么‘私人方面如何并不重要。人们只要求他把事情做好。’所以就是这个结果了。大家听得久了也就信了,就是这样。我们的总统在道德上什么都不是,可既然他是个自由主义者,怎么样都没关系。”

尼克松担心既然克林顿的个人绯闻在竞选活动中没有提及,如果白宫出现政治丑闻,也会被淡化的。降低伦理道德要求的先例已经摆在那里了,这样,受到前一代人谴责的行为到现在已经很难让人感到愤慨了。这个发展趋势实在令人担忧,但尼克松不能公开谈论它,因为它的根基是越来越严重的玩世不恭的风气,而水门事件在促成了这一风气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1978年,国会通过了政府制定的伦理道德法规。水门事件后,新清教主义兴起,国会借此机会,竭力清除政治上的堕落和腐败行为,但它没有意识到,旨在与政治腐败作斗争的伦

理道德标准毫无成效，可有可无，正如其他为了与人性作斗争而制订的道德标准一样。

国人对肯尼迪和克林顿的个人绯闻漠不关心，其中体现了文化的巨变。对于尼克松来说，这表明现在的政治游戏已经采用了一套新的规则。肯尼迪和克林顿动用了领袖气质和个人魅力等有力的政治工具为自己的个性弱点开脱，获得了政治优势：人们很容易只联想到个人的缺憾，不会联想到政治上的缺憾。也许只有担任总统职位的那 41 个人才能够与滥用总统权力的罪名联系起来，但几乎每个人都能理解个人背叛和欺骗的罪名。

那么，在个人这一层面上，一切都容易得到宽恕。肯尼迪和克林顿的过失被看作是人性的本质弱点而得到开脱；尼克松的过失由于是政治上的，因此成了冒犯全国人民的罪孽。尼克松努力把握正直的个人德行与正直的政治德行之间的区别，努力去协调它们，并判断两者的明显脱节在选民的心中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然而，他对 1991 年 10 月 6 日发生的事仍然毫无思想准备。那天，《纽约每日新闻》刊登了俄克拉荷马的法律教授安妮塔·希尔对最高法院法官提名人克莱伦斯·托马斯的指控，罪名是性骚扰。她宣称，1981 年年底和 1982 年大半年中，她与托马斯在争取同等就业机会委员会一起工作时，托马斯对她进行性骚扰。她的描述生动具体，令人震惊，并产生了极大的政治轰动。司法委员会的 14 名男性参议员负责主持听证会，听取托马斯的确证。他们没有料到后面还必须对指控进行一次公开讨论。他们原来以为，托马斯在里根政府中是个卓越的黑人新保守主义者，联邦调查局对他曾进行过四次调

查，而且他已经获得了参议院的确认，因此他的确证应该可以轻松过关。委员会成员用了八天时间举行第一次听证会后，准备将投票结果送交参议院全体成员，但紧接着他们又认定需要再花些时间调查希尔的指控。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感到投票将平淡无奇，顺利过关。他们没有料到，就在 10 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一场罕见的闹剧渐渐展现出来。他们也没有料到，托马斯的政治生活已经通过了严密的审查，无懈可击，但他的对手居然会找到他们能够下手的地方，对他进行指控，这就是他的私生活。

对希尔指控进行调查，这不免牵扯到重大的政治利害关系，各种变幻莫测的社会问题纷至沓来。听证会一波三折，出乎意料，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可以与电视播放的其他历史剧相提并论：1947 年的希斯事件，1954 年的军队—麦卡锡听证会，1973 年的水门事件听证会，1987 年的伊朗门事件听证会。这些听证会在不同领域具有突出的特色，托马斯的确证同样突出了不同领域的各种问题：在体制领域是参议院问题，在文化领域是妇女问题，在政治领域是堕胎问题。

10 月 8 日，这些指控吸引了尼克松的注意。当时我们正在他的办公室里检查《只争朝夕》的毛条校样。作完修改之后，他把书稿扔到地上，取下眼镜，用眼镜指着我说："你对克莱伦斯·托马斯的性骚扰事件有什么看法?"

"嗯，详细情况我不太了解……"我说道。

"那么你说说看对这件事有什么总体的看法。"他说。

我跟他说，许多这类的指控是合法的，但这类案件轰动很大，削弱了问题的可信程度，因此得不到认真的注意。由于事情发生时没有其他目击证人，受害者往往不敢走出来，这些指

控也就很难证实。

他又用眼镜指着我说："好吧。可正常谈话与骚扰之间有什么分界线呢？比如说，什么时候赞扬成为一种伤害呢？"

我答说，当它被有权势的人当作武器威吓另一方的时候，就会产生充满敌意的氛围。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那么说，男人——多数男人——利用它从跟他们一起工作的女人那里获得，嗯，他们想要得到的一切。"

我解释说，没有人愿意应付这种不受欢迎的挑逗。他思考着下一个问题说："他们怎么证明呢？好像总是一对一地对质啊，是不是？"

"那当然啦，"我答道，"没有目击证人就很难证明。那些男人有这种行为的时候，有几个会允许他人在场呢？"

"我就知道一些人。"他笑了，"有性别歧视的杂种。"

令人吃惊的是，他对这一话题十分好奇。他那一代人对性骚扰一词及其影响完全陌生。他似乎决意了解它是怎样演变为社会问题的、它对政治舞台可能带来怎样的冲击。他以公诉人的精确细致，询问什么构成性骚扰、如何证实，这些标准如何运用到这个案例中。

"关于性骚扰的问题，我一直在思考着你说的话。"第二天早上，我们碰头讨论时，他对我说道，"在这个时代，这个年头，男人居然会轻视女人，这样就让自己觉得很了不起了，我觉得实在太有趣了。哪个家伙这么做——我的意思是，正如你描述的那样，说些不恰当的奉承话，阻挠女性的发展机会——这种人好像对自己的能力非常没有自信心。我不知道他们是想要找个女朋友还是害怕丢掉官差，还是别的什么，不过我能明

白你所说的让女性觉得不舒服是什么意思。"

他从地上拾起报纸:"我认为,这个案件的细节实在肮脏。可你猜测她为什么要等上 10 年才捅出这个鬼事呢? 这就给整个案件笼罩上疑虑的阴影。她听上去像个受凌辱的女人,可她现在的所作所为会剥夺其他有同样遭遇的人的均等的机会。"

我说,关键是要把对于性骚扰的总体看法与当前案件的详情区分开来,尼克松同意了我的观点。

"司法委员会推迟投票表决,继续调查,这意味着他们在政治上要遮掩此事。委员会的男人不认真处理这件事的话,妇女组织早就发狂了,早就发生骚乱了。他们可能意识到希尔的指控纯属子虚乌有,可他们必须坚持搞下去,不然他们准会被宰了。都是政治策略,在她那方面和委员会方面都是如此。"

10 月 10 日是听证会的前一天。这个问题继续让他着迷。他马上看出听证会有可能成为党派之间、性别之间、种族之间的政治拉锯战。当年,希斯的听证会因为指控的是间谍罪而受到全国的关注,军队—麦卡锡听证会则阐述了共产党的颠覆活动,令旁观者目瞪口呆。现在,这些听证会同样令全国人民着迷,因为争辩的中心是两大社会问题:性骚扰和堕胎。

"我在新闻上或其他什么地方听说过,一位妇女声称自己受到伤害了,因为一个男人跟她说她很漂亮,他真想围着桌子追逐她。"在尼克松的办公室,他坐在我对面跟我说道,"现在,我明白称赞一个人是怎么把事情弄得一团糟的。他跟她说她长得漂亮就行了,可他太出格了。是不是?"

我告诉他，这要视他们的工作关系而定，否则无伤大雅的客气话都可能构成性骚扰。

他非常震惊："是吗？我的天啊！啊，我同意说它不合适，可说到性骚扰？我真看不出。"他抬了抬眉毛，"也许这些女人太敏感了。"

我问他是不是故意唱反调，他大笑："我把你给惹恼了。继续说吧。"

我解释说，女性希望能够在安全的环境工作，希望评判她们工作的标准是她们的成绩。不得体的举止和赞扬会贬低和侮辱对方，也会使冒犯者自己显得不光彩。

"我明白了，"他双臂交叉着回答道，"可我也看出这会被滥用的。比如某个人没有得到提升，她就可以提出性骚扰的指控！关系处得不好？性骚扰！问题就在这里：由于太多虚假的案子弄得一团糟——我想这个案子就是个例子——真正合法的案子就得不到公正的裁决。所以整个事情就完蛋了。"

我说，反对托马斯的人对他提出一些无法证明是与非的指控。他答道："不错！他们可以拿性骚扰来指控他，以后还可以拿他的想法指控他呢！"

"我想，"我说，"这些听证会跟性骚扰没有太大关系，可是却关系到……"

"堕胎问题，这我知道。"他说，"如果我是布什，托马斯被击败了，而我又必须另外提名，我就让他们看看，选个女性的白人反革命者、彻头彻尾的反堕胎者。这会把他们气疯的！可你看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呀？他是个反堕胎者，他们一心要摧毁他。他在政治上没有问题，他们就在他本人身上做文章。"他顿了顿，"那些听证会会比水门事件还热闹。"

"可得小心了,这些参议员最好马上击垮她的信誉,不然他们就要失去一个优秀的法官了。问问她为什么等了这么久才跳出来。问问她是否向妇女组织(全国妇女组织)反映过,或者那个什么组织来着?——全国堕胎权利组织(全国堕胎权利行动同盟),或者向其他什么人反映过没有?如果她反映过了,他们会证实的,这不就结束了吗。她的本来面目就显露出来。"

"堕胎斗争中的一个武器。"我说。尼克松点头表示同意。

"您不相信她吗?"我问。

"我的直觉说,不,我不相信她。"他回答道,"可我还是等听证会结束后再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10月11日,星期五。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召开听证会,调查希尔对托马斯的指控。在电视摄像机前,她详细地描述了托马斯对她的骚扰和言辞上的侮辱。她的证词在性方面的描述十分详细,听起来令人尴尬。她描绘了她的羞辱和心理上的困境。她暗示,这是典型的性骚扰,这就是一个男人在女人拒绝了他的勾引之后的反应,而现在,这个女人敢于反击了。

尼克松惊呆了:"你能相信我们今天听到的话是从美国参议院传出来的吗?"当晚尼克松打电话问我,"我的天!我以为是在看电影——一部肮脏的电影!——哪里是确证听证会啊。我不得不说,她可真够坚定不移的了。她睁着眼睛说瞎话,至少有一部分是谎话,可她真够冷静的了。像她那样子地谈论性!我敢打赌,奥林·赫奇(参议员)坐在那里听她说那些东西,还得问她问题,肯定难受得要死!他可是个直肠子的人。莫尼卡,你知道,天啊,他肯定都想钻到椅子底下去了。还有其他人!"他笑了,"你注意到他们的样子了吗?豪韦尔·

黑弗林(参议员)? 天啊! 霍华德·米津班(参议员)? 拜托了! 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 我的天! 那个家伙在妇女问题上根本是毫无信誉可言。他看上去跟喝醉了酒似的。也许坐在那里就会是这副样子。参议员阿尔兰·斯佩克特尔和艾伦·辛普森都是很精的人,恐怕他们也只能一本正经地坐在那里。我跟你说他们出于政治原因只好揽上这事儿,但他们成立了这个特别委员会。骚扰,好吧,可听证会本身就变成了丑闻!"

我担忧地表示,参议院召开了这些听证会,但没有证实希尔的任何声明。尼克松表示同意。"问题就在这里,"他说,"还不就是妇女组织和堕胎问题嘛。"

"他们好像不明白,在这个国家,堕胎永远不可能变成非法。"我说,"尽管这个问题仍然争议很大,罗夫·韦德还是不可能被推翻的。"

"不可能,"他重复说,"作出决定的时候(1973 年),我就在那里。这个决定完全正确,妇女应该有权合法堕胎,可政府不应该参与支持它。我不是说我赞同堕胎,我也不是说它就是非法。如果有哪个总统会宣布它为非法,那个人就是里根,可他没有这么做。"

我跟他说,这次针对托马斯的策略可能会使民主党事与愿违。尼克松回答说:"我跟你说过,如果他倒下了,要是我的话,我会怎么办——提名菲利斯·希拉弗利,准把他们气疯!"他笑了,"不过恐怕他们这一次会赢的。我想托马斯这回过不了关。你看呢?"

我告诉他说,我虽然觉得他会通过确证这一关,但听证会留下的创伤会阻碍其他深明大义的候选人接受提名或主动谋求公职。

"谁他妈的愿意经历这个?"他问。

10月12日和13日,周末的时候,听证会继续进行。一群证人来来往往,或者证明希尔是可信的,或者证明她没有信誉,但都没有提供任何真凭实据。起诉人的形象越来越不讨人喜欢:这是个脾气反复无常的女人,带有浓厚的政治偏见,有过不负责任地控告别人性骚扰的历史,虚伪,不诚实,名声极坏。听证会一片混乱,最后变成托马斯与希尔互相摧毁对方的电视专题讨论会;被告人,起诉人,以及他们各自的支持者在全国人民面前都受到损害。托马斯是为自己辩护的最佳证人,他声称听证会是"利用高新技术,对不服控制的黑人施以私刑",这个时候,他自己也加入了集体的歇斯底里。所有相关的人员,包括负责主持听证会的参议员们,没有人能够控制局面。它已经不是性骚扰问题而是意识形态问题,不是当前人物的品行问题而是涉及到活跃于政治上的诸多组织的议事日程问题。正如尼克松所说的,托马斯和希尔都是在政治哲学的斗争中被人利用的工具。当时双方都明白这一点,但都无法保护自己,无法与之抗争。

10月14日,星期一,听证会全部结束,而且已经安排好在第二天投票确认。司法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拜登在听证室外叫住两个托马斯的证人,告诉他们,他相信托马斯,不相信希尔。尼克松并没有听到拜登的评论,但他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嗯,您叫我在听证会后再问您相不相信希尔。"10月15日,投票前的几个小时,我们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我这样跟他说。

他把脚架在软垫搁脚凳上:"不,我的观点没有变。我相

信他。她要么在撒谎，要么编瞎话报复他。"他说，"你看，他有可能要求跟她约会，而她拒绝了。他受到伤害了，也许有那么一两次对她说了些不合适的话。她说的什么色情电影啦，或其他什么东西啦，我才不相信呢。我相信她在故事里添油加醋，不是全部至少也是一大半。也有可能是她邀请他出去，他说不行，她就生气了，借这个机会报复他。要知道，她有可能喜欢过他。我不知道他们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无关紧要。关键是美国人对他的支持率是二比一，你又怎么解释？"

我提出两个理由：其一，希尔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指控。其二，公众将这个案件的具体事实与性骚扰这个总体问题区分开了。

"我知道，不能因为这个案件不合法，就把许多其他合法的案子抛在一边不管。"他说，"可能是有人指使安妮塔·希尔这么做——也就是说，毁掉克莱伦斯·托马斯——她这么做了，但那些真正需要提出控告的妇女可就被她害惨了。那些妇女组织伪善透了，它们根本不在乎。它们只想着要抓住他！"

他把双腿叠在一起："咳，今天就要投票了，我预计 52 票比 48 票确认他无罪。这就是投票结果。原来支持他的仍然支持他，原来反对他的继续反对他。我怀疑这些听证会改变不了那儿任何人的看法。"

尼克松的预测是正确的。投票结束后，我打电话赞扬他有先见之明。

"嗨，我以前也见识过类似的情形，所以预测这类事情很在行。"他说。

我告诉他，参议员肯尼迪说投票结果"给受害者带来了耻

辱”，斯佩克特尔回敬他说，耻辱不耻辱，不该从肯尼迪的嘴里说出来。

尼克松轰然大笑：“我喜欢他的回答！肯尼迪在妇女问题上的信誉可是百孔千疮，他不该在那里胡说八道。他坐在那里实在是太滑稽了。难怪他们限制他提问题。杰克·肯尼迪是最早的性骚扰者，特德也好不到哪儿去。还有那个林登·约翰逊——嗨，他也同样不是东西。如果咱们说的是凭性骚扰就可以取消一个人担任高级职位的资格，参议院里那帮家伙有一半都得滚蛋！”

尼克松对托马斯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他相信，他们两个人都是被比自己强大的力量伤害。两人都是深陷于各种问题和思想观念的动荡之中，被激流挟走，他们接受的评判与自己所代表的原则截然相反。这很不公正，也很不公平，但这就是 20 世纪末美国的政治现实：议事日程至高无上，人与机构都应该为它们作出牺牲。

“我这里有个民意测验的数字，你来看看。”投票后的第二天，他对我说，“你听听。”他戴上眼镜，把报纸举到面前，“超过 50%接受民意测验的女性说她们受到过性骚扰。”他摘下眼镜，放下报纸，“这会是真的吗？听上去这个数字可实在太大了啊！”

我告诉他，性骚扰相当普遍。他顿了顿说：“啊，那么这可真糟糕。可我想可能这下子男人要强烈抗议女性了，他们会不雇用她们。她们倒是可以喊说是性别歧视，可她们得想办法证明才行。你看看，如果女人老是拿性骚扰在男人头顶上挥来挥去威胁他，他为什么还要雇用她呢？干嘛冒那么大的风险？我知道这样说不对，确实有些是这种情况，可是想想

吧。对了,今天赫奇和斯佩克特尔狠杀了特迪的嚣张气焰,我真开心啊!在那里,这可是承认的代价。"

他换了个话题:"你知道,在希斯案件里,我们接受整个自由主义组织的挑战,我们胜了。"

"可在这个案子里,有利益关系的组织却反对他。"我说。

"他们还想方设法地伤害他。谢天谢地,他总算幸免于难了。"他说,"这可比我们或者我们的一些朋友强得多。"

投票确证托马斯无罪之后的两个星期,这个案子仍然驱之不散,全国人民仍然拿它来谈论性骚扰问题,以及隐藏在背后的堕胎权利问题、党派之间所耍的花招等等。尼克松决定在10月29日飞往华盛顿会见参议员辛普森、斯佩克特尔和赫奇。他们三个司法委员会成员在听证会上的表现获得了尼克松的钦佩。他们在宾馆和他谈话时,我就在隔壁房间。他们离开后,尼克松把我叫过去。

"他们都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家伙。"他说,"都很精明。斯佩克特尔这个强悍的杂种,非常认真。我们就需要让这样的人在那里。辛普森是个出色的家伙,从不漏过任何事情。赫奇是你见过最正直的人了。我真高兴他们是我们的人!"

他正了正领带,坐到我对面:"他们跟我讲了些有关希尔的有趣事情。那些证据很有破坏力。"

"他们会在公开辩论上用这些证据吗?"我问。

"不会的,那是联邦调查局搞到的。我告诉他们,从希斯事件我得出经验:往往是不起眼的东西,你认为是不重要的证据,就会毁掉证人。任何一点点谎言你都得拆穿。"

"可希尔蛮横,冷酷,又不聪明。关于她性格方面的一些证据站不住脚,可她最后还是自己毁了自己。"

最后，听证室的灯全部关掉了，希尔回到了俄克拉荷马，党派之间的鸿沟进一步加深了。民主党或共和党对听证会的解释都很难让人全部接受。听证会之所以召开，其目的不是为了对事实的真相进行公正的探索。显然，委员会对这些指控早就有所察觉，他们正确地判断出这些指控无法得到证实。但如果不是报纸发表了它们，令他们惊慌失措，听证会就永远不会召开。当然，听证会也没有搞种族歧视，因为这次丑闻与其他丑闻的模式完全相仿，没有任何种族歧视的成分。

双方对性骚扰的指控都义愤填膺，但愤怒的背后却隐藏着关于堕胎问题的议事日程，十分虚伪。结果，他们不仅损害了自己在这两个问题上的信誉，而且破坏了旨在进行辩论的政治程序。托马斯确证听证会引发全国人民讨论性骚扰问题，却没能警醒人民注意，无声的哲学战争富有欺骗性，对人民与体制正在造成破坏。

参议员罗伯特·派克伍德同样被指控为性骚扰，他的案子为我们提供了又一个生动的例子。1992 年秋季，这位俄勒冈州的共和党人准备参加第五届竞选。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党内一股进步的领导力量，支持妇女运动和民权运动，声誉极佳，很有机会提名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这位参议员的事业蒸蒸日上，未来充满了希望，可是到了 1992 年 10 月便轰然崩溃。原来，《华盛顿邮报》的两个记者向派克伍德提出，一些曾经和派克伍德一起工作过的妇女控告他对她们有不受欢迎的性骚扰。他矢口否认，提供陈述，证明这些妇女的指控不可信，这样就阻止了他们发表那些指控。11 月 3 日，他再次当选参议员。

然而，三个星期后，《华盛顿邮报》报导说，10 名妇女控告

派克伍德举止不端。派克伍德回答说，他很抱歉对个人造成“任何不舒服和尴尬”。这些指控与希尔的 -样生动具体，让人震惊；但这些陈述不像希尔的陈述，它们可以得到证实。这一次又是个人绯闻爆发为政治丑闻，个人的悲剧转化为全国的闹剧。

11月23日，内幕被披露出来。当天的晚间新闻结束后，我打电话给尼克松，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失望和恶心。“嗨！莫尼卡！你好吗？新闻里没有什么内容，我给派克伍德写了封信，告诉他我看见他的一个讲话。我看现在桃色事件给他带来麻烦了。”

“而且好像麻烦不小。”我说。

“他妈的！这些家伙出了什么毛病？”他问道，“派克伍德很精明，前途无量。可能他有些卑下，我是说他可能不是很不错的人，可他是个鬼精的参议员。现在他却把自己搅进这种烂事里面。他怎么这么蠢？又是性骚扰这类事。”

“托马斯听证会之后，他一定是惊恐万状。”我说。

“除非他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在搞什么鬼。”尼克松说，“这也有可能。”

四天后，派克伍德在医院挂号，进行一个酒精中毒诊断治疗计划，他的困境进一步恶化。尼克松和其他人猜测他之所以有这一举动，无非是为了引起人们的同情，因为下个星期参议院品德委员会将着手调查他的案子。

“派克伍德的麻烦大了。”11月28日晚上，我在电话上对尼克松说。

尼克松叹了一口气：“我知道。很悲哀。但他不该辞职。这些指控都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跟希尔的年龄一般大——

在此之前她又在哪里？啊，时代不同了……”

我问他是不是可以肯定派克伍德不该辞职。

“不管怎样，现在还不能肯定。”他答道，“咱们先看看这些指控，听一听听证会，然后再看吧。也许什么事都没有，也许麻烦很大，谁知道呢。可他现在又搞了个酗酒的名堂。我想他这样做可能想抵消性骚扰事件的影响。我不知道这么做是不是明智之举。”

“您的意思是用一桩丑闻抵消另一桩丑闻？”我问。

“很少能够生效的。”他答道，“当然啦，我们想用一些好的事情来抵消水门事件的影响——与俄罗斯人的首脑会议啦，诸如此类的事情。根本没用，而且那时我们是用好事抵消坏事。怎么能够用一桩坏事抵消另一桩坏事呢？只能产生更多的坏消息。”

我说，我认为派克伍德可能无法应付这次攻击，尼克松表示同意：“他们现在揪住他了，不会松手的。又是酗酒，又是桃色事件，我看他很难过关了。可我跟你说，如果他们强迫他辞职，他们也得强迫肯尼迪和其他有同样问题的人辞职，这意味着我们的参议院几乎一个人都不剩了。我了解这些人！”

12 月 1 日，参议院品德委员会开始调查对派克伍德的指控。九天后，为了控制住局面，减少损害，这位参议员宣称：“我原来的做法完全错误。我原来就是没有明白，现在明白了。”

尼克松摇了摇头：“我佩服派克伍德的胆量。”12 月 10 日，尼克松在华盛顿与多尔面谈后回来对我说，“但恐怕太迟了。他们根本不会让他逃过去的，尤其是托马斯已经确证无罪。我跟多尔说不能让派克伍德辞职，等到所有确凿证据都

出来再说。可你知道，派克伍德就是那种围着桌子追逐女 人的家伙，很臭名昭著了。噢，妈呀！他肯定逮住了几个，现在她们可叫他好受了！”

“您难道不觉得她们应该这么做吗？”我说，“如果她们说的都是真的。”

尼克松看着我：“如果她们说的都是真的，那当然了，他应该对此负责。问题又是他妈的双重标准。特德·肯尼迪追了多少女人？还有克林顿？噢，上帝！比你知道的不知多多少！还有其他有类似罪过的民主党人？他们那边干这种事情的人太多了——而且多少年了——你简直不敢相信。托马斯事件发生时，你跟我谈到性骚扰的事情，我都明白。好吧，继续搞派克伍德吧，可也别放过其他的小丑啊！”他停了停，“可他们不干。这只是个借口，想搞掉共和党人，就这么回事儿。”

对于尼克松来说，派克伍德事件是意识形态大战的又一个例子，只不过换了一种形式而已。如果指控派克伍德行为不端的罪名成立，他应该付出代价。但同样是犯罪，只牺牲共和党人，民主党人却安然无恙，如此区别对待是很不公平的，而且将对体制造成破坏。因此，尼克松敦促多尔告诉派克伍德不要马上辞职。如果他在党派纷争的压力下让步，对手将比预期更早赢得这场战斗。尼克松提出的建议，其目的是要迫使他们为了获得政治优势而进行漫长的、头破血流的斗争。虽然性骚扰是个值得注意的严重问题，尼克松认为这个案件会像托马斯案件一样，让人拿来当作借口，将意识形态上的纷争引入另一个领域。

派克伍德像在他前面的尼克松一样，犯了一个严重错误。1993年10月6日，他在委员会成员面前作证时，提到他的私

人日记,于是他们为了获得日记,开始了一场漫长而又合法的斗争。委员会全票通过赞同获取那些日记,名义上是为了调查他们向派克伍德的前妻提供院外活动集团成员资格时是否牵扯到犯罪行为。1993年11月2日,全体参议院成员以94对6票,同意品德委员会发出传票,强迫派克伍德交出日记。投票的前一天,尼克松非常不安,觉得是他在水门事件期间开了这类事情的先例。

"首先,争夺日记——他们居然要求他交出日记!"他说的是派克伍德的对手,"他们想要什么他就给什么!他一开始就不该提什么鬼日记。就像我们当时录音系统的情况。亚历山大·巴特菲尔德(H·R·霍尔德曼的助手)提到了它,我进退两难,只好承认我有这个系统。现在,派克伍德张开乌鸦嘴提到日记,好了,他们就有新的理由追查他和那些日记了。"

我说,他的日记跟尼克松的录音带一样,仍然是私人财产。尼克松反驳道:"很快就不是了。要知道,他不得不交上去。逃不了的。他肯定吓得屁滚尿流。可他应该照我那样做:跟那帮杂种斗到底,斗到他们筋疲力尽为止。啊,也许他会摧毁他们呢,当然,也许这意味着妨碍司法,蹲监狱。管他个屁!反正他们总要让他受苦的。"

他停了停:"这其实不是性骚扰的问题。我相信那些女人说的他确实也干了不少,他不对。可要看到他们揪住他不放的真正原因:要搞掉他的参议员的位子。就像托马斯的案子——目的是要他的最高法院法官的职位。政治!不折不扣的政治。"

尼克松说派克伍德将不得不交出日记,他的预测是正确的。1993年12月16日,美国地方法院法官托马斯·彭菲尔

德·约翰逊命令这位参议员将所有日记、录音带和手稿交给品德委员会,协助委员会进行彻底调查。日记里充满激情地写到疯狂的恋爱事件和生动奇特的幻想,结果令派克伍德十分尴尬。他最隐秘的思绪和行动突然之间毫无遮挡地暴露出来。尼克松对"桃色事件"又一次进入政治论坛十分不安。1994 年 2 月 6 日,他针对这个案子发表了最后的看法。

那是个星期天下午,我来到他的府邸,与他继续修订《超越和平》一书。在书房里,他递给我一部分书稿,在我对面坐下。

"我想咱们得把它赶快完成,"他说,"越快打发越好。我只希望这本书能够充分地论述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一切。一切变化太快了,书还没出版,里面的很多内容都给刷新了。我指的不仅是对外政策方面,那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我是指价值观念这类东西。"

"国人比几年以前更容易包容许多事情。你看,盖利·哈特由于玩弄女性这个该死的事给毁了,克林顿倒安然无恙。托马斯打赢了性骚扰这场官司,非常险;现在派克伍德又危在旦夕。这种行为不仅仅是道德败坏;身居要职的人这样做实在太蠢了。可你明白我所说的吗?国人的观点在改变。"

我跟他说,选举人倾向于不以候选人的私人生活作风来预测他的政治表现。

"可他们往往是受到他们的观念驱使。"他说,"如果他们是自由派人士,咳,那就可以自由地干坏事。如果他们是保守党,就得自作自受。哈特倒是个例外;多数自由派人士并不会被这类事情毁掉,因为妇女组织都拥护他们。派克伍德在参议院支持妇女,关上门却围着桌子追逐女人,老天!你怎么

解释?"

尼克松触及了政治性格与个人性格的一个重要区别。如果两者之间鸿沟很大,两者的冲突将导致派克伍德所经历的那种灾难。一个政治家,私下里为人如何,政治上为人如何或支持什么,他应该能够把两者轻松自如地协调起来,这才能成为最成功的政治家。稍有失误,像克林顿和派克伍德那样,就会引发灾难。

尼克松相信,评判政治候选人的基础,应该把政治性格和个人性格结合起来。但1992年克林顿当选为总统,标志着这一标准的严重偏移。候选人看上去是个品德优秀的人,但这不再意味着他能够成为杰出的政治领袖。相反,政治性格和个人性格作为评估候选人的标准,两者越来越脱节了。政治观点比醒目的个人行为记录更重要,选举人评估候选人时不再看重他们的为人。候选人往往承诺他们当选后将做些什么,选民则越来越趋向于根据这些承诺评判他们。

在尼克松看来,这是个不幸的发展趋势。召开克莱伦斯·托马斯的听证会,要求克林顿解释为什么有人控告他不忠实,表面上这些都是政治道德的强烈体现,实际上是不同党派的政敌之间争斗的结果。在政治战争中,敏感的社会问题被当作武器,用来隐藏更为深远的议事日程。在托马斯和派克伍德的案子中,审判的是性骚扰问题,但这只是个诱饵,最后引出更意味深长的争取控制政治、控制思想的斗争。

政党丑闻,像性丑闻一样,永远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将继续以法律所不允许的面目出现。尼克松认为,如果在选民心目中,个人腐败不再意味着它可能导致政治腐败,那么反之亦然,政治腐败并不一定意味着个人腐败。尼克松一直

是个忠于家庭、令人尊敬的人。他从未背叛过妻子,他从不围着桌子追逐女人。他被指控为滥用职权,那是不同形式的指控。

尼克松清楚地看到现代丑闻的真正含义:丑闻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牵涉到提出控告的对手的政治议事日程。水门事件牵涉到尼克松在希斯事件和越战上的看法;伊朗门事件牵涉到反对共产主义是否正确的问题;克莱伦斯·托马斯案件牵涉到妇女是否有权堕胎的问题;派克伍德的性骚扰事件牵涉到民主党希望在参议院获得一个席位的问题;白水事件则是一些虚伪的自由派民主党人谴责20世纪80年代的贪婪,自己却贪婪无度,并竭力掩饰自己。每个丑闻都有其特殊之处,但背后都有一股更深沉、更强大的政治力量驱使着它们。敌人必须除掉;借口当然也必须事先编好。

结果,社会对丑闻习以为常,对领导人很不信任,对政治上的歼灭战很不耐烦。可是,只要体制是由意识形态相对立的两个派别控制着,他们难免会希望通过政治丑闻和个人绯闻将对方拉下台。对党的忠诚、个人荣誉,这些不成文的行为规范曾经使整个体制得以团结起来。但到了水门事件,这些明白无误的美德不过是一层烟幕,背后掩藏着腐败。

滥用职权,不管是针对人民还是针对制度,不管是在政治欺骗方面还是在个人背叛方面,严重地破坏了人民的信任,最终可能导致下台。有时,那些一心想摧毁对手的人会得到意外的惊喜,通过对手自己的手来摧毁他,这差不多可以称得上是巧妙之举。

这就是现代丑闻的精髓。尼克松是这方面的重要设计师,他知道它的毁灭性极大。倘若要遏制它的恶劣影响,只有

等到人性变得完善、丑闻不再被用来谋求政治利益的时候。但两者都是不可企及的，丑闻里的角色将继续在政治舞台上翩翩起舞，轻松自如，同时一点点地带走我们对体制的信任。

第四部分

反　　思

冲突是驱使人类进步的动力，没有奋斗，人变得越来越软弱无力，生命也变得毫无意义、没能摧毁我的，令我越发强大。没有奋斗的生活一文不值。人们总是努力让生活变得更安逸，更轻松。但这样一来，我们没有增加任何阅历。事实上倒是减少了阅历。有了奋斗，有了失败，才会有成长。奋斗会创造生活。

第一章　论哲学、宗教和人性

“上帝当然是最伟大的哲学家。”尼克松说。

1992年8月26日下午，我来到他的府邸跟他见面。我刚到不久，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上完楼梯，走进他的书房，见他正从窗口转过身来面对着我。在我的椅子前的软垫搁脚凳上，放着他那本破旧的《圣经》，正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

“读读这个，”他边说边把书递给我，指着这一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你看，”他把《圣经》又拿了回去，说道，“谋求和平的人都是有德行的人。但光是和平还不够，它必须联系到更高的目标。”

他坐下来，把《圣经》放在大腿上，

架起双脚，喝了口保健可乐，继续说："永远不能把和平本身当作目的。它是个伟大目标，但不是万灵药。追求和平必须从属于一个更远大的目标——啊，能够赋予它意义的某种东西。"

我问他会不会认为自己是个促进和睦的人，他在脑子里仔细地想了想这个问题，这才答道："嗨，我试过。我们结束了越战；我们赢回了中国，缓和了与俄罗斯人的紧张关系。我认为我们为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可关键是，我们不是简单地追求没有战争的状态。我们寻求的是和平与公正。我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时候，就是这么跟他说的，我是认真的。当时他身体虚弱，可仍然头脑敏锐。我当时所说的和平与现在所说的和平已经不同了。当时，和平就是结束东西方的争斗。现在，按照我们的说法，我们需要一个超越和平的使命。"

他眯缝着眼睛："我是说，寻求一种更有意义的和平，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否则的话，和平只是暂时的，很快会被下一次战争打碎。"

他这些关于和平的思考构成了他大部分政治哲学的基础。他的《真正的和平》和《超越和平》这两本书，特别讨论了在这个充满冲突的国际领域里，如何给和平定位，如何实现有意义的和平。尽管他曾经将战争进行到底，但他仍希望作为和平的缔造者而流芳百世。尽管他知道这是个渺茫的目标，他还是希望能够建立恒久的和平。他希望自己这个总统能够以合作替代冲突，以伙伴关系替代敌对关系，以真正的和平替代战争。但他是个现实主义者，知道只有冷静地评估实力现状，才能实现上述目标。战争与和平是政治家所面临的两大问题，也是他的领袖观和他研究古典政治哲学的基础。

尼克松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即使在他担任总统的时

候，他仍要空出时间阅读自己想看的东西。退位以后，尼克松每天总有几个小时的阅读时间。他的阅读量极大，他每天要看《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每周看《经济学家》、《时代周刊》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此外，还要阅读《国家述评》、《新合众国》里的选文。为了留出更多的时间看书，他总是迅速地浏览这些报刊。

"我需要读读报纸、杂志，才能知道天下大事和人们的看法。但我讨厌花太多时间看这些东西。"那天，他跟我说道，"干嘛跟人胡搅蛮缠？让你没时间读这些伟大的书。"他拿起一本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用书指着我说，"这东西很深奥，值得读。还有那么多书要读，我的时间不多了。你还有很多时间。我可没有。想读的书还有那么多，有的我还想再读一遍，可就是时间不够用。"

然而，尼克松还是找到了读书的时间，经常读一些哲学书。他书房里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种全集：古希腊哲学家、古罗马哲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①]和奥古斯汀、尼古拉·马基雅维利及其他文艺复兴思想家、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阿列克希斯·德·托克维尔、大卫·休谟、爱德蒙·伯克[②]、让·雅克·卢梭、杰尔米·边沁、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黑格尔和卡尔·马克思。这些书他读了一遍又一遍。他根据主题分段，在重点的词句下画线，不时地与他自己的政治思想进行比较。

① 圣托马斯·阿奎那(1225? —1274)，中世纪意大利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他的哲学和神学称为托马斯主义。

② 爱德蒙·伯克(1729—1797)，英国辉格党政论家、下议院议员，维护议会政治，主张对北美殖民地实行自由和解的政策，反对法国大革命。

更为重要的是，尼克松积极地讨论古典政治哲学，思想很活跃。他深入挖掘书中的重要涵义、它们在实际生活中的意义及其历史演变。他经常努力把伟大的思想和他的思想联系起来；对于尼克松来说，思想家们开拓了人类行为的思想基础，哲学是我们和他们沟通的途径。善与恶、是与非、好与坏的政府，他对它们的本质问题十分感兴趣。人的本性及其对政府事务和国际事务的重要性永远是他探索的源泉。伟大的哲学家关于人的性格的看法深刻地影响到他对自己的性格的看法。他的许多同代人对他的本质作出了评判，但他所阅读的哲学家们不会对他说三道四，这就使他能够客观地思考自己性格上的善与恶以及人类性格的善与恶。

"我相信人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既有光明的一面又有阴暗的一面。但在某些情况下，恶会战胜善。虽然他一心向善，但有时他天生的恶会占上风。霍布斯说得对，他说人的生命孤独、可怜、龌龊、残忍、短暂。这是场永恒的搏斗，不过，这个搏斗不是坏事，相反，我倒觉得是个好事。"1993 年 9 月 24 日，我们坐在他的书房里，他这样对我说道。

他坐在椅子里，转向我，补充说："你知道，由于水门事件这个无聊的事儿，我永远不可能在公开场合谈论这类事情。人们会说：'他是什么东西，居然敢谈论善与恶？他自己就很邪恶。'"他从衣袖上捡去一团绒毛，接着慢慢说道："太糟了。关于人性的问题，我想了许多许多——尤其是在我担任总统前后。这在我是难免的。"

尼克松不是个乐观的人。他相信人类恶的本性经常会战胜善的本性，因此他基本上不信任别人。在他的社会生活中，这种本质上的怀疑主义经常遭到抨击，但他毫无悔意。相反，

他到《圣经》和伟大的哲学作品中寻找关于人性的答案。“哲学,”1993 年 1 月 29 日,他说,“我经常不太理解,但值得读一读,寻找这些重大问题的答案:什么才是最完善的政府形式?人的本质是什么?”他从古典作品里寻求解答,力图与现代世界保持距离,远离不公正的评判和扭曲的现实。当代的各种问题很重要却如过眼云烟;恒久的哲学问题才有可能改变他,于是他不懈地探讨它们。

尼克松很欣赏那些知识分子的作品,但对他们中的多数人很瞧不起。他鄙视他们,他坚信他们尽管才华横溢,对头脑不是同样深邃的人却冷漠、傲慢、居高临下。“知识分子一般都不是和善的人。”1991 年 5 月 2 日,他说,“他们的思想很伟大,但这不能使他们成为伟大的人。现代知识分子尤其糟糕;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非常虚伪。保守主义者都很冷漠,他们说他们不在乎,他们也确实不在乎。自由主义者说他们在乎,其实他们不在乎。我不理会美国的自由主义者,倒是更尊敬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人。”

他相信多数知识分子不仅傲慢、自以为是,而且根本不理解别人,不尊重别人。他们受到自己思想的威力的驱使,常常无视并鄙视人类所具有的人性的一面。

“我知道自己说过很多遍了,”1991 年 10 月 22 日,他说道,“但我知道一个最正确不过的道理:要想在任何事情上成功,尤其在政治上成功,需要三个条件:头脑、决心和胆量。不幸的是,多数知识分子只有脑袋,完全没有勇气,根本没有决心。”他把一本翻得很旧的书递给我,是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他接着说道:“知识分子讨厌承认自己的错误。多数人过着堕落的生活;多数人的品德极其败坏。读读这本书

吧,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知识分子》收入了一些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的小传,包括让·雅克·卢梭和托尔斯泰等。贯穿这本书的主题是:尽管他们在理论上宣称自己拥抱人类,实际上糟蹋和忽视身边最亲近的人。他们的一生都致力于对人类这个概念作出评论,却又虐待最亲密的人。"卢梭生了那么多的私生子,却又拒绝承认他们,还虐待那些情妇。"尼克松说。

他知道,他政治生涯中的悲剧禁止他讨论他对人性的看法。但他可以通过阅读那些经历过史诗般挫折的伟大思想家的作品,私下里在他们那儿得到确证。

尼克松看出,知识分子对思想进行"专制垄断",他对他们以及这种专制垄断十分反感。克林顿就职后不久,第一夫人希拉里·罗德汉姆·克林顿开始了一场令众人欢呼的"寻找意义"的行动,尼克松的反感终于爆发了。1993 年 5 月 23 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克林顿夫人的故事,杂志封面上登了她的照片,文中又附有几幅她近乎天人的照片,另有一幅政治漫画,把她画成圣女贞德的形象。

"可耻啊!"第二天我们见面时,尼克松对我说道,"他们把她当成圣人了。"文章涉及许多方面,但尼克松主要注意到克林顿夫人对哲学的思考。"希拉里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她决心解决世界的难题,可就个人而言,她冷漠无情。知识分子都不是好东西。我不希望他们管事,你觉得呢?我们当时(尼克松政府时期)反对的就是这个,克林顿偏偏就是这种人。希拉里跟他们一模一样。"他指着杂志说,"她在这里说的话好像没经过脑袋思考一样,看上去前言不搭后语,而且——谁知道呢——废话连篇。她和迈克尔·勒纳在这类问题上夸夸其谈,

可这里面有些值得注意的东西。"克林顿夫人透露她曾和勒纳讨论到人类寻求意义的努力及其与决策的关系，她提出，隐约的"精神危机"和"灵魂深处沉睡着的厌倦"时时困扰着我们每个人和整个民族，这就需要我们立即关注这些精神方面的问题，寻找解决的办法。

"我在这些问题上已经挣扎很久了，多数哲学家也一直不断地思索它们，希拉里却把它们说得好像是个新的现象。我倒是想谈谈这些事情，可怎么才能避免希拉里那种极端的多愁善感呢?"6月16日，他在考虑《超越和平》的主题时，这样说道，"我可不想像希拉里和勒纳那帮人那样屁话连篇。相对主义论认为道德不是绝对的——他们一直陷在这个泥潭里——这是60年代的遗产。都是卢梭的屁话。我们都知道，人天生不是善良的，而是邪恶的。不是政府使人变坏。人天生是不平等、不完美的。"他摇了摇头，"希拉里和她那群人鼓吹由政府寻找出路。他们错了。有难题了吗？让政府想办法吧，让政府多花点钱吧，争论个你死我活吧。错了。提问题与找答案比这更深奥：除了获得某些东西，达到安宁的境界，我们活着还有什么其他的目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们讨论的是个宗教问题。可我们能解答吗？我们很容易指出什么是错误的，可我们需要的是能够指出什么是正确的。"他不耐烦地说道。他的思想像克林顿夫人的一样，是一堆永恒的问题，没有确切的答案。

"希拉里在思考这种精神危机，值得赞扬。但寻求生命的更高层意义，这个问题不应该由我们来解答。"他接着说道，"我想我们得等到死才能知道答案。我真的这么想。安宁是随着死亡而来的，可我想只有等我们离开这个人世，我们才能

解答哲学家们争论了几个世纪的问题。"

我问他是不是认为只有等到我们死后，上帝才向我们展示答案，他凝视着我说道："啊，如果你愿意这么想的话也可以。我相信，等我们离开了这个舞台，我们就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来到这里、更高的目标是什么。"他指着天花板说，"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努力分析，可是我总觉得我们没办法充分理解这些问题，没办法完全解答它们。"

尼克松不懈地探索答案，不断地阅读伟大的哲学著作。他潜心研究各个哲学家的著作，往往一读就是许多天。他沉浸在他们提出的主题和问题中，努力理解他们深邃的阐述和微妙的涵义。他努力挣脱他们言辞的牢笼，从他们的争辩中获得启迪，从他们的智慧中获得确证。

"古希腊作品一直被认为是绝对真理，后来却受到挑战。"1992年8月31日的早上，尼克松这么说。当时我们仍在谈论着哲学问题。这些讨论涉及面广，涉及到国内外和个人的事件。

总统竞选活动接近最后阶段，大选之日即将来临。尼克松希望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获得启示，以便运用到当代美国的政治进程当中。他捡出柏拉图的《理想国》，打开来，戴上眼镜。"《理想国》应该是论述正义的。习惯上认为正义对强者有利，他的目的就是要向它挑战。他的基本意思是，言语的威力才是统治和控制的有力武器。他说：最强大的人通过雄辩，唤起其他人已有的观点，促使他们接受自己的意愿。"尼克松从牙缝里挤出"已有"两个字以示强调，"这就是现在多数政治家的缺陷。柏拉图感兴趣的是通过辩论的力量激发人们去改变自己，这当然就是伟大而有力的领袖的标志。雄辩

术用来说服对手;众所周知,辩证法改变他们自身,它改变着他们。”

他把书放到桌上,摘下眼镜说:“我想柏拉图的基本意思是在政治中注入理性。我们今天当然可以在政治中使用更多的理性。关键问题是,靠打动人们的基本情感是做不成有意义的事情的。所以柏拉图把诗人从理想国中排斥出去;他们感情用事,否认个人对集体的责任。柏拉图想要以理想替代诗人的情感。这个观点不错。每个人都有情感,但你不能受情感的支配。”

两天后,他把柏拉图放在一边,注意力转到亚里士多德上。我走进他的办公室,见他手拿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在上面作着记号。“柏拉图不错,可我发现亚里士多德更容易理解,更有趣。你觉得呢?他谈论灵魂的状态这类东西,但我认为最有趣的是他对各种形式的统治的看法。他说——这在今天仍然有意义——政治统治应该受到法律的约束,应该合乎宪法。柏拉图当然不仅仅是个上层人士。他相信最好的政府形式是由最高阶层统治。亚里士多德指出,最好的政府形式是民主和上层领导相结合的形式。他好像认为每一群人中选出一个作代表,就会产生最稳定、最合法的政府。换句话说,没有人会拿它作交易,因为大家都从中得到好处。听起来耳熟吧?”

他笑了,合上书。“难怪希腊人不朽。他们提出的是不朽的问题。什么是最佳的政府形式?我们不要忘了,他妈的腐败透顶的领导阶层才是最大的问题。”他指着我大声地说道,“你现在该明白我为什么不能公开表达这些想法了,可这是事实。亚里士多德相信政府的腐败是由于缺乏教育;我们政府

的腐败却是由于过多的教育！这些上层知识分子是世界上最他妈腐败的人了。"

他在椅子上移了移身体，继续说："民主本身倒没有什么，它实际上相当于人民，因此我们必须改变人民，但这不可能。那么我们该转向什么？暴民统治？那是最糟糕的政府形式。我说的就是皮洛切特的狗屁多数主义和什么电子市政大厅。暴民的统治？没有什么有意义的代表权？难道你想这样治理这该死的国家？不行！希腊人说得对：用理性替代情感，用人民的同意替代专制，用某种形式的代表权替代暴民的统治。"

尼克松是个谨慎的理想主义者。他相信好的政府的目的是启迪被统治者，改善他们的生活。但他又是冷静的现实主义者。他经常引用爱德蒙·伯克的话，而且像他一样知道不能因为追求至善而敌视善。"人和政府都不可能达到至善，但我们必须不断追求它，这会使我们变得更加完善。"1993 年 7 月 22 日，他把伊曼努尔·康德的《论历史》又浏览了一遍之后这么说道。他认为这部作品非常重要，里面关于永久和平的命题具有开拓性。康德提出，历史经过几个阶段向前发展，最终所有或多数国家变成自由国家。自由国家比较不倾向于发动战争，尤其是国家之间的战争，因此，随着这些政权的拓展，和平扩大了影响范围，最后将实现持久、广泛的"永久和平"。

"德国哲学太厚重了！"他接着说道，"康德的伦理作品几乎让人理解不了，可'永久和平'这东西虽然不太对头，却很有趣。没有什么'永久和平'，不管你有多少种民主体制。总有些重要的利益会让各个国家为之而战；总会有某种战略问题、伦理道德冲突或宗教仇恨让球滚动起来。冲突是而且永远都

是生活的现实。就是这么回事儿。我们怎么也没办法改变它。康德在这方面是不可救药的理想化。伍德洛·威尔逊也相信这东西——啊，你知道，就是'嗯，咱们聚到一起谈谈我们的分歧，世界就和睦了'。都是垃圾、鬼话。我们倒是可以努力处理那些分歧，可根本无法阻止分歧的出现。"

几天后，他打电话给我。这回他引用了约瑟夫·熊彼特的话，发展了康德关于自由政府的观点。尼克松说："他比谁都赞成自由市场，自由派人士都恨他。"

尽管尼克松不同意康德的自由派理想主义，但他明白，随着苏联的解体、共产主义在东欧的结束，民主看上去在向前迈进，这使康德的论点具有一些现实意义。"民主在扩展，但除非人们懂得如何行使民主，否则这没有太大的意义。"他说，接着又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思想家尼古拉·马基雅维利的作品作出了敏锐的分析。

1993 年 1 月 14 日，我们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他说："马基雅维利一直是个很有趣的哲学家。"他拿起公文箱，取出一个小册子，"《君主论》，"他挥动着这本书对我说道，"'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多数人只看到马基雅维利的这一点，我敢打赌在讲授他的观点时老师们都是这么说的。这句话当然是他的中心论点，但他的内涵可比这更复杂。批评家用这句话来批评我们的对外政策，但他们显然不明白现实世界是什么样子的。现实是：我们需要获得一定的平衡；你不可能生活在完善的国家里，反对万恶的国家，没有这种好事。对外政策有许多阴暗的地方。有时渴望实现的和可能实现的相差太远，你只能接受现状。因此，有时政策可能在某个方面不是最佳的，只是为当前的形势所迫制定的。"

他不仅阅读《君主论》,而且坚持阅读马基雅维利那部冗长而复杂的《李维罗马史论》。他不仅把《君主论》看作是政治家手册,而且认为它是一部与现代世界关联很大的分析性作品。里面的教导在尼克松的内心产生共鸣,即使是书里最含糊的道德论断,他都会捍卫它。"批评马基雅维利的人显然都没他妈的当过官,也没有治理过国家。马基雅维利是个外交官,他有实际经验,写的都是他了解的东西。他写作的时间是16世纪初,但从那时以来,政治一丁点儿都没有改变。一丁点儿都没有。运动员当然都换了,游戏规则却一模一样。所以嘛,你想想,他说的话到底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尼克松问道。他一边数着手指一边接着说道:

"他说领袖一旦察觉到威胁就要断然采取行动;他说他们应该有能力借用残忍、不人道的方法维持他们的国家,这一点我们现在当然不同意了,但当时为了把各个该死的地方团结起来,这样做是有必要的;他说外部形象最重要。马基雅维利一定预见到电视的重要性了!他一定会是第一个打电话给政治与传播策略家罗杰·艾尔斯的人!"

他打开《君主论》,翻到他画了许多重点线的一页。"好的国家应该以什么为基础——他怎么说的?"他迅速地浏览了那一页,看到了那句话,"'完善的法规和精良的武器'。你看,对于他来说,战争是门艺术,甚至是必要的罪恶。"他合上书,继续说,"他说的话还有更深远的涵义。这么早以前,他就指出领袖们应该懂得使用武力,不过他们往往很难将这个方法与当时的形势协调起来。这当然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当时不像我们现在这样有各种武器。问题是:领袖必须显出有德的样子,而且他也必须是有德的,必要时他也必须善于使用

诡计。"

他飞快地看了我一眼:"这就是马基雅维利的意思。他向我们揭示的是强有力的领袖风范。有的人会说了,领袖从里到外都应该是纯洁的,但这是做不到的事情——都说我们不是普通的人,可我们当然是普通的人。对于那些打到上层的人来说,善与恶都是并存的。正直的品格造就优秀的领袖,但狡诈同样也可以,马基雅维利就是这样说的。"

他又翻开书,找到另一条引言:"'人总是凭外表作出判断而不是凭行动作出判断的。'你觉得怎样?天啊,多有道理呀!我们凭表面现象判断现实,即使这表面现象与现实毫不相关。不过我倒是在那本书里(《李维罗马史论》)发现最重要的东西:他强调政治行动。他说得很清楚:政治行动是生活的最佳方式,因为它是成就伟大的惟一方式。这难道不是我们一直追寻的吗?"

"伟大?"我问。

"啊,是的。"他回答,"它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

尼克松不懈地追求生命的意义,不断地审视这个国家的哲学思想,正是这个国家的哲学思想塑造了他。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使他着迷,他们的思想或者与他关于政府的思想发生共鸣,或者向他的思想挑战。1993 年 6 月 16 日,在我们的谈话中,他对卢梭作出了评价。当时,为了扩大政府职能,为了矫正资本主义造成的经济失调,克林顿夫妇的种种计划渐渐成形。卢梭提出的假设是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尼克松直截了当地驳斥了卢梭的这一假设:堕落的文明败坏了人纯洁的本性,人需要达到完全平等才能巩固他善的本性。

"胡说!"他说,"我们从来都不是卢梭所说的高贵的野蛮

人,生活在幸福的无知之中。错了!我们知道我们从一开始就是善恶参半。人与人之间从来都不会是毫不相干的,人不断地互相竞争。我的天啊,竞争是我们的天性呀!至于他的社会契约论嘛,他说每个人服从于所谓的总意志,这不过是为了强制实行平等而设置的烟幕。这是搞平均主义,他妈的!"他拍了拍手,厌恶地说,"卢梭这种观点是极坏的观点。"

由政府来引导社会平等,尼克松对这一观点很反感。他相信人是不平等的,我们生来具有不同的天赋和能力,享受不同的机会,承受着不同的负担。政府可以尽力安排平等的机会,但它无法重新塑造人的性格和先天条件。

"再读读洛克吧,"1993 年 6 月 1 日,他指点我说。当时他刚刚开始写《超越和平》的初稿。他广泛阅读,为写作作准备。在写到关于美国的章节时,他重读了约翰·洛克。美国革命的领袖和宪法的制定者创立了独特的美国哲学,确立了个人、社会和国家之间的恰当关系,其基础就是洛克的思想。

洛克提出,在社会形成和政府建立之前,存在着一个自然状态,人生活在自给自足的、独立的、相对幸福的状态。人天生享有生存权、自由和私有财产。他有权自我保护,有权拒绝服从他所不赞同的统治者,有权拥有含有他的劳动的自然之物。对于尼克松来说,这些主题形成了政治、宗教、知识与个人自由的基础,使自由在美国的试验具有独特的风格。

"洛克不像卢梭,他拒绝接受强制平等的思想。他的见识更高。他知道那意味着违背人的本性。"那天,他说道,"相反,洛克的社会契约思想认为,当我们成为国家的一员,就把我们的权利转移给政府,更准确地说,是转移给整个社团。所以即使我们生来不平等,在政府的眼中却是平等的。这是关键的

区别。

“卢梭提出为了求生存而斗得你死我活，对此我们已经厌倦了，因此不得不需要有社会和政府。但我认为洛克更接近实情。他说，我们需要某种组织以获取天赋人权，没有这种组织，我们就面临着种种不便，因此自然而然地需要有社会和政府。我们发现，只要稍有组织，生活就容易一些，这当然意味着文明的诞生。”

“这导致了政府的出现。”我说。

“但他特意指出，没有正当的理由，社会和政府不能推翻人的权利，不能剥夺人的权利。你知道，这些思想在《独立宣言》和宪法中一再体现出来。政府是必要的，限制政府的权力也是必要的。政府的目的不是像自由主义者相信的那样，不是要建立完美的社会，而是要获得社会存在之前就有的人权。说得好，完全正确。我想把这些思想写进《超越和平》的关于美国的章节中。限制政府权力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我们把我们的思想写出来的时候，我希望用洛克来支持我的观点。

“顺便说一下，”他接着说，“洛克关于天赋人权的思想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是为每个人而设的。许多国家不具备能够使民主运行起来的传统和机制，我们必须面对这个现实。我知道这样说可能让人不好接受，但它是实话。有些国家根本办不到；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很他妈的糟糕。但我们必须记住，民主不能保证产生好的政府或繁荣的经济。我们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支持自由与人权，但我们永远不能把我们的价值观强加到别人头上。”

尼克松从英国哲学家那里得到关于管理政府的启迪。除了洛克以外，伯克也是他喜欢的一个哲学家。1993 年 3 月 14

日，在他的府邸，他告诉我他开始读两本关于伯克的书，其中一本的作者是罗素·柯克，另一本的作者是科诺尔·克鲁斯·奥布莱恩。“伯克一直没有受到人们的注意，等他写书反对法国革命时，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他反对社会主义革命——那些雅各宾派的平均主义言论，自由派人士就无法忍受他了。伯克赞成代议政体，如果这就是共和民主，那才有鬼！”他笑了。

尼克松不仅仔细阅读阿列克希斯·德·托克维尔，而且认真思考伯克关于代议政体的文章和言论。他特别注意到，伯克建议应该综合选民的意见和代表们自己的判断。“这是执政者所要应付的最棘手的问题。”尼克松说这话时，正在阅读伯克在 1774 年向他的选民发表的演说，“你听听：‘你们的代表献给你们的，应该是他的判断而不是他的勤勉；如果他为了听从你们的意见而失去自己的判断，那么他不是在为你们服务，而是辜负了你们。’”他合上书，“他说得对。在某些情况下，你的选区多数赞成或反对某件事情，而你却投相反的票，这样做很愚蠢。你得先向他们证明你是有道理的。

“我还记得投票赞成马歇尔计划[①]时的情景。我通过邮政在我的选区搞民意测验，发现我的选民中 75％的人反对任何对外援助。可我在欧洲看到了战争造成的重大灾难，回来后，我坚信只有美国提供大力的援助才能阻止他们步东欧的后尘。这个想法很难让人接受，但我发表了一次又一次演说，阐明我们为什么要提供援助，最终说服了选民接受我的观点。结果我投票赞成马歇尔计划，没有对我的席位造成威胁。政

---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所宣布的援助欧洲复兴的计划，1947 年 6 月 5 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演讲中提出；又称“欧洲复兴计划”。

治家应该懂得劝说的力量。公众的意见是一回事;引导公众的意见是另一回事。"

伯克的代议政体思想来源于他关于人行善的本性和能力的更广阔的思想。尼克松引用了伯克1791年说的话:"'人如果愿意以道德规范控制自己的欲望,他就有资格享受公民自由,两者是成正比的。'"尼克松评价说:"不幸的是,如果人民不能控制自己,政府就要去控制他们。让政府提供出路,解决所有问题,包括道德问题,这是自由主义哲学。这是错误的,很糟糕。美国人民主要应该从宗教、家庭和他们自己的信仰里寻求意义,不应该从政府那里寻找——根本不该找政府想办法!保守派应该大力提倡传统价值和个人责任,以此战胜自由派那软绵绵的相对主义道德观和宗教狂热分子偏激的冲动。如果我们做得好,我们的精神就会把人民团结起来,不至于使他们分裂。"

他站起身来,来到书架前,找到阿列克希斯·德·托克维尔的《论美国民主》。"这本书,"他挥了挥书说,"是部杰作。你知道,我喜欢预测,但托克维尔的预测总是正确的。150多年前,他就意识到宗教对于美国生活、伦理道德和稳定的重要性。他认为宗教对于民主政治尤其重要,它能够灌输道德责任、良心等思想。今天缺少的就是这个——良心。"

他坐下来,翻了翻书,找到了他要引用的话:"'人的无限完善'——说人性可以达到完美,这是最可笑不过的想法了。嗨,根本不可能。托克维尔知道这一点。我来把它解释清楚:我们努力追求完善,但我们同时知道永远达不到完善。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唐,可只有这样才能弄清楚我们在这里的目的。托克维尔知道民主政治最容易相信人能够达到完善。因

此我们——啊，确切地说，是自由派人士——尝试卢梭式的社会管理。这种狗屁根本行不通。"他的话体现了他的哲学精髓：虽然政府可以通过正确的法律和优秀的榜样改善人的状况，但它永远无法改变人的本性。

基督教同盟对共和党的影响越来越大，很不合适，尼克松对此十分担忧。他从托克维尔哲学中找到了答案。"你听听，"他翻到另一页，说道，"'宗教应该格外小心，应该把自己局限在适当的范围，如果他们希望超出精神领域，很容易让人对它失去信仰。'你看，这跟我的想法一样，所以在 1960 年，我建议比利·格雷厄姆[1]不要来支持我。他偏偏要；我说不行。我跟他说，政治的目的是从政治上改变国家，而他是从精神上改变人民，如果他卷入政治，就会危害到自己改变人民的能力。教士的工作是改变人民，不是改变政府。教会和国家，完全是两码事。宗教界的是与非自有他们自己的位置，但必须避开政治。"他的右手握成拳头，怒气冲冲地说，"他们有重要的东西要说，但他们可不能接管政府。在管理政府和处理现实中的事务方面，他们知道得太少，即使知道一点，也都是错误的。"

对于那些企图用宗教影响政治的人，尼克松十分反感，但他同样谴责道德虚无主义。他好奇地阅读弗里德里希·尼采的作品。尼采认为世间已经无所谓是非曲直。尼克松从我那里借去尼采的《超越善恶》[2]，正是这本书的书名启发了他，因

---

① 比利·格雷厄姆（1918— ），美国基督教福音派传道士 浸信会牧师，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宣讲耶稣基督福音，开展福音复兴运动。

② 又译作《善恶之彼岸》。

此他为自己的最后一本书命名为《超越和平》。

“我找不到我的那本了，”1992年1月24日，他从我手里接过这本书时说道，“肯定是借给什么人了。我简直不相信会丢掉尼采的书！我在竞选总统时一直在看他的书，提醒自己为什么我会经历那些该死的磨难。”

第二天见面时，他已经看完了那本书。“多数人认为尼采是个疯子，”他说，“我倒觉得这值得商榷。”

他默读了几段，抬起头来说：“尼采被认为是疯子，主要是因为他的超人哲学——那就是最理想的人。希特勒扭曲了尼采的话，对人类犯下了滔天罪行，尼采因此受到指责。可这不妨碍我们看看尼采的其他思想。你听，尼采在谈到灵魂时，用了这样的词语——‘松开的弓’。他谈的是灵魂的张力促使个人和历史前进。”尼采提出，冲突是驱使人类进步的动力，没有奋斗，人变得越来越软弱无力，生命也变得毫无意义。这一理论在尼克松心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这是书中最美妙的一句话，可能也是最著名的话：‘没能摧毁我的，令我越发强大。’没有奋斗的生活一文不值。人们总是努力让生活变得更安逸，更轻松。但这样一来，我们没有增加任何阅历。事实上倒是减少了阅历。有了奋斗，有了失败，才会有成长。奋斗会创造生活。我赞成他的观点。”

他顿了顿，又说：“说到战争，他说需要战争来保持灵魂的张力，迫使人类前进。它会激励人们，赋予他们责任，赋予他们更高尚的使命。现在就没有这个说法了，这个时代是核武器的时代。但他看得很透彻，人们需要有个使命；他们需要一个比他们自身更伟大的使命。在过去，战争达到了这个目的：它使人们敏锐、团结、强悍。当今美国再也没有这种选择了。”

我问他，是不是国家除了满足物质需求以外，我们需要有新的使命。他答道："是的。记得我最后一次和毛泽东的谈话吗？他问我和平是不是我们惟一的目标。我说，我们寻求和平与正义。它是个很好的例子，我经常提到它。可现在我们寻求的是和平以外的东西。它存在于奋斗之中，不是吗？"

尼克松相信，虽然不能像尼采那样颂扬残酷的斗争和不顾一切的冒险，但如果希望在生活中有所成就的话，至少需要在逆境中冒险和奋斗。

"生活中最难得到的东西最宝贵，因为这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和斗争。比如说，努力获得总统的职位就是很值得去做的事情，因为很少有人愿意忍受其中的艰难困苦。保持灵魂的紧张——紧绷着，正如尼采所说的——才是关键。"

在尼克松生命的最后时期，他没有实在的权力却能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他腾出大量时间，探索美国成为20世纪仅存的超级大国的意义。如果国家希望永远具有活力，不仅应该重新评估物质财富和世俗耀眼的权柄的重要性，而且必须重新投入关于奋斗的思考。这是很艰巨的任务，特别是为了达到更高的目标，需要凭借个人的努力，去追寻个人的更高境界，否则人们只会变得更加自私自利，满足现状，最终放松了绷紧的弓弦。

尼克松十分担忧这种集体的松懈。美国的开放体制使美国政治与宗教、意识形态的斗争风暴隔离开来，但也容易使人们沉湎于物质至上的思想之中，十分危险。尼采预见到，世俗的价值观在将来的某一天最终会占上风，他警告人们不要变成他所谓的"最糟糕的人"，这种人沉湎于物质稳定和安逸之中，无力投身于更高尚的事业。

"这种最糟糕的人不仅自私，"尼克松说，"而且很可悲。

想想看，你无法成就大业，都是因为你变得那么软弱、懈怠，完全缺乏精力和勇气。物质的东西会使你在这里的生活变得舒适一些，可那只不过是外在的东西，老天啊！能够为你定位的，使你成为你的，是你所成就的事业，任何值得你去成就的事业都需要奋斗。当然啦，没有人愿意听这些，但这是真的。

"只有经历了痛苦，经历了火的洗礼，经受住考验，你才算真正地生活过。只有在作出艰难的抉择之后，伟大才能降临。而作出抉择往往需要你冒险，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就像发表基金演说时，还有决定是否轰炸越南的海防市时，在内阁会议上，我向他们征求意见……"

"您没有把您的决定告诉他们吗？"我问道。

"啊，就像威廉·罗杰斯所说的，'如果它行得通，我就支持它。'只要最终的决定不是由他们负责裁定，大家就都会有某种立场。"他接下来那充满希望的话透露出他自己的情形。他补充说："甘当风险的人才有可能伟大。"

他在思考了尼采的哲学之后，自然而然地转向黑格尔的《法哲学》。这本书复杂深奥，论述了思想自身的发展、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及辨证逻辑，后者是关于思辨环节的再思考的形式。黑格尔像卢梭一样，先是热情地支持法国革命的平均主义言论，最终又反对它。他希望人们认识到世界是善的、有理性的，是上帝的体现，人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人应该看到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我发现黑格尔的思想几乎很难懂。"1993 年 5 月 10 日，尼克松叹道，"太复杂了，太德国化了！但很值得你去慢慢地啃。黑格尔好就好在你可以引用他来论证任何论点。"

他摇了摇头说："我经常一点都搞不懂这些东西，但偶尔

也会悟到些什么。他的论证有力地反对了官僚主义的停滞状态，反对人把自己当作是车轮里的一个了不起的部件，好像车轮本身有多了不起似的。我们很容易迷失在琐碎、无聊的生活细节中，从来不会真正看到生活的全景。黑格尔觉得这实在是无可救药，我倒不敢肯定。他说伦理道德才是正确的道路，可我认为多数人达不到这个标准。多数人没有能力像他说的那样不断地审视自己，那是很累人的工作。"

"人们不愿意这么做，那是因为他们可能会不喜欢自己所看到的东西。"我补充说。

"谁知道呢，"他回答道，"把一切都埋起来会更好办一些。我的意思是，黑格尔甚至说，财富不均会造就下层阶级，他们一心投入到世俗的生活中。可我觉得这种情况不仅仅局限在下层阶级；我认为它的影响面更广。我们所要追寻的目标，应该使人超越世俗——这是一种与战争相对应的安稳状态，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达到这个目标，我甚至不知道它是否存在。"

这些问题让尼克松很伤脑筋，于是，他转向他更熟悉的话题：战争。黑格尔同尼采一样相信战争是必要的，只有通过战争中的动员和牺牲，人们才能理解超验的责任的意义。战争创造了无秩序，从无秩序中又诞生了有秩序，最终又引起新一轮的战争。如此无限循环，这是普遍存在的模式。

"黑格尔说，既然每个国家总是在与其他国家对抗，战争就是难以避免的结局。"尼克松接着说，"他说得很在理，不过他不大相信谈判与合作。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有时战争是可以避开的。"

然而，最让尼克松着迷的却是黑格尔关于经济发展的思

想。黑格尔的这些思想正是形成共产主义哲学的基础，而尼克松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主要就是努力挫败这一哲学。

黑格尔虽然没有完全否认市场是分配资源的途径，但他的思想为卡尔·马克思铺平了哲学道路。黑格尔提出，职业为个人定位，而工作又需要知识，那么人就成为独立的存在实体。他担心，这种客观化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严重的贫富不均，引起穷人的嫉妒，并使贫穷的更加贫穷，循环往复，难以消除。如果妥善地管理市场，市场其实可以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伦理道德结构，但黑格尔并不这样认为。

尼克松对马克思的作品既着迷又反感。他相信马克思以无懈可击的逻辑精心地构造了优秀的思想体系，但新"民主政治"中不断的政治和经济斗争迫使尼克松从全新的角度思考马克思。

"马克思的思想在理论上很有威力。"1993 年 4 月 28 日，尼克松对我说，"可一旦经过阐释，付诸实践，它对人类所造成的影响可能比其他哲学更大。"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劳动分工，势必将人锁在固定的位置上，难以逃脱。这种被束缚的状态意味着权力掌握在少数特权阶级的手里，必将导致人类的堕落，阻碍自然的发展。为了避免灾难，马克思提出，我们必须统一计划社会的发展目标，解放被剥削阶级，这样才能开始而不是结束历史。他推出社会革命的思想，宣称要想真正解放人类，不仅需要像黑格尔那样去理解世界，而且要改变它。必须消灭国家。

"马克思认为工人革命是民主的胜利，他自己却非常怀疑民主。"尼克松说，"法国革命中的雅各宾派人士说，要'抓住政权，强制实施平等'。马克思对此竭力反对。他当然认为这是

个严重错误;他认为这会导致恐怖主义和社会动乱,必须等到社会各力量都成熟了以后才行。马克思倒是善于估算时间。在这方面列宁太性急了。"

我说他是个革命派,希望马上看到结果。尼克松补充说:"可思想不可能在实践中立即显露出真实的面目。马克思倒是更有耐心。我认为他更是个思想家,而不是个实践家。还有,一旦民主或某种形式的民主实现以后,马克思就开始怀疑无产阶级是否有能力利用民主来掌握大权,实现社会主义。他希望没有集权军队,没有政府机构,国家最终将萎缩,真是理想主义。我们发现,社会主义只能通过武力来维持。"

尼克松在写《超越和平》的时候,重读了《共产党宣言》和部分《资本论》,希望从马克思理论中得到某些见解,以便运用到新的时代中。1993 年 6 月 15 日,尼克松坐在我面前,腿上放着这两本书。"马克思的书里有很多不错的话,只是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教条主义式的共产主义实在是毫无生机,困在里面的人们放眼世界,发现了更民主、更有色彩、更光明的社会。他们充满渴望。他们渴望自由,更渴望物质财富。教条主义式的共产主义只会产生奥林匹克运动会冠军,其他什么都产不了。"7 月 7 日,他又补充说:"实利主义右派,像我们那些《华尔街杂志》的朋友,认为只要我们搞彻底自由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切都会平安无事。可没有同情心的资本主义是不够的。实利主义左派说出路是实现伟大社会。[①]可即使我们能够满足所有的物质需求,还会感到一片空虚。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

① 美国第 36 任总统约翰逊于 1964 年提出的以社会福利为主要内容的施政纲领。

们在这里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你不可能在物质中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如果我们在那里寻找，就找错地方了。”

尼克松转而谈到教条主义式的共产主义及其先锋国家苏联的终结的意义：“看看那里发生的一切。不信上帝的教条主义式的共产主义。我的天！想象一下，有人会跟别人说他们不能信上帝！只允许他们相信国家！如果不是使用武力的威吓，教条主义式的共产主义连五分钟都坚持不了，更不用说70年了。我想我们在谈教条主义式的共产主义崩溃的原因时，也应该稍微从精神的角度考虑。人们需要信仰。

“我记得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1954年或1955年说过——当时还是异端邪说——懂得原子复杂的内部结构的人无疑也能看出教条主义式的共产主义的自相矛盾。他当时就看到了这一点。并不是我们结束了冷战，我们只是促使冷战结束。杜勒斯说，没有哪一种思想像教条主义式的共产主义那样在这么小的范围内发展得如此成功。他当然是对的。但等这个思想运用到现实当中，它就灭亡了。

“教条主义式的共产主义不能成功，是因为它的根基从本质上讲是错误的，它否认个人利益是发展的动力，它排斥上帝。不管什么体制，只要它否认精神信仰，甚至因为精神信仰而惩罚人民，或者企图以世俗的信仰代替精神的信仰，那么它注定要失败。

“现在，看看我们的体制。它并不完美，但它允许百花齐放，允许精神信仰。当然啦，军事力量是促成苏联终结的原因，但人民信仰自由的需要也是其中一个原因。教条主义者使国家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威；资本主义顾及到物质财富，但也顾及到精神上的成就感。”他指着空中说道，“资本主义有它不

足的地方，但这个代价很值得。它在生产上总是超过计划经济，它允许人民自由发展。政府应该改善人民的生活，但不要碍手碍脚。我不是个自由主义者，但我确实认为，不需要政府出现的时候，政府往往过多地予以干涉。我们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让教条主义那些行不通的东西蔓延到我们的体制中。

"在教条主义中，你根本找不到真正民主秩序所必需的两大思想：第一，人民的价值构成了社会和政府的基础；第二，需要限制国家的权力。所以它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致命的谬误：它是不可行的思想；它否定人权思想和限制政府权力的思想；它使用武力。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教条主义对人类犯下了各种罪行。"他摇了摇头说，"不幸的是，它欺骗了一代又一代人。"

尼克松的政治生涯建立在反对共产主义的基础上，他引导国家经历了冷战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在实践上使他烦恼不安，在理论上又使他十分着迷。思想就是力量：正确的思想能够改善人的生活条件；错误的思想则能够起到破坏作用。尼克松感兴趣的是，伟大思想家的思想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运用到思想界或人类交往的实践中，其影响范围如何。最让他感到好奇的是思想的起源以及它们在思想领域和实践中的影响。人性和战争与和平等基本问题困扰着他，促使他审视自己内心深处的信仰，激发了他对生命意义的最后探索。

在探索的过程中，他经常思考和平这一主题。他相信，首先应该承认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才是国与国之间实现真正和平的基础。另一方面，他同样努力探索，希望对个人内心的和平有所了解。对于尼克松来说，探索生命的和平既艰巨又

有必要。他认识到，仅仅是努力去了解这种和平，无论是从个人角度，还是从世界的角度，都是不够的，应该在探索中注入某种意义，它或者是正义、善、精神上的满足感，或者是对上帝的热爱。

1993年8月中旬，尼克松找到了进行精神探索的又一个理由。当时，教皇约翰·保尔二世开始访问丹佛。教皇的身边挤满了听众。他谈到了信仰、悔罪、救赎，传达了希望的福音，大大地激励了听众——也包括尼克松。新闻界大力地播放了他的访问，在8月12日，又特别报导了总统和第一夫人问候教皇的消息。

"哈，你觉得怎样?"当天黄昏我们在他的书房见面时，他对我说，"教皇和克林顿在一起！圣人和罪人！多不和谐的一对！"

"多不和谐的画面啊！"我坐在他对面，应声道。

"我也这样想啊！"他笑着答道，"希拉里还站在旁边呢。噢，天！我真想知道教皇当时是怎么想的。可我告诉你，"他把脚架到软垫脚凳上说，"这可真有趣。教皇要谈的是伪善，可克林顿就站在他身边。这样吧，我们来看看更深远的问题。

"人们可能会不同意教会的教导，但我觉得教会一点都不能动摇，绝对不能让步。只要它一放松，那就完了，它就失去教导是与非的力量了。可一定要有个善恶标准。宗教右派只会喊口号，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有信仰，只知道获得政治力量。东正教太教条，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思考它、审视它。人们关心的是它所蕴藏的永恒的和神秘的东西。我认为教堂从传统的拉丁语弥撒转为英语弥撒后，损失很大。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好让人们能够听得懂都在说些

什么，听得懂他们传达的福音。但传统和神秘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啊。”

我问他仪式本身是不是跟传达的内容一样重要，他回答：“噢，绝对的。不管在政治上还是在其他的什么方面，都是如此，特别是在宗教方面。人们丢弃不了的就是宗教仪式。它多少年来一直是恒久不变的。即使人们接受福音慢，宗教仪式仍然具有令人着迷的威力。

“再来说说教皇吧。到处都是精神的真空，不仅在美国是这样，在全世界范围都是如此，他的访问会跟他在其他地方的访问一样获得巨大的成功。”他握紧拳头说道，“人们渴望信仰，不是什么都可以接受，而是信仰有意义的、真实的东西。”

我说上帝总是在那里的，他耸了耸肩说：“我知道。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迷失了方向。你用不着看就知道。我的天啊！只需打开电视晚间新闻或 MTV，你就全明白了。虽然上帝一直在那里，人们却并不在那里。”

他停了停，又说：“这种探索既是精神方面的，也是哲学方面的。我们想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还有什么其他的内容。我知道自己是在高谈阔论，可你知道我的意思。”他说。

我问他是不是认为精神正在复兴。

“啊，我不敢说得那么远。针对信仰上帝的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式。你知道，我是个贵格会教徒。我信仰上帝，我相信应该向他求助。

“可并不像那些讲述水门事件的作者们所描述的那样粗俗，他们说我和基辛格跪在地上。我曾经让他和我一起祈祷，我们在最黑暗的时刻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私下里祈祷。是的，这种时候我都是私下里进行的。我读《圣经》，可我从不把

我所知道的和所想的到处去宣传。那是我自己的信念。”

我问他是不是有过信仰动摇的时候，他回答：“啊，我得承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我觉得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是动摇过。但很快我就意识到自己很可笑。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错。”

他停了停：“要知道，如果你是总统或参议员或国会议员或其他什么人，你就开始自认为你懂得最多。实际上并非如此。等你被选为领袖，你会觉得自己可以拯救一大堆人。你可以尽力去做，其实这很难很难。其实，你所能拯救的只有你自己。”

我请他解释一下为什么年轻人似乎明白这个道理。

“啊，确实。不管教皇走到哪里，他似乎都能触动、真正触动年轻人。他们听到那样的福音确实会有所反应。现在倒是越战的那一代人在这方面很欠缺，可年轻一些的人嘛——啊，是个好迹象。”

他站起身来，走到书架前。“你知不知道这本书——嗯，我想作者是M·斯科特·派克？我想书名是《人迹罕至的道路》。很多年以来一直是畅销书。”他走向我，“我找不到了。算了，反正我对它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不过，第一句话很不错：‘生活艰难。’”他用一只拳头在空中挥了挥，“确实艰难。如果你认为不需要上帝的帮助就可以顺利走完它，那你就是傻瓜。我们谈论哲学，寻找这些重大问题的答案。可不管你的宗教信仰是什么，惟一永恒的问题就是：你信不信？”

显然，尼克松不需要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他似乎在他与上帝的联系中、在他对他的依赖中得到了满足。对于一个不断避免依赖别人的人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尼克松认识

到生命并不只属于他自己,生命是由更伟大的力量设计的,自由意志可以让人抛弃信仰,但也可以让人拥抱信仰。他的信仰动摇过,但他又回归了;在绝望、黑暗的日子里,他坚定自己的信仰。他认为我们能否从事更高层的事业,这将为我们的世俗生活定位,同样,他也认为我们能否信仰更高层的力量,这将为我们的精神生活定位。有意思的是,一个终其毕生精力争取政治控制权的人,却相信奉献自己——不仅是投入到世俗的事业中,而且是服从于更伟大的神力——才是真正成就自己的惟一途径。

"回想这一生,"1993 年 11 月 30 日,他在书房里告诉我说,"虽然困难重重,但很值得。我可能不愿意再来一遭,可我也不会错过它。确实有许多令人后悔的地方,但我从不后悔自己决定从政或坚持原来的选择。原因是我知道自己活着是有目标的,而且也基本实现了那个目标。批判我的人不断地提醒我,说我做得不够完美,没错,可我尽力了。考虑到当时的见识,我实在是做了我自认为最得体的事情。我们对自己的期望也只能如此,是不是?"他停了停,"生活的目标应该是比生活本身更重要的东西。如果不投入到比你自身更伟大的事业中,你就看不到生命的意义。那是找到自我的惟一途径。"

尼克松坚定地认为,我们应该逐渐理解精神生活的意义,他相信精神生活才是内心力量的源泉。他承认生活道路并不完全是个人所能控制的,因此他能够战胜悲剧,接受自己的成就与失败。他阅读《圣经》,不仅从中获得精神力量,而且找到了哲学解答。上帝引导着他,给了他信心。哲学不但使人与现代世界保持距离,而且让人审视塑造世界的种种思想。对

于尼克松来说，从古到今，精神的与世俗的理论与实践不断地互相影响，社会与个人在这里交汇。每读一部伟大的作品，都是他与作者的精神交流，他思考着自己的思想，并与他们的思想进行比较。

也许尼克松更愿意后人把他看作是个思想家。哲学成就了这一目的：几个世纪以来的种种问题和思想成为他自己的思想的基础。到了晚年，他相信自己对人性已经获得了深刻的理解；作为国家的公民，作为地球上的人，其生活意义是什么，他对此也有了深入的认识。政治如过眼云烟，哲学却万古长青；政治深陷于纷扰的世事，转瞬即逝，哲学却超脱于现代的凡俗世界之外；政治为他的生活定位，哲学却具有改造他的力量。

他认为自己是个言行一致的人，他综合了古代精神界国王——哲学家们的美德，是个非凡的政治家。智慧与自制、勇气与奉献、既超脱俗世又合乎礼俗，这些是他判断成功的标准。在前人的著作里，他发现了通往精神启迪的道路。它不像他生活中的其他部分，不会受到公众的审查和批判。它只属于他自己。他孜孜不倦地探索永恒的问题，虽然没有获得确切的答案，但问题的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需要知道自己已经尽力去探索了。

第二章 论 家 庭

理查德·尼克松在公众的心目中如此出名，人们已经很难把他与儿子、兄弟、丈夫、父亲等角色联系在一起。然而，正是这些家庭关系构成了他的私人生活；他在白宫、参议院的任职，直至最后担任副总统、总统，这一切只是他的社会生活。他的政治生涯起伏曲折，他的家庭关系为他提供了避难所，不断地给予他理解和安慰，更重要的是，给予他爱。

尼克松在社会生活中能够不屈不挠，正是因为家庭成员用支持、耐心和尊严抚慰着他。在这个喧嚣动荡的世界，他们是他自信与力量的源泉。在他缺乏力量的时候，他们为他注入力量；在他轻浮自负的时候让他谦恭谨慎；在他沉闷严肃时让他轻松愉快；在

外界压力太大时，为他提供解脱。他信任他们，而他们无条件地给予他支持。他们支撑着他，提醒他：他在政治战场上经常是孤军奋战，但他并不孤独。

对于家庭为他作出巨大的牺牲和贡献，尼克松一直铭记在心。正是由于他们坚定地支持着他，他在任职期间和辞职之后才能够有所成就。他的胜利、失败与复兴既属于他，也属于他的家人。他选择从事公职，他们也跟着他选择了这样的生活。在他经历着政治上的风霜雪雨时，他们表现出了沉稳和勇气，忍住痛苦和失望的泪水，高高地昂起他们骄傲不屈的头颅。他们的忠诚与奉献毫无矫揉造作的成分；他们真挚的奉献和爱心具有强大的力量，这是在他们家庭的圈子之外的人所不能理解的。

他常常提到他的父母，汉娜和弗兰克·尼克松，说他每作出一次选择，他们都激励着他。他们培养了他强烈的责任感和坚定不屈的性格，鼓励着他走向总统的职位，并支撑着他战胜无数次挫折。他们忠于家庭，信奉上帝，尊重艰辛劳动所创造的机会，这一切都成为他们的儿子开创生活的基础。在他们的精神遗产的武装下，他遵照他们的教诲，坚定地抗争、反击。1974 年 8 月 9 日，在他向白宫工作人员致告别辞的时候，他回忆起他的母亲，称她为圣人。在他离职后所写的回忆录中，第一句就是："我出生在父亲亲手建造的房子里。"言辞是那么朴素，意义却又是那么深远：他的父母赋予他走向成功的动力、拒绝接受失败的决心，让他在获得成就时不忘自己谦卑的出身。

"我永远也忘不了我的母亲。"1992 年 9 月 9 日，他对我说。每当他的新书论述到国家和个人的目标的时候，每当我

们在讨论新书的时候，他都想到他的母亲，她是他生平见到的最具有哲学根基的人。“她是个很有思想的女性。对于她来说，寻找生命的意义就是寻找信仰上帝的意义。我在告别讲话中说她是个圣人，批评家却说我太夸张了。天啊！我辞去总统职位的时候，难道就不能提到我的母亲？我们都在说些什么啊！”

他摇了摇头：“我的母亲教我学会辛勤地劳动、忍耐和耐心，当然啦，耐心不是我的长项。可是我的天啊！她是多么有耐心的人啊！她是个最坚强的人，在这方面尼克松夫人跟她很像。她为我们牺牲了一切，她像老黄牛一样地工作，遭受过痛苦，也流过眼泪，历尽了千辛万苦。她看着自己的儿子一个个在眼前死去。”他使劲地眨了眨眼，“顺便说一下，我不会在公开场合表露自己的情感，可我母亲去世时，我再也控制不了了，趴在比利·格雷厄姆的肩上痛哭。有些时候，你就是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我非常怀念她，可我很高兴她没有看到水门事件。那会打垮她的。”

“是因为对你的指控，”我说，“还是因为结局？”

他看着我说道：“都有。她有很强烈的是非感。我永远都不愿意让她失望。我清楚地记得她跟我说过：‘君子连玩笑都不要去听。’对于她来说，除了信仰，最重要的就是礼貌和荣誉。每一次灾难降临，她都表现得非常坚强，因为她把一切托付给上帝。她从来都不屈服。”

我说尼克松夫人也同样坚强。他笑了，说：“我一向认为女性是最坚强的。啊，我的父亲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但他像我的母亲一样坚强。老天啊！他工作起来多么勤奋啊！他什么都干，剪羊毛、做木工——只要是能养家糊口的他都干。

当时，我们的早饭只有玉米片、燕麦片、葡萄干果。我的老爸常说早饭一文不值。'干嘛不在锯木屑上拌点糖和奶油吃呢？'他说。当时觉得很好笑，可我现在常回想到这事儿。我们一无所有，父亲经常是没有东西也要变出些东西来。"

我问他是不是相信远大抱负这一类性格是遗传的。

"绝对是。"他答道，"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可基因是改变不了的。我的父亲那么拼命，我们都这样。尝试、工作、成功。"他指着空中说道，"失败了，爬起来，接着再试。谁也不接受失败。他没有受过教育，所以特别重视教育。他促使我们想去读书。他也是个斗士。我的父母都是斗士。他们不愿意屈服。弱者才会放弃。放弃意味着有某些事情你做不了。他们总是教育我们人世间没有什么事儿是我们办不到的。"

81 年来，他牢记父母的信条：要有所成就，要独辟蹊径，要领导而不是被领导。他们教导他，成功意味着即使面对逆境都永不退让。他们向他展示：力量不是来源于傲慢自负、自以为是，而是来自信仰。

因此，难怪他选择的终身伴侣具有同样的品格。尼克松夫人拥有坚强的性格、信仰、勇气和毅力，在他动摇的时候默默地支撑着他。我经常看见他们进行感情交流，两个人之间有一种特殊的爱意、温暖和尊重。他们相敬如宾，他们每一个小小的举动都充满着爱意，令对方感到惊喜，这些举动虽然细小，却意味深长。她准备休息的时候，他为她拍松枕头；她为他冰镇他最喜爱的饮料——白葡萄汁。她生病时，他为她拿来凉水，她病愈时为她带来巧克力；每天共进晚餐前，她都精心打扮。晚餐后，他们静静地坐在一起，一起看晚间新闻，了解每天发生的事情，共同分享喜悦和失望。他们像许多夫妇

一样进行着无声的交流;他们互相交换着会意的目光,这时候言语显得那么累赘。他们在公众舞台上的动荡生活终于结束了,现在总算可以分享迟来的独处了。

"我希望你见一见尼克松夫人。"1990 年 7 月 12 日,就在我为他工作后不久,他对我说,"她今天来办公室办事。她知道你加入了我们,想见见你。"他陪我走出我的办公室,来到会议室。前总统夫人正坐在里面,为慈善活动签名。

"帕特,"他说道,"这是莫尼卡。"

她抬起头,温和地笑着,双手握着我的一只手:"啊,你好。他总跟我提到你。迪克跟我说你刚刚大学毕业。你在这里工作,机会多么难得啊。"

我谢了她,她握紧我的手:"别让迪克太为难你了。"她笑着对他说,"他为难你的话——嗯,你就告诉我。"

他转向我:"你会打我的小报告吗?"

"那要看你是不是为难她了。"她冲着我眨了眨眼睛说。尼克松俯身充满爱意地捏了捏她的胳膊。

她知道他一向要求严格,因此这样开他的玩笑,而他同样作出戏谑的回答。他们之间已经达成一种平衡:多年来,她对他的雄心抱负给予支持,现在终于可以享受期待已久的清静生活了。她再也不需要在政治舞台上劳神了,也用不着保留自己对他作出的决定和判断的看法。她曾扮演一个活跃的政治家的妻子的角色,现在她解脱了,可以把她的精力倾注到自己的生活上,倾注到他们的家和亲人身上。1990 年 10 月 31 日,尼克松来到我的办公室,向我发出一个不同寻常的邀请。"你可能已经听说过,万圣节前夜在我们家是个隆重的节日,"他说,"这是很重要的一天。我们清理庭院,邀请城里的

孩子和他们的父母来,我出来给他们分糖果。非常热闹。我想你会愿意来看看的,是吗?"

我马上想象到,一群孩子在美国第37任总统的门前喊着"要恶作剧还是给吃的",而他亲自出来招呼他们,我不由得十分向往。

"那么好吧,下午4点左右过来,穿过人群就可以找到我。"

到了约定的时间,我驱车前往尼克松的住处,发现房前停了许多车子,聚集着许多州警察、几百个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孩子们穿着节日的化装服和父母在庭院里嬉闹。虽然就要见到美国前总统了,他们一点儿都不紧张,一边等着尼克松的出现,一边焦急地摆弄着摄像机。这是一个凉爽的秋日,我沿着车道向前走去,看见孩子们在树丛中玩耍,闻到尼克松书房的壁炉里传出了木头燃烧的味道。

我穿过聚在门前的人群,走进房门,发现每个房间都灯火通明。尼克松听到我关门的声音,在书房里喊道:"我很高兴你来了!你一定要来看看这个场面。"他穿过门厅,来到门前。

"我给您从衣橱里拿一件外衣吧。"我说。

"不用了,"他说,"我不想搞得太夸张。你先走在我前面,然后再站到一边。"

我打开房门。观众本来是满怀希望地等着尼克松的出现,一看到是我,都发出失望的叹息声。我走到一边,听到他们发出了惊叹声,原来尼克松终于露面了。照相机的镁光灯不停地闪烁着,孩子们兴奋地向他举起了糖果篮。孩子们的父母紧张地探身和他握手,围在他身边不肯离去。尼克松在他们的注目下十分轻松愉快。他跟每个孩子都说了话,那样

子就好像只有那个孩子一个人站在他面前似的;他跟孩子们的父母打着招呼,那样子就好像他仍在竞选似的。

我的目光扫视着人群,只见一个人奋力地穿过人群,走向前总统。他跟多数来宾一样,身穿化装服,不同的是他戴着一张尼克松面具。尼克松既不感到惊奇,也不觉得不安,他很开心地伸出手,一口气地说:"啊,总统先生,很高兴见到您!"那人笑了,脱下面具,引见了他的儿子。人群中还有人惹眼地戴着里根和布什面具,尼克松开玩笑说他生平从没见过这么多美国总统聚在一起。

大约半个小时后,我陪着尼克松回房,等待下一轮万圣节前夜的狂欢者聚集过来。我正跟着他要走进书房,见尼克松夫人从厨房里向我招手。

"嗨,莫尼卡,"她说,"我看到迪克让你参观一年一度的万圣节前夜活动。"她探过身来,压低声音说道,"啊,迪克自己不会跟你说的,可我要告诉你。我知道万圣节是他最喜欢的节日了。他简直喜欢得不行。你看他在那里的样子,像个孩子,好像是他自己在搞'要恶作剧还是给吃的'这个把戏。"她笑了,握住我的手,"这对他有好处。他需要偶尔开心开心。我知道他很高兴你能在这里看到这一切。"

厨房门打开了,尼克松看着我们:"你们在密谋对付我吗?"

"也许。"她说。

"我还不知道你跑到这儿来呢。"他对我说道,"真奇怪。我正跟你说着话呢,一回头,你就不见了。啊,你觉得我们刚才做得怎么样?"

我飞快地看了尼克松夫人一眼,见她转过头去,竭力掩饰

自己的笑容。我跟他说向人们敞开大门是个慷慨的举动。

"啊,他们都很开心。"他回答说。

尼克松夫人笑道:"这样做真不赖。还有啊,你可以看看政治的另一面。政治并不总是关于外交政策的重要谈话。你得出去,到群众中去,和他们谈话……"

"争取他们。"我说。

"是的,不仅仅是为了拉选票,这太功利了。是真正地听他们说话,听听他们在想什么,感觉一下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需要什么。人们称之为亲抚婴孩,这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他说,"你现在也见识到了。"

"迪克,外面开始冷了。"尼克松夫人说道,"我知道你不想穿大衣,可你至少也该穿点儿什么;不然就穿我去年圣诞节给你买的超麂皮外衣吧?"

他看了看她,又看着我说道:"你得看看这件夹克。"他说着,转身去取衣服。

尼克松夫人转头对我说:"要知道,迪克很浪漫。我想这会让很多人大吃一惊的。"

尼克松取了夹克回来,展开衣服让我从各个角度欣赏它。"这衣服棒不棒?"他问。尼克松夫人回答道:"迪克,衣服是穿的,不是观赏的。大家还等着你呢。"

他拿起她的右手,握了握,接着示意我跟着他出去。打开前门,他的女儿特丽西亚和孙子克里斯托弗走进来,克里斯托弗马上宣布说他是要到灌木丛里寻找在城里搞到的"臭弹"。

"臭弹?"尼克松看着他的女儿,眼中闪过不安的神情。"好吧,"他对孙子说道,"可别吓着客人了。"

这天下午度过得太棒了。在他踏出房门的时候,我听到

厨房里传来尼克松夫人和女儿的笑声，也听见外面有几个来宾低声地说见到了“活生生的历史”。我不仅看见尼克松所从事的平民政治激发了那么多人投他的票，这在美国历史上是没有哪一个政治家可以与他比拟的；我也目睹了他远离无情、残酷的政治的那部分生活。亲人之间不时地流露出温馨的爱意、其乐融融的戏谑，这些都表明多年来他们通过共同度过家庭内外的风风雨雨，已经亲密无间。尼克松那不肯安定的精神，既需要他在动荡的政治世界不断拼搏，也需要家庭为他提供避风的港湾。

“迪克拿着手电筒出去遛狗了。”1991 年 1 月 4 日 6 点钟，我来到他的府邸，尼克松夫人对我说，“我知道他在等你来，可布朗尼实在等不及了。”她笑道，“请进来吧。我刚才在给自己准备晚饭，可我没胃口。”她把手放在心口上，笑道，“如果你想见识一下最糟糕的厨师，只要看看迪克煮东西就行了。噢！我想是他回来了。你有机会看到的。”

“帕特？”他从门厅喊道。他听到我们是在厨房里，于是厨房门开了，他的狗先跳了进来。“嗨！啊，外面真冷。我要冲点儿咖啡。”

尼克松夫人止住他：“迪克，让我来吧。”

“得了吧，”他回答。他走向壁橱。尼克松夫人静静地看着他笨手笨脚地打开咖啡罐，把咖啡粉洒了一台子。“他妈的！我来弄。”他生气地说，一边开始清理，结果搞得一团糟。他更加恼怒，只好回头请尼克松夫人帮忙：“帕特，你不介意吧？”

他绝对地依赖她。只要听了她的建议，他就会更加顺利；只要呆在她身边，他就会更有耐心、更坚强。她警告他当心不

要做某些事情，他总是倾听她的建议；她提出要帮助他，他也总是让她这样做，否则他最终总会受罪。她同情地倾听他的诉说，他总是向她卸下负担，在他离开的时候，仅仅因为她的倾听而变得更加刚毅。

他的女儿们支持着他，为他感到自豪，他也从中找到安慰。她们凭着自身的实力取得了成就，她们以前所未有的热爱和忠诚支持着父母的事业。她们是父母最热烈的捍卫者、最忠诚的拥护者、最亲密的知己；父母则是她们最忠实的保护者、最热情的支持者。他们互相引以为荣。

1991 年 12 月 13 日，尼克松夫妇邀请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到他们的新住处参加一年一度的圣诞节聚会。前总统惹眼地穿着一套紫红色的宽松系带的便服，尼克松夫人则是全套的乳白色服装。两人站在门前迎接我。她拿起我的一只手，紧紧地握了很长时间。

他们给我们讲述过去经历过的有趣的事情。在他们阐述自己的观点时，两人不断默默地交换目光，不时地伸出手握在一起。

“1953 年和 1958 年的出游我记得很清楚。”尼克松夫人说道，“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是典型的沉湎女色之徒！他身边总是围着许多漂亮的姑娘。”

“帕特，还记得当时的条件多么让人受不了吗？”他问道，“天啊！当时房里没有卫生设备，外边又是盥洗室。”

“那里很潮湿，睡觉时一大群蚊子飞来飞去的。昆虫害实在太严重了！”

“那些时光真美妙，”他说，“艾森豪威尔让我们自由来去。我们好几个月好几个月地从一个地方游到另一个地方，看到

许多没见过的新鲜事物，每一次都那么美妙。"他看着我说道，"莫尼卡，你是这里最年轻的，你会游遍所有这些地方的。"

尼克松夫人表示同意，接着又善意地提醒说："要记得带上蚊帐哦！"她慢慢地站起身来，"我想让你们来看看我最喜爱的房间。"

我们跟她下楼，来到一间日光浴室，房子漆着她最喜爱的颜色——黄色和绿色。"我多数时间都是在这个房间里度过的，我们就决定把圣诞树放在这里。"她说，"50 多年来，我们从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搜集了许多装饰品。有一些实在很奇妙。"她伸手到树下拿出礼物分给我们，其中有一本关于白宫艺术品收藏的书。

在他们向我们道晚安的时候，我看见前总统伸出胳膊搂着她，让她靠在他身上。我走到房前小道的尽头，回头向他们挥手道别，见他们臂挽着臂站在门口，我不由得被这画面惊呆了。他们互相关爱，这是个极好的体现。再也没有公职苛求他们、束缚他们，他们从无情的监视下解脱出来，他们在更多的时间里只需要互相欣赏着对方就够了。他们站在那里，胳膊相连，不仅在婚姻上而且在他们的经历中，他们合二为一。

1992 年 2 月 29 日是星期六，尼克松和两个孙子阿列克斯·艾森豪威尔和克里斯托弗·科克斯一起度过了这一天。他们在麦迪逊广场公园看纽约尼克斯人篮球队的比赛，碰到了一件出其不意的事情。

"今天下午我带阿列克斯和克里斯托弗去看比赛，"那天晚上他打电话给我说，"比赛倒是不错。中场休息时，啦啦队长领头表演，结果看到我坐在观众中间，他们就为我唱歌跳舞了。这也罢了，没想到他们来到人群中，离我很近，跳到一半，

其中一个居然坐到我腿上！我觉得就像盖利·哈特让人搞了恶作剧一样。他们可能把我当作特德·肯尼迪了！噢，天啊！”

我们都笑了。“我跟尼克松夫人说了，”他接着说道，“她觉得这事儿很滑稽。她可真是好脾气。”

“想想看，这会影响到您的声誉的！”

“没什么好事，”他笑道，“噢，天！总是这样。可你知道，我宁愿在电视上看比赛，不然我得签上大约150个名，这也罢了，可我不大看比赛。

“再说尼克松夫人，她是个坚强的人。许多年来，她一直被列入《持家能手》上最受钦佩的女性的名单，即使在她引退以后也是如此。我们出国时，她都有自己的日程安排，好几次她还是自己出去的。他们称她是亲善大使，她确实是亲切善良。我的天！每回一想到她的遭遇，我总不敢相信。我们离开白宫时，她在48个小时以内就把整个白宫整理停当，打好了包，一刻也没有合眼。整个事情对于她和姑娘们来说都是个煎熬，可她们都那么坚强，她们自己心力交瘁，却替我承担，为我而坚强。”

他顿了顿：“没有她们，我肯定渡不过难关。”他停下来回忆着过去，“我记得几年前，我抱着特丽西亚，在冰上滑了一跤，倒在地上。我到毕士达教会医院——他们为国会服务——找到一个海军医生，他没有接好我的胳膊，从那以后，每回都要把一个衣袖裁短！可我不后悔那次抱着孩子，她当时还那么小。现在看着我的孙子们，总想起特丽西亚和朱莉。杰妮和米兰妮（朱莉的女儿）为我和尼克松夫人表演，就像朱莉以前那样。她们都是了不起的孩子！

“朱莉样样都领先，特丽西亚总是那么有创意。都是尼克松夫

人的功劳。她是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母亲。她相信每个人都很重要,不管他们是什么人。国王、总统也好,街上的行人也好,她对他们都充满了同情心。她真诚地关心别人、同情别人,是一个最聪明的第一夫人。埃迪斯·威尔逊很冲,但不很聪明,埃琳娜·罗斯福很精明,她总有自己的做法。杜鲁门夫人很和蔼,就是不太聪明。梅米·艾森豪威尔对政治不感兴趣,她只喜欢打牌等室内游戏。伯尔德·约翰逊夫人是个强悍的甜姐儿。可怜的贝蒂·福特和罗萨琳·卡特——她们在那儿的日子很难过。南希·里根精明强悍。巴巴拉·布什也很强悍。可尼克松夫人真的很特别。"他说,"我并不是因为她是我的妻子才这么说。"

尼克松在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智慧、冲劲、力量、傲气、同情和宽容。她激励他成为更优秀的领袖、更尽职的丈夫、更慈爱的父亲、更慈祥的祖父、更高尚的人。他至死都相信他的力量已化为她的力量,反之亦然。他动摇的时候,她总站在他身边,用安慰的话语鼓励他、支持他,告诉他真相,即使那是他所不愿意听到的。她是他的知己,因此他们得以白头偕老。

1993年6月22日,尼克松夫人去世后,他希望女儿们能够继续保持家庭的整体感。1993年7月5日是朱莉的生日,尼克松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开了个家庭讨论会。

"对于离开这里以后的归宿问题,我们尽情地讨论了一番。"当天晚上,他告诉我说,"大家意见统一。我们一直都是这样,以后也要这样。尼克松夫人是不希望其他样子的。我觉得朱莉的生日过得很不错。海迪带孩子们去看那部恐龙电影(《侏罗记公园》),我们开了个火鸡宴会,还为她(朱莉)准备

了蛋糕。"他顿了顿,"我们聚在一起,感觉很好。对了,你可记得过去常帮尼克松夫人准备缺席选票[1]的事情?"

我记得。

"你可记得几个月前初选的时候,你把她的选票拿给我,我又还给你?那时我以为她病得太厉害,可能没办法做了。"

"没错。"我说道。

"啊,她后来向我讨了。"他说,"她说:'我的选票在哪里?'我以为她病得那么厉害,根本不会想到投票的事,我错了,她想投票。我很难过没让她做。"他清了清嗓子,"啊,今年没有了她肯定很不一样了。朱莉和特丽西亚会经常过来的,我当然跟她们说没有必要,可她们愿意这么做。当然了,她们让我很开心。"

感恩节快到了,尼克松的精神似乎好了许多。他最喜欢的节日,除了万圣节前夜就是感恩节了。他喜欢万圣节前夜大家搞化装聚会时随意嬉闹的气氛,感恩节则是美国独特的节日,注重家庭团结的纽带,不像圣诞节那样更多地与物质方面的期盼联系在一起。

"我确实盼望着今年感恩节的到来。"1993 年 11 月 23 日,他说。我走进他的府邸,听见他在叫我,我循着他的喊声来到厨房。"只有在这个节日里,我们全都聚在一起。圣诞节时姑娘们喜欢聚在自己的树下,做自己的事情,所以感恩节对于我来说是个大节日。我一般只是叫海迪为我烤一些乳酪,可在感恩节我们会准备所有传统的食物,这些食物使每一年变得那么不一般。

---

[1] 缺席选票:通过邮寄等方式预先投给选举机构的选票。

他递给我一杯白葡萄汁说，"节日里我们准备了很多，我想你会喜欢喝一点的。对了，秋天里的每个星期天，我都为自己做热狗，看橄榄球赛。我还烤面包，我都觉得自己就在比赛场上了！"他笑着说，"在那本书上埋头苦干了五六个小时后，这是很好的放松。看着他们拼抢滚爬，我觉得很高兴在那里滚打的不是我。"

他喝了一口葡萄汁，用杯子指着我说："你知道感恩节之后是什么日子吗？哈，是'大都会'最热闹的时候了。"

每年尼克松都迫切地盼望纽约"大都会"音乐厅的圣诞表演，每年他至少看两次：一次和孙子们去看，一次和里波佐夫妇、阿布拉纳尔帕夫妇去看。演出中的音乐很辉煌，舞蹈节目多姿多彩，布景令人赞不绝口。他的嗜好不多，这是其中的一个。

"你上一次去'大都会'看表演是什么时候？"1993 年 12 月 12 日，他问我。

"好几年前了。"我回答。

"啊，你一定得去。很不错的，一年比一年好。洛基特一家太棒了，还有结尾——基督诞生——非常感人。太棒了，安排得来的话，我这个星期要去看。

"对了，你听说我们昨晚的事了吗？我带里波佐夫妇进城吃晚饭，然后去'大都会'。结果路上结冰，没看成。我们三个小时后才赶到，整个节目都结束了。如果能搞到星期五的票，我们就去。你们得去看看。不知道我能不能给你们弄到票，不过我试试看吧。

"我们是去'二十一'吃的晚饭，我已经好几年没去那里了！很不错，可我不愿意老是这样子出门——你知道，是社交方面的事。我倒不想总是很严肃，我只是想谈些有意义的话

题，一对一式的谈话，不是跟陌生人或熟人打哈哈，我都什么年纪了。跟里波佐夫妇、阿布拉纳尔帕夫妇出去是一回事；出去让人看是另一回事，我可没那闲心。"他脸上堆出假笑，"'噢，你好，你好。好久没见了！'"他做了个鬼脸，"天，我讨厌这无聊的东西。

"我们去'大都会'肯定会很开心，我敢保证。"

12 月 17 日是个温暖的冬日。尼克松的豪华轿车开到办公室前接全体工作人员。我们都挤在车座，他最后上车，坐在靠窗的位置。

"今年这时候比往年暖和，是吗？"他一边说一边脱掉大衣，"我真高兴我们弄到了白天的票。"他看了看手表，"我只是希望不要碰到交通阻塞。"

到了城里，我们恰好就碰到大范围的交通阻塞。

每到圣诞节前后，整个曼哈顿中部都陷入交通瘫痪的状态。尼克松感到很热，于是打开车窗透透新鲜空气。我们停在那里，就见一小群人开始聚集在路边，许多人向豪华轿车看过来，认出了尼克松并向他微笑。尼克松没有意识到车窗是放下来的，继续跟我们说话。他偶尔向外瞥了一眼，看见聚集在外面的人群。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那边一群人在看什么呢？"

"先生，"我说，"他们是在看您啊。"

他吃惊地看了我一眼："哦，啊，那是呀。"他嘟囔着转向人群，"嗨，很高兴见到你们。"他打着招呼，一边小心翼翼地冲他们挥手，一边缓慢地升起车窗，"我忘了车窗是放下来的，人家会看进来。噢，还好，没关系，他们都很友好。"

我们总算在“大都会”音乐厅的边门前停了下来。尼克松一踏出豪华轿车，几百个人就一拥而上，要求他签名、握手，或仅仅是要看他一眼。他一面尽量照顾到他们，一面护送着我们穿过人群，走进剧院。走进后，他身后立即挤了一排的人，剧院的引座员费了很大劲才把观众劝回到座位上，表演才得以正常进行。

灯光熄灭后，帷幕一拉上去，尼克松就给迷住了。在他看表演的时候我观察着他，只见他身上有一种纯真在复苏，好像这些孩童时代所听到的圣诞故事仍像70多年前那样令他感到新鲜。柔美的音乐萦绕着他，他笑了。

我又一次为这画面惊呆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在美国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现在完全为一场圣诞表演的单纯与美丽所倾倒。

然而，最扣动他心弦的是表演的最后一幕。基督的诞生重现在眼前，剧中的叙述员告诉观众，在一座不起眼的小山村里出现了一个人，他的母亲是个农妇，他只是个普通的木匠，他没有写过书，没有任过一官半职，也没有任何值得称道的壮举，最后却死在敌人的手里。但是，叙述员提醒我们，那个“孤独的生命”却影响了在他以后的每一个人。

这一幕结束后，我看着尼克松，见他紧紧地攥着手帕。这个信息使他震惊。写书与任职是他毕生的事业，但突然间，它们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大都会”的最后一幕表演让他找到了他所寻求的：看待问题的视角。

伟大并不只是来自壮丽的言辞、史诗般的成就；它可以来自对自己的坦诚。尼克松并没有抛弃常人皆有的雄心抱负和

决心,但他考虑的重点仍然包括信仰和家庭。其他事情转瞬即逝,它们却是永恒的。

1994 年 4 月 3 日星期天是复活节,也是他去世前的三个星期,他在纽约和特丽西亚度过了这一天。他们沿着第五林阴大道慢慢地散着步,越来越多的人拥到他身边。这是他最后一次为人群所围绕。那天晚上,他跟我说他为来自全世界的 600 多人签名,感到非常满足。即便如此,更重要的是能够有女儿陪伴在他身边。

"那些人都向我致意,确实很感人,"他说,"他们都很尊敬我。可我最高兴的是特丽西亚就在我身边看着,和……"

"和您一起分享。"我替他说完这句话。

"这很有意义。"他说。

尼克松的社会生活经历了大起大落,他在为美国人民服务过的总统中是最充满矛盾的一个。鲜为人知的是,他在个人的家庭生活中找到了安宁与祥和,成为他战胜政治挫折与个人磨难的关键。

其他人感兴趣的是他的政治,他的亲人关心的却是他的安康;其他人感兴趣的是他的言语,他们关心的却是他的感觉。在他们由于他所选择的生活道路而受到批评的时候,他即使偶尔没能捍卫和保护自己,也要奋力捍卫和保护他们。他的选择使他们也成为公众注目的人物,但他们给予他的同情不仅支撑着他,而且给了他坚持下去的毅力,尤其在最黑暗的日子里。

"俗话说,每个伟大的男人身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尼克松有一次对我说,"可我比多数人都幸运。我身后有三个伟大的女人。"

她们的勇气使他坚定;她们的力量使他勇敢;她们的爱使他有成就感。最后,他看清楚生命中真正重要的是什么:他认识了那么多人、为那么多人服务,他获得了权利和物质,但只有上帝和家人不会背弃他。

第三章　论年龄、死亡和目标

1994年1月9日的早晨，我醒来后伸出手去拿电话，准备完成理查德·尼克松生日的祝贺仪式。我知道他一定在书房里思考着天赐给他的又一年的生命。他不得不承认“没有人长生不死”，但他仍然打算在这条不可避免的道路上一步步地抗争。

电话铃响过许多次以后，尼克松才拿起电话。我听到他清了清喉咙，早起的困乏使他的嗓音含混不清，只听见他谨慎地嘟囔了一句：“你好。”

“早上好，总统先生。”我说道，“我想第一个向您祝贺生日快乐。”

“噢，谢谢。”他缺乏热情地说，“我知道你总记得这些该死的东西，我早就不庆祝生日了。不过你的问候让我真高兴，我想今年还是庆祝一下吧。”

在每年的1月9日,我都向他祝贺生日快乐,每年他都诅咒这个日子。他对人们的善良祝愿彬彬有礼地表示感谢,可又蔑视这些祝愿所代表的含义:它们再一次提醒他,他的生命距离那个终点又近了一年。

"难道不是您经常告诉我说年龄不过是个数字而已吗?"我问他。他经常一遍一遍地对自己重复着这句老话。

他笑了:"啊,生日没到的时候说一说当然很容易了。姑娘们提出今天要过来玩,我说没必要了。我什么都不想要——不要声张,不要忙乱,什么都不要。今天是星期天,大家都没空。我甚至跟海迪说中午只要一大份金枪鱼色拉,留一些热狗当晚饭,我自己会把它热一热的。"

我意识到他既想坚持自己的独立自主,又隐约有些寻求同情的意思。我问他是否需要我为他带点儿什么。

"谢谢你,不用了。"他答道,"我要看看(纽约)巨人队的比赛,希望他们会赢,然后读点儿书。这样就行了。你听起来觉得怎样?"

听起来有些伤感和孤独。美国前总统独自度过他81岁的生日,也是最后一个生日。尼克松夫人在六个月前去世,留下他一个人独自在空荡荡的房间和大厅里游荡,脑子里萦绕着对于他自己的死亡的思考。

我想象他坐在书房的椅子上,双脚架在软垫搁脚凳上,身边放着一杯白葡萄汁,手里拿着一支钢笔,腿上放着一本书。但他不在读书,他凝视着窗外的景色,看着冬天渐渐地窒息他周围的生命,考虑着它那肃杀的力量何时会降临他的头上。

在我为他工作的四年当中,我们谈论了许多话题,最让他不安的话题就是衰老和死亡。在他的整个成年时期,他一直

在竞选、领导国家、奋力拼杀，有时他也思考自己生命的结束，但总是联想到史书将会把他描写成什么样的人。

然而，一年年过去了，他对死亡所采取的漠视的态度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淡淡的否认。自嘲的话表明他是真正地为自己的衰老担忧；幽默掩藏着恐惧；他人的死亡成为拒绝考虑他自己的借口。然而，在偶尔出现的一股怀疑和恐慌中，恐惧会浮现出来并抓住他。

"我前几天见到比利·格雷厄姆了。他看上去还不错，可他一直在抱怨自己老了。"1992 年 1 月 31 日，他跟我说。当时，尼克松为了促销《只争朝夕》一书，在纽约市的《早安，美国》节目上进行现场电视访谈。他刚回来不久，感到疲惫不堪，精神郁闷。与格雷厄姆的谈话似乎深深地影响了他。同龄人不断地提醒他：人不是长生不老的。这时，很难再认为自己是个例外。

"你知道，我今天早上坐在梳妆室，看着那个三面镜——对了，除了刮胡子以外，我其实很少认真地看自己——意识到自己显得真他妈的老。"他看了看我，很快又移开目光，"我看见你是那么年轻，周围的人都那么年轻，可我——啊……"

他清了清嗓子："我见到一些同龄人，他们老态龙钟的。再看看年轻一些的人，觉得自己在智力上很年轻，可在生理上，我得面对现实：我确实老了。"

前总统坐在椅子上转向我，举起右手制止我发表任何看法。他的脸上闪过一丝淡淡的微笑："我不是心情郁闷，也不是想捞到些什么评论，我甚至不想把这些东西一股脑儿说给你听。在演播室的强光照射下，看看自己，就想到你也该考虑考虑自己了。就像邓小平说的：'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你应

该跟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而不是一颗即将陨落的星。”

我正想反对，他就笑着继续说：“你怎么受得了围着个老头子转呢？”

“我不知道什么老人不老人的。”我回答。

他开怀大笑起来：“啊，就这么回答呀。”

尼克松向来认为年事渐高的过程就是生理上缓慢的衰老。他认为它不是人生睿智的最后阶段，而是充满压力和紧迫感的一段时间。谁也不知道还剩多少时间，所以许多事情必须马上完成。尼克松感到死亡越来越近，他必须飞速地利用他的知识作出贡献：每两年出一本书，每年出国一次搜集信息，每隔几个月发表一次演说，时常在国家的权威报纸上发表专栏文章。这是无意识的步骤：他的日程安排不断加码，希望可以使生命那不可避免的终点放慢脚步，或至少在此期间频繁活动，让自己不去注意它的到来。

1992年10月7日发生了一件滑稽的事情，不仅使他能够或多或少轻松地对待衰老，而且突出了他不稳定的处境。当晚，他打电话给我，谈论布什总统最新的一次民意测验数字，接着告诉我一个笑话。

“喂，莫尼卡，今晚我想替你省省电话钱。还是五分钱，对吧？”他笑着说，“如果现在不方便，那我等会儿再打过来。”他说。

我跟他说我现在可以听电话，他接着说：“你想不想听听今天的笑话？真难以置信。昨天晚上大约11点的时候，我和尼克松夫人、朱莉正在看新闻，约翰·泰勒（理查德·尼克松图书馆及出生地负责人）打来电话。我当时想：‘噢，天啊。谁去世了？’他说：‘总统先生，真高兴听到您的声音。今天一整天，

联合报社和《洛杉机时报》报社一直向我询问，尼克松总统是否去世了。'

"去世！你能相信吗？所以我跟他说：'我的天！没那事！我活得很好！'他们从哪里听来的？"他大声地笑道，"莫尼卡，他们以为我去世了，老天！我告诉他，下一次他们再问，就跟报社说我们无可奉告！"

这个小插曲，表面上很幽默，却也表明尼克松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不愿意去想他总有一天会真的去世。他的酒窖里储藏着一瓶1913年拉菲特·罗特希尔德酒，他总说它是"促使他活到100岁的动力"。

"我知道医生禁止我今生喝酒。"1992年10月31日，他说。由于心脏问题，他一直在用药。"要知道，贝比一直说我应该再问问医生有没有新的看法。如果我能活到100岁，我就喝那瓶波尔多葡萄酒，他妈的！到了2013年，我们俩就都100岁了，我就这样庆祝。如果喝完酒马上倒地死去——啊，好，至少我是开心而死的！"

尼克松80岁时仍然相信自己会一直活到90多岁。1992年12月中旬，他的80岁生日越来越近了，他请求我不要谈论它："请别再提起了。我真的不愿意想到我的年龄。里波佐夫妇想从佛罗里达来看我，我说算了。我不想听人提起它。我是认真的。"

他确实是认真的。他的逻辑依据是：如果他不庆祝时间的流逝，年龄就不会对他有所影响。如果他不谈论衰老，他对它的影响就有免疫力。如果他不承认生日在正式地提醒他生命的本质是脆弱、短暂、转瞬即逝的，他就不会被毁灭。

1991年2月6日，他打电话给里根祝贺80岁生日时，很

明显地表现出了内心的挣扎。那天早上，我走进他的办公室，发现他坐在角落的椅子里，对着一份《纽约时报》直皱眉头。

“今天是里根的生日。要知道，这是个很隆重的日子。80岁。”他停了停，“80岁啊！我的天！我就在他后面。”

他拿起电话，要求接通在加利福尼亚的里根。

“罗纳德吗？啊，祝你生日快乐。我希望这个时间在你那里不算太早。”

尼克松笑着继续说：“你39岁生日的第41个纪念日？啊，说得好！我要记住它。”

尼克松挂上电话后，双手交叉放在腿上，叹了一口气：“时间不等人啊。”

我笑了：“也不等总统吗？”

“特别是不等总统。”他也笑了。

他突然在椅子上坐起身来，向前探了探身，说道：“我跟你说没说过我对后事的看法？”

“‘后事’是什么意思？”我为这一问题惊呆了，不由得问道。

“啊，我对死亡的看法是这样的：我知道这该死的事情是不可避免的，可我们没有理由老是考虑它。看，我至少每年看一次医生，看所有的医生。如果觉得身体有什么不适，看得就更勤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多数是老人——不去看医生。我知道他们害怕，可他们应该了解身体究竟怎么样。我的化验单经常表明我的身体没问题，医生告诉我说我身体很棒，我知道自己至少可以再活一年，或者是他们这么说的。

“我对后事的看法是：我真的不愿意让人大张旗鼓地操办我的丧事。我讨厌参加那些该死的东西，每个人都那么伤

心，哭哭啼啼的——要么是装哭，像这样：‘呜呜’——乱七八糟的。不，我可不要这些。等我去了，”他声音颤抖地说，“我希望迅速、简短，不要那些个多愁善感、痛不欲生的场面。”

他使劲地眨了眨眼，接着说：“我可不愿意老想到死。在我还能干的时候，我得写书、思考等等。等我离开人生舞台时，就痛快一点，别拖拖拉拉的。趁我还行的时候，我要多作点儿贡献。”

1993年8月17日下午，我来到他的府邸，和他一起修改《超越和平》的书稿。在书房里，他坐在我对面，一边呷着白葡萄汁，一边像舞弄武器一样地摆弄着钢笔。“要知道，”他说，“我为国家考虑了许多，就此而言，这是我最有哲理的一本书了。我可不善于写一些反省的东西——即使《尼克松回忆录》和《在政治舞台上》在这方面也写得很有限，《在政治舞台上》会透露得多一些。所以这本书也不会过多地写我对衰老的看法。也许以后会专门写一写的。也许为《读者文摘》或其他什么的写一篇文章，让其他人知道生活就是生活——充满大起大落。看看我的一生：折腾得要命。”

我问他，愿不愿意用一种更安宁的隐居生活来替换这种生活，他毫不犹豫地答道：“不愿意！有时我也在想，是不是真有人能够适应社会生活。说到担任总统，即使你一辈子都在努力，还是不能真正适应这个角色。总有争议，尽管我们都料到了，你还是没法过上正常的生活。”他直视着我，“你面前还有很长的路，我的都在身后，走完了。”

他拿起最新的一期《经济学家》，封面上有克林顿的一张照片。“这家伙很年轻，看上去很精神，精力充沛、生机勃勃。”

我止住他说：“您怎么能拿他跟您比呢？”

他把杂志扔在地上:"我知道这很蠢,我只是想——啊,我要是再年轻40岁,可以做多少事情啊。我知道人总想得到更多,特别是到了我这个年龄,可轮到你自己总是不太一样。"

他咬紧牙关说道:"莫尼卡,你需要有生活目标。每个人都需要:国家也好,人民也好。每个人都应该保持年轻的心态。有时这很难,可又必须这样做,否则衰老就会征服你,打败你。"

尼克松的坚强主要来自他的活力。他不断战胜巨大的困难——战胜政治对手和批评家,不断地打败那些怀疑他、诋毁他的人。他从失败中站起来,向自己、向世人证明他其实是坚不可摧的。他承认死亡是惟一能够战胜他的力量,但他不允许它占据自己的思想,他的思想要用在更有意义的地方。

"自律,"1993年10月1日,他跟我说道,"自律是让人过上健康的生活的关键。"冬天很快逼近了。虽然尼克松说他在散步时思想最活跃,但他再也不能长时间地在室外散步,只能在健身自行车上作室内运动。

"你看,我可以跟自己说:'外面很冷,没法散步了,我只好坐在家里百无聊赖吧。'可我没有。我说:'我没法出去,好吧,可我还是要活动活动。'我就在室内活动开了。没有自律,生活中就会失去很多东西。我一直非常严格地遵守锻炼的时间安排,不然的话,整个人就会犯懒。读书、发表演说和写作让脑袋不至于犯懒,可你得让身体也跟上去,不然的话,你想谈论点儿什么,却没办法出门,脑筋好还有什么用呢?今天我去游泳了,等天真正冷下来,我会想念游泳的。我的身体很不错。我不喝酒、不抽烟、不打牌!我干什么呢?"

"没什么可以玩的了。"我说。

他笑了:"我知道。到我这年纪,玩儿什么都会要我的命!时间的脚步是挡不住的。医生经常说我会再活一年的,所以我干什么都得小心。"

然而,只要他稍不小心,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他一直小心保证健康的饮食,有规律地进行体育锻炼。但他偶尔也会过头,于是就病倒了或受伤了。在恢复阶段,他缺少活动,缺少与人交往,只有被孤独地困在那里,感到特别痛苦,特别脆弱。

1992年4月25日,尼克松到佛罗里达拜访好朋友贝比·里波佐,结果摔了一跤,扭伤了脚踝。下午,他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我。

"莫尼卡吗?"他说,"啊,出了点儿小问题,我们早上到迈阿密医院去了。"

"出了什么事儿?"我问道。

"啊,在里波佐家下楼的时候,没看到前面一节楼梯,把脚踝给扭伤了。"他说,"我坐在该死的轮椅里呢。我常说,我可不愿意在这种东西里寿终。医生说骨头没断。我的骨头一定很硬。我想我得在这儿呆上一段时间了。他说两周内就可以走动了。"

我问他是否很疼。

"啊,你知道这会是什么情况。"他说,"我不想吃止痛药,可我不得不吃。我明天回家,星期一见吧。我的情况看上去会很糟的,不要被吓着了。"

星期一早晨,我来到他的府邸。我带了一些资料让他审查,还带了一张卡片,我在上面写了一句希波克拉底的话:"康复需要时间,也需要机会。"我登上了通往书房的楼梯,发现他

坐在窗沿上，显然正遭受痛苦的折磨。他站起身来，探手抓住书架作为支撑，但他靠得太用力，书架连同里面的书一起倒在地上。

“他妈的！”

我冲到他身边，扶他坐到椅子上，扶起书架，问他是否觉得好一些。

他的脸因为痛苦、愤怒和沮丧而变得通红。“不太好，”他指着没穿鞋子的双脚说道，“我想穿上鞋子，可脚肿得太厉害了。我不愿意让你看到这个情景：光着脚，痛苦万分，什么都不能干……”

我建议他换个医生看看，他做了个鬼脸：“我本来不想的，可实在太疼了。你知道我对看医生的看法，而且那是我身体健康的时候。一个又一个医生对你盘根问底，陌生人都来给你揉揉捏捏的。可我没办法。”

第二天，医生给他的脚包扎好，向他保证疼痛会最终消失的。当天傍晚，我来到他的府邸。

“你看，”他用一只手指向他的脚说，“我按照你的要求去看医生了，我很高兴听了你的话。现在还疼，不过至少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他皱了皱眉头，“这种疼是一阵一阵的，我还不能走动，这几天要在这把椅子上读书了，送些有意思的资料过来吧。”

他把双手叠放在腿上，笑道：“我可不愿意老想到死，可这种事情总让我想我到底还剩多少时间。我不知道你怎么能受得了围着这么老的家伙转！”他大笑，“可我在想啊，不知道我在电视上是他妈的什么样子。要知道，我实在不想在那儿像个又老又瘪的家伙。想想就难过。我们得面对现实，时间在

流逝,没办法。"

他的脸又亮了起来:"像我这么大的年纪,身体还这么好,实在让人吃惊。不过我还是宁愿不提我的年龄!要经常向前看,不要向后看,这很重要,不然就会被别人超过了。话又说回来,到我这个年纪,就很难再向前看了,谁知道前面还剩多少时间呢。可我还是要说:'看看将来,只要这样就一定能活着看到它。'"

虽然他竭尽全力避免想到衰老和死亡,这些话题还是缠绕着他。在他的一生中,他都努力展示自己的力量、精力、坚强和活力,但每回生病或受伤都让他想到自己身体的脆弱。他并不害怕死亡的过程,而是害怕它所代表的含义:结束他作贡献的机会,最终失去控制,中断他的复兴。死亡是他所不能战胜的一个敌手,是不会提供第二次机会的敌手。

过去,他也曾失去过亲人,但 1993 年三个人的去世对他的影响尤其深远。在五个月内,前得克萨斯州的州长约翰·康纳利、尼克松夫人和他的竞选班子领导人 H·R·霍尔德曼相继去世,留下尼克松孤零零的一个人,他感到既震惊又恐惧。死亡已经夺去他周围的人的生命,不久就会降临到他的头上。

"尼克松夫人病得很厉害。"1992 年 12 月 22 日,尼克松说,"我的意思是病得非常厉害。她现在的身体很糟糕。那时我们去参加里根图书馆的开馆仪式,她就倒下来了,可那时的情况比现在好。她瘦得不到 100 镑,可她身高 1.70 英尺呀。她咳嗽,我们都劝她看医生,可她不肯。我不知道她感觉怎样。她又坚强又脆弱。"

在我为前总统工作的四年中,尼克松夫人有时很健康,有时又病得很厉害。肺气肿使她呼吸困难,不能作剧烈的运动。

她身体虚弱，但她意志坚强，精神不屈。她每次生病时，都顽强地拼搏直至病愈。每次病愈后，她都显得比生病前更坚强。但在 1993 年年初，她终于敌不过死神的力量。

1993 年 3 月 2 日刚过中午的时候，我在电话上跟尼克松谈话。他的语气很不安，于是我向他表达了我的关切之情。他答道："是尼克松夫人。她染上了我的感冒，再加上肺气肿，呼吸十分困难。我们把她送到纽约医院了。"

"她还好吧？"我问道。

他没有回答。

"先生，您没事吧？"我问道。

他的声音颤抖了："啊，我现在没法跟你说，你过一会儿再打电话过来吧，好让我在你的肩膀上哭一哭。"

他的话把我吓坏了。我还从来没有听到尼克松承认自己的脆弱，也没有见到他如此直接地显露出悲伤的感情。尼克松一向善于隐藏自己的忧虑，很少让人知道他内心最深处的感情；通常是在危急时刻，如尼克松夫人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时，他才会充分地表露出最真实的悲伤。

我过了一阵又给他打电话。他说："我现在好多了。他妈的。我应该是坚不可摧的。到此为止了。她在医院里，我每天都要去看她，可能不会经常到办公室去。"他叹了一口气，"嗨，我想也只能这样了。"

她恢复了些力气，回到家里。但到了 4 月 25 日，尼克松夫人由于更严重的呼吸问题又被送到纽约医院。

"他们降低她的血压。"第二天他告诉我，"这对于她来说是个考验。她有两个私人护士。我们本来打算在我做完前列腺手术后这么做的。贝比过来和我提前在那里等着，这时那

个古怪的护士走进来问我的名字，还说：'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你能相信吗？从那时起，为了避免工作不得力，我们雇了自己的护士。她现在情况很不好，卧床不起，可她精神保持得很不错，她真了不起。还有其他的麻烦事，现在不谈了。如果新闻说事态很严重，我同意。"

三天后，尼克松夫人仍然躺在医院里。前总统打电话告诉我他已经开始考虑准备后事了："我不是想让你心情忧郁。我今天去医院看尼克松夫人，她的精神还很好，医生也说她很坚强，可还是不太妙。如果发生什么不测，我们打算在图书馆举行，不在纽约，也不在华盛顿。我想最好还是及早安排。"

尼克松并不掩饰自己的绝望。无论他做什么，说什么，都流露出悲伤。他经常话说到一半就停下来，在办公室和家里的门厅内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呆望着窗外，他在房里踱来踱去。没有了她，她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在这之前，他从来不需要面对这个问题。她是他生活的伴侣，永远支持着他，陪他走过了胜利和悲剧，越过了他那些著名的山峰和低谷，也经历了病痛和健康。她的生命即将结束，她静静地煎熬着。想到他必须独自度过余生，想到这一切都压在他头上，他觉得实在难以忍受。

"请进来，"5 月 3 日傍晚，我走进他的书房时听到他这么说。整栋房子一片黑暗，一片寂静，只有电视机传出播报新闻的声音。"我刚才在读点儿东西，做了些事情……"他关上电视机，坐到椅子上，请我坐下。好一阵时间过去了。

"啊，尼克松夫人觉得好一些了，但不过是暂时的。她不知道有多严重。要知道，是癌症晚期。"他说道，"年纪大点儿的人嘛，癌扩散得就慢一些，所以时间很长。你知道，这时候

对于我们来说很难过。她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也许更长，也许更短。可她精神很好。”他带着微弱的笑容说：“她今天下楼了，还说：‘我会没事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让她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我们必须做到。”他握紧拳头说道，“多难过啊！她以为自己的病会好的，可她不会好了。姑娘们更是受不了——朱莉和特丽西亚。她们感觉很糟糕。”

“您觉得怎样？”我问道。

“啊，你知道，我是个现实主义者。”他答道，“你得面对现实。你不要为我担心。我们会渡过这一关的。”

五月中旬，尼克松夫人的情况非常严峻。她几乎已经不能呼吸了，体重已经减少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疼痛也越发难以忍受。她的亲人每天都围绕着她，她的病越来越严重，可她仍然保持积极的态度，十分伟大。他们决心保持她良好的精神状态，她也决心为了他们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

5月17日，我在办公室碰到尼克松。他已经决定为最后一本书起名为《超越和平》。我们一起讨论着它的含义。

“我对这个书名感到着迷。”他说，“《超越和平》。很有趣，也很惹人注意。你知道，从字面上来看，我们的意思是仅仅和平还不够，根本不够。在和平之外，我们的目标、我们的使命是什么？这是关键。可还有更深沉的涵义，多数人都抓不住。这个意思就是：由于安宁在今生不会降临，我们活着为了什么？安宁不可能降临的。人们生来就是焦躁不安的，有些人比别人更严重。安宁只在坟墓里，不在这里。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知道得会越来越多。

“对了，我在博布·侯普的特别节目里看见克朗凯特，他显得真他妈的老。他跟我差不多大。哎呀，天啊！最近的危机

向我表明，生命有限，每天的日子要过得好像是你最后的一天。我要充分利用每一分每一秒。

“可让我这么说吧：如果尼克松夫人有什么不测——到了这个地步只不过是时间问题，我希望你呆在加利福尼亚。我不喜欢葬礼，所以仪式会很简单。不过如果你能来，可以帮着应付报社。反正你总会在那里的。”

他在椅子上移动了一下身体说：“还有一件事：我希望你关注一下关于她的新闻报导。如果哪里出现任何不利的话，我希望你猛烈地反击他们。我们决不容忍这种情况发生。”他愤怒地指着我说，“我选择了社会生活；她可没有。他妈的，他们最好离她远一点儿，否则的话，跟那帮杂种没完。行吧？”

我同意了。

“好，”他说，“我们最不愿意应付的就是这类狗屁东西。朱莉和特丽西亚是歇斯底里的，我也疲惫不堪。我不想让她们看到什么反面的东西。我们的一个朋友凭直觉感到发生了意外，对我们说：‘我想她快不行了。’我的意思是，人都有一死，可……”他使劲咽了一下口水，“啊，她很快就要得到安宁了，可我们这些人还在这里东奔西走，寻找安宁。”

一个星期后，我见到他时发现他焦急万分，又开始踱来踱去了。“我不大容易向别人吐露心声。”他说，“可我不想给特丽西亚和朱莉增加负担。我得找一找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我想，按规定应该安葬在公墓，但我们当然想把她葬在图书馆。我所以提起这事儿，是因为这个周末贝比提到让·保尔·盖蒂希望被葬在他的图书馆，可只有等到立法机构通过法律后他才能葬在那里。”

我跟他说好像里根夫妇前几年已经安排好以后将安葬在

他的图书馆里。

“好，”他说道，“我们必须确保不会在最后时刻搞得一团糟。我记得戴高乐说他死后不需要纪念碑。我也不需要。图书馆就是个纪念碑。我只要一块朴素的石头。如果在安葬的事情上纠缠不清的话，我们就葬在其他地方吧。

“最难受的事情就是：我们知道结局会怎样，可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发生。太可怕了。”

6月4日，尼克松接到一个坏消息：他的好朋友约翰·康纳利已经病重，即将去世。他先给康纳利的家人打电话，然后把我叫到跟前。

“他病得很厉害，我给他家里打了个电话。”他说，“是肌风湿病，或诸如此类的。他快去世了。他得了肺炎，看来快不行了。”他摇了摇头，“我很尊敬他。他和布什在那里关系一直合不来。原因嘛，坦率地说，布什属于上层阶级，康纳利却不是。你知不知道，他根本没有提起说肯尼迪被枪杀时他就在同一辆车上。也没跟我说起过，在他竞选的时候也没有，从来没有提到过。就那个脾气！”

他低头看了看：“你知道，这是件很伤感的事情。康纳利生命垂危，他的年纪更小，我想才75岁吧。当我想到了自己，我年纪大，皱纹满面，我就想：‘我的天！我得眼睁睁地看着大家这个样子吗？’我那一代人还活着的已经为数不多了，我是其中的一个。我记得人家问赫伯特·胡佛怎么对付批评他的人，他说他打算比他们活得时间长。啊，我比许多批评我的人活得时间长，我敢打赌他们都渴望我早点儿蹬腿。所以我还不打算死！”他放声大笑。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笑了。

尼克松夫人的健康状况继续恶化。但有些时候她觉得好

-些了，前总统就陪她在房外坐着，希望暮春的美景能给她带来些安慰。他陪她说话，念书给她听，陪她一起看电视，照顾她。他尽量让她感到舒服，也为最终失去她作心理准备。他静静地陪在她身边，井井有条地做事情，既害怕又渴望他们的痛苦能够早些结束，同时又必须把自己的这些情感隐藏起来。但在我们的谈话中，他表露出了伤感的情绪，虽然尼克松夫人比他更需要听到安慰的话，但他听了就会觉得心烦不安。

"你知道，"6 月 15 日，他说，"尼克松夫人昨天去医院。她走向车子，可她太虚弱了。得了这些病，身体当然会越来越虚弱。他们为她准备了一辆轮椅……"他顿了顿，"今天早上，我让海迪为她切了些番木瓜，那是她最喜欢的水果，我们只能让她尽量多吃点儿东西。她一天比一天没力气，她需要增加些力量。她每天下来吃晚饭，回房时都要费很大的劲儿。可你又 -点儿办法都没有。"

他的一生都在不断展示自己的力量和控制能力。对于这样的人来说，这种无助的感觉实在令他难以忍受。世界上所有的权力都无法拯救他的妻子的生命，也无法拯救他的挚友约翰·康纳利的生命。

"先生?"那天晚上我打电话到他家里问他，"我刚听说康纳利去世了。我向您表达我的问候。

"噢，"他答道。他沉默了良久后说："他去世了？我还不知道呢。啊，我今天早上跟他的妻子谈过话，他那时情况很不好。我当然会去参加葬礼的。"

显然，他的情绪非常低落。死神围绕着他，不愉快的现实越逼越近，死亡威胁着他，扰乱了他井然有序的生活。

6月 17 日，他飞往奥斯汀参加康纳利的葬礼。第二天，

我到办公室见到他，他命我跟他一起到纽约市与医生见面。路上，我们谈论了葬礼和他对尼克松夫人的担忧。

“我很抱歉把你强行拉到这类事情中。”坐在豪华轿车进城的路上，他说，“可我得去医生那儿，我还要跟你谈谈书的事情，谈谈昨天的事情。我想所有这些让我太紧张了。我的后背和脖子酸得不行，我得去治一治。

“康纳利的葬礼办得很不错。他的亲人哭得很伤心。我跟他们说他的孩子是对他最好的纪念。我经常也是这么说尼克松夫人的，他们两个人都是如此。我跟他们说他在各方面都很伟大：才智出众，心地善良。我告诉他们，他从来没提到说肯尼迪被枪杀时他也在车上，这表明他很有风度，很坚强。我来回八个小时，就是为了告诉他们这句话，这对他们很重要。我很高兴我去了。”

“参议员菲尔·格兰姆为什么没有去？”我问。

他砰的把公文包关上：“啊，你是对的。那是不可原谅的。他当然应该去；他妈的，那是他自己的州。我们不会忘记的；下次再也不为他做事情了。对了，安·理查兹跟我很谈得来，她很不错；我在想我们身边为什么没有她那样的人。伯尔德·约翰逊夫人跟11个特工人员在那里。唉，我们再也不搞那种东西了，这样我们每年就替纳税人省几百万美元。我们根本比不上她。现在就付出代价了！”

他顿了顿：“布什也没去，我能理解。他们是死对头。可坦率地说，福特夫妇和里根夫妇应该去。啊，我们记着我们的老朋友呢。”

我问他跟康纳利的关系怎样，他笑了：“他很有原则。只有他倡议加紧对越南的轰炸。他说：‘炸吧，别管什么高级会

谈。'他是对的。他说内阁没有支持它，早该被解散了。他坚强，精明，人缘很好。他加入了共和党，这耗尽了他的政治生命，他是个非常不错的共和党人，所以我不能相信我们那帮杂种怎么不去。"他气呼呼地说。

纽约市渐渐出现在眼前，他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到了。罪恶之城！每次我哪里疼了痛了，我都痛恨来这里，痛恨得要死，可我的医生都住在这里，他妈的。这段路程很难过，特别是开车的人不是我的时候感觉更糟。

"你知道，昨天我从葬礼上回来，在机场时，一个老黑人认出我了，向我和尼克松夫人问候；他还记得啊。他跟我说他参加过'杜鲁门先生的战争'——朝鲜战争。他说他在越战时期支持我。我为他和他的孙子们签了名。真不错。回到家后，我都告诉尼克松夫人了，让她开开心。她一直在挣扎，可她好像都理解，向我淡淡地微笑。"他微笑着说。

尼克松正在为尼克松夫人的健康状况而伤心不已的时候，康纳利又去世了，这对他影响很大。他的去世使尼克松震惊，但这个悲伤的事件转移了他的注意力，因为他正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家里一个生命在慢慢地结束。他跟康纳利的亲人提到他的精神遗产，其实这也正是他准备跟自己的亲人说的。他那些安慰康纳利的亲人的话，其实也正是他准备安慰自己的亲人的话。他对没有参加康纳利的葬礼的人感到不满，其实表达了他潜在的恐惧，他担心尼克松夫人的葬礼，甚至他自己的葬礼，也可能同样遭到冷遇。康纳利的去世不只是使他失去一个挚友，而且让他对几天后可能碰到的障碍有心理准备。

6月21日，我走进尼克松的办公室，发现他正俯在桌子

上,一只手按在背后。

"您怎么了?"我问。

"噢,没事,没事,我很好。"他努力坐起身来,"只是后背有些毛病。一定是太紧张了。疼得要命。可这不是眼前最重要的问题。"他慢慢地移到椅子上坐下,痛得脸通红,"尼克松夫人的情况很糟糕,看来不行了。"

他挥了挥手:"我没事,啊,就是姑娘们受不了。"他竭力分散他对疼痛的注意力,"朱莉和特丽西亚一生经历了不少事情,可这一次打击太大。我们有一些小小的争论:尼克松夫人不愿意举行葬礼,可我说她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国家,属于世界。"

他转过脸,接着说:"今天是我们结婚53周年。她还很清醒,她还记得。真是太……"他说不下去了。

"我还是不能相信康纳利的葬礼会是那个样子。我对整个共和党厌烦透了。他们那群可悲的家伙。谁也不肯拼命,谁都没有一点儿忠心。那个葬礼简直让人丢脸。

"啊,我不想整天愁眉苦脸的。等我们过了这一关,我马上动手写这本《超越和平》。我们总要把这事情做完。"

"我们也许可以把期限向后拖一拖。"我说。

"不行,"他反驳说,"就算一天24小时工作我也要把它完成了。这是我义不容辞的工作。而且我总得做点儿其他事情。"

在我们谈话一个小时后,我从对讲机里听到他的声音:"莫尼卡吗?请开车送我回家。"

我有些踌躇。从尼克松的办公室到他的府邸三英里,开车带着他走过这段路程是个很折磨人的经历。这种情况很少

出现，往往是他的车子送去维修或去接他的女儿或孙子时，才由我送他回家。但每回都让人害怕，担心前总统坐车时可能发生一些意外的交通事故。我之所以会同意送他回家，主要是因为我别无选择。

"啊，我想，我的车到城里去接特丽西亚了。看来尼克松夫人捱不过今晚，她来照料她。朱莉已经在家里了。"他说。我们来到我的车前，我走到人行道这边，打开车门，把座位向后作了调整，让他可以舒舒服服地把双腿放进去。见他坐定，把公文包放在腿上，我关上车门。我在驾驶座上坐好后，请他系上安全带。

他茫然地看着我说："我在我的车上很少系安全带。这辆车的安全带是怎么系的？"

我又下了车，打开他边上的车门，把安全带绕在他身上，然后请他拿住一头，我回到驾驶座，为他系好安全带。

"啊！这么复杂！"他说。我拿出钥匙启动车子时，他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臂，脸上露出恐惧的表情，"我不能回家。"

"什么？"我问道。

"我不能回家。"他重复道，"现在还不能回去。"

我又看了看他。这位美国前总统坐在我的小车里，告诉我说他还没准备好，还不能回家看望他生命垂危的妻子和伤心的孩子。"好吧，"我慢慢地说，"您想做什么呢？"

"我只需要几分钟。"他说，"你能不能开车带我转一转？"

"行啊。"我说，"想去什么地方吗？"

"开到萨德尔河的老房子那里转一转。"

我启动车子，小心翼翼地穿过他以前住过的地方。开到他们的老房子前，他让我停下来。他们曾在这里度过了幸福

的时光,那时尼克松夫人身体健康,死神不像现在这样咄咄逼人。

"我过去经常在这里散步,"他说,"绕过这些房子。你看那座房子,我们有一段时间还想买它呢。尼克松夫人走不了那么远,她就没跟我一起来散步。我经常带上狗,拿上手电筒,在这些街道上来回散步。我可以一直走到我们这里,可这里不够僻静。"

他沉默了好一阵:"等这一切结束后,我要把全部精力放到这本书上。我要在书里毫不含糊地阐明赚钱没有什么不对的。自由派让辛苦赚钱的人觉得内疚,我要狠狠地抨击他们。他们谈到人道主义项目,可钱从哪儿来?我还记得1953年去缅甸时的情景。他们的人民都很不错,总理是个社会主义者,他们计划修路、办学校,我问他钱从哪里来。他说:'政府会出钱的。'可他知道私人企业才是关键。

"有人认为当个家庭主妇不体面,我要狠狠地抨击这个观点。我的母亲比谁都辛苦,她是个出色的女人。尼克松夫人承担了那么多责任,可她把姑娘们带得那么好,我没有时间,她就一个人把家照顾得好好的。"

他停止了纷乱的思绪,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好了,我准备好了。你现在可以送我回家了。"

我在他的府邸前停下车,为他松开安全带。他飞快地看了看他的家,又回头看了看我,说:"行了。"我为他打开车门,伸出手扶着他。他说:"我讨厌像这样依靠别人,只是后背很不舒服。好了,我没事了。"他尽量挺起后背,慢慢地走进他的家,轻轻地关上门。

前总统在车上的那些时刻充满了柔情,流露出了他的内

心感受，十分令人感伤。最让尼克松自豪的，是他坚强不屈，不可战胜，具有强大的控制力，能够毫无畏惧地做好最棘手、最险恶的工作，但他坐在我的车子里的时候，悲观绝望，无法面对妻子临终的最后时刻。他束手无策、失落、脆弱、恐惧、充满悲伤，而在他的一生中，他总能成功地战胜这些情感。他坐在我的车子里的时候，不再是坚不可摧的前总统，不再是那个狂傲地在空中挥动着胜利的手势的人，也不再是具有钢铁意志、能够东山再起的干将。他现在只是个普普通通的丈夫，即将失去他的终身伴侣。

6月22日早晨6点15分，我的电话铃响了。“莫尼卡吗？啊，半个小时前她走了。”

“总统先生，我很难过。”我说。

“好了，谢谢你。”他说，“我希望你尽快过来，报界很快就会涌来，我希望你给一些大人物打电话，你要赶在他们听到新闻前亲自通知他们。”

我问他是不是没事。

“我会熬过去的。”他的声音伤感但很镇静。在他躲在书房的时候，消息传遍了全世界。整整一天，我通过电话跟他联系。他似乎很安详，渴望知道葬礼如何安排、其他人接到消息后是什么反应。他周围的世界坍塌了，可他出奇地平静，他决心抑制住情感的崩溃。

第二天早上，尼克松来到办公室后，立即召见了我。他情绪激动，脾气暴躁，关于《超越和平》这本书提出了一系列的想法，关于如何与报界打交道的问题发出了一连串的指示，针对克林顿夫妇辩论政府职能的方式发了一通脾气。“你对托克维尔感兴趣，我想你可能愿意看看对亨利·斯梯尔·康姆梅杰

的新书的评论。我知道他原来是学校里的宠儿，但不知道现在他还有没有实力。这个老混蛋——一本书才 130 页，居然卖到 24 美元！老天啊！他会说些什么呢？”他戴上眼镜，“‘尼克松和约翰逊总统使战争升级。’纯粹是放屁！”在激烈尖刻的指责中，他又拿起电话，给他的女儿朱莉打了个电话。

“喂？朱莉在吗？”他问，“我是她父亲，尼克松总统。”

他问了问葬礼的安排事宜，然后转头对我说：“我真不相信布什夫妇居然不来。说什么布什夫人的兄弟刚死。但是除了这种大事，星期六一般是不安排葬礼的。他们是可以来的。还有克林顿，那个鸟人！他们问他有关尼克松夫人的事，他居然说他无话可说。我真不敢相信！昨天本来是个绝妙的时机，他可以转达希拉里的哀悼，可他什么都没说。他们最好派个内阁那一级别的人来。为什么不派戈尔来？应该是个有点儿级别的人。”

我问他有什么感受。

“我没事。”他答道，“我会一个星期不去散步；我要避免见到人。特丽西亚和克里斯托弗今天过来。”他凝视着我说，“我昨晚一夜没睡，是不是脸色很难看？我知道自己的气色很不好。我一直在准备悼词。悼词应该……”他停了停，接着说：“我看到《纽约时报》发了份很不错的悼文。头版的相片很棒。”他从椅子边的地上拾起《纽约时报》。照片是他担任副总统时照的，上面是尼克松夫人和她的两个年幼的女儿在新泽西的曼特洛京沙滩上散步的情景，非常动人。有趣的是，《时代周刊》所选的相片上没有她的丈夫，与她被迫生活其中的政界也没有任何关联。如果让她自己选的话，她也会选择这张作遗照，它反映了她最珍视的角色：母亲。

"里面的相片非常不错。"他继续说,"他们应该把忌辰也放在头版上。每个自由派的家伙的忌辰都是放在头版的。这表明我们有多大的阻力。不过,总的来说,他们干得还不错。"

第二天一早,他请我到他办公室去。他的声音严肃但很镇定:"我希望你列个名单,看看有谁来表示慰问了,他们说了些什么。做完后,告诉我一声。你看见萨菲尔写的文章了吗?"

"写得非常出色。"我说。

他指着我说:"报界的杰作。这是我们一直谈论的。我想,总的来说,报导得都不错。《洛杉机时报》的一篇文章让朱莉很不安;以后我不会为他们写文章了。不过我觉得《纽约时报》的文章挺好。"

我问他最近能不能入睡。

他回答道:"这么久以来昨晚第一次睡了点儿觉。但我5点就起来了。对了,我听说总统的顾问戴维·格尔根打电话,他们要派希拉里来,可又有时间冲突什么的。他们最好派个内阁成员来,不然他们就会被抛到电视摄像机拍不到的角落里,不会引起公众的注意。"

他站起身,抓住后背,向前趔趄了一下。我伸手扶住了他。

"是我的后背,也许是没睡好觉的缘故。"他虚弱地笑了笑,"没事了。明天在加利福尼亚见。"

6月25日,我在福勒顿的宾馆等待尼克松的到来。傍晚时分,他终于打电话来找我。我发现他身穿睡衣、披着罩袍、脚穿拖鞋,俯身站在窗帘前。他慢慢地转向我。

"啊,我的后背完全顶不住了。"他说,"我的骨科医生提出

要来这里给我按摩,但没那个必要。"

"可您不是痛得很吗?"我走过去扶他坐下。

"我会挺过去的,"他说,小心翼翼地在椅子上坐下来,"你知道,从4月底我们发现她病得很厉害以来,这段时间对于我们大家都很难熬。一直到最后她都在说:'我的病会好的。'可我们知道她好不了了。噢,至少到最后,一切疼痛都结束了,也许是吗啡的作用……"他的声音慢慢消失了。他环顾四周。他想说话,可谈话是那么地费劲;他想保持沉默,可无法忍受沉默;他想独处,可又需要别人的陪伴。身体上和情感上的痛苦折磨着他,他既想与人分担痛苦,又想把自己孤立起来。

"我想知道有多少来宾到图书馆凭吊。"他继续说道,"我想已经有几千人了,还不错。你觉得有没有这么多人?我猜大概有吧。"他顿了顿,"我的气色很差吧?我故意让自己疲劳一些,今晚才好睡觉。没有睡眠的话,明天就挺不过去了。

"要知道,比利·格雷厄姆很出色。他很会安慰人。可还是很难,第一次看到灵柩……"他停了下来,看着他的双手。

"政府很不错,为我们提供飞机,还是空军一号,我去中国和苏联时乘坐的就是它。"他又停了下来,"你明天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黑色。"

"当然,"他摇了摇头说,"当然。明天葬礼完了以后,我要会见大家。"

我问他能不能应付得过来。

"能。鲍伯·阿布拉纳尔帕和贝比·里波佐还有其他人特地从大老远飞过来,我不能不见他们一面。对了,朱莉建议为我的后背准备一个电热垫,你也许得问问她,也许有点儿用。

等这事儿办完后，我可能带朱莉和特丽西亚去度假，转移她们的注意力。好了，你现在可以走了。"

我离开前问他是不是还需要些什么，他只是摇了摇头，向我挥了挥手。前总统疲惫不堪，精神上紧张忧虑，他正准备向妻子作最后一次告别。她的勇气、奉献和活力曾经与他的是那么地般配。他们像攀缘在棚架上的两股藤萝，一起生长，共同对抗狂风暴雨。生平第一次，他必须发表演说，却没有她焦急地等待着为他喝彩。他现在必须独自一人站在那里，为纪念她而讲话。

此后，我一直到他来到图书馆参加葬礼仪式时才见到他。一小群人静静地伫立着，看着尼克松夫人的灵柩抬进来，她的亲人随后鱼贯而入。霍尔德曼就坐在我前面，他突然低声说："总统受不了了。"我看了看尼克松。他一见到灵柩和宾客，早已泣不成声。他弓着身子，浑身颤抖，泪水从他疲惫的双眼里不断涌出。他在痛苦与悲伤中崩溃，那情景实在令人心痛。尼克松后来看到录像时，自己也感到震惊。

正式的仪式结束后，尼克松退到一个安静的房间，在那里接待了里根夫妇、福特夫妇和致悼词的皮特·威尔逊州长、多尔参议员、詹姆士·休斯将军以及他们家的朋友辛西娅·米利甘，接着他又陪同他们来到大厅，和聚集在那里的人一起举行了一个特别的招待会。他表现得非常自然大方，用安详、平静的口气对大家说：

"这个房间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特别，因为你们跟帕特都很熟悉。"她与他"相爱并共同生活的半个世纪"，为他的生命和她所接触到的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带来了"阳光"。他对他们一起生活过的日子充满了温馨的回忆，那是一段亲密的个人历

史，同时，他们共同经历并创造了一段政治生活的历史，两者形成了完美的结合。

他的讲话展示了他那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帕特·尼克松慷慨、热情、机智、勇敢，全世界有大批的人崇拜着她，景仰着她。半个世纪以前，也正是她的那些品格吸引了她的丈夫。在尼克松的政治生涯中，他不断地进行着意识形态方面的战争，而他的妻子更关注如何为不幸的人们服务。她以一股无声的力量，经历了丈夫事业上的胜利与成功，面对了他的打击和耻辱，保护了女儿们，使她们没有受到残酷的政治势力的侵扰。他的成就与失败就是她自己的成就与失败，他的生活就是她的生活。她无私奉献的惟一回报，就是拥有一个温馨、忠诚的家庭，并品尝其中的喜悦。自然而然地，在她的生命静静地结束时，身边便围着她最亲爱的亲人。

当晚，尼克松和他的家人回到新泽西。第二天一早，他给我打了个电话。当时我仍在加利福尼亚，正准备乘飞机回到东海岸。"嗨！我很高兴还能找到你。"几个星期以来，他的声音第一次显得比较乐观，"你都看到了，昨天悲伤的情绪一下子涌上来，我一下子就控制不了了。我得承认，我去接待里根夫妇和福特夫妇时，在南希的肩膀上哭了起来，罗纳德伸出胳膊搂住我的肩膀。可怜的朱莉和特丽西亚努力不让大家注意到我。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了；我只是心如刀绞。可这样很好，把悲伤都发泄出来了，后面才能下楼来说那些话。你觉得我说得怎样？"

我告诉他那些话是对他已故的妻子的最感人的悼念。

"这就是我想要做的。"他答道，"那些话是不是表达太多的个人情感了？你感觉怎样？"

“挺好的，充满感情，很温暖，又不会显得不自然，让大家都很感动。”

“那就好。”他说。他顿了顿，接着说：“啊，以后还会有这样的日子呢。很难熬。有些悼文写得很糟糕，我要你搜集所有好的文字，我过后要看一看。读一读《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吧，我敢保证它们都很恶劣。我说过，我要你写些抨击它们的文章，然后送到休格·西迪那儿去。我们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的。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报导都还是积极的。你认为呢？”

接着，他提到政府没有派一个内阁级别的人来参加葬礼，于是发了一通脾气：“威农·乔丹？克林顿夫妇派了威农·乔丹。他是个不错的人，可是得了吧。希拉里应该来，真让人不能原谅。克林顿为了保住小命来找我，可他居然没法派个内阁成员参加尼克松夫人的葬礼？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他的选票是不是还在马桶里？”

然而，他对克林顿的失望之情很快消失了，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尼克松夫人的临终时刻：“你知道，在她昏迷之前，她闭着眼睛坐在椅子上，姑娘们说她一听到我的声音眼皮就跳了跳。我就一直跟她说话，告诉她：‘你的亲人都爱你，你的国家也爱你，全世界的人们都爱你。’她微笑了。然后我吻了吻她的额头，她就走了。”

他停了很长时间，又问：“你觉得怎么样？”

我为他这些充满感情的表白惊呆了，一时没能回答。他催问：“啊，这是不错的告别，你认为呢？”

我跟他说确实很不错，然后告诉他等我当天回新泽西后再给他打电话。

当晚 11 点，我遵守诺言给他打了电话。

"我正在楼下关灯,我等会儿再给你打吧。"他说道。五分钟后,他打来电话时,声音充满了感伤:"我知道你下飞机后,还得大老远地赶到办公室取车子。你应该顺便过来一下的,我就一个人。"

他顿了顿说:"我在公开场合一般都能控制自己的情感,这回我是情不自禁。噢,没事,这没什么不对的。53年是个不短的时间……"他清了清嗓子,"啊,你的精神状态怎样?累吗?你一定累了,不过你年轻。好了,明天见吧。来这里吧,来我家。我这个状态没法去办公室。噢,莫尼卡?"

"什么事?"

"谢谢你听我说话。"

尼克松的痛苦开始转为孤独。尼克松夫人的去世从情感上对他刺激很大,但阵痛最终会渐渐消失,而她的离去却产生了永久的虚空。他想念她。

第二天早上,6月28日,他把我让进家门时,对我说:"这里一个人都没有。你听听,多安静啊!"上楼梯时,走到一半,他停了下来,转身对我说:"听听,多寂静!我的天啊!"他继续往上走着,"我想我们在这本书里应该侧重哲学的思考。和平不是很美妙吗?不一定。和平不是终结。坟墓里有和平,和平阻止了毁灭,但它不能重新建设。记得抗议战争的人说什么吗?'立即和平!'然后呢?没有荣誉的和平更糟糕。"他一副失落的样子,"我们不都是追寻这个目标吗?我的意思是,尼克松夫人现在安宁了,可在这个世界寻找和平是没有意义的。"

他坐下来,把领带整理了一下,接着说道:"要知道,我今天早上到纽约去了,去看医生。在华尔街,十几个人拦住我,

说他们为尼克松夫人的事感到难过。他们不错，可我不想跟任何人说话。我只想确保后面关于她的报导不会有问题。”

并非所有的报导都是积极的。有些文章称她是向比较蒙昧的时代的倒退，那时的女性为了让她们的丈夫实现抱负，牺牲了自己的事业心。然而，那些这样说的人没有看到真正的帕特·尼克松。她从来都不喜欢政界，她照管家庭，承担家庭责任，为丈夫的胜利而欢喜，在他失败的时候安慰他，这才是她的快乐与满足的源泉。在社会生活之外，她按照自己的理想塑造了她的个人生活。

第二天一早，我发现尼克松已经到办公室，正气得发抖。我走向他的时候，见他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扔在地上了，上面有对尼克松夫人的评价。“我真不敢相信会有这种东西。太过分了。你读读。”他命令道。

文章宣称尼克松夫人不曾拥有“崇拜她的公众”，没有自己的事业成就，说她不过是被当作政治拐杖；文章嘲笑她一心只会支持丈夫，说她保守、可悲和愚蠢。

“你看到没有？”他继续说，“除了朱莉，谁都比不上她。我们一些人就是办事不得力，我们的敌人可不是这样。整个是他妈的开玩笑。恶心的杂志！”他从我手里抢过杂志，冲着我摆了摆说：“这个东西真让人心烦，真让人感到震惊。一定是有人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主编莫尔顿·扎克尔曼和戴维格尔根这样干的。为什么？简直太恶毒了。我离开政治舞台时，我们料到他们会冲着我来，因为那是政治。可对她也不依不饶的？我们不能接受。

“啊，《时代周刊》上有一篇很棒的文章。他们很公正、恰当，我真不敢相信。我要你给朱莉和特丽西亚打电话，让她们

知道《时代周刊》干得很出色，免得她们受到《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那篇文章的打击太大。《新闻周刊》怎么样？"

我只好告诉他，文章抱着相当否定的态度，他马上惊恐起来："这些人痛恨我，可发泄在她头上，啊——"他气得满脸通红，接着变成绯红色。我建议他放松下来。

"我的血压没问题，"他说，"可医生要我去做个细胞核应力测试。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看了看我："医生坚持让我做。等我到了那儿，他会搞出更多名堂来的。我的后背好多了，但我还要想办法去看看骨科医生。"他扮了个鬼脸，"明天一整天泡在医生那里。衰老真是他妈的可悲。"

第二天，6月30日，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曼哈顿的医生那里。回来后，他请我到他的府邸见面。他向空中抛起钢笔，可没等他接住，钢笔就落到地上了。"我的压力很大，可医生说我还会活下去的！"他笑了，拾起钢笔，"我的心脏没有毛病，他们说我的身体非常棒。这事就到此为止了。"他可以推迟那个不可避免的结局，虽然只是暂时的，他似乎也松了一口气。

"我决定到巴哈马群岛的珊瑚岛上沃尔克的家里跟鲍伯和贝比呆几天，也许更长时间。那里没人认识我。离开一阵会是很不错的。

"我看到海伦·托马斯写来的便条，很不错。她倒不是对我有好感，她热爱尼克松夫人。我还是不能相信《新闻周刊》会这么恶劣。如果他们打电话来，就说'打错了'，马上挂掉。那篇文章表明了谁是他们的主使。我只能想象着在我退出舞台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报导，但至少我是看不到了。"

接着，他继尼克松夫人去世后，第一次开始评论政治。他

说："对伊拉克的轰炸没什么了不起的。如果经济没有改善，克林顿就完了。"他不仅仅是对总统在伊拉克的军事还击活动进行评论，更重要的是，这表明尼克松又恢复了他的战斗精神。他渐渐地走出狭窄、悲伤的情感世界，又回到了外部世界。

7月2日，他继续恢复精神。他从府邸给在办公室的我打来电话，请我带去一些来自"普通的美国人"的唁函，他和朱莉、特丽西亚准备下午一起读一读。下午两点，我搬了一盒信走上他门前的小道。门开了，尼克松微笑着站在我面前。

"我的天啊！这么大一盒！那就马上放下来。"他说，"还有吗？"

"大概还有十几盒子。"我答道。

"太好了！"他说，"你看，外面的人知道尼克松夫人是什么样的。他们可不相信《新闻周刊》那一类文章所说的恶毒的鬼话。"我转身正准备离开，他就叫我晚上看完新闻后给他打电话。

"我希望现在打电话还不算太迟。"我10点钟给他打电话时说。

"才不会呢。"他说，"我还没睡呢。噢，等一等。"他放下话筒离开，几分钟后他又回来，"抱歉，克里斯托弗领着狗在外面，我得给他们开门。晚上我和朱莉拿着手电筒去散步，又跟孩子们做了会儿游戏。他们躲起来，我们去找他们。他们喜欢这个游戏。我得说这对我也有好处。所有的压力太累人了。

"我看新闻太无聊了。倒是失业率又上升了，克林顿竭力说没关系。可上个月下降时就有关系了！还有一件有趣的事

情，报导说克林顿把旅游局的人都开除了。我觉得太有趣了！这件事情上到处都有希拉里染指的痕迹——还有那个哈里·托马森！他们谈到贝比，他当时比哈里这家伙跟总统更密切。我们是在府邸里招待过他，可他并不像那个家伙那样任过职，也没有要求过任何特别的恩惠。如果这事落到共和党总统头上，他们早就弹劾我们了！我们都在说些什么呀？他们说它涉及到不恰当地使用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我们当时可没有这样用过他们！可能提到过，但从来没有真正照办过。哦，天啊。”

尼克松回来了。绝望已经让步于一种新的使命感。政治又钻进他的生活中，促使他工作，让他考虑个人伤痛以外的事情。新的一天不断到来，克林顿的白宫不断出现新的丑闻，尼克松越来越坚定地进行政治战斗。

他几乎全力以赴地写《超越和平》，阐明他对国际和平与个人安宁的哲学。他又一次拿起钢笔，论述他最为关注的问题。他把自己的精力越来越多地从情感的内省中解脱出来，投入到政治与哲学辩论当中去。

“要知道，这些东西很深沉。”8 月 26 日，我们在他的府邸见面时，他说道，“我独自一个呆在这栋房子里——啊，有些日子里会好受一些。特丽西亚给我拿来了一本书，是一个印度宗教教师写的，我想，他还是个老年方面的医生。他的意思是说你总需要有某种东西让你不断进取。我每天都感觉好一些，沉浸在我们这本书里很有好处。可我也要面对现实，我的生命已经过去了——都在身后了。”

我正打算反对，他举起右手：“过来，我要让你看个东西。”我们下了楼梯，来到尼克松夫人的房间。她的房间仍然像她

生前那样布置着。他用手比划了一下说："现在这是客房了。"他慢慢地在房间里走着，不时地从梳妆台和书桌上拿起一些小物品，再把它们放回去，"朱莉以后就住在这里。布置得很好吧？当然了，壁炉在这里，我打算等天冷了就用它。我只是觉得你可能会想看看它。"他说。在我们准备回到书房前，他又在房前停了一会儿。

在尼克松夫人房间那令人尴尬的几分钟里，他一次都没有提到她的名字。它不再是她的房间了，而是"客房"。现在他也是那里的客人了。这个简短的巡视并没有引起感情的波澜，他暂时回到过去，但没有长时间地流连，尚不足以引起悲痛。似乎只要他邀请外人分享对这个房间的回忆，他就可以使自己不致于太动感情。

"要知道，我的母亲到老年时仍然很有风度，直到最后时刻都那么精力充沛、充满活力。是中风夺去了她的生命。我的好朋友前国会议员乔·瓦格纳尔好几次中风，当然他还在硬撑着。我意识到自己有多么幸运，尤其在智力方面，这主要是归功于勤奋的脑力劳动：读书、写作、记忆——反复磨练。"他咬着牙说，"但有一部分也只是靠运气和遗传。工作转移你的视线，让你不去注意别人身上发生了什么，你身上可能会发生什么。很多老年人只是放弃了。他们让自己的头脑松懈下来，这太糟了。你必须做点儿什么事。"

尼克松有时也会感到身体疲惫，大脑疲劳，精神痛苦，但他坚持工作。他害怕只要大脑稍微懈怠，就会永远失去它那可怕的威力；只要他停止为新时代的辩论作出贡献，他就会很快被弃置一旁，让人归纳到陈旧的史书里去。他促使自己不仅和美国公众保持紧密的联系，也和他本人保持紧密的联系。

1993年11月,他完成了《超越和平》一书。但对于书是不是质量高、是否有重大意义,他的内心充满了疑虑,备受困扰。他认为尼克松夫人去世的危机削弱了他的思想,尤其削弱了他对书中许多重要问题的思考,这些问题涉及到和平的意义和国家的目标。他相信,如果这真是他的最后一本书,它应该也是他最深邃的书,即使这意味着推迟出版。也许是为了寻找安慰,尼克松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他所熟悉的氛围:挑战。

然而,11月12日他接到了一个意外的消息,H·R·霍尔德曼去世了。他对自己的那股冲劲的满足感马上烟消云散了。下午,我书桌上的电话铃响了。

"莫尼卡吗?"他问,"你听说霍尔德曼的事了吗?"

我表达了自己的惋惜之情,尼克松接着说:"他很忠心,是个很不错的汉子。想想看,现在都充斥着些什么货色!他们给他提鞋子都不配!好了,让我的脑子转移到其他事情上去,请把书稿的第三部分带过来,我今天晚上要看。"

6点钟,我带着书稿来到他的府邸,发现整栋房子只有餐厅亮着灯,尼克松正在吃意大利面条。他看见我进门,来到屋内,显得十分吃惊。

"哦,对不起,"我说,"我不是想这么唐突。"

"不会,不会。我只是没料到你现在会来。"他说,"请进来。我给你盛点儿意大利面条吧?海迪准备了一大堆。"

"谢谢您,不用了。我只是想把书稿拿给您。我知道您迫切要读到它。"

他站起身来,从我手里接过书稿:"这会让我的脑子不去想——啊——不愉快的事情。"

“听到霍尔德曼的事我很难过。”我说，“我知道他的服务对您来说很重要。”

尼克松向后退了一步，低头看着书稿，柔和但很坚决地说：“他什么都没干，可他们还是放不过他。他忠诚、坚强，正是总统所需要的那种人。”他抬起头来，“到目前为止，对他的报导都还没问题——要知道，是说他坐过监狱，等等。但格尔根说他独裁。我对待他也是独裁啊！朱莉说有线新闻电视网做了个不错的节目，节目上黑格评价霍尔德曼评得很好。对了，我知道他们只举行私人家庭葬礼仪式，谢天谢地，我不用再去参加一个葬礼了……”

他看上去烦躁不安，心情沉重，好像由于霍尔德曼的亡故，他对死亡的恐惧不请自来，慢慢地重新滋生。它夺取了他一部分传奇般的内在力量，一些对他不利的、脆弱的想法威胁着他，让他很容易就想到了等待着他的命运。1993 年三个人的亡故——康纳利、尼克松夫人、霍尔德曼——构成了黑暗的现实缠绕着他，他不断努力地回避它。

12 月 29 日，他又参加了另外一个葬礼：积极的思想先驱诺尔曼·文森特·皮尔的葬礼。第二天，《纽约时报》登出了尼克松和特丽西亚参加葬礼的照片，早上我们谈话时，他拿给我看。

“你知道这张照片是怎么来的吗？”他问，“很有趣。大家都坐着，可皮尔夫人的悼词太感人了，我就站起来鼓掌，特丽西亚也站起来鼓掌，跟着大家都站起来鼓掌了。这显得很隆重。要知道，她 90 岁了。葬礼办得不错。他所有的孩子都致了悼词。”他停了停，“啊，本周就这个葬礼了，不要再有其他葬礼了！我希望再也不会有人去世，我再也不参加了。”

八天后，也就是 1994 年 1 月 6 日，克林顿的母亲弗吉尼亚·凯利和前众议院议长、绰号叫"小费"的奥尼尔谢世的消息传到尼克松那里，他只能感伤地说："啊，一个一个都走了。克林顿夫人——我是说，凯利夫人——他们说她得了癌症，可她气色很好呀；她是真正地热爱生活。我不认识她，但我还是给克林顿发了个唁函。还有奥尼尔！我在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日子里认识他的。他是个精明强悍的政治家——不折不扣。"

我说即使民主党也难逃一死，尼克松笑了："很难相信吧，啊？可能的话，他们在这上面也会大做文章。"

他周围的人不断地逝去，尼克松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然而，他并没有料到自己的大限会这么快就到来。

2 月 22 日，他向我家里打电话，跟我说他去看了心脏专家："我不想让你担心，可我觉得额头上的动脉或什么鬼跳个不停，医生说不严重，但不当心的话会变成中风。所以我得做一次磁共振成像检查。我不想拿这些琐碎的细节烦你……"

我问他感觉怎样，他回答道："啊，我现在没事了。我想得了这病是个好事。最近一直睡眠不多，加上其他压力——啊，我想这是难免的。我严重失眠，到了我这个年纪，赔不起。"

第二天，磁共振成像检查结果送过来了。尼克松对我说："很好，没问题。我敢说，我下个星期可以去俄国了。他给我稍微改换了其他药物，我知道因为事先去看了牙医，可能使血压升高了。不管怎样，我觉得好多了。"

他可能感觉好多了，但第二天见到他以后，我在日记中写道："他的气色很不好；疲惫、紧张，而且——非常罕见的是——情绪很阴郁。"他的思绪很不连贯，说的话也不完整，表情十分呆滞。他谈到了俄罗斯彬彬有礼的外交政策，谈到它

的意义，但他的话缺乏往常的激情，他有时只是长久地静静地凝视着窗外。我问他是不是没事，他马上答道："我会没事的。我想我只是太累了。"

几天后，他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3 月 4 日，他去了俄罗斯。其实，他在出发前已经疲惫不堪，路上便生了病，只好缩短日程安排，腾出时间休息和康复。这一举动在他来说是很少有的。他鄙视生病，痛恨它限制他的行动，厌恶依赖别人的帮助。

"我看见一张我在莫斯科的相片，相片上别人正扶着我下楼梯，我想是美联社发的。天很寒冷，我又有些眩晕，看上去很老，还要人扶着。就是这个原因。"3 月 2 日，他说："我再也不让人把我拍成那个样子了，步履蹒跚，年老体弱。不行，这种事再也不能发生了。我要么就健健康康地出去，要么就不出门。"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月，尼克松的人格似乎有了新的变化。他不再那么暴躁，也不再容易灰心丧气，他常常静静地自我反省，比较少沉湎于那些曾经吸引他注意的问题。4 月里，天气特别暖和时，他喜欢在户外跟我讨论问题。他坐在露天平台上，感受着太阳的温暖和微风的清凉。曾经激动着他的激烈情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超脱，他不再强求控制一切，也许他的生命已经接近尾声。

4 月 15 日，我最后一次看到他。他的外表与前几个星期相比有很明显的改变。他显得强健、精神、健康。我们坐在户外，他时常在阳光里伸长脖子，闭上双眼，表现出一副罕见的安详与满足。

"很美的天气，是吧？"他问道，"我常想，是不是搬到佛罗

里达那样温暖的地方去住更明智一些。那里整年都是这样的气候。啊,生命短暂,也许我活得太长了。

"我想,等我为这本书进行巡视时,他们会问许多关于俄罗斯主题的问题,这很不错。那是我们写这本书的主要原因。他们也会问一些有关水门事件的问题;一直都是如此。但我希望有些问题是关于书中更深沉的东西,诸如超越和平之外的国家使命啦,超越幸福之外的个人使命啦,等等。我不敢肯定那些评论员和采访的人会挑出这些话题。可它们很重要,我会尽量往那方面谈。如果学者或其他什么人说它太肤浅,我才不会在乎呢。它对于国家、对于人民都很关键。我们无法回答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但我们可以讨论它,希望能促使人们去思考。"他指着我说,"后面的几个星期里,这就是我们要为国家做的事情。"

尼克松再也没有机会进行这方面的辩论了。4 月 17 日,星期天晚上,他打电话给在家里的我,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谈话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都是些常见的话题,诸如他重新考虑是否拒绝到大学发表讲话;他决定出现在《今日》节目,以便宣传他的书。然而,我们的谈话反映了最终引导他的、根深蒂固的精神。

"你知道,我昨天参加了玛莉·阿布拉纳尔帕的婚礼。"他说。新娘是鲍伯·阿布拉纳尔帕的女儿。"婚礼办得不错。我跟来宾一起拍了不少相片,可真累人,不过看见大家都那么快乐真让人开心。"他顿了顿,"现在我只有在参加婚礼和葬礼时才到教堂去!如果有优秀的传教士或牧师我早就去了。可每个人对上帝的看法不一样。还有,我去教堂就跟展览似的。大家都不听布道坛传来的重要信息,都看着我。我不想从别

人的经历中——包括我自己的经历中——剥夺任何东西。”

第二天早上，中风摧毁了他，夺去了他的视力和说话的能力。在他奋斗到美国权力的极顶时，他一直依赖这两个官能：视力引导他，声音则用来劝说、谈判和让步。两天后，中风使他陷入昏迷状态，夺去了大脑的思维能力。又过了两天，死神终于降临，夺走了他的生命。

尼克松夫人去世后，他不再认为永恒是神学家和哲学家应当思考的抽象问题，而是开始把它看作自己生命中不可逃避的精神生活。他诚实地带着人类所共有的恐惧和顺从面对它。在地球上的生命旅程中，他的所作所为将由后人来评判，他自己是看不到的。但当他思考自己的生命时，他不仅以历史学家的眼光而且以他自己的眼光进行评判。这是他自己选择的生活，他相信它总体上还是好的。

在死亡中，他终于为他那永不平静的大脑找到了安宁，为那不懈地促使他创造、成功和攻克的驱动力找到了解脱。尽管他具有惊人的政治天赋——他精明、机智，怀着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感，掌握了政治策略——但必须冒着自我毁灭的风险。他之所以攀登理想的高峰，只是因为它们就在那里，可一旦登上峰顶，他又滚落下来。他接受挑战，去攀登另一座山峰。他既追求成功，又招致失败，他对两者都不满意。

他带着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目标感面对自己的历史，他相信伟大的品格是智慧、勇气、信念和忍耐，它不仅表现在危急时刻，而且表现在日常生活中。

死亡永远地结束了他的漫漫旅程，但它并没有削弱他留下来遗产：顽强不屈、桀骜不驯以及坚强的意志。说起来可能有些荒谬，但他史诗般的历史似乎表明他超越了人类生命

的弱点和脆弱,表明他总会逃脱等待我们所有人的命运。屈服,甚至是向死亡屈服,不是他的性格。因此,在 1994 年 4 月 22 日他最后的日子里,似乎很难让人接受的是:他终于被击败了。

第五部分

最后的尼克松

在他的内心深处存在着原始的求生本能，最后演变为更成熟的推动力：桀骜不驯和顽强不屈。他可以接受不完美，但不能接受它的必然结果：失败。他曾经失去平衡，滚落到深渊里，但这不过意味着他有机会重振旗鼓，冲向另一轮的挑战。他遭受了惨痛的失败，但那股驱动力一直在他内心澎湃起伏，驱使他继续向前冲……

理查德·尼克松3岁的时候，曾坐在邻居的腿上，乘坐一辆由他的母亲驾驶的四轮轻便马车。在一个拐弯的地方，马车以飞快的速度突然转弯，把孩子猛然甩到地上。就在母亲拼命停住马车的时候，她那年幼的孩子已经鼓起勇气，从地上爬起来，向马车跑去。

他后来在回想这段往事的时候，称它是他自己最早的记忆，它残酷而突然，因此在他的头脑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摔倒后，第一个反应就是不能在痛苦中退却，而是重新站起来，跑上去，向降临他头上的命运挑战。几十年后，这个景象成了生动而又深刻的比喻：在他的一生中，他正是不断地奔跑、跌倒、再奔跑。

在他的内心深处存在着原始的求生本能，最后演变为更成熟的推动力：桀骜不驯和顽强不屈。他可以接受不完美，但不能接受它的必然结果：失败。他曾经失去平衡，滚落到深渊里，但这只不过意味着他有机会重振旗鼓，冲向另一轮的挑战。他遭受了惨痛的失败，但那股驱动力一直在他内心澎湃起伏，驱使他继续向前冲，而不是向后看，驱使他在废墟上重新建设。在他的一生中，他不断地朝着某种似乎是不可企及的目标奋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从那不知疲倦的旅途中，获得了一定的满足。

在国际事务上，他寻求不同意见，以此考验他性格中求生的力量。他每作出一次痛苦的决定，都是在掷骰子：有的时候出现有利的结果，有的时候出现不利的后果。但对于尼克松来说，最令人兴奋的，莫过于骰子抛在空中以及落定前四处滚动的激动人心的时刻。赌徒陶醉于输输赢赢的轮回，一种可能性不断地诱惑着他：下一次投掷会赢来更大的彩头。尼克松迷醉于政治游戏里莫测难料的运气。每作出一个决定——竞选职位、轰击新敌人、与宿敌对话、引发辩论、掩盖犯罪——他都掷出骰子，希望得到最佳的结果。

然而，当不可避免的失利降临的时候，尼克松利用他的失利展开下一轮的进攻；他不是在失败中退缩，而是重新站起来，继续尝试。结果，他经历了辉煌的胜利与惨痛的失败，这种政治上的轮回赋予了他顽强不屈的气质，因此，不仅他的传奇故事引起争议，而且无法对他作出结论性的历史评判。有的人认为他不屈不挠的品质只是一种人为的政治工具；实际上，这就是本来的尼克松，他不断地从挫折中复兴，他不知道还有其他的选择。

尼克松认为担任领袖就像演高级戏剧,必须毫无畏惧、毫不犹豫地以宏伟壮阔的气势演出。他以史诗般的激情引导着他的政治生涯,引导他面对迅速更迭的胜利与失败: 1946 年他被选入国会;他揭露了国务院高级官员阿尔加·希斯为苏联充当间谍的面目,一跃而成为公众瞩目的政治中心人物;1952 年他被选为艾森豪威尔的搭档竞先副总统;以基金演说为自己进行周密的辩护,批驳了对他不公正的指控,挽救了他在候选人名单上的位置;在大选中以极微弱的劣势败给肯尼迪,两人选票的差距在美国历史上是最小的;1962 年在竞选加利福尼亚州长中失利;此后的六年里,在政治的波澜中奋斗拼搏;1968 年大获全胜;打开了中美关系的死结,缓和了与苏联的紧张关系,结束了越南战争;在水门事件和辞职之后,他精心安排,缓慢地恢复荣誉。

他的任何一个成就都可能使其他的政治家心满意足;他的任何 -个挫折都可能摧毁他们。但尼克松需要拼搏,需要经常面对挑战,成功的前景越暗淡就越能激发他。他需要赌博所特有的冒险。他所以能够生机勃勃,正是由于这种赌博的不确定性,由于他必须把不可能变为可能。作为局外人冷眼旁观,只见尼克松奔跑、跌倒、再奔跑,每一次爬起来都比前一次更强壮、奔跑得更快。每一次胜利或摔倒之后,他显得更加不可战胜,似乎他的生存就依赖于不断战胜更大的困难。

尼克松处于美国的政治中心将近 50 年,他的影响和重要性超越了政治范畴。无论是倡导反对共产主义还是倡议援助冷战结束后的俄罗斯,无论是支持民权运动还是停止征兵,无论是以"体面的和平"结束越战还是恢复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无论是提倡负责任的军备控制、环境保护,还是提倡社会福

利、保健改革或者教育机会，尼克松一直都在那里谈论如何使美国继续成为伟大的美国。不管是在自己任职期间作出决定，还是为他的继任传递建议，尼克松都在那里塑造美国的这后半个世纪。不管是好是坏，他界定了我们的生活。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在去世之后仍然使人着迷。他是大萧条时代的儿子，他创立自己的事业时，与美国中产阶级最狂野的抱负和恐惧发生了共鸣，而他们则以选票和忠诚回报他这一非凡的能力。尼克松称他们为伟大的"沉默的大多数"。他在捍卫他们所珍视的价值观时损害了自己的政治优势，但他们的价值观也是他自己的价值观。

尼克松的批评家在他身上看到的缺陷，在那些美国人看来却是美德：他离群索居但不乖张孤僻；他沉默矜持但不傲慢自负；他彬彬有礼但不冷漠；他情感丰富但不因循守旧。这些美德是真正的尼克松的一部分，他们理解他，因为这些美德也是他们的一部分。

尼克松就任总统时，酝酿已久的文化风暴终于爆发了。反正统文化的狂热如同一阵巨浪，冲击着他所代表的传统价值观。他用来与之对抗的工具和信念失去了作用；新的时代要界定他，而不是由他来界定。他选择再次奔跑，一头冲入风暴的中心，根本不曾考虑到凶猛的风暴可能连他一起摧毁。

即使在风暴刚刚平息的时候，对尼克松的指控仍在继续。一旦他被当作是动机不纯和玩忽职守的象征，所有的错误、所有的罪恶、所有邪恶的表现都栽在他头上。他成为国家无能的体现，这也使人们更容易将他从权力的宝座上驱逐下去，也让人们更能够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事实。

尼克松被迫退位了，但我们却没能以同样高的伦理道德

标准来要求其他人;我们不给尼克松任何解释的机会,却又为其他人的行为编造借口。为了让自己安心,我们一遍遍地告诉自己:我们在尼克松问题上做得对。历史将会裁判我们的是与非。但是,其他人犯下了同样深重的罪孽,却可以安然无恙;惟独对他却发动了无情的抨击,最后演变为一种全国性的心理活动,以说服我们相信:我们的近代史不像表面上那样遭受严重的破坏,纵然有破坏也全部是尼克松一手造成的。他为自己包扎伤口,我们却拿着从他那里剥下来的政治头皮,把它当作战利品,以此证明那些动荡不堪的年代至少产生了一个表面上公正的成果。我们把他当作一个容器,向他头上发泄我们所有的自怨自艾和被误导的骚动不安的情绪。

真正理解他的人很少,这对于他的事业没有帮助。他的性格具有双重性,他成了一个谜,即使了解他的人也有这种感觉。他似乎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一个充满思想,有知识,生活在理想主义的国度;另一个注重行动,以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和现实主义为准则。一个是人道主义者;另一个是冷漠的行动者。一个是具有紧迫感、喜欢孤独的人;另一个是外向、奔放的政治家。一个生活在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另一个格外地慷慨大度。一个严肃;另一个轻快。一个性急而脾气暴躁;另一个安详而善于冥想。一个果断;另一个忧郁不决。这些表面上不可调和的矛盾造就了这么一个人:他注定不满足于消沉的生活;在他自身内部存在着复杂的动力,驱使他去实现自己,去毁灭自己,去再生。

有些人提出,尼克松在辞职后如此活跃,惟一的原因就是他希望获得某种程度的补偿。这话只对了一半。真正的问题是:如果他成功地完成了第二次任职,他会不会同样写出八

部畅销书、多次进行出国考察、发表无数次演说、为世界领袖出谋划策。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应该看一看水门事件发生前他的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在他的性格里有一个声音，它时时刻刻地透露出雄心壮志：政治、更高的地位、一次次复兴。在经受最惨重的失败时，他生活在最黑暗的日子里，本来最容易忽略这个声音，但他依然无法窒息它。它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迫使他向四轮马车跑去、后来，又迫使他奔向最光辉的目标，迫使他逃脱失败的最终判决。

即使水门事件没有提前结束他的总统任职，他在离职后仍然会作出同样的贡献，而且带着同样的热忱和激情。耻辱并没有打垮他，却使他的雄心壮志燃烧得更加猛烈。他在1974年之后的成就可以算是他努力奋斗的结果，但前提是，他在此前的政治活动——数次竞选运动、外交上的多次突破——也都是他努力奋斗的结果。尼克松不再谋求公职，不再管理政府，不再参加创造历史的首脑会议，但他切实地保证离职后的活动和成就汇成他最后的一次运动。这一运动主要不是因为他本人希望东山再起，而是如他自己所说的，因为他必须"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那种毫不含糊的渴望。

在他办公室的墙壁上排满了放大的相片，显示了他无数次的伟大胜利，将参观者带到了往昔：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尼克松与萨达特①；尼克松在中国；尼克松对众人发表演说；尼克松与帕特坐在车队中，伸出胳膊展示着他那著名的胜利手势。他决心重新塑造世界，他成功了。他清晰地看到了自己不同寻常

① 萨达特(1918—1981)，埃及总统，和平解决埃以冲突，与以色列总理比金共获1978年诺贝尔和平奖，1979年签署了埃以和平条约。

的命运,离职后的放逐绝对不能阻止命运的脚步。他的事业包容了罪孽、天恩、赎罪的承诺以及勇气、信念和忠诚等美德。他知道高贵的品质在于能够接受自己的历史,拥抱领袖和罪人、幸存者与受伤者、善人与恶人,把他那喧嚣动荡的政治生涯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承受下来,并接受它的全部内涵。

尼克松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劣势。他的儿童时代是在辛勤劳动、贫穷和亲人的疾病中度过的,但像多数孩子一样,一个信念植入他的内心:只要不断地辛勤努力,最后可以成为总统。美国梦永远都不会遥远,即使是对加利福尼亚南部种植柑橘的农民的儿子也不例外。

正是因为他感到这个伟大而奇妙的目标可能实现,这才激发他踏上了漫漫的征途,穿越了美国辽阔的政治场景。但是,自立自足的信息埋藏在那个目标之后,使得他必须孤独地走完大部分旅途。尽管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和他的亲人朋友支持着他,尼克松相信他仍是孤独的。

尼克松喜欢离群索居,但他又情不自禁地要展示自己,特别在政治斗争相当激烈、或者他自己的力量动摇的时刻更是如此。在那些时刻,他意识到人类的体验应当共同分享:他需要别人,别人也需要他。他害怕依靠别人,生怕这会被看作是软弱的表现,但他又接受它,认为它是人在脆弱时一种无声的表示;令人吃惊的是,这反而使他更加强大。在那些时刻,他允许自己变得真实、平凡,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1994 年 4 月 27 日,在为尼克松举行的葬礼仪式上,安排了尼克松的三段话,每一段话都体现了他性格的不同的侧面。

1960 年 7 月 28 日的一段话具有惊人的预见力:"赫鲁晓夫先生说我们的孙子辈将生活在共产主义之下,让我们这么

说：他的孙子辈将生活在自由之中。"30 年以后，冷战结束，赫鲁晓夫先生的国家解体了，这证明尼克松是正确的。

1974 年 8 月 9 日的一段话隐约透露了不屈的呼声："当我们的亲人去世时，当我们在竞选中失利时，当我们经历失败时，我们以为一切都结束了。不对。这只是开始，永远只是开始。"就在他担任总统的最后一天，他谈到的不是失败，而是如何返回、与失败搏斗、寻找新的开端。

过早逝去的生命会使人们对那个生命的回忆更加深刻，但长久而充实的生命可以使人更公正地评价它。尼克松多年来建立的事业成为 20 世纪的标志，象征着美国人的风貌：原始的雄心壮志，献身于辛勤劳动、忍耐、成功与失败。正如国家一跃而到达国际权威和经济财富的极顶，尼克松从贫苦潦倒和默默无闻中纵身登上全国最高权力的宝座。我们伟大的传统和迷失的歧途、我们最光明与最黑暗的时刻、我们的善良和卑劣——一切似乎都在他的个人经历中得到体现。这是个沉重的象征，没有人可以承受得起，但他承受了这个重负，有时很高贵，有时不很光彩，但无论如何，他都带着乐观的信念，相信他像祖国一样，可以战胜任何困难。

最后一段话引自他 1969 年 1 月 20 日第一次担任总统时的就职演说，它透露出引导着他的责任感的信念："历史上最伟大的头衔就是和平使者的头衔。"他最大的抱负不是获得权力本身，而是他可以利用它成就自己的愿望：在国内外取得和平，建立更美好的国家和更美好的世界。对于一个平素被称作是讲求实际的现实主义者来说，这些都是令人吃惊的理想主义目标。但他相信领袖的目标就是激励人民、教育人民、启迪人民，他的任务就是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他自己的错

误束缚了他完成那个责任的能力，这是他最大的悲痛。因此他开始了又一次的奋斗：重新获得平衡，重新负担起重任，不过，这一次他没有正式的权力。

他永不停息地建设和重建，这一过程不仅给我们留下了黑暗的纪念碑——水门事件，而且也留下了辉煌灿烂的纪念碑：化解冷战、结束热战、打开宿敌的大门。但也许最鼓舞人心的遗产是他钢铁般的意志、力量和耐性。如果评判历史的标准是看结果以及导致这些结果的过程，那么尼克松的历史尤其复杂。1974 年的最后告别其实并不是最终的告别，因为失败之后就是复兴。在尼克松的生命中，各种结局漂移不定，不是完全的逆转，而是不断的变幻，这一切都是出自他的意志力。

邓小平说过："领袖是人，不是神。"他们多数也不是鬼怪。尼克松的历史既不是一篇完全伟大的故事，也不是一连串的罪孽。他是个充满争议的总统，一个举世闻名的资深政治家，一个复杂的美国人，但他也是一个平凡的人，也具有我们的力量和缺陷，只是也许它们在他身上燃烧得更加猛烈。他在伟大的力量和不可避免的明显弱点之间努力达成和解。我们观察过他，看见他才智出众，光彩夺目，也看见人固有的缺点导致了一些悲剧性的事件。他希望后人记住他是在各国之间谋求和平的使者，但后人也该记住，在半个世纪的人类历史上，他奔跑、跌倒、爬起来、继续奔跑，一股顽强的动力驱使他与国家和解，最终也令自己获得安宁。

译 后 记

《冬天里的尼克松》中译本终于问世了。

这是一部记录离开白宫后尼克松最后岁月的力作，也是作者莫尼卡·克罗利跟他一起工作四年的不平凡的回忆录。

理查德·尼克松(1913—1994)，1913 年 1 月 9 日生于加利福尼亚州约巴林达村清寒的普通人家。1937 年从杜克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到菲蒂尔当律师。1942 年参加美国海军，获少校军衔，1946 年 1 月退伍。同年，他当选国会议员。1950 年他继续当选国会议员。1952 年成为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1956 年他又跟艾森豪威尔一起当选连任。1960 年他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没有成功。1962 年他以共和党候选人身份参加加州州长竞选，又遭失败。1963 年他从洛杉矶移居纽约市，一面继续重操律师职业，一面加强与东部财政寡头集团的联系，奠定自己重新崛起的政治基础。1968 年，他又以共和党候选人的资格竞选总统，终于战胜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当选为美国第 37 届总统，1969 年入主白宫。1972 年尼克松总统应邀来华访问。2 月 28 日中美双方联合发表了《上海公报》，开始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同年11月，尼克松以绝对优势再次当选总统。1973年3月，华盛顿地区法院受理水门事件，即1972年6月17日共和党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以尼克松竞选班子成员詹姆斯·麦克科尔德为首的五人偷偷地潜入首都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盗窃，结果被警察发现逮捕。后来，事情越闹越大。民主党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揭露尼克松政府的许多非法活动，最后涉及尼克松总统本人。1974年8月9日他不得不辞去总统职务，以避免国会弹劾。

辞职后，尼克松回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克利门蒂，开始写作回忆录和有关著作，先后出版了《六次危机》、《尼克松回忆录》、《领导人》、《1999年：不战而胜》和《超越和平》等书。后来他移居纽约市，并曾再度访问中国和苏联等地，受到热烈的欢迎。他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写作，关注国际政治时事和国内的政治生活，不断为里根总统、布什总统和克林顿总统提出外交政策方面的建议，受到应有的重视和尊重。1994年4月尼克松在纽约市寓所因病去世。

《冬天里的尼克松》如实地记录了尼克松对于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形势、中美关系、海湾战争和结束越南战争的看法，反映了作为战略家的尼克松，对于国际问题的远见卓识。他果断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断了20多年的中美关系走上新的道路。这个历史性贡献是他一生的重大业绩之一。他还顺应美国人民的心愿，结束了长达10年的越南战争。

应该指出：作为美国共和党的政治家，尼克松始终是美国利益的捍卫者。如何捍卫美国的全球利益成了他一切考虑的出发点。同时，他善于从大局和未来着眼制定对策，分析和研究重大国际问题。他是个杰出的外交家。但是，尼克松又

是个保守的思想家。他一生始终反对共产主义。也许正是这一点使他有条件采取果敢的措施,恢复中美的外交关系,并获得国会里两党的一致支持。当然,他的历史性贡献是不容抹杀的,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尼克松对于我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和国家领导人仍有不少偏颇的看法。他在与莫尼卡·克罗利的谈话中多次提到"自由"、"民主"、"人权"等问题。他的许多见解,我们不能苟同。读者在阅读时要多加思考。

莫尼卡·克罗利在书中指出:"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尼克松以不断改变自己的形象,成为一种更有效、更坚定的政治力量,成为一个'新尼克松'而闻名于世。他在跌了一跤以后又以奋斗不息的雄心壮志爬上更高的地位。"水门事件后,尼克松告别了白宫,政治上和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打击。但他毫不气馁,更不屈服,及时地调整心态,总结历史经验,寄希望于未来,终于以新的形象在政界、思想界和外交界重新崛起,再次获得政界同仁和广大民众的尊敬与信任。他一生经历过无数次挫折和失败,但每一次失败都没有摧毁他的精神堡垒。相反,每经历一次失败,他都仿佛变得更坚强了,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是个不平凡的结局,史诗般的结局。也许,这就是本书的积极意义之所在。

全书由杨仁敬负责译前言和第一部分,詹树魁译第二部分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周南翼译第二部分的第三章至第五部分;最后由杨仁敬审校统稿,进行必要的文字修饰,保持原著的文风。由于时间仓促,译文难免有疏漏之处,欢迎读者指正。

杨仁敬

于厦门大学敬贤楼

1999.9.25